

八九民運實錄（二十周年再版）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著
香港記者協會出版




獻 給
一九八九年愛國民主運動中
奮起挺身的同胞；
無私無畏地犧牲的中國公民；
以及
仍然在苦難中不屈抗爭的鬥士。

下一頁





第一章　學運始末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第二章　人物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第三章　專題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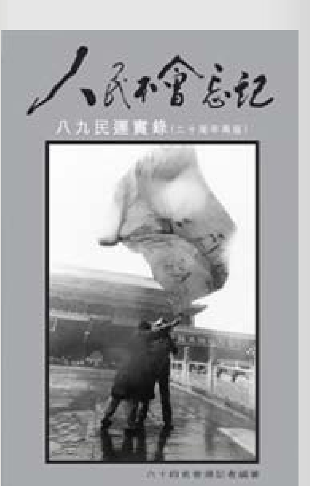




第四章　新聞界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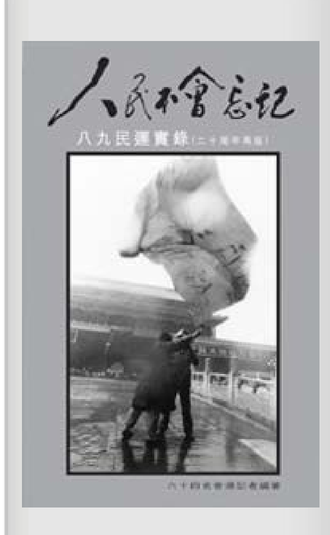




第五章　文獻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八九民運大事記（四月十五日—七月十八日）

4.15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心臟病發逝世。北京各大學出現悼胡大字報。

4.17 三千名北京大學學生從校園步行至天安門廣場，向全國人大常委會 遞交請願信，提出重新評價胡耀邦等七項要求。

4.19 數千名大學生深夜聚集在中南海的新華門外，高呼「李鵬出來」與 學生對話，其後衝擊新華門，並與軍警衝突，有學生和記者受傷。

4.20 北大校園出現大字報批評公安人員毆打學生，又指責新聞媒介歪曲 報道。北大成立「團結學生會」。南京、上海、合肥、天津、武漢 均有遊行示威。

4.22 中共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胡耀邦逝世追悼會，拒絕讓學生參加。廿萬 學生和群眾同時在天安門廣場追悼。長沙和西安發生暴亂。

4.23 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赴北韓訪問。北京學生發起無限期罷課。

4.24 原定出版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因刊載悼胡文章，遭上海市委 禁制發行。

4.25 政府首次提出與清華學生對話「流產」。罷課學生湧上街頭宣傳 及募捐。

4.26《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

4.27 北京出現建國以來場面最大，歷十四小時的群眾遊行，抗議《人民 日報》社論。廿萬學生參與，百餘萬群眾夾道吶喊助威。國務院下 午同意與學生對話。

4.28 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成立，吾爾開希任主席。

4.29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和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跟全國學聯邀請的學生

對話，吾爾開希因被禁發言而退席。北高聯不承認是次對話。

4.30 《人民日報》一百五十名記者不滿禁制《世界經濟導報》，要求與 該報高層對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與學生對話。趙 紫陽從平壤返京。

5.1 北高聯發表《告香港同胞書》，呼籲港人支援。

5.2 北京學生組成「對話代表團」，分別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 常委遞交十二項要求，要求廿四小時內答覆，否則再上街遊行。

5.3 袁木拒絕與學生對話，稱北高聯為非法組織，並指學生背後有「黑 手」。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大會」，表示要愛護青 年，但強調必須創造安定的局面。

5.4 十餘萬學生和大批記者遊行，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及爭取新聞自 由。趙紫陽對亞洲發展銀行成員發言，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並指 出民眾不滿在於法制不健全，腐敗不能及時清除，政治透明度不夠，提出要與學生和群眾廣泛對話。

5.5 除北大和北師大外，其餘北京高校普遍復課。

5.9 逾千名新聞記者和編輯向全國記者協會請願，要求與主管宣傳的領 導對話，討論《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擴大新聞自由，實行總編輯 責任制。學生到場聲援。

5.13 二千多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爭取與官方對話。

5.14 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和教委主任李鐵映與學生對話，但在是否撤回「 四˙廿六」社論和電視直播對

話的問題上無法協議，不歡而散。公 安局宣布翌日封閉廣場，以迎接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到訪。

5.15 六十萬學生教師和知識分子到廣場聲援絕食學生，逼使迎接戈爾巴 喬夫的儀式改在機場舉行。二十名大專學生在香港新華社門外絕食 聲援北京學生。

5.16 趙紫陽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透露黨內機密，說國內最重要的問 題，仍由鄧小平掌舵。天安門廣場絕食人數增至三千，超過四百 人暈倒入醫院。

5.17 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在北京實施戒嚴。趙紫陽會後發表書面談話， 肯定學運，保證不會「秋後算帳」，呼籲同學停止絕食。絕食學 生不支送院達二千人次。逾百萬來自各界和黨政機關的群眾幹部 上街，高叫鄧小平和李鵬下台。嚴家其、包遵信等知識分子發表 宣言。

5.18 四名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和胡啟立）清晨往醫院探 望絕食不適的學生。李鵬隨後與王丹、吾爾開希等十多名學生「 對話」，結果不歡而散。深圳大學黨員要求鄧小平引退。

5.19 趙紫陽、李鵬破曉前到廣場探望學生。趙含淚說「來遲了」，並 勸學生停止絕食。晚上九時，學生停止絕食轉為靜坐。三小時半 後，李鵬在黨政軍大會上指學運為「動亂」；國家主席楊尚昆宣 布派解放軍入城，強調軍隊不是為對付學生。學生聞訊宣稱再絕 食。上千逾萬群眾上街堵截軍隊。

5.20 李鵬宣布十時起在北部部分地區戒嚴。市長陳希同頒佈三項戒嚴 規定，禁制一切遊行、集會、罷工、罷課、採訪等活動。

5.21 學生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呼籲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緊急會議； 嚴家其、金觀濤等發表《保衛憲法宣言》，要求撤銷戒嚴令。逾 百萬香港市民上街遊行支持北京學生，創下歷史紀錄。「全港市 民聲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成立。

5.22 吾爾開希擅自要求學生撤離廣場而被罷免北高聯主席職務；聯會 改為集體領導。在加拿大訪問的人大委員長萬里首次肯定學潮是 愛國運動。

5.23 近百萬人違反北京戒嚴令冒雨上街遊行。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 畫像被三名外地人弄污。萬里突然縮短行程回國。

5.24 五十七名全國人大常委聯署要求召開常委緊急會議。

5.25 萬里回國後以健康理由暫住上海。北京再有百萬人示威。

5.26 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表決支持李鵬及楊尚昆「五˙一九」的講話。

5.27 北高聯、廣場指揮部等建議五月卅日撤離廣場。李先念、萬里表 示擁護「五˙一九」李鵬及楊尚昆的講話。香港演藝界舉行十二 小時馬拉松音樂會「民主歌聲獻中華」，三十萬市民參加，籌得 一千二百萬元支持北京學生。

5.28 「全球華人民主大遊行」，香港近百五萬群眾上街遊行，世界各 地華人響應。

5.29 北京及外地學生出現分歧。廣場總指揮部四名常委集體辭職，學 生將撤走日期延至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會議開幕之後。上海學生 則號召空校行動。

5.30 學生塑造的「民主女神像」在廣場豎立。首都工人自治聯會三名 負責人被警察帶走，近一千名工人及學生在市公安局前聚集要求 放人。

5.31 官方的天安門管理處指責學生豎立女神像。政府發動北京南郊近 萬農民遊行支持李鵬。

6.1 柴玲及封從德聲稱險遭同學綁架。

6.2 台灣歌手侯德健、北師大講師劉曉波、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 部長周舵、《師大周報》前主編高新，在廣場絕食抗議戒嚴。港 支聯代表李卓人抵達北京送款支持學運。

晚上，一輛軍用吉普車在復興門外撞倒四人，其中三人喪生。為 數萬餘軍人在北京飯店附近被群眾學生堵截後撤走。

6.3 軍警在廣場以西發射催淚彈、毆打和驅散人群，在六部口奪回失落在 群眾的槍械。晚間不斷廣播警告市民不得上街。深夜裝甲車在通衢大 道清理路障，為進城士兵和坦克開路；士兵槍擊攔截的市民。

6.4 血腥鎮壓。非官方人士估計死近三千人，袁木後來則說只有三百多

人死，學生只佔廿三人。成都也發生暴亂，據報軍警槍殺三百餘人。 數以十萬計香港市民參加黑色大靜坐，抗議解放軍屠殺市民學生。

6.5 各國開始譴責中國政府，並自北京撤僑。香港「支聯會」代表李 卓人在機場被公安人員拘留。

6.6 最後一批香港記者撤離北京；外國記者仍留京採訪。

6.8 李鵬探望及讚揚戒嚴部隊。官方否認在廣場開槍殺人。李卓人獲 釋放返港。

6.9 自五月十六日見戈爾巴喬夫後，鄧小平首次公開露面，接見軍人， 發表講話指民運為一場「反社會主義的暴亂」。

6.11 香港居民復旦大學學生姚勇戰因參與學運在上海被捕。官方宣布 通緝方勵之夫婦，但他們目前已躲進美國大使館。中國駐外使官 首批變節；三藩市兩名領使館官員宣布不支持北京政權，尋求美 國庇護。

6.13 中國公安部通緝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廿一名學生領袖。

6.14 《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被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高狄接替；總編 輯則由軍人邵華澤取代譚文瑞。

6.20 中共不顧多國首腦呼籲，在上海處決三名被指焚毀火車的男子。

6.23 中共召開十三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審議趙紫陽在「反黨反社 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的錯誤」。

6.24 四中全會結束，趙紫陽被免除黨內一切職務；選出上海市委書記 江澤民為新總書記；罷黜胡啟立、芮杏文和閻明復，選出宋平、 李瑞環入政治局常委會，丁關根入書記處。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會議決定一系列清黨整黨措施。

6.29 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改變了原訂議程，首先學習四中全會文件。 會議免除了趙紫陽僅餘的國家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職務。

7.3 王丹潛回北京，與台灣《自立晚報》記者黃德北會面時，被追捕， 稍後失蹤。黃德北翌日被捕。

7.4 吾爾開希和嚴家其逃離大陸在法國巴黎發表《國殤月宣言》，譴 責屠城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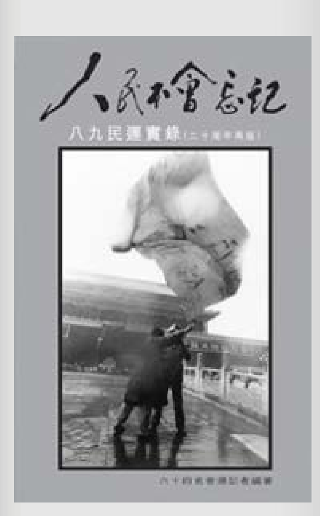
7.11 中共考慮對台關係後釋放黃德北。

7.18 嚴家其、吾爾開希、萬潤南、蘇紹智和劉賓雁五人在巴黎倡議成立 「民主中國陣線」，團結海內外華人，以和平非暴力手段推翻專 政。

《人民不會忘記》編輯委員會

1989年7月





二十年大事記（**1989-2009**）

1989年

6月4日：北京發生天安門流血慘劇。

6月11日：公安部發出「關於堅決打擊反革命暴亂分子和打、砸、搶、燒、殺犯罪分子的緊急通知」，通緝全國民運人士。

6月24日：因同情「六四」民運，趙紫陽被中共13屆四中全會撤銷總書記、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江澤民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7月3日：王丹在北京被捕。

9月22日：「六四」後流亡海外的嚴家其、陳一諮等在巴黎成立民主中國陣線。

10月14日：港人羅海星在深圳營救民運分子行動中被捕，後來判刑5年，91年釋放回香港。

10月20日：「黃雀行動」兩位成員李龍慶、黎沛成在湛江救援王軍濤和陳子明時被官方逮捕。自6月中旬開始，港支聯「黃雀行動」陳達鉦在香港展開地下營救行動，先後營救133人，當中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陳一諮、蘇曉康等六四被通緝及在逃亡的民運人士，從深圳、珠海、海南經香港中轉至其他國家。

11月9日：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由江澤民繼任，劉華清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楊白冰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1990年

1月11日：政府解除自5月20日早上10時起在北京部分地區所頒布的戒嚴令。

11月24日：王軍濤被控「散播反革命宣傳」、「煽動叛亂」判刑13年。

1991年

5月：丁子霖接受美國廣播公司(ＡＢＣ)採訪，譴責中國當局鎮壓「六四」，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受難者及家屬的命運。自此，丁子霖開始「六四」受難者群體的尋訪救助工作。

11月：因美國國務卿貝克訪問中國要求釋放民運人士，包遵信、韓東方及王有才等獲提前假釋。

1992年

1月18日到2月21日：鄧小平「南巡」，發表有關經濟改革開放的重要談話。由於「六四」鎮壓後外界擔心中國會收緊經改步伐，有32名資深黨員曾建議取消所有經濟特區，鄧小平南巡講話表明繼續維持改革的方向，促進了國內的經濟改革進程和社會發展。鄧小平把胡耀邦和趙紫陽下台的原因，歸咎為「政治犯錯」，而非他們加速經濟增長的手法。之後，中共十四大召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全面確立，取代「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

3月：韓東方獲准赴美醫病。

1993年

2月17日：中國政府提前四個月釋放王丹，同月27日，提前兩年釋放王希哲。

3月27日：江澤民被鄧小平指定為接班人，出任國家主席、軍委主席；榮毅仁出任國家副主席；李鵬連任國務院總理；喬石出任為人大委員長；李瑞環出任全國政協主席。

8月11日：韓東方回國被拒，遭驅逐出境，吊銷護照，滯居香港至今。

1994年

4月23日：王軍濤獲准赴美醫病。

1995年

4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陳希同辭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常委、委員的職務。

5月21日：王丹、劉曉波等因聯名上書，王丹以「顛覆政府罪」再次被捕，重判11年；劉曉波、廖亦武等被關押拘留判刑，其他聯署者許良英、林牧等老人被軟禁在家不准外出。其他聯署人亦被拘留、勞動教養、強制傳訊、抄家等。海外民運團體發表《聲援中國知識界公開信》，籲請聯合國與國際社會伸出援手，對北京當局侵犯人權的行為表示嚴重關切和抗議。

5月26日：丁子霖等27位天安門母親難屬首次以聯署方式致函人大常委會，要求對他們親人的死有個負責的交代。

1996年

5月28日：以丁子霖為首的31名「六四」受難者家屬，再次聯名去函人大常委會，要求組成專門的「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公布死難者名單、依法作出相應賠償及追究責任者的刑責等。

1997年

2月19日：鄧小平逝世。

9月：前胡耀邦秘書林牧上書人大，呼籲平反「六四」。

11月16日：魏京生獲「保外就醫」離開中國，流亡美國。

1998年

3月19日：李鵬十年總理任期屆滿，朱鎔基當選總理。朱鎔基在當日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回應記者提問時談到「六四」事件，表示 「對於發生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 …… 我們黨和政府的歷次會議對此都作出了正確的結論， 這個結論不會改變」。朱鎔基是用 「政治風波」形容事件，不再用「六四」期間的官方用語「動亂」。朱鎔基當時更表明，若到訪香港遇到要求平反「六四」的示威，只要活動合法，都是香港人的自由。

4月19日：中國政府允許王丹「保外就醫」前往美國。

5月29日：安徽異見人士王洪學準備赴京悼念「六四」死難者，向領導人遞交平反「六四」公開信，被公安部門抓走，並遭拘留15天處罰。

5月31日：大陸5省市21名異議人士發出一封致人大、政協等的公開信，提出9項建議，要求平反「六四」並公開向人民道歉等。

6月20日：林牧上書促請當局平反「六四」，推動政治改革，公安則阻撓外國記者訪問他。

1999年

2月6日：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在北京成立。

3月25日：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去信中央領導人，促請中央主動平反「六四」。4月9日公安人員到鮑彤家，指他的信危害國家安全。鮑彤自1998年5月申請護照到美國探兒子，申請也被拒絕。

5月15日：丁子霖等105名「六四」受難者家屬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提交控告書。請求最高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1989年6月在北京發生的政府命令軍隊大規模屠殺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嚴重流血事件，追究參與這場屠殺事件最高決策、並對屠殺事件負有主要責任的原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法律責任。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已找到的155位死難者之中，僅學生就有62名，包括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51名，中學生和小學生11名。在這些死難者之中，年齡最小的僅9歲，最大的61歲。經反覆查詢、核實，在目前已知的155位死難者和65位傷殘者中，無一人有任何暴力行為，他們均屬於那場屠殺事件的無辜受害者。

5月30日：丁子霖等「六四」死難者家屬致江澤民及朱鎔基公開信，要求平反「六四」，以及公布「六四」死難者名單。

6月2日：鮑彤通過一盒運到美國的錄影帶，公開評論「六四」，並要求中共當局平反「六四」。

6月4日：「六四」十周年，王丹經由港支聯發起「全球簽名運動」，共收集近六萬八千多個簽名，全球則收集了近十萬個簽名，共一百二十五個國家及地區參與；其中，單是香港籌集的簽名人數已佔總數的一半。

2000年

6月4日：內地4個城市50名異見人士展開24小時絕食行動，悼念「六四」死難者，並要求平反「六四」。另3名來自北京及遼寧的異見人士去信當局，要求平反「六四」，及後被捕。

6月4日：踏入千禧年的第一個「六四」周年紀念，約28,000名香港各界市民參加維園燭光悼念晚會。

8月15日：國家主席江澤民接受美國CBS「60分鐘時事」節目主持人華萊士訪問，被問到是否欽佩天安門上擋坦克的年輕人，江澤民說理解89年時學生要求民主自由的激情，但不贊成在緊急狀態下對政府行為的當場反對。江澤民同時指出，當時坦克停了，沒有壓過去。以坦克沒有壓過示威者說明戒嚴部隊的克制，一直是北京官方反駁外界指「六四」是大屠殺的說法。但該訪問內容沒有在中國內地公開播出。

2001年

3月5日：18名異見人士致人大公開信，要求平反「六四」。

12月19日：王若望病逝。他曾因參與八九民運被捕，入獄14個月。自
1992年流亡美國後一直不能回國。

2002年

11月15日：胡錦濤出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

2003年

3月3日：丁子霖等115位「六四」難屬在全國十屆人大召開前夕發出公開信，向即將產生的新一屆人大常委會提出三項要求：一，組成「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進行獨立、公正的調查並公布包括死者名單和人數的調查報告；二，全國人大責成政府對每一位死者親屬作出個案交代，制訂賠償法案並依法給予賠償；三，責成檢察機關對「六四」慘案立案偵察，按法律程序追究責任者的法律責任。

3月15日：胡錦濤當選為新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曾慶紅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溫家寶獲任命為國務院總理，賈慶林為全國政協主席，中共第四代領導正式集體接班。

6月2日：「天安門母親運動」以特快專遞郵寄近22,000個香港市民的簽名，促請最高人民檢察院立即立案偵查「六四事件」真相，向受害者及其親屬作出賠償，追究侵犯人權者的法律責任。

6月4日：「六四」十四周年燭光集會，約有55,000人參加。大會播出丁子霖致辭的片斷。

2004年

1月16日：「六四」喪子的蘇冰嫻女士在京去世。蘇女士「六四」期間失去兒子趙龍，之後作為天安門母親與丁子霖一起，不斷為「六四」難屬的權益而奔走。截至2009年，已有20位難屬相繼去世。

9月19日：江澤民辭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2005年

1月17日：趙紫陽逝世。他因八九年同情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最終在軟禁中度過15年的餘生。18日，北京有四、五百名上訪民眾，自費購買花圈，人人佩戴小白花或黑紗，手舉「悼念我們的好總理」的橫幅，前往趙紫陽住宅富強胡同致哀，但在胡同口被上百員警和大批便衣攔截。另有退休政要不理中央禁令，前往八寶山出席殯葬儀式。21日，港支聯舉辦趙紫陽悼念燭光集會，參加人數高達一萬五千人。

2月19日：中共黨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和諧社會的六大基本特徵：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12月5日：劉賓雁病逝。劉是前《人民日報》記者，被讚譽為中國的良心，曾經被打成右派，因揭露中共腐敗，兩次被中共開除黨籍，自1988年流亡美國，曾申請回國，但不獲批准。

2006年

10月8日：胡錦濤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口號，成為這屆政府試圖消弭社會矛盾的執政理念。

12月：中國在全國範圍查繳尚未出版但已在中國地下翻版流傳的《六四詩集》。2007年11月12日留美學生吳強因攜帶該書入境，遭中國政府逮捕審訊。

2007年

5月27日：「黃雀行動」指揮陳達鉦首次於美國紐約公開亮相，接受電視專訪。

6月3日：晚間，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丁子霖、徐珏、馬雪琴，首度在北京市木樨地街頭祭奠被解放軍槍殺的兒子蔣捷連和吳向東，現場有便衣公安監視但沒有阻止拜祭。

6月4日：多位民運領袖同時在網絡上舉行「六四」紀念網聚，由王丹與自由中國論壇網站共同發起，與王軍濤、陳子明、劉曉波、浦志強等許多民主人士，共同討論有關中國民主的問題。國內的維權律師浦志強表示「六四」不能被遺忘、不能走進歷史，否則歷史就會重演。

8月1日：「六四８人縱火焚燒軍車」案中唯一倖存者王連喜出獄後無家可歸，於2008年奧運會前夕，被有關部門送進了精神病院至今。

10月28日：支持「六四」民運的知識分子包遵信病逝。

2008年

3月15日：全國人大會議選舉胡錦濤為國家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習近平為國家副主席，吳邦國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5月28日：天安門母親開設網站，公開「六四」天安門慘案死難者名單、難屬證詞、遇難地點和死亡醫院示意圖。

6月4日：全球各地中外人士舉行「六四」19周年紀念，要求中國釋放政治犯，改善人權。香港維園「六四」燭光晚會被中央電視台描述為香港市民悼念四川汶川大地震死難同胞。

2009年

2月26日：天安門母親團體自1995年以來，第15次致函給「兩會」代表和委員。公開信呼籲當局衝破「六四」禁區，要求討回「真相、賠償及問責」。在歷年參加簽名上書的難屬中已有19人故世。

3月：多位內地學者在兩會期間發表公開信，要求特赦中國政治犯、呼籲成立專門機構，重新處理「六四」事件及提出「六四」和解的建議。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亦聯署公開信，要求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重新查處鄧小平和李鵬濫用國家暴力，屠殺和平市民的事實和責任。

《人民不會忘記》編輯委員會

2009年5月



申請基金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由該書所得收入成立，供有助促進國內新聞、言論和出版自由的項目申請，歡迎申請者提交計劃書，連同項目支出預算，填妥表格，寄回香港記者協會，由"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編輯委員會負責審批。

申請表格 (PDF 下載)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目 錄



作 者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圖片區



四月初，北大出現第一張倡議校園民主的大字報。 羅綺萍攝



充滿使命感的中華兒女。 冼偉強攝



四月十九日凌晨，北京學生第一次衝擊新華門。 陳木南攝



新華門前告御狀。 陳木南攝



壯歌送君行。 冼偉強攝



學生心目中的胡耀邦。 陳木南攝



四˙二零新華門流血事件。 羅綺萍攝



群眾夾道送別胡耀邦。 陳木南攝



鄧小平一語定性。 陳木南攝



前仆後繼保衛天安門廣場。 黃勤帶攝



拍下歷史性的四˙二七。 陳天權攝



旗幟鮮明的北高聯。 梁耀榮攝



在生命中的這七天。 冼偉強攝



絕食行動破釜沉舟。 冼偉強攝



學生問：「餓你兩天看？」 陳木南攝



搶救絕食學生。 羅綺萍攝



漫畫反映出學生情懷。 陳木南攝



廣場上出現俄文標語。 冼偉強攝



五˙一七全民遊行。 葉英傑攝



解放軍在北京市郊候命。 冼偉強攝



小孩子可知道發生什麼事？ 陳木南攝



亞洲週刊提供



戴起口罩防催淚瓦斯。 陳木南攝



一名大學生臥在車輪下，阻擋軍隊進城。陳木南攝



北京市民向軍隊提供食水、食物。 陳木南攝



外省學生眾志成城。 陳木南攝



市民護送「民主女神」到天安門廣場。 陳木南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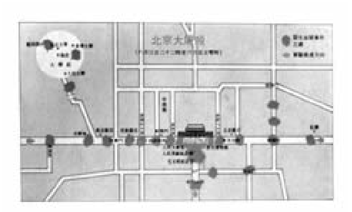
自行車敢死隊。 陳木南攝



掙破樊籠的新聞報道。 陳木南攝



一夫當關。 冼偉強攝



軍隊屠城，死傷無數。亞洲週刊提供



六月三日凌晨，娃娃兵進城。 陳木南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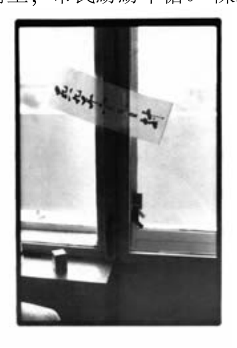
長安街上，市民紛紛中槍。 陳木南攝



學生從廣場東南面撤離。學生提供



被屠殺者屍體滿布復興門醫院殮房。 陳玉華攝



六月五日北京飯店露台門窗被封。 陳木南攝



解放軍鏡頭下的天安門廣場，及所謂的「反革命暴亂」。這組圖片自北京街頭佈告板上翻攝。



解放軍鏡頭下的天安門廣場，及所謂的「反革命暴亂」。這組圖片自北京街頭佈告板上翻攝。



解放軍鏡頭下的天安門廣場，及所謂的「反革命暴亂」。這組圖片自北京街頭佈告板上翻攝。



中共政府進行全國性搜捕行動。 中央電視台



王丹 。葉英傑攝



吾爾開希 。黃勤帶攝



柴玲和封從德。葉英傑攝



馬少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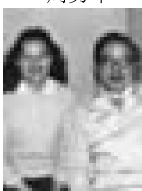


楊濤


周勇軍


王超華


沈彤


方勵之夫婦


嚴家其


包遵信


戴晴


韓東方


學生愛國心佈滿紀念碑上。 冼偉強攝

橫眉冷對千夫指。 陳木南攝


大批香港物資運抵天安門廣場。 陳天權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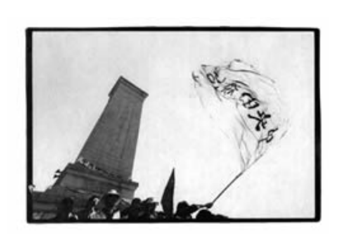

學生說：「我們不養狗了。」 冼偉強攝


直升機在廣場上空撒放解釋戒嚴令的傳單。 冼偉強攝


四月二十二日西安新城廣場的警民衝突。 學生提供



亞洲週刊提供


中央電視台的旗幟飄到紀念碑上。 陳木南攝


為自由、民主踏出的一步。 冼偉強攝

回前







申請基金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由該書所得收入成立，供有助促進國內新聞、言論和出版自由的項目申請，歡迎申請者提交計劃書，連同項目支出預算，填妥表格，寄回香港記者協會，由"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編輯委員會負責審批。

申請表格 (PDF 下載)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人民不會忘記》

People Will Not Forget

A chronicle by 64 Hong Kong reporters

on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in 1989

It was an unprecedented act. And it's unlikely to be repeated in future.

In 1989, after witnessing and reporting news on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a total of 64 Hong Kong reporters put their heads together to compile a comprehensive, first-hand account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of the movement that ended with the military crackdown at and around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4, 1989.

The 400,000-word book, entitled People Will Not Forget 《人民不會忘記》, was written in Chinese.

It was first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July 1989, less than two months after the crackdown. Though working for different media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then, 64 journalists held out the same hope of telling the truth, setting the record.

More than 50,000 copies have been sold after it went on sale. With stock running out, no more copies of the book were available in bookstores in recent years.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took note of the view that most young people know little about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1989. So, it reprinted more than 10,000 copies in 2009,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ve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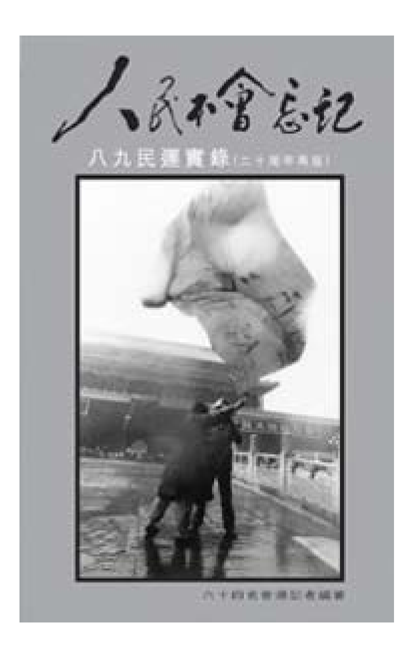
The latest re-print version contains no substantial change to the content, including text and pictures, and the book size. The purpose is to maintain its originality. The only new addition is a preface and an extended chronology that chronicles major developments related to the movement in the past 20 years.

By making new copies available and put it online, it is hoped that students and society at large will be able to view from a journalist perspective of the events 20 years ago.

Proceeds of the book, as in the past, will go to the People Will Not Forget Fund which is aimed at promoting press and publication freedom in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Fund is managed by the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is also posted online. Only Chinese language version is available.

www.hkja.org.hk/1989report


人民不會忘記
八九民運實錄



再版序言

編輯委員會

二十年，轉瞬即逝。一件二十年前發生的事，置於歷史長河，不過是涓涓細流；驀然回首，甚且驚夢無痕。誰還耐煩去攪動腦神經，翻揭二十年前的舊記憶？

是的，絕大部分世事是不值一記的。但是有些事件卻是驚世駭俗，令人永誌難忘。當時置身其中的人，固然刻骨銘心；旁觀者耳聞目睹，同樣為之震撼。那是二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在北京。

那年那月，當時當地，流灑的鮮血一直未得報償，留下的懸案至今無人釋惑，枉死的冤屈何以慰解！因此，這事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一根刺，當日知悉情勢的人不應忘記，當日關懷國是的人不會忘記，當日身處其間的人更不能忘記。

雖然，北京距離香港相當遙遠，但是從二十年前的四、五月開始，這場由反貪污反腐敗、爭人權爭民主的學生運動及知識分子議政，一步一步演化成為政治鬥爭、流血鎮壓的亂局，始終吸住港人的目光，牽動著港人的神經，通過媒體及時報道，港人每天關注著事態的發展。直到六月四日。北京慘變，在京採訪的香港記者逼不得已急忙撤退。為了讓歷史記載住這件大事，六十四名曾採訪北京民運的香港記者迅速集合起來，將大家所瞭解的北京民運始末，綜合報道，組成一幅縱橫交錯的京城變亂圖。相信沒有一個個人能對全局有深入理解，中國政治架構的封閉性更為事態籠上厚紗，但是為了梳理出較為全面的場景，香港記者不惜打破工作機構的界限、放下搶新聞的惡性競爭，全心全力撰寫一己的所見所聞，集眾人之力互補不足，在不足兩月之內，出版了這本新聞界前所未有地合作的新聞紀事書籍：《人民不會忘記》。

港人與港記同樣關懷國是。本書出版後，瞬即售罄，重印又重印，至當年十二月又出版了增訂版，銷售總數超逾五萬本。由於本書早已銷售一空，因此多年來書店內均無本書踪影。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來說，是沒有甚麼問題的，因為當時關心時事的人，大概已是人手一本的了。時移勢遷，「六四」時的小孩以及其後出生的嬰兒，至今陸續成長，然而，他們對此事已無法能道其詳了。除非家長是有心人，特別提供相關資料，否則，若問「八九民運」、「六四事件」是甚麼，相信多數年輕人都是印象模糊。至於曾購買本書的人士，也有可能因年日久遠而失落散佚此書。

提供事實、報道真相是記者的職責，紀錄「八九民運」、「六四事件」更是當日曾參與採訪的記者的歷史任務。這項任務，我們曾經履行了，但不能說已完成責任。為了讓年輕一代認識此事、為了讓這項記載繼續留存，編輯委員會決定藉二十周年的機會，再版此書，俾得廣為流傳。

二十年世事變化很大，但是，我們紀錄下來的，是我們自己親眼所見、親身所受，這些都不是世局演進所能更改的事實。當然，正如此書中曾有文章分析：由於對新聞幕後的瞭解不足，我們的敘述或許有局限、有偏差，可是，二十年來，又何曾有真正的「知情人士」為世人解說：何以會出現六四的血腥局面？究竟當晚京城發生了甚麼事？既沒有更進一步的全面敘述，我們深信，我們憑藉記者的良知、為世人呈獻的這一份紀錄，是值得繼續留存的。我們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編寫一部新書。為此，編委會決定只作重印、不作修改，除了錯別字需要訂正之外，全書保留原貌，只增編了一份二十年大事記，追溯這些年來官方對六四的處理手法、評論態度的演變，並紀錄了涉及這場運動的學生領袖、知識分子、黨政領導人多年來的動向。

二十年過去，當日的記者，今天很多已離開新聞機構，但是，書中屬於每一位作者的文章，永遠都是他／她的心血紀錄。再版一事由編委會辦理，編委會已知會六十四名作者。

另一方面，鑒於傳播方式日新月異，網絡傳播快捷有效，編委會同時將此書上載至網上，製成網絡版，相信更容易為年輕人所接觸。

與以往一樣，本書由香港記者協會出版，由當年銷售此書所得的收入來支付出版開支。至於再版的銷售收入，同樣會一如既往，撥入「人民不會忘記基金」，以作支持新聞自由之用。

重提舊事，不為名利不圖吶喊；只為：我們不能忘記。謹以此書，獻與關心中國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所有人士。

《人民不會忘記》編輯委員會
2009年5月4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驚蟄（四月十五日前）

心受重創的巨龍，不願聽虛偽的安撫，

多災的華夏，不願任政客清談，

羸弱的母親，不再容忍貪官吸血，

炎黃的子孫，必須掙脫專制的羈絆，

醒來吧，人民大會堂，

假如你還屬於人民。

——野夫(1989　4　24)



四月初，北大出現第一張倡議校園民主的大字報。 羅綺萍攝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校園內外，蓄勢待發

范卓雲 潘潔





充滿使命感的中華兒女。 冼偉強攝

一九八九，人民不會忘記。.

中國人民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還有民運分子魏京生被捕十周年，中共派解放軍平定西藏一九五九年流血事件三十周年。

歷史的擔子對中華民族來說，今年彷彿特別沉重。

人民怨聲四起

中共推行十年改革開放之後，出現了震盪人心的社會紊亂和政治經濟危機。雖然改革帶來建國後最豐裕的物質生活，但人們面對社會風氣日漸敗壞，重商主義抬頭，「讀書無用論」風行，物價飛漲，官倒成災，舉國湧現出國潮，教育事業瀕臨崩潰，貧富差距擴大等。在人民生活條件稍為改善的表象之下，社會上匯聚著人民對現狀強烈不滿的暗湧。

鄧小平把改革開放推上第十個年頭時，國內的經濟卻掉進混亂狀態。去年夏天隨物價改革掀起的搶購和提款風暴，吹襲十多個大城市，來勢兇猛。甚至被視作開放橋頭堡的廣州市，去年七月也出現搶購副食品和銀行擠提，驚動中南海。

去年官方物價指數升幅達兩位數字，沿海省市更高至百分之三十。但最令人民痛恨的，卻是日益猖獗的官商倒賣，官僚以權謀私，倒賣緊俏物資、原材料，甚至出口許可證，令已失控的通貨膨脹更趨惡化，高幹子弟貪污腐敗現象令民眾怨聲載道，懲治官倒成為去年底官方整頓經濟的重點工作。據報道，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曾親自下令調查八大中資機構，並指定先從與其長子鄧樸方任主席的中國殘疾人基金會有密切關係的康華公司著手調查，一時間好像要掀起廉政風暴。

由於去年農業失收，造成部分地區缺糧，工、農的生活水平都呈下降。一些城市工人以消極怠工、或罷工方式表達不滿情緒，全國總工會承認去年罷工事件有一百餘起。一些人為抵銷通脹的壓力，千方百計找「創收」門徑，遍尋外快，社會瀰漫著一股「世紀末情懷」。

八月初舉行的各省市領導人會議，就日益增多的犯罪活動和社會動亂發出警告，要求公安部門作好準備。他們認為其原因出自物價和工資改革失調所引發的民怨。會議結束不久，有報道說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參考東歐發展的經驗，下令公安部門研究東歐國家和南韓制止騷亂的方法，以免中國重蹈匈牙利、南斯拉夫或波蘭的覆轍。

改革急剎車，整頓甫出台

連番物價改革的震波，中共領導層已感到人民已承受不住改革的陣痛，社會經不起變動引致的紊亂，這使力促「硬闖物價關」的鄧小平和趙紫陽撞個焦頭爛額，在北戴河會議上慘遭挫敗。此時亦第一次傳出趙紫陽地位不穩的消息。

隨之而來的十三屆第三次中共中央全體會議，馬上把經濟改革剎住，重點落在「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三中全會標誌了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進一步遭受挫敗。總理李鵬、副總理姚依林等擁護陳雲經濟路線的保守派掌握大權，一團「鳥籠經濟復辟」的烏雲籠罩北京知識界，理論界對改革開放的前景感到悲觀。

隨著緊縮政策的推行，銀行信貸收緊，鄉鎮企業受到打擊，大量建設項目遭受壓縮或停建，幾個大城市數以十萬計從農村流入的工人被解僱，於是今年春節前後廣州、瀋陽、北京等地出現數以十萬，以

至百萬計的「盲流潮」，造成地方物資供應和就業緊張，威脅社會治安和穩定。

黨和政府都深知困難的日子已經降臨。今年三月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李鵬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承認某些政策失誤，藉此挽回人心，他也呼籲國民準備過兩、三年緊日子。

國家興亡，知識分子挺身而出

作為社會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也不禁驚呼：「中國是否將被開除『球籍』?」(註：球，指地球。全句指中國被擠於國際政治舞台之外。)為了拯救這個衰敗中的民族，各種思潮遂相繼湧現，並一波接一波地衝擊著社會和新一代。

去年六月，中央電視台播出《河殤》系列片集，引起社會各界極大反響。《河殤》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進行了一次大反思，通過批判「黃河文明」的特點和缺失，指出封閉型的黃河農業文明已衰老，喻示中國今後的生路應該趨向「海洋開放型文化」的發展。片集在校園掀起一片「河殤熱」，學生熱情投入討論中國未來的出路和發展，《河殤》的撰稿人蘇曉康、王魯湘和幕後顧問金觀濤、厲以寧、包遵信等，更在學生心目中樹立了開放改革思想先鋒的形象。然而官方一些人則指《河殤》散播民族虛無主義。

去年十月左右，「新權威主義」理論在學術界出現，倡導者是一些年輕的經濟學者，包括王滬寧、張炳九和吳稼祥。他們提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從自然經濟過渡往商品經濟客觀地需要政治上的相對集權，同時必須盡快完成從集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變。

「新權威主義」在學術界引起激烈的爭論。一些學者憂慮，在目前改革陷於極大困境下，若宣揚「新權威主義」並付諸實踐，必導致改革全面退卻，且為中國當前的專制獨裁政治提供理論依據，不利民主化進程。在大學校園內，「新權威主義」更成公開辯論、私下研討的重點課題，北大「草坪沙龍」更曾以專題討論方式探討這個理論，學生普遍對此理論提出嚴厲質疑。

知識分子多年來的生活窘境不單未見改善，而且趨勢越顯惡劣。教育經費捉襟見肘，佔國民生產總值不足百分之三，落後於發展中國家的水平。據國家統計局的材料顯示，在十二個行業的月平均工資中，教師收入居於倒數第三位，教師被迫賣茶葉蛋、補習賺取外快，社會上流行著「窮教授」、「傻博士」的說法，教師的待遇和社會地位之低，實屬世界罕見。從八四年九月至八七年九月間在職中小學教師和未就職的師範畢業生流失三十萬人，出現「有書沒人唸，有書沒人教」的局面。

面對如此局面，知識分子和教育界不斷大聲疾呼「中國將面臨知識真空的危機」，籲請當局馬上採取行動挽救。

今年一月六日，以敢言見稱的方勵之一封給鄧小平的信，掀起了聯名上書風潮，打破知識分子對民主運動的禁忌。方勵之建議為紀念中共建國四十周年，大赦魏京生及其他政治犯。

今年二月，詩人北島和曾參與一九七九年民刊工作的陳軍，發動簽名要求釋放政治犯，聯署者包括著名作家冰心、吳祖光、金觀濤、蕭乾、王若水、蘇紹智等卅三人。

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許良英和施雅風亦發起聯名上書，共有四十二位知識分子簽名；隨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新學科研究室副主任蘇煒發起另一次上書，著名政治學家嚴家其、《光明日報》記者戴晴、作家史鐵生等簽名。

在接二連三的上書潮中，知識界表現了空前的獨立意識，當時在美講學的前《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認為上書行動是自一九八七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以來國內危機與全民覺醒的必然結果，知識分子已摒棄逆來順受的傳統，煥發獨立個性。

危機四伏，步步為營

面對知識界日益強烈的民主要求，中共對國內外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呼聲不敢怠慢，不斷透過官方渠道重申魏京生是「反革命刑事犯」，非政治犯，絕對不可能獲得釋放。

三月，七屆人大二次會議和政協會議在嚴峻的政治氣氛中召開。李鵬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嚴厲批評自一九八七年以來推行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失誤，矛頭直指趙紫陽出任國務院總理期間出現的問題。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通篇以治理整頓為題，卻不見深化改革的新內容，而且完全沒有重提中共十三大由趙紫陽提出的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人大會議之後，關於趙紫陽將於今年夏天下台的消息更甚囂塵上，更傳出保守派領導人姚依林可能繼任總書記的說法。

兩會召開前夕，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委員的共產黨員都接到上層「知會」，要求他們在會議期間，避免提出針對政府的尖銳批評，以維護「安定團結」之局。而在會議期間，兩會代表的住所都守衛森嚴，記者要求採訪代表必須經過層層請示，經常不得其門而入。大會發言時候，兩會代表的表現頗有顧忌，慎言而保留，比諸七屆人大一次會議時的民主開放氣氛大為遜色。當時更發生了香港市民簽名要求釋放魏京生，請願信在天津海關被扣事件，赴京遞交簽名的六人代表團更受到公安人員如臨大敵的監視，引起海外輿論嘩然。引用香港政協委員徐四民先生的評語：「中共當時正感到自身危

機四伏，所以對小小事情都如臨大敵地處理，顯示它已失去自信心。」

可是一批進步敢言，在建制內頗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仍不顧禁忌，在人大政協會議期間，就體制及施政問題提出批評和建議。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在當時一個人大小組會上當面批評李鵬在過去一年工作中沒有執行中共十三大制訂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改革同步進行」的決策。在「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論與實踐」研討會上，溫元凱及嚴家其均指出，「單純經濟改革的孤軍深入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長期滯後，是十年改革的根本失誤」，大膽抨擊政治改革的停滯不前。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思源，就「人大議事規則」提出四點建議，要求從各方面制衡人大主席團權力，改變目前主席團凌駕於人大常委的違反憲法的狀況。知識分子在在表現出自「反自由化」以來罕見的積極性和參與熱情，他們在青年學生之間更發揮了深遠的影響力。

學生蠢蠢欲動

在大氣候下，北京校園內也隱伏著一片不安的沉寂。就在「五四」民主啟蒙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大學的校園內，記者可以看到同學忙於「經商創收」，或沉溺於舞會文藝活動，「麻派」(搓麻雀)、「托派」（出國考托福試）盛行，學生為謀出國而疲於奔命，本為國家精英的大學生在苦無出路的困境中，表現出莫大的無奈和消沉。

經過八六至八七學潮後的兩年沉寂，北大少數積極分子開始在校園內推動討論民主，並在今年初籌辦「民主沙龍」座談會，內容主要環繞當前中國民主化的問題，結果在沉寂的校園掀起了一股探求真理，追求民主的風氣。知識分子的上書亦激勵著一些蠢蠢欲動的學生，一群以王丹為首的歷史系一年級生，就把四封知識分子要求釋放政治犯的聯名信副本，先後張貼在三角地帶（北大學生活動中心地區，大字報欄所在地），使釋放政治犯和人權問題成為北大學生私下討論的熱門話題。

零星的民主之火雖未能迅速燎原，卻在沉寂的校園內掀起或大或小的波濤。三月初，北大和清華校園內分別出現抨擊專制獨裁的大小字報；三月廿九日下午，王丹等一群推動「民主沙龍」活動的同學，張貼了由方勵之撰寫的《中國的失望和希望》的文章複印本，文中提出中國必須實行「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的改革」，並呼籲中國人「反思五四的歷史教訓」、「民主和科學的精神」。

政府對國內廣泛響起呼喚政治體制改革及自由人權的聲音已起戒備，為防知識界的改革呼聲及民間對物價暴漲的普遍不滿相結合，李鵬在人大會議期間三令五申中國當前首要工作是維持「安定團結」局面，強調「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要符合國情，不能走得太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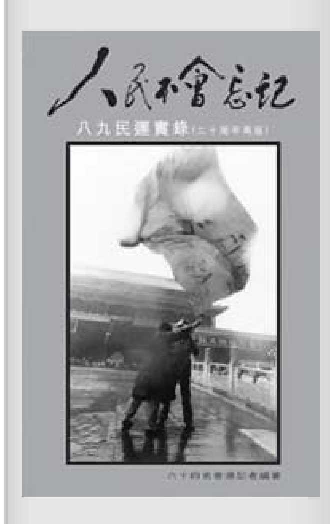
官方對學生可能利用五四紀念而上街鬧事顯然做足防備，在四月上旬已計劃了連串大型紀念活動，企圖疏導學生不滿情緒。今年二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向全國發出通知，整個五四紀念將以「愛國、改革、創業、奮進」八字方針為主調，鼓勵青年們結合五四運動對馬克思主義思考，結合四十周年國慶對社會主義思考，結合時局對改革進行思考；並舉辦盛大青年文化科技博覽會，但另一方面卻下令高校在慶祝五四時要避免「民主」的主題。

此外，由蘇曉康籌備攝製多時紀念「五四」的電視片則被官方禁止而停止拍攝。

在北京校園，縱使「山雨欲來風滿樓」，同學仍感到缺乏了起來的契機。在「四五天安門事件」十三周年的日子，北京市面平靜，紀念活動冷冷清清，好不冷落。當日王丹失落地說：「相信目前的校園很難突破沉寂的氣氛。我們現在是指望五月四日，屆時相信較有可能喚起同學的關注，但現在一切都是言之過早了。」

王丹沒有言之過早，因為他做夢也不能想像在十天之後，前黨總書記胡耀邦的猝然逝世，竟會揭開共和國新的一頁，在沉寂的校園爆發出一場驚天動地、震撼億萬心靈的學生運動。





民主星火──北大草坪沙龍

范卓雲

暮春的北京大學校園，瀰漫著一片鬱悶的沉寂。

就讀於這所全國最高學府的莘莘學子們，臉上掛著絲絲的茫然與失落。七十年前，北大走在中華民族的前列，成為這場偉大民主啟蒙運動的發源地與領導中心，而七十年後的今天，學生面對的是出國潮盛行，經商熱壓倒一切，「創收」（國內名詞，即找外快；增加收入。）遠勝學問的大學校園、「民主與科學」被遺忘，「讀書無用論」取代了昔日的北大精神。

「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一個饒有歷史意義的日子，它的來臨卻激勵著一群關心國家民族前途的年輕「北大人」，謀求活躍校園民主氣氛，增進同學間思想交流的機會。

今次學運主要領袖之一王丹就在這時候初露頭角。

人大、政協兩會期間，他正在組織一個名為「中國當代社會問題部」的組織，設在北大最具規模的學生社團「學海社」之下。王丹從今年一月初開始，逢星期三下午舉辦「民主沙龍」，與同學討論學術及政治問題。

最初，「民主沙龍」在四十三號樓430活動室舉辦，每次邀請著名學者出席，就著同學關心的問題討論，直至三月廿二日才首次移師到塞萬提斯像前的草坪上舉行。

「我們希望促進北大的言論自由和民主氣氛，我們希望把民主沙龍的規模擴大，搞成類似海德公園一類的自由論壇形式。」王丹解釋為何要把「民主沙龍」搬往草地上去。

「在草坪上公開討論問題令人更感舒暢自然。」王丹說。

但是，「中國當代社會問題部」的籌組卻遇到障礙重重，一直受到校方和校黨委的留難，更威脅提出，若不是由王丹出任負責人，校方可批准該部成立。然而，王丹和一群主要來自歷史系一年級的學生鍥而不捨，不斷向校方爭取，並得到著名知識分子方勵之、李淑嫻、冰心、戴晴、任畹町、蕭乾、吳祖光等答允出任顧問，結果校方在四月初卒讓步，批准「中國當代社會問題部」成立。

在第一次「民主沙龍」舉辦之前，「中國當代社會問題部」的同學在三角地帶（學生活動的心臟地帶，大字報欄集中區）張貼了一篇方勵之教授的文章《中國的希望與失望》的影印本，引來同學們議論紛紛，但被校方在幾小時後撕去。儘管校方控制嚴密，「中國當代社會問題部」的同學仍是努力不懈地在校園四周張貼宣傳「民主沙龍」的傳單，鼓勵同學出席。

宣傳「民主沙龍」的活動在校園內迅速而秘密地開展，雖然以往參加的人數只徘徊在三十至七十之間，「民主沙龍」卻已成北大人所皆知的「每周盛事」。

果然不出王丹所料，第一次把「民主沙龍」引往室外，即時吸引了上百同學出席，那次是由北大社會學系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研究生蕭國亮主講熱門政治問題「新權威主義」。由於舉辦場地公開，校方監視更是明目張膽，在草坪四周都站若穿乾濕褸或長褸狀的便衣人員，間中抄錄與會者的講話，不時注視著發言的學生。

王丹坐在蕭國亮旁邊，不時就著蕭的講話作出回應或提問，努力地營造討論氣氛。同學們在學校便衣人員的監視下，最初都緘默，靜靜地聆聽著蕭國亮的發言，及後由王丹及幾位「中國當代社會問題部」成員帶頭發表意見，提出新權威主義興起的社會基礎，並對新權威主義可能鼓吹的專制政治和國家控制提出批判，其他同學才投入討論。

可惜「民主沙龍」不久便遭受政府與校方的阻撓。在三月廿九日舉辦的「民主沙龍」，被邀出席的中國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中國經濟研究所所長姜洪，在北京市委的干涉下被迫缺席，引起北大同學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校方對學生活動的控制就更加變本加厲，甚至對記者及一般訪客進入北大也採取了嚴密的限制。

就在姜洪被勒令不得出席「民主沙龍」的當天，北大公安部派出近二十名便衣人員在草坪四周拍照及

錄像，令到氣氛大為緊張，但同學仍然堅持當日的沙龍要如常舉行，並在會上宣讀了港澳區政協委員、香港《鏡報》雜誌社長徐四民在政協大會上的發言，徐在發言中呼籲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以革新政治體制去解決國內社會經濟危機，即時引起同學熱烈反響，爭相向王丹索取發言的複印本。

雖然備受壓力，王丹仍認為必須堅持把「民主沙龍」辦下去。他堅信只要把一切事情公開化，不偷偷摸摸而為，行事一切合乎憲法和國家法律，校方也抓不到他什麼把柄，頂多在分配工作上令自己吃大虧，但他已做足心理準備。

於是他便鼓起勇氣和其他五十五名同學聯名簽署了一封要求校方批准「民主沙龍」合法化和常規化的宣言，並以大字報形式張貼在三角地帶，這張長達數頁紙的巨型大字報更公開要求北大領導與學生對話，取消對學生活動的種種限制，把北大闢為政治民主化推行的「特區」。如以往的大字報同一命運，這封徵集全校師生簽名的呼籲書當天被撕掉。

在大字報貼出後的兩天，也是「四五天安門事件」的十三周年，王丹特別邀請了李淑嫻，出席當天的「民主沙龍」，題目是討論四五精神與「民主沙龍」的日後發展。

李淑嫻在北大學生的心目中是開明、敢言並且愛護學生的老師，故此，大部分北大同學對李教授既尊敬且信任。加上她是海淀區（北京的大學區，北大所在地）人大代表，而且又是「中國沙哈洛夫」方勵之的夫人，當天的「民主沙龍」便開創了空前踴躍的熱鬧場面，參與的同學一開始已達二百多人。

李淑嫻就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校園民主氣氛與人大政協兩會問題進行評論，她鼓勵同學要敢於爭取憲法賦予公民的各種權利，亦應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要意識到作為中國公民的權利和責任。

但意料不到的是，校方除了派出大批公安部人員對沙龍參與者拍照和錄音，更在草坪上架起自動旋轉灑水器，把整片草坪全部澆濕。一百多名同學被迫站立起來，擠在草坪邊緣圍成小圈，縱然灑水器不斷朝參與沙龍的同學迫進，他們濕了頭髮，滿身沾水，仍然聚精匯神地聆聽李教授的發言。

但是，同學大都止於默默聆聽，為免招來無謂的麻煩和校方的報復，沙龍中似乎只能聽到李教授和王丹兩人的聲音。

「校方對我表示，政府說北大已經夠亂了，不希望再有民主沙龍這類東西。我真不明白，如果這個政府是具有自信心的，實在沒可能會有這種反應。」王丹對與會的同學說。

他告訴同學，校方曾經對他進行恐嚇，並說「民主沙龍」乃「非法活動」，要他從此停辦這種活動，但他反駁說，舉辦「沙龍」是合乎憲法所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而且符合大多數同學的意願。

李教授亦表示對「民主沙龍」的支持，認為這是活躍北大校園氣氛的健康活動。

當沙龍步入尾聲時，一位一直沉默不語的女同學提問：「我們的政府和校方對校園控制得那麼嚴，我們組織民主沙龍，表達了意見又有什麼用呢？」

李教授當時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現在北京的大學校園可用物理學的地震理論來比喻，外表看來平靜非常的地面，底下是洶湧活動的熔岩，若果上面一直是壓下去而沒有任何途徑讓熔岩釋放出來的話，必然的結果是導致大地震。現在大家都感到很壓抑，感到大風暴快要來，這就要看政府怎樣面對學生的要求了。」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知識分子聯名上書

陳慧兒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被中國當權者認為最反動而以敢言見稱的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突然給中國最高領導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一封公開信，建議今年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四十周年和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之際，大赦政治犯，特別釋放魏京生和有類似罪名的政治犯，以促進良好的社會氣氛。

方勵之上書，是自從他八七年初，因學潮事件被中共指責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而開除黨籍後，一次矚目的舉動。當然，方勵之的信只可能在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報章刊載。不過，由於近年通訊發達，加上方勵之和他當北大副教授的夫人李淑嫻，在中國知識界和學界有一定的影響力，所以，北京大學學生對方勵之的上書均略有所聞，並且十分關注。

方勵之又一次給中共出了一個難題。須知魏京生是鄧小平親自過問而定的案子。

追溯早一點，方勵之在《新啟蒙》叢刊的新聞發佈會上，已提出中國知識界要形成一個壓力團體制衡政府。

他上書不久，大約一個月時間，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許良英也開始草擬另一封公開信，不過，在發表日期來說，詩人北島在二月十六日發出的那一封，就搶先一步了。

北島等三十三人的公開信是給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內容與方勵之的差不多，也是要求大赦魏京生等政治犯，信中的用詞非常溫和。由於這批聯名的知識分子都十分著名，包括有冰心、蕭乾、吳祖光、王若水、蘇紹智、李澤厚、蘇曉康、包遵信、吳祖湘、邵燕祥、老木、湯一介、高皋等人，中共不得不加以重視。

中共一方面展開對鮮為人知排名最末的聯署人陳軍的攻擊，同時又間接再公布魏京生的罪狀和審判；另一方面，例如作家協會，就親自派人去安慰老作家冰心，以致後來鬧出冰心表示不認識陳軍，不知魏京生所犯何罪的小風波。不過，冰心還是肯定地說，並不後悔簽了名，因為人民是有權向人大提出建議的。

由於聯名上書事件適值發生於三月人大、政協兩會舉行期間，不只加添會議緊張氣氛，同時亦為四月的學生運動埋下了伏線。

從第三封知識分子公開信，即由許良英發起的北京科學界四十二人公開信的要求，或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與前兩封公開信不同，他們在信中都避開了政治犯及魏京生的名字，只要求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的青年，以及不應再因思想而定罪。

由於簽名的科學家中，有一半以上是黨員和老、中知識分子、還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們對於黨內腐敗、官倒猖獗、物價飛漲、人心渙散，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等方面的問題都顯得憂心忡忡。他們用婉轉的字眼，表明是「本著為國為民的社會責任感，以赤誠的愛國心，懇切地提出建議。」

就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他們提出由人民監督政權，杜絕腐敗的現象；而民主化的首要條件，就是要保證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利；他們亦提到增加教育和科學研究的經費。

這批中國著名科學家的建議，都是針對時弊的。假如當權者能夠及時重視，或者順應民意，在大赦等問題上作點讓步，為建國四十周年創造點寬鬆氣氛，可能不會引發學生要上街遊行。後來可以看到學生提出的口號和要求，並沒有離開過科學界公開信的內容。

然而，中共不但沒有任何退讓，還對簽名的人士施加壓力。到《光明日報》記者戴晴發起四十三人公開信的時候，即三月十四日，形勢已十分緊張，有人勸告嚴家其不要再簽名了，但是嚴回國後馬上加進去。又據許良英表示，部分簽了名的青年科學家都開始有點擔憂。而他為《科技導報》寫長達八千五百字，有關民主與科學的稿件，亦已經退回。許良英又說，統戰部長閻明復曾經與他本人及其太太王來棣，以及自然科學家施雅風吃飯，席間談到公開信的事，表示有意見可以盡量向中央提示，但不

要利用外國媒介向中央施壓力。

雖然中國知識分子在今次事件中表現出無限勇氣，得到海外廣泛的支持和聲援；不過，當權者仍然寸步不讓，甚至不承認中國有政治犯。他們在政協和人大會議中，被中外記者逼得透不過氣，最後由人大副委員長王漢斌在一次記者會中宣布，人大常委今年不會特赦犯人。李鵬在一個記者會上更表明民主化的過程不可以走得太急或走過頭，否則會影響穩定和改革。

知識分子的聯署行動，隨著兩會的結束而收場，甚至曾經聲稱要發起全國簽名運動，東奔西跑成立「八九特赦小組」的陳軍，在四月七日亦在上海市公安局「勸諭」下離開中國。

還記得某一個晚上在捷捷酒吧，和講得一口流利英語的陳軍做訪問時，他還強調要承繼「五四」傳統，重鼓中國知識分子的勇氣，用溫和的手段向政府爭取民主和人權，認為只要有幾萬人簽名，中國政府就受到壓力了。另一位公開信的聯署人是電視連續片集《河殤》撰稿人蘇曉康，他亦說中國知識分子需要建立獨立的人格。他樂觀地認為，既然有這麼多人聯署，政府方面也應該有個像樣的答覆。

至於許良英的態度，更是愛之深，罵之切。他對目前的中國國情和辦事方式既感到痛心疾首，也流露出一種救國無路的心情，他曾經多次提及在國民黨時期，浙江大學竺可楨等地下同志，如何不怕死地去拯救被抓的青年學生。而在建國之後，他們卻因為歷次的運動變成驚弓之鳥。

這百多位知識分子曾嘗試通過合法途徑向政府提出意見，結果卻遭遇到十分大的阻力，慘淡收場。這次舉動可以說是被壓下去了，雖然方式與鎮壓學生運動不同，造成的影響卻十分深遠。

連串聯署舉動，全國人民都已蠢蠢欲動了，只等待一個時機，四月五日紀念天安門事件發動不起來，大家都寄望「五四」，「十一國慶」；只是沒逆料到是四月十五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招魂（四月十五日—四月廿五日）

真誠的人死了，虛偽的人卻活了下來，

熱情的人死了，冷漠來將他埋葬。

—大字報



四月十九日凌晨，北京學生第一次衝擊新華門。 陳木南攝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悼念耀邦，衝出校門

譚衛兒　梁錦雄



新華門前告御狀。 陳木南攝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猝然逝世，令廣大群眾、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深感痛心和焦慮。他們痛心，因為永遠失去一位光明磊落的領袖和良師益友。

要求為胡平反

也許是基於中國人對「蓋棺論定」的執著，噩耗傳開後，萬民注視著中央對胡喪事的規格，因為它意味著一個人一生功績的最後評價。

然而，一切又是那樣令人失望和悲憤。中共中央當天發表的訃告，雖曾四易其稿，卻隻字不提胡辭職的因由，甚至不願把胡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一個對已辭世的中共領導人的普遍評價。

人民更難容忍，是對這位前總書記、現政治局委員的喪事，中央竟只成立「治喪辦公室」，而不是「治喪委員會」，明顯不願給胡過高的身後評價。

也許有人認為，「辦公室」與「委員會」只是名稱不同；但對廣大關心胡的民眾來說，這不啻意味胡生前蒙受的不白之冤，死後也不能洗掉。

於是，從胡家到社會，迅速掀起了自發的悼胡活動，期望促使中央，在一周後舉行的官方追悼會上，給胡更公正的評價。

胡逝世當晚，其長子胡德平對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提出，希望中央對胡辭職一事作出公正的評價；胡夫人李昭更明確提出，對胡辭職作結論是他的最後願望，儘管顧全大局的胡也說過，如果不行也不勉強。接替胡任總書記的趙紫陽，不知是否從胡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當即明確表示，一定為胡爭取公正的評價。

胡逝世當晚，北京大學校園出現首批悼胡的文章與輓聯，其中不乏強烈為胡抱不平的標語，如「死錯了」，「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等。類似標語迅速在各校出現。「培養黨政幹部搖籃」的人民大學內，出現了一幅長長的輓聯：「英雄長跪為民請願血染京華看千萬忠魂爭凝眉、先驅短命壯志未酬淚灑中華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橫批「哭我中華」。

悼胡活動瞬即推移到天安門廣場。十三年前，神州於此共泣另一位人民愛戴的領袖周恩來的辭世。廣場成了人們寄托哀思的最大公開祭堂。

四月十七日，第一個悼胡花圈出現在廣場紀念碑上。其後，更多的花圈和輓聯接踵而至，並出現了懲治官倒，加速民主進程的標語和詩文。

此時，曾經發起八六、八七年間學潮的大學生也在反思：悼胡的意義何在？是單純地抒發對一位逝去領袖的哀思？還是同時應有所行動，表達他們的心願，實現胡生前所提倡的「寬鬆、寬容」的政治環境？

念胡生平，反省民運

同學一直不能忘記，兩年前他們走上街頭，要求民主和加速政治體制改革，卻換來支持政治開放的黨總書記下台，以及隨之而來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幸而接任總書記的趙紫陽並不主張大規模「反資」，運動才不了了之。

同學也不能忘記，這位前總書記真誠關懷新一代的成長，即使不在其位，也時刻不忘青年及教育問題。四月初，胡去世前就曾向友人表示，「對青年學生要愛護、理解」。當時，他正為即將召開討論教育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作準備，也正是在四月八日該次會議上，一直為青年及教育問題憂心忡忡的胡耀邦，因心臟病發昏倒送院救治。消息傳開，同學們不勝感慨，一位不在其位的領導，尚且時刻記掛教育問題，那麼那些在位的領導呢？從胡病發到去世，學生看到一位憂國憂民的領導的赤誠之心。

同學更不能忘記，胡下台後黨風明顯腐敗。大家看在眼裏，恨在心頭。神州大地官倒橫行，物價飛漲，十一億人民的生活，給「摸著石頭過河」這句話搞得沒了方向。而「十年改革最大的失敗在教育」的說法，更令同學痛心疾首。這些青年學生，從他們前輩的拮据生活中，看見自己的未來。他們感嘆道：「我們的黨什麼時候變得這樣不民主、不科學和腐敗？開明的領導人哪裏去了？」

「在中國，循正常途徑去爭取民主幾乎絕不可能。我們的黨和政府實在需要人民多監督，而群眾更需要重新凝聚。我們必須重建中華民族的精神及心靈支柱：誠實、勇敢和民主！」一位北大學生站在廣場上慷慨激昂地說。

「兩年前，我們的運動半途夭折，今天，我們從頭來過。我們相信我們誠摯的心和雙手。通往民主的路雖漫漫，但我們將繼續上下而求索。」北大內一張大字報出現這樣的字句。

同學也很明白，光喊民主口號其實無濟於事。兩年前的學運曇花一現，正由於沒有提出具體的要求，得不到廣大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今天再不能重蹈覆轍，必須以具體要求敦促政府解決問題。

基於為胡耀邦，也為八七年學運平反，同時促進民主化進程的迫切心情驅使，北大同學在四月十八日，率先向政府提出七點具體要求：（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二）否定「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及「反精神污染運動」;（三）要求新聞自由；（四）增加教育經費；（五）公布政府部長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的財產；（六）取消北京市政府限制遊行的十條規定；（七）如實報道是次悼念活動。

這些要求，官方當然難以接受。四月十九日，北京市政府頒布一項通告，首次對群眾自發的悼胡活動作出官方反應。通告指「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借悼念之機，提出種種與悼念無關的要求」，強烈暗示悼念活動中提出的加強民主進程等要求是「別有用心」。北京市政府還通告各單位，不可組織任何在單位外的悼亡活動。換言之，人們不得隨便到天安門廣場擺獻花圈。

同一時候，各重要新聞單位也接獲上級通知，不可報道民間自發的，悼胡活動，官方的悼胡活動也要酌量而發，以免引起「動亂」。因為此時悼胡活動正不斷蔓廷，武漢、上海等地的學生也走上街頭，要求公正評價胡耀邦和八七年學運。

於是，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官方一再壓制悼胡活動，民眾卻反其道而行，自發悼胡活動越演越烈；人們把這次悼胡，與十三年前不畏「四人幫」勢力而發起的悼念周總理的「四五」運動相提並論。

新華門外，警民衝突

正當民眾，特別是學生對政府的不滿不斷高漲時，中共中央機關要地——中南海——門外，發生了警民衝突，使學生和政府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四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凌晨，數千名學生到新華門外，要求致送花圈入中南海，以及遞交載有七點要求的信件。但兩次都遭到武警阻擋。混亂中更出現衝突場面。二十日凌晨，武警衝進人群中，用警棍及銅頭皮帶驅散群眾，百餘同學被打傷。一位女同學，憤怒之下喊出「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此後，官方一直指責有人利用學生推翻共產黨領導。

翌日新華社的報道，卻隻字不提給打傷的學生，反指「別有用心」的人衝擊新華門，打傷警察云云。

政府的種種強硬手段，與官方傳媒的歪曲報道，終於催生一個反叛色彩濃烈的非官方學生組織。

「新華門慘案」發生於四月二十日凌晨，早上，悲憤難抑的同學，深感官方學生會在壓力下無法組織校外悼念活動，自發的悼念活動又遭鎮壓。北大學生首先發起組織「團結學生會」，希望自力組織更多悼胡活動，推動民主和改革進程。後來覺得該名稱太敏感，容易令人聯想到波蘭的「團結工會」，決定改為「北大學生自治聯會」（北自聯）並成立籌委會，以北大力學系研究生丁小平為首。即日貼出《告北京高校書》，號召成立全市性的學生自治會，「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同時指出，悼胡活動已擴展為一場全面爭民主的和平請願運動。

當天，丁小平在北京大學三角地發表演講：「歷次學運都失敗而終，使我們認識到，缺乏有組織的、由各高校、各階層和人民組成的聯合行動，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倡議，各校以民主方式選出真正代表同學的代表，共同成立一個統一組織，領導各高校的悼念活動。」

他又指出：「官方的學生會已不能代表我們的利益了。當我們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卻失蹤了。」丁小平同時宣稱：「不能把悼胡與爭取民主截然分開，又怎能說我們提出什麼與悼念無關的要求？胡就是民主與開放的象徵。」他還強調，是次運動一定要以和平方式進行，並指出前兩晚衝擊新華門是過激的於事無補的行動。

同日，各校學生還不約而同地成立學生糾察隊，一則要在今後的活動中維持秩序，二則保護同學的安全。此後，官方在一連串的學生和平請願活動中，一直難以找到學生搞動亂的證據。

同學很為自己的覺悟和組織自豪；但這些行動卻在官方眼裏摻進一粒無法容忍的砂子。廿四日，北京市長陳希同向中央上呈一份報告，指學生上串下聯，成立非法組織。該報告令鄧小平大為光火，認為學生在搞文革時一套，因此絕不能對他們的活動「心慈手軟」。鄧的態度，也為廿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定下基調，指學生在搞動亂。此後，官方既不願跟自治學生團體的代表對話，亦不願承認這些組織的合法性。自治會的出現，一方面加強學生運動的領導，也埋下學生與政府進一步對峙的導火線。

學生下跪，求見李鵬

各校在各自學生自治會號召下罷課，敦促政府答應之前提出的七項要求。同時通電全國，呼籲外地學生聲援。北京各校領導及教師也以默許的形式表示支持。

學生自治會成立後首項工作，是組織同學參加二十二日官方舉辦的胡耀邦追悼會。當時，總書記趙紫陽本獲政治局同意，在二十及二十一日連續兩天，在人民大會堂組織萬人瞻仰胡遺容的悼念活動。但此活動後來卻以「防止動亂」為借口取消。學生因此更迫切要求選派學生代表參加追悼會。

二十一日晚，十多萬高校學生，數千名進京聲援的外地學生和群眾，陸續匯集在天安門廣場，要求派代表出席追悼會，又要求官方媒介全面報道這場「大會堂外的追悼會」。學生聚集廣場的一個主因是：經過一周努力後，他們希望第一時間從悼詞中，聽到中央對胡作出比訃告中更公正的評價。

可是，同學們又一次失望了。學生代表未獲批准參加追悼會，悼詞雖然終於譽胡為「馬克思主義者」，但對胡的辭職及八七年學運卻隻字不提。

趙紫陽還沒把悼詞唸完，大會堂外在寒冷、飢餓及盼望中渡過一整夜又一個早上的學生，一下子掉進失望及憤怒的深淵。他們不知道，中央就悼詞的最後定稿，已進行了數次爭論。

學生悲憤情緒洶湧，「李鵬出來」，「對話」等口號此起彼落，同學實在忍不住了，覺得過去一星期的努力，並沒有得到官方的認真考慮，又或者官方不屑一顧學生所提的要求。無奈與焦急的情緒交織底下，三位同學面對大會堂莊嚴的國徽下跪，雙手高舉請願書，請求政府正視他們的要求。

然而，大會堂內的領導人對外面的一切似乎視若無睹。三位同學下跪了半個小時，終於未能打動這些號稱「人民公僕」的人民共和國領導人。

傳媒歪曲，激化學潮

事實上，官方將一切都看進眼裏，並且記在心上。他們把這一切看成是對政府，特別是對共產黨的嚴重挑戰。追悼會結束後，官方立即宣布停止所有悼胡活動，避免學生借勢起事。當晚中央電視台報道追悼會情況時，沒有一個大會堂外的鏡頭。翌日，各官方媒介卻大事報道，西安、長沙等地舉行追悼會期間發生了騷動，不法分子趁學生悼胡之機縱火搶掠，衝擊省政府。官方旨在警告北京學生，也暗示悼胡活動很容易引發暴亂。

這些報道再次火上澆油。當天，許多學生在校園內焚燒報章，諷刺道：「中央電台，顛倒黑白；《人民日報》，欺騙人民；《北京日報》，胡說八道；《光明日報》，一片漆黑。」對敢於頂著壓力，敢於報道學生悼念活動的《科技日報》，卻表示支持及欽佩。學生的行動，引發了新聞工作者在反省後掉轉槍頭，支持學生，爭取新聞自由。

廿三日，趙紫陽按原定計劃出訪北韓。同學發覺，黨中央根本沒有把他們的要求放在眼裏。北大一張大字報說：「趙紫陽出訪北朝鮮，是政府對學生運動的最大漠視。」同學也認為，趙未能真正為胡爭取得公正的評價。加上趙在同學心目中威望本已不高，以致後來學生根本不考慮推展學運可能導致趙紫陽失勢。

同學以罷課來抗議政府冷漠的態度，並籌備「五˙四」大遊行。「北高聯」拍急電到各地，號召全國大罷課，得到熱烈的響應。上海、武漢、廣州、西安、長沙等十多個城市的大學加入罷課，又派出學生赴京聲援。北京各高校自治會並準備派出宣傳隊，到全國各地推廣運動，動員廣大群眾支持。學生開始走上街頭，進行募捐，籌集活動經費。

與此同時，許多知識分子以各自不同的形式支持學生。有的上書中央，要求政府盡快與學生對話，有的到各校園演講，從理論上幫助同學推展這場運動，儘管大部分知識分子並不富有，許多人還是慷慨解囊。

種種發展，政府當然不會坐視不理。廿四日，即胡追悼會後兩天，政治局開會討論對策。會上，代理總書記職務的李鵬總理主張強硬對付。李鵬認為，學潮已蔓延外地，並由和平轉向暴力。陳希同起草關於北京市學運報告說明了這一點。另一些政治局委員如萬里，主張盡量疏導。雙方爭持不下。翌日向鄧小平請示，鄧聽了匯報，特別是陳希同的報告後，認定這是一場有預謀的動亂，必須旗幟鮮明地

反對。中央於是根據鄧講話的精神，草擬一份文件，並在廿六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以「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為題的社論，把學潮定為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號召全黨全民去制止它。

這篇由鄧定基調的社論，令學生十分震怒，兩年前的學運尚未平反，竟又羅織更兇更重的罪名。他們不禁質疑，這是個什麼樣的政府？



黨校上街

梁美芬



第一批挽著輓聯花圈湧上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來自中國政法大學。

戒嚴期間中央黨校不顧勸諭參與遊行。

屠城之後，據學生說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犧牲最多。

為什麼這些一向被譽為「中國神學院」的中央正統大學在今次學運中表現得一反常態，如此勇敢？



壯歌送君行。 冼偉強攝

人民大學一向校風保守，前幾次學生運動中，校內學生大多都是跟著走。八六年底的學生運動中雖有參與，但也不是領頭；八七年底因有學生被流氓毆打受傷，自發搞了一次遊行；去年北大學生柴慶豐遭毆斃而引發小型示威，人民大學學生也是抱著非常保留的態度。總之，文革以來該校從未搞過任何學生運動。

人民大學一向以「第二黨校」見稱；學生們畢業後分配工作比北大還要好，是一所把工農子弟轉為中央幹部的培養所。自四九年建校後，有三千人在中央單位工作，擔任要職。文革時停校。文革後，即改革派上台後復校。自七八年以來分配到中央單位更多。尤其是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及國務院等，有很多該校畢業的學生。亦可能由於這種關係，反政府的情緒沒有北京大學那麼強，他們想到日後會當官，自然對中央政策抱諒解心情。

最近兩年該校的情緒也隨著種種原因變得低落：畢業分配沒有以前那麼好，學生經常被視作「官的走狗」，心理壓抑很重。自胡耀邦倒台後，學生心理也受到影響；體改所再不像從前那樣得寵，當官也不見得是好出路。然而胡耀邦的死確是令到校內很多學生情緒激動，筆者去探訪過很多宿舍，很多「忠誠」的學生仍是貼著胡耀邦的照片，對他實在有種說不出來的懷念。

這所長期被譏笑為「神學院」的學校，其實也有很多同學非常關心國是，亦有一些執信於馬克思主義的年輕人，不斷思考理論和信仰問題；但基於前途，沒有北大那樣灑脫，他們不願意隨便說話，亦可以說不敢說話，以致整個校園的壓抑感特強，種種的潛在壓抑，就透過胡耀邦的死而爆發出來。

改革派在四月的人民代表大會明顯失勢。李鵬的工作報告批評改革的失誤，再不提政治改革；體改所失寵；學生們感到要倒退到七八年以前的政策。

就是在這次民主運動中，人民大學一開始就表現積極，胡耀邦死後不到兩天，校園內已出現了不少十分激情的大字報及悼念文章，一改該校一貫作風。此外，在新華門前靜坐及「四˙二七」的遊行，他們都起了帶頭作用。

可是，從戒嚴開始，他們漸漸由前線退居二線的原因基於學生有如下兩種估計：

第一：人民大學的學生與國家領導層的關係較好，已肯定改革派大勢已去，趙紫陽已被迫辭職，知道這次學生運動必然失敗，故由前鋒退到二線，並開始說服其他同學撤退，以免傷亡慘重。

第二：人民大學的學生較為穩重和務實，經過絕食行動之後，政府並無絲毫反應，知道堅持下去也沒有意思，因此主張撤退。

然而，該校仍有很多同學是主張堅持到底的；這些同學，很多在六月四日屠殺中殉難。據非官方統計，清華大學與人民大學的學生在那天死亡的人數是各大學中最多的。

政法大學與人民大學一樣，在學生運動中一向比較穩重，不會首先冒出頭來。也是一所親中央和畢業後分配較好的學校。

學生們也如人民大學學生般，有種壓抑感；政法大學這樣積極地參與了這個學生運動，並且有好幾次大會都在政法大學舉行，也是前所未有的。

政法大學校長江平是胡耀邦平反的，他與胡耀邦的感情特別深。因此，學生們要把悼念胡的活動擴大，校方一直沒有反對。江平曾利用法理的角度表達對學生示威的態度：「到天安門示威是可以的，衝擊新華門，就不可以接受。」以一位大學校長來說，這種表態已經是對學生的支持了。

另一方面，政法大學學生王智勇在四月二十日凌晨四時，被警察不由分說，打至重傷，也激起該校師生的憤怨。

除了學生的積極參與外，政法大學的老師亦透過了不同形式去支持這次民主運動。四月底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受官方干項及停刊；政法大學的一些法律系老師自願為該報寫起訴狀，給法律系同學實習「模擬審判」，打算為《導報》伸冤。這種表現確是非常罕見的。

中央黨校不言而喻，這是一所正統的中央官校，專門訓練忠誠的黨員幹部。七七年以後，胡耀邦當過副校長，該校與胡耀邦的感情特別深。胡的逝世當然地引起師生情緒上的激動。

中央黨校現任校長喬石，是中央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也是秘密警察的頭子。喬石為人比較難預測，但在學生運動初期，黨校的學生對胡的悼念，喬石是沒有出面阻止的。喬石在整個運動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其實也耐人尋味。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一名通緝的學生領袖中，並沒有中央黨校及人民大學的學生，這實在令人疑惑。但亦有人說，這兩所大學校長曾與官方接觸，不要把他們的學生列在通緝名單內，但官方可以私下捉人，以免影響校譽。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哀思背後

譚衛兒



學生心目中的胡耀邦。 陳木南攝

一九八九年的四月至六月，譜寫了中國現代史上沉痛而嶄新的一頁。第一筆始於他的逝世──儘管他生前可能從沒預測到會這樣。

四月十五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發，永遠地停止了呼吸，噩耗傳出的當日深夜，北大校園裏便出現了第一批悼胡的詩、文和輓聯，人們從心坎喊出：「耀邦永在我們心中」，「民主自由永存」。「不該死的死去了，該死的卻還在」，一幅輓聯還寫道：「老毛落、老X落，歷史自有公論；周公逝，胡公走，一樣悲苦一樣愁？」（翌日有人把英文字母D字貼在「X」上代表鄧小平）同時，「反貪污，反官倒」的字句也貼滿了校園。隨後，各大校園出現了一張內容相若的題為《試看今日神州到底是誰家天下》的大字報，一一列出許多身居要職的高幹子弟的家庭背景。當時一句很具諷刺性的順口溜風行一時；「毛澤東的幹部兩袖清風；華國鋒的幹部無影無蹤；鄧小平的幹部百萬富翁。」所有這一切，使胡的廉潔與黨風的腐敗明顯地分別出來。

與此同時，各大專院校除了在本校設置靈堂外，更自發地把悼念活動發展到天安門廣場上。胡去世翌日，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陸續出現了大大小小的花圈與輓聯，有署名者，也有不署名者。其中不少是大學生和知識分子送來的，一幅長約三十呎的巨幅輓聯上書三個大字「中國魂」。中央美術學院的同學更連續幾日趕繪了一幅巨型的胡耀邦肖像，把它放上了紀念碑最上一層的碑身上。莊嚴宏偉的天安門廣場儼然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公開祭堂。

胡去世的同一日，上海一千多名學生也走上街頭，高唱由頌毛民謠改編的悼胡歌曲，以表達對胡的哀思。

群眾性的悼胡活動在全國各地迅速展開。人們自覺地在本單位設置靈堂，向胡耀邦表達最後的敬意。

對廣大知識分子，他們痛感永遠失掉了一位良師益友，一位真心實意幫助他們、保護他們的中共領導。至於廣大同學，儘管他們沒有直接受惠於胡，但現時在黨風的腐敗之下，他們更需要胡的清廉和開放思想督促政府，促進黨的建設及加速政治改革。

同學們很大程度上對胡還有一種負疚感。因為胡的下台是由於他對兩年前學潮所採取的寬容態度，下台後的憂鬱又反過來加速了他的去世。

悼念初期，許多同學確有這種想法，因此也就覺得義不容辭地要爭取為胡平反，也為他們兩年前的學運正名。北大於四月十八日率先貼出了七條要求，首兩條便是：「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徹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正是在這種為胡重定功過的迫切心理下，同學們也不自覺地把悼胡與爭取加速改革和民主自由緊緊聯繫在一起。

在悼胡的同時，爭取民主的意識更由於官方的阻嚇和壓迫而演變得更加激烈。

四月十九日，也就是胡去世的第五天，隨著越來越多的群眾和學生不斷湧到天安門廣場獻花圈，北京市人民政府發出了一個通告，指「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借悼念之機，散佈謠言，張貼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大字報，提出種種與悼念無關的要求。」通告同時要求：「為防止少數人的搗亂，悼念活動應在本單位組織，有秩序地進行」等等。這通告把學生激怒了，因為他們覺得悼胡與爭取民主是不可分的。

一九七九年，在胡的大力推動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口號的出現，給中國大陸帶來了文革後理論界的第一個春天。「兩個凡是」論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前逐步分崩離析。一批敢言的知識分子李洪林、于浩成、蘇紹智、胡績偉、孫長江等人改變了長期以來噤若寒蟬的局面。理論界變得虎虎有生氣，也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奠下了理論基礎。

一九八一年，人們思想不斷開放，同時傳統思潮又伺機反撲，出現了文革後首次的反精神污染運動。知識分子又一次成為受衝擊對象，被指責引進了西方自由思想，污染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當時，胡挺身而出，保護了白樺等一批知識分子，同時號召人們把精力放到改革上去，使「清污」在極小的範圍內迅速結束。同時，他還提出要倡議一種「寬鬆，寬容」的政治氣氛。

著名離心分子方勵之教授曾對筆者說：「無可否認，胡耀邦主持中國科學院和中央工作時，確是知識分子受壓力最少的時候，他還很關心知識分子的實際生活。他最早為科學院的知識分子解決了煤氣問題。雖然那不見得是件大事，但也不是小事。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我們的後顧之憂，於細微處我們見到了他的真情。」

大家不會忘記，胡耀邦任黨總書記後，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光明磊落，在一次大會上公開向在座曾在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的老同志道歉。他會前向大家鞠了個躬，誠懇地說：「對過去的一些冤假錯案，我也有一定的責任。對不起大家了。」這是何等的氣魄，何等的坦誠!

「他走了，兩袖清風，一身正氣。卻也喚醒了我們，他在，我們還心存一線希望，期待能在某一位較開明領導人的影響下，能得到更寬鬆的政治環境，或者說是民主。現在，我們意識到，民主不能靠別人賜予，必須靠我們自己去爭取。」紀念碑下，一位和同學一道送花圈來的清華學生這樣說。

「我們悼念他，因為他贏得了我們的尊敬：悼念他，正表達了我們對開放、民主的鍥而不捨。」他說。

當天安門廣場上的花圈、輓聯、巨像與人海構成一幅令人刻骨銘心的歷史畫卷時，北京一條胡同裏的一間毫不起眼的四合院內又是另一幅感人肺腑的圖畫。

胡去世的第五天，絡繹不絕的人群，胸佩小白花，臂纏黑紗，神情凝重卻又井然有序地緩緩走向一間普通的四合院，那便是胡宅。位於會計司胡同內。

來悼念的人太多，胡家親屬悲傷過度，也太累了。家庭拜祭活動本打算在十九日晚結束。但許多人二十日一早又來了，所以又延長了一天!

春天的陽光下，滿院鮮花盛開，伴著各地人民無限情思的花圈和輓聯。潔白的弔唁冊上，密密麻麻地簽滿了來自大江南北人民的名字，短短的五天，留下了包括藏文、滿文和蒙古文的五千多個名字。

在那小小幾百方呎由客廳改成的家庭靈堂正中，懸掛著胡耀邦生前的最後一幅生活照。飽經憂患的面龐，透出倔強的神態，背景是一片翠綠的冬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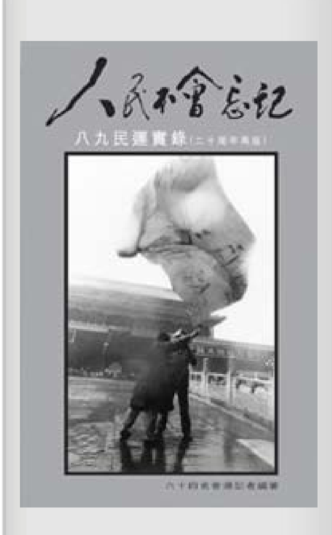
那是四月六日，前《人民日報》社長秦川，一位諍諍風骨的老報人和老攝影家杜修賢來到胡家，要為胡拍照──他們正在籌劃一本中國當代名人攝影集。三人來到小院，胡如往常一樣侃侃而談：談實事求是，談知識分子政策，談青年學生問題......杜修賢舉起了照相機──就是這幅照片，眉宇間凝聚了無限的思緒，眼神透著許多許多的憂慮。

在沉痛的哀樂聲中，人們眼噙淚水，深深地向這位一生正氣凜然的共產黨人鞠躬。旁邊，胡夫人李昭，兒子胡德平和劉胡（小時送給劉姓農民撫養）── 與每人緊緊握手致意。一位中年婦女一直忍不住低聲抽泣，哽咽著喃喃自語：「你為什麼去得那麼快，那麼快？」

從院子出來的人不期然地慢慢又在胡家門外聚成一堆堆，都不願那麼快就離去。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感受：「真沒想到我們的前黨總書記就住在這麼一間普通的四合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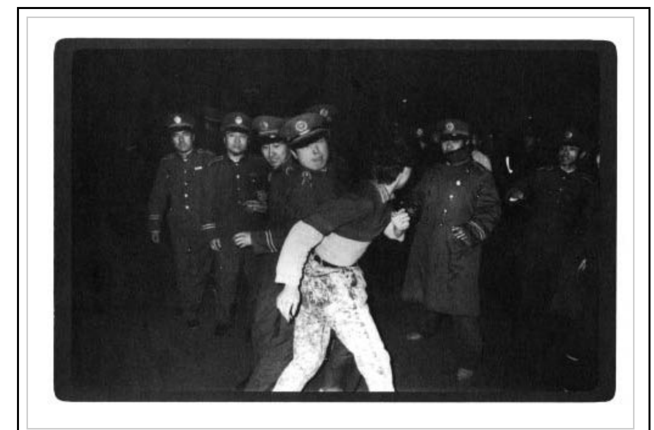
胡耀邦夫人李昭曾對相處幾十載的戰友這樣傾訴心聲：「紅燭伴隨紅淚盡，留得遺灰照人間......人淚似流三十里，天涯何處不招魂......我今天看見了人民對你的感情，你的生命，你的事業是無窮無盡的。」





衝擊新華門

羅綺萍


四˙二零新華門流血事件。 羅綺萍攝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這廿二個斗大的字，分左右兩邊守著中南海的大門──新華門，正中還有一幅嵌著「為人民服務」大字的內牆，長年累月展現它的嚴肅、權威和神聖不可侵犯。

然而，在學潮開始後不久，學生便用行動挑戰這權威──衝擊新華門。

學潮開始時，根本沒有組織領導，學生大多自發攜備花圈輓聯，遊行到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到了四月十九日凌晨，數千學生由廣場衝到新華門，企圖將花圈及請願信送入中南海。學生的情緒越來越高漲，最後，他們喊出了帶挑釁的口號：「李鵬，出來！」

部分學生不滿一直受領導人冷待，企圖衝進新華門，但為大部分學生所阻。當時新華門前只有百多名公安及武警，如果全體學生一起衝擊新華門，後果便不堪想像。

至凌晨四時二十分，約二千名公安及武警出動，把學生驅散，這時候公安對學生尚算客氣，並未對學生動武。

公安驅散新華門外的學生之後，又把廣場紀念碑上的花圈輓聯全數清除。然而，中央美術學院師生趕製了一幅三米乘六米的巨型胡耀邦油畫，送上紀念碑，使悼胡活動再掀起高潮，廣場聚集了近十萬學生。

十九日晚至二十日凌晨，新華門前又聚集了約二萬人，今次當局動員了逾千公安封鎖長安街，並且用廣播車警告圍觀群眾必須於二十分鐘內離去。

凌晨二時半，武警衝入人群中，用警棍、銅頭腰帶和大頭皮鞋驅趕群眾。不過，武警的行動並未能把學生驅散，數百名學生仍堅持靜坐在新華門前，另外數千學生則在以東一公里外靜坐。兩批學生被數百名公安分隔。

在外圍的學生圍坐在一起，初時有點不知所措，因為沒有人帶頭喊口號。當時有數人拿著攝影機在公安保護下把學生一舉一動拍下。

但學生並沒有被嚇退，相反有個別學生站起來，其中最落力是吾爾開希，他在人群中喊得聲嘶力竭，不斷朗讀各校的聲明及學生的心聲。

過了不足兩小時，吾爾開希的一位老師被召到來，勸諭吾爾開希回校，但吾爾開希不為所動，並站起來激昂地說：「老師，我告訴你，我愛共產黨，我的話是十一億人民要我代他們說的！」那老師只得黯然離去，學生的情緒更高漲。

將近三時，警方的廣播車又發出警告，指少數人搞事，衝擊新華門，命令圍觀群眾及外國記者在二十分鐘內離去。廣播持續了個多小時，學生卻不為所動，個別學生曾朝公安扔玻璃瓶，即被其他學生喝止。

到四時五十分左右，東長安街又湧來數百名公安，與原先戒備的公安配合圍攻學生，東面的公安則留了一道缺口給學生逃離。學生見事態不妙，許多朝東逃走，但部分堅持不走，也有部分動作較遲緩。西面的公安一湧而上，驅趕學生之餘，更抓著學生來打。筆者所見公安多對學生拳打腳踢，或輔以警棍，較少用皮帶抽和用大頭鞋踢。

「四˙二○」事件在學生內引起很大反響，學生對流血事件悲憤莫名， 紛紛聲討及要求懲治逞兇者；對於國內傳媒不報道公安打人情況，學生更加以譴責，並藉此帶出新聞自由的口號；此事也啟發他們知道宣傳的重要性，便開始大規模地印發一些講述真相的傳單，分發予各院校學生及市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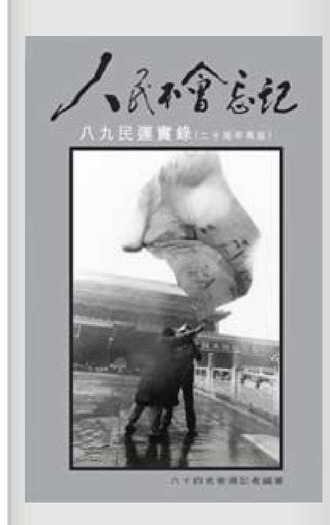
對政府來說，衝擊新華門事件大大觸怒了當權者，個別學生被追打時氣憤地喊：「打倒共產黨！」政府一方面發動傳媒機器，嚴厲批評學生有反黨反政府口號和衝擊黨政機關，另方面也佈置軍隊，防範胡耀邦喪禮時有更大的「動亂」。

一個軍校學生說，他們在四月二十一日接到通知，有特別任務，原來是秘密進駐人民大會堂西側的一工地中戒備。那幅工地面積有人民大會堂那麼大，按他估計當時約有二萬人，多數是軍隊，由於軍隊人手不足，故連軍校學生也要出動。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我寫了悔過書

羅綺萍

俗語云：「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想不到在北京採訪悼念胡耀邦活動時，竟能深深體會這句話。更想不到活了二十多年，第一次捱打會在北京，而且打我的是「愛護人民」的公安人員！

四月二十日晚上十一時許，我在北京飯店樓下碰到《快報》的記者蔡耀銘，他說他們的攝影記者何澤在新華門前拍攝公安追打學生時，被二十多名公安圍毆，之後失蹤。

我馬上趕到現場，但在距離一公里左右已不能前進，因為出路已被數百名公安所阻。

我掏出記者證，對公安說：「我是香港記者，據說有一名香港記者被公安毆打後失蹤，請問誰是負責人？」

公安木然地望著我，一聲不吭，我拿著記者證把前排的公安都問遍了，仍沒有一句答案。我只得先回飯店向報館報告。凌晨零時左右，我再到新華門看情況，那已聚集了數千學生及群眾，另外數百人被困在前面，中間隔著數百名公安及軍警。

群眾高呼口號，氣氛熱烈，我馬上把情況用攝影機拍下來，並坐下來跟學生交談。

到二時左右，一名身穿便服的中年胖子從公安隊中走出來，我馬上問他是不是負責人，他說他是普通市民，我即說如果普通市民都可以自由進出，為何我們不能進去，他便悻悻然走入公安隊中，不知所蹤。後來發現這個自稱普通市民的人，正是北京公安局治安處處長。

三時開始，氣氛變得緊張，巡邏車上開始廣播，說少數滋事分子在新華門外鬧事，圍觀群眾及外國記者必須在二十分鐘內離去，否則後果自負。

在場誰都沒有離去的意思，二十分鐘轉眼便過去了，公安也沒有什麼行動，只是一再重複那廣播。

到四時半左右，人群後面突然又來了數百公安及軍警，不知誰一聲令下，兩邊公安向人群夾擊。人群慌忙向後散去，後排的公安也讓路給人群逃走。

部分學生及群眾不願離開，或者跑得較慢者紛紛被公安推擁及毆打，我連忙舉起相機拍攝情況，但馬上有公安推我離開，旋即又有四五名公安圍困我，企圖扯下我的相機，我死命抱著，他們硬扯我的頭髮，混亂中我的腰部挨了兩拳，我高聲尖叫，大叫救命和非禮，才有一個較高級的公安上前把他們制止，把我拉到一旁。

此時那中年胖子又出現，命令我交出證件，我立即反問他是不是公安，有沒有證件，他叫另一穿制服的取去我的回鄉證，然後馬上搶過來看，之後大叫：「她是中國公民，犯了事按中國法律處理，抓起她。」

數名公安硬把我推到路邊，後來有兩名穿便服的男人到來，以尚和藹的態度叫我稍等一會，待上級指示如何處理。隨即便查問我的身份及查閱記者證。

我問他們什麼時候交還回鄉證及記者證給我，他們一再表示要上級指示，並指我已違反了中國法律，我問他們我犯了那一章那一條，他們也答不出來，只說我不聽廣播勸告已是違反法律。

我繼續跟他理論，說那個廣播只是行政指令，不是法律；而且那廣播叫「外國記者」離開，但我是中國人，那廣播根本對我不適用。然而他們也不再講理，只是一再強調我違反了中國法律。

我被拘留了個多小時，其中一人半認真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如果我肯交出菲林便放我走，我說絕對不可以，如果硬來我便四處發稿說中國干預新聞自由，還要告到法院，務必把事情鬧大，他才表示只是說笑。

及後他又要求我把事情始末寫下來，簽個名，但要認點錯，換言之要我寫悔過書。我問他是不是寫了就放我，他說上級看過同意就是。我便寫了採訪的情況，承認為了執行採訪職務，沒有聽廣播勸諭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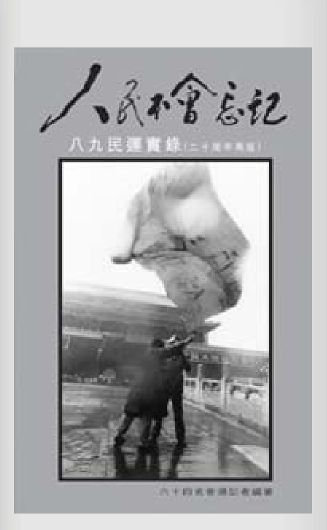
去，如果為當局帶來不便，深表歉意。

其後一名較高級的便裝公安到達，看了一遍我的「自白」，眉頭緊皺，說我沒有悔意，對自己的錯誤認識不深，他暗示我應該承認自己違反了中國法律。我於是問他我犯了那一章那一條，他說廣播就是緊急指令，不聽就是犯法。

我心想跟他辯論也是徒費氣力。當時我暗自盤算，如果不加一句「違反中國法律」，可能再來的是那中年胖子，那我肯定給他用「中國法律」來治；事實上在中國法律中，遊行靜坐是要申請的，我跟學生坐在一起，以他們的理解及思辯方法，要脫掉違法這頂帽子實在不容易；加上我的菲林還保存下來，脫身之後可以用文字和圖片呈現真相，便決定加上這一句，以求脫身。

後來得知何澤被公安打得傷痕處處，兩筒菲林也給曝了光，閃燈也摔壞了，被拘留了三小時，同樣簽了悔過書才放行。

另外《新晚報》的司徒元跟亞洲電視的戚香蓮也被公安留難，要求他們簽悔過書，但他們以沒有參與新華門前的靜坐行動，只是正常採訪，並沒有觸犯中國法律為理由，拒絕簽署，雙方爭論一會，公安讓步，放他們離去。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他們跪下了

張結鳳


群眾夾道送別胡耀邦。 陳木南攝

烈日當空的正午。莊嚴的、但是冰冷的人民大會堂，隔斷了學生瞻仰遺容的最後機會。大會堂東門，三名學生一步一步邁上台階，高舉請願信，面向國徽下跪了；大會堂西門，一部靈車緩緩駛出，載著胡耀邦的遺體，直赴西郊。

四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時。在廣場上熬了五天的學生，懷著巨大悲痛來追悼胡耀邦的學生，以為這一日終於突破了封鎖廣場的禁令，以為此際已到達了悼胡學運的最高潮，為了實現他們這次運動的要求，不惜含著淚跪在象徵人民最高權力的大會堂前。赤日下險些昏倒的學生，未能軟化當權者鐵石般的心，正如學生高呼「李鵬出來」之際，李鵬毫不理睬地由地下通道拂袖而去一樣，當局不容學生有任何瞻仰遺容的機會，就在學生跪倒的一刻，將靈車駛出大會堂。

廣場上有十多萬學生、五十萬群眾；西長安街通往八寶山的十里長街，亦夾道舖滿百萬送喪人群。十三年前的十里長街送總理，至今北京市民印象猶存，孰料一般的心情，相同的景象，重現此日城西。市民從清晨開始佔據「有利位置」，湧出大道旁，登上立交橋、路旁建築物，甚至爬到樹上。數小時佇候，只為向靈車揮一揮手。一條高舉的橫額：「耀邦同志，讓我們再送你一程。」最能表達這些送殯群眾的心情。

也許是當局不願意卸任的總書記擁有一如周總理的最後榮耀？靈車沒有慢駛地讓群眾簇擁尾隨，而是高速駛過，教人無法徒步緊跟。縱然如此，也有不少市民騎著自行車，身披上書「耀邦」兩大字的巨大披風，「護送」靈車。

城西道旁，群眾噙著淚夾道恭送；廣場之上，學生眼見三名請願代表，跪地半小時而無人接見，更是情緒激動。

且看當局是如何一步步激化矛盾，將學運推上高峰。

四月二十一日，晚上八時，因傳出官方要在追悼會進行期間清場，將天安門廣場四周列為禁區，連日來紛紛湧到廣場悼念胡耀邦的學生自然十分不滿，決心要打破禁制，在廣場上與官方同時舉行追悼儀式。入夜後，群眾蜂擁而來，深夜的廣場成了熱鬧的講壇。由於四月二十日凌晨曾發生「衝擊新華門」事件，因此保安更為嚴密，天安門城樓閘口的守衛頻頻勸諭群眾離去，但態度卻出奇地溫和，只說：你們累了，早點回家睡覺吧！

十一時多之際，確是有不少群眾回家睡覺去了。可是二十二日凌晨以後，各大學的隊伍相繼而來，繞廣場遊行。凌晨一時，北京理工大學率先靜坐，並高唱《國際歌》；各校開始在紀念碑附近佈陣，學生們或靜坐沉思，或席地而臥，或激憤講演，等待晨曦照射人間。

悼念英魂的哀慟之情，掩不住廣場上綳緊的氣氛。到處流傳的小道消息，更切割著人們飽受煎熬的神經。三師軍隊已進駐北京城附近！軍警將在清晨六時清場！既然選擇了留在廣場上，只能冷靜地等待命運的主宰。

黎明時分，學生準備向治喪辦公室提出三條要求：

一、要求絕對保證參加這次活動的同學的安全；
二、要求瞻仰耀邦同志遺容；
三、公布「四˙二○」事件真相，向被打學生道歉。

晨光照耀大地，卻沒有為廣場上的學生帶來好消息。早上七時，在雄壯的《國際歌》聲中，廣場上率先揭開追悼的序幕，學生向擺放在紀念碑上的胡耀邦像默哀三分鐘，並致三鞠躬禮。治喪辦的答覆來了，三條要求均無法達到；僅答應讓學生留在廣場，將廣場作為第二個追悼會的會場，可收聽到人民大會堂內追悼會的現場直播。

學生不滿意，幾所大學的隊伍開始移動，移近大會堂。到處是群眾起哄。接近九時，警察列隊排在大會堂東門外，群眾、學生湧上前，警、民對峙著，學生唱起《便衣警察》主題曲。

警察沒有動手，也沒有清場，後來更坐下減少對立氣氛，學生也克制著，並不準備衝上人民大會堂。

雄偉的廣場、凝重的氣氛，天地在為這位一代政治家奏輓歌。通宵守候的學生，既痛悼國家損失英才，亦期待中央為胡耀邦平反。

萬千期待，盼到了上午十時。中共中央為胡耀邦舉行的追悼會正式開始了。大會堂內全體肅立默哀，廣場上群眾亦屏息靜聽。

楊尚昆主持追悼儀式。從開始便註定楊主席要擔任「反面」角色的了，他一開口，便將「奏國歌」說成「奏國際歌」，廣場上馬上噓聲四起。

趙紫陽語調沉鬱地致悼詞。很失望，雖然為胡耀邦加上了幾個「偉大」，但沒有提到他因反自由化而「辭職」一事。中共如此不敢面對現實。

一夜間不斷積累、上升的希望一下子戳穿了。學生們失望、激動，高叫「打倒官倒」。許多學生和群眾向廣場北面長安街方向跑，希望看靈車，但警察加強在大會堂北部的警戒。

繼續在廣場靜坐，還是採取新的行動？學生進退兩難。學生高呼：「對話！」又大叫:「李鵬對話！」

大會堂內賓客安靜地向遺體告別；大會堂外一片沸騰，口號、呼叫聲，震天價響。武警不斷從大會堂一個通道湧出，排成層層人牆，多次向學生推進，企圖衝散人群，秩序混亂。

接近中午，學生代表決定，不提任何條件，只要求李鵬走出來與學生公開對話。

早在四月二十日新華門前，群眾已曾高叫「李鵬出來」，假如這是一位向人民負責任的總理，當時就應該出來了。在胡耀邦追悼會完結之際，廣場上的學生呼聲，同樣沒有得到他的理睬。

不僅學生的呼聲李鵬不理睬，連學生在石階上跪著遞請願信他也不出來接，甚至廣場上群眾高呼「不對話，絕不走！」他亦堅拒對話。

國徽之前，殿堂之外，人民的心被這些黨官傷透了！女學生激動流淚，男學生悲憤握拳，有人發起狠要衝軍警的警戒線，軍警迫得後退。

追悼會完結了，參加儀式的人群魚貫而出，不少人留在石階上，看到推擁的人群，看到請願的學生。一些知識分子出來，看見正跪著的學生，悲憤交集，一下子跪下來，擁抱著學生。《新觀察》主編戈揚老太太，氣得破口大罵，指著門前的警衛說：你們怎能這樣對待學生？

三名代表跪了半小時後，纔獲准進內送花圈和請願書。

這是一個怎樣的政府？

群眾的驚歎失望，由四月二十二日開始。追悼會結束了，卻是更大規模學運的序幕。





吶喊（四月廿六日—五月十二日）

我們走了，衝向天安門廣場，

我們並不奢望烈士的稱號，

只求作一個大寫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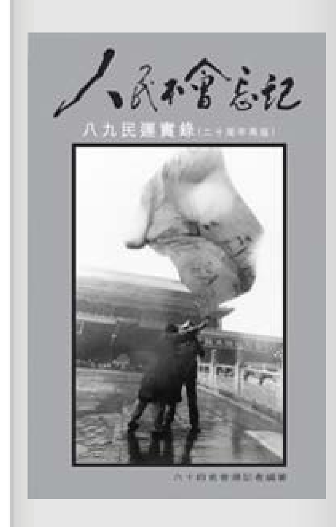
—北京師範大學學生遺書



鄧小平一語定性。 陳木南攝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社論定音，群情洶湧

梁錦雄　羅國威　馬妙華　蔡淑芳

具爆炸性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一語定音之作。這篇把學運定性為「動亂」的社論，不單重新挑起學生自胡耀邦追悼會後漸已平伏的情緒，還將他們的憤怨轉為狂怒。

這篇以「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為標題的社論，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企圖蠱惑人心，搞亂全國，文章認定學運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最終是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面對的嚴重政治鬥爭。

社論刊登當日，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分別在兩地召開萬人幹部大會，學習社論。李錫銘更對幹部指出，學生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張貼大字報、搞串連組織「戰鬥隊」，成立非法學生組織，搞罷課等活動，是在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是在製造動亂。

四月二十七日，在第一面寫上「人生自古誰無死」的橫額飄揚下，遊行隊伍踏出北京大學校門，學生仿如踏上征途慷慨就義。遊行隊伍沿途贏得百萬圍觀群眾歡迎，衝過幾道由武警築成的人牆後，成功闖過長安街，經過天安門廣場，沒有在廣場停留，便折回校園。遊行由早上八時至凌晨一時。從遊行學生的人數和圍觀者的反應來看，這第一步可說是成功的，學生的要求得到市民普遍支持。遊行過程中，學生保持高度自律，並未高喊「打倒共產黨」或領導人的口號，反而高舉擁護共產黨的旗幟，使當局找不到藉口鎮壓。

政府對遊行隊伍極度克制之餘，亦採取主動，爭取對話。當晚七時，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引述國務院發言人的談話，企圖緩和矛盾。發言人除肯定學生提出與政府對話的要求外，更強調黨和政府歡迎及一直主張透過正常和非激烈的行動，與學生和群眾對話，但希望學生取消罷課，國務院方面更已委派全國學聯和北京市學聯安排對話。

各執一詞，陷入僵局

對話看似簡單，卻存在很多原則性的問題。由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中，政府與學生就對話的形式和細節一直爭持不下，陷於膠著狀態。

北高聯主席吾爾開希重申對話的根據為北高聯日前提出的七點要求，並提出官方對話代表應是人大常委或國務院有關領導人，學生方面應由各高校自治聯會代表，及讓記者採訪對話過程。

四月二十八日，在學生沒有充足準備下，官方突然安排對話。出席官員包括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學生方面約有四十人，包括吾爾開希和周勇軍。但官方強調學生只以個人身份參加，絕不承認「非法的」自治聯會所委派的出席代表，矛盾無法解決。而吾爾開希在會上被拒宣讀北高聯的七點聲明後，進場不久便憤然離場。

官方把三小時的「對話」錄影，當晚在中央電視台播出，以表示官方重視對話和誠意聽取批評，袁木在對話中強調是受李鵬委托，指出《人民日報》社論中關於否定中共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等問題，是針對極少數人的非法行為，不是針對廣大同學。會上官員亦試圖解答官倒、胡耀邦下台、新聞自由及「四˙二○」新華門事件等問題，但並無實質答案。

三十日，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也與學生代表對話，陳否認是陳雲的兒子，兩人更聲稱可讓群眾調查他們的財產收入。同時，各種渠道的對話在進行，包括統戰部長閻明復與知識分子見面。同日，總書記趙紫陽結束北韓訪問回京，氣氛更趨緩和。

五月一日，「北高聯」召開中外記者會，發表一連串公開信，包括「告全國同胞書」、「告香港同胞書」、「告全國同學書」和「致領導人書」，呼籲人民團結一致爭取民主自由。在「告香港同胞書」中，北京學生呼籲港人支持國內民運，並在九七年在中國建立民主制度。此外，「北高聯」正式否定袁木與部分學生代表的會談為正式的對話。

五月二日，數名學生領袖，包括北大的王丹，分別向黨中央、國務院和人大常委等遞交請願信，要求在二十四小時內，答覆他們提出的要求，否則會在五月四日舉行大型示威。學生提出對話以「七條為

討論基礎」，另加嚴格條件，包括每個院校透過普選或現有學生會遴選，選出一至三名代表，組成對話代表團，再由代表團推選幾名總發言人與官方對話：官方成員應為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員長或副總理級官員；整個對話過程容許自由採訪和由電視直播；對話結果有法律效力，由雙方簽署聯合聲明；學生又指出，這種對話可進行多次，甚至制度化。

官方未等到最後通牒期限屆滿，已於五月三日早上召開學運爆發以來第一次中外記者會，直接答覆有關對話的問題。一如所料，袁木一口拒絕學生的條件，並指請願書近乎威脅，所提條件，例如由普選產生和「非法」學生組織推選代表參加對話，政府實難以接受。

袁木說：「……就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為談判的對手，而且要超越政府之上……不僅不合情理，還表現了青年學生的相當程度的一種幼稚的衝動」。袁木又在會上強調學運由一小撮「黑手」在策劃。他點名以美國為基地的「中國民主聯盟」及暗示方勵之在背後出主意；這些後來都為學生一一否認。袁木並強調中國政府有能力制止動亂，並確保改革開放政策不受影響。袁木的記者會後，學生代表決定翌日舉行示威，以秉承「五四」精神，追求民主與科學，和要求政府答應對話條件。

「新五四宣言」

五月四日早上，學生再次上街遊行，由於沒有「四˙二七」遊行前夕恐懼官方鎮壓因素的刺激，遊行人數大減，僅約數萬人。遊行隊伍下午陸續抵達天安門廣場，當天早上人民大會堂內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開幕儀式結束，各國代表和中央領導人已分別離去，未造成混亂或尷尬場面。遊行隊伍在人民紀念碑下發表一篇「新五四宣言」，指出這次學運是七十年前五四運動以來最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目的是爭取「民主、科學、自由、人權和法治」。學生代表並宣布翌日開始復課，繼續爭取與政府對話。

「五˙四」遊行以後局勢一度緩和，與當時黨總書記趙紫陽在五月四日亞銀年會開幕禮後一番重要講話有關。這番話是學運另一個轉捩點，基調與「四˙二六」社論完全不同，顯露黨中央對學運態度分歧，及成為日後保守派打擊趙紫陽的「罪證」。趙強調應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應透過改革和合符理性和秩序的辦法解決。對於嚴重的貪污問題，趙直言是因為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公開化及透明度不夠。趙紫陽希望與工人、知識分子、各民主黨派和學生都廣泛對話，交換意見，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同日，《人民日報》社論對學潮作出較溫和的評論，認為在社會變革的歷史關頭，青年是名副其實的生力軍，這篇社論與殺氣騰騰的「四˙二六」社論對比鮮明。

經過這次無驚無險、情緒平和的遊行，加上趙紫陽安撫性講話後，同學心情複雜而又矛盾，部分認為他們的「歷史任務」經已大功告成，只應持續下去，在不荒廢學業下，可繼續爭取對話；部分則認為政府仍未有誠意，決定繼續罷課。

在「五˙四」遊行翌日，來自三十多間高校的學生代表選出「對話代表團」，繼續貫徹學運的長期目的──透過與官方對話影響國策。

臨時團長項小吉表示，學生要和政府討論將學運定性為動亂的「四˙二六」社論，他們亦計劃深化問題，並向政府爭取憲法所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如遊行、集會和新聞自由。

五月六日，代表團分別向全國人大常委、國務院和中共中央遞交請願書，呼籲盡快對話，但不得要領，學生與政府關係進入膠著狀態。

隨著復課之聲，四月中旬以來的學運轉入第二次和緩期。

空群出動，聲援《導報》

官方與學生僵持於對話條件之際，北京新聞界醞釀請願行動，爭取新聞自由，成為整個學運中一股不可忽視的支流力量。

自從四月底以力倡改革開放馳名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因刊登一篇悼胡座談會的文章，以致總編輯欽本立被停職後，北京新聞界就一直蠢蠢欲動。

加上學生多次指責官方媒介甘為政府喉舌，掩飾甚至歪曲報道學運真相，北京新聞工作者的滿肚冤屈激發無比勇氣，三百多名新聞工作者，在五月四日舉行自建國以來首次抗議遊行，抗議「被迫造謠」，博得北京市民及學生熱情及衷心的鼓掌。

新聞尺度也在不斷抗爭中打開缺口，各種報紙甚至刊載了學生遊行的過程和照片，令各界喜出望外，以為新聞自由開始了突破。

五月九日，北京逾千編輯記者聯合簽署一封請願信送交全國記協，要求與官方對話，爭取新聞自由及討論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等問題。五月十日，超過萬名高校學生參與單車遊行，在中央廣播電視部及新華社門外高呼要求新聞自由，聲援新聞工作者。

官方在此時亦破例地與新聞工作者對話，當時主管新聞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於五月十二日與

《中國青年報》工作人員對話，表示中國新聞工作已到「不改革不可」的階段。

中央更成立五人小組，有系統地與各種媒介工作者對話，但由於中蘇高峰會議在即，預計對話須待五月下旬才開始。

學運陷低潮，絕食起波濤

學運的暫時沉寂與新聞工作者的活躍成了鮮明對比。一般學生開始意興闌珊，部分卻在沉寂中醞釀再掀起學生的熱情，向政府施加壓力。

而另一方面，外地學生在知道北京學潮情況後，紛紛趕赴北京聲援，再次鼓舞了北京學生心底不滅的激情。

於是，各院校又相繼宣布重新罷課。堅持得最徹底的北大同學表示，罷課是一種象徵，藉此表明民主要求的意願，又認為運動尚未結束，同學們爭取的目標尚未達到，他們表示為平等對話作準備，除非對話有合理進展，他們才考慮復課。

政府對學生堅持罷課沒有任何反應。五月十二日晚，他們給予學生對話代表團的答覆，仍是限制對話人數和形式，另外只允許報道部分對話內容。

這個答覆顯然不能令學生滿意。此時，部分學生已決定採取較激烈的抗爭手段，在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訪華前夕，發起絕食行動。

一位絕食同學在出發前寫下遺言：

「我不能再徬徨，我不能再等待！彷徨就是怯懦，等待就是死亡，而且比死亡更痛苦……萬一不幸，父母也不會悲傷，他們唯一的兒子沒有給他們丟臉。」

掀起波瀾壯闊的學運的絕食隊伍出發了！首都莊嚴的大道上、踏著自行車的學生，在《血染的風采》歌聲中，前赴廣場。「也許我告別，將不再回來……」像號角，又像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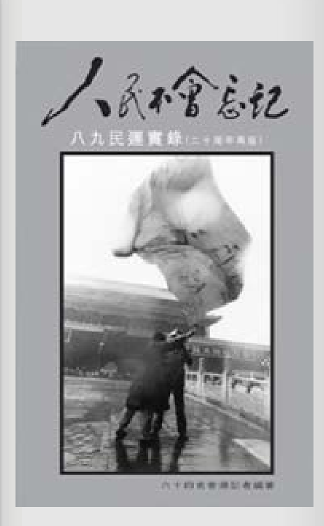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進退之間

梁美芬



北京蔚藍色的天空，象徵著我們坦蕩蕩的心胸；
我們別無所求，只希望偉大的祖國給我們一句公正的說話；
我的心在哭泣，我的心在流血；
我們愛北京，愛祖國；
正因為此，我們一定要去。
死，我們害怕；但為了中國的民主，我們仍是要去；
媽媽，不要怪我；
愛人，別了！
我們為中國的民主要永遠去了！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本科生
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六日

這是一位將要參加四月廿七日遊行的同學寫下的一封遺書。當時，同學們的心情非常沉重，大家都擔心當天會出事，當局將要打人或抓人。

我們當時非常害怕，整個校園都靜得鴉雀無聲；好像世界末日將要來臨一般。心中的壓抑根本無法形容，憤怒的情緒像要爆炸般似的。一個年青老師在描述他在廿六日所目睹的一切。



前仆後繼保衛天安門廣場。 黃勤帶攝

前幾天熱哄哄的氣氛銷聲匿跡。大家都很失望。政府終於把這次運動定了性。是「動亂」！大家都氣得說不出話來，雙手緊緊地握著拳頭，想打人似的，眼睛則怒火如潮，快要爆出來了。

這時候，負責組織進行的同學責任尤見重要。年輕的他們，知道明天要去進行是件非同小可的事，他們一方面很擔心同學的生命安全，一方面又要商量對策；他們肩負著前所未有的擔子，人焦慮，又憤怒，在寂靜的校園裏跑來跑去。當時，他們就跑到我的房間來！

哭著！這些孩子都在哭著。他們見到我，就跑上來抱著我，不停地顫抖，嚷著：『政府怎可以這樣對待我們？我們沒有錯！』

他們是剛剛給學校高層人士帶去查問。看來，他們受了不少壓力！

『我實在不知道可以怎麼辦！同學們都決定要去了！我怕負責不來。萬一有人受傷或死亡，我怎樣可以擔當得起？』其中一個學生領袖驚惶失色地說，他手緊捏著拳頭，眼眶都是濕著的。

我實在按捺不住了。我終於決定與另外一個老師，跑去學生的宿舍，看看同學們的情況！

到了宿舍，同學們都是一群一群的圍在一起。他們握手、祝福；原來，這些人都是決定明天要去遊行的。

『很多男孩子都很激動，很堅決，說誓死也要去。我知道後，匆匆跑去多看他們一眼；我怕……明天之後，大家再沒有見面的機會了！』一個女同學說，說完，淚水就從眼眶中湧出來。

『我其實很怕死，四月廿二日我也沒有去廣場悼念胡耀邦，我怕警察打人；不過，《人民日報》的社論實在太過分了！我決定明天也去！最多，大家死在一塊！』另一個同學衝動地喊著。

『當時的心情實在無法形容！同學一個、一個地寫下遺書。校園從未出現過這種氣氛！我實在無法冷靜！我真的受感動了！平時只講做生意的我，也決定明天去拼到底！就這樣，我也匆匆地寫下了遺書，與其他同學握手告別！』一個纖瘦的、時髦的男生拍著胸膛說道。

『這時候，誰也不知道明天之後，再見不到的會是誰！大家確是很害怕！想起電棍……鐵釘皮帶……頭破血流……我也想不下去！去了才算！現在實在也想不出什麼來！反正，我從來也未見過這些場面。』另一個同學氣沖沖地跑去寫橫額時說。

其實，不只同學沒有面對過這樣大的壓力，連校方也是比以前幾次學潮時表現得手足無措。

自四月廿五日下午開始，各間大學的高層人士已十分緊張，聽完鄧小平「三不怕」的講話後，大家確是不知如何是好？他們深知道這番講話傳出來後，學生一定很激動，可能會引發更大規模的行動；可是，把這個運動定性為「動亂」，已是一個事實！若學生堅持，一定會出事！

當天晚上，各校高層人士都召開緊急會議，把所有老師都召來，商量解決方法。他們一方面召見學生領袖施加壓力；另一方面派不同老師去游說學生，勸他們不要去。

人民大學出了一封廿六名資深老師的聯署信，呼籲學生在廿七日不要出去。政法大學的校長江平傳出口訊，如果學生願意取消遊行，他跪下來也可以；另外，北京航天航空大學及清華大學校方則向所有同學施加壓力，說任何同學在四月二十七日上街，後果自負。

結果，清華大學的學生自治組織因為受不住校方強大壓力，宣布解散。而北京師範大學則有老師說要在廿七日考試，不准學生離開校園。

校方千方百計地阻撓遊行，顯出了他們實在很焦慮和擔心，遊行出了事，校方擔當不起。他們也看出，學生的激動情緒比前幾年大大高漲；若是遊行成功，肯定是一個控制不了的局面。

校園內不斷廣播，警告學生不要參加遊行，呼籲他們不單要為個人著想，也要考慮父母及親人的將來，千萬不要參與遊行。

四月廿六日晚上及廿七日凌晨，這些廣播從不間斷！我本來負責勸學生不要出去的。可是，當我跑到他們的宿舍時，看見他們默默地、凝重地、堅決地在地上寫橫額，其中一張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也忍不著眼淚了。我對著他們，什麼話也說不出來。見到這些年輕人的勇氣和決心，我不期然地說：『也許，你們是對的！』

我上前，緊握著他們的手，給了他們一點錢買物資，就匆匆地離去了！另一個年約四十歲的老師一面說，一面流著淚。

在校園的另一端，是北京市高校自治聯會常委會的緊急會議。周勇軍、王丹、吾爾開希等人正在猶疑是否去遊行。當時，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一些代表也在場。據他們說，平時樂觀、開朗的吾爾開希當晚也顯得十分焦慮。當學聯代表表示要離開，吾爾開希拉著他們說：「最好你們不要離開。」他似乎知道將有大風暴降臨到同學身上，希望香港學聯代表可以在場作一個見證。

這時候，清華學生已經宣布退出北高聯。當新成立的「清華學生聯絡組」宣布不參加遊行時，校園的氣氛突然變得一片死寂，每個同學都顯得心事重重。

我們確是不甘心！心中的憤怒無法宣洩！害怕是害怕的！不過，害怕的心情已遠遠敵不過壓抑的情緒！所以，當其中一個同學突然喊出來說：『明天去遊行』，很多同學即時附和，自動組成校內宣傳隊，呼籲其他同學一起去。所以，我們參與四月廿七日遊行是完全自發的！一個清華學生說。

經過多番波折和恐慌掙扎，成千上萬的北京學生毅然走上街頭。他們大無畏的精神不但感動了他們的老師，也感動了數以十萬計的市民，自願為學生開路。當天，他們成功地環繞京城遊行了，向全世界顯示要求民主的決心，為中國民主運動翻開了新的一頁。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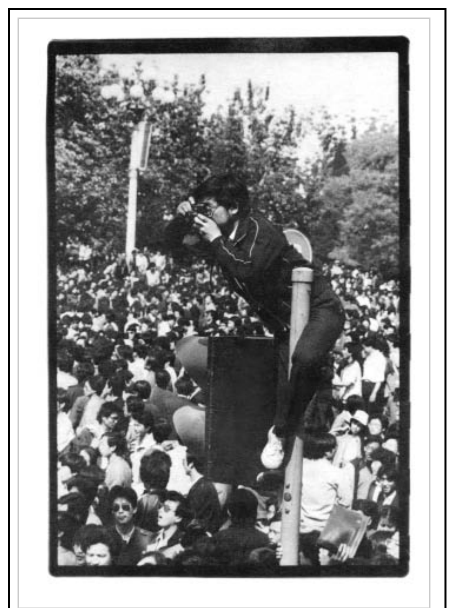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豁出去──四˙二七遊行

崔麗容　梁慧珉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拍下歷史性的四˙二七。 陳天權攝

「四˙二七」遊行是悼胡學潮開始後，一個極具規模的遊行，這次遊行的成功，為繼後一個多月的學生運動奠下了「良好」的基礎。

是次遊行由於是被前一天的《人民日報》社論激發的，因此，學生當時的情緒，已不僅為胡耀邦之死而哀傷和激動，而是對官方的震怒。

四月二十七日，烈日當空，義憤填膺的北京高校學生，不理北京市政府日前發出有關「為了維護社會安全和正常的交通秩序，嚴禁聚集街頭、演講、募捐、散發傳單，違者按治安管理處罰條列，予以處罰」等的警告，於早上八時多，兵分多路出發，沿多條路線向市中心進發，環繞北京城遊行。

「我們豁出去了！」同學們說。

參加遊行的學校，除組成「北京學校臨時學生聯合會」的成員共四十間外，還加上數間非成員的學校，學生人數超過十五萬。大批武警和公安人員在遊行隊伍經過的要點「恭候」，雖然武警已獲中央指示，要保持克制態度，但雙方小規模衝突仍免不了。衝突的引起主要在於群眾加入學生行列，全面支持學生的要求，繼而藉此宣洩他們多年來對政府的不滿。

雙方衝突較為嚴重的，首選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所走的路線，武警早在距離北師大不遠的西直門大街設置了厚厚的人牆，他們手牽著手，橫排的把整條大道堵住了。在遊行隊伍走近他們時，大批在道旁圍觀的市民，不斷叫喊：「警察讓開！讓開！」

甚至有市民從旁邊走出路中心，幫忙突破武警隊伍。而學生看到大批武警後，竟坐了下來，令支持他們的群眾頗失望。

尚未「站起來」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於學生坐下以後，出來與公安人員「談判」，談判後，吾爾開希拿著擴音器向同學說：「為了不干擾主要道路的交通，我們將改行路線，依照公安方面規定的路線走。」

同學對此決定並沒有表示反對，但亦沒有走公安規定路線，只坐著。原來吾爾開希此決定乃是策略，待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隊伍到來時，結集力量，齊向前衝。

雖然武警堅守防線，但情緒高漲的市民，不斷向武警隊伍衝擊。武警開始時仍保持緘默，只是用手推開群眾，但後來按捺不住，對往前湧的市民施以拳頭，惹起眾怒，群眾遂向前衝。

部分市民捱了拳頭後，馬上退出，而在外圍的群眾和學生則高喊「警察打人」、「反對暴力」。

在混亂中，兩名武警倒地，一名男學生因被洶湧的群眾推倒，鼻血直流。

在場採訪的記者，亦有不幸被人群推倒地上，被踐踏得遍體鱗傷。

學生隊伍最後還是衝過了警察的防線，警察不再阻攔了，市民和學生於是鼓掌歡呼勝利。

另一遊行隊伍在北大所在地的海淀路路口、即北京圖書館處，遇上為數約一至二百名武警攔截，但隨即被後來的圍觀者衝開。

該支隊伍順利地遊行，直至下午近五時抵達市內的復興門再遇警察攔截。天安門廣場附近的西單、新

華門及人民大會堂，遊行隊伍遭千多名武警分三批阻截，但武警最後亦擋不往氣勢如虹的行伍而讓路。

學生也避免與武警正面衝突，以免發生流血事件和給官方藉口，他們只在天安門城樓下經過，沒強闖廣場便逕出建國門外大街，轉至東直門下，再繞至德勝門。整個遊行歷時十四小時才「大功告成」。

在遊行中，學生自編歌曲，既悅耳又帶諷刺，其中一首調寄《打開蚊帳》：

> 人民日報、北京日報、真奇怪、真奇怪！
> 一個不說真話，一個只說假話，
> 真奇怪！真奇怪！

這次遊行中，群眾首次在學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顯示了「人民被喚醒」的跡象。站在武警面前勇敢的群眾，他們不再像以往那樣地畏懼，他們不單與學生的心連在一起，和他們一起唱著《國際歌》，一起喊著引人共鳴的口號，甚至在學生「危難」時刻站出來，站在最前線替學生阻擋武警。

北京群眾如此表現，除了震動了學生和記者外，也引起了國際及北京政府進一步的關注。

滿腔熱誠的群眾為數不少，但藉此宣洩多年來對政府不滿而亂叫亂推的群眾，也委實太多了。當日，有些人就曾因不屑該類「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的群眾而向他們大罵一番，他們都認為，純潔無瑕的學生運動，不該被一些「不知為啥」的人們破壞和玷污。

「六˙四」大屠殺，軍隊把學生群眾打個落花流水，不留餘地，筆者回想起「四˙二七」遊行的一個有趣片斷。

話說遊行隊伍經過天安門回校時，向駐守廣場一角的幾百名武警高喊「感謝警察」，教他們啼笑皆非。

那些「排排坐」的武警，一副無可奈何，略帶微笑的臉孔，相對於屠殺時他們同袍的猙獰面目，實在可愛多了。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七十年後的「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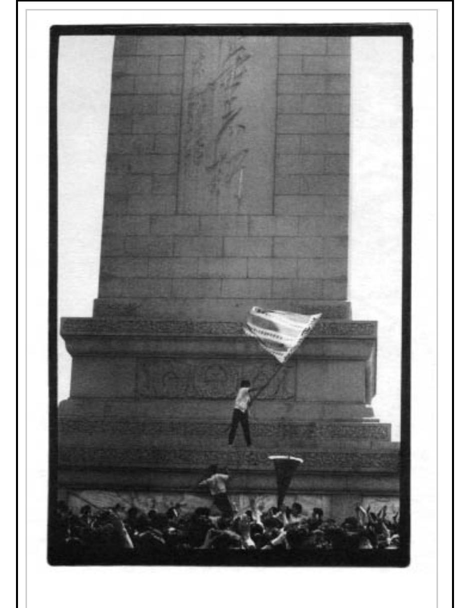
馬妙華

八九年的「五˙四」大遊行，可說是歷時將近兩個月的中國學生運動中，最和平、歡欣和生活化的一次遊行──沒有太大風險，亦沒有多大激情。

經過「四˙二七」「闖關式」的遊行後，學生的激情及新鮮感已失，加上部分學生奉家人命令回家，故令「五˙四」遊行人數大減，一般估計是有七、八萬人。

而官方亦表現得極為克制，只是象徵式地在遊行途中設立三度頗為薄弱的防線，輕易地被學生衝破；又不執行在天安門實施的禁制令，讓學生可在孫中山畫像下集會，宣讀「新五四宣言」。

清晨時份，記者結集於北京師範大學「三一八紀念碑」一帶，在五月初夏和煦的朝陽下，幾個學生在打乒乓球耍樂，校園顯得一片安逸平靜，而學生領袖這在大本營倒頭大睡──一切跡象都與即將舉行的遊行不相稱。



旗幟鮮明的北高聯。 梁耀榮攝

八時四十五分，鮮紅的旗幟在北京大學校門內綠油油的大道上出現，北大學生首先步出校門，沒有受任何阻撓。學生在途中組成糾察隊，分隔遊行隊伍與圍觀的市民。

而北京師範大學的隊伍則在一出校門時已受阻，校方緊閉校門，不讓四千學生衝出去，經學生交涉及高呼「開門、開門」後，保衛處人員才開門。

甫出校門，師範大學學運領袖吾爾開希再一次受到中外電視台的注視，因為他是被學生抬在肩上遊行，並拉起一面鮮紅的北師大旗幟，儼然一個統帥。

一如「四˙二七」遊行，浩蕩的學生隊伍及熱情鼓掌的市民令大學區至天安門的各主要街道交通全線癱瘓。

但學生的情緒卻都算不上激動，無論唱《國際歌》、《國歌》又或者喊口號，都顯得不起勁，不像「四˙二七」遊行時，學生因勝利衝破遊行禁例而散發出激情和熱忱。

不少學生表示，參與「五˙四」遊行是為了完成「歷史任務」，回應七十年前先輩的行動。他們都期望學運可以在不影響學業的情況下繼續下去。

至於學生提出的口號，比之「四˙二七」遊行亦明顯有轉向。

除了「應景」地重提「五四運動」倡導「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外，最常見的要求都是反對官僚貪污，結束老人政治，建立自由新聞系統及要求與政府對話。

在輕鬆的氣氛下，學生更佻皮地唱著一首改編《打開蚊帳》的反官倒歌：

「打倒官倒，打倒官倒，反腐敗，反腐敗，我們要求自由，我們要求自由，真自由、真自由」。

而最能引起市民反應的則是北大隊伍前面的一副對聯：

橫題是「袁木求愚」

對聯是：「這副嘴臉政府何以立本，如此對話國家幾時東昌」。

這副諷刺性的對聯恰恰把學生當時最痛恨的三位「對話」官員囊括在內。他們就是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發言人袁木，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及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

學生的情緒間中也會受到一些突如其來的小刺激所帶動，例如有一個年輕小伙子，爽朗地踏著單車，車頭掛著一面清華大學的紅旗，架著一部大型錄音機，播放著《國際歌》，單車劃破海淀路時，人群亦隨之引吭高歌，引起了一浪一浪的迴響。

正當五十多所高等學校的學生這在路上，步向天安門時，一群突擊單車隊已於中午前抵達目的地，並成功地闖過薄弱的公安防線，「佔據」了天安門廣場。

當學生遊行隊伍走到長安街時，再次被新聞工作者的示威掀起新的高潮。

超過三百名來自三十個新聞單位的首都新聞界人士在長安街上拉起橫額，舉行了建國四十年來首次與政府唱反調的行動。

人們都意識到，在中央要死命抓緊「槍桿子」與「筆桿子」的前提下，新聞工作者受盡屈辱和壓抑，他們被壓下去，不能抒懷地說真話的痛苦，當然會被理解，更進一步的是，他們膽敢站在街頭抗議的勇氣，令他們博得市民和學生頻頻高呼「記者萬歲」。

新聞界的口號也是很生動的，例如：

> 「我們想說真話！
> 別逼我們造謠！」及
> 「我們的筆不能寫我們要寫的文章，
> 我們的嘴不能說我們要說的話。」

他們亦提出「支援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該報的總編輯欽本立因容許一個有關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紀錄出版，而遭受停職處分。

炎熱的天氣，鮮紅夾雜雪白的旗海，令中午的長安街變成巡遊大道，一片熱鬧和興奮。

一名在使館工作的外籍青年人對筆者表示，他感到異常振奮，因為在長期政治低氣壓的北京，鮮有如此生活化的巡遊隊伍出現，他但願這種場面還可以在繼後的日子常常出現。

下午二時半，所有學生正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學生們一邊魚貫入場，一邊和相遇的朋友打招呼，各人的心情是非常暢快的。

在人民大會堂前，官方只佈下最低限度的戒備，公安人員列成一條單人防線，疏疏地站在台階前。

集會在孫中山先生的巨型畫像下舉行，由吾爾開希宣讀了一九八九年的「新五四宣言」，學生不再單單提出「五四運動」的民主和科學的口號，他們進一步演繹為：「加速政治經濟體制上的改革，保護人權、加強法制，已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當務之急。」

學生促請政府，「保障憲法所賦予人民的各項權利，實現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剷除官倒、加強廉政建設、重視教育、重視知識、科學立國。」

另一位學生領袖周勇軍則當場宣布北京高校全面復課，並繼續要求和政府對話。

集會在三時半結束，學生們悠閒地走路或乘車回校。

「五˙四」遊行是一九八九年學運中唯一一次不是由於政府的行動而直接激發的遊行，他們企圖回應七十年前的先輩，為久已枯乾的民主與科學的幼苗澆上活命的清流。

可是，七十年來，民主與科學不曾真正在中國國土上實現。新一代中國學生進一步倡議的人權和法治，要到幾時才可以在中國受到真正的尊重？







死諫（五月十三日—五月十九日）

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

也不得不為之。

我們以死的氣概，

為了生而戰。

——北京學生絕食宣言

在生命中的這七天。 冼偉強攝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絕食絕水，背城借一

羅綺萍　蔡淑芳

「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生。」──《絕食宣言》



絕食行動破釜沉舟。 冼偉強攝

為了讓更多中國人活得更好，超過三千名北京學生，用他們年青的生命，作為促進民主的最大注碼，進行無限期絕食來向政府「死諫」。

五月十三日中午，北京大學數百名自願絕食的學生，吃過老師為他們餞行的「最後午餐」後，在學生糾察隊的護送下，到達北京師範大學與該校絕食學生匯合，一起出發到天安門廣場。

絕食的學生都頭纏白布帶，上書「絕食」及校名，糾察隊和聲援學生則頭纏紅布帶。(《人民日報》後來有一篇文章批評纏紅頭帶的學生吃東西，其實他們並不是真正的絕食者，只是後來，很多學生的布帶經已混亂，實在不能因此而攻擊學生。)

千多名學生約在下午四時到達廣場，隨即宣讀絕食宣言，並且宣誓自願絕食，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他們向政府提出兩點要求：第一，肯定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其次，開展平等對話，並作現場轉播。

絕食對政府的壓力

學生選擇了一個最佳的時機來絕食──戈爾巴喬夫訪華，中蘇兩國領導人舉行三十年來首次的高峰會議。世界各地記者雲集北京，有些外國電視台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更特地設立衛星轉播站，這些新聞渠道，後來亦用作傳送學生絕食的消息到世界各地，對中國政府構成很大的國際輿論壓力。

學生這種最激烈卻又最和平的請願方法，震撼了大部分北京人的心，使他們的矛頭紛紛指向政府；政府一再拖延，不願真正解決問題，使她的威信也跌至前所未有的低點。

一直同情學生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絕食首天，便透過與工人座談，表示希望學生在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維護國家的尊嚴和利益，保持理智，顧全大局，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又透露六月中旬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議程，將包括學生及工人關心的事宜。

十四日凌晨一時許，北京市長陳希同及市委書記李錫銘，在百多名公安人員保護下，到達廣場，再次勸諭學生放棄絕食。然而二人沒有就學生的要求作任何承諾，學生曾要求陳、李二人多說幾句，但他們沒有回應便離去，學生報以倒采聲。

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盡力調停學生與政府的矛盾。十四日下午他與學生對話，出席者還有教委主任李鐵映和監察部長尉健行。然而，他根本不能代表政府否定「四˙二六社論」，雖然他私下承認拖延對話是政府不對，卻不能作任何實質承諾。學生對此自然不滿，對話沒有成果。

作了被架走的準備

五月十四日，絕食的學生增多，人數近三千。當天晚上，學生都作了被架走的準備，因為戈爾巴喬夫翌日便抵京。許多北京市民更聞風而來，密密的坐在紀念碑四周，喊口號支持學生。

包遵信、蘇紹智及戴晴等十二位知識分子在與統戰部官員對話後，當晚更到廣場呼籲學生妥協，修正兩個要求，改為由《光明日報》刊登知識分子肯定學運訪問稿全文，及要求李鵬和趙紫陽到廣場亮一

亮相，說一兩句話。由於學生情緒高漲，知識分子又不能明確說出提出修正的背後原因，所以學生根本不接受這兩項建議。

至十五日凌晨四時，學生討論是否向東挪動，讓出廣場中央舉行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儀式。各校代表投票結果，決定原地不動。吾爾開希則在五時許，以個人身份懇求學生挪一挪，以免給人扣上「動亂」的帽子，最後學生以「聲音」投票，決定向東挪動，騰出中央地方。從這個事例中，可見發起絕食的學生領袖已不能控制群眾情緒。

另一方面，中央為怕出現不能控制的場面，決定將歡迎戈的儀式改在機場舉行，戈爾巴喬夫的訪華行程也數度更改，甚至接載他的轎車也要繞進小胡同，以避開大街上遊行的人潮。戈爾巴喬夫透過秘書表示，希望在會見各界代表時也會見學生，可惜作為東道主的中國政府不作安排，此事不了了之。

十五日上午，已有三十多名絕食學生暈倒送院。這天，街上開始出現零散的市民遊行隊伍，在廣場四周來回。更多的市民把食物、食水和藥物送來給學生，一些送物資者表示，這些物資是他們偷偷從單位拿來的，上司睜半眼閉半眼，不作干預。

「讓我一個人先死」

根據外國的絕食請願經驗，絕食者不僅限於飲清水，且可以飲用葡萄糖水，甚至牛奶。當時一些老師勸諭絕食學生飲用牛奶，部分學生包括王丹也聽從勸告，但大部分學生堅持只飲清水，以示決心。

學生絕食了三天，政府還是不理不睬。部分學生開始沉不住氣，十五日晚上有十多名學生，其中包括柴玲，聲稱要自焚，後來被其他學生勸止。

五月十六日，中央戲劇學院的十二名學生宣布絕水，幸而醫護人員在危急時強行給他們注射葡萄糖水，才不致危及生命。後來一批政法大學的學生亦加入絕水行列。

更感動人心的是，有些學生靜悄悄地絕水，不驚動旁人，抱必死的決心。其中一名中央民族學院的學生在醫院被救活過來後說：「像他們那樣公開絕水，肯定死不了……這個政府一定要學生死才知錯，如果要大家一起死，倒不如我一個人先死。」

有些學生雖沒有求死的想法，但往往拒絕救援。有些在擔架上仍掙扎著說「不去醫院！」「不要給我扎針！」有些在醫院裡躺了一會，便乘醫生不覺，偷偷拔掉鹽水瓶，又走回廣場，繼續絕食。

由於暈倒入院的人漸多，救護車川流不息地往來廣場及醫院。為了盡速救人，學生糾察闢出一條「生命線」，讓擔架及救護車通過，這條「生命線」後來更延至長安大街以至通往各醫院的要道，行人和司機都服從學生糾察的指揮。

在學生絕食期間，出入廣場控制得緊，絕食團指揮部發出每日更換的通行證，無證者不得擅進絕食者休息的範圍，也不得接近廣播站及指揮部。

連續數天的絕食已令許多學生倒下，廣場上的環境越來越惡劣，數以萬計的學生日夜在廣場駐紮，丟了大量垃圾，空氣也十分污濁，特別是北京當局在開始數天時，並無到廣場清理垃圾，致令垃圾堆積如山。醫護人員很快便提出警告，呼籲學生預防感染病，並以廣播宣傳衛生常識。到了絕食後期，廣場出現了甲型肝炎、傷寒和瘧疾等傳染病，幸好情況不算嚴重。

不過，仍有小部分學生因絕食過度，對身體造成嚴重傷害，據報有些學生已變成植物人，亦傳說有學生死亡，但由於學生與政府均有意避免刺激學生及市民，迄今無法證實嚴重傷殘及死亡數字。

到了十六日下午，閻明復親自到廣場勸諭學生返校，他表示已將學生的要求轉告高層，但高層意見分歧，希望學生給予時間，先返回校園，他願意跟隨學生回校作人質，直至政府答應學生的要求。可惜，學生情緒高漲，沒有體諒政府「溫和派」人士的最大努力，仍然緊抱「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宗旨，對閻明復喝倒采。

十七日凌晨二時，趙紫陽發表了書面談話，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希望學生保持冷靜及以大局為重，並說不會秋後算帳，趙紫陽希望學生因此而結束絕食，然而學生並不領情，堅持絕食。

人民站起來了

除了學生之外，北京新聞界也發表聲明批評當局態度冷漠，數百名記者更到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更重要的是新聞工作者衝開關卡，大小報章、電台電視，都出現了大量有關學運消息的報道，一反過去一面倒偏幫政府的慣例。

學生為了中國、為了人民而絕食請願，生命危在旦夕，許多北京人都覺得自己再不能躲在後面觀望，應與學生站在一起。因此，五月十七日，在學生的號召下，近二百萬名北京市民上街遊行，聲援學生。

這次遊行可說是全民運動的開端，許多參加者是工人，其中包括首都鋼鐵廠的工人，另外許多黨政機

關人員也加入了遊行。

群眾對政府不理睬學生很不滿，加上對政府長期的積憤，在這次遊行中全面發洩，他們高叫「李鵬下台」、「鄧小平退休」、「小平您好──糊塗」等口號，這種萬眾齊心地反對領導人的現象，成為這次運動的新里程碑。

群眾的支持令學生士氣大振，不過，高昂的士氣敵不過饑餓及氣溫驟冷驟熱的煎熬。五日來，約有一千五百人次的學生暈倒送院。

絕食學生的精神感動了其他人，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在十七日加入絕食行列，一些市民稍後也組成「市民絕食隊」。

由於天氣預告五月十八日下大雨，當日上午，廣場出現了數十輛公共汽車，讓絕食學生可以進去躲避風雨。這些公車據稱是政府派來的，部分學生懷疑派車隊來是詭計，準備運走絕食學生，不過為絕食者健康著想，還是讓他們上車，不過偷偷把公車的輪胎放了氣。

高層出現嚴重分歧

此時，中共高層對處理學潮的態度出現嚴重分歧。據報道，同情學生的除趙紫陽外，還有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國防部長秦基偉、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和書記處書記閻明復。趙紫陽回應學生的要求，絕食期間，在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提出能否撤回「四˙二六」的社論，又表示自己可以承擔發表社論的責任。他還向政治局提出在全國人大之下成立審查高幹子弟官倒行為的機構，公布高級幹部收入和待遇。可是，他的主張遭大多數政治局成員反對。

支持趙紫陽的萬里於十三日離京往加拿大訪問，離京前他與其他副委員長擬定六月二十日召開第八次常委會會議，討論當前人們關心的問題，包括整頓經濟、學生罷課遊行和草擬新聞法的進展。

十六日下午，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會見趙紫陽，正式標誌兩黨關係正常化。可是趙卻出人意表地說了一番耐人尋味的話，同時也一反常態地公開了黨內一個高層秘密。趙首先說兩黨正常化，其實在當天早上戈氏與鄧小平見面時已開始。隨後他透露一九八七年十三屆黨代表大會後，鄧小平退出政治局，但第一次中全會通過一個決定，在最重要問題上，仍需要鄧小平掌舵。趙說：「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他說這個重要決議是從未公開過的。

通過電視廣播，海內外都接到這個訊息。學生開始意識到由鄧小平定調的「四˙二六」社論，非鄧首肯，誰也沒法改動。但是一些高層領導對趙紫陽這番話十分不滿。據報道，李鵬指趙推鄧小平上「第一線」，要鄧小平承擔全部責任，是「分裂黨中央」的行為。楊尚昆說趙是把責任往鄧身上推。

據事後陳希同發表的官方報告顯示，在十七日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討論是否要在北京實施戒嚴，因趙紫陽反對而擱置一旁。他曾對鄧小平說，在學運的性質上不能同鄧小平保持一致，後來他提出辭職，但楊尚昆等其他常委不接受，認為趙這時辭職不利整體局面。這時，趙似乎已失去他的靠山了。

十八日清晨，五位常委中四人，趙紫陽、李鵬、喬石及胡啟立到醫院探望絕食學生，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有些學生更緊握領導人的手，訴說絕食因由，希望領導人接受學生的要求。姚依林則沒出現。

充滿火藥味的對話

當日上午，李鵬、李鐵映、閻明復等突然與學生領袖對話，出席的學生包括吾爾開希、王丹、王超華、熊焱及王治新等，在學生中頗有代表性。然而，李鵬在對話中態度強硬，指北京已進入無政府狀態，指這場運動「比文革還要動亂得厲害」，指王丹、吾爾開希「要對事件負責」，更批評新聞界的表現。李鵬既無妥協之意，又因說話被吾爾開希打斷而怒形於色，雙方鬧得很僵，最後不歡而散。

學生對李鵬講話極感氣憤，部分認為不應再為麻木不仁的政府絕食。及至十九日凌晨，趙紫陽到廣場探望學生，含淚說「對不起」、「我們來得挺晚了」，並誠懇地呼籲學生珍惜年青的生命，不要再絕食。後李鵬也趕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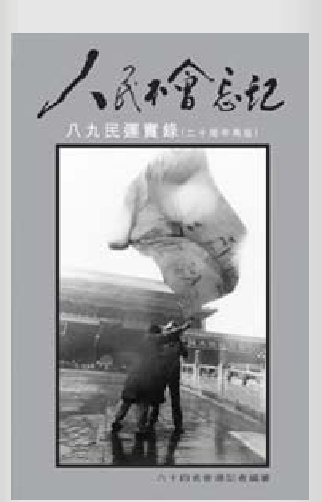
部分學生受了趙紫陽的感動，同意停止絕食，也有學生理解趙紫陽講話的深層意義，同意應保留實力作長期抗爭，加上從策略考慮，絕食七天已算極限，可以乘勢停止，所以絕食團常委宣布在十九日晚上九時停止絕食，改為靜坐，學生與政府的對峙局面表面上稍為緩和。

然而，李鵬卻在晚上十時召開中央和北京「黨政軍幹部大會」，宣布解放軍進城制止「動亂」。絕食團指揮部從廣場廣播中聞訊，憤而宣布廣場二十萬學生全體絕食，如果絕食超過五天者則先送進醫院。不過，二十萬學生絕食只是口號，實際上差不多所有學生都恢復進食，補充體力與政府抗爭到底。七天的絕食請願、以死相諫的階段終於結束。

天安門的小共和

中國政府一直指學生「侵佔廣場」、「製造動亂」，真實的情況卻是，絕食期間的廣場活像小「巴黎公社」，除了遊行外，沒有帶來市民太多不便，其實市民也很支持，紛紛送水送粥，贈衣施藥，其程度上體現了一種「共和」精神。學生之間前所未見地團結和親密。在傾盆大雨中，一個學生可以脫下自己的雨衣，送給另一個不相識的學生；為了快一點送暈倒的學生入院，抬擔架的學生跑得汗流浹背，喊得喉痛聲嘶；有些學生蹲在病床前，像母親一樣照顧倒下的學生，好言規勸他們喝牛奶。

此外，當時廣場的治安很好，丟了東西多能尋著。人們多把絕食請願視為神聖而嚴肅的事情，所以頗抗拒娛樂。例如搖滾歌手崔健到廣場唱歌打氣，也遭受一些學生及老師指責，認為崔健破壞了請願的嚴肅氣氛，這與後來廣場像開嘉年華會一樣的熱鬧，成為強烈對比。



媽媽我餓了，但我吃不下
絕食源起

譚衛兒



學生問：「餓你兩天看？」 陳木南

「五˙四」大遊行後，一位學生領袖在天安門宣布翌日復課，並說：「如果不復課，會給市民造成損害。」當天下午，當時的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對來京參加亞洲發展銀行年會的外賓，稱讚學生的愛國熱情，肯定了同學們提出嚴懲腐敗，要求民主的要求。許多同學的情緒開始平伏下來。

「我們應該回到校園，開始校園民主活動，從校園做起。」一位北京大學的同學對記者說。

接下來的幾天，學運陷入了低潮，許多同學茫然若失。政府對學生對話團的對話要求沒有迅速回覆，一些同學認為政府此舉有心拖延，而且在總書記肯定學生的愛國熱誠之時，扣在學運頭上「動亂」的帽子還未摘掉。情緒低落的同學，對再上街遊行已有點力不從心。

難道整場運動就這樣不了了之嗎？

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學生領袖都在苦思冥想：不能讓同學的感情如此葬掉，必須重新燃起同學們的熱情，必須採取一種更有效的鬥爭方式，既要保持同學的熱熾情緒，又能引起政府和民眾的關注。

五月十日，王丹、吾爾開希、王文、馬少方、楊朝暉和程真六人，一起進膳時討論到今後學運發展的方向。席上有人提出應該考慮絕食，以尋求政府真正平等的對話，一如當年印度甘地，以絕食為國家爭取獨立和民族團結。（事後，馬少方和程真說他們以前看過《甘地傳》，他們對甘地的作為印象深刻。）這一提議立刻得到其他人附和，並一致同意先在北大徵集簽名，組織一個絕食團。

天安門廣場指揮柴玲日後說，在想到甘地之前，同學已有過絕食的念頭。「因為遊行，請願不奏效，就決定用生命來呼喚一下，看看政府究竟會是什麼樣子。」她說。

其實最早提出絕食向中國政府施壓力的是香港學生。

四月廿三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四名赴京代表，曾醞釀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廿四小時，要求總理李鵬與學生對話。不過，計劃最後告吹。學聯代表曾與北大、北師大和政法大學的學生領袖交換意見，其中以北師大的吾爾開希最為贊成，政大同學也表示支持。但北大前研究生會主席、青年教師李進進則叮囑香港學生千萬不能這樣做，否則只會幫倒忙。

學生決定絕食時，顯然也看準了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數天後訪華這個機會。舉世矚目的中蘇高峰會議期間，若學生進行絕食請願，必然會引起世界的關注。不過，王丹後來公開否認他們想借外國勢力向政府施壓力。

採用集體絕食的抗爭方式，在共產黨掌政後的中國尚屬首次。對這種較激烈的手段，北京市高校自治聯會部分同學甚為反對，但絕食還是定下了，只是以個人自願形式參加。

五月十日當天北大便收集絕食簽名。起初願意參加的同學只有四十多人。王丹、吾爾開希等都很焦急，柴玲更難過得哭起來，她對同學說：「這次絕食是要看看政府的臉孔，是來鎮壓還是不理睬；看

看中國還有沒有良心，還有沒有希望。」

當晚，「北高聯」草擬了日後廣為傳頌的《絕食宣言》，強調「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我們以死的氣概，為生而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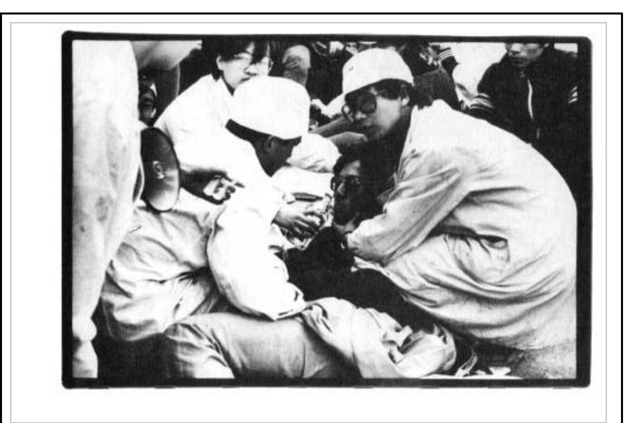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壯士一去兮

徐忠明



搶救絕食學生。 羅綺萍攝

五月十三日，北京大學師生在校門兩旁貼上「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兩行字。我當時的報道說：「北大師生以送荊軻的心情，送別參加絕食的同學。」但我萬萬想不到他們此去真的不復返。

當日，我和其他同事早上九時到北京大學校園。三角地（北大學生貼大字報的地方）已有大批學生聚集，牆上貼出絕食行動的通告，學生自治會透過廣播，呼籲其他同學、老師支持他們的行動。我站在一旁觀察他們的籌備工作，心想同過去幾次遊行前的情況差不多，沒有特別之處。

十時剛過，我走到廿八號樓對開的空地，看見二百多個參加絕食的北大學生已經齊集。他們額頭纏上白布條，上書「北大絕食」四個字，有些學生還在衣服上，用墨汁寫上「不民主毋寧死」、「我以我血薦軒轅」等誓詞以壯行色。

當一名代表踏上台階，用揚聲器叫各人齊集，絕食的學生按預先編定的組別，分組站好。他們神情肅穆的宣讀絕食誓詞。當他們重複兩次最後一句「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時，我開始感覺到他們真的要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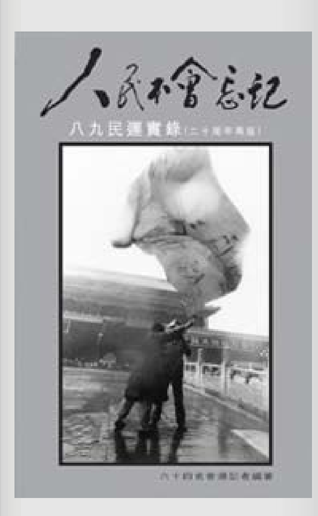
他們後來到飯堂吃絕食前最後午餐。這頓午飯是北大教職員工請客，菜餚相當豐富，但他們吃飯時真是各有滋味在心頭。北大代表王丹在飯堂穿梭往來，除了要安排同學座位吃飯之外，又要應付中外記者訪問，真不知他這頓最後午餐吃下多少。北大作家班一批較年長的同學寫了一幅「壯士一去盼復返」的横額，拿到飯堂門口，希望今次的絕食行動，像「四˙二七」大遊行一樣，他們能在校門夾道歡迎同學們平安回來。

同學們飽餐一頓後陸續到大門集合。中外記者預先在大門外選擇最佳位置，拍攝北大絕食學生踏出征途的第一步。正當我在門口等待之時，北京師範大學的程真趕來，通知北大同學，各高校參加絕食的同學先到師大操場集合，會師後再出發到天安門廣場。她頭上也纏了絕食的白布條。我詫異地問她：「你也絕食麼？」她傲然向我擺出勝利的V字形手勢，說她也絕食。她個子不高，瘦削，而且看來弱質纖纖，我本以為絕食行動應由一些身體較強壯的同學參與，起碼可以多支撐幾天，如今看見像程真這些女生也毅然參加，真是國家興亡，匹「婦」有責。他們這回真是把生命豁出去，為中國的未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中午，北大的絕食隊伍，在其他同學陪同下離開校門，浩浩蕩蕩向北京師範大學進發。北師大的操場好像開諸侯大會，紅旗飛舞，好不熱鬧。下午二時許，當各路隊伍會師後，龐大的絕食請願團宣告組成，各高校絕食的學生已超過二千人。吾爾開希、王丹等幾位絕食團的領袖手牽著手，帶頭向天安門廣場進發，贏得市民在兩旁夾道歡呼、拍掌，掌聲不絕，直達廣場。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絕食日記

劉大北

五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

中午，來自北京十多所高等院校二千多名自願參加絕食的同學，組成「絕食請願團」，在北京師範大學集合，吃過一頓「最後的午餐」和宣讀了絕食宣言後，大隊於下午二時出發，往天安門廣場開始無限期的和平絕食請願……

下午四時，同學們抵達廣場，不久周圍坐滿了來自北京各高校的聲援隊伍，形成了一個保護圈，外圈聚集了市民。當他們知道同學在絕食請願要求為「四˙二六」社論平反與平等對話時，一個市民說：「哎喲！這得餓到什麼時候去？」他勸學生們別太認真，別餓壞了身體……

市民和部分學生還圍成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圈，自由論談，大的有幾百人。演講人手持話筒，批評黨內和國家機構一些官僚腐敗、官倒、剝削的現象，他們還列舉實例，人群則不斷發出怒罵聲和掌聲。一位中央機關幹部還大喊：「公民們，我建議大家為我們民族的根本利益，想想，中國的希望。」
「對！」
市民齊聲地回應！「我們的希望在哪裏？公民們，我建議拿出你們的能力來，那怕是一分錢，拿出來！我為你們鞠躬！」也有數人埋頭在一起，冷靜的對中國民主化進程各抒己見。「……七十年前我們就喊打倒貪官污吏，到了今天我依然在喊，原因是什麼？就是國家體制沒有體現出民主，導致官僚官倒的出現，如果沒有民主的制約作用，再過七十年，我的後代還會喊打倒貪官污吏。」

各高校的聲援隊伍陸續來了，天津南開大學五百多名學生，徹夜騎單車趕來北京。《國際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在廣場上迴盪著。

這時我的神經、皮膚、縮得緊緊的，心在強烈地震動著。眼淚，千萬別流出來！忍著！同學們，我和你們在一起堅持著。在你那張有抱負，有理想，發放著熱情的臉上，我看到了中國的一線曙光。「學生萬歲！」一群原本是圍觀的市民，喊出了這句發自內心的口號，來表示對同學們的支持，當天廣場上最少聚集了十幾萬人。

五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晴

凌晨十二點三十分絕食團指揮部一項緊急通知，說得到消息，當局正在調集大量武警公安，隨時準備行動。但這段消息公開後沒有引起騷動，大家早有這個準備。這次運動的最大意義是用和平的方式請願，在任何情況下要理智、克制。

北京醫學院和北京醫科大學組成絕食救援隊來了。

真冷！北京的天氣，白天二、三十度，半夜只有七、八度，只穿一件背心，一件單外套，真夠嗆！我走到一群同學身邊坐下，他們是北大的老師和研究生，一坐下有人就說「冷啊！靠近點！」這樣我就留在他們身邊。

已是凌晨兩點多了，廣場上大部分聲援的同學，和市民離去了，但仍有兩、三萬人在廣場和絕食的同學在一起。

兩點四十五分，北京市長陳希同、教委主任李鐵映、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等領導來到廣場，引起了很大混亂，同學們一湧而上，喊著要話筒。李鐵映首先發言：「同學們要遵照紫陽同志的講話精神，冷靜、理智考慮問題。能夠盡快的回去，我們會按照中央的精神……」「少廢話！」人群怒罵，「只有對話才能解決問題」，「對話！」「對話！」「平反！」「我們要平反！我們不要空話，我們要社論！」在同學們的呼喊聲中，幾位領導人顯得很不自然，有些無奈……

陳希同接過話筒說：「同學們，國務院已經決定十五號對話。」同學追問具體內容，一時蓋過了他的聲音，當大家靜下來，他繼續說，「同學們要相信紫陽同志的講話，冷靜、克制，以法律允許的方式解決問題，要相信領導的講話，中央的精神。」……「我們不相信！」「問題都會在對話後得到解決，你們盡快回去！」「欺騙！」「我們不相信！」在這些怒喊聲中，陳希同等人結束了講話。在學生和保安人員護送下，他們狼狽離開。

不久，廣場上的喇叭又呼籲同學回校。「同學們，我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劉曉波（他是講師），大家不要拿同學的生命開玩笑。同學們要珍惜這場運動中取得的成就，我們能避免流血，就避免流血，今天的民主不是用流血換來的。今天學生自治聯會的成立，證明了這點民主程序，已經到了有組織，有策略地解決問題的階段，我建議鞏固這成果，我提議要求給學生運動平反，要求平等對話，假如我們不理智的把事態擴大，這就會失去達致這兩個要求的希望。我希望大家在十五號前盡量克制，說真的大家在這靜坐、捱餓，我的心在流血，我不希望學生付出更大的代價。用流血換取民主不是現代的民主意識，這帶有一種中國傳統的農民仇恨的心理，現代民主需要的不是仇恨，是妥協、寬容，是對話，是多元化……。」

同學們沒有離開廣場，當一切爭論停止、已經是清晨五時多了，東方開始出現了淡淡的紅色，天快亮了。大部分同學都躺在冰涼的地上，有的還在低聲議論；各校的旗幟，在冷風中呼呼的飄揚。此刻，我想剛才劉曉波的講話有他的道理，但是我們就這樣離開廣場嗎？政府一次又一次令人民失望，同學在實質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前是不會離開的，絕食宣言明確表明這次運動的立場、原則：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今日是星期日，北京大部分市民放假。中午，廣場上聚集了十幾萬學生和市民，氣溫已上升至三十度，在猛烈的陽光下，有些同學暈倒，救護車的警號響遍了長安街。

晚上十時左右，絕食團代表之一吾爾開希向大家匯報，在統戰部與該部部長閻明復和李鐵映談判的情況：「政府表示平反『四˙二六』社論是不可能的，我們已到了無可再談的地步。同學們，我們已把他們迫到死角了。他們還是叫我們回去廣場勸說同學撤離，我說無這能力和義務。」

他續說：「同學們可以放心，這晚政府是不會派警察來，據我所知，中央某些領導人甚至希望這大亂，最好來點打砸搶。我個人主觀願望，希望能撤出去，我不多說了，如果大家認為我是學賊，我甘願捱打。」這時絕食指揮部傳來激烈的爭吵聲。最後還是決定堅定到底，不撤出廣場。

五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晴

天亮了，廣場上的風很大、很冷，絕食的同學在飢寒中迎來了第二個清晨。

天亮前，同學們有過一場激烈的表決，絕食團指揮部動議，為了不直接影響廣場上舉行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國事活動，及使絕食行動在廣場上繼續下去，建議大家把隊伍轉移到紀念碑東側，大部分同學都表示同意，只有少數同學執意不走，最後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轉移。

中午，廣場開始熱鬧，北京各高校和外地高校的學生市民，形成一片人海。

我跟隨著一位北大的教師，在紀念碑北和南側主持了兩個論壇，有幾萬人參加。當時，有一個年輕人說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這位老師馬上站出來說，「我身為一個黨員，我愛這個黨。在中國喊打倒共產黨是很不現實的。共產黨有幾千萬名黨員，我想大部分是好的、善良的，但最根本問題就在我們的一些領導人，他們表現壞，極度不稱職，不得民心，這樣的領導人一定要下來，不然，我們黨的傳統、我們黨的威望，早晚被這幫敗家子敗光了！」群眾們報以熱烈呼聲。

當日廣場上沒有舉行歡迎戈爾巴喬夫儀式，儀式改在機場舉行。

三天沒吃飯了，但我現在一點餓的感覺也沒有。昨天的感覺最難受，又餓又凍，根本坐不住，站不穩，後來和同學擠在一起才好些。一位同學告訴我，有十一位同學到新華門要求向國家領導人遞交一封請願信，如果在晚上十二點前不接收的話，他們就自焚，後來經校方老師、同學相勸下，才放棄。那個同學拿出一條血布條，上面寫著「不要自焚」，他送了給我，我加了四個字「要燒朽木」。

五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

葡萄糖注射液、鹽水、蜂王漿、果汁、牛奶，我們就是靠這些進入絕食的第四天，到目前為止，已有六百三十一人倒下，送院，幾天的烈日高溫，晚間的冷風，大家擠在一起蓋著市民和老師從家帶來的棉大衣、棉被，人民溫暖著我們，白天廣播，一位北大舊生捐出三萬元人民幣，表示支持，還有解放軍、警官、便衣警察寫來的慰問信，一位便衣警察在來函中說，「三天以來，我一直與你們一起，同學們的愛國行動，使我深受感動，已令我忘記本身的任務」。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師，舉著「孩子們捱餓，我心痛」的紙牌，來到同學中間，學生則拉著「媽媽，我很餓但我吃不下！」的橫額繼續絕食。

歷史，你要為共和國的孩子作證。

在「絕食團」的場地內，情況越來越壞。指揮部的廣播不停播著救護車的緊急通知。十分鐘內暈倒了五位同學。我身邊的兩個同學也被抬走了，之前，醫生要我們輪班看守，每隔一個鐘頭叫醒同學一次，以防止他們在睡眠中昏死過去，幾天以來，同學們太虛弱了。

今晚我值班，其實這三天，我沒真正的睡過一會兒。

「同學醒一下，喂！同學！」我本是輕輕拍在他臉上的手，突然加重了；他仰起身來，不大高興的說……

「幹什麼呀！」「沒事，我以為你　　睡吧，一會再叫你！」

「喂，同學！醒醒！」拍了好幾下沒反應，我們急擰他一把，「不行，叫醫生快過來，他休克了，快送醫院」，「擔架！讓開！」「救護車！」又抬走一個。

「同學醒醒，同學！醫生，醫生快過來！」，另一位同學掙扎著，他哭著被抬走了，再也沒力氣掙脫。

「你也休息一下吧！」另一位女同學勸我。「你絕食時間長，又沒好好休息，睡吧！身體要緊。」

話畢，她按下我，為我蓋上棉大衣。

五月十七日 星期三 夜雨

……在一陣劇痛中醒來，一位護士站在我身邊。媽的，我已經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了，「疼嗎？」我點點頭，護士摸了摸我手背上的針頭，又拔了出來，「你血管收縮得很厲害，我幫你打靜脈吧！」

我是凌晨三時許被送到廣場救護站，再轉送到北京醫院，暈倒的同學太多了，病房都住滿，我被安置在走廊。

昏睡中，我感覺到有人用熱毛巾為我擦臉、脖子和手腳。我一定很髒，我睜開模糊的雙眼，淚水忍不住流出來了，只見一位六十多歲穿著病服的老人，手拿著一條發黑的手巾，看著我說，「睡吧，孩子！」我張開乾裂、顫抖的兩唇，用連我自己都聽不到的聲音說了一聲「謝您！」又閉上了眼。後來才知那老人是一位身患「敗血病」的國家幹部。

再次醒來，已是中午，我還輸著葡萄糖，醫生說已給我輸了六瓶，還要觀察一天。

到北京以後，我未試過睡這麼多。醒後，覺得精神得多。「回廣場去！」我向醫生提出。她叫護士給我換了一瓶新的葡萄糖，無奈地說，「你們全是這樣，一醒來就要走。同學！你們付出的太多了，你們不能再餓下去，中國的將來要靠你們，你們不能垮。」醫生激動地說。

一個吊著鹽水的同學經過我身邊停下來，原來是「北高聯」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他對我說：「同學，聽醫生的話，保重身體，我們的生命要比他們高貴的多。」吾爾開希患了「心肌炎」，已昏過五次了，他拔去輸液針頭和氧氣管，從醫院跑回廣場兩次。現在他正接受觀察治療。他父親在旁照顧著這個不聽話的孩子。

下午輸過六瓶葡萄糖後，我和一名北大的同學，一起向醫生提出離院的要求，費了好一番唇舌，醫生才讓我們離去。

我來到吾爾開希的病房，一個剛從廣場上出來的同學向他匯報情況，廣場上已有一千七百多人送院。「我們做夠了，不能再付出了，我們已經勝利了。現在外面有過百萬來自各界的人自發地全市大遊行，支持我們，我們的愛國行動已得到了人民的肯定。我們應當改變鬥爭方式，但是如果我對同學們說停止絕食，撤出廣場，肯定遭到反對。」吾爾開希說。

我也贊成他的看法。目前這個局面，已經發展到非學生領袖所能控制了。

「你回去跟同學們說，鬥爭是長期的。要保存自己，有不舒服的，馬上找醫生或去醫院治療。」吾爾開希囑咐我。

傍晚回到廣場，同學們見到我，都很高興。

五月十八日 星期四 降雨

大清早下雨，大家準備轉移到車上，中國紅十字會為絕食團同學準備了百多輛公共巴士。這次轉移是為了清理現場的垃圾，另外是把絕食同學集中起來。爬上巴士頂，才發現整個天安門廣場，都是一片旗海，長長的遊行隊伍。在遊行隊伍中，我還看到了三輛站滿警察的卡車，敬著禮從天安門前駛過。人們報以「人民警察萬歲」的歡呼，警察喊出「學生萬歲」「人民萬歲」！

過了一會兒，一隊由警官學校教官幹部組成的遊行隊伍，來到我們絕食團外，我們走上前去，互相握著手，「同學們，我們支持你。要注意身體，別再絕食下去了，身體要緊呀！」

中午過後，車上來了一位農村老大爺，他是來找兒子的。從河北省來，可是他兒子昨天已經被抬進了醫院，老大爺流著淚說：「我不是擔心這個兒子，我來看看他！要是他死了，我也沒什麼捨不得的！我全看見了，同學們跟我說了，我明白！我心疼呀！」

中午下了一場雨，廣場上的人沒有東奔西跑找地方避雨，遊行的仍在邊走邊喊著口號，糾察隊的同學，仍然緊守崗位指揮交通，維護秩序，突然間傳來一個消息，「鄧小平下台了！」廣場上一陣歡呼！是真的嗎？我不大相信。不久，又傳來，這段消息未經證實，只是謠傳。

晚上廣場播出了李鵬與學生見面的談話錄音，李鵬吊高嗓子用教訓孩子語氣擺出他不可一世的威嚴。稍後，我和兩個同學及一名老師去醫院。那裏擠滿了人，醫生不由分說，叫我躺在病床上，量血壓聽心臟。可能是因為太累了，一躺下就昏睡了過去。

五月十九日 星期五 晴

一早從北大醫學院的病床上醒來，想下床走走，但好像被黏在床上一樣，一點勁兒都使不出來，一個醫生走過來說：「別動，需要什麼，我幫你拿，喝杯水吧！」這間病房有四張床，除了我還有三位同學，其中一位同學的母親，低語不休的說著話，同時，手捧著碗，一口一口的餵他的孩子吃。

當醫生一來到我身邊時，我問醫生有湯嗎？「我們的生命要比他們高貴得多！」我想起了吾爾開希的話。身體是本錢，不能垮。

六天以來第一口湯怎麼咽下去的，真說不出有什麼感覺，只知道食物從嘴邊流到肚子那段過程，我慢慢喝，完成了一碗，旁邊的那位同學，只喝了半碗，他吃不下，覺得反胃，而我吃了兩碗。

中午從廣場上來的消息，趙紫陽凌晨到廣場看望學生。廣場同學們的情況到底怎麼樣？我要回去。

坐上一輛紅十字會的救護車，一路上，到處都是疲累的人。這些天來整個北京城都疲累了，由於交通停頓，公路上除了自行車、電單車外，大貨車、麵包車都載滿了遊行的市民，V字勝利手勢代替了所有說話。

來到廣場，發現進入廣場的通道除了救護車用的生命線外，到處都擠滿了人。走向絕食同學的公共巴士，一陣惡臭傳來，是來自廣場兩輛臨時由巴士改裝的廁所。這裏的空氣污染已使紅眼病和一些疾病流行起來。

當我來到原來和同學們一起的巴士時，同學們都不在了，只有一個老師在裏面。他見到我，沉重的對我說：「你怎麼還沒走，今天晚上實行軍管，可能有行動，你最好離開這裏，不然，會有麻煩。」「軍管，他媽的軍管！我腦海，一下子空了，找不到一個字來形容。再看一架架巴士上的同學，一張張沉默、憤怒的臉，他們的心情和廣場上所有的人一樣。

我在廣場中央坐下，握著一個同學的手，我們大家的手都在顫抖。他對我說：「我們不想你走，但眼前的形勢對我們不利。」「我明白！」，「日後到學校來找我們。」，「保重，大家保重！」

我和同學沉默起來，這剎那的沉默，因為今天人民醒覺的聲音，絕不會成為爭取民主、自由的絕響。

廣場無一寸地方沒人擁擁擠擠，市民默默面向著廣場，眼睛內沒有任何東西，他們把希望放在學生身上，我再也看不下去了，低著頭離開了廣場，難道我們真的這麼沉默下去嗎！

我回到了一個多星期沒回過的住所，在我準備洗澡時候，同屋的朋友衝進來說：「大兵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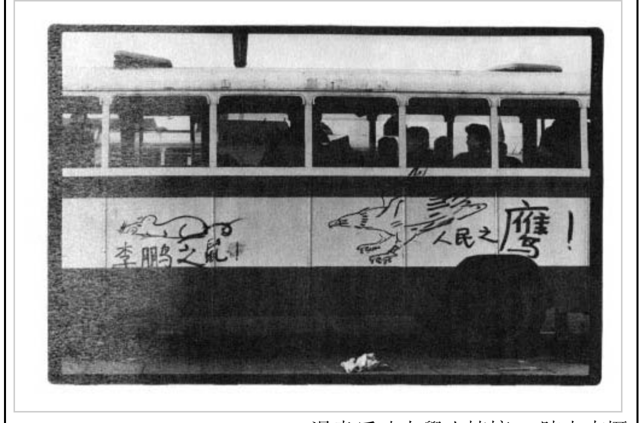
編者按：作者是一名曾參與北京絕食的香港市民。劉大北為筆名。





對話還是訓話?

陳寶珣 黎佩兒



漫畫反映出學生情懷。 陳木南攝

李鵬在學生絕食第六天，終於與學生代表會面，然而，一開始這次對談便註定失敗，因彼此並非站在同一層面，也沒有打算妥協讓步，兩方都是硬要對方迎合自己。

李鵬開宗明義聲明他的孩子沒有一個搞官倒，不過，還未講完，便被吾爾開希打斷。

吾爾開希反客為主，首先聲明大前提是學生請李鵬出來講話，所以談什麼應由學生決定。學生要求「進入實質性談話」，因為「外邊的同學在捱餓，坐在涼涼的地上」，那是生與死的迫切問題。

王丹點出他們來不是要聽李鵬說服學生代表，而是要官方答覆學生提的復食條件：第一，要明確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是民主愛國運動，第二，盡快對話。

他們並指出，全市上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學生，包括小孩、老頭、從八十歲到幾歲都有，反映民心向背。

吾爾開希進一步迫令當局答應條件，他強調情況「不是怎樣說服在座的人」，（所以他們沒必要也不會聽道理），而是答應他們，因若有一個同學不離開，其他幾千個同學也不會離開廣場。

學生與李鵬對談的同時，仍強調有必要「立即、公開、平等、直接、真誠的對話」，正好反映了學生心知是次會面，純粹是要令官方答應條件，根本沒有討論餘地。

李鵬那方面，他避免正面回答學生所提的要求，他眼中的實質性問題是：作為「負責任」的政府，要同學盡快結束絕食，盡快到醫院接受治療。

他的具體建議是由中國和北京市的紅十字會負責把絕食的同學送到醫院。

學生列出的兩項要求，看似簡單，卻是根本性的問題。學生認為先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並不足夠，因在這熱情之下，什麼事都可幹出來，他們要求徹底平反──正式否定《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向全國道歉；至於電視直播對話，實際等於衝破新聞封鎖的樊籠。

其實官方一再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及承認了學生舉出的時弊，顯示他們願意間接地平反學運；至於對話，雖然還未解決到實質問題，但官方已陸續召開，及承諾了在各層面上解決學生提出的問題。

因此，學生執意要求官方一定依足他們開列的條件，一方面顯示他們自信，並相信人民的力量；另方面則反映了他們脫離不了傳統政治鬥爭的格局，不懂得妥協，只一味堅持對抗到底。

李鵬與學生在五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至十二時會面，傍晚時分官方正式由電台及電視廣播會面情況，市民聽到學生質問「政府是不是我們的政府」，「有良心的人...其他什麼面子呀，是應該放下的」。學生把矛頭直指李鵬：「對李鵬總理有意見，這不是針對他個人有什麼意見，而是因為他是共和國的總理」。

學生尖銳的說話大快人心，群眾收看收聽到官民言詞交鋒處，無不喝采，額首稱慶。

學生質問為何學生長跪請願，千呼萬喚，領導人仍置若罔聞；並把學生絕食六天，政府不聞不問，類比南非這樣沒人權的國家，暗示中共人民政府的形象，還要不如。

學生咄咄逼問下，李鵬終於沉不住氣，他一方面說：「政府和黨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我們一定肯定大家的愛國熱情」，另方面卻說：「北京已經是秩序大亂，而且波及到全國……北京這幾天已經陷入了無政府狀態。」

他把學運提升與十年文革動亂相提並論，並把這個責任推到學生領袖身上：「我沒意思把責任加於王丹、吾爾開希身上，但這是絕對客觀事實，在某種程度上，比文化大革命還要動亂得利害。」但李鵬這句說話卻在中央電視台轉播時被略去。

李鵬以「負責的政府」自居，抨擊「機關工作人員、市民、工人、甚至國務院人員上街遊行」，是在鼓勵學生絕食。

北大同學熊焱三言兩語便把李鵬本末倒置的因果論戳破：「一個社會是否會有動亂……這與社會的體制與社會的弊端有直接的關係，學生的行動，是想把社會的弊端集中反映出來。……鎮壓學生運動……恰恰是引起社會動亂的原因。」

王丹更直截了當地說：「社會上的動亂或不良影響，我可以代表廣大同學說，這個責任應該由政府負全責。」

學生運動和動亂的關係道理簡單，官方和學生各執一詞，但他們都意識到學運轉化為民運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已非學生能控制。

正如北大學生部江說：「學生運動本身，中央也承認是比較理智的，但是，我們不能保證這種全民運動是一種理智化的運動」。

中國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表明：「很多事情並不完全決定於我們的主觀想法和願望……最終只能由歷史來檢驗，如果在今天的中國沒有一個安定的局面，什麼事情都吹了。」李鐵映的說話似乎要學生單方面肩負「大局為重」的擔子。

李鵬更明確地說：「事態的發展，不以你們善良的願望和良好的想像和愛國的熱情為轉移」，他並舉出「鐵路生命線，在武漢，被堵了三小時，停止了運輸。現在不少的城市……是社會上閒雜的人員，正在打著學生的旗號，到北京來。」

李鵬抱著君臨天下的架勢，侃侃而談不著邊際的官倒開場白、無關宏旨兼空洞的關切之詞。學生則頭束血淚交織的絕食布條、吸著氧氣，以至體弱到只餘柔絲沙啞的聲線，仍掙扎奮力地緊逼反駁。

慷慨高揚的情緒，犀利的詞鋒，直迫中共無上權威，總理的智慧邏輯被質疑了；有人輕蔑地打瞌睡，不屑發一言。

當北大學生熊焱挑戰李鵬「學運和動亂簡單的道理」，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宣讀從外緊急傳來的紙條，謂「絕食團指揮部的同學希望代表趕快回去」。

吾爾開希激動得心肌炎發作，在這對峙高潮，他倒下來，抬出去急救；有人緊急召回廣場。在這戲劇化收場時，學生在混亂中仍不忙加上一句：「這不是對話，是見面。」

透過電視電台全國廣播，長期頂住「皇帝」的中國子民，看見學生與總理平起平坐，無畏地辯論國是，實在鼓動了他們的參與情緒。

北京一名市民以「望之不似人君」來形容李鵬的表現；學生邊收看電視，

邊追思寬容謙厚的周恩來總理。

「李鵬下台」的口號接著在北京城漫天捲起，反政府情緒與日俱增，會面沒有紓緩學潮的緊張，只標誌著以「對話」來解決問題的階段告終。

寫於八九年七月十二日

戈爾巴喬夫的啟示

鄭偉鳴



廣場上出現俄文標語。 冼偉強攝

五月十三日，北京為數約二千的大學生開始絕食，這是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進行三十年來首次高峰會談的前兩天。

五月十三日，北京為數約二千的大學生開始絕食，這是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進行三十年來首次高峰會談的前兩天。

五月十三日，北京為數約二千的大學生開始絕食，這是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進行三十年來首次高峰會談的前兩天。

自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以後，學生運動經過「五˙四」遊行而轉入另一個低沉期，極需尋找另一個凝聚點。五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戈爾巴喬夫與中國高層領導會晤，世界各地記者雲集，正好提供大好機會，學生藉此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

一些參加絕食的大學生強調，他們的行動與高峰會談無關。其中一位說：「我們並不反對高峰會議，我們並不想藉此製造事端，難為國家。」另一位學生說，他們可以暫時離開天安門廣場，避免妨礙在人民大會堂門外舉行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儀式。

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五月十三日下午與首都工人代表座談時表示，希望學生在戈爾巴喬夫訪問期間，維護國家的尊嚴和利益，保持理智；他並透露，在六月中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將把學生和工人群眾關心的事列為議程。

絕食的學生沒有接納趙紫陽的意見。當問及他們的行動可能使中共黨內的「改革」派領袖，如趙紫陽等，置於不利處境，一位學運積極分子說：「我們不是從中共內部權力鬥爭角度來看問題。」另一位絕食學生說，學運自有其發展規律，不可以「人為」地改變。

北京學生欲利用戈爾巴喬夫的訪問，引起世界的注意，這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這位富有改革形象的蘇聯領袖來訪的鼓舞。他們悲慟開明的胡耀邦逝去之餘，把他們對政治改革的渴望，投射在這位蘇共領袖身上。

戈爾巴喬夫訪京期間，在天安門附近的街道牆壁上，可看到一些有關他的小字報。內容主要是讚揚他推動改革、熱情及開放言論。曾接受訪問的學生都說戈爾巴喬夫在推動改革是「比較了不起」，且把他跟中國領導人作比較。一位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生說，中國領導人，包括鄧小平，也想推動改革，但行動則不及戈爾巴喬夫的堅決。

接受訪問的北京大學生承認他們對戈爾巴喬夫的了解不深。他們只是通過中國的官方報紙認識這位蘇聯領袖，對他了解片面。其實，中國學生的熱情主要不是來自對戈爾巴喬夫及蘇共改革和開放(glasnost)的深刻認識，而是對中國領導層在政治改革上猶疑反覆、對經濟改革陷入困境的失望的反映。

中國無可避免受到蘇聯及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改革的影響。中國與蘇聯的改革是從兩個不同方向開展的。前者主要先從經濟領域開始，然後擴及政治。後者則主要先從政治領域進行，帶動經濟。從經濟改革開放的程度及速度來看，中國十年來所進行的變革是蘇聯所不及的。但中國近兩、三年的經濟改革已經進入「瓶頸階段」，若不以政治改革來配合，將會停滯不前，甚至引發社會動亂。中國經濟本身陷入結構性矛盾中，而官倒貪污的猖獗，亦使人民深感不滿。蘇聯自戈爾巴喬夫在一九八五年擔任總書記以來，推行國家制度的政治改革，雖然內部阻力很大，但確實帶來了一些生氣。而戈爾巴

喬夫才五十八歲，與中國年紀老邁的領導層相比，才算「第三梯隊」。
他富於活力，且又塑造了一個開放敢言的形象。由於中蘇兩國在改革上，歷來是互相補充借鏡，再加上戈爾巴喬夫個人的形象，中國的改革者及大學生，摒棄了兩國三十年來的積怨，以熱情看待蘇聯的變革。

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受到大學生及一些市民的熱烈歡迎。示威遊行隊伍更豎起他的畫像及讚揚標語和橫額，例如「老戈您好」，「戈爾巴喬夫，北大歡迎您」。北大、清華等院校向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要求，戈爾巴喬夫到校園演講。這位蘇聯領袖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訪問時透露，收到不少中國公民的信件，有些還邀請他去探訪。

儘管一般大學生對蘇聯改革開放政策，不一定有很深入的認識，但在知識分子心中，戈爾巴喬夫大刀闊斧的改革，正是中共所急需推行的。大陸知識分子劉賓雁六月訪港時表示，他在八七年時就與人議論過，中國能不能出戈爾巴喬夫那樣的人，結論就是並不是沒有這樣的人；而是沒有這樣的條件，即沒有人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割斷與老人輩的聯繫。除了老人政治的問題外，實際上，兩個社會主義超級大國面對很多共同的問題。

蘇聯的危機，同樣是社會上出現了停滯現象，形成了某種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機制：黨風不正，幹部與官員出現貪污受賄，弄虛作假，以權謀私等情況。戈氏提出欲解決蘇聯經濟改革的難題，必須進行政治改革，以提高群眾的積極性。具體表現出來的便是「民主化」、「法治化」和「公開化」，並強調民主是首要。蘇聯在三月間舉行七十年來第一次人民代表差額選舉，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個試點。戈氏開放選舉，令「政敵」蘇共政治局候補委員葉利欽當選為人大代表，舉世都對戈氏表示欽佩。在中國改革派心中，更是別有一番滋味。

戈氏的勇氣，顯然在中國知識界及校園內留下深刻印象，相對之下，不斷以要根據中國的「國情」、「具體情況」進行改革，「不能存在一種固定模式」的說法，則常被視作推遲改革的藉口。

戈爾巴喬夫曾肯定中國學生對改革的熱情。他在中央電視台的訪問中談到中國年輕人堅信社會主義改革，並希望加速推行改革。然而與中國領導人會談時，他提到蘇聯年輕人也有些「頭腦發熱」，似乎在影射北京的大學生。據報道，戈爾巴喬夫向蘇聯官員表示，對北京學運不應過份樂觀，當時他說：「站遠一點研究，事態還在發展，遠遠還未到結局。」

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引起的問題，中、蘇和其他執政的共產黨均要面對。加上戈爾巴喬夫必須珍惜得來不易的中蘇關係正常化，他不像西方領袖一邊倒地肯定北京的學生運動；但他也沒有像一些共黨領袖（如北韓、東德、古巴）般支持官方的鎮壓。戈爾巴喬夫的態度是他的位置使然，北京學生對他的愛戴，似乎未看清這位蘇共領導人的歷史處境。

工人、幹部也來了

蔡詠梅



五˙一七全民遊行。 葉英傑攝

「救救學生，救救中國！」「人民已經忍無可忍！」五月十七日學生絕食進入第五天，北京二百萬市民發出悲憤的吼聲，從四面八方湧入天安門廣場，聲援英雄紀念碑下絕食的三千多大學生，形成了民主運動另一個高潮，也是四十年來大陸最大規模的民眾自發示威遊行。據中國新聞社形容，這一天必將載入「中國史冊」。

清晨曙光初露，千年古城就已開始躁動。北京市各界，包括教育界、文化界、科技界、企業界、工人、市民、男女老幼已紛紛集隊沿長達十公里的西長安街，從南面的大前門進入天安門廣場。隊伍源源不斷，一直持續到深夜。

正午後，聲援集會達到白熾的程度，萬里晴空下，世界上最大的天安門廣場和寬廣的長安街滾動翻騰著巨龍般的人流，只見無數黑壓壓的人流和一片五色繽紛的旗海，只聽見口號聲、吼聲、歌聲，此起彼伏，震天動地。北京城完全沸騰了！

由於當局對絕食學生不聞不問，遊行隊伍首次將矛頭指向最高領導人。在排山倒海的抗議怒吼中，鄧小平成為眾矢之的。清華大學師生舉著「小平，你好狠心！」「小平，你好，好糊塗！」的橫幅向前行進。

「下台吧，末代皇帝」、「小平老矣，尚能飯否」、「打橋牌，莫忘了人民」、「中華十一億，不能一人尊」、「不要慈禧太后，不要垂簾聽政」的橫幅和標語一條接一條走過去。不少人都感到大快人心。

《北京日報》受北京市委直接管轄，是此次學運中最「左」的報紙，多 次遭到學生痛恨焚燒。但《北京日報》的記者和工人也衝破層層阻礙，舉著「小平，人民要你認錯」、「小平，收回講話」的橫幅走上長安街。

這一天，北京人幾乎是傾巢出動，清潔工人、個體戶、居民、老大娘甚至黨政機關和國家幹部、警察、軍人都肩並肩、手攜手，走在人民的隊伍中，顯示了人民的巨大力量。

浩浩蕩蕩的人潮，出現了中共中央組織部、統戰部、全國政協、外交部、郵電部、航空航天部、外貿部、國家檔案局、國家體委、國家教委、電子工業部和公安部等十數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部委的隊伍。

國家體委隊伍舉的橫幅形容自己是「血還沒有涼的幹部」，表達這些身居黨政重要機關的幹部的共同心聲。

他們支持學生，要敵視學生與人民的當權者下台。國家教委幹部公然地高舉這樣的標語「我們不要何東昌這樣的領導」。

令人意外驚喜的是，除了公安部和軍隊的文職人員，竟有一千多名解放軍，身穿軍裝走在人民的行列中。在作家協會的隊伍前面，一位解放軍身跨布帶，向兩旁熱情歡呼的人群頻頻揮手。他是軍人作家，他驕傲地宣稱，「我和人民在一起」。

大陸的八大民主黨派一貫被人譏諷為唯中共命是從的兒子黨、孫子黨。在這一天，他們投進聲援學運的巨大民主潮流，發出了獨立的呼聲。

正午十二時三十分，八大民主黨派五、六百人在中央美術館集合，然後從南河沿進入東長安街。

隊伍最前面是一面「中國民主黨派」的統一大旗，然後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旗幟，打出的橫幅是孫中山語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及「救救學生，真誠對話」。

其餘七大黨派舉的橫幅、標語，喊出的口號是，「為民主而奮鬥」、「天賦人權」、「求民主無損國家形象，反獨裁有利中華前途」、「沒有民主不能安定，一人獨裁何謂團結」、「民主黨派堅持民主」。

這支隊伍一走出南河沿，在長安街的民眾立刻爆發出如雷的掌聲，年輕小夥子喝采道，「好樣的！」走在隊伍中的民主黨派成員人人面上放光，顯得份外激動和興奮，似乎吐盡了往日的窩囊氣。

兩個旁觀的男子評論說，「連民主黨派都如此得人心，看來共產黨真要完蛋了。」

一直沉默的工人大眾舉著「工人的火再也壓不下去了」、「工人不能再沉默了」、「聲援學生不怕開除扣獎金」的橫幅浩浩蕩蕩走上街頭。首都鋼鐵廠、鐵路工人、地質工人、計程車司機的隊伍一個接一個，一個比一個聲勢大。他們均是精壯大漢，穿統一的制服，邁著雄壯有力的步伐，或駕著龐大的工程車，大巴士、大貨車，聲勢浩大地操入長安街。

北京的三輪車工人以一面「祥子聲援團」的旗幟開道，騎著數十輛三輪車加入遊行行列，隊伍拖了長長的半公里，又是另一番奇特的氣勢。「祥子」是作家老舍的小說《駱駝祥子》的主人公，一個三輪車伕。連年輕的姑娘也向這些風塵僕僕的「祥子」們揮手鼓掌。

海關、銀行、中信公司、北京人民藝術劇團、中國民航的隊伍也來了。在滾動的人流中，可以看見「三里屯個體戶聲援團」、「三露廠聾人職工聲援團」、「景山房管所」等旗幟，及各式各樣大學、中等技術專業學校的標誌。

連小學生也由他們的老師帶著來了，他們舉著「請大哥哥、大姐姐喝杯水」的紙板，聲聲哀訴著，「救救哥哥姐姐」。後面一輛三輪車上堆放著他們用兩毛、三毛零用錢捐獻出來買的紙包水。稚嫩的聲音感動得人潸然淚下，紛紛向他們拍照、鼓掌，高叫「小朋友好！」

比他們年長的中學生則高唱《國際歌》，雄赳赳氣昂昂地步向廣場。他們的口號是，「哥哥姐姐們，今天的你們就是明天的我們。」

在人民的聲援大軍中，有一個市民聲援團，數日前他們還是彼此不相識的路人，今天他們已成為共同戰線的親密戰友，打著「誓做學生堅強後盾」的旗號，高呼著「民主萬歲」、「自由萬歲」的口號，驕傲地邁步。

學生的獻身精神激發著人民的愛國熱情，這是民間自發的示威遊行，各路人馬多則數千人，少則數人或一人。有一家數口坐在一輛平板三輪車上，車上插著一幅「家庭聲援團」的旗幟，其中一人舉著「刀小也能動大手術」的牌子。

此外還有「一人聲援團」、「夫妻聲援團」，總之國家興亡，人人有責。

入夜，華燈初亮，氣溫轉涼，但長安街和廣場仍是人和聲的海洋，在救護車不斷的淒厲笛聲中，悲涼復又憤怒的「救救孩子」吼聲仍震撼著北京城。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危城（五月二十日—六月二日）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國歌



解放軍在北京市郊候命。 冼偉強攝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大軍壓境，民不畏死

林靜潔　彭士雄　顏婷
梁淑英　麥燕庭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五月十九日黎明前，以個人身份到廣場探望絕食學生，情真意切地對學生說「對不起，我來得挺晚了」，勸導學生停止絕食，強調解決問題需要一個過程。他短短的一番話博得在場同學熱烈掌聲。同學當晚九時宣布停止絕食，改為萬人靜坐行動。



小孩子可知道發生什麼事？ 陳木南攝

可是形勢急轉直下，當晚十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中共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李鵬和楊尚昆發表了講話。

李鵬強烈指責學生遊行、絕食、罷課等行動，令首都形勢嚴峻，無政府狀態越來越嚴重，中共決定「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制止「動亂」。

李鵬指出，「極少數極少數的人要通過動亂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這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他呼籲學生停止絕食，各界也不要再作聲援。

楊尚昆並宣布解放軍將入城，恢復首都的秩序。

而趙紫陽沒有出席這次大會。黨內高層意見分歧看來已白熱化，趙紫陽失勢的跡象則更趨明顯。

李鵬指學生運動為「動亂」的講話，在二十日凌晨零時後透過廣場擴音器播出，即時引起廣大學生極強烈的反應，學生於凌晨三時宣布，將原先決定的靜坐行動升級為二十萬人絕食。

學生揮舞著旗幟，喊聲蓋過不斷重複著李鵬講話的廣播聲響。

戒嚴令挑起反抗

由於楊尚昆宣布解放軍將入城，因此數以萬計的市民就湧到街上堵截軍車。而大批裝甲車、坦克和軍隊先後在北京城郊以至市中心外圍出現。

早上十時，國務院正式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這些地區都位於城中心一帶，包括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石景山區、海淀區、豐台區和朝陽區。

北京市政府繼而公布三項戒嚴限制，包括嚴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串連、煽動社會動亂等。戒嚴令亦限制新聞採訪，並指出戒嚴部隊有權對違反戒嚴令者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制止。三項戒嚴規定由北京市長陳希同簽署。

軍隊的出現引起北京市居民強烈反感，大批市民湧上街，以身軀築起血肉長城，堵截解放軍前進，使市民聲援學生行動推至高潮。學生組織平民堵截軍隊，並向車上軍人教育，向他們解釋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不是什麼「動亂」。從駐紮部隊口中獲悉，在行動之前，他們除了「四˙二六」社論之外，不准閱讀其他報章及看電視，部分更透露上級告訴他們入京是為了演習。

在戒嚴令頒佈後，廣場每晚都有傳言謂軍隊會清理廣場，但學生堅決不撤，市民白天睡覺、晚上來，一致起來保護學生。廣場每晚都聚集了數十萬人，市民更組織「敢死隊」，軍警和民眾之間也曾發生

零星衝突。

廿二日晚上，在豐台區一些武警與堵截軍隊的市民衝突，武警用皮帶和磚頭打學生和市民。混亂中，在該處被堵截的解放軍亦有受傷，這次衝突最少有四十人受傷。此外，六里橋亦傳出有軍民衝突，多人受傷。

連續數晚，廣場內均有有關鎮壓的傳言，說將有空降部隊降落故宮；說軍隊配備水炮、催淚瓦斯，於凌晨入廣場清場；又說有傳言鄧小平曾下令不惜以二十萬學生生命換取首都廿年穩定等等。言之鑿鑿，令學生在撤與不撤的問題上出現意見分歧。

廿二日凌晨，吾爾開希在接獲情報後，建議學生撤離廣場往使館區，但遭學生大力反對，且被罷免了「北高聯」主席之職。

當天黃昏，在學生領袖柴玲帶領下，二十萬學生一同宣誓「頭可斷、血可流、自由民主不可丟。」

這段期間，天安門廣場的權力中心由「北高聯」轉移到「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簡稱「廣場指揮部」）。

自戒嚴以來，軍隊始終被阻於城外，但學生一直表現得很有秩序。但也有人故意製造事端，廿三日下午，三名男子用顏料弄污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學生旋即抓著三人，交公安人員。當局指他們的身份為教師、記者及工人，均為外地人士，但從中央電視台報道所見，被捕者操流利北京話，他們的身份及動機頓成疑問。在同日晚上被弄污的毛像已更換。

全民奮起，動而不亂

此時，爭取民主自由的洪流湧到北京各階層。自四月底開始，已不斷有工人打著旗號遊行支持學生，直到五月中，才有消息傳出一個由學生協助籌組的組織，名為「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工自聯」），醞釀成立。

「北高聯」、「工自聯」籌委會、「廣場指揮部」及「外地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等，聯同知識分子一起組織成「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骨幹有王丹、劉蘇里、嚴家其及包遵信等。

與此同時，打著維護首都正常秩序旗號的圍城大軍已超過廿萬人，並不斷增援。廣場指揮部召開大會後決議要將行動升級，組織更大規模遊行及絕食，向政府施以壓力。

學生當時仍然有一個寄望，就是期待正在北美訪問、曾發表同情學生言論的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及早返國，召開緊急人大常委會會議，否決李鵬下的戒嚴令，甚至罷免他的總理職務。為促成此事，全國人大常委胡績偉收集五十多名常委簽名，聯署動議開會。

戒嚴令頒布三天後，北京市面的治安、交通、供應漸趨正常。此時市公安局還公布刑事案和交通事故在過去兩個月來都明顯下降。一位卸任的中國官員私下說：「什麼動亂，我看只是動而不亂。」

入城的戒嚴部隊被堵三天後，開始後撤隱藏起來，軍車坦克離開公路暫駐於一些營房和軍事大院內。不久，戒嚴部隊進駐了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稍後又進駐了新華社。

中共上層亦重新部署，「戒嚴意識形態領導小組」取代了由胡啟立掌管的中央宣傳工作領導小組，新小組組長是王忍之，副組長袁木，成員還有何東昌、曾建徽（中宣部副部長）和李志堅（北京市宣傳部長）。

透過宣傳媒介，戒嚴部隊司令部展開「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的宣傳，強調戒嚴是維護首都秩序，而非對付學生。另外，在駐地附近，軍隊組織聯誼活動和義務勞動，發揚「軍民魚水情」，以緩和軍民之間的緊張情緒。

與此同時，一些高級將領和民主黨派人士出面呼籲政府克制，不要大動干戈對付學生。另一方面，鄧穎超和兩名元帥──徐向前、聶榮臻──分別以書面講話，勸學生離去，強調軍隊入城並非鎮壓學生。

數名八十多歲元老分頭做工作。廿四日楊尚昆召開中央軍委緊急擴大會議；廿五日陳雲召開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會議，彭真則約見各民主黨派頭頭；廿六日李先念在政協常委會上講了話。他們的作用，是解釋當前的「動亂」及對黨的「危機」，指斥趙紫陽的錯誤，號召大家跟黨中央保持一致。

各地方大員（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在五月下旬奉召入京，分別與楊尚昆、李鵬、喬石和組織部長宋平會面，領會中央政策精神後，陸續回到地方部署。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幹部都需學習楊、李、喬三人的內部講話，又接到訓令，不得再參與遊行和罷工。

在各項下達文件和傳話中，趙紫陽已被批判為分裂黨。一份軍方的文件甚至指趙犯了「反黨」罪。然而，各地各級和軍隊內對「倒趙」的抵制情緒很高，表示對中央的做法難以理解，對黨總書記「反黨」一事難以接受。消極抵制和內部反對意見使高層不敢貿然召開中央全體會議，解除趙紫陽的職務。

透過黨宣傳工具和組織紀律，五月廿九日起，各黨、政、軍、地方首長紛紛表態，擁護中央，支持李鵬和楊尚昆的戒嚴决定。連較開明的單位，包括北京軍區和廣東省等，也別無選擇，只好緊跟中央。

北京市民的最後期望也宣告破滅。人大委員長萬里在廿三日縮短訪問行程，匆匆回國。北京市內出現歡迎萬里歸來召開人大常委的橫額。可是廿四日萬里回國後不直接返回北京，而先到上海。官方新華社報道萬里因病需在滬稍息。三天後萬里發表書面談話，同意李、楊的戒嚴令，並認為戒嚴既有需要又合法。這番講話令學生非常失望。

學運低潮，矛盾顯現

隨著政府的重新部署，氣氛稍為和緩，學生安全不致受到即時威脅。然而學生因長期靜坐和天氣炎熱，正疲態畢現，鬥志鬆懈，學運滑入低潮。在廣場靜坐的學生迅速減至二萬餘人，其中大部分是外地學生，本地生只有北大、清華和政法大學少數學生。

雖然不少外省來的學生已陸續返回原地，但新的外地學生卻又不斷到來。這些外省學生滿腔熱情遠道而來，滿以為天安門廣場是一個革命聖地，誰知環境惡劣，又未能得到本地學生照顧，不但吃不飽，睡不好，想找點事做，又茫無頭緒，參加糾察隊也沒機會，有的失望而去，留下來的很多不滿「北高聯」的不民主作風。他們覺得，在廣場上支撐場面的大多是外地學生，但「北高聯」有任何重大決策，卻沒有諮詢他們，因而產生被欺騙的感覺。

另一方面，北京的高校生和市民，對外地學生也頗有微言，認為不應接待外地學生。部分外地生的表現亦令人失望，有人顯然是抱著遊覽首都的心態而來，日間四出蹓躂，晚上才回來吃飯睡覺。有些人行為亦不檢點，引起北京市民不滿，令人擔心外地學生的行為會破壞學運的形象。

外省學生和本地生不協調的現象令廣場秩序日漸失去控制。就應否撤退問題，「外高聯」和「北高聯」也出現嚴重分歧。

主張不撤者指出，天安門廣場已成了民運的一面旗幟，亦是各界爭取民主的基地，如果倒了這面旗，民運將日漸瓦解；亦有部分「外高聯」代表抱著回去難以交代的心態，而不肯撤離。

主張撤離者則認為，作為愛國民主運動的推動者，學生已完成了歷史使命，藉著學運喚醒了民眾的民主意識，起了啟蒙作用，所以應撤離廣場，回校園推行深化民主運動的工作。

他們並認為，以廣場的實際情況，亦有撤離的必要，廣場上有數萬學生，與靜坐初期相比，顯得骯髒混亂，衛生條件惡化，可能釀成疫症。糾察隊因人手不足導致警戒鬆懈，賣汽水的、拍照的攤販可走到紀念碑下做生意，遊人往來，直如園遊會一般。

官方也利用這機會加強了宣傳。在中央電視台的新聞中，整天報道廣場衛生環境差，衛生部每日清理數以百公斤計的垃圾，並要噴射殺蟲水，防止傳染病。

「北高聯」雖已將管理廣場的權力交給廣場指揮部，但因為「北高聯」是整個學運的倡導者，一些佔主導地位的學生領袖如王丹、吾爾開希等都是「北高聯」核心人物，因此廣場指揮部不時亦想擺脫「北高聯」的影響，加上與「外高聯」的矛盾，當時的學生組織呈現著分裂危機。

廣場的廣播站是一個權力的象徵，但在分裂的情況下，大家都想控制廣播站，因而出現廣播站剛發佈一個消息，隨即被其他人廣播否定的情況，
「山頭主義」瀰漫廣場。

「北高聯」，「外高聯」和廣場指揮部在撤留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在後期更形白熱化。「北高聯」原建議在五月廿八日舉行「全球華人大遊行」後兩天，即五月卅日撤出廣場，以象徵學生勝利凱旋回校，但馬上遭到以「外高聯」為多數的廣場指揮部否決。

廿八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北京的隊伍不足十萬人，比以往數次百萬人的大遊行，大為遜色，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當局和黨組織明令禁止員工參與遊行，違者將被「秋後算帳」。

這次遊行後，「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立即呼籲召開緊急人大常委會議，罷免李鵬、解除戒嚴令及撤走軍隊，否則在廣場靜坐的學生將起碼堅持到六月二十日第八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召開為止。

廣場權力分裂令到財政管理出現混亂，指揮部指「北高聯」從廣場撤往北大時帶走了所有捐款，負責財政的副總指揮封從德也在廿五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北高聯」沒有清楚交代帳目。

封從德又稱，有跡象顯示學生在財政上有腐化和貪污的現象，包括濫用捐款作私人用途及虛報人數領取食物物資等。

當天晚上，指揮部重組財務管理制度，並由柴玲及王丹監察工作。同時亦委任北大自治會主席楊濤負責整頓廣場秩序。

這時，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為了支持北京學運，攜來大批捐款和帳篷等物資。但初步與管理廣場的學生

組織接觸後，香港學生鑑於學生組織發生分裂，財政紊亂，決定自行將物資派發。他們在廣場設立「香港各界聲援北京學生運動物資供應站」，派發帳幕和食物給廣場學生，大大緩和廣場物資告急的情況，亦減低了廣場學生因物資缺乏而考慮撤走的顧慮。

熱潮再起，暴雨欲來

在學運低潮期間，隨著軍隊後撤而不再「天天來」的市民，又被在天安門廣場豎立的「民主女神像」再次吸引到廣場。

五月卅日，由中央美術學院同學塑造、高十米的「民主女神像」屹立在廣場上，與城樓上的毛像遙遙相對，數十萬市民日夜前來觀看，令沉寂一時的廣場再度熱鬧起來，但神像的豎立，卻被官方報章、電視台嚴重指責為非法行為。

四名知識分子，包括台灣詞曲家侯德健、北師大中文系講師劉曉波、四通集團綜合計劃部部長周舵、原《師大周報》主編高新於六月二日下午四時，在天安門廣開始七十二小時絕食行動，他們並發表「六˙二」絕食宣言，聲明絕食是抗議戒嚴和軍管。他們既批評政府處理學運犯錯，也批評學生的行動有非民主因素，呼籲雙方沉靜反省。四人的絕食行動和豎立民主像一樣，使原本日趨冷清的廣場再熱起來。

另一方面，五月卅日「工自聯」三名成員，錢玉民、白東平和沈銀漢被公安人員拘捕。在此之前、十一名稱為「飛虎隊」的摩托車手已被市公安局拘捕。

工自聯負責人韓東方等在公安局交涉要求放人時，約有千名學生前來聲援。經斡旋後，三名工人在三十一日獲得釋放。

六月一日中午，廣場總指揮柴玲和封從德舉行記者會，指他們在該日凌晨四時多，險遭數名學生及一名工人綁架，聲言這是政府一場有預謀的行動。柴玲亦指出，這些學生中，包括「外高聯」副總指揮連勝德、前絕食團常委王文和北京學生陳偉。

然而，王文後來交給記者的一盒錄音帶，內容顯示王文等人前去找柴、封二人，是與學生領袖挪用公款有關。

王文在錄音帶中講述了事件發生的前因：五月廿一日大軍圍城之際，絕食團的部分領袖，包括總指揮柴玲、張伯笠和李錄，鑑於情勢危急，決定動用七千元捐款，攤分給七名絕食團常委，作逃亡時的「保命費」。其餘四名常委是王文、郭海峰、夏斌和封從德。後來情勢和緩，他們卻沒有把款項歸還。王文和數名同學前去找柴玲，是要她解釋為何她可分得一千元，王文只得一百元，並要求各人交代這些錢用到什麼地方去，事件並不是柴玲和封從德所說的綁架。此事後來未能求證於柴玲。

另一方面，便衣公安人員和軍人也乘廣場紊亂之機，混進學生市民群中。

這時官方已通告各單位，製造民意歡迎戒嚴部隊入城。三十一日，官方發動北京市郊農民遊行，高呼「維護首都秩序」、「制止動亂」的口號，有些還喊「打倒方勵之」。一些出租汽車司機說，官方發動他們的單位，說遊行不用上班，而且每人得十元獎金。

六月二日，學生不甘後人，策動一趟「反遊行」，在學校區高喊「支持李鵬」，「支持軍管」，「擁護專制」等口號，實行反面諷刺。

六月一日，北京市政府發言人丁維峻突然在外交部每周記者會上宣布收緊戒嚴令下的採訪規定，將新聞封鎖升級。聲明所有外國記者、港澳台記者不得在天安門，人民大會堂、新華門等地進行採訪，中國公民亦不得與記者接觸。

此外，記者亦不得採訪拍攝戒嚴部隊，並將違反規定的處理方法由戒嚴令的「予以制止」升級為「施以懲戒」，有關的所有解釋權均在北京市人民政府。

至此，種種跡象顯示官方清理廣場行動已如箭在弦，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政府已在輿論、法令、軍事等方面做好部署，在氣氛逐漸緊張的北京城裏，一場前所未有的腥風血雨正在寂靜中醞釀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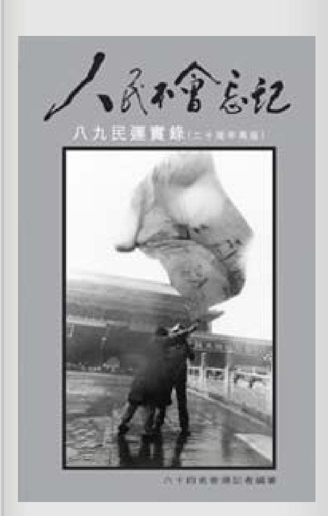
亞洲週刊提供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鎮壓序幕

司徒元




戴起口罩防催淚瓦斯。 陳木南攝

五月十九日晚上十一時，天安門廣場上旗幟飄揚。紀念碑下，學生糾察隊開闢的生命線，很多身穿白大褂的醫科大學學生手拉手，組成一道白色的人牆，生命線一直延續開去，從廣場東側一直伸到長安大街。

雖然學生組織在兩小時前停止絕食行動，但實際上很多絕食學生仍堅持絕食，他們對於學生代表與李鵬的對話結果，表現出強烈不滿。雖然趙紫陽清晨時分曾到廣場看望學生，說了一番很動感情的話，但對於學生來說，他們所提出的要求並無絲毫實質性的進展。

救護車不斷地響著刺耳的警號，在生命線內穿梭來往，救護人員不斷地用擔架抬著衰弱的學生，奔跑著……

絕食已進入第七天，「學運之聲」廣播站不斷地發出呼籲。「剛才，我們廣播呼籲暫停絕食的通告，但是絕大部分同學仍然堅持絕食，更有人滴水不進。我們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喝一點水，絕大部分同學的絕食，即將進入第八天，我們呼籲中央領導人馬上對話。」報以呼籲的，是一大片熱烈的掌聲，似乎這不是呼籲暫停絕食，反而對絕食有進一步鼓勵之意。

高音喇叭突然傳出了吾爾開希十分衰弱的聲音。他的說話斷斷續續，甚至不成句，但透示了堅定的信心，他說：「……我們要理智和不忘記我們的誓言，我們的目的是為了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繁榮昌盛，我們……鬥爭到底，我吾爾開希……在這最後的關頭，團結一致，團結起來，就是勝利，團結起來，堅持到底，直到我們勝利。我們一定要冷靜，一定要有統一的指揮，我希望大家保重身體，堅持到底。現在，也許我將倒下了，我倒下了……我們一定要記著我們的誓言，不達目的，決不罷休。」話畢，喇叭傳出廣播站內一片忙亂，有人叫：「快把他抬下來」，「讓一下」……

五月二十日的凌晨，就在一片緊張、狂熱的氣氛中悄悄降臨。

廣場廣播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絕食指揮部、對話代表團、京外聲援同學指揮部聯合協商的決定:絕食團同學服從指揮，在醫務人員協助下，將垂危同學送往各醫院搶救；除了強壯同學外，其他同學返回學校，各同學清掃各自地段；學生代表說：「同學們，為了照顧絕食已經七天的同學的身體健康，為了挽救大家的生命，為了使我們的鬥爭繼續下去，我們絕食請願改為靜坐示威，請願是我們鬥爭的繼續，我們的口號是：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同學們，希望絕食的同學們絕對聽從醫務人員的指揮，顧全大局，為了我們今後的鬥爭，為了鞏固我們已經取得的成果和進一步擴大成果。」

學生信任他們的領袖，越來越多人退出絕食。救護人員更忙了，救護車更加頻密，組成一條條車龍，呼嘯著衝出廣場，衝過長安大街，將垂危的學生送到各間醫院。

但學生卻不知道，數萬軍隊這時正由四面八方圍向京城。凌晨零時不久，他們的幻想破滅了，廣場的廣播系統突然開動，傳出了李鵬、楊尚昆在中共黨政軍大會上的講話。

學生慢慢地圍向各燈柱下的擴音箱。

李鵬的講話殺氣騰騰，廣播隨之而傳出劃一整齊的掌聲在廣場上迴盪，令人感到像納粹德國的狂熱叫囂。

李楊二人的講話不斷地重播，但漸漸地被學生的噓聲蓋過。廣場上，搶救工作、警號聲、廣播、噓聲、《國際歌》聲交織在一起，數百面旗幟在揮舞著。

人群開始叫出了「李鵬下台」的口號，聲音越來越大，形成了「下台！下台！」具節奏感的巨大聲

浪。

人民英雄紀念碑東側平台，一個學生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同學們，我們能接受這個政府嗎？」「不能！」周圍數百名學生齊聲怒吼。

他續說：「我們一定要團結在一起，繼續堅持我們靜坐和平請願的方式，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我們要把民主鬥爭進行到底，我們決不退出天安門廣場一步！」

「如果我們的鬥爭失敗，中國的民主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實現，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同學們，我們不惜付出自己的性命，決不能屈服！」

「我們的鬥爭將使我們的子孫引以為豪！」

「自由萬歲！民主萬歲！共和國萬歲！堅持鬥爭！」

廣場外，傳出地下鐵路口有軍警的消息，數百學生正在堵截。廣場裏，學生行動與李鵬的講話針鋒相對。

二十萬大學生宣布集體絕食，絕食團副總指揮張伯笠說：「李鵬、楊尚昆錯誤地估計形勢，他們又把我們的學生運動說成動亂，這是我們大學生決不接受的。」

絕食發起人王丹、馬少方先後在廣場上發表講話，對這次學生運動轉變為偉大的人民民主運動表示欣慰，並指出這場運動已取得巨大的勝利，兩人將回到同學中去，和同學們永遠在一起。

李鵬通過廣播說：「他們散佈了大量謠言，攻擊，污衊，謾罵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現在已經集中地把矛頭指向為我們改革、開放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鄧小平同志……」

學生在唱著<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已……」

李鵬說：「如果他們的目的得逞，什麼改革開放，什麼民主法制，什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將成為泡影，中國將出現一次歷史的倒退。」

學生的喇叭播出的詩篇：「為了中國的民主，我們不能退後，在《國際歌》聲中，我們獻出的熱血，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美麗的明天就會到來。」

隨著時間的過去，廣場上不斷傳來軍隊向廣場進發的消息，同時學生又知道成千上萬的市民走上街頭，堵截戒嚴部隊，數十萬學生和市民的情緒時而緊張，時而興奮。指揮部也不斷地發出命令，召集糾察隊員到各處增援，並播出了來自政府官員，各大機關和人民群眾支持學生的來信。

凌晨四時三十分，學生透過「學運之聲」宣布：「現播放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北京市上百名市民走上街頭，用各種形式組成糾察隊，設置路障，在各大路口阻擋軍隊入城，這表明人民已經行動起來了，學生運動已經發展成為一場人民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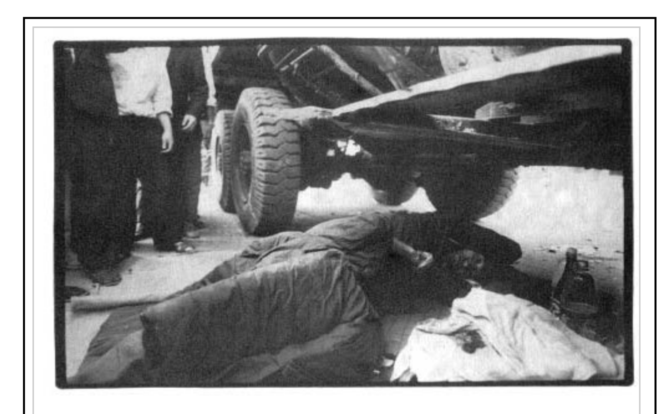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人們屏息靜待，期望這最漫長的一夜早點過去。

五時二十分，廣場上的燈突然全部熄滅，大家都一愣，這時，東面天邊的雲層射出一線曙光，太陽正從東長安街的盡頭升起，喇叭響起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的《歡樂頌》：「歡樂女神，聖潔美麗……在這光輝燦爛明天，人們團結像兄弟……」。廣場數十萬人，包括平台上的數百記者，都高興地跳起來，齊聲歡呼：「天亮了！」



血肉長城堵軍車

陳少強



一名大學生臥在車輪下，阻擋軍隊進城。 陳木南攝

什麼叫「血肉長城」？什麼叫「萬眾一心」？五月十九日晚上，百萬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在北京城四周各主要通路上，手挽手、肩並肩，奮力阻擋著軍車和士兵，不讓他們入城的場面，相信是最佳具體的說明。

沿北京城周圍所見，東邊的呼家樓、西邊的公主墳、南邊的三環路、北邊的學院路上，都有無數市民自動自覺在深夜走出家門，參加了阻軍車的行列，可以這麼說，進入北京城區的每一條主要公路都有逾萬市民把守著。在人牆的後面，市民也開動了大卡車、公共汽車橫擺在公路上，作為一道道擋軍車的屏障。

廣大學生為爭民主、為求真理，在廣場絕食，七天中已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被學生的獻身精神所感動的北京市民，也不惜用生命來保衛這些民族的精英。在公主墳公路上，首先躺在軍車輪底下的竟是一位逾古稀之年的老太太，隨之而來成百上千的市民，也加入了這勇敢的行列。

市民包圍了每一輛軍車、每一輛坦克車，向車上那些「遠道而來、不知所措」的官兵們講述當時北京的真實情況。有的還向「子弟兵」們派發了前幾天在「自由空氣」下出版的北京報紙。激動之處，講者和聽者（軍人）都不禁流下眼淚。一些士兵向市民大聲說，他們進京絕不會鎮壓市民。

可憐的是，這些軍人一個星期前就出發「行軍拉練」，而這一星期以來，根本無法看到任何報紙，或收聽廣播，每天卻要學習「四˙二六社論」。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北京城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聽到這些情況，人們不禁搖頭嘆息：這些士兵完全是受當權者愚弄，被騙進城的。

北京城外圍的事態緊張，軍民出現相持不下的狀態，而城內的市民和學生的精神也絕不輕鬆，由學生和市民組成的糾察隊，帶領著大批群眾，毫不鬆懈地監視著城內各交通要道及一些「可疑建築物」。人們將一些可容納數萬人，位於天安門廣場周圍的人民大會堂、故宮、中山公園及勞動人民文化宮等建築物的出入口全部封鎖，特別是人民大會堂，因為北京市民早已流傳著大會堂有一條地下秘密隧道的消息。

此外，人們在暫時停止服務的地鐵出入口外排起了防線，並將出入口鐵閘封死，以期令到準備入城的部隊無法鑽出來。

「戒嚴令」除了令人民對當權者更加敵視外，也令到「人民軍隊」創立六十多年來與人民結下的「魚水之情」蕩然無存。在那段時間內，一些本身就住在城內的軍人不敢穿軍裝上街，或在街上行駛軍用汽車。曾有一名海軍部隊的軍長，因坐軍隊編號的車上街，立即被憤怒的市民擋回，後來他只有被迫換上便裝，坐上一部殘舊的「上海牌」小車才可通行。另外，西邊有許多軍人因前路被擋，被迫進入軍事博物館棲身。一名團長曾向他城中的朋友致電，說非常想到廣場上看看，但由於上述原因也無法成行。

由於人民的力量，使得李鵬政府的「戒嚴令」，在簽署生效了十四天而無法在北京城內有效實施，令這道四十年來首次在北京頒佈的「戒嚴令」，一開始就失去效用。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回去，人民子弟兵

翁惠玲


北京市民向軍隊提供食水、食物。 陳木南攝

在北京實施戒嚴令後，目睹過不知多少個學生和市民勸阻軍人進城、向戰士們遞冰棒、送熱飯的感人場面，深感著人民熱愛軍隊那種「軍民魚水情」的親切和真摯；可是，這一切一切，如同眾多北京市民和學生一般，都在六月四日凌晨目睹軍人荷槍實彈掃射手無寸鐵的市民後，在連串的衝鋒槍聲中被轟得支離破碎。

在頒佈戒嚴令後的頭幾天，軍隊調動入城的氣氛是那麼嚴峻、緊張，但是，數以十萬計的北京市民又是那麼齊心的走上街頭，與學生們一起在各個軍隊主要進城的路口，以血肉之軀堵截軍車。人們難以想像，在訊息傳遞不大直接的北京城，市民為著堵截軍車、保護學生，是那麼神速地從四面八方走上街頭，走到主要路口架設路障。那種齊心合力的高效率，令人感到驚訝。瞬息間，馬路兩旁的石墩，大型的公共汽車、水泥管和大鋼管──一切可以成為路障的東西都被推移到路中央橫放。他們毫不畏懼地躺在裝甲車的履帶旁，躺在坦克前的路面上，以生命來阻擋軍隊前進。市民又是那麼機智，什麼「前面修路、車輛不放行」等似是而非的指示路牌，在堵截軍車時都用上了。

在市民和學生的齊心合力下，大部分調進入城執行「任務」的部隊，在各個主要路口：盧溝橋、石景山、六里橋、呼家樓、豐台路和萬壽路一帶被堵截，無法進城；在這幾天，學生和市民勸諭軍人不要進城，遞水送飯的感人場面到處可見。

令筆者最難忘的是進入火車站採訪學生堵截軍人的情景。就在五月二十一日，戒嚴第二天，早上八時許，得知一列載滿軍人的火車已抵達北京火車站，我與兩位行家便匆匆前往。來到火車站，已經有百多名從廣場趕來的學生集結在站外，他們都是為堵截軍人而來的。以一列火車來運載軍隊，人數至少也有二千多人。但當時進出火車站的乘客仍人頭湧湧，心想，如果軍隊使用暴力就麻煩了，在估計到危險之餘，也希望進入火車站看個究竟。我們走到那群學生當中，問了幾位學生糾察，請求他們協助我們進入站內，他們都樂意幫忙。一位個子較高、膚色黝黑的男同學雖然聲音已沙啞，但仍多次向身旁協助我們進去的同學說：「我們一定要好好保護他們呀，他們冒險來採訪，就是幫助我們把事實真相公諸於海外。」說畢，這位同學還為我們借來了幾個學生證、紅布條。紅布條在頭上一結，我們幾個身份暫時變了蘭州、天津和南京大學的學生。我們試從幾個入口入站，但是站員見到我們的衣著裝束，不允進內，後來終於找到了一個沒人管的入口；拐了好幾個彎，終於來到六號月台。

路軌上停了兩列火車，其中一列是開往西安的，我們幾個人從火車廂之間的空隙穿過，抬頭一看，頓時嚇了一楞。噢！一列火車望不見盡頭，估計約有二十卡車廂，裝滿了穿著軍裝、便裝的軍人，中間幾列車廂放置的全是武器。鐵路軌上，站著一群、一群的學生，向著列車上的士兵講述在學運期間北京的情況，語氣是那麼真誠、懇切。一位女學生哽咽地向著士兵們說：「解放軍同志們，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有很多已經絕食七天了，我們為的是與政府對話，要求清除官倒，剷除腐敗；解放軍同志，你們會忍心拿槍對著我們這群手無寸鐵的學生嗎？」淚水不停地從她臉上流下來，她已泣不成聲了。旁邊的學生攀上車廂，張開幾份《北京晚報》、《科技日報》給戰士們看看有關學生運動的報道；一群群的學生你一句、我一句地講述國家現存的問題，勸說軍人不要做歷史的罪人，連列車服務員也加入了勸說行列。當學生再問軍人，若要執行命令，他們的槍口會不會對學生時，有些士兵沒有回答。他們的表情顯得那麼無奈，有些則嘆氣，有些則抽著煙，彷彿要把心中的抑壓透過煙霧宣洩出來；個別士兵也有回答:「我們的槍口是不會對著學生的！」有個別士兵則回答說：「你們要理解我們，我們要聽從上級的命令。」看著、看著、一些士兵從最初沉默無言，到最後亦被學生的說話所感動了，有的士兵把帶來的糖水菠蘿和汽水遞給學生，此際，彷彿車上車下的軍民魚水情又交織在一起了。

在隔鄰停著的一列開往西安列車，乘客們都看到這感人的場面，一些女乘客都不禁潸然下淚；列車開動了，學生與車上的乘客握手告別，「你們一定要把這裏的消息帶到各地去！」車上、車下，人們都示出「V」字的勝利手勢。很記得一位乘客以肯定的語氣說：「勝利一定會屬於我們的！」但願如此。



餐風露宿，聲援學運

譚衛兒

外地學生參與是次學運始於四月下旬。四月二十一日深夜，三百多名天津南開大學的同學騎著自行車長途跋涉來到天安門廣場，與陸續步行來到這裏的十幾萬首都高校學生一起，期望參加翌日官方舉行的胡耀邦追悼會。

之後，隨著運動的不斷發展，外地學生紛紛進京。到了五月中北京學生開始絕食，全國各地遠至西藏、新疆的學生代表都雲集到現被譽為民主聖地的天安門廣場以示支持。

外地學生進京達到高潮時，成立了「外地高校自治聯合會」（簡稱外高聯）。一位學生領袖曾告訴筆者，廣場上一度成立了大大小小共三百八十個外地各高校自治會。換言之，起碼有超過三百八十所外地高校的學生來過北京。

廣場上，北京各高校及外地高校的校旗匯成一片旗海，迎風飄揚，蔚為奇觀。帳篷外，操著外地口音的同學們蓬頭垢面，聲嘶力竭地跑來跑去。只見他們額上、臂上纏著的紅布條在旗海、人潮中轉來轉去。驟眼看去，廣場上似乎雜亂無章，但在這雜亂無章下卻跳動著一顆顆純潔無比的、嚮往著民主自由的年輕的心。



外省學生眾志成城。 陳木南攝

外地學生進京，很大程度上是響應北高聯的號召。運動初期，為進一步擴大聲威，北高聯拍出電報到各地大學呼籲全國總罷課，並派出宣傳小組到各地傳播民主的火種以爭取支持。於是，熱血沸騰的外地同學們決定，他們必須進京，去天安門廣場作出實際的支持；同時他們也認為，這場民主運動應該是全國性的，因此他們必須親臨廣場，親身參與。

於是，每天從早到晚，一批批的同學從北京火車站走出，群情激昂地向著天安門進發。我們可敬的鐵路工人老大哥們，更讓進京爭取民主的同學免費乘搭火車，更多的同學就此湧進了共和國的首都。

筆者有一晚從廣場走回下榻的飯店，當時已是凌晨一時多，短短十分鐘的路程，便看見上萬名分別來自山東大學、瀋陽大學、河南大學的同學，背著極其簡陋的行裝，高唱著《國際歌》，高舉著旗幟，高呼著「要民主，不要專制」的口號，向著天安門邁去。

與此同時，隨著外地學生的不斷湧入，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五月下旬成功地堵截軍隊後，北京的學生開始陸續回校了，只把他們的旗幟留在廣場。一位北大的同學說：「我們要養精蓄銳準備持久戰。北京的同學太累了，需要回去休息一下，外地同學來得正好，廣場可以讓他們來守衛。」之後，廣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外地學生，有的已來了幾天或十多天，有的則風塵僕僕剛剛到埗，每個人都為能親臨這民主聖地而自豪萬分，因而也就義不容辭地擔負起了保護天安門的重任。

一天，像經常一樣，筆者來到廣場。穿過一片旗海，正欲登上紀念碑第三層的學生新聞中心，一位身穿整齊制服的青年迎面把筆者攔往，「請出示證件。」

筆者抬頭一看，天！難道紀念碑被警察佔領了不成？只見百多位頭帶藍色大沿帽，身著白色制服和藍褲的青年在紀念碑底層手拉手圍成了一圈，不時在檢查意圖進內的人的證件。

再定睛一看，眼前是一張汗水淋淋的面頰，雙眼佈滿了紅絲，但卻透著認真與執著。再往上一看，只見他的大沿帽上印上有一個金色的鐵錨，旁邊寫著「大連海運學院。」

我不禁鬆了一口氣，拿出記者證遞給他，並問道：「你們穿著校服進京來了？」

「是的，你看，這都是我們同學，就因為我們有制服，我們被選為保衛紀念碑的糾察隊。」他很神氣地回答道。紀念碑可算是天安門廣場的靈魂，這裏有同學們的最高指揮部、廣播站、還有物資部和財

政部。「我們昨晚剛到，馬上就被派來這裏了。」他接著說，並很自豪地整了整他那身看來好幾天沒換洗過的又皺又髒，卻又是那麼威武的制服。

事實上，自從外地學生不斷地來到廣場，這裏的許許多多糾察隊都是由外地學生所組成，由於遠離家人，再加上廣場上的衛生條件差，他們的面頰、臂肘都被一層黑沉沉的污漬蓋著。然而，他們又是那樣神采奕奕，滿懷自信地在維護著他們的「民主夏令營。」

同時，他們也認為自己的到來令到北京的同學更具有安全感。一位山東煙台大學的同學曾這樣說：「我們來是要支持北京的同學，決不能一走了之，否則北京的同學就得獨自背黑鍋。我們絕不能這樣做！」

與此同時，圍繞著學生是否應該撤離廣場的問題，學生內部和社會各界人士中間引起了許多爭議，有人指出，外地學生不斷湧入，終會引起超負荷的北京人對學生的反感，這將對學潮很不利。再者，也令到廣大的同學無法就撤退一事達成共識。五月廿七日，北高聯曾宣布同學們將在五月三十日光榮大撤退，但翌日便改變了初衷，宣布要堅守廣場，直至六月二十日人大召開常委會為止。

南京大學學生李錄說過：「我們不能撤！我們必須以實力贏得勝利！」在他看來，堅持就是勝利，就是實力的表現，更何況背後還有源源不斷的援兵哩。正由於當時留在廣場上絕大部分都是外省學生，每次北高聯試圖提出撤離方案都不成功。由於在當時的形勢下無法以投票方式決定，只能以聲音的大小進行裁決，因此每次北高聯的撤離計劃便在一片喧嚷的聲浪中被摒棄了。同學們保衛他們心目中的聖地而餐風露宿，他們發誓，北京一天不撤消戒嚴令，軍隊一天不撤離，他們就將與天安門同在。

一位煙台大學的學生後來擔任了保衛天安門糾察隊的副總指揮，他解釋為什麼絕大多數的外地同學都不願離京。

「我們當中許多人都是不辭而別，千里迢迢地來到北京，有的甚至已是二進京或三進京了，為什麼？就因為我們的目的還沒達到，我們不能讓北京的同學孤軍奮鬥。如果希望我們繼續留在這裏會對黨內某一派有幫助的話，我們對這一點無能為力。我們進行的只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我們不願被捲進任何黨內派別鬥爭裏去。更重要的是，沒法向焦急等待著我們勝利消息的同學們交代，他們也就還會繼續來。」他憤憤地說，很有點無顏面見江東父老的樣子。

五月底，戒嚴令已實施了十天，軍隊由於群眾的阻擋和其他一些原因始終沒有進城。政府呼籲外地學生離京，並慷慨地為他們提供免費火車服務。

與此同時，外地高校也紛紛派出校領導、老師甚至家長到廣場來，苦苦勸說學生們回家。他們本著一顆善良的心，希望同學們明白，死亡正在一步步逼近，再死守廣場對整場運動的發展無濟於事，孩子們，回去休息吧。

但許多同學對政府已徹底失望，胸中激情洶湧。他們意識不到政府的磨刀霍霍，也聽不進老師及家人的善意勸告。屠城的前一天晚上，一位天津美術學院的同學在紀念碑上說：「我是本校唯一留下的同學。學校校長和老師都來了，別的同學今早都哭著上火車走了，我堅決不走，他們硬把我拽到火車站，我趁他們一個不留神，跳下火車就跑來廣場了。」

「我來廣場已十多天了。來之前的那個星期天回過家，拿了二十多塊錢，沒告訴家人便來北京。他們可能還以為我在學校裏畫畫呢。」說著說著，他的語調明顯地慢下了。十九歲的少年，他何嘗不想家，不想父母？「留下，我要創作一幅巨型油畫，就以這次學運為題材，以天安門為背景，我要讓這幅畫成為歷史的見證。」他激動地說。

另一位山東來的學生則說：「我們全體三百多位同學一致決定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決不回去。」

六月三日下午，也就是天安門被血洗的前夕，在一頂剛搭好的新帳篷裏，幾位天津同學很興奮地對筆者說：「有了新帳篷，可以好好休息整理一下，準備打持久戰。你看，學校還給我們送來了新毛毯。」

可是，預備打「持久戰」的天真善良的同學們做夢也沒想到，就在這天的深夜到翌日凌晨，聲稱為人民服務的軍隊便隆隆地開動坦克壓過了他們精心營造的民主夏令營。年輕的理想和生命就這樣被壓碎。自豪的穿制服的糾察隊員，誓死保衛天安門的同學們，還有我們未來的大畫家……你們在哪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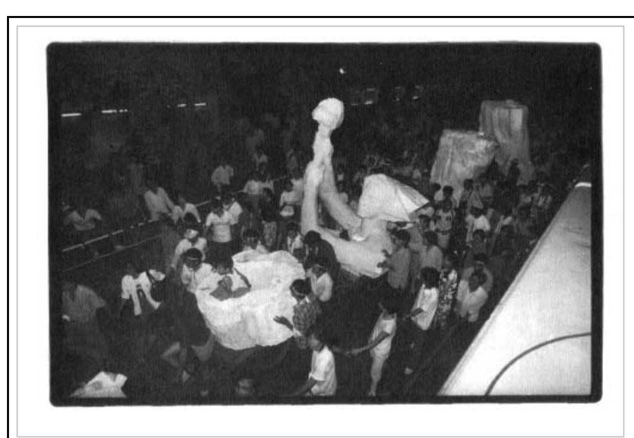
「一個什麼女神像」

范卓雲　廖美香

人民不會忘記
八九民運實錄（二十周年再版）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戒嚴進入第十天，廣場已經陷入混亂、骯髒、散漫和凋零的狀態，學生沒完沒了地在那裏獃下去，完全看不出有什麼結果。就在這個沉悶的拉鋸期間，突然聽到一個令人精神振奮的消息，原來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將為廣場豎立一座十米高的神像。



市民護送「民主女神」到天安門廣場。 陳木南攝

這是五月廿九日的早晨，本來學生決定翌日撤離廣場，現在不但不撤了，還來個「什麼神像」。

走進位於市中心的中央美術學院，剛巧碰上一位正在張貼海報的學生，海報通知同學當天傍晚七時便要把「民主女神」送往廣場。

鬼主意千奇百怪的美院學生，已不止一次為廣場增添生命力，早在四月中學潮開始便繪製了一幅胡耀邦巨像，獻上人民英雄紀念碑；後來在遊行中他們再次製作五十多米長的巨型標語，令北京市民津津樂道。

穿過幾道美院教學大樓的門廊，終於到達雕塑系的工場，學生正趕工用石膏和發泡膠塑造一個雕像。這座「民主女神」短髮及肩，迎風而起，雙手高舉火炬，臉上帶著祥和的笑容，遠看頗像美國的自由神像。其中一位同學不諱言說是參考了自由神像，然而造像的藍圖卻是取自數月前雕塑系同學所作的功課。

當時學生佔據廣場已超過兩個星期，差不多成為獨立王國，為何還要多一座塑像？一位雕塑系同學表示，中國極需要一個創新的形象，一個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和平」的形象，所以他們希望透過雕像去表達這個理想。

「『民主女神』將代表中國新一代的想法，要破除舊有傳統，破除封建家長制。」他補充說。

另一位同學則希望藉神像的刺激，混亂鬆散的廣場能添生氣與凝聚力。為達這個目的，發起塑造神像的四十多名雕塑系同學提出以「北高聯」的名義來豎立神像，以壯學運聲威和士氣。同學從五月廿六日下午開始連續三夜不眠趕製塑像，並得到該系老師指導和協助製作。

但「民主女神」的作者似乎沒有對政府可能的反應深思熟慮。「如果政府真的罔顧民意而強行把神像拆毀，只會更顯當局的『狹小胸襟』和他們『反民主』的醜陋嘴臉。」一位同學說。

美院學生將為廣場立像的消息，火速地透過學生廣播站傳遍京城。前往廣場欲瞻女神像風采的學生和群眾絡繹不絕，不到晚上七時，便有數萬名焦急的市民苦苦守候。當時廣場上搭建了一個三層棚架，以備安放神像之用。

「民主女神」千呼萬喚始從美院施施然出來，神像的頭、身及底部分別放於三部腳踏三輪車，沿東長安街往廣場進發。神像在數千人前呼後擁護送下上路，無數路人夾道鼓掌歡呼，車輛紛紛響號致意，市民不時豎起「V」字的勝利手勢迎接神像，長安街頓時一片歡騰。

晚上十一時左右，姍姍來遲的神像終於在數萬名久候的市民的面前出現了，圍觀的人群越聚越多，好像誰也不願錯失目睹女神的誕生。三十日凌晨時份，學生開始把神像安裝。

沒有起重裝備的學生，要靠繩索布條運用槓桿原理，以肩膀和全身氣力把沉重的神像運上棚架，再進行裝嵌，學生赤手空拳，顯得異常吃力。單是神像的頭部便花了差不多半小時，才由地面運上棚架的第一層。在黑夜裏學生艱苦作戰，疲憊的身軀還要作一番力的搏鬥，學生氣喘如牛，雙手抖顫，一邊拉一邊呼喊：「一二三……嘿！一二三……嘿！」為了鼓勵同學，群眾在地面上也回應「嘿！嘿！」

吶喊，看著神像逐寸地緩緩上升，每到神像停止移動，市民便屏息靜氣地守候，完全不敢打擾同學的工作。當看到神像昂首安全到達棚架的每一層時，群眾由衷地爆出轟雷的喝采聲和掌聲，市民的情緒完全被這勞動攫住了。

「這個神像太了不起了，我來這裏是要陪伴學生的，他們已經那麼辛苦，他們很需要我們的支持。」一名女市民說。

「不能讓學生孤軍作戰，他們為我們豎立神像，我們要和他們共同進退。」一名工人激動地說。

中外記者紛紛搶拍神像安裝的過程，怎料被市民一一喝止。「學生們已經是四天沒睡了，你們知不知道？你們的閃光燈會照得他們頭昏眼花的，不准拍照！」焦急的市民大聲叫嚷。

凌晨三時，神像的身軀開始爬升上棚架的第二層，但市民仍沒有散去的打算。大部分人似乎預料到神像絕對不會長久豎立在廣場上，所以他們堅持留在那裏做「歷史見證」。

辛勤的勞動在夜幕中點滴過去，轉瞬間，天將破曉，而神像在黎明曙光的照亮下成功地被整合成人的形貌。天安門廣場上的街燈此時全熄滅，只剩下「民主女神」雙手高舉的火炬，被曙色照映出皎潔的亮光。沒多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幟亦徐徐上升，飄揚的國旗與神像互相輝映。

「民主女神」終於矗立在廣場上，在三十日那一個烈日當空的正午，覆蓋神像的紅藍布幅在激昂的《國際歌》聲中徐徐拉下，十多萬市民報以熱烈的歡呼。

「這個雕像，是受幾千年封建專制壓迫的中國人民發自肺腑的渴望，是廣場上每個學生和億萬人民心中的象徵，是八九年中國民主潮的靈魂！」雄壯的聲音在頌讀「民主女神」的落成宣言。

宣言和著人民此起彼落的喝采聲，「人民萬歲」、「自由萬歲」、「民主萬歲」之聲充斥廣場，神像的作者們──美院的學生──更高歌一曲悲壯的《血染的風采》，萬千群眾齊聲高唱，廣場經過多天以來的沉寂，在「民主女神」的召喚下再次熱鬧起來，陷於低潮的學運又再一次被推上高峰，廣場再次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

果然不出大部分人所料，官方對神像作出迅速和強烈的反應，就在三十日的晚間新聞報道，北京市天安門管理處聲明：「天安門廣場是中國舉行政治性集會和迎賓活動的重要場所，是全國人民的廣場，是非常莊嚴肅穆的地方，現在有人把一個『什麼女神像』搭設在天安門廣場，是極不嚴肅的。」

不料聲明甫播出，卻為學生作了免費而功效宏大的宣傳，為看看這個「什麼女神像」的廬山真面目，廣場再次聚集數十萬之眾。

為保護神像，學生在神像的四周圍架起警戒線，並搭起帳篷，由學生敢死隊與工人敢死隊聯手捍衛女神像。三十一日早上，一名年逾六旬的男子突然越過學生的警戒線，企固攀上雕像，雖然終為學生糾察隊所阻，已令學生警覺官方正在進行破壞活動。

就在六月四日凌晨的那個最黑暗時刻，「　　」前進的坦克把「民主女神」推下來了，這個矗立在廣場上六天的雕像被坦克無情地砸毀輾碎了，它與無數熱愛和平的學生一起在廣場上遭受屠殺。北京「民主女神」倒下來，但香港、台灣、日本、美國等地的海外華人卻請她在世界各地復活了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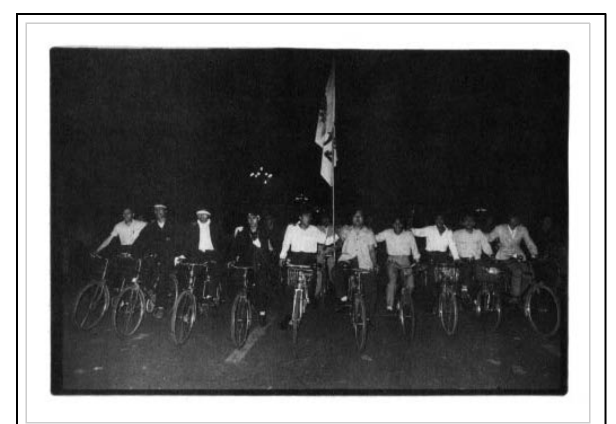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勇哉！工人敢死隊

顏婷　黎佩兒


自行車敢死隊。 陳木南攝

「北京人瘋了！都瘋了！」上百架摩托車呼嘯而過，它們響號，來來回回衝鋒於十里長街，聲震中南海，長安街成了賽車場，他們像進入催眠狀態，跟中國的「民主夢」賽跑。

他們是市民、工人，多是個體戶，晚間出動，為數以千計，躺在天安門廣場涼涼的地上、奄奄一息的絕食學生打旗吶喊助聲威。

戒嚴令頒下，更多車種加入「示威」行列，摩托車、小型貨車、貨車、自行車都出動了，他們成行成市，一呼百應。

當夜幕徐徐落下北京城，他們便開動馬達，自各大小路口一個跟一個，自自然然匯集了數十以至上百的車輛，來到長安街。車隊東西匯流，到了廣場附近便向群眾呼喚，車上的人把市民一個一個拉上車，堵軍車去！

自行車和摩托車的車頭都插著小旗；貨車則打著橫幅、高舉醒目的旗幟「老鄧快退下」、「李鵬下台」──紅色、黑色斗大的字在黑夜中飛馳掠過；車頭燈光閃得人目眩，刺耳的車號、鼎沸的吶喊聲，激蕩著人心。

他們高舉「V」字手勢，群眾報以掌聲，還以勝利的「V」字手勢。外來的人都會楞楞地站在道旁，詫異於這形同世紀末的瘋狂狀態──「他們會出事的，他們太像飛車黨，情緒那末高漲，一觸即發，稍有煽動，『打砸搶』全都來了」。

事實出乎意料，這些散兵游勇並沒有滋生事端。他們組成了或大或小的基層組織──「市民敢死隊」、「工人敢死隊」，每隊成員不到二百人，在戒嚴令頒佈後，他們都守在廣場外圍，誓言捨身捍衛學生，陪學生熬過不眠的晚上，直至晨光穿過夜幕。

四月下旬，學生運動邁出「四˙二七」大遊行，突破被當局鎮壓的心理關口，民眾參與具體化成組織，除了上述兩個具特別功能的「敢死隊」，還有「市民自治會」、「中華民族同盟會」等。

在芸芸工人組織之中，最具規模要算「首都工人自治聯會」（工自聯）。它的成員來自四十多種行業，包括鋼鐵，機械、建築、鐵路、商業，他們多是保護絕食學生的糾察隊員，與學生稔熟。

一名退下二線的學生領袖更主動協助籌組「工自聯」，該會的法律顧問是北京大學的研究生。

這個號稱有十萬工人支持的聯合陣線，在戒嚴令頒佈翌日，即五月二十一日，曾向外界表示擬發動全市罷工，逼政府讓步。

然而，「工自聯」代表私底下表示，該會沒有能力發動大罷工。而北京在屠城前（即使是學生絕食最危急，以至堵軍車群眾情緒最激烈時)，也沒出現大規模的工人罷工。

「工自聯」三名核心分子沈銀漢、錢玉民、白東平，在五月三十日凌晨被公安人員強行架走問話，「工自聯」到工廠發動工人營救他們，遇到很多困難，根本發動不起營救力量。

號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共政權，很早便對工人參與學運，採取軟硬兼施的對策。

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在五月十三日與首都工人代表座談時，透露在六月中旬舉行的人大常委會，將把學生和工人群眾關心的事，列為議程，並表示希望學生在戈爾巴喬夫訪問期間，維護國家尊嚴利益，保持理智。趙藉此番講話安撫學生和民眾。

學生絕食期間，首都鋼鐵廠工人曾揚言：若有一個學生死去，他們將關掉一台煉鋼熔爐。大群工人並打著鮮明的單位旗幟，加入聲援學生的遊行隊伍。學潮爆發後，李鵬在十四日到擁有二十多萬工人的首鋼工廠，安撫工人。

另一方面，官方採取強硬措施壓制工人，早在三名「工自聯」負責人被捕前，「工自聯」設於天安門城樓西門後面空地的總部，便遭到天安門廣場管理員干涉，以保護文物為理由，勒令搬遷。

五月三十日，「工自聯」成員被抓當日，《北京日報》報道有十一名駕駛摩托車的人士被捕。

公安當局聲稱該批「飛虎隊」每晚穿街過市，毆打公安人員，並且煽動工人罷工。

「工自聯」終於在五月三十日晚上，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宣布正式成立，雖然活躍分子不足一百人，仍得到英國工黨社會青年部秘書杜利，及加拿大新民黨一名左派代表列席成立儀式。

在工人及學生不斷交涉抗議下，沈銀漢、錢玉民、白東平終於在三十一日獲釋。他們瞬即匿藏起來，而該會活躍分子，入夜都到北京大學留宿。他們都感覺到局勢危險嚴峻。

該會並把總部遷到天安門廣場，駐紮在廣場北面的邊沿上，用意是守在最前線，捍衛學生及廣場。

「工自聯」也意識到現階段的北京政權不會容忍民間政治組織，該會的籌建綱要開宗明義表示該會是「監督工人階級政黨」的壓力團體，並非政治團體，也非福利組織。

「工自聯」負責人韓東方表示首要任務是搞好內部組織，繼而到工廠宣傳。最終是通過該組織，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中，爭取權利，採取一切合法而有效的手段，監督其法人代表，保證工人做企業的真主人，在其他企業中，通過與企業東主談判或其他合法手段，保證工人利益。

韓東方也明白政府不承認該會的合法地位，他們能吸納的會員預料不多，他希望切實為工人爭取福利，以能招攬更多支持者。

部分學生領袖明白若要把學運推展成真正的民主運動，必須得到工人參與；但部分學生則擔心工人參與，會令學運蒙上「非純粹化」的陰影，故遲遲不敢到工廠或下鄉策動群眾。

事實上，市民一般對工人持偏見，他們認為學生出發點是純潔的，工人組織的成員，身份不明，水平不高，可能心存私欲，所以都不願意大力支持。

六月四日凌晨，「工自聯」的總部，在屠殺最激烈的廣場北面消失了。

六月十四日，北京公安局繼發出通緝二十一名學生，再下令通緝三名「工自聯」成員：韓東方、賀力力、劉強。

接著，當局公布「工自聯」成員劉強、劉煥文、白東平先後落網。

截至六月底，北京、上海、濟南三地公布處決共二十七名民運分子，都聲稱他們是曾參與「打砸搶」，或與「在北京煽動、組織反革命暴亂的非法組織」沾上邊的工人。

一名工運活躍分子在屠城前說，這次北京民運令工人意識到團結就是力量。近年政治改革，不能配合經濟發展，工人受到上級剝削，積怨甚深，都蠢蠢欲動，希望能成立真正為工人謀福利的自治會。但目前未到時機，他們正等待一個新的觸發點。

中國大陸的工人要成立真正獨立的自治組織，發揮監察「無產階級」政府的功能，及為工人爭取權益，似乎路正漫漫。



戒嚴令下的採訪

徐佩瑩　何展鵬





掙破樊籠的新聞報道。 陳木南攝

戒嚴令甫一宣布，直撥香港的長途電話線路，也突然撥不通，對需要繼續即時為香港觀眾報道北京最新情況的電子媒介記者而言，不啻是很大的考驗，幸而還有同事在上海採訪，與他取得聯絡後，再經他向香港報道北京消息。

電視台記者與香港的新聞報道員採取了問答的報道方式。這種電視台內戲稱為「打電話問功課」的方式，好處在於毋須在報道末尾加上一句「某某在北京報道」的尾巴。當時，我們估計這樣可避免予北京當局有「證據確鑿，查明屬實」的把柄。而電話對答，現場感較強；但缺點是如果京港同事之間欠缺默契，則對答間易有矛盾，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會誤以為是事實。

提到未經證實的傳聞，不能不談「李鵬下台」的消息。香港新聞界有一種不成文的慣例，就是在香港收到外地的消息，一般是會將這些消息用外派記者的名義發表。在一般情況下，倒是合用的，要一個以香港為基地的記者，臨時調派某地，即掌握當地的局勢與聯絡，即時採訪到重要消息，決非易事。外派記者對這樣的安排，一般都感到無可奈何，以至無法異議。

但「李鵬下台」的消息，情況十分特殊。消息來自香港，但在京採訪的記者卻無一聽聞。這次派往北京的記者，不少在當地已建立了良好聯絡，如果消息屬實，絕不會聽不到半點風聲，派京記者自然與香港的同事據理力爭。不幸的是，只有很少數的香港傳媒機構，充分信任在京記者的判斷；但也許在這場大是大非的事件面前，強烈的善良主觀願望，在某些時候淹沒了冷靜分析。

一些未經證實、但流傳頗廣的消息，是否應該採用，又或如何處理，幾乎是記者每天都要面臨的難題；在這樣一個消息封鎖的地區，求證一些例如高層領袖變動的新聞，幾乎是沒有可能的事。

能處身在這大時代的洪流，自然是十分興奮的，但在港家人和朋友的思念，卻構成壓力。在北京工作期間，思妻念兒的記者為數不少，但因為工作時間實在太長；亦顧慮到致電回家，要面臨苦勸回港的局面，唯有減少撥電話回家的次數。部分為免家人擔心，索性不告知家人此次行程，但這些方法，都未能稍減家人懸念之情。

同事之間，對於在戒嚴令下如何採訪，亦有些爭論：例如遇到民眾堵截了軍車、士兵的場面，是否應匿在較隱蔽地方拍攝？軍隊動手打人，記者應否冒生命危險前去採訪？畢竟，在香港出發時，對北京出現的突變，是毫無心理預備的。

何展鵬飛機爬升，北京雖然已離我們越來越遠，但我們的心，仍掛念水深火熱的老百姓及學生。我們在他們最需要我們的時候離開了他們！不知道他們日後的命運又如何？

窗外，黑漆一片，已麻木的腦袋，浮起一幕幕畫面。彷彿，又聽到北京老百姓與學生的聲音……「你們是哪一個單位？啊！香港來的，好極啦！請將我們的消息傳回去，如實報道，多拍一點鏡頭……這裏的位置好一點，我來保護你，不用怕，盡量拍好些，辛苦你們啦！」遇到一些環境險峻的場面，學生總是叫我們快走！快走！我們的目標太大了。

是的，我們能夠在戒嚴令期間，順利完成採訪拍攝工作，實拜北京市民及學生的幫忙。因為電視台攝影記者要攜帶著目標頗大的電子攝影機，身份完全暴露，環境又不是那麼熟悉；可是看到學生與老百姓那麼勇敢地跑上街，又激發起我強烈的使命感，忘記了北京市政府對記者嚴厲的警告。

戒嚴令頒下最初幾天，開始時還有些擔心。其後，見到學生及老百姓成功堵截入城的軍隊後，緊張氣氛又平復下來。但我們採訪拍攝時，還是小心翼翼，視乎當地環境的可行性，以事發現場的群眾多寡為根據來判斷。

我曾經在不同的場合聽市民說：「群眾多的地方，便衣公安不夠膽抓人，老百姓也不會讓他抓。」北京市政府在六月一日透過外交部的定期新聞發佈會，由市政府發言人丁維峻在會上重申戒嚴令，並向中外記者公布了七點收緊新聞採訪的說明。

屠城前兩三天，整個北京城的形勢非常險峻，天安門廣場氣氛已不尋常，非學生糾察隊所能控制，多了很多陌生人穿插其中，連採訪記者及學生自己也察覺得到，很多外國電視採訪隊在廣場也受到嚴密監視。

五月三十日前門附近的北京公安局門口，近千名工人及學生，揮舞旗幟並高呼口號，要求盡快釋放他們的負責人，周圍的人亦加入聲援，當時的氣氛非常熱烈。公安局的揚聲器不停地勸工人離去，不要聽信讒言，有些公安更拿攝影機將情況拍下。

在這個環境採訪拍攝是頗為冒險的。果然，開動攝影機未及五秒鐘，已經有人查問我是那一個單位。起初我裝作若無其事，當作聽不見似的，但身旁那人不停地問我是那裏來的，我為方便工作也想趕快離開那兒，邊答他：「從香港來的。」跟著很快地聽見幾下按動相機「失打」聲回報了我。

拍電視新聞片需要不同的鏡頭──畫面──去組成一個故事。今次只拍了幾個鏡頭，還未能湊夠一個完整的故事，就遇上這種情況，雖然這已非第一次了，但今次的地點是公安局門口。來不及考慮，唯有冒險轉了一個位置，拍完其他需要的畫面便趕快離開。後來，聽聞一位日本記者在該處採訪的時候，被公安人員拆了菲林。



義無反顧，退黨！

楊健興　鄧祥兒



解放軍在北京市郊候命。 冼偉強攝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兩萬名軍民在中共黨中央組織下，在天安門廣場歌唱，歌頌共產黨六十八歲生日。

這一天是七月一日，中共的建黨紀念日。

同日，太平洋的彼岸，三百一十八名中國留學生和學者在美國紐約市公開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並且成立「退出中共聯絡委員會」。

退黨者不滿中共血腥鎮壓學生運動，決定從此與這個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統治大陸的執政黨決裂。儘管這批黨員只是中共四千七百萬黨員的極少數，然而卻暴露了中共前所未有過的一股退黨暗湧。

這暗湧始於李鵬頒佈的戒嚴令，至「六˙四」血洗天安門真相輾轉在國內外相傳，更多的黨員醒覺、憤慨，感到羞恥，公開或私下地與黨組織劃清界線。

今天中共不但面臨嚴峻的政治、社會、經濟和外交困局，更要應付來自黨內消極的抵制和流失。

中共當權者鐵腕無情的手段，使好一大批期望以改革共產黨來改變中國命運的黨員，心靈受創，頹喪失望。

廿日凌晨一時，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一位教師，亦是備受爭議一時的話劇《WM》（即《我們》）原作者王培公，毅然退黨，成為學運以來一個具啟示性的個案。

四十一歲的王培公，經過四年申請及反覆審核，於一九六五年才獲准入黨。追溯年青時代，王培公便下決心要做「黨的兒子」。他父親是黨員，文革時受逼害，卻未動搖他對黨的忠心；甚至在四人幫時期，他仍維持對黨的信心。

王培公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黨員都應為黨工作。他重申自己是非常愛黨和政府的，希望政府能順應民眾要求，尊重人民意願。然而當局宣布戒嚴後，他對黨徹底失望。

他說：「作為一個人民政府及父母官，對廣場上的絕食者不聞不問，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這位正值盛年的劇作家說，他本來抱著一線希望，以為通過合理及合法途徑表達的民眾意願，會得到政府的理解，但換來的卻是李鵬宣布戒嚴的講話。於是他當夜寫了一封信，簡單的寫了寥寥數字：「對黨已經失望，要求退黨。」

王培公慨歎道：「不知何時黨竟是變了樣。領導人竟認為學生爭取民主運動是動亂，和文化大革命混為一談！」

「在國內，黨籍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入黨是進步，退黨是恥辱。」他說。但作為一個負責任及「有黨性」（即政治覺悟高，願意為人民服務和犧牲）的黨員，他必須對黨真誠。現在共產黨漠視大眾的要求，他覺得應該脫離黨，不再參與黨的「大合唱」。

他為何不留在黨內做工作，改進黨，使它更民主呢？他說：「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黨員，又怎能同當權者鬥爭呢？」

王培公提出退黨後，又用了三天時間寫了一份宣言，闡明他退黨的原因：「作為一個有黨性的黨員，我對黨內存在的官僚風氣和腐敗現象十分厭惡，不過，對黨所倡導的改革前景從未失去信心。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但現在情況起了變化，自四月十六日以來局勢的發展，充分暴露了黨的領導機構的無能和愚蠢。一些領導人自認是人民的『當然代表』，自我感覺十分良好，殊不知自己早已脫離了人民和時代。他們缺乏實事求是的態度和自我批評的精神。相反，濃厚的封建農民意識使他們越來越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上去。

「他們無視廣大黨員的改革意願，無視民眾的呼聲，一意孤行，一錯再錯，直至公開依仗武裝力量與人民為敵，這是嚴重地違反黨章和黨內民主的行為！這是典型的『槍指揮黨』！黨的性質正在起變化，卻又頑固地強制廣大黨員服從，想讓廣大黨員都變成他們壓制民主、欺騙民眾的工具。」官方大搜捕如火如荼之際，有報道說王培公已在貴州被抓。或許抓他的原因，正是他那份「污蔑黨」的退黨宣言吧。

戒嚴期間，北京校園內一些學生及年青教師也把退黨聲明張貼在佈告欄上。北京大學和中央美術學院就出現過這類的聲明。

中央美院教師賀西林表示看到政府全不理會絕食的學生，遂對中共的期望幻滅，在絕食的第四天（五月十七日）決定退黨。

賀西林的祖父是資深紅軍。他本人曾參與學生的絕食行動，及後又著手一起製作「民主女神」像。他和王培公同樣認為，退黨並非等於反對共產黨，他深信黨內仍有很多精英分子，並希望黨能夠改進。

六月四日屠城之後，對學運一直抱謹慎保留態度的《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在驚愕血腥殘殺之餘，也退了黨。

在香港，六十五歲的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何銘思，同樣在屠城後登報啟事，表示無法接受當權者以武力鎮壓人民的血腥事實，決定退出共產黨。何銘思十六歲入黨，一九五七年加入新華社。他說，多少年來，他一直把中國人民的幸福寄托在共產黨上，不相信當局會以血腥手法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可是不幸的事卻真的發生了，對他來說這不單仿如一場惡夢，更是一個不能接受的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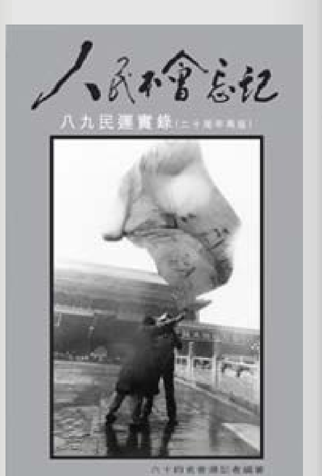
六月五日的《明報》引述大陸一名知識分子的話，他說建國四十年，開放改革十年，國家依舊貧窮，教育水準依然低落，才引致老百姓怒憤沸騰，這全是執政黨的責任，因此，如他仍獃在黨裏，就是恥辱。

在中共的系統中，一向被認為最可靠、最忠心的外交人員，自「六˙四」後，恥於當權者所為，相繼與政府決裂，尋求他國政治庇護。至七月上旬，已有廿多名駐外人員變節，庇護的國家包括美國、法國、澳洲、比利時和日本。在紐約的「退出中共聯絡委員會」聲稱在發出集體退黨聲明後，參加退黨的中共黨員人數不斷增加。

國內一位黨支部書記說以前支部從未有人退黨，現在有人退黨了，他也不知如何處理，雖然黨章容許黨員退出，可是隨便讓他們退，將使黨損失一些精幹分子。他說他做了一些勸說及挽留工夫，但沒奏效。

中共黨員退黨，對一個世界上擁有最多黨員的政黨，估計在短期內難以動搖它的統治地位。鄧小平六月九日的講話和廿四日中共四中全會的公報中，把加強黨的建設列為當前四件重大任務之一。之後新任總書記江澤民七月一日談及，要中央組織部加強黨的建設，並要下決心對各級黨組織，從思想上到組織上進行認真整頓。他承認這場「鬥爭」暴露了黨組織和黨員中存在的不少問題，有的還相當嚴重，因此一場整黨風將避不了。在這環境下，原本打算要退黨的，或許會暫時按下不動。但是，這些數目難以估計的黨員，日後對黨起什麼作用，難免令領導人憂心不已。





血祭（六月三日—六月七日）

也許我倒下將不再起來，

你是否還要永久地期待。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

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血染的風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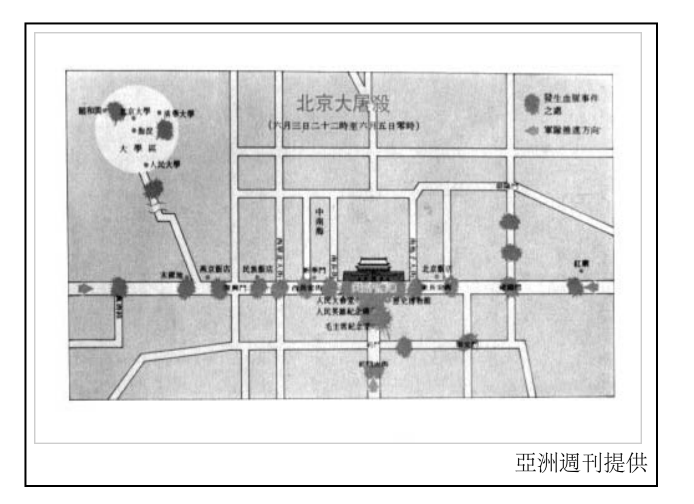

一夫當關。 冼偉強攝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軍隊屠城，死傷無數

陳寶珣　蔡淑芳　陳建平



亞洲週刊提供

「鎮壓遲早會來！」這是北京市民和學生都預計到的。他們只是沒有想到，自六月二日晚開始，軍方著手進行種種挑釁，蓄意造成一幕幕難以想像的大屠殺。北京市民將以他們的鮮血，來為這場和平抗爭打上一個感嘆號。

大屠殺的先兆始於六月二日晚上約十一時，多輛軍車疾駛經過復興門外大街，其中一輛吉普車撞死三人，肇事司機聲稱他們是在「執行任務」，然後被帶離現場。

六月三日凌晨，為數萬餘名年輕軍人沿東長安街徒步跑向天安門廣場，市民立即趕往堵截，雙方互相推撞，場面混亂。對峙至凌晨三時，軍隊才無功而回。

與此同時，群眾更在街上截停的大巴士內發現衝鋒槍、步槍、手榴彈、菜刀等武器，令市民大為憤怒。

軍隊進城的消息令北京城內氣氛突趨緊張。六月三日從早上開始，長安街上便人群不斷。軍警在中午開始製造多樁武力衝突，以催淚瓦斯和電警棍驅趕西單及新華門群眾，早已藏於人民大會堂的軍隊則在大會堂西側與群眾對峙傷人，至傍晚始退回大會堂內。

最後通牒，軍隊全面行動

六月三日傍晚，中央電視台不斷出現異常的廣播，聲稱京城發生動亂，戒嚴部隊將會出動鎮壓，警告市民不要外出，否則後果自負。也許這是當權者的「最後通牒」，然而，數以萬計市民置若罔聞，東西長安街上滿是情緒激昂的群眾。

北京夏令時間晚上八時半左右，前門方向突然出現了一隊約三百人的士兵，他們頭戴鋼盔，手持上了刺刀的衝鋒槍和半自動步槍，急步地由和平門自南向北跑去。當時攔截軍隊的市民主要結集在京城東西面的主要街道上。這支部隊所選擇的路線，是市民集結較少的。但是，為數不多的市民見到軍人「駕到」，照例衝上前去企圖攔截。這些士兵一見市民前來阻截，不由分說，舉起槍托劈頭蓋腦就砸過去。記者當時所見，就是市民衝上去阻攔的一瞬間，至少有三十多人當即被砸得血流滿臉，不支倒地。其他市民見到這隊士兵如此兇殘，立即紛紛向路兩旁的人家奪門而進。這隊士兵很快就向中南海方向跑去。也是這個時候，一架直升機乘著黑幕，升上了京城夜空，一直盤旋不去。

可以說，從這個時刻起，圍城的軍隊全部開始行動了。

東長安街：裝甲車撞人

六月三日晚上九時許，東長安街首先出現了第一批為數約千名的年輕軍人，穿軍裝但無攜帶武器。他們急步操至北京飯店對開的南池子附近，速度慢下來，群眾把落單的士兵拉住勸阻，當時也有士兵頭破流血。激動的市民想打那些士兵，說他們下午殺了人。該隊軍隊停在南池子路旁，然後撤回，市民鼓掌歡呼。

此外，南河沿一帶亦有軍人出動，他們年齡則較大。京城在那個時刻，信息傳遞非常快速，各路大軍壓境的消息，令市民真正感到恐懼和緊張。他們於是竭盡所能，快速地設置路障，分隔行車道與行人道的雕花鐵欄杆、分隔慢車道與快車道的水泥墩，公共汽車、以及劏泥車等，紛紛被推到寬闊的長安街上充作路障。

建國門立交橋附近是一個攔截軍車的衝突熱點。大群學生、市民成功堵住數以百輛軍車，有部分軍車更轉向北走。

剛踏進六月四日凌晨，東長安街出現一輛全速飛馳的裝甲車，橫衝直撞，旁若無人，群眾慌忙向兩旁躲避。裝甲車駛向大北窰方向，群眾馬上追車。群眾在東大橋路設路障試圖堵截軍車和裝甲車，但很輕易便被那輛高速前進的裝甲車輾過路障。有市民說，這部發了瘋似的裝甲車已壓死、壓傷了不少人。

該輛裝甲車在東長安街來回衝撞，它駛至建國門立交橋時，竟然撞倒一輛滿載軍人的軍車。軍車被撞翻，不少軍人被拋出車外，司機頭顱爆破，但是裝甲車繼續前進，並沒有停下來。有士兵很激動，一位軍官模樣的軍人從腰間拔出手槍追去，喝令裝甲車停下來；其他軍車上的士兵都說「不幹了」，棄械下車，與群眾站在路邊。

西長安街：槍聲不斷

城西的血腥爆發得更早。

六月三日晚上十時正，軍人終於開槍了，慘烈的鎮壓開始了。木樨地、復興門、西單一帶，從這一刻起至翌日，槍聲未曾間斷過。

不少圍觀的群眾、學生被槍彈擊倒，勇敢向前堵截軍車的人則給輾斃。市民利用三輪車救人，運走無數死傷者。

目擊者說，軍隊在木樨地附近甚至向高幹樓開槍，射擊那些目睹軍隊屠殺的居民。他又表示附近的復興醫院一早已爆滿，兒童醫院亦已空出二百張床作急救之用。

從西向廣場逼進的是二十七軍。他們遇有群眾聚集或上前阻截軍隊前進，即向人群密集處射擊，不少市民是在逃跑時背後中槍的。

二十七軍沿途殘殺，開出一條血路，約有二十多部裝甲車在前面開路，隨後有四百多部軍車，百多部吉普車。一排排學生和市民被射殺倒地，被徹底激怒的群眾一面破口大罵他們是「法西斯官兵」，罵他們是畜性，一面蜂擁衝前堵截。

西面的軍隊終在六月四日凌晨二時，踩踏著北京市民的屍體，沾滿著人民的鮮血，抵達天安門城樓下。他們抵達時，此處仍有數以千計的市民聚集，這批軍人不由分說，立即開槍驅散人群。數分鐘內，群眾在槍彈淫威下，退到了東長安街的南池子。在南池子市民曾一度坐在地上與軍隊對峙，亦有市民向前衝，軍隊即持續開火數分鐘。

從西面來的軍隊到廣場後開始佈防，將士兵分散在廣場東西兩側以及在長安街上設防。裝甲車及坦克亦在北面和西面緊緊包圍廣場，隨時準備執行清場任務。

廣場上：告急不斷，抱死堅持

儘管各屠殺點的殘殺消息早已傳到廣場，但在六月三日晚上十一時，廣場上學生仍決定按原定計劃舉行「民主大學」的落成典禮，由嚴家其主持儀式並任校長。「民主大學」闢在民主女神像的右側，吸引了不少學生、市民圍觀，聆聽講者發言。

與此同時，位於紀念碑下東北角的廣播台，則不斷播出長安街上告急的消息，並廣播軍隊已向群眾開槍。約十二時，學生與市民的傷亡消息不斷傳來，廣場上的同學情緒已十分激動。吾爾開希通過廣播說，要誓死保衛天安門廣場，廣場的同學約在十二時半宣誓。其時在廣場指揮部的學生領袖有柴玲、封從德、李錄等。

不少學生見軍隊殺了人，也豁出去了，說要決戰到底。他們拆毀帳篷，取出木棍、鐵枝作武器，裝製汽油彈。一些學生更組成「玩命隊」、「敢死隊」，向槍聲不斷的西單方向進發、支援。亦有部分同學在廣場支撐了幾十日，因身體支持不住而在帳篷內休息。

雖然在日間經已發現人民大會堂內有數千軍隊，但進入六月四日凌晨，儘管長安街上經已死傷枕藉，廣場內仍未見軍隊出現。然而就在凌晨約十二時十五分，兩部裝甲車一先一後從前門方向全速往北駛，一部沿廣場東側路，一部沿廣場西側路，出現時間相距約五至十分鐘，兩部裝甲車駛上長安街後，目擊者說都是向東面駛去。

學生群眾赫然見到裝甲車輕易進入廣場範圍，都亂了陣腳，連忙將圍住廣場的鐵欄杆也橫在路上設障礙，並在地上鋪上棉被，以圖阻擋其他裝甲車進入廣場範圍。

兵臨廣場，學生圍集紀念碑

大約凌晨一時，一隊約二千人的軍隊從前門方向跑進廣場。市民、學生沒有正面阻擋，邊跑邊在軍隊

側面擲木條、瓶子、甚至石塊。目睹軍隊如此輕易進入廣場，學生以為會即時清場，然而這隊軍隊，走進廣場至歷史博物館正面，即列陣在館外矮樹林下。隨後陸續進場的軍隊亦分別在歷史博物館及人民大會堂外列陣，市民學生則一度圍著軍隊坐下，並要他們放下武器。

學生廣播台不斷呼籲，這次是「和平、非暴力」的抗爭，希望同學放下手上武器，又叫同學齊集在紀念碑。

陸續有死傷者從廣場南面和長安街方向送到廣場急救站，訊號彈不斷從前門向紀念碑方向發射，周圍都傳來槍聲，甚至有炮轟聲。

一時許，一部編號「○○三」的裝甲車在天安門城樓下沒法開動。其時西路的軍隊仍未殺至，群眾聚集在裝甲車周圍，有人爬上車頂試圖撬開鐵蓋，市民又傳來軍衣、棉被，蓋在車頂焚燒。不久，從裝甲車後門逃出三數名士兵，憤怒的群眾衝前圍打，但士兵終於被學生救走。送上救護車時，群眾還追著喊打，有市民說該部軍車已壓死七、八個人，不能放過車中的士兵。

凌晨二時，廣場北面方向槍聲更響更密，中槍的學生、市民不斷送到廣場，水泥磚上到處血漬。

此時，軍隊清理、封鎖長安街的行動經已完成，長安街上市民被迫退到北京飯店附近，任何企圖前進接近廣場或集結都受槍擊。長安街上的市民這時只剩下不過一萬，仍不時與佈防的軍隊遙遙對峙。

軍隊並未即時進入廣場驅散學生市民，只是在人民大會堂及歷史博物館兩側聚集。

三時許，侯德健等四名絕食代表要求與軍方談判。四時正，廣場上的燈全部熄滅，清場行動即將展開。官方的廣播整夜在廣場上傳來，開始時是戒嚴部隊清場的通告，表示北京發生動亂，戒嚴部隊要執行任務，維持首都秩序。沒多久，廣播已將事件升級，表示首都發生「反革命暴亂」。

此外，凌晨三時至四時間，北京城南遠處，南苑機場方向，傳來頗長時間的炮擊聲。

廣場關燈期間，有目擊者表示軍隊開進廣場時，士兵專向紀念碑至城樓之間仍未離開的市民、學生開槍。不過後來亦有報道軍隊這時沒開槍。

談判撤離，開始清場

凌晨四時半，侯德健等四名絕食代表，通過廣播向學生勸說，他們已和軍隊談判完畢，戒嚴部隊的總指揮答應讓廣場上的人平安撤離，軍隊在南面留了一條通道，清晨前必須清場。四名絕食代表希望市民和學生盡快決定，並勸諭同學不能再流血，不能再作無謂犧牲。

四時四十分，一串紅色的信號彈升上天空，廣場上所有的燈隨即全亮了。可以說，正式的「清場」行動開始了。廣場北面的大批裝甲車列陣向廣場南面駛來。裝甲車所過之處，一座座學生棲息的帳篷被輾過，民主女神像被撞倒……與此同時，人民大會堂方向衝出了一大隊頭截鋼盔、身穿迷彩服、手持衝鋒槍的士兵；歷史博物館方向也有一支人數約二百多人，同樣是戴鋼盔、穿迷彩服和持衝鋒槍的士兵。這支隊伍，瞬即衝到紀念碑前，他們向天開槍，又毆打學生，從東、北兩側衝上紀念碑第三層。

學生還猶疑於撤留之間，紀念碑南面開始有學生打著旗號撤退，其時是四時四十五分。這時學生領袖封從德還向同學廣播，要同學決定撤退。

學生開始撤離時，軍隊還向紀念碑上的喇叭開槍，又搗毀紀念碑前的帳篷和橫額。同時，裝甲車全速駛到坐在北面前線的學生面前。

西面和北面又湧來大批持槍的士兵，以快速步伐威嚇學生，驅趕學生向前走，舉起槍托或隨手拾起木棍打學生。

倉皇撤退，殘殺學生罪證難集

在南面首先撤走的學生隊型完整，一路還有學生組成的糾察隊，邁出廣場時還有市民和他們握手，說他們經已勝利，但隊伍也曾一度被趕亂。

據當時還在場的香港學生和記者目擊，向南走的撤退隊伍約共走了三十分鐘。站在廣場外的香港學生說，學生撤離的過程中未有聽見槍聲，其後十五分鐘也聽不見槍聲。

另一香港學生說，大隊撤退時，毛主席紀念堂與紀念碑之間約有三百至五百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生向他們揮手，沒有離開的意思，後來也不知道他們是否撤離。

撤退後段學生隊伍有裝甲車押著撤離。而在前門箭樓至毛主席紀念堂之間，已布滿了坦克車。

撤退進行間，約清晨五時，軍隊在廣場內施發煙幕彈，廣場內視野並不清晰。

一名香港學生在撤退後在醫院向兩名坐在紀念碑北面的國內學生了解撤退情況。該兩名學生均表示，

南面先撤走的學生人數較少，也較安全，坐在北面的學生人數最多，前面排列裝甲車和軍隊。很多學生並不知道只能從南面撤退，也有學生以為最後的撤退時限是七時。

他們說，當北面學生起身撤退時，即有士兵連續開槍，有同學倒下。北面的學生於是慌忙亂走，有部分走上了紀念碑，紀念碑上軍人便向他們開槍。有同學向北穿過裝甲車之間逃跑，也被射擊。同學奪命而逃時有人跌倒，慘被踐踏。

此外，從紀念碑北面逃出廣場的清華學生向香港記者敘述，指軍隊在紀念碑北面架起機槍向學生掃射，約三千學生衝向歷史博物館正面方向，被裝甲車堵住、輾壓，倒下了，散失了很多學生，至博物館門口時只有千多人。

四時四十分至五時三十分，天安門廣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根據香港記者的現身說法及多個倖存者的敘述，根據日本記者提供的圖片，仍可以勾劃出一個大致的事實輪廓：紀念碑南面和東面的學生是最早撤離，也相對比較安全地撤離廣場；紀念碑北面和西面的學生在南面和東面的學生撤離之時，仍大批的留在那裏，最終多少人逃離，誰也說不清楚。

官方宣稱整個清場過程，沒有殺過任何一個學生，並提供了一個學生撤離的錄影片斷加以證實學生是和平撤退。這個錄影片斷只是記錄了廣場東側，毛澤東紀念堂對開的馬路，亦即上述紀念碑南面和東面學生撤退的情況。既然學生的撤離是有錄影為證，為什麼卻不把紀念碑和廣場全方位的清場過程的錄影昭示於天下？這正是最難理解的地方。

學生隊伍從南面撤出廣場後，再繞上西長安街。在西單郵電局方向，有三部坦克車從後高速駛來，同學慌忙走上路旁。據一名香港學生目擊，至少有十多二十名國內學生遭輾斃。

清場以後，軍隊封鎖廣場和附近一段長安街。北京醫護人員對記者說，軍隊將廣場的屍體裝進塑料袋，由軍用直升機運走，傷者被軍車送走，均不知被運送至何處。又有市民說，軍隊架起帳幕遮蓋遠處市民的視線，在廣場架起鐵架燒屍。更有一說法指裝甲車將屍體輾碎，方便焚燒或運走。

六月四日凌晨過後的兩天，長安街上仍槍聲不斷，香港記者所住北京飯店亦遭槍擊。從飯店下望長安街，勇敢的市民不時聚集與佈防的軍隊對峙，軍隊則每隔一段時間便向人群開槍，運送死傷者往醫院的木板車仍然不時在長安街上飛奔。

六月五日，北京城內更傳出南苑機場發生激烈槍戰的消息，部分居民更表示聽到炮聲。有目擊者聲稱目睹軍人在通往城中的大道，棄置軍車和坦克後逃走，並在街上燃燒裝甲車和坦克，但箇中原因至今仍是不解之謎。由於城內軍隊活動頻繁，並不時傳出軍隊爆發零星槍戰的消息，令京城氣氛一直緊張。六月七日，一隊全副武裝的步兵更向使館區開槍，各國使館紛紛撤僑。

直至六月八日，駐廣場的二十七軍與三十八軍方乘夜幕的掩護撤離。北京街頭的槍聲至此暫歇，但北京市民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悠閑歇息的日子卻不知何時再復。

編者按：此文是作者集合赴京採訪記者及部分香港學生，在六月二日至五日期間，在北京所見所聞，反覆核實，整理而成。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殺機初露

梁淑英

六月三日凌晨一時半，我從北京飯店飛奔到街上，找到相約好的學生，誰料還未開口，他便告訴我：「今天晚上廣場可能會出事，我想還是隨便在附近找個地方做訪問算了！」然後他用單車載著我在附近兜圈，當我們兜到市政府後門不遠處，赫然發覺一隊解放軍正轉入一條漆黑的窄巷中，我們還來得及看見最後數百人。學生告訴我：「那是公安部的後門！」

六月三日凌晨，娃娃兵進城。 陳木南攝

車行不久，又有另一隊為數千多人的解放軍在我們旁邊經過，這時四周有數十個乘單車的市民，和我們一樣停下來，駐足而觀。這些解放軍身穿白襯衣、綠色長褲，背著小包，有的手上拿著膠水瓶，有的挽著皮鞋，也有的拿著擴音器；那學生告訴我，那是行軍時發號命令用的，我的心慢慢下沉。

偌大一條街上，只聽見軍隊雜沓的腳步聲，幾十個市民眼光始終隨著軍隊移動，每個人都屏息靜氣，心中疑惑，這麼多解放軍究竟為何連夜趕入城中，難道是來執行鎮壓學生的任務？

我趕回飯店衝上一間外國記者的房間打長途電話給報館。剛才長安大街上悄然只有十數市民疏落地踏著單車路過的情景叫我擔心。怎麼北京市民的戒備就這樣鬆懈，大家都在夢鄉了嗎？突然，我聽到街外隱約傳來陣陣單車的鈴聲。我放下電話走到露台看大街上，正有數十輛單車從天安門廣場的方向往東飛馳，有的不斷按著鈴，還有人大聲呼喊；也有少數奔往廣場方向。兩時了，我伸長脖子往東看，似乎看不到有多少單車往這邊駛來增援，忙心焦地跑下樓。

甫跑到王府井大街對開的長安大街，我已見到數十個市民正以極快的速度搬動街上的鐵欄石礅橫放在馬路上，還沒來得及取出相機，後面已有一大隊便裝的解放軍，以急速的步伐朝廣場方向邁去，鐵欄絲毫起不了阻截的作用，石礅則滾在一旁。

這時市民已增至二百餘人，有的人徒手去拉軍人，有單車的則紛紛將車子攔在軍隊前面，一些則亦步亦趨地隨著軍隊前進，苦口婆心地勸說，但亦無阻於軍隊推進的速度。

我追上去想跟在最前頭，抬頭已見到幾百群眾堵在前面，「回去！」「我們不需要你們！」呼聲此起彼落。隨著喊聲，人群中不時拋起一些鞋子之類的物件，落入黑暗中。然而軍隊仍是往廣場走。

我回轉身來，仔細打量這些解放軍。他們都穿著白襯衣，沒戴頭盔，背負著壓縮餅乾、麵條、食水和被舖，低著頭默默地抵受若群眾的責罵或勸說，汗水已濕透他們的衣衫，不少邊走邊拭汗。我看清了其中一些人的臉孔，都是稚氣未除的年青戰士，看來只有十八、九歲，疲累和沮喪流露在他們的臉上，還夾雜著疑惑。

為了避免被群眾沖散，他們手扣著手前進，其中有些卻似乎走得太累了，走路一跛一跛的，需由伙伴扶著走。數以千計的解放軍努力擠開人叢衝過去，但仍不免有些軍人被群眾拉得離了隊。

落了單的軍人馬上就被十多名市民七嘴八舌地勸說，我看見一個「娃娃兵」低著剪著平頭裝的頭，一臉惶然地聽著市民告訴他北京城的局勢和戒嚴原因，汗水不斷從他的額角流下，然後他顫聲表示：「我是不知道這兒的情況的，我再也不願往前走了！」群眾高興地將他往東面送走。

另一個娃娃兵則倔強地要往回跟隊，市民費盡唇舌、死命拉著他，他被迫往相反方向走，可一轉身又向軍隊方向跑。如是幾次後，有的市民光火了，揮著拳頭想揍他，但立刻被其他人勸住：「別打、別

打！應該好好勸嘛！」不過怕被嚴格的軍紀懲罰的恐懼感，最後還是戰勝了，小男孩終於重投軍隊中。

就在短短的十多分鐘內，街上的群眾已越來越多，迅速增至上萬人，在歷史博物館對開的馬路，已橫放著四、五部貨車堵軍隊。群眾如山堵，軍隊只能艱辛地緩緩寸進。

我看到一面紅色的旗幟在國家旅遊局外飄揚，學生也趕到增援了。然後我見到一家外國通訊社的攝影隊從天安門廣場方向走過來，頓然放下了心，相信廣場那邊已沒有大問題。

三時左右，這群「娃娃兵」已無法再前進，他們被市民迫到不斷退回來，從單車道退到行人道上，重重的人群圍在外面，一些小戰士索性坐在路上喘息。看見軍隊被穩往了，群眾開始鼓掌歡呼，後來更唱起《國際歌》，雄壯的歌聲響徹夜空，部分軍人低下了頭。

僵持了廿多分鐘後，軍隊陸續撤退回市政府及公安局。沿路上，遺下了大批軍用品，包括壓縮餅乾、水壺、水杯、鞋子等，散落一地。有些市民拿著從軍人身上奪下的大軍衣、背包給記者看，有個背包放著軍用對講機及天線，還有一枝尾端磨尖的鐵筆。有的市民則憤然表示，不少人發現軍人身上暗藏著匕首、尼龍繩索、鋼筋條，腰纏雙皮帶，這些都是用來對付市民的。

原來，軍隊接到命令，要在三日凌晨三時到達天安門廣場。集結在城外的數萬解放軍，自二日深夜時已開始從四方八面入城，主要是來自城東及城西。軍隊有的徒步，有的坐軍車或公共汽車，大部分都是便裝打扮、或明或暗地開進來。然而在十時三十分左右，一批城西復興門外木樨地乘車入城的軍隊，卻因其中一部軍車超速，釀成市民三死一重傷的車禍，重重地響起了警鐘，驚醒了市民。

結果，除了長安大街外，王府井、六部口、東單、西單、朝陽區、宣武區、前門大街等各主要路口，均被數以萬計的市民堵截住了。不過，儘管軍隊未能佔領天安門廣場，但仍有部分軍隊成功進城，駐守在一些醫院及報社等單位內；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南池子，據報亦進駐了大批軍隊。

在西單近六部口處的西長安街，市民在四部被截停的公共汽車和軍車上，發現大批槍械、鋼盔、子彈等，全用麻布口袋裝著，一些市民和學生在一輛車頂展示截獲的機關槍、衝鋒槍、步槍、子彈等，吸引了數以千計的市民圍觀。

在天安門廣場，學生亦搜集了一批由市民繳獲送來的槍枝武器，為了不被當局以此作為學生策動暴亂的口實，學生糾察隊在三日下午一時多送回新華門，可是軍隊拒不接收。

至二時半，一隊約二千名頭戴鋼盔的軍警由中南海西門開出，到在西單府右街及六部口街頭，隔開了該處與新華門的群眾，並透過擴音器，警告市民扣押軍火是違法的行為。

雙方僵持兩、三分鐘後，軍隊開始首次向群眾發射催淚彈，二十多枚連續發放，六部口四周都充斥著嗆鼻刺眼的催淚氣，現場數千名學生及市民掩面爭相走避。

幾乎在同一時間，位於現場斜對面的新華門內又突然衝出三百多個防暴警察，揮動著電棒、木棍，以至鑲有鐵釘的狼牙棒向四竄的市民和靜坐的政法大學學生，不由分說地見人就打，以驅散群眾。很多猝不及防的市民，包括老人和小孩，都被電棒和木棍打傷了；一些年紀較大走避不及的市民，被打得倒下了。

一個正在公共汽車頂大喊「人民警察愛人民」的女學生，腰部被爬上來的軍人的大頭鞋重重踢了一腳，跌了下來，接著迎來電棒的當頭痛打，幸好她仍能掙扎起來逃走。

催淚彈發放了約廿分鐘後，軍警開始退回新華門內，軍警離開後，現場人士發現本來放在四輛車內的彈藥武器都已不見了，相信已為軍警「奪回」。

據一些目擊者說，約七、八十名市民無辜被打傷，至少有十多名需送院救治。趕到附近的醫院時，一名因為剛巧路過六部口、腳部給催淚彈的碎片割傷了的女學生，已敷完藥出來，她右腳整個小腿殷紅一片的，叫人為她無辜受傷感到不值。醫院一位護士告訴我，還有兩個女子因為傷勢較重要住院。

正要離開時，一名口鼻流血的市民由其他人扶著到來求醫。他才進門，就駛來一部小汽車，一個學生氣急敗壞的伸出頭來要護士打開醫院的閘門，但護士說重傷者要去另一間醫院，小汽車便迅速駛走了。

在場的市民告訴我，已經有好幾個學生頭破血流地被送到醫院去了，我驚問原因，才知道學生、市民和軍隊在人民大會堂西門外已對峙好些時候了。

趕到那裏，我見到數以萬計的市民在西門外圍著大約五千名解放軍，他們都很有秩序的分坐在內圍兩邊，中間騰出一小塊空地；但再遠一些，卻有一批軍警正包圍著些什麼人，看見飄在上頭的紅旗，我猜想準是學生與軍隊起了衝突。然後我見到有人檢起地上一些石塊，扔向對方的陣地，不過雙方互擲了一陣子就停了下來，雙方都有幾個人受傷。

人群忽然一陣起哄，有一個人被幾個市民抬著飛奔送了出來，一個學生告訴我，軍隊接到命令，誰要是喊「打倒李鵬」就要打誰。打人時，十多個軍人把學生圍在圈中，拳打腳踢，還要用皮帶抽，旁的

人都沒法救，結果學生都被打得頭破血流地抬出來。光是由三時多到四時半的一段時間，已有廿多個學生被送到醫院去了。而在以後個多小時內，據我的觀察，差不多每隔十五至二十分鐘就有一名受傷學生被抬出來送院。每個人都是頭面滴血，令人不忍卒睹。

雙方僵持良久，約在五時，一名軍官站出來表示，為了使軍民矛盾不再激化，所以他們決定暫時撤退。可是市民沒有讓路，部分已站起來的軍人唯有再坐下來，然後，有幾個學生跑進圈內與軍官談判，另兩名則手持擴音器，分別向圍坐的軍人勸說。還有數名學生拉著一件血染的襯衣繞了一圈，訴說學生、市民給軍人無理打傷。最初，軍隊似乎無動於衷，每人都木無表情地呆坐著。

圍觀的群眾開始發揮力量了。他們跟著學生一起喊口號，高唱「國際歌」，歌後有人喊道：「解放軍也來一個吧！」軍隊依然沒有反應；於是群眾唱起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然後又不斷要求軍隊回唱。軍隊中開始有人動容了，最貼近群眾的一群年青解放軍，有的慚愧地低下頭傾聽人民的呼聲，另一些則漸露笑容，有些較大膽的，更悄悄地張嘴隨著哼唱。

後來，終於有一名軍官站了起來，指揮解放軍們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群眾歡欣地報以掌聲，打破了僵局。雙方你一首我一首的互贈革命歌曲；歡唱間，有熱心的市民送來了一桶水讓大家喝，又有市民遞煙給軍人，氣氛暖乎乎的十分融洽。

正當氣氛轉為熱烈之際，群眾中忽然有人大喊「李鵬下台」，跟著其他人也隨著喊，而且越喊越激動。人民大會堂樓上窗戶中有很多人頭探出來窺看，部分群眾邊喊邊打出「V」字手勢，還報以噓聲，嚇得那些人頭縮了回布簾後。

這時，一名學生猝然被樓上公安人員擲下的磚塊擲破了頭，被醫療隊忙亂地送走，這事猶如一盤冷水般冷凍了群眾的熱情。在其後的半小時內，又再有兩名學生被擲傷。至此，群眾和軍隊又回復當初的對峙狀態。

這場軍民對峙，在學生代表盡力勸說之下，負責的軍官卒在晚上八時答應撤離北京城，並允諾在四十八小時內不再入城。結束了這場持續達六小時之久的軍民對峙。

然而，後來形勢的發展，證明上述幾樁軍民衝突，只不過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徵兆。與數小時後的大屠殺相比，這些小規模的流血事件，可說是「小巫見大巫」。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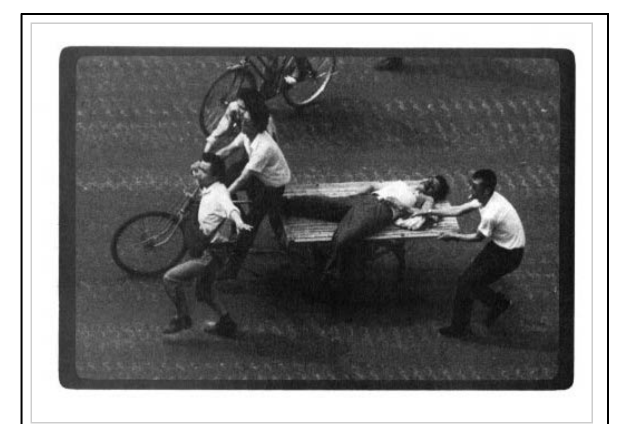


血，灑在天安門下

張結鳳



如果這是最後的一槍，我願接受這莫大的榮光。哦！最後一槍。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話還沒講，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歡樂沒享。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樣，不知道有多少，多少個最後一槍……


長安街上，市民紛紛中槍。 陳木南攝

是崔健去年的作品。去年沒有人想到今年六月血洗北京的荒唐事；去年寫下的這首歌，卻這樣精確地反映倖存者的心聲。是的，我也願意這樣，相信千百個學生都願意這樣，假如這槍之後，能換取不再開槍，就讓這槍射進我的胸膛吧。

可是，我捱的是最早一槍。血，流下；人倒下；耳畔仍迴盪卜卜槍聲。在醫院，在飯店，到處聽聞突如其來的槍響。數不盡多少槍？劊子手，何時纔是你的最後一槍？

六月三日晚十時多，我與住在古城的一位朋友通電話，他告訴我西面聽到槍聲。

六月三日下午二時多，軍警在六部口放了催淚瓦斯，不僅激起民眾憤怒，更令人心情萬分沉重。武力鎮壓開始了，清理廣場的時刻到了。無知、無恥的當權者，究竟會使出什麼手段？自從戒嚴令以來，每夜傳出軍隊進佔廣場的消息；我的腦海也不時浮現恐怖的想像：軍隊衝進廣場放催淚瓦斯、拳打腳踢；數百部卡車駛入廣場，軍警抓起學生扔上卡車，強行搬走……

如今我多麼希望就是這樣。

朋友告訴我聽到槍聲；不久外電亦報道軍隊在城西放了槍。我想衝出去採訪，可是又不曉得在如此危險的處境該如何採訪。在北京飯店露台上觀察至夜裏十一時多，看長安街上騎自行車的市民不斷湧往建國門，看群眾在街上擺設路障。忽然，驚心動魄的事發生了，一部裝甲車自西向東，衝開街上密集的群眾，衝破建國門路口的人牆。人潮在「轟」巨響中驚散，路障亦東歪西倒的。這是第一次在北京市中心出現的重型軍事裝備。

形勢越來越險峻，我感到有責任、有需要跑到現場去，實地觀察。於是與兩名行家，組成「採訪敢死隊」，帶備防催淚瓦斯的濕毛巾，輕裝簡履，一起出發。

北京飯店早已緊鎖大門，我們翻過鐵閘，跑小步趕去天安門，不管是馬路上、路旁小徑或草叢，都是人。不怕死的人啊！你們知否戰亂即將發生？

他們真像不怕死。裝甲車一次又一次地衝來，他們不僅不閃避，還追著裝甲車來拍打，那怕只有石頭、竹枝，也要扔向那鐵甲車身。我站在天安門城樓東側邊上，看著裝甲車衝來衝去撞人，救護車跑出來團團亂轉，形勢已是驚險萬分。

四日凌晨一時十分，裝甲車再一次由東面衝到天安門，群眾同樣趨前追打。這次它衝不過路障了，帶著一段矮鐵欄，窒礙地前行了幾步，洩氣地停下，屢發引擎無效，終於動彈不得。

我站到護城河邊的圍欄上，遙望群眾攀上車頂，打破鐵蓋，放火燒車。

由李鵬宣布學運是動亂，楊尚昆調軍入京以來.，所謂「動亂」的北京，一直是那樣和平，井然有序。甚至攔截軍車的市民，對軍人也沒有一點敵意，還憐憫士兵受困捱餓，不斷送飯送水。是誰逼出六月四日凌晨這一幕火燒裝甲車？殘暴的當權派，不斷挑釁、施壓，出動軍警、重型軍械，怎不激起民眾的憤怒？

火光、烈焰，令人神思迷惘。由於群眾圍住裝甲車，我看不清楚車上的人有沒有被活活燒死？有人說看到人放出來了。

一時四十五分，西面傳來清晰的槍聲。這時街上瀰漫一種詭異、但是熾熱的氣氛，在那樣的情境下，令人滋生投入感，越是發生事故的地方，越要去。是啊，聽到槍聲，還不走避麼？沒有，不僅不避，我們更向西前行。

當然，我們向西行，更因為我們不相信軍隊向群眾開槍。人民軍隊啊，怎會射殺人民？

我們由城樓東側走到城樓西側，來到盡頭，已被前面人牆擋住去路。看不清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攀上燈柱石墩，熱熾熾的火光，映照出眼前冷森森的景象：數百士兵，手持槍械，或坐或立地排成陣勢，對峙於人民大會堂北面的長安街上。我們前面的人牆與這些士兵靜靜地對望，士兵持槍的姿態，無疑是一觸即發。

我驚呆了。在槍口之前，投入感失去了，瞬即萌生逃跑意念。我環視四周找尋逃生之路，尚未警覺前面的人忽然散去。

什麼事呢？我們真是太不夠敏感了，眼前一隊墨綠色的整齊隊伍，是這樣快速地朝著我們步操而來，我們竟是到此刻纔看見。這是一隊抱槍在胸、頭戴鋼盔的防暴警察。怎麼辦？周圍的人都已經開始奔逃，有幾個人一面跑一面招手叫我們趕快走。

軍警進攻天安門了。我沒有看到外圍死、傷有多少，但此刻我站在廣場的邊上，軍警進來了。凌晨二時零五分。我們趕快跳落地面，向著東面往回跑。拔足飛跑，可是我們跑得這樣慢，他們步操這樣快！我們該一直往東跑回飯店，還是先躲在大路旁的草叢中？

跑到城樓中間，身旁的行家建議躲入城樓腳下，於是我們跑上金水橋。纔跑了幾步，發覺所有群眾都在大路上往回跑，我們顯得極其孤單。還是跟著群眾一道撤退吧，我們又從橋上跑回路上。

剛跑到橋頭，忽然眼前一黑，右腦劇烈疼痛，濡濕黏液滑下臉頰。中彈了！我還未來得及識別槍聲，他們已開槍。沒有發出任何警告，他們開始掃射。頭顱發熱，鮮血直冒，我心裏湧起死亡的恐懼。不過理智支配著我馬上伏下，一趴到地上，背上又是一陣劇痛，又中了一槍！

我拉起外套抱著頭，大滴的鮮血滴在橋上，滴得這樣急，我甚至聽到那「滴答」的聲音。我已經看不見警察走到哪裏，亦不知道此際街上是如何混亂。我該起來繼續跑還是伏下躲避？跑，有機會再遭亂槍掃射；躲，可是那額上流淌的鮮血……

我為了採訪學運而流了血，最後還是學生跑回來救我，帶領我逃生。

軍警開到天安門的第一槍，我大概捱了這第一槍。這一槍之後，尚有成千上萬槍。長安街、廣場，在我逃生離去後，已看不到那混亂的情況。被清理得血肉模糊的廣場，直到我離開北京，也無法再看一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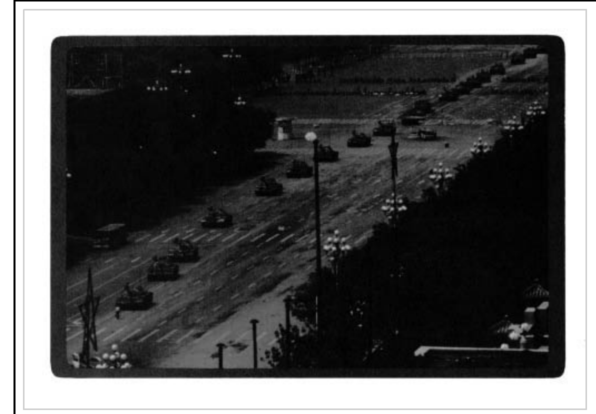
京城一下子掉入黑暗的深淵，無盡的災難籠罩著中華大地。長安街上的英靈，安息吧。廣場上遍灑的熱血，昇華吧。這一場血戰，已將我們的命運與國家命運，緊緊扭在一起；今後，不管中國是黑暗，是光明，我們都不會忘記，共和國的土壤有我們付出的愛。





公廁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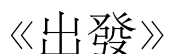
梁宙然



一夫當關。 冼偉強攝

別了！ 我的故鄉
我雙手提著行囊 帶著滿腔的憂傷
五月的天空下著雨
淋濕了戰火撕裂的村莊
是誰佔據了家鄉 是誰使我離開爹娘
是誰幻滅了我的希望
踏上了列車駛向前方

再讓我飲一口老家的酒
就好像那江水長流
再讓我看看這兒時的天堂
誰也無法改變這善良
再讓我撫觸那溫馨的泥土
也許這將是明日的戰場
再讓我吟一段古老的國殤
因為我將出發到遠方
《出發》



六月三日下午二時還在北京飯店胡亂的吃著午飯，忽地裏傳來中南海新華門發生解放軍放催淚彈的消息，而且一放就是五十多枚，使得他們可以順利「收回」在較早時「流失」在學生群眾手上的一批軍火。好幾個人受了傷。

三點多鐘，在人民大會堂西門外採訪軍民對峙的情況。六時許，由於公安人員到飯店中警告我們違反了戒嚴令，我們被逼暫停工作，商討對策。結果：管他的警告，工作第一……

晚上九時許，相識不過三、四天的一位幹部先生來電。

「梁先生，我剛到廣場那邊去了，今天的形勢不太好，恐怕會有事了。上頭要今天晚上絕不可以上街……嗯，我們明早再聯絡吧！小心。」

「你也要保重！明兒見。」心頭立即泛起了一片興奮，此行來北京採訪，終於看到政府如何處理這個結了。

趕忙把這個政府要在今晚動手的消息，告訴同事。

胡亂的又一頓飯，從外面回飯店時，遇上了數百個「落荒而回」的軍警，回到飯店才知道這些都是在十時左右，想開入天安門廣場的軍人，結果卻在東長安街上給群眾截回！

十一時，十四個同事聚在房間內，商量如何採訪政府的鎮壓行動，你一言、我一語，最後商定組成九人的採訪隊，負責廣場的採訪和拍攝工作。其他五人則在飯店內，從高角度拍攝，以及負責外勤採訪隊與香港之間的統籌工作。

九個人各自檢查了必需的用品：濕毛巾、開水、證件、流動電話、攝影機等等，趕在午夜前出發。

九個人浩浩蕩蕩徒步從飯店走往廣場，開展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採訪經歷。沿路上沒什麼異樣，但間或有一、兩個群眾趨前問我們：「哪裏來的？是香港記者嗎？」跟著就帶著非常誠懇的目光說：「對，多拍一些，把事實真相報道出來！」那一刻無人預料到殺機將至。

六月四日零時廿五分，到達了天安門廣場。廣場今晚特別混亂，大夥兒不知在忙什麼，卻顯出他們在備戰。我們幾個人商量，為了減低傷亡的可能，決定只留在紀念碑上十五分鐘左右，然後在附近尋找較安全，又可清楚看到廣場的地方，繼續工作。

在紀念碑上，剛開始拍攝，第一輛裝甲運兵車，便以示威的姿態，高速地由南向北掠過廣場的西側。

廣場上霎時緊張起來，有人鼓噪、也有人飛跑追趕這裝甲車。

跟著，廣場指揮部立即廣播召集廣場上的學生，進行了整場運動中的最後一次宣誓；雄亮沉鬱的聲音響起：「……我起誓，我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

學生糾察隊在學生的《國際歌》聲中，收集起同學預先準備好的木棒和汽水瓶；同學們一個一個戴上了口罩，作好負隅頑抗的準備。

零時卅分，廣播傳出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因心肌炎發作，需要找救護車送院治療的消息……

一分一秒過去，是離開紀念碑的時候了。這時，英文台的記者李奇，見紀念碑上外國通訊社記者沒有走的意圖，堅持要留下，務求將最新的消息發回香港，可是我卻不知為何，竟和他吵起來，給他罵是懦夫，沒有專業精神。好不容易才把李奇帶走。（儘管事後大家和解，這兩句話至今仍縈繞心頭。離開北京後，常自忖，當時是不是走錯了？今天可還有袁廿三的「事實」嗎？）

離開紀念碑後，便在附近打量，找個立足點好看看事情會如何。人民大會堂石階上？歷史博物館？還是毛主席紀念堂？都不成，這些地方不是一早已囤兵數萬嗎？軍隊還沒動手，恐怕我們已首當其衝了。

想了好一會，仍沒有理想地方，便在毛主席紀念堂旁花圃的休息椅上，靜觀其變。差不多同時，前門傳來了嘈雜的人聲，又有學生和群眾朝那邊跑去。原來一批解放軍正從前門方面開進來。

沒多久，幾十個學生氣急地跑回來，還抬著兩個被打傷的士兵，邊走邊喊：「管他是不是士兵，救人就是了。」而且，還叫上前拍照的不要擋著去路。

如是者群眾一群一群來來回回的在我們面前經過，咱九個人七嘴八舌的談了一會，認為站在紀念堂外亦非妥當，當下又再往外找更佳的據點。終於，我們到了人民大會堂東南角的一個矮公廁前。

由於附近已無可落腳的地點，九個人再加上台灣華視的三人攝影隊及一個荷蘭籍的記者，十四人就互相摻扶爬上這小小的廁所頂，在約三百公尺外遙看天安門廣場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情況。

公廁上滿佈碎玻璃片、碎石，但相對於西單、六部口、木樨地或東長安街上任何一個殺戮現場，都要安全上百倍，而旦也可以看到紀念碑上的情形。如是者，各人就開始統籌、現場報道、拍攝或後勤支援的工作。我則拿起了隨身的錄音機，記下了看到的事情。

一點廿分，前門那兒響起了連串的槍炮聲，跟著就看到一枚又一枚的曳光彈劃破長空。廣場一帶的人都很緊張；我們在公廁上的十幾人也不例外。

曳光彈在頭頂上響了三、四分鐘，忽然地面傳來槍聲與密密的步操聲。伸首往下看，赫然發現了一隊軍警正由前門向廣場操去，而且邊走邊放槍；那時候不知道這些軍警是否開始採取鎮壓行動，連聲就叫廁所上各人伏下，生怕有人會中槍。於是大家在廁所上，各自施展從戰爭電影裏學到的匍匐前進技巧，在公廁上由這邊爬到另一邊去看看地面的情形。

這幾百個軍警沒有直向廣場前進，只是集結在人民大會堂的東門石階上。群眾見軍警沒行動，跟著又圍攏起來，有些更拾起路旁的玻璃瓶或石塊，向軍警扔去；有些則點燃了路旁的垃圾堆。而軍警則間歇地放槍；或假裝向外衝，嚇唬人群。

跟著的一個小時，並無其他軍隊開入，而在公廁附近的群眾，情緒則開始平靜下來。不過，槍聲則不絕於耳。但在廣場的北面，卻開始惡化了。廣場北面的兩端，都燃起了熊熊的烈焰，焚燒了一輛裝甲車。更糟的是，飯店內的同事說，長安大街上，士兵肆意開槍殺人，平民屍橫遍地……

我們不曾目睹，卻都心裏難過。

兩點廿分，第二隊為數幾千的士兵，也從前門開入，在我們這所公廁前，轉到人民大會堂的南面去了。由於這隊士兵都把槍背在身後，態度也不是那般兇，附近的群眾把這些軍人團團圍著，在他們身旁大喊「打倒李鵬」的口號。由於氣氛看似緩和了，我們幾個記者就膽大大的，用手電筒拍攝和用這些軍人為背景，做了現場報道的錄像。

差不多同時，廣場那邊傳來了學生的廣播，先是呼籲學生將手上的武器交到廣場指揮部，同學只可以靜坐，迎接軍警到來，以維持連月來學生和平請願的精神。

不多久，陸續聽到六部口、西單及東長安街上士兵殺紅了眼，群眾雖有大無畏精神，但都前仆後繼地被殺。

這時廣場上的播音播出了這樣的訊息：「學生向潛伏在廣場上的便衣軍警勸說，強調學生這場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而非暴亂；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槍口絕不可向著人民，若他們向人民開槍就是犯罪。」

繼而，又播出了兩段消息：第一次是學生提出要跟戒嚴部隊談判；第二次則是四個絕食人士之一的侯德健，主動要與戒嚴部隊談，讓廣場上的學生安全撤離。

廣場上跟著響著的就只有戒嚴部隊的廣播。

廣場上的學生在悲壯的《國際歌》聲中，向紀念碑上靠攏，手拉手地在紀念碑的石階上。我們用望遠鏡看，只見紀念碑上黑壓壓的頭兒在鑽動。

時間在槍砲聲、呼喊聲與《國際歌》聲中點滴流逝，可一直沒聽到學生和戒嚴部隊的談判結果。

三時十五分，廣場的氣氛越益沉重。

由於飯店那兒傳來有公安人員到房間搜查底片的消息，我們第一件事便想著如何保護拍下來的錄像帶。開始時我們把錄像帶藏在隱蔽處，然後繼續留在廁所上拍攝。可是，鑒於廁所實在太近廣場了，百密總有一疏，而且士兵清場時必會封鎖這兒，翌日也未必能取回錄像帶，必須另想他法。

公廁上，不知何時，原來已經聚集了十數個市民，他們有的在高談闊論；有些在破口大罵政府；更有些在用鎂光燈拍照……把這安全的據點，變成一個攻擊的目標！再者，軍隊用作鎮壓學生的不是橡膠子彈，不是催淚彈，更不是棍棒，而是嗜血的子彈。衡量過後，大家決定放棄這一據點，暫逃到附近的民居避避鋒頭。

三時卅分，大夥兒收好了器材，正分批爬返地面時，卻又碰上第三隊士兵開入。這隊軍人雖只有百來個，可卻是三批中最危險的，每一個士兵都緊握步槍，像是隨時要打人一樣，嚇得周圍的群眾四散奔逃，我們兩個最先到地面的同事，也逼得拋下器材，躲到公廁內去，在公廁上的，也嚇得慌忙伏下，只偷偷從天台邊緣窺看情況。

猶幸這隊士兵很快在眼前消失，大家急忙從天台上又扶了兩人下去。怎料，大會堂南門那邊又忽然傳來群眾走避聲，大家再一次慌忙跌伏地上，這一次卻是杯弓蛇影，只是一輛救護車駛過。吓，這車子真要命！大家又再趕忙爬下去，最後點人數時，發現少了一個人！這次是謝志峰，他仍然站在公廁上，叨叨地跟香港做直播報道，大家在下面為他發急，好不容易把他拉了下地，大家就往大會堂南門處走。

我們都想著遠離廣場，便可舒一口氣，誰料南門石階上原來站滿了荷槍實彈的士兵……大家沒說一話，都明白只要稍有差池，便會……於是提心吊膽地快步走過士兵的槍口前，結果，一行人安全脫險。

好不容易，在距廣場不遠處，覓得一處民居暫避，想不到這平日不外十分鐘的路途，會是如斯漫長。

歇了一會，從路人口中，知道廣場那邊的燈光剛滅掉，看看腕錶是四時正，心想軍隊要開入廣場了。儘管大家都想到外頭去，但只能倚在門前，豎直耳朵聽廣場那兒的動靜。

四十分鐘後，聽到廣場那邊重開電燈了，而侯德健也成功說服了戒嚴部隊，讓學生無條件地安全撤離廣場，由東南側封鎖線一處缺口退往東交民巷去。

在民居裏，大家都忐忑不安，惦念著學生的安危。經過商量，我們在四時五十分左右，再走向廣場查看。

走到大路口，只見大街旁聚滿了群眾，在大會堂南門與我們曾棲身的公廁所在地，站滿了解放軍，把廣場重重封鎖著。

而在南面前門那邊，數十輛軍車開往毛主席紀念堂東南方，不多久就在那裏傳來了綿綿不斷的槍砲聲。心裏盤算那兒發生什麼事，而謝志峰又開始他的現場報道了。

這時兩個平民走過來，輕聲問是不是香港的記者，隨後遞上了一顆兩吋長的步槍子彈，說是軍隊射殺群眾時拾得的。他倆還七嘴八舌地說士兵怎樣開槍打市民，他們看見一個老頭兒，躲在路中的警衛亭，吃了一顆子彈……

在街頭拉著一些人，追問他們有沒有看到廣場的情況。怎知一站著，就

圍攏了人群，你一言、我一語，都沒法聽清楚誰說了什麼。還在街頭聊著時，忽然大街上響起了密密的槍聲，群眾四散奔逃，情急之下，把幾個同事連忙推進一個小院子裏。

在小院子的天井裏，十數個人面面相覷的站著，討論外頭的事；嗅著火藥的硝煙與感受著催淚氣的刺眼味道。隔了一會，外面靜了，才探首到外頭查看，跟著趕快回到棲身的地方。

外頭的槍聲仍然卜卜地響，間或混雜了幾響砲聲。又過了幾個小時。天色逐漸由灰暗吐白，我們看看時間，已經接近七時了，學生該離去了吧！於是我們又走到廣場那邊去，膽子大的幾個人都跑到封鎖線前；與士兵相隔不過兩呎的地方，察看廣場那頭的情形，可是在封鎖線後，我們只見一堵布帳篷。

這時身旁有人蠢蠢欲動，大家見勢色不對，連忙急步離去。這時碰上了四個情緒極激動的學生，原來他們都是剛離開廣場的，於是分頭把他們帶到附近的胡同裏，讓他們平靜下來，並且問問他們離開時出了什麼事。

這幾個學生，有的是在歷史博物館前勸阻軍人，有的是在西單堵軍車後回到廣場的，也有一直在廣場上坐著的學生。他們都說差不多的事──廣場的燈一滅掉，就有士兵衝上紀念碑上，分別拿棒子或步槍痛打學生，硬生生地打出一條「血路」。士兵衝上紀念碑後，立即把所有錄音機都砸爛，似乎不讓任何人留下紀錄。……然後士兵不理學生是不是已經提步撤離，仍拿著棒子在後頭狂打學生。跟著，學生看到坦克車駛進了廣場，不理廣場上的帳篷內還有沒有學生，就朝著帳篷輾過去，而且是來回地在帳篷上輾過……

在西單堵軍車的說，親眼看到一個同學中槍，子彈穿過身體出來時，身體都「爛呼呼」了……

這幾個學生邊說邊哭，途人好不容易在附近弄來了一碗開水，讓他們喝過定下神後，連忙就由好心的途人帶走了。

同事想著學生的話，都沒發一言。

這時又遇上了一個曾在公廁上的中學生，當時他並沒有跟我們一塊離開那兒。從他口中知道，我們「逃」出了公廁後，不消十五分鐘，那處被解放軍發現，跟著還衝到廁所上放槍掃射，而他見勢頭不對，便跳樹逃生，避過了災難。

六月四日早上，大伙兒像沒了動力的木偶，提不起精神來，只想著怎樣與飯店的同事會合，可是飯店那邊傳來長安街頭仍有殺戮，暫時只得躲在民居中。

六月五日，經過一整天，仍想不到脫險的辦法，又擔心再逗留，會對民居的主人帶來危險，於是知會了飯店的同事，打算冒險由民居，逃往最近的民族飯店避一兩天。

民居的主人倆由於擔心我們途中會出事，不顧自身的安全，硬要冒死帶領我們走過胡同小巷，越過不斷有士兵槍擊平民的長安街，到達飯店才肯與我們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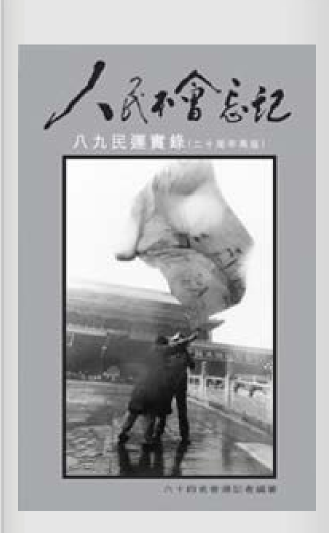
我們一抵達民族飯店，竟看見我們的計程車司機在等我們！原來他們在昨天已嘗試繞道找我們，但多次在路上給士兵槍擊，險些沒命才被逼放棄營救的打算。到今天，他們知道我們要到民族飯店，又再嘗試找路來接我們。

好艱難回到北京飯店，同事與行家恍如隔世。幾小時後，在極不願意下，放棄北京的工作，訣別數以百萬勇敢的北京市民，帶著滿眶熱淚離開了北京。

寫於八九年七月六日

再見，廣場

蔡淑芳





學生從廣場東南面撤離 學生提供

天安門廣場，是記者採訪的焦點，也是這場民運的心臟地。我在廣場渡過了很多個日夜。六月三日晚十時，軍隊開槍鎮壓的消息傳來，我知道這夜外出是要冒生命危險的，但是絕食期間，到戒嚴之後，我每晚都去廣場，這晚我是不能不去的。

我與梁二早已約定，凌晨我們一起去廣場。廣場周圍組織了很多糾察隊，隨時出動到告急的地方增援。外圍傳來很多死傷的消息。形勢越來越緊張，廣場指揮部發出了最後一道命令，堅持和平、非暴力的鬥爭，請全體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市民和同學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齊集。

在前門的方向，不斷有訊號彈發射過來，這橙紅色的火花，伴著爆炸聲、槍聲，威嚇著紀念碑下面的祖國孩子們。他們卻不懼怕，還在廣播中表示絕不撤退，要以鮮血對抗獨裁者的殘暴，要向歷史宣布繼續不屈不撓的鬥爭，要呼喚新生命，讓同學們站起來。

一位全身染滿鮮血的同學，氣急敗壞地跑到廣播站，說他把同學救去醫院，已有十七個同學死了，不能夠不反抗了！但是，廣場指揮部為了貫徹這場運動的和平請願精神，不單沒接納這同學的意見，還呼籲同學和群眾放下手上的武器，絕對不能動武。

我去外圍了解情況，沿途見憤怒的市民向一部載滿解放軍的公共汽車扔汽水瓶。又聽到從人民大會堂傳來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廣播，表示廣場已經成為極少數人製造動亂、傳播謠言的市場，戒嚴部隊為恢復首都正常秩序，決定立即對天安門廣場清場。

緊急廣播不斷以宏亮的聲音，呼籲所有人必須立即撤離廣場，戒嚴部隊有權對違抗者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強行處置，後來廣播又將首都發生動亂，升級為「反革命暴亂」。儘管廣播不斷地在廣場上迴盪，但聚攏的學生、工人和市民仍沒有散去，一些人更跑去有軍隊的地方，把士兵團團圍住，企圖作最後的游說和堵截，而且還有學生糾察隊隔開市民和士兵，維持秩序，制止衝突。

我在大會堂東門對開的馬路蹓躂，看見長安街城樓一帶有多個火頭。本來想沿長安街到大會堂西面，看看是否駐有重兵，但是走至路口，便發現由裝甲車開路的大批車隊和士兵已殺到，而且不斷向著東面開槍。

長安街上的人群四散躲避，我也只得後退，躲在一個站崗亭的後面。很多子彈在頭頂和附近飛過，把站崗亭的玻璃擊碎，身旁有人倒下，幾個不怕槍彈的人上前救他，一位國內記者在我旁邊拿著錄音機口錄現場情況。槍聲停歇之後，他還拖著我的手往後跑。

已經是凌晨二時了，噩夢成了事實。這隊兇狠、精悍、無情的「人民子弟兵」竟真的向人民開槍了，他們不知在長安街上殺了多少人，才開了這條血路來到天安門。

人群總是不死心，往後跑了一段路，見槍聲一歇又再往前衝。雖然敢於往前衝的人明顯減少，但仍有不畏死的人向軍隊擲磚塊。

學生把血流如注的傷者運到救護站，地上血跡斑斑。我看到學生拿起木棍、鐵枝戒備，看到很多同學都戴上口罩、頭盔迎接即將來臨的鎮壓。

朝東望去，又見到大隊士兵由路口往歷史博物館方向跑去，很多士兵聚在歷史博物館。另有大軍由西殺到，佔領了北面城樓。廣場西面的人民大會堂門前，早就有軍隊駐守。只有南面似乎是較為平靜，

人群亦聚集得比較多。

侯德健等四名絕食者作緊急呼籲，希望解放軍停止使用武力，因為人民手無寸鐵，只不過是和平抗議，又表示願意進行談判，他們會勸服同學立即撤離廣場。

呼籲在三時許從人民英雄碑上的喇叭傳出來。到四時正，廣場上的燈全部熄滅，恐怖的氣氛籠罩住整個廣場，殺機在四周埋伏。我想到我可能會真的死在廣場上，所以摸黑到一個帳篷前面，問同學可否借一張銅床給我坐下，而帳篷內還有同學在休息。我亮起電筒在筆記本上寫下遺言，我的命運已經跟學生連結在一起，我不怕死，我肯定自己是做對的，能夠經歷這場悲壯的歷史時刻，個人的生命早已消失在大時代的洪流中。

太黑了，什麼也看不見，不過，在廣場的東南面還走進來一大隊市民和工人，他們喊：「中國人，站起來。」

紀念碑上的喇叭，又傳來侯德健的聲音，表示已經流了很多血了，不能再流下去了。現在已經取得了這場運動的勝利，廣場上的所有人都是民族的精英，都不怕死，但是死要死得有價值，所以他和另三位絕食者，未經同學的同意，作了一個決定，與戒嚴部隊接觸，並且取得他們同意，讓全場的，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們，平安的撤離廣場。侯德健強調，希望工人們、同學們、市民們想一想，然後才作決定。

但是，侯德健的話還沒完，廣場上已有人大喊：「不撤！」然後另三位絕食者，周舵、劉曉波和高新相繼發言，勸說同學要保存下來，別作無謂犧牲，又表示戒嚴部隊得到上級的死命令，在清晨前會不惜任何代價清理廣場，不過他們已同意在南面留一條通道，希望同學們有秩序地撤離，又希望大家能夠做到少數服從多數，冷靜地做決定。

後來，侯德健等四位絕食者又表示，要看到所有人離開，他們才會離開，又再呼籲大家為中國未來的民主保留力量，應該有秩序地撤離。

四時四十分，廣場上的燈重亮起來。工人自治聯會的代表也通過喇叭發出呼籲，表示戒嚴部隊毫無人性，向人民剮了一刀後還有第二刀。一路來的槍殺已經流了很多血了，大家不能心存幻想，堅持留在廣場只是無謂的犧牲。

正當廣場上的學生還在思考撤留的問題時，第一批戒嚴部隊已經潛進廣場，越過廣場上的帳篷，向紀念碑進發，喝令同學坐下。我在紀念碑下的東北角，看見這批持槍的衝鋒部隊，直追上第三層，不斷聽到槍聲，然後學生和市民都大喊：「人民軍隊，不打人民！」

戒嚴部隊緊急清場，通告的廣播掩蓋了紀念碑上學生的廣播。廣場上的學生圍住人民英雄紀念碑，還不知道撤離的決定如何，士兵便已佔據紀念碑第三層階，把坐在梯階的學生趕走，士兵不斷開槍，又往掛在紀念碑上的喇叭狂開槍，把紀念碑射到迸出火花。群眾激動地喊：「不許打紀念碑！」

學生向東南方潮水般撤退，我則朝西走，在最前線的坐著的學生面前經過。就在紀念碑的北側，遇到馬少方，他坐在第一排，叫我趕快走，後來還拉了我進入他們的隊伍中，叫我提防戒嚴部隊會放催淚瓦斯。

五時正，我們看到裝甲車、坦克車迎面駛過來，輾毀所有的帳篷，遠處已看不到民主女神像，大抵女神被推倒了，寧死不屈的學生會否還留在帳篷內，已經輾斃！？

啪啪的槍聲響過不停，坐在馬少方旁邊的楊朝暉喝令我向後撤，要同學讓路。但是他們這般勇敢地面對駛近的坦克，我又怎能撤？更何況，我已決定跟他們一樣，把生命豁出去的。

感覺是一片混亂，不斷有槍聲，到底是向天還是向人？到底是衝鋒槍還是機關槍，我都分不清。其實，士兵是穿迷彩服，抑或是普通軍服？戒嚴部隊中，到底哪些是解放軍，哪些是防暴警察？有履帶的哪些是裝甲車，哪些是坦克車，我也分辨不出來。此外，我跟學生一樣，天真地以為政府的鎮壓只會用催淚瓦斯，於是準備了濕毛巾，難以置信的是真槍實彈已經殺了許多人，學生和市民還有退路嗎？

坦克和裝甲車後面，湧來一隊全速前進的士兵，直壓向學生，用木棍打學生，驅趕學生。本來在南面，已有學生有秩序地撤，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士兵已經包圍住學生，坦克和裝甲車堵住了撤退的路。很多學生都捱過士兵的棍打，人擠人在窄窄的退路上不知應怎樣撤。

我被推倒在矮灌木叢中，有同學也給擠倒壓過來，秩序很亂，他們往邊擠，我則爬出去，士兵在面前要打，我跑，在跌倒時捱了兩棍，沒事，還可以跑，不過，很多人卻頭破血流，負傷而逃。

逃出來的，很迷惘，同學都哭了。跟著大隊向南撤，隊伍很凌亂，後面還有同學跑出來，我又再碰到馬少方和楊朝暉等幾位同學，他們手拉手，心情凝重，招呼我並肩前行，突然間楊說：「我不走了！我不能離開這兒，我要死在這裏！」馬不許他激動，與另兩名同學強行把他扶走。

再前行到東交民巷的路口，我就跟他們分手了，一別之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重逢。患難中，他

們可以說救了我一命，儘管大家都曾以拚搏之心去面對政府無情、血腥的鎮壓。

寫於一九八九年七月九日

編者按：作者是最後一名撤離天安門廣場的香港記者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坦克輾在同學身上

何苦

他們感動了上帝
卻感動不了皇帝

—北大詩選



被屠殺者屍體滿布復興門醫院殮房。 陳玉華攝

六月四日凌晨一時左右，我看見了第一批軍隊，約千餘人，手持長棍，背著衝鋒槍，在我們設於天安門廣場東邊的「香港社團聲援物資聯絡站」前幾尺經過。他們說：「我們不打學生，你們不要怕。」我緊張的心情始輕鬆起來。

我一直認為政府最聰明的驅散方法，是用軍隊把廣場圍起來，或將學生強行架走，再把校園包圍。我想這大不了遭拳打腳踢，強行架入醫院或監獄。這樣當然可能有一小部分人會死，然後在市區實施戒嚴，讓市民和投資者漸漸習慣，正如以前台灣做法一樣。因此，儘管一些「小規模」衝突已發生，有十多個中槍受傷的人被人抬過，我仍不相信軍人會血腥鎮壓我們這群不作抵抗的學生。

二時半，我獨自回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最高台階的北面，躺在地下。這時，天空之上隱隱約約閃著幾顆星星。在四周圍槍聲、炮聲的襯托下，在悲壯的《國際歌》歌聲中，在強烈的燈光下，紀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大字格外顯得莊嚴。

直至四時半，我腦海一片空白，想寫遺書也寫不出。無聊之際，竟生平第一次抽起煙來，而且幾乎抽完整整一包。唯一想到的，就是若「去了」對不起家人。

官方的廣播不停地呼籲同學離去，說天亮前不離開，便無法保證大家的安全。約四時半，廣場指揮部的廣播也呼籲同學們為了大局著想，避免做無謂犧牲，請大家從速撤退。因為和軍方談判的結果是：他們收到了死命令，天亮之前會不惜一切代價清場。現在廣場南面留了唯一的生路給同學們。指揮部的廣播還說，我們平時提倡民主，現在正是實行民主的時候，我們應少數服從多數開始撤退。但在我旁邊的一位同學馬上說，你們才是少數，我們不撤。如果撤，會令市民很失望。明天天亮，北京市民一人扔一塊石頭，就會把這些軍人統統擲死。這時，絕食的四名知識分子也呼籲同學們撤。侯德健也發言了，他說他會等所有同學撤走之後才撤。另一位知識分子也說，這是代表了四人的共同心聲。

再過一會，廣場上較早前關掉的燈又亮了起來，而大會堂側一些從來沒有亮過的燈也亮起來了。照得紀念碑和附近如同白晝，一列列的軍隊從人民大會堂耀武揚威地操出來，手持著槍，漸漸向紀念碑推近，一百米、五十米、十米……。再向北面望去，一隊約二十人的軍隊正穿過人群，已來到紀念碑的最後一段梯級。我取出相機，正想拍照。說時遲，那時快，另一小隊軍人已從東面梯級上來紀念碑之最高台階，向著紀念碑人頭頂一尺至幾尺的地方開槍，還如臨大敵般用衝鋒槍指著我們。我心裏馬上想：「有無搞錯」，萬一軍人失手按下槍板，我們豈不是必死無疑。然後，我隨著人群慢慢向南面梯級退下。走到梯級時，看見一軍官手持喇叭和無線電通話機，不時用通話機說話。幾個士兵很敏捷、殺氣騰騰地用手槍指著「敵人」。看見人群中有拍照，我也舉起照相機拍了幾張。這時我已身不由己地被人群推著走。

我跟大隊向南慢慢移動，在毛主席紀念堂附近，看見兩位中文大學和一位香港大學的同學，駐足一會，再向前走。再碰見了一位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同學，又停了一陣子，再前進。在前門箭樓旁看見政法大學的學生領袖A君和他的朋友B君，一直坐鎮在指揮部的A君估計，至少有一千人以上的死傷，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死傷數字，令我震驚。再過一會，當著政法大學同學經過時，我們三人就混在當中走著。到前門東大街之際，約有一千多軍人從旁向天安門方向跑去，人群很憤怒地叫：「走狗，走狗……。」他們便加快腳步跑去。A君告訴我，從他們的制服看出，他們是來自中國唯一的傘兵團。

學生跟隨著自己的大學隊伍，慢慢地向西，再向北，回到西長安街，再向西行，沿途老百姓向學生握手告別，人群中不斷爆發出：「血債要用血來償」，「罷工罷市」，「我們會再次奪回天安門」，「你們是勝利歸來」的呼聲……。

當隊伍離開前門約五分鐘，天開始亮，當隊伍走到西單郵電大樓時，天已經全亮，隊伍佔了足足半條長安街。這時，傳來坦克車聲，人群開始亂，我們從路旁欄杆的缺口跑向一個小胡同。跑了十多米後，回頭看見三輛坦克，最後一輛上面有一軍人開了十來發機關槍，還扔了一、二顆煙幕彈，人群更加四散逃走。不一會，三輛坦克又出現，令稍為聚集的人群又四散逃命。我離煙幕彈很遠，風也不是向我這兒吹，但我的喉嚨很辛苦，幾乎要把所有東西都嘔出來。我忘記了是哪一位學生告訴我，這是「芥子氣」。這時，有後面來的人告訴我們，後面有十來人被坦克壓死。於是，我們三人跑回頭，看見大約在我們後面幾十至一百米的地方，有十來人可能因欄杆所擋，來不及脫險，有的腦漿溢了出來，有些手腳分開了。我在十米外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了。我和A君、B君都認為這三輛坦克的目的是衝散人群，否則我們當中至少死一千人，而衝散人群的目的可能是抓學生領袖，因一大群人回校不易動手。於是，我們三人便落荒而逃，沿途見長安街上有很多衝突過的痕跡，遍地碎石，一大片、一大片的血跡，由幾十至幾百平方米不等。三人幾經辛苦，找得一輛順風車，在政法大學門口停下。B君先去探路，發覺安全後，三人直奔A君宿舍。半小時後，政法大學的同學大隊回來了，還抬了五條冒死搶回來的屍體，而各方面得來的消息令我幾乎支持不住。先是有兩個同學進不到天安門廣場，隨即去了六間醫院，估計最少有一千具屍體；然後知道紅十字會在凌晨二、三點的公布是死了二千多人。根據最遲走的一批同學報告（包括一個曾藏在樹上），最後撤的一批同學遭到槍殺，而軍醫私下透露給學生領袖的數字是至少二千六百多學生因遲撤而死亡。因為有些被壓成肉餅，分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加上軍隊在途中，見人就殺，包括很多在街看熱鬧的小孩子，所以有人估計最少死了一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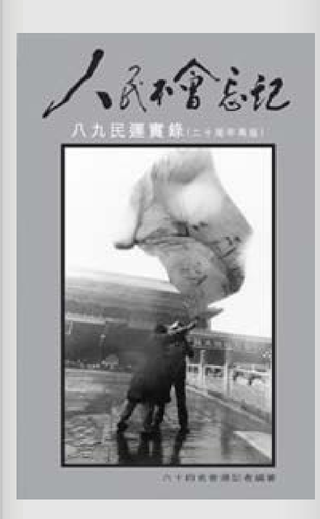
這時，有幾個政法大學學生想設路障，軍隊便向政法大學門口開了幾槍，還把門口一度堵塞。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覺得死亡是如此近。留下來又怕軍隊遲些軍管政法大學；回飯店，又怕在街上被軍隊亂槍掃射。這時死了，可能比蟻還賤。於是，突然感到一股強烈的求生慾望。六月四日中午十二時左右，我由一個政法大學同學帶著，騎自行車回到飯店。

編者按：何苦是一名香港學生的筆名。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李卓人被扣

陳寶珣

六月五日晚，飛機正在焦灼不安等待起飛，我們急欲擺脫眼前仍歷歷在目的一個血腥政府的獸性暴行，盼望三個小時後飛回那片苟安一隅，仍然自由，生命不受威脅的土地。

播音器播出機長的聲音，大意是經已超過十五分鐘，飛機必須起飛。有消息說，今晚十二時，即兩個多小時後，北京機場將會封鎖。

鄰座的一個香港學生說，我們目擊解放軍舉槍瘋狂射殺，無能力挽救一個倒地不起的中國同胞，而在這眼看要飛回香港的港龍包機上，我們甚至不能對一個熟悉的香港居民作出任何援助，目送李卓人被兩名中國邊防人員帶走。

亞洲電視新聞部主管包雲龍向機上乘客作了一番說服後，機上港人舉手決定：唯有起飛。面對不講道理的中共當權派，回港恐怕要比留在北京所能做的事多。

事實上，機上數十名記者、約二十名中大學生、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數名代表和十多名香港在京學生，都隨時可被中國當權派以不遵守戒嚴令，甚至更嚴重可被指為參加反革命暴亂，而受到任何無法估計的處理。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一個女同學這時舉步要離機，其他人此起彼落的揚聲制止，一名女記者攔腰把她抱住，那女同學邊哭著邊說，不能讓他們這樣做。但事實是，即使我們都下機，也做不了什麼，我們甚至不知道李卓人已被帶往何處。貿然步出機場，我們更不能預計又有些甚麼人會把我們帶走，命運又如何。

當所有香港人都平安步進機艙之際，大家都感受到過去四十八小時以來不曾有過稍稍的精神安穩，可就在二百多名乘客拍手歡呼之後不久，兩名北京機場邊防人員進來把李卓人「騙走」。

說是騙走，這殊非誇大造謠。邊防人員登機時向機上乘客說，有兩名乘客的證件較早前未有蓋印，需要補蓋。他們逕自走向機艙盡處，並未細看前排眾人展示的證件。機上各人正在議論紛紛，猜度可能是同機兩名小童的證件未弄妥，兩名邊防人員已把李卓人帶走。李卓人走過記者身旁時還說，他的證件蓋印並無不妥。他揚起手中的回鄉證，乘客所見亦不察覺有何問題。

機上各人的腦筋尚未轉過來，邊防人員已帶著李卓人步出機艙。有乘客提出，需要有人陪同李卓人。三名記者以及港龍的一名負責人隨即陪同前往，但三名記者卻被拒諸於往機場的通道，港龍負責人亦只能陪至機場閘口。

根據港龍負責人最後與邊防人員接觸所了解，邊防人員的解釋是李卓人的證件有問題，需接受問話，肯定不能乘搭此班航機回港。至於其他情況，包括證件出現什麼問題，將被帶往何處，何時獲釋，全部沒有透露。

隨之而來的是更難耐的十五分鐘。機長原先只定下十分鐘等候時間，幾經爭取才延至十五分鐘。雖然與李卓人同行的「全港市民聲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成員和學生對此難以理解，一再要求再等，但機長則表示他要對全機乘客和航機負責。而最主要的還不是十分鐘或二十分鐘的差別，機長認為中國當局究竟要放要留，與飛機上二百多名乘客意欲作何打算，並不相關。

機上乘客作了短暫而十分容易得出結論的討論：留在北京根本幫不上李卓人什麼忙，回港向港澳辦公室、新華社及港、英政府施加壓力，恐或會有些效果。

李卓人與「全支聯」另外三名人士在五月下旬攜帶港人支援學運巨款赴京，及至他突然被拘，其時的處境確是十分難以掌握。中國當權派聲稱今次所謂反革命暴亂與海外勢力勾結。倘若要揪出一兩條「海外線」作典型來懲治，李卓人的形勢便十分不妙。從好處想，他們只是想藉李卓人來嚇一下興緻勃勃聲援學生的港人。從事後的結果看來，後者的猜想是對了，而且也確實收到預期效果：李卓人有驚無險返抵香港之後，「全支聯」以及熱衷於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各個團體，已不敢輕言派人赴大陸作任何方式的援助，也鮮有公開地探討在現時中國法律容許下，香港人還可以在國內做些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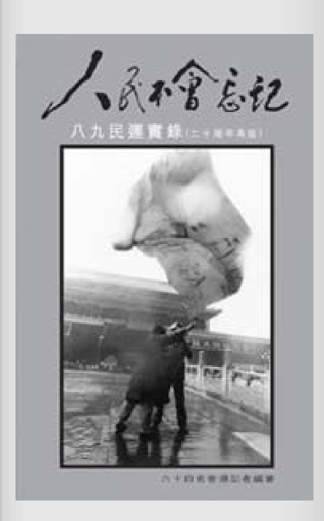
無論如何，李卓人被扣留審問的三天期間，絕大部分香港人均是憂心如焚。支援北京學生的巨款是向許多香港市民募捐而得的，倘若李卓人因帶這筆款項到北京而被入罪，他就是代表香港很大部分市民受罪；若將李卓人判刑，無疑是正式宣告香港人都是反革命份子或其支援者。

至於北京公安局指在李卓人一度下榻的北京飯店，發現一批為數八萬元的人民幣，內有字條寫有李卓人的名字。據事後了解，飯店中發現人民幣屬實，但遺棄的另有其人，李卓人稱對此不知情。

隨李卓人安然抵港，香港人虛懸的心稍稍踏實，但甫下飛機的李卓人說得好：他只是在過去四、五天擔心懼怕自己的安全，但國內的人又如何？他們要一世擔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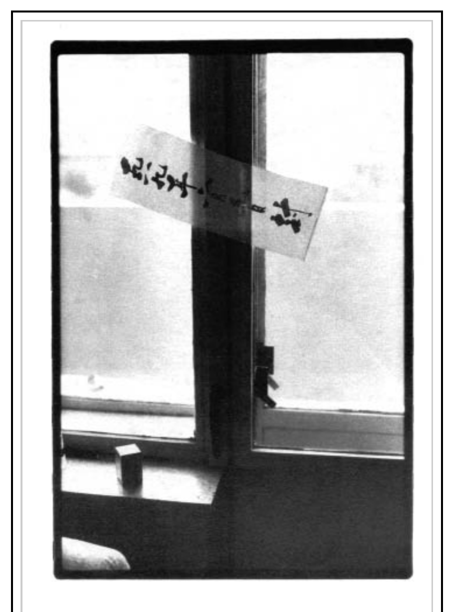
寫於六月二十五日





最後一日

黎佩兒


六月五日北京飯店露台門窗被封。陳木南攝

六月五日，下午二時，我跟另外三名記者走出北京飯店，向天安門廣場另一方向走，即東長安街。那時廣場附近仍有軍隊駐守，並不時向靠近的群眾放槍，記者估計難於靠近。

從北京飯店往左直去，首先經過王府井大街，這條熙攘大街在戒嚴後，商店已不營業，這段路顯得更寬闊，路上橫著一個木牌，上書大字「血債要用血來還」。

經過人行隧道，這就是六月四日凌晨，我曾目睹裝甲車向隧道內躲避的人群掃射；旁邊的路牌，在黑夜中被大炮擊中，整個都燒焦了。

我們走得很快，邊走邊四處顧盼，留意有沒有軍車經過，或公安模樣的人物在附近。

行人路被裝甲車、坦克車壓得凹陷不平；路邊被削去大半石屎。橫著路中心作為路障的石墩和交通標誌，被裝甲車車輾作粉末，馬路可見清晰的裂痕。柏油路承受不了數噸重的坦克車、裝甲運兵車的負荷，路面留下條條傷痕。

沿途仍可看見燒焦的公共車橫在路中，它們是被憤怒的人群燒的。路旁一些樹木給連根拔起。

也有些賣汽水、香煙、茶葉蛋的小商號打開一扇門營業，也有人和鄰家低聲議論局勢。

沿途可見牆壁的子彈洞洞，積瘀的血痕，血斑深藏在樹身、路旁、沒有被早一天的大雨清刷盡。

我們問一些背著包包的外省人，他們剛下火車，不知北京發生巨變，有些並在燒焦公共汽車的廢鐵旁拍照留念。

在東單附近，突然有人群衝過來，邊走邊喊「軍車」。我們也隨人群跑，蹲在路邊看動靜，軍車似乎從東邊開過來，我們再跑，入了死胡同，跑出來，欲衝入一個小劇場暫避，裏面的人立即來關門，說：「你不是我們單位的。」我的一條腿伸了進去，被木門夾著，好不容易才拔出來，同行的拉我走，躲在樹後。軍車繞過三輛燒焦的公共汽車，筆直向長安西街駛去，群眾才從隱蔽處出來。

之後，我們提高警惕，邊走邊留意附近有沒有可躲避的地方。攝影記者拿出相機，也不對焦，估計距離按下快門，馬上就離開。

到了國際大廈附近的二環路，這裏靠近大北窰，是其中一個軍隊囤駐地。二環路立交橋上約有十部軍車停駐，都被燒了。市民說是中午時分起火的，一說是軍人燒的，一說是給市民燒的。橋下駐紮大批軍人，部分站崗，數個蹲在水道旁，以污水洗手。

陽光很猛烈，二環路、日壇路（通向使館區）附近一帶很平靜，市民騎車穿過烽煙四起的軍車附近。濃濃的黑煙籠罩了大半個天空。

我們折回協和醫院，這醫院在王府井附近，比較靠近天安門廣場，是屠城後最早住滿死傷者的醫院之一。

醫護人員把守著前門，鐵閘牢牢的關著，探病需先講出名字，在傷病者名單對號，才可入內。我們拐到醫院後邊的停屍間，和醫護人員閒聊，他們最初講得很平淡，避談細節。其中一個市民踏著大板三輪車過來領屍，屍體用藍碎花布床單裹著，上覆紙皮，捲伏在大板車上，我們追上前去，欲到那人的家，那人擺擺手，只問「東四」在哪裏，一臉木訥迷惘。想必又是一名好心的市民，為死者家屬到來領屍。

停屍間門前，傳來陣陣防腐劑味道，另一名年青的工作人員靜靜地告訴我們，他們已接到傳達文件，軍隊日內軍管醫院，料必是要趕盡殺絕。

他低聲地說：醫院盡快醫治傷者，然後將他們送到別的地方。也沒所謂手術室了，太多傷者，連走廊都躺滿，醫生口罩也沒帶，就在走廊幹起來。

「手術室內，一邊堆滿傷者，醫生把傷勢太重的放在另一端，那些也就無法救活了。」

「醫生眼睛通紅，邊搶救邊喃喃自語，說：瘋了，瘋了。情況比絕食期還要厲害，軍隊連達姆子彈也用上了，炸得老百姓面目模糊，肢體不全，不成人形。」

他說：部分屍體送來時是血肉模糊，被裝甲車輾過。一名男記者聽時忍不住哽咽下淚。

他說：從天安門廣場送來的死傷者絕少，場內的人肯定給「處理」了。六月四日大屠殺後，即時送來的傷者不多，今天（六月五日）才陸陸續續送來。市民太好了，都把傷者抱回家，不敢交出來，但重傷者也就救不過來。有些連屍體也放在家中，過了一天翻出學生證，才敢送回學校。

回到北京飯店，已是傍晚時分，第一批撤離北京的香港記者，在首都機場，以無線電話來電，力勸記者離去。他們威脅說：港龍專機下午七時左右起飛，一定要等到全體記者到機場才起飛。

電話不斷響起，最後一班留京記者的心死寂，每個記者對局勢有不同的判斷，對工作也有不同的理解和承擔，最後答應作好遷離北京飯店的準備，首批記者才安心地登機。

屠城之後，曾傳出軍隊將進駐北京飯店，因這是較理想的軍事哨站，戰略制高點。北京飯店是長安街上較高的建築物，臨街大樓既可俯瞰東西長安大街，也可遠眺天安門廣場。

七時，我們下樓到東大廳晚飯，服務員端上套餐，戒嚴後期北京物資短缺，餐廳已不供應菜單上的菜。

服務員換上便服，他們都佇立在長窗旁，窺看街外情況。街外不時傳來卜卜槍聲，他們說部長叫他們八時下班，明天可能不用上班。

大堂兩旁的咖啡座已清理好，原先擺放得錯落有緻的座椅、茶几都疊起，堆在兩旁，騰出大量空間。整個北京飯店空偌偌的，燈火大都關了，住客都疏散了，只餘我們數名記者，儼如淪陷國度。

回到房間不久，服務員進來，奉命封閉通出陽台的窗戶，封條上書「八九年六月五日封」，也沒蓋章。

服務員說此舉不是奉公安局的命，純粹是北京飯店擔心住客安全，戒嚴期間，為防住客出陽台受傷。

事實上，六月五日下午一時許，軍車開進長安街時，曾向北京飯店樓上放槍，我們隔壁房間的玻璃鏗鏘碎落，猶如我們的心。戒嚴後期，這個臨向長安大街，位處較高的房間已受到公安人員注視。日前曾經有一個不明身份的人進來，勒令記者遵守戒嚴令規定，不得出去陽台，後記者據理反駁，謂戒嚴令沒該規定，並要求該人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才不了了之。

六月六日凌晨之後，電話不斷地響。第一批香港記者回港，受到英雄式歡迎，部分在電視台即時現身說法，描繪北京險境。留京記者所屬報社、親友收聽消息之餘，聲淚俱下急電記者回港。首名港人被扣，他是李卓人，代表香港支援組織，攜巨款到北京支持學運。

凌晨一時許，長安街異常寂靜，北京飯店對開一段路突然燈滅，數輛軍車、裝甲車、吉普車開至，停在飯店門前，軍人大喊：「出來、出來！站住、站住！」

有人被抓，隨著是槍聲卜卜，被「正法」的人應聲倒地。吉普車及軍車追到王府井對開的台基廠大街，然後是然巨響，途人慘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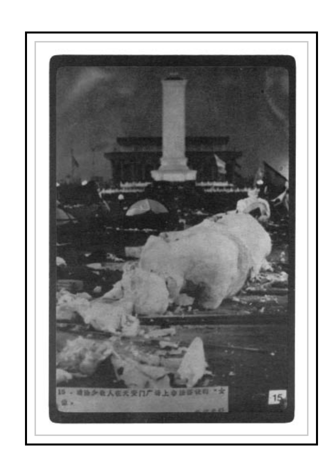
我們掀開封條，爬出窗外，全伏在陽台地面，在欄杆縫往下窺，漆黑中仍可看到子彈的火光，人影惶惶。我們都屏息，軍隊極可能開進飯店來。

凌晨三時，我們以字條傳遞訊息，筆錄如何安排撤離。路經大堂的記者，在漆黑中被公安人員以強力電筒照射斥喝查問。

徹夜收拾，把名片、文件毀滅，房間充斥燒焦文件、稿件的焦味，煙火薰得眼睛迷糊，終於也要離去，這夢囈的北京城。

寫於八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解放軍鏡頭下的天安門廣場，及所謂的「反革命暴亂」。這組圖片自北京街頭佈告板上翻攝。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人民不會忘記"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黑日（六月八日以後）

鞭子底下有咆哮，

被污辱的有仇恨，

窮苦的人有骨頭，

哭泣的天空有響雷，

打抖的冬天有春夢，

血汗流溉的地有不凋的花，

苦難的中國有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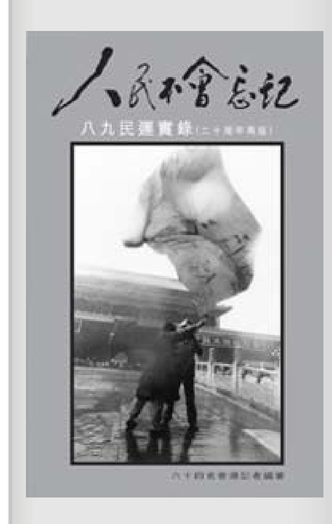
——青勃（1949年前）



中共政府進行全國性搜捕行動。 中央電視台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白色恐怖，顛沛流離

盧永雄

子彈和坦克粗暴地撕裂中國人民對政府的幻想。六月四日的屠殺既在人們的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人們明知政府的鎮壓始終會到來，卻料不到是那麼暴烈。子彈改變了遊戲規則，當權者也變得肆無忌憚，大力發動專政的工具，傳媒系統企圖清洗人們的思想，而公檢法機關則全力搜捕不同政見者。當權者向手無寸鐵的民運分子發動一場生與死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瀰漫全國。

在「六˙四」事件發生後一個月，局勢仍是變動不定，有跡象顯示，高層在初期尚未完全控制大局，軍隊內不同派系傳出有零星的衝突，全國各地的抗議活動亦未平息，官方盡力去穩住局面。

屠殺後的混亂

大屠殺後的七日內，中國高層的領導人未有露面。美國總統布殊表示，他也無法與中國高層領導聯絡上，未知誰在領導中國政府。由此可見當時中國高層政局仍未底定，支持血腥鎮壓的領導人正在謀求共識。

期間陸續傳出鄧小平死亡、李鵬下台、李鵬中槍、楊尚昆外逃等消息，事後判斷該等消息大多只屬謠言，甚至有中國留美學生承認放出假消息，逼那些領導人露面。無論如何，假消息更添撲朔迷離氣氛。

軍隊內的矛盾也暴露出來，傳聞負責天安門清場的二十七軍和負責保衛首都的三十八軍，曾一度爆發零星的衝突；各軍的調動更有對峙的態勢，致使「六˙四」之後數日北京城仍籠罩在緊張的空氣中。

民間的抗議行動在初期仍繼續，特別在屠殺後的一兩天，北京屠城軍雖已亮出屠刀，但市民卻似視死如歸。他們冒死呼叫「軍隊受騙了」，但無情的子彈卻即時穿透呼喊者的胸膛；青年王維林站在一長列坦克前擋路，英勇的形象傳遍世界。此外，上海、武漢、長沙、西安、杭州、瀋陽、廣州等地也有大批市民上街抗議，更有攔車、臥軌等事件。

儘管高層鬥爭和民間抗議仍末平息，但強硬派在屠城後，已立刻發動宣傳和搜捕的攻勢。宣傳重點是為整件事件定性，把殘暴鎮壓民運行動說成「平息反革命暴亂」。

六月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指出：「一個月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蓄意製造動亂。從六月三日凌晨起，這種動亂已經發展成為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亂。」而反革命暴亂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主要是極少數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的人、與海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人，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

六月七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和戒嚴部隊一位政治部主任張工向記者揭露所謂反革命暴亂真相，袁木透露事件中的傷亡數字可謂語出驚人，他指出，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多人，暴徒及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受傷二千多人，各類人士合計的死亡人數近三百人，另有四百名官兵失蹤。至於北京各個大學死亡的學生則有二十三人。

張工並指出，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的過程，即凌晨四時半至五時半之間，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群眾，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張工說，當時社會上流傳著一個說法叫做解放軍「血洗了天安門廣場」，還有傳說打死了多少多少人，並且在天安門廣場焚屍，這純粹是謠言，根本沒有這種事情。

官方公布的「真相」和事實顯然相距十萬八千里。就死傷人數而言，官方完全封鎖資料，後來更禁止醫院向外界透露死傷數字。但據《文匯報》報道：有一間北京醫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說，袁木無恥地歪曲事實，單單他的醫院搶救無效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已達二百多名。

截至六月五日，據中國紅十字會抽樣統計的資料，北京各大醫院統計的市民和學生死亡總數超過二千人，其中未包括在天安門廣場內遭殺害的學生。據《文匯報》和《明報》報道，北京醫務人員透露，廣場上遇難的學生沒有被送往醫院，軍人在廣場架起鐵架，就地把屍體焚化。

另一方面，官方的搜捕行動已在大屠殺前悄悄地全面展開。

「北高聯」秘書長郭海峰早於六月三日晚被捕。北京市面也貼出一些尋人廣告，刊載被尋者的資料，要求市民撥電通知。

六月七日美國電視台報道，著名不同政見分子方勵之及其妻李淑嫻已躲進了美國駐華大使館避難。不少著名知識分子在六月四日後立刻失蹤，有些是遠走他方，亦有些已被暗中拘捕。

局勢初定豺狼笑

屠城後七天，北京高層局勢已由強硬派全面控制，開始對付民運人士，逐漸大造輿論，而大搜捕亦公然展開，當權者有意製造緊張空氣，企圖以白色恐怖鎮住全國。

六月八日，即在傳出李鵬被侍衛開槍受傷後兩天，李鵬和國家副主席王震看望戒嚴部隊官兵，新華社的報道指李鵬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去慰問，由此可見李鵬當時已取得黨高層較一致的支持。

六月九日，中央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終於亮相，慰問戒嚴部隊，人們不得不相信屠城事件由李鵬和楊尚昆發動，但鄧小平才是幕後的最大黑手。鄧小平亮相也掃清關於他病重或死亡的謠傳。

由於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萬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等一起出席了六月九日的慰問活動，使人相信中共高層已統一了思想，而趙紫陽及胡啟立等未見露面，顯然已被擯出局。鄧小平當天的講話寫成文件向全國轉發和傳達，成了統一思想的基礎。鄧小平四月廿五日的指示起了一錘定音的作用，「六˙九」講話則為八九年的民主運動譜上休止符。

在其後半個月內，官方的輿論機器要徹底改變人的思想，公檢法系統則大肆進行搜捕，務求斬草除根。

公開大搜捕始於六月九日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表的四個通告。通告指「北高聯」和「工自聯」皆是非法組織，其領袖必須立刻投案自首。為擴大搜捕行動，當局設立舉報電話，呼籲市民舉報暴亂分子。

當局於六月十三日通緝二十一名「北高聯」的領袖，被通緝者以王丹為首，包括吾爾開希、柴玲、馬少方、楊濤、封從德等。六月十五日官方通緝北京「工自聯」領袖韓東方、賀力力、劉強三人。北京當局先後只公布了上述二十四人的通緝名單，事實上他們要追捕者遠較公開的名單為多，例如要通緝的知識分子名單便沒有向外公布。當局只公開通緝兩名知識分子，他們就是躲在美國領使館的方勵之、李淑嫻夫婦，指他們犯了「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向記者談及此問題時，一時說溜了嘴，竟說對二人下了格殺令，其後才更正為通緝令。

在公安機關厲行搜捕下，「北高聯」的領袖紛紛落網，包括熊焱、周鋒鎖、馬少方、楊濤、劉剛和熊煒。

「工自聯」方面，被通緝的劉強於十五日落網，另一工人領袖劉煥文也同時被拘。此外，官方只公布拘捕了「工自聯敢死隊」骨幹李江。官方似乎有意不張揚拘捕「工自聯」首腦，由於中共向來忌憚工人參與反政府行動，使人懷疑官方可能已秘密處決了不少工人領袖。

官方幾乎沒有公布逮捕知識分子的情況，正式公布已拘捕者僅劉曉波一人，但有消息報道曹思源、李洪林、戴晴和包遵信等知識分子已被捕。

快捕快訊，斬草除根

檢察院和法院亦和公安局的行動互相配合。最高人民檢察院早於六月七日及十一日連續緊急通令全國各檢察機關，在當前非常時期，對「反革命分子」做到快捕快訊，只要基本證據確實，便不必糾纏細節，通知稱「這是中國檢察機關面臨的一項突出重要的任務」。

最高人民法院於六月二十日發出通知，要求各級法院要及時依法審判進行反革命暴亂及製造社會動亂的反革命分子和嚴重刑事犯罪分子。通知規定對三類人要依法嚴懲，包括極少數策劃、煽動反革命暴亂及社會動亂的犯罪分子，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首要分子和骨幹分子，猖狂進行打、砸、搶、燒、殺的嚴重犯罪分子。

在快捕快訊、從嚴打擊的通令影響下，上海法院最先發難，判處三名工人死刑，工人徐國明、卞漢武及嚴雪榮被控於上海鐵路道燒毀一列火車，焚毀警用摩托車及破壞交通設施。但目擊者指他們是在目睹六名學生攔截列車不遂被輾死後才這樣做。法院當然不會聽這些申辯，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於六月十五日判他們死刑，二十日上訴無效，二十一日在上海市普陀區刑場被槍決，距離判處死刑的日期只有六天，法院行事速度之快使人吃驚，當局還組織了三千人參觀審判。

儘管西方國家強烈譴責中國迅速處決民運分子的行徑，但中國置若罔聞。據公布的資料顯示，北京法院判七人死刑，濟南判十七人死刑，至六月底已有共二十七人被槍決。由於後期不再公布判刑的情況，究竟總共有多少人被處死刑，實無從統計。但據非官方估計，截止六月二十四日，政府在屠殺後

二十日內已拘捕了二千人。大搜捕還一直在進行，至七月，估計最少達至五千。

為配合搜捕行動，公安當局要求公民更換在六月二十日以前發出的出境登記卡，此舉顯然是要重新審查過去已批准的出國申請，防止民運分子外逃。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就是憑正式護照於六月六日經深圳、香港到巴黎去。

謊言千遍掩蓋真象

另一方面，在政局趨向穩定後，傳媒系統也全面發動起來，宣傳重點集中幾點：第一，大事宣傳所謂反革命暴亂真相，並宣揚傷亡軍人的「英勇」事績。第二，攻擊民運分子和學生組織，方勵之、劉曉波、「北高聯」成為主要攻擊目標。第三，宣傳新的意識形態綱領。特別是鄧小平的「六˙九」講話，更要求全黨學習。

在屠殺後不久，官方媒介宣傳反革命暴亂真相。六月九日，中央電視台播放一些「目擊者」的訪問，指天安門廣場沒有開槍，也沒有傷亡。同日新華社轉發北京市委宣傳部撰寫的《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事實真相》一文，指「暴徒」殘殺解放軍，大搞打砸搶。

中央電視台製作了《清理天安門廣場紀實》和《北京暴亂真相》錄影帶，發給一百六十二間中國駐外使館及多家外國電視台，其中有軍人屍體被焚的鏡頭，有軍車被燒的鏡頭，並展示了阻攔戒嚴部隊入京的人群及戒嚴部隊受襲的情況。

官方亦大力宣傳解放軍的「英勇事蹟」，例如在崇文門立交橋菜市場，一個解放軍被燒焦後掛在車旁。現場群眾說他是殺了三個人後，群眾激憤地把他打死，而官方卻說他是被暴徒襲擊，因為堅持不開槍才被打死。後來中共更對十名在「六˙四事件」中死去的軍人頒發「共和國衛士」的榮譽勳章。

官方傳媒同時對外國及港澳媒介大加攻擊，指他們造謠生事。新華社轉發了一名港商去信北京當局支持「平亂」的消息。《人民日報》海外版又刊登「沙田五居民」、「香港十二青年」等讀者來信，支持北京當局的做法，更間接警告「香港人不要做救世主」。七月下旬《人民日報》還不點名地指責身兼立法局議員和基本法起草委員的李柱銘和司徒華，說他們領導的「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是在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破壞一國兩制。

官方在大量製造輿論的同時，清洗離經叛道的傳播機構。曾有上百員工上街的《人民日報》首當其衝，被迫改組；原《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總編輯譚文瑞被撤職，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高狄被任命為社長，《解放軍報》總編緝、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邵華澤調任為總編輯。而《新觀察》及《經濟學周報》則被勒令停刊。七月下旬外國通訊社報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被停職，原因說他不同意指學運為「動亂」。中國分析家普遍視杜導正為一個頗保守的人物，在八七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時，走馬出掌該職，到今天也保不住了。

官方傳媒也不放過打擊民運分子的機會，而最厲害的打擊方法便是大量宣傳民運分子被捕的消息。在螢光幕上可見，被捕民運分子多被公安扣緊兩手，捏住後頸，不少更被抓住頭髮面向鏡頭，只見有些民運分子已被打得臉青鼻腫。接著是判刑的消息，顯然藉此威嚇民眾。

一名在京的大連市採購員蕭斌，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電視台訪問時，描述了天安門廣場的血腥事件，說軍隊又用槍打，又用軍車軋學生。結果官方截收了電視衛星訊號，在中央電視台播放出來，指蕭斌為造謠者。結果他遭舉報，迅即在大連被捕，法院判定他犯上反革命煽動罪，判囚十年。

中共又加強攻擊和詆譭離心知識分子。中國的電台和電視於六月十一日反覆播出一則沒署名的評論，指方勵之是一名叛徒。《人民日報》六月十四日的一篇本報評論員文章，指控方勵之是暴亂策劃人。其後不斷出現咒罵方勵之的言論。北師大講師劉曉波也被點名批判。《人民日報》六月十六日有署名文章題為《抓住劉曉波的黑手》，指「劉曉波是反革命暴亂的陰謀組織者，他的反動思想和駐美國的『中國民主聯盟』「一拍即合」」。

此外，在通緝名單之首的北大學生王丹被多次批判。官方認定王丹和方勵之關係密切，所以對他火力特強。官方媒介多番指控王丹受方勵之和李淑嫻操縱搞動亂，意圖推翻政府。另外，中央電視台播放了偷拍吾爾開希吃飯的片斷，指他在同學絕食時大吃大喝，但同席的香港學生卻駁斥那次是他們請吾爾開希吃飯，而且是在絕食結束之後。官方刻意醜化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已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

發動宣傳機器的另一個目標是樹立理論，為殘暴的鎮壓行動進一步製造合理的基礎，重提「階級鬥爭」理論更使人注目。

雖然在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共官方從未完全否定階級鬥爭理論，但已極少在官方文章中重提，社會上出現的所謂「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年底）或「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九八六年底），只被視為受到外來文化的污染，並未上升到階級鬥爭、敵我矛盾的地步。

《人民日報》六月廿三日題為「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社論，指出要研究階級鬥爭的新特點，暗示「暴亂分子」是階級敵人，鎮壓他們自然順理成章了。

鄧小平「六˙九」講話也成為思想教育的綱領，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社論指鄧講話是統一全黨思想

的綱領性文件。社論承認「有些同志的思想扣子沒解開，對某些問題思想還有混亂，但要以鄧的講話作思想武器，排除干擾，戰勝一切困難」。

中共新班子力改形象

中共第十三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終於在六月廿三日召開，選出新領導班子，中共要為新班子建立較開明的形象，而且政治運作亦日漸正常化，故此對民運分子的打擊也由明轉暗。

中共高層經過一番鬥爭和醞釀後，在四中全會選出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任中共黨總書記，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和中共組織部部長宋平加入政治局常委會。另一方面，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溫家寶和閻明復等則被撤職。趙紫陽被指「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由於趙拒絕承認，所以中全會只好決定繼續進行審查。

新班子完全由「總設計師」鄧小平一手締造出來，據《文匯報》報道，鄧小平早在五月三十一日已特意對李鵬和姚依林發表談話，指出新的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有改革的希望。如果他們提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殘暴的班子，將來便很容易出事。

鄧小平顯然不止顧慮人民的意見。在解決了人民對中共權位挑戰這個首要問題後，鄧小平又開始懼怕經濟改革政策不能得到貫徹。所以他選了江澤民和李瑞環，希望新班子能夠「兩手抓」，既堅持四項原則，也著手改革開放。

鄧小平的「兩手抓」理論顯然是中共統治的主導意識形態基礎。《人民日報》六月廿五日社論明確地闡釋了這種觀點，社論指四個堅持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兩者缺一不可。社論相當強調中國不是要「收」，不會再走回閉關鎖國的路。

由於四中全會以後，中共不再公布民運分子的被捕名單，所以也難以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捕。傳聞學運領袖王丹在接觸台灣《自立晚報》記者黃德北後被捕，但直至七月下旬仍未見公布。

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提交人大常委會的平息反革命暴亂報告中，點了大量中國知識分子的名（見另表）。

已知民運分子逃離中國的，包括學運領袖吾爾開希、李錄和沈彤等；知識分子計有嚴家其、蘇紹智和萬潤南等。

何日見黎明？

中國表面上逐步走回常軌，但「六˙四」屠殺後的一個月，冤獄和謊言暴露了當權者專權獨裁的本質。

政府傳播出來的謊言被海外看成一個個的笑話，袁木說現代科技可以造出幾千呎的錄影帶來歪曲血洗天安門的事實。李鵬說水炮和催淚氣不夠，才用真槍實彈對付群眾。

中國正踏入黑暗時代，問題是黎明何時到來。當權老革命家正圖建設一個經濟繁榮但政治專制的國家，老人們正努力實現夢想，他們既然進行了大屠殺，已經不能後退，以後再遇到民運分子的挑戰時，自然絕不手軟。

但鄧小平總算說對一個規律，學潮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的小氣候造成」，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是遲早都要來」。但他卻看不到一兩個老人在歷史滾滾洪流中，轉眼要遭掩蓋埋葬的事實，這也是不以他們的意志而轉移的歷史規律。

被通緝學生名單

北京市公安局六月十三日發出通緝令，追捕下列廿一名「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學生領袖：

姓名	性別	年齡	所屬院校	備註
王丹	男	21	北京大學歷史系	被捕
吾爾開希	男	21	北京師範大學	維吾爾族人 逃往海外
劉剛	男	28	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生	被捕
柴玲	女	23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研究生	

周鋒鎖	男	22	清華大學物理系	被捕
翟偉民	男	21	北京經濟學院	
梁擎暾	男	20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	
王正雲	男	21	中央民族學院	
鄭旭光	男	2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被捕
馬少方	男	25	北京電影學院	被捕
楊濤	男	19	北京大學歷史系	被捕
王治新	男	22	中國政法大學	
封從德	男	22	北京大學研究生	
王超華	女	37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	
王有才	男	23	北京大學物理系研究生	
張志清	男	25	中國政法大學	
張伯笠	男	26	北京大學	
李錄	男	20	南京大學	逃往海外
張銘	男	24	清華大學	
熊煒	男	23	清華大學	被捕
熊焱	男	25	北京大學法律系	被捕

*被捕者以官方公布為準

（寫於八月廿九日）

被點名知識分子名單

北京市長、政治局委員陳希同六月卅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點名指責下列廿三名知識分子，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據報道，當中已有一些人被捕：

姓名	性別	簡介	備註
方勵之	男	北京天文台研究員、天體物理學家	躲在美國大使館
李淑嫻	女	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北京海淀區人大代表、方勵之妻子	躲在美國大使館
戈揚	女	《新觀察》主編	流亡海外
蘇紹智	男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研究員	流亡海外
金觀濤	男	《走向未來叢書》副主編	暫在香港
嚴家其	男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逃亡海外

鮑彤	男	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原趙紫陽秘書	已被革職
張顯揚	男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研究員	
包遵信	男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胡平	男	中國民主聯盟主席	留學美國
劉曉波	男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	被捕
陳軍	男	卅三人聯署要求釋放魏京生之一	暫居美國
任畹町	男	人權同盟」組織者，七九年西單民主牆民運分子	被捕
陳子明	男	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	
萬潤南	男	四通公司總經理	逃亡海外
李洪林	男	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戴晴	女	《光明日報》記者	
于浩成	男	前《群眾》出版社社長	
李澤厚	男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蘇曉康	男	北京廣播學院講師、《河殤》撰稿人	
溫元凱	男	中國科技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	
劉再復	男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	
曹思源	男	四通公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	

據香港《文匯報》七月廿一日報道，國家新聞出版署已禁止出售流通下列十人的作品。他們是嚴家其、劉賓雁、包遵信、方勵之、李淑嫻、蘇曉康、萬潤南、王軍濤、陳子明、陳一諮。

（寫於七月廿一日）



疑惑、壓抑、等待

黃漢軍

京城內外憂

六月四日凌晨北京城內的排排槍聲和陣陣硝煙，激起香港市民的齊聲怒吼，聲勢浩大的百萬人上街遊行，揭開了香港愛國運動歷史上新的一頁。但是，當人們翹首遙望北方的神州大地，那裏卻是萬籟俱寂，鴉雀無聲。

難道說，大陸上的十一億同胞都被那坦克和機槍嚇怕了？又難道，他們對民主、自主的良知和追求就此泯滅了？「鴉雀無聲」意味著的是愚昧？懦弱？還是什麼？

屠城之後的一天，在素稱是中國「南大門」的廣州，筆者看到兩名親戚為北京的事情爭吵不休。兒子在朋友的家中看到香港的電視新聞報道，跑回家對母親說：北京出動了坦克和機關槍鎮壓學生，天安門廣場上血流成河，慘絕人寰。但母親聽罷當即嚴詞教育他不要聽信謠言，因為中央電視台和電台說得很清楚，那是鎮壓反革命暴亂，而且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過一個人。當筆者將自己在北京城親眼目睹的幕幕慘情，向母子倆訴說後，母親的眼圈紅了，淚水在眼眶中轉動良久，但最終還是搖搖頭，半信半疑。

類似的事情，筆者在與香港僅有一水之隔的深圳也遇到過。按道理說，深圳人消息靈通不亞於香港的市民，他們幾乎每家每戶都可收看到香港的電視，隨時可收聽到香港及外國的電台廣播。但是，當一次筆者與一位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深圳朋友談起六月在京的所見所聞時，這位朋友不厭其煩地詢問許多問題，反覆核對每一個細節，思慮良久，最後他也是搖搖頭，不盡相信。

筆者明白上述的廣州親人和深圳友人的心境，與其說他們不相信，倒不如說他們不願相信和不敢相信。的確，誰能夠相信一個政府竟會出動十幾萬軍隊和上百輛坦克，去鎮壓幾萬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誰又會相信自己信服了四十年，而在近十年來正帶領人民逐步走向光明、開放的政府，竟然會在一夜之間變成屠殺人民的劊子手？

在遠離京城的南方，看到的是市民的疑惑。然而，對於親身經歷過血與火洗禮的北京市民，卻是壓抑和期待。

在真正實施戒嚴令之後，北京市民過的是槍口下的生活，儘管生活秩序已經逐漸恢復正常，但是人們的心情卻難以平復。在一片肅殺的「秋後算帳」聲中，追緝令、處決公告在機場、火車站、碼頭及大街上到處可見。舉報熱線電話的設置，更令市民說話也不敢大聲，人心惶惶，各自提防，好像又回到了文革時人性扭曲的那段日子。

筆者曾經在六月屠城後重返北京，看到在當局的槍桿子加筆桿子的雙重壓力下，北京市民失去了在五、六月間曾經擁有過的「講真話」的自由和權利。一篇篇所謂「反革命暴亂真相」的文章，一個個表態效忠的會議，充斥著所有新聞輿論媒介，人們要麼閉起嘴巴不說話，要麼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或者昧著良心說謊話。

一名在北京生活幾十年的朋友，對筆者分析了時下北京市民的幾種心態：一種是主張「以暴制暴」。這些大多是北京屠殺事件死難者的家屬、親友，或是本身在事件中受到傷害的人，他們對生與死已不在乎，對當局只懷著一股仇恨，時刻尋找機會向軍人或政府官員報復。他們是一群復仇主義者，但只是市民中的極少數。

另一種抱的是獻身民主精神的心態。他們是一些曾經在學運期間勇敢爭取民主、自由，大膽地提出過自己的一套治國方略的知識分子，包括部分首都新聞界人士。目前他們正面臨著大整肅的風波，隨時有被捕、坐牢甚至被處決的危險，但他們毫不畏懼，決心為中國的民主事業獻身。他們是精英，但在市民中也只是少數而已。

至於絕大多數市民，現時的心態則是壓抑、害怕及等待。他們當中大部分人在五、六月學運高潮時，曾經參加過遊行，叫喊過「打倒李鵬」的口號，有些甚至還堵截過戒嚴部隊的軍車，如今雖然未必會遭到整肅，但交代、檢討思想則免不了。在學運被強行鎮壓下去後，他們的政治熱情也就消失了。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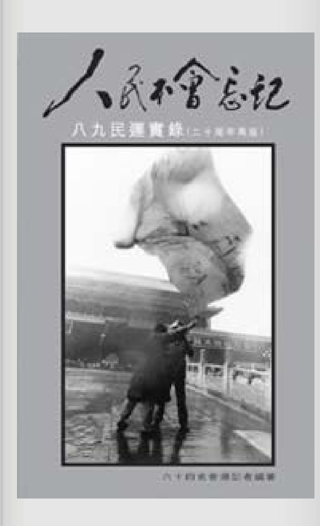
加上軍人、武警當道，誰也不敢再多說話了。因此，許多市民採取了「避之則吉」的策略，下班後即趕快回家抱抱孩兒，或者三五良朋自成「麻派」、只顧「四方城」內的春春秋秋，不去管那窗外的風風雨雨。

不過，儘管各人自掃門前雪，但是仍然經常交換訊息。在平靜、沉悶之中，人們似乎仍在期待，期待著什麼大事情再發生。

在北京拜訪朋友後，臨別時筆者向朋友道聲珍重，而朋友卻回覆一句：「好好活著吧！」

「好好活著吧」，好一句令人心酸的道別語，但筆者明白朋友的語意：是的，無論如何艱辛，都要好好活著，活著我們就可以看到美好的明天！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校園風雨後

陳天權

北京的高等學府在當局暴力鎮壓民主運動之後，已歸於平靜。較早前貼滿佈告欄、校舍和其他樓房的大小字報，已被撕得殘缺不全，但留在學生心中的民主意識，仍然可以從他們的說話中體現出來。

北京高校在六月份陸續宣布放暑假，但仍有少數學生住在學校的宿舍內。他們大部分是應屆畢業生，在踏入社會工作之前，都要留在校內接受為期三周的政治思想教育，撰寫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心得。學生若不回校參加學習，將無法畢業，甚至已分配好的工作也會喪失掉。

至於其他留校的同學，有些是被校方召回審查，交代六月三日至四日曾做過的事情。他們大都曾經交代在某段時間參與過學生組織活動，或撰寫過學運文章和廣播稿等。

中國政法大學一名學生說，學校基本上是保護學生的，若果學生被認為犯了「錯誤」，但沒有參與過北京高校或學校本身的自治會而被通緝，學校方面只會奉命將之留校檢查，寫檢討報告，而不會給予其他懲罰的。

若果學生沒有被當局點名追查，校方索性不聞不問。事實上，北京絕大部分的高校學生都曾參加過遊行示威和靜坐請願，所以當局不可能對這一大撮學生進行秋後算帳。

那位學生表示，政府不想擴大打擊面，激化學生與當局的矛盾，因此舉同時會令很多市民感到不滿。當局在拘捕所謂「暴徒」的時候，亦盡量不把學生捲入漩渦中。

北京師範大學一位學生說，當局現在雖然只通緝學生自治組織的領袖和骨幹分子，但他們擔心這種搜捕行動會由上到下，不知何時會輪到自己被打擊。

因此，一些曾經較為積極參與過民運的學生，都有人人自危的感覺。較早前他們曾經收集過很多由學生自行印製的傳單，現在已經連印刷機一起毀掉。在軍隊鎮壓民眾期間，有些學生也拍了不少歷史性的珍貴照片，但因恐懼被搜查出而先行燒毀了。

一學生說，六月三日軍車被市民堵截的時候，有些軍人為免槍枝彈藥落入不良分子手中，故將之交給學生保管。鎮壓事件發生後，學生便馬上將槍枝彈藥交給學校，恐怕軍隊進入學校搜查。幸好至今軍隊仍未進入北京的高校。但這位學生又說，外地的情況則不同，據他所知，曾有軍隊進入學校搜查。

北師大的同學說，較早前公安人員曾到學生領袖的宿舍房間搜查，帶走一些東西。而政法大學的學生則說，除了公開被通緝的學生領袖外，內部仍有一份通緝學生名單，他獲知政法大學已有十多名學生被抓。因此，一些曾經在學運中較活躍的學生，目前都忐忑不安，不敢回校。

據悉被抓的學生，在問話之前，先餓了半日，然後再一輪毒打，問話後發覺沒事便釋放，不過卻被警告不准透露曾被毒打。若果問話後證明有罪，輕者會影響學生畢業後的工作分配，重則可能入獄。

一位學生表示，不可低估國家安全部的能力，他們對活躍學生的行動暸如指掌，搜查了很多資料、照片和錄音，才對學生進行審查。若果學生未能清楚說明六月三日至四日的活動，就會受到懲罰。

還未畢業的學生，現在大都離開北京，他們將於暑假後回校上課。但曾經參與學生運動但未被通緝的學生，則要面臨是否回校接受審查的決定了。

暑假中仍然留在學校的學生，都知道目前形勢已不容許他們再發表意見，故此大多保持沉默，不想談往事。情緒無從發洩的學生，只好寄情於吃喝玩樂，或者努力把英文唸好，爭取出國留學，甚至希望可以在外國定居生活。

一位北京大學的畢業生說，群眾的意願現在基本上給壓住，很多遠離北京而文化素質低的人，根本就不關心北京所發生的事件。就如西藏拉薩三月實施戒嚴時，北京很多人都不知原因而沒有理會。另一位尚未畢業的學生說出心中話，他希望畢業後可到美國讀書，若有機會便會在那定居，不管可以做什麼事情。他說：「我們要努力擠上公車，上車後才找位子。」

學生在學習之餘，什麼都不管，連報紙都不想看。中國人民大學一位學生說，政府最近不斷加強平暴宣傳，市民多聽之後會人心浮動，久而久之甚至會相信了官方的一套，令到他們更不敢發表以前的說話。即使私下傾談，也會感到心慌。

他說，這種情況在北京以外更為嚴重，因為外地人大部分都不了解鎮壓事件的真相。有些為了一千元人民幣或以上的獎金，舉報參與過民運的人士，而地方的公安局，在不清楚實情之下，便會處置那些被舉報的人。

表面上看，這些學生感受不到校內和北京曾發生過什麼大事。他們嬉笑談話，定時到飯堂取飯，生活如常。但若果進入其宿舍與他們閒聊時，他們的不滿與無奈情緒便表露無遺了。

清華大學一名應屆畢業生說，他不會忘記這場從古至今都罕有的運動。他指出，要進行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總得有頭頭來帶領。如果有人指學生們被那些學生領袖利用了，他相信大多數學生會甘願被利用的。至於學生領袖背後是否另有人在策劃，他就表示感覺不到。

北京醫科大學一位學生說，今次的民主運動不算很失敗，只可惜死了很多人。他認為學生們現在應靜下來思考，日後若再搞運動也不應太過激烈。對於中央更換了新領導層，他表示不抱希望。他認為學生不是想推翻領導層，亦不想某人下台，只是希望中央能實現民主。他知道中國經過幾千年的封建制度，要一下子改實不容易，但起碼有一個開始。

至於學生今後的動向如何，北京大學的學生說，要看政府怎樣進行改革。若果中央作出大膽的改革措施，回復黨的聲譽，學生就不會再爆發民主運動。他補充說，學生若再進行民主運動，將會升級。

父母事後有沒有責怪其子女參與這場運動呢？該學生說，家裏的人埋怨他們把運動搞得太過份，該撤出廣場的時候卻不撤。但在心裏，家人是同情這場運動的，雖然曾以安全為理由勸告子女不要去廣場，但並沒有否定學生的做法。

北京多間著名大學現在都門禁森嚴，本校師生和員工要戴上校章和帶備證件出入，校外人士到校辦公室要先登記，閒雜人等難以進入校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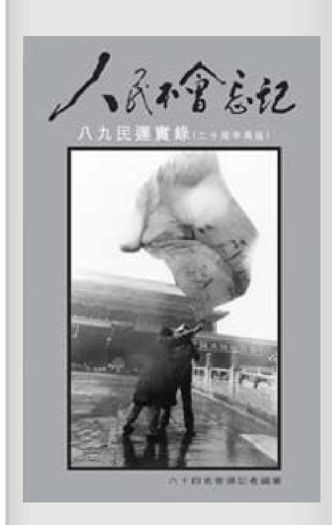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學昔日鬧哄哄的三角地帶，暑假期間靜如止水。要求民主自由和政制改革的大小字報已不復見，代之貼在公布欄的是轉讓、找尋失物和文娛活動通告的啟事。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所張貼的舉報暴亂分子通告，則明顯被人故意撕毀。

北大校方貼出通告說，為了學校安全、學生安全和家長放心，由六月九日起開始停課，何時開學視情況而定。

每間宿舍門口，都張貼了一項學校規定，說明宿舍已經關閉，有需要進入者，要經校方批准，如擅自進入，校方將按有關規定處理。曾經作為北大學生籌委會大本營的二十九樓宿舍，更有一名守門人坐在門口，注視著學生進入。而曾經設有學生廣播站的二十八樓宿舍，則封了左右兩邊側門，只留正門出入。

一位留宿學生說，校舍管理員晚上偶爾還會進入宿舍檢查學生的證件，以防止校外人士或被當局通緝和追捕的學生領袖藏匿於房間內。





南天黑雲罩

陳建平

恐懼，已經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社會心理降臨到每一個清楚知道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一件什麼事情的中國公民頭上。天安門屠城後不久，筆者與友人長談至次日凌晨，當筆者送友人回家的時候，其舉家上下惴惴不安，倚門而待。友人苦笑道：「現在大家都是這樣。」

在大陸，目前有兩種內容絕對對立的消息，以兩種截然相反的方式在社會上傳遞。一種是政府的宣傳，堂而皇之地佔據了所有的電視、廣播、報刊等陣地，大展攻勢；另一種是一些悄悄地從天安門廣場「亡命攝影師」的磁帶和國外電視轉錄下來的錄影帶，以高於一百五十元人民幣的價格，從一個窗簾緊閉的客廳穿街過巷又到另一個窗簾緊閉的客廳。人們在看，在思考，在判斷，那個是真，那個是假……

據筆者了解，內地以北京及其他沿海城市的抵制情緒最大，無論是工人、學生、商販以至國家各機關高級幹部，敢言者甚多，他們似乎是用轉彎抹角的方式表達心中的不滿。

不少黨的高級幹部亦對最近一系列傳達方式表示很不理解，討論時就公開提出疑問：為什麼國家發生了這麼重大的事情，但是至今沒有看到一份正式的中央文件？北京市李錫銘的學運情況報告，是以沒有任何名份的方式進行傳達；李鵬、楊尚昆、喬石、姚依林的講話，用的是中央辦公廳通知的方式下達；取消近期在北京舉行的所有會議的決定，只是由國務院辦公廳電話通知；即使鄧小平在軍委會議上的講話，已經被提到了是「統一思想的綱領性文件」的高度，仍然只是用《中辦通訊》的形式傳達。（《中辦通訊》只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發行於國家機關的一份內部刊物。）人們從中感到很不正常，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中共中央四中全會召開日期一直推遲至六月廿三日，外間分析這與黨的高級幹部認識未能統一有關。筆者從有關人士獲悉的幾件事情，確實多少反映出部分地方黨政負責人的複雜情緒。某省第一把手在該省廳局級黨員幹部會議上傳達鄧小平的講話後便說，現在大形勢就是這樣，也沒有更多的討論餘地。在座的誰想不通，可以先去療養院休息一段時間，別在外面談什麼真實思想惹麻煩。另一省的主要負責人在傳達時也談到：我聲明我不是反對中央決定，但我也不明白，人家學生在五月十九號晚上九點半不是說停止絕食了嗎？幹嗎深更半夜又來一個黨政軍大會？這不又挑起來了嗎？還有一個省的書記在傳達時，被幹部要求提供更多的內部情況，他雙手一攤，晦聲晦氣地說，老實說，我現在知道的跟你們一樣，電視上講的，報紙上說的，想知道更多的情況，你聽「美國之音」去！更多地方官員是借批評北京市之題來發揮的。有個省領導就說，北京市的報告說去年第四季度就發現有壞人要搞破壞，今年二月份也注意到內外勾結的苗頭。既然是這樣，為什麼不及早採取措施，非要搞到動用軍隊，開槍開炮的地步？北京市委對這件事本身就要負責任嘛。

最近，「忍」字，「難得糊塗」的條幅竟然像流行病似的在不少黨政幹部家中張掛起來。畢竟，用髒話私底下罵的日子慢慢就會過去。現在人們對於閻明復屬於「年幼無知」，「還可以留用察看」，江澤民將進入政治局常委取代胡啟立的位置等等一類傳聞也無暇顧及；甚至改革開放也不想再提。人們的思考軌跡正慢慢轉移，當聚焦到國家前景，個人安危的時候，惶惶然不知後路何在的恐懼在折磨著一個月前還懷著小康之夢的中國老百姓。

人們在擔心會不會打內戰。他們這種「末世愁緒」不是沒有根據的。一位幹部告訴筆者，他們討論時就談到，凡舉中外歷史，每當一個國家政治上、經濟上陷入困境的時候，各種矛盾尖銳衝突的時候，製造戰爭是慣常的解脫辦法，中國現在是不是已經到了這一步？如果不是，那難道沒有比將坦克車開進北京城更好辦法了？

一位北京朋友說，中央現在面臨的問題很棘手，黨和人民親密無間的關係、政府與人民相互信賴的關係、軍隊與人民半個世紀以來建立起水乳交融的情感都發生了變化。

共和國成立四十年了，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疑惑。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天涯亡命愁

陳慧兒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二日中午時分，巴黎的上空一片蔚藍，陽光灑地。我們專程來到法國，採訪被中國政府通緝的民運人士，包括吾爾開希和嚴家其等人，他們準備下午在巴黎召開逃亡後首次的記者招待會。

想不到，吾爾開希提前於民主女神像揭幕禮上公開露面。當我聽到陣陣的掌聲和叫喊聲：「開希，歡迎您。」我知道，我們又再在異地相見了。真是恍如隔世！記得最後一次在北京採訪他是五月二十七日，他和王丹、柴玲等一起在天安門廣場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四月廿七日為中國民主自由節，並建議同學撤離廣場。之後發生了「六˙四」屠殺事件，大部分學生領袖都是下落不明，直至六月底，才知道吾爾開希和嚴家其已安全逃離中國。

與吾爾開希前來參加民主女神揭幕儀式的是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婚禮的李錄。他們兩人為了掩人耳目，方便逃亡，都把頭髮剪得短短的。

吾爾開希穿著了一件黑色T恤、牛仔褲、波鞋。他後來告訴我，為了紀念六四事件中的死難同學和同胞，他以後都只穿黑色的上衣。他看來胖了一些，精神也飽滿，但是臉上沒有了笑容。他舉起那代表人民勝利的V字型手勢，向台下陌生的臉孔打招呼，我忍不住上前和他握手，說：「我們又再見了。」

正如吾爾開希自己形容，他這回是九死一生地逃離中國，因為北京政府正四處搜捕他們。

「逃亡的滋味並不好受，誰也不願意逃亡。在逃亡的過程中，我無時無刻不想回到自己的祖國。」吾爾開希這樣描述他當時的心情。

據吾爾開希憶述，六月四日凌晨，當他接到同學被打死的消息之後，由於太過激動，引致心肌炎復發，但是當時他不肯離開廣場，躺在英雄紀念碑的第三層。直至凌晨四時，最後一部救護車的司機要駕車離開，他被人抬進車裏送走。當時他差不多全身癱瘓。

離開醫院後，吾爾開希匿藏在北京幾天，並且想要再次出來，但給身邊的朋友勸止，因為據他們得到的消息，學運領袖一旦被捕，會格殺勿論。

「我以前曾說過，我拚坐十年牢，就算十五年牢我都願意，就是坐牢是堅持鬥爭，出來也是堅持鬥爭，但如果把我們打死......」吾爾開希停了一會兒，繼續說：「當時我知道，我在一定程度，不屬於自己，我是想出去，我說，他們通緝我，我不管他，我想出去。但是他們說不成，你不屬於你自己，你應該保存『吾爾開希』，不是保存你自己的生命。我說好，我聽了他們的意見，我覺得我有義務、有責任活下去，而且有責任把這場民主鬥爭堅持到底，有責任保存每一點點爭取民主的力量，包括我自己的生命。」

吾爾開希抵達香港，獲悉大陸大舉搜捕自七六年以來的民運人士的時候，第二次想放棄逃亡的念頭。

「我當時想，也很幼稚，我覺得應該回中國去，回到大陸去，在這種恐怖的情況下，出來是一種逃命，後來朋友告訴我，這不是逃命，這是繼續革命，但是我不喜歡『革命』這個詞。」

從吾爾開希這幾番話中，不難察覺到，得以逃出生天的民運分子，雖然比起那些死在長安街上，或者被捕的人僥倖，但是他們的內心，仍然是處於無止境的痛苦和悲憤，甚至連最摯愛的家人，也絕不想提起。

再者，他們肩負的擔子亦特別重，就如吾爾開希常說，他們這些活著的人，生命已不再屬於他們個人，他們的生命裏包括了那些為了民主，為了自由，為了美好的祖國而付出生命的同學和同胞們，他們必須要堅強地挺起胸膛、挺直腰板，活下去，直至中國得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吾爾開希和嚴家其等人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不過，相信在一段時間內，他們的行動不可能完全自由；回國的願望也不可能實現。

這批民運人士在巴黎安頓下來後不久，馬上聯同逃出來的萬潤南、蘇紹智，以及正在美國訪問的劉賓雁，倡議成立「民主中國陣線」，希望團結全球華人，繼續以和平的方式，推翻專制。而到了七月下旬，他倆更遠赴美國，出席第一屆全美中國學生學者代表大會，準備籌辦報刊和廣播電台，繼續促進國內民主化。



增訂版序

編輯委員會

本書於九月下旬出版，不到一個月，已售出近二萬本。可見在中國大陸政局暗湧浮現、變化萬千之際，香港人關心國是的熱情並無冷卻。

香港記者史無前例地集合起來編寫這本書，是為歷史作見證。我們不僅寫「六˙四」，也寫「六˙四」前後的局勢及其牽連的種種問題。

《戒嚴部隊調動內情》一篇原在本書大綱之內，因付梓時間緊迫，來不及包容；陳希同的報告內容疑點甚多，當時未及一一核對，故沒有收入第一版內。現在都作了增補和辨正。

正由於當時我們急不及待要「催生」這本書，出版後，發覺內容未臻完善；故初版不久，即著手籌備增訂版。除了上述增補外，編委會更反覆核查資料、修改潤飾全書，務求本書文字準確洗練。

本書作者亦參與修訂工作，編委會發了一次問卷，調查本書作者對自己及其他文章的意見。作者協助了文字校對工作。

「六˙四」後幾個月內，不斷有政治人物公開發言，勸諭眾人淡忘前事。也有一些輿論說經過了幾個月，更多資料冒出，香港人應修訂原來的「情緒性」看法。

北京仍處於戒嚴時期，不歡迎外來記者採訪，大部分新增的資料，源自官方報道。這些資料的可信性難以查證，我們也不打算無休止地增添資料，縱使事態有了新的發展，我們也寧願將那段歷史，盡量如實地凝固在我們採訪學運的那段日子。

儘管緊張的中港關係，使不少人修改原來的看法；可是本書作者沒有否定昨日的我，仍然相信自己的眼睛，堅持當日的觀察和報道。因此，本書的文章大抵維持原貌。

大多人要努力忘記。他們沒有想到，一次又一次重犯錯誤的人，就是沒有從歷史汲取教訓。血的教訓，我們至今不曾忘記。

本書收益將撥入香港記者協會屬下一個戶口，由記協執行委員與本書編委組成的一個小組，決定如何運用這筆款項。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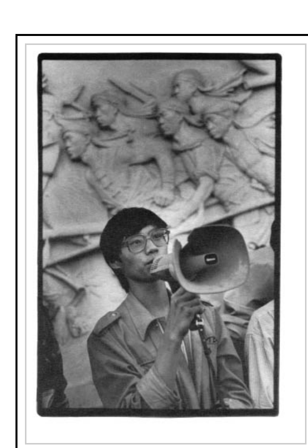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永不言悔的王丹

范卓雲


王丹 葉英傑攝

第一次與王丹話別，是四月初人大政協兩會曲終人散之時。喜不自禁的王丹捧著他的心血結晶──最新出版的北大刊物《新五四》雜誌，方眼鏡下閃露著無比喜悅的神采。

這個一臉書卷氣的廿一歲歷史系一年級學生給人親切隨和的感覺，文弱書生的模樣看去總不像個什麼學生領袖。王丹早自今年一月初籌辦「民主沙龍」開始，已萌起為民主而戰的念頭。他說自己作為新一代的大學生，覺得有責任為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而努力，但他感到自己力量很有限，只能在推動北大民主氣氛的工作上入手。

認識他時，國內知識分子上書要求釋放政治犯的事件在北大校園內亦掀起波濤。同學們在私底下都議論紛紛，王丹更是當中的積極分子。王丹說他並不太了解魏京生，不知他的「反革命罪」是什麼回事，但他是支持釋放魏京生的，因為這是代表一種人道主義精神，對人權的一種起碼尊重。

王丹說話時間中流露天真瀾漫的孩子氣，有些記者形容他看來倒像個中學生，蹦蹦跳跳地奔波籌辦活動。王丹憨厚沉實，平易近人，討論問題直率坦然。這孩子年紀輕輕，便領導同學籌組學生社團「中國當代社會問題部」，出版學生刊物，並把「民主沙龍」活動從四十三號樓430活動室拓展到塞萬提斯像前的大草坪，魄力相當驚人。

王丹不時來到港澳台記者雲集的民族飯店流連。他在當時認識了不少記者朋友，他渴望獲得外來的訊息，關切地垂詢香港與海外的最新情況，並主動介紹北大的動向。他說，他只能從「美國之音」獲得外界的訊息。

一次與王丹到一家外資酒店會面，才發現他的儉樸與靦覥，他一直堅持要回飯堂吃飯，而當時只要了一杯白開水。

王丹有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他談到校園的經商熱、出國潮、「麻派」、「托派」盛行，同學愛「創收」不愛理想，他的臉泛著失落和無奈。言談間，他流露出對五四運動的嚮往，他對於政府現行的知識分子政策感到失望。對學生運動，他有一分飄渺的憧憬。他認為，學生是社會的先鋒，但是在中國每次學潮都以失敗告終。他覺得有點消沉，因為同學間廣泛地存在一股悲觀情緒。

「今年是『五四』七十周年，我總希望我們大學生能做點事。最低限度，我們也應反省『科學與民主』的意義，從『民主沙龍』做起已經不錯了。」王丹說。

「請回香港報道我們的『民主沙龍』和《新五四》雜誌，這將是我們的第一步。」這是他在話別時的託言。

想不到我們分手後的個多星期，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猝然逝世，北京爆發了驚天動地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自然地王丹被同學們推舉為學生代表，成立北大自治會籌委會。

從「四˙二二」大遊行到四月廿四日北京高校號召罷課，王丹都起了領導的作用，繼而領導了空前龐大的「四˙二七」大遊行，更傳出了官方企圖逮捕王丹與吾爾開希的消息，從學運早期開始，王丹便與吾爾開希並肩作戰。

在「五˙四」大遊行後的學運低潮時期，王丹與吾爾開希、程真、馬少方、王文和楊朝暉，某一天大家共進晚餐時，建議以絕食行動再把學運帶上第二個高潮。

程真對筆者說，王丹與吾爾開希在那個低潮時期都感到情緒低落，他們都不願意看著學運就此消沉下去。王丹主張採取較激進的辦法向政府抗議，於是在北大發起了五月十三日的絕食，北師大也響應。

筆者與王丹再次見面，已是五月二十日北京實施戒嚴之後。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眼前的王丹已成前

呼後擁舉世矚目的學運領袖，帶領著這場偉大愛國民主運動堅持奮戰。

實在擔心他那瘦削的身體，怎樣能熬得過七晝夜的絕食和軍臨城下的沉重壓力。

「我的身體還好呀，我在絕食期間沒躺過醫院，也沒昏倒過，你看我臉色不錯嘛。」沒料到此時的王丹竟比三月底的他更要幹勁十足。

與王丹詳談機會不多，因為那時他已身兼數職，既是「北高聯」常委、「保衛廣場總指揮部」常委、「總指揮部聯席會議」召集人和「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代表，每天從早到晚都要應付「文山會海」。另一方面他每天必定回北大一次，跟進北大自治會的工作進程和後勤力量。再加上圍在王丹身邊總有數名北京體育學院的「學生保鏢」和守候在廣播站週圍的大批索取簽名的「仰慕者」，要突圍而上跟他定下約會時間已極為困難。

在戒嚴令下，王丹已是身處險境，他隨時有被逮捕的危險。王丹對我說，他已不能再往後想了，到了這個地步，唯有犧牲，他說「大不了就死」。他說得很輕鬆，有點漫不經心，令我有點詫異的是，一個才二十出頭的孩子，怎麼把生死看得如此微不足道。

我問過他家人的反應，他說，父母擔心得要命，但他們從沒有怪過他，從「民主沙龍」到現在。他的父母一直是他最大的支持者，他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亦鑄造了他那永不言悔的道德勇氣。王丹的父母都是北大畢業生，父親留校出任地質系教師，母親在歷史博物館工作，廣場的同學說王丹的雙親常到廣場看望他，絕食期間更天天守候在歷史博物館。

由於家庭教育的關係，王丹對知識分子有一分特別深厚的感情和信任。他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非常尊重知識分子的意見。因此，有同學批評王丹背景複雜，說他是代表知識分子的利益，又有人說他的幕後智囊是「首都知識界聯合會」，更把他與方勵之、李淑嫻扯在一起。

「根本是瞎說，我已許久沒有和方教授他們聯絡了。我聽知識分子的意見，不表示我全部接受，我堅持獨立思考。」他說。

事實上，王丹對方勵之並不是毫無保留地接受。他曾指出，方勵之作為中國民主的一個象徵是值得尊敬的，但並不表示他沒有缺點，他認為方勵之的民主理論水平有不足之處，因為他有自然科學家的局限。

每當談到學運的前景，王丹眼裏總閃爍著光彩。他認為今次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是空前偉大的，已超越五四。而學生運動一定要堅持下去，要打持久戰，並要擴展至全國。

王丹由始至終是個實而不華、踏實堅韌的學運領袖。曾記得程真說過，王丹沒有吾爾開希的領袖魅力和矚目鋒芒，但他比開希沉著應戰，認真投入，在同學間比開希更獲信任和擁戴。

「開希優勝地方是他的辯才、決斷和膽色，他的領袖風采很吸引人。王丹是屬於另一類型的領袖，思想比開希縝密，理論水平比他高。」程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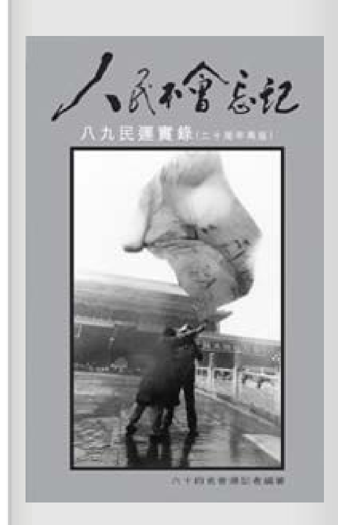
一些廣場的同學告訴筆者，王丹是學生領袖中人緣最好，口碑最佳的一個，說這與他的謙虛厚道、顧全大局的性格有關。亦有同學評價王丹是「最清廉」的領袖之一，不愛耍派頭，從不擺架子，只是默默耕耘。當然，亦有部分同學抨擊王丹攀上領導寶座後，名聲暴漲，便不再願意把權力交回同學手中，指其亦逃不過「學生官僚」的利益圈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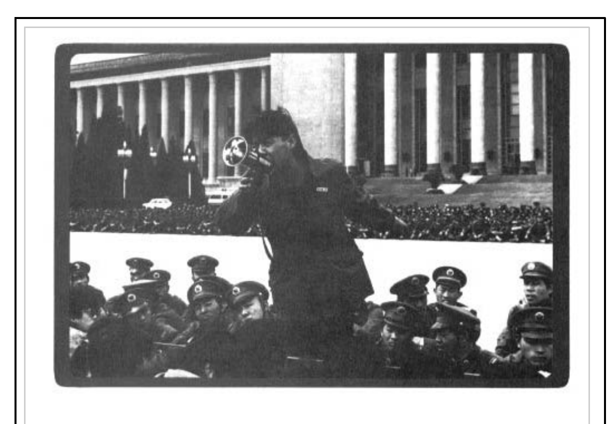
無論如何，今天的王丹已登中共通緝榜首，生死未卜。前途凶險難料，茫茫天涯路，不敢想是否還有見面的機會。



射下黑太陽──吾爾開希

黎佩兒




吾爾開希 黃勤帶攝

在天安門廣場，無論老少，見到他都要求簽名；遠在香港的人，也千里迢迢託赴京的朋友索簽名，不單只是少艾迷他，連資歷極深的記者，也囑同事務必得到簽名。

於是，一個香港記者的筆記本上，便全是「吾爾開希」的簽名，以及他不知傳送到什麼人手上，一頁又一頁的珍重語句。

吾爾開希的冒升，可謂時勢造英雄。北京學生悼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竟日竟夜聚在天安門廣場不散。四月十九日晚上十一時許，發生「衝擊新華門」事件，武警以警棍銅頭腰帶驅趕群眾，學生沒有被嚇退，其中站出來聲嘶力竭地領導同學的正是吾爾開希。

當北京師範大學的講師到場勸吾爾開希回校，他答：「老師，我愛共產黨，我的話是十一億人民要我代他們說的！」初露頭面，他便鼓動了不少同學。

胡耀邦出殯前夕，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不去，要求四月二十二日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喪禮及瞻仰遺容。吾爾開希便是與「治喪辦」斡旋的十名學生代表之一。

早在那天凌晨，吾爾開希已公開宣言這是一場「鬥爭」，他希望官方知道「學生的份量」，他強調「這麼多學校學生齊集，他們不動，但不是永遠不動。」

當胡耀邦喪禮結束後，三名學生高舉請願書，步上象徵最高權力榮譽的人民大會堂台階，向李鵬下「哀的美敦」通牒，淒然下跪；吾爾開希卻堅持「民主不是跪回來的」，堅拒在國徽前下跪。

人們不會忘記他揮舞著北師大的校旗，在同學簇擁抬舉下，衝破警衛築起的重重人牆，帶領同學邁出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壯烈遊行的第一步。

到絕食第三天，五月十五日清晨，蘇共領袖當天來華訪問，同學借此機會，絕食死守天安門廣場，迫令當局對話的希望告幻滅，並可能被扣上「打亂正常國事運作」的罪名。

吾爾開希就在此時，鼓動絕食三天後僅餘的氣力，「求同學顧全大局，挪一挪，並不是撤」，同學卒聽他的號召，挪到歷史博物館東側，騰出紀念碑前的一段。

吾爾開希也作過令同學失望的決定。戒嚴令頒下的第三天，即五月二十二日，凌晨三時，他在巨大壓力下，擅自宣布撤離廣場。據說以鄧樸方為首的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派代表力陳軍隊將開入，向學生格殺勿論。

當天早上，吾爾開希被罷免了北京高校自治聯會主席一職，失去了部分同學的支持。

吾爾開希深知自己的缺點，剛韌沉實的王丹就成了他最好的配搭。

吾爾開希說王丹是他的朋友，不僅僅是戰友，哪怕日後二人成為政敵。

四月二十七日大遊行之後，學潮沉寂下來，吾爾開希與王丹欲維持學潮聲勢，在五月四日掀起另一遊行高潮，二人遂商定製造緊張氣氛。

首先是吾爾開希匿藏不公開露面，王丹及其他學生散佈謂二人已被公安局點名，隨時會被逮捕的消息。

後來二人都承認這是策略，生怕同學滿足於短暫的勝利，策動不起來。

五四遊行後，王丹宣告全面退出學運組織，他不當北高聯常委，也不任北大籌委會常委，他說太累，讓位給新血，寧願與北大同學搞深化民主的工作。

首都新聞界在五月九日，到全國記者協會，遞交請願信，吾爾開希騎自行車，帶領約千名同學聲援，到了西交民巷記協附近，遍尋王丹不果，很失落，大喊他的名字。

二十一歲的新疆維吾爾族孩子，父親在新疆搞出版工作，職級等同副廳長級。吾爾開希說他夠不上是高幹子弟，他花的錢都是課餘時為新疆提供商業資訊，取得的報酬。

影響吾爾開希較深的是他的老師劉曉波，他不諱言劉是他的軍師。

在北京城，部分同學對他有微詞，不滿他「個人主義」，喜歡享樂，獨斷獨行。

六月二日，局勢膠著，下面一段該日對談錄透露了一個自信而鋒芒畢露的孩子，如何在滾滾民主潮流中冒升。

問：如果在絕食兩三天後撤退，取得的成果會否更大？因政府已開始談，如李鵬見學生，學生籌組對話團等？

答：中國所要取得更大勝利，在於出現政治制衡力量，改善民主體制，而不是換一個英明領袖。

若一早停止絕食，和李鵬對話，政府接受全部條件，如承認腐敗官倒，我們可能改喊「李鵬萬歲」。

這就永遠達不到目前的勝利。政府也永遠不會搞「新聞自由」，也永遠不會承認「民間自治組織」。

這兩樣是突破口，出現了民主意識。我強調李鵬下不下台不重要，重要的是喊不喊這口號。喊這口號代表民間力量的出現，制衡政府。

李鵬下台，若上來「王鵬張鵬」，有什麼好處？若趙紫陽上台，就算他是好的書記，仍需制衡。

問：口號是喊出來了，但局面仍是膠著，沒有實質的改變？

答：民主運動要爭取：（一）民主意識；（二）民主體制。

問：但目前我們看到政府倒退，控制得更厲害？

答：我相信這緊縮政策是暫時的，這將埋下定時炸彈，將產生強大反作用。問：那次學生負責人與李鵬的對話，為何你要打斷李鵬講話？

答：我們坐在人民大會堂，處於空調環境，坐在舒適的「沙發」，喝茶水；但廣場上的同學捱餓，坐在涼涼的地上，可是李鵬在那裡發表冗長的開場白，完全把學生看成是他的子女一樣。

他說廢話，毫無解答問題的廢話，而且不尊重公民權利。他應當把他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子女，人民共和國的兒子，人民公僕，他卻擺老資格。他們（領導）的孩子是不是官倒，關我們什麼事？講這些是形式，他作為總理，本身引起人反感。

三分鐘已很長，必須打斷。

問：人們都說你大膽，公然在電視轉播中打斷他（李鵬）講話。你有沒有當他是總理？

答：我當他是公民（氣憤之情)，總理是他的工作。我也是共和國的公民，我們兩個平等。我比他正確，如果不平等，只能是我比他高，不可能我比他低。但是我還覺得我們是平等的。我完全可以打斷他，平等的話有什麼害怕不害怕。

問：有人說你當場暈倒，在作戲？

答：我要澄清，我沒有暈倒，我氣喘，因過份激動。身體反應令我渾身無力，我插了氧氣平躺。此時對談已完全破裂，李鵬表現令人作嘔。

王丹說：「開希，我們走。」

因為我平躺，無法走，我說：「把我抬走吧。」

問：你在全國電視聯播中質疑李鵬，在學運當中有沒有影響？

答：有巨大影響。其實也是很正常。

正如侯德健歌詞：「過去我們不習慣」，和總理見面，以往是「皇恩浩蕩」。我的表現，開了頭；公民頂著皇帝，已經很累，他們看見平等的話，當然高興。

問：你是否覺得你受歡迎的程度已不太正常？

答：在北京，尤其是。

有人喊「吾爾開希萬歲」，我聽了很傷心。我一直在搞民主運動，推翻專制封建皇朝領袖的東西，但有人呼叫我「萬歲」。這當然可以理解，因人民受了很多苦。

問：有人批評你太個人主義。

答：記者有責任，他們報喜不報憂，將我神化。

問：人們說你穿名牌，愛花錢，喜歡在人前笑。

答：太氣人（他又激動），我是公民，是人，我難道不可笑。以前我也是一樣，這麼多年，我注重穿，愛吃，愛笑，希望別人喜歡我。我非得扳起臉來，形象糟糕？簡直是李鵬腔調。

問：據說外國將給予學生領袖政治庇護？

答：這裏流傳各種傳言，謂外國願意提供避難所，我不願意幹這種事。

一是要鬥爭要犧牲。二是不需要避難。三是避難對中國民運作用等於零，坐牢好一點。

但我願意出國，到美國香港台灣澳門看看。

我想去別的地方，這沒錯，我想去考察，去讀書，但絕不脫離中國。我和中國民運牢牢結在一起，願意貢獻一生。

我是人，活生生的，我喜歡文學、藝術、自己的生活。若要搞政治，便要犧牲。原沒想過要犧牲那麼多。

現在下了決心，我和王丹，最有利的兩個人，若退對民運不負責任。但要把自己的原來生活目標放在第二位，這個思想彎很難轉，很痛苦。我非常熱愛生活。

問：享受，是不是？（吾爾開希笑）

問：你一直那麼樂觀，爸媽有否支持？

答：爸媽來勸過我，媽媽到的時候，剛好是十七號，那天我停止絕食。他們勸我基於我的身體不好，我患心肌炎，血糖不足，絕食期及之後進出醫院十次，激動便暈倒。

我在北京生，北京長大，八四年舉家搬回新疆，八七年回京唸大學預科。在新疆上中學時，當過學生會幹事，在中央民族學院預科期間也搞過學生會工作。

問：你曾私下罵知識分子是臭老九，為什麼對他們那麼反感？結合不了知識分子，是否有點遺憾？

答：數千年來，知識分子的視野都是偏的，大多採「改良主義」，不是革命，是「軟骨症」在作祟。

問：這是不是因為他們看到實際環境不可能有「改革」？

答：世界上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就因他們「知識分子」，這不可能，那不可能，過份消沉，「時候到了，十年不成」。

問：學運發展到後期階段，似乎變成「山頭主義」，也不斷傳出學生領袖的不正之風？

答：學運基本上是神聖偉大的。但基於同學素質不一，動機不同，難免出現「學賊」，「學奸」，這沒有不正常。

學運的變質，其中原因是由於有大量捐款、權力腐蝕，對學生領袖過份評價。像我，有時也被人捧得飄飄然，還得控制情緒。

問：為什麼不願意離開廣場，是否已錯失時機？

答：時機是錯失過，這個不願意再講。

事實我們想過撤，很多次，定了又推翻，例如五月二十七日，本公布三十日撤，但後來又被推翻。主要是同學，尤其外來的不願意撤。

造成一個客觀環境是無論誰當指揮，都只能堅持，你說撤，便肯定被趕下去。已到了誰也控制不了場面的地步。只能任由事件發展，等政府反應，看似被動，也算是主動。

寫於七月八日

學運夫妻——柴玲、封從德

梁淑英

說柴玲和封從德是對罕見的學運「夫妻檔」應沒有錯。他們在政治觀及取向上雖然十分接近，但性格卻是對比鮮明：一個活潑嬌憨，自信直言，另一個則溫文穩重、謙厚自持，當然這也可說是大家相輔相成。有趣的是，二人稍為「破傳統」之處，就是妻子台前領導群英，而丈夫則在背後鼎力支持，成為共同進退的親密戰友。



柴玲和封從德 葉英傑攝

兩人是在北京大學唸本科時認識的，往後柴玲進了北京師範大學唸碩士，專攻兒童心理，封從德則仍留在北大，成為理科遙遠感應研究所的研究生，搞電腦研究。去年五月，兩人結婚。

他們在參與這次民運之前，都是對政治不感興趣，一心只打算好好唸書，然後到外國升學，封從德的志願是在唸完書後，籌集一筆資金回國，搞一間人工智能（電腦）研究所。夫妻倆早在今年初已考了托福等試，為升學鋪路。然而中國這場七十年來最偉大的民主運動卻改變了他們的計劃，出於對民主的熱切追求，他們決定捨卻安穩平淡的讀書生活，而選擇了投身民運的洪流。

如果因為參加學運而失去留學的機會，二人可會後悔？小夫妻都是斬釘截鐵，爽快地回答：「不後悔！」封從德又說：「我覺得個人前途是由社會局勢所塑造的，最重要的還是個人的完善，何須為自己的前途硬定下一個模式呢？」一貫的謙然，又何其豁達！

真正認識柴玲，是在五月廿八日跟她所作的一席詳談。在個多小時中，她始終是淚眼淋漓，嗓子沙啞地向我和另一位外國記者吐露她參與學運的前因後果、心態，及對學運、當前政權和中國前景的看法，言談直率大膽，也表露了她相當感性的一面。

她是在四月廿二日胡耀邦的追悼會後參與學運的，並成為北大學生自治籌委會的秘書長。學運在五月四日後陷於停頓，一些學生領袖發起絕食，柴玲也是北大的召集人及最早參與絕食的四十名學生之一。她嗚咽著談到她當時的心態：「請願沒有辦法，就用生命來呼喚！」她說，要看看政府的真正面目，看看中國是否還有良心、還有希望。臨絕食前的一天，她憶述自己當時還講了這樣一番豪氣的話：「我們這一代要死得氣慨，為生而戰，死亡絕不是我們追求的，我們要活到勝利，讓共和國有個晴朗的天空！」

後來，她覺得要對參與絕食的同學負責，就勇敢地站出來當了絕食團的總指揮，在吾爾開希因作出撤離廣場的決定而被撤職，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宣布成立後，廿三歲的柴玲便一躍成為統籌領導學運方向的廣場總指揮。

對於學運，柴玲聲言她並沒有一套理論的看法。不過，總結她個多月來在學生組織的參與和觀察，她對學生提出了頗嚴厲的批評，包括沒有信念、民主意識太低、責任心不足，有投機心態，或抱有個人私利的目的；甚至認為有小撮同學已被政府收買，因而極力勸說同學撤離廣場。她亦不諱言，學生組織中出現了內部矛盾，如北高聯與外高聯之間已發生權力鬥爭。

她痛心地搖首嘆息，這場運動充分暴露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劣根性，儘管是學運領袖，她坦承自已從來沒有預料過這場運動會成功。

由於對學生表現感到悲觀，柴玲一度提出辭職；但因為她認為暫時還沒有比她更有能力或值得信賴的人站出來代替她，所以她後來又再繼續當總指揮。於此亦可見到她對自己和其他學生領袖的評價。

看似嬌柔的柴玲卻是個激進派。當靜坐行動發展到後期，很多學生都主張應該撤離廣場，但她卻堅持

要留守。因為她認為，天安門廣場已是學生最後的陣地，學生守住此陣地，才能凝聚人民的力量，使民運在全國推廣。她甚至覺得，運動必須流血，才能真正喚醒人民。

對於政府，柴玲是看得很透徹的。她激動地直斥李鵬政府「沒有人性」、「喪心病狂」，認為這樣的政府，如果不被推翻，中國人民就不會有希望；並預言政府將會瘋狂報復，屆時會有很多人被屠殺。現在看來，這估計可真是驚人地準確。

然而，當時並沒有多少人抱這樣悲觀的看法，包括她的丈夫封從德，他對時局及事態的分析是較為謹慎的，也較樂觀。同時，與柴玲的詞鋒銳利，批評直率比較，封從德則溫和得多，說話亦留有餘地。

每次「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舉行記者招待會，在總指揮柴玲及其他學生領袖出來報告指揮部的部署或決定後，負責總管財政後勤的封從德就會站出來，拿著公文夾不慌不忙地宣布廣場的財政管理狀況。這個廣場副總指揮看來毫不起眼，光芒完全比不上吾爾開希以至柴玲，但他卻不介意作為妻子的後盾，而甘於做一個二線的人物，踏實地做一些實務工作。看見他在眾記者面前有條有理地唸著各地捐款的準確數字，坦率地承認廣場財政管理初期出現了混亂及貪污的情況，叫人十分信賴他的誠實。

事實上，在他的努力下，廣場的財政管理情況漸見改善，逐漸顯出了他的才能。當他的太太柴玲後期因身體健康為理由辭去總指揮後，我問他可會接手此職，他靦覥地笑著，謙稱他自己是優柔寡斷的人，不適合站出來擔此重任。

話雖如此，封從德可說是參與學運的老大哥了。早在八六年底的學潮時，他已因為參加學潮，成為北京三十四個被捕的學生之一，還險些被系開除。繼而在今年四月十九日北大的「民主沙龍」中站出來，成為當時團結學生會北大學生自治籌委會第一屆籌委，以至以後各屆的委員。不過，他卻坦言稱，由於他性好讀書，所以一直都有退出學運的念頭，但責任心令他留了下來，「五˙四」大遊行宣布復課後，令他感到灰心挫折，曾一度退出籌委會的工作。

然而因為愛妻柴玲參與了絕食，他又出來協助絕食團的宣傳工作，與妻子共同進退。打從那時開始，他才決意全心投入學運。

封從德表示，在前一階段的學運，他看到處於領導地位的北高聯缺乏領導能力，致有個別學生領袖作出不民主的決定和領導。他以為這現象是十分危險的，而實際上整個學運是由學生們自發地共同推動的，不應被當作是任何組織或學生領袖的功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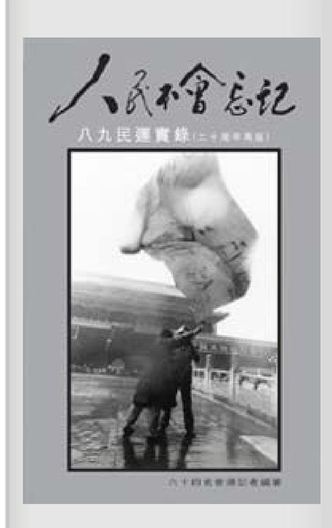
故此，他在學運後期盡力在廣場指揮部建立一個較民主的程序，希望藉此選舉一些有能力的人擔任工作及杜絕個別學生領袖獨斷獨行的情況。

他與太太柴玲在很多地方的意見都頗為一致，但在對政府是否會作出瘋狂報復的問題上，他顯然比太太樂觀。所以當柴玲獲悉自己被列在學生領袖的黑名單裏，而計劃逃亡，以期保存力量，他日重圖再起時，封從德對被政府報復的可能一笑置之，淡然表示「不怕秋後算帳」。

誰知還是被其太太不幸言中，小夫妻在「六˙四」血洗天安門後變作亡命鴛鴦。在「六˙四」之後初期，曾盛傳柴玲已安然轉赴澳洲，而封從德則悄沒聲息。

我記得柴玲曾說過，她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來，大家要保留革命火種和力量，在下一次運動中，如果她還活著，她還要站出來。期待著看見這對小夫妻再次站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紀念碑下。





激情總指揮——柴玲

黎佩兒

北京學生絕食不久，天安門廣場不時傳出一把柔弱而激動的聲音：我是柴玲，我是柴玲，絕食團總指揮。

事緣於五月十五日凌晨，吾爾開希力勸同學「挪一挪」，騰出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一段，讓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進行訪華活動。

部分同學堅持不動，場面一度混亂，柴玲就在這時站出來，拿著擴音器維持秩序，之前，絕食團並沒有總指揮。

五月十六日，絕食的第四天，柴玲聲嘶力竭地呼籲政府對話，呼籲同胞援手，話音剛落，不支昏倒，這幕慘情，通過電視衛星傳播，感動了海外千千萬萬的人。

北京戒嚴令頒佈前學生已結束絕食，廣場由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統領。

戒嚴後的第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凌晨，北高聯主席吾爾開希受不住外來壓力，因怕軍隊血腥鎮壓，擅自宣布撤離廣場。當天他被免職，北高聯從此改為「常委制」，不設主席。

另一方面，廣場於二十四日重組權力機制，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柴玲被推舉為總指揮。

學運早期，北京的同學都不大認識柴玲，稍後知道她是北大研究生封從德的愛人。柴玲也愛以原北大本科生自居，不大提起是北師大研究生。

外地來聲援的學生聽到廣場頻密的廣播，知道有一個女孩叫柴玲，一說話就哭，說話感動人，人們報以掌聲。

王丹說她性子好強，很早便提出在校園絕食。絕食早期，柴玲還建議用自焚來表示對政府徹底的抗議。

柴玲當初非常排斥外界，她反對知識分子及其他人對學運提意見，她認為學運是學生的事，不能容忍旁人指指點點。她也排斥記者，拒絕接受採訪，認為記者幫倒忙。

自從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代表攜同巨額捐款到北京後，柴玲有了明顯的轉變，她開始接受專訪，並著意地拍著香港記者的肩頭說，她將在百忙中，首先照顧香港記者。

每次記者會，封從德都站在她旁邊，用手扶著她，一派親暱「革命夫妻」檔，讓記者拍照。

絕食結束之後，很多市民、外來學生都在廣場廣播站等待學生領袖簽名。王丹和吾爾開希匆忙中，也會停下來為熱情的民眾簽名。柴玲則拒絕，並對尾隨不捨的市民，投以不悅之色。

有一回她說太累，短暫退下總指揮一職，叫同學把支持她的心，轉而支持她「摯愛的丈夫、副總指揮封從德」。廣場上數以千計的同學並不察覺問題，部分學生領袖鄙夷二人「私相授受」。

部分人批評柴玲作為絕食團指揮、廣場總指揮，很多次撤離的時機都錯過，並且出爾反爾。如五月二十七日宣布三十日撤離廣場，後又說改延至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會召開之後。

最令同學驚詫的是一場涉及金錢的風波。

五月二十一日入夜，戒嚴令頒佈第二個晚上，廣場氣氛非常緊張，同學都擔心隨時會被暴力鎮壓，就在此時，指揮部七個常委開會，商定各人預留「保命費」，以作逃亡之用。

這事件引致六月一日凌晨四時，柴玲所謂的「綁架風波」。

柴玲於六月一日早上召開記者會，點名力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王文

（他是絕食行動六名發起人之一）和外地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的連勝德意圖綁架她，並聲稱懷疑同學被政府收買。

據王文於六月二日提供給記者一盒現場錄音帶顯示：六月一日凌晨，柴玲、封從德、王文等曾有激烈爭論，緣起是王文發覺五月二十一日之後，部份常委分得「保命費」一千元，他只得一百元。

這場風波在同學間引起很大震動，不單因為部分領袖作好逃生準備，更嚴重的是學生分歧表面化，彼此攻訐，並且單方面向外宣揚，部份同學對柴玲的不滿更表面化。

這名才二十三歲的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二年級研究生，她的鋒芒沒有被她較矮小的外型、柔弱的聲線所埋沒。她說話感性激情，煽動力強。另一方面，同學對她的評價，甚具爭議。部分同學批評她「激情蓋過理智，權力慾強，在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問題上猶豫拖拉」。

六月二日終於在廣場的一個帳篷內，就備受爭議的絕食及撤離問題，訪問了柴玲。

她指出自己不是絕食發起人，但北大內，經她演講呼籲，簽名絕食的同學由數十人，躍至數百人。

她看見同學一個一個倒下，「幾乎落淚，後來沒有眼淚，變得憤怒。」

知識分子如嚴家其、包遵信、于浩成曾力勸同學撤離，停止絕食，但同學回以極端的反應：「若叫我們撤，請走。」

柴玲解釋絕食的目的是要看中國有沒有良心及希望。絕食不單是對政府施壓力，而是向全中國人民，展示有那麼多孩子，為民主救亡，獻出生命。

絕食數天，群眾已被喚醒；不斷有知識分子到廣場，勸說同學顧全大局，但同學仍是一味地堅持。柴玲承認與他們宣誓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有關。

至於由絕食推到「絕水」一步，是否激情蓋過理智？

柴玲激動地反問：「一個人願意把生命奉獻，不能說沒有經過理智考慮」。她強調「要犧牲的時候，光靠衝動，感情用事，不能支持他們。」

絕食的第四天，五月十六日凌晨有十一名北師大同學聲稱要自焚，柴玲作為提出的一員，她說：「當時哭得很傷心，若政府沒人性，若有一個同學犧牲，只有自焚，別無他法。」

她當時的理念是：「如果年輕人，還不為國家犧牲，為民族救亡，民族便失去希望。」

當記者追問為何總強調犧牲，為何硬要一次兩次爭取便得到勝利？民主不是長期鬥爭？

柴玲顯得言詞混亂，只說「犧牲是信念，沒採取實際行動」，忘記了先前她承認曾打算自焚。

就記者所見，五月下旬，留守廣場的大多是外地來的學生，北京高校的學生實際上已撤回學校。每校只餘三三兩兩捍衛著校旗。

她答：「北京同學在輪休，沒有撤離。」

至於有人批評學運發展到後期，廣場已到「失控」地步，柴玲歸咎於部份同學不負責任，在外亂說話。

她說：指揮部中，不光是北京學生，有外來的，人多意見多；指揮部成立才不過一周，剛換領袖，有一段時間混亂。一來沒經驗收拾爛攤子，二來「幫派多」，要花時間平衡各派利益。

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市高聯、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外高聯、廣場總指揮部、工人自治會、市民自治會等聯合召開記者會，公布五月三十日，舉行完全球大遊行後，同學全部撤離；但該建議於五月二十九日又被推翻。

主持二十七日記者會的正是柴玲，另有王丹及吾爾開希。

當記者就這關鍵性的撤離問題追問為何出爾反爾，柴玲只答：「完全是謠傳，昨天（六月一日）已發表聲明不撤。」

其時，封從德不客氣地打斷對話，堅持要柴玲和他先講話，記者預料這與問題敏感有關。

回想當日柴玲慷慨激昂地說：「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如今廣場已失，不計其數的同學市民被屠殺，學運分子顛沛流離，中國的前路實在需要冷靜反思。

一九八九年七月七日



智囊無用武之地——馬少方

潘潔



馬少方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十一時半，馬少方和另一位北京市高校的學生坐在他們朋友的家中，當時他們正討論著幾個小時前在天安門廣場成立的「民主大學」。凌晨零時四十五分，馬少方和那位北京高校學生站起來準備離去。「你們現在往哪裏去？」「回廣場營地。」馬少方答道。這時已是六月四日的凌晨，一個中國人，以至全世界人永遠記住的凌晨，中國自那個凌晨開始出現了重大轉折，如同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如同「反右」運動、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改革開放一樣，永遠記載在中國的歷史上，不可磨滅。

那天凌晨馬少方的朋友最後一次見到他，他依然用他那條永不放棄的吊帶繫著褲子，不過另一樣很少放棄的衣飾——白色領帶沒有出現在他的脖子上，頭上的鬈髮已經長得太長，但他仍然不失慣有的幽默。顯然，馬少方當時仍未得知，在北京城西面的木樨地附近，一支包括持槍軍人、坦克、裝甲車的武裝部隊，正向天安門方向挺進，在部隊經過的路途上，遍躺著鮮血淋漓的屍體。

六月十三日，中國公安部發出的通緝令，馬少方列於通緝名單第十位，六月十四日，馬少方在廣州向當地公安部門自首。

馬少方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他不隸屬於學運中堅院校，如北大，北師大，卻早於運動初起便投身運動行列，在「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籌組階段，與吾爾開希、王丹一起進行策劃和組織工作。在學運的中期及最後階段，馬少方雖然沒有擔任北高聯的職務，但依然參與北高聯關於學運決策的討論，並成為藝術院校的學生領袖。

馬少方認為今次學生運動源於開放改革政策。在思想方面，一些開放的知識分子在報上發表有關民主自由的文章，一些教師將民主自由的意念帶入校園，使校園的民主空氣越來越濃；在社會層面，一度蔓延的「讀書無用」風氣，「腦體倒掛」現象，使學生開始關注如何做買賣，如何可以賺多些錢。當他們與基層生活更為接近的時候，便看到了社會的腐敗現象，認識到沒有民主政制社會的可怕。在上述兩種認知下，胡耀邦逝世便成為導火線，爆發了學生運動。

在學運問題上，馬少方一直主張「進行有策略民主運動」，當學運取得一定成績時，便應適當放緩步伐，待時機又成熟時，再掀起新的高潮，像海浪一般將社會改革一波一波往前推進。

在馬少方看來，四月廿七日的大規模遊行，是在《人民日報》發表措詞強硬的「四˙二六」社論，指學運是動亂的情況下進行的，故遊行成功本身已顯示學運取得了極大勝利，隨後便應考慮轉換鬥爭方式。他說：「從四月二十一日北高聯臨時自治聯合會產生到大規模遊行的成功，非暴力和平請願方式在中國產生了，以後每當政府出現重大失誤時，便會出現這樣的請願活動，迫使政府在以後的進程中不得不考慮民意」。不過，學生並沒有因為取得「四˙二七」大遊行勝利而罷休。五月四日，藉紀念五四運動，大規模的學生遊行又再舉行。

馬少方的社會閱歷和廣泛閱讀的愛好，使他在眾年輕的學生領袖中顯得特別思想成熟。比較之下，馬少方有關學生運動的觀點和主張更為理性和現實，自然他的熱情衝動也就相對地較其他學生領袖為低，這也說明了馬少方雖然與吾爾開希稔熟，但始終未達到如吾爾開希一般在學生中的威望。吾爾開希在談到他與馬少方之間的關係時說，「他的理論基礎強，我的組織能力和感召力強，所以我們利用各自的長處分擔不同的工作，他搞學運的理論研究，我則站出來當領袖，目前我們是對很好的搭擋」。

事實上，馬少方也意識到自己「個人魅力」不足，而專心「研究學運理論」，探索學運的深層社會意義，聯繫整個局勢變化思考學運策略，在學運的不同階段，馬少方都有一些獨到的見解。例如在五月中旬學生絕食之際，馬少方認為「十七、十八數天市民在學生絕食行動的感召下，參與運動的情緒已十分高漲，北高聯應該藉此機會，將運動指揮權交出去，讓更有鬥爭實力的工人接收，使其他社會力量能充分地介入運動，這樣學生運動就擴展成全民運動，它帶來的對政府的震撼力更強，取得的勝利

也將更大」。不過，當時指揮學生運動的北高聯、廣場指揮部、絕食代表團均未意識到這一點，使學運錯失了一個擴展的機會，也導致後來學生必須獨力支撐著運動的擔子、疲憊不堪地堅守到最後一刻。

在戒嚴令頒佈後的七、八天後，廣場上靜坐的學生疲態畢露，有很多萌發撤退的念頭。馬少方認為，「此時外地的學生應先撤回本地，在當地宣傳發揚學運，而天安門廣場只留下三百同學堅守陣地。在廣場旗幟屹立不倒的情況下造成一個全國各地民主火花點燃的壯觀局面」。但是，當時外地學生抵京參加靜坐不久，學生情緒仍十分高漲，外高聯不願接受撤退的決定，無法形成統一行動，致使學運再失去一個「保存實力長期鬥爭」的轉機。

馬少方是個思辯能力特強的學生領袖，但有時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對一些較複雜的問題，有意或無意地採取迴避態度。在絕食時期，馬少方被問及學生激烈行動可能會導致政府採用強硬措施，學生是否應考慮政府的迴旋餘地而採取一些適當的步驟。馬少方說，「讓政府作出某種適當的反應，責任不在學生，社會上應該還有另一些人——如知識分子，告訴政府作出怎樣的反應才是適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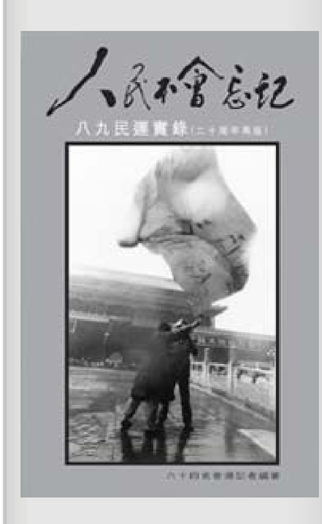
在談及學運激化了上層權力鬥爭，馬少方對於局勢發展的估計也是過於樂觀的，他表示「學生運動被權力鬥爭利用是無法避免的，不過無論哪一派利用了學運，他都將收斂專制控制、並改善腐敗現象。」

和其他學生領袖一樣，馬少方除了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之外，也具有強烈的榮譽感，當趙紫陽失勢已成為定局的時候，很多人擔憂中國從此面臨一次大倒退，當時馬少方和吾爾開希均表現得十分激動，「如果中國有一次歷史大倒退的話，我們作為學生領袖應承擔歷史責任，我們不排除採用極端的鬥爭形式——自焚，來喚起民眾的覺醒，阻止大倒退！」在他們的心中，此時充滿了悲壯和浪漫的犧牲精神，他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鮮血承擔起歷史責任，同時藉此維護學生運動和作為學生領袖的聲望，杜絕因大倒退可能出現的對學生運動和學生領袖的質疑。

在私人場合，馬少方是個十分隨和並且愛開玩笑的年輕人，他會大肆批評電視廣告水平後，開始闡述自己的廣告構思，而且在一片噓聲中仍然自得其樂。他認為自己是個具有藝術氣質的人，具有獨到的審美觀點。他愛用白色領帶和長褲吊帶來顯示他的衣著品味，經常拿白長褲來配黑襯衣，一雙二寸釘鐵踭的皮鞋即使在長途遊行時都不捨得放棄。

一位與馬少方稔熟的記者說，「馬少方是個極具潛質的年輕人，假如他堅持不懈地造就自己，十年後便是個出色的人才」。然而，六月四日凌晨之後，馬少方的命運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與整個中國一起步向一個未可預知的未來。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反思的馬少方

黎佩兒

馬少方，絕食行動的發起人之一，活躍的學生領袖，絕食行動之後，退居二線，搞民主運動的理論及深化工作。

他年二十五歲，八年前離開學校，到社會工作，曾任編輯、自由撰稿人、記者、文化幹部、會計。

八六年進北京電影學院，就讀文學系編製班。他曾任北京高校自治聯會七名常委之一，四月二十七日大遊行之後，曾一度退出。

學運期間，他曾撰文推動學運，該篇題為「學運目標──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大膽闡述學運任務是「粉碎專制、清除腐敗」，其次是「罷免李鵬乃為掃清障礙，爭取公民監督權、參政權，撤除家長制、幹部終生制，建立法治、實行新聞自由。」

訪問他的時候是五月底，天安門廣場亂哄哄，秩序、衛生都成了官方的攻擊點。撤與不撤的問題成了死結，各個組織竟日開會，同意了一個決定，很快又推翻。

另一方面，局勢膠著，當局宣布了戒嚴令多天，城內雖進不了一兵一卒，但威脅性仍在。

白天廣場秩序渙散，人雜地髒；晚上，又被隨時會被鎮壓的危機籠罩，學生的情緒拉得綳緊，一觸即發。作為絕食行動發起人之一，馬少方總結這階段是「激情蓋過理智」，同學完全忘記目的，是「失控的控制」。

問：目前（五月底）天安門廣場情況很混亂，你是否贊成撤？若惡化下去，會否成了當局清理鎮壓的口實？

答：現在才撤，我覺得是錯誤，因天安門廣場已成了象徵點，群眾也不會答應，北京市高校聯不單是搞決策，要顧實際效果。

但我認為要擺脫被動地位，擺脫當局的威脅，當務之急是（一）疏散外來聲援學生，留下部分，捍衛大旗；（二）改窄佔領廣場的範圍，擺成方陣；（三）搞好秩序衛生。最少有三千至五千人留守廣場，宣傳五月愛國民運；又或二十、三十人一組，到各地宣傳。但要明白留守廣場，不是要達實質目的，是為了維持象徵性。若立即撤回校園，將失去力量。市民不是說：「廣場不能丟」？

問：學生一直強調學運與黨內派系鬥爭無關，但實際客觀環境可能已成為某派棋子？

答：主觀上，我們沒和高層鬥爭聯繫。若能推動民主進程，我們便支持；若權力鬥爭結束，又反對民運，那是悲哀。

群眾都旗幟鮮明喊叫「李鵬下台」，李鵬作為總理公然站在人民對立面，按國際慣例，他應下台。但群眾喊「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這意味李鵬下了台，便不來了，這是悲哀。我們應明白，李鵬下不下台，這不是目的，民主還是要繼續爭取。

問：怎樣提高民主運動的素質？

答：民主要具體化，便要靠宣傳，素質要提高，參與人數自然會下降。假若天安門廣場仍有人在，便會激發市民思考問題。前一段，學生絕食，民眾心焦，要解救。絕食是喚醒了民眾；但要他們再三反思，廣場便有必要維持下去。

「國無希望，民無寧日」，若當局答應新聞自由，便可撤了，不需要廣場這焦點。

問：學運後期，學生組織內鬨，傳說紛紜。

答：因學運到了後期，激情掩蓋了理性。廣場失控，單是口號「非達目的，誓不罷休」，已是非理性的。

例如絕食團，以為是搞獨立運動，完全忘記目的是為什麼，完全忘記自己只是運動的一部分，絕食是手段。變成更多興奮，更多悲哀。

我們必須反思，這第二段的高潮，是產生領袖的時候，我們會否如八六年底，學潮完畢後，沉靜地回到書房，又或是被抓進監獄。

在這階段，北京高校聯不可避免地犯了大小失誤，錯失時機，造成失控、混亂。因為學運基調是「盲動」、「獨裁」，因為組織沒權威性，控制不了。現在總結，「吃一虧，長一智」，應是激情為理性服務。

這可能是由於對形勢估計不足，以為命都不要，以為一定可達到那兩條要求：（一）平等對話；（二）公正評價學運。事實上，群眾已被喚醒，推進入學運第二個高潮，不光是為了這兩個要求，而且把評價學運，拱手讓給政府，非常可悲。

問：那就是基於這原因，不絕食了？

答：由絕食轉到靜坐，我們是基於三條，這不曾公布。（一）絕食已把學運推向第二階段，具歷史意義；（二）政府的嘴臉已暴露出來：（三）若還得交給政府去評價學運，是悲劇。

絕食後期，發展成為「失控的控制」，無論宣布絕食，撤消絕食，都是「非理性」，沒有經過理性的考慮。因同學有規定，若不絕食者，沒權去領導，實際環境，極需理性組織。

問：第三階段的學運將怎樣走下去？

答：到目前為止，學運並沒有真正的領袖，學運的領袖其實是「政府」，都是政府壓迫出來的反應。目前（五月底）學運陷入癱瘓狀態，誰能把學運帶進第三個高潮，誰便是真正的領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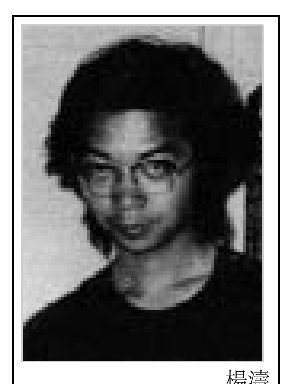
我估計第三階段將不再是轟轟烈烈、震撼性的，而是宣傳提高民主素質的階段。



在第二線上──楊濤

崔麗容




楊濤

最後一面，在北京大學三十二號樓的宿舍。時間是六月一日深夜十一時多。我和華僑日報、快報、澳門日報的記者，與楊濤作了一次訪問。那晚以後，我們再也沒有機會看到楊濤。因為他已在中共的掌握之中……

楊濤才十九歲，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生。在這次學運中，他屬於第二線人物。相對於王丹、柴玲、吾爾開希的知名度，他只是一個配角而已。然而，他還是成為中國政府通緝的廿一名學運領袖之一。結果，他在甘肅被捕。

最後一次的訪問，楊濤的父親也在場。他在旁細心聆聽記者跟他的獨生子每段的對話。談話完畢，他懇請記者不要作報道，生怕影響楊濤的前途。

楊濤與王丹是同學。可以說，在胡耀邦逝世所掀起的爭取民主自由的浪潮中，楊濤一直跟著王丹走。

他的參與始自北大一些學生活動小組。在學生解散原有學生會而籌組北大自治聯會時，楊濤逐漸捲入。

他雖然一直與王丹並肩作戰，但兩人很不同。王丹是決策者、發言人；楊濤則默默在幕後苦幹。沒有太多記者認識他，也沒有很多人認為他是學運中的主要人物。

不過，隨著學運發展，楊濤的角色亦隨之改變。像往常一樣他仍甚少對外打關係，或發言，但他已「背上」許多名銜如北高聯常委、保衛天安門廣場活躍分子。及後因王丹把所有時間放於北高聯而無暇照顧北大時，楊濤擔任了北大自治聯會的主席。

由基層至領導崗位，他的心路歷程與其他學生領袖不一樣。他沒有其他領袖那樣激情滿溢，他只是在過程中慢慢投入的。

他說自己在學運開始時，並無想到日後會全面捲入，而是一步接一步的走，漸漸到了「不能退」的地步。

雖然身兼數職，他自言本身非大將之才。他認為擔任領導崗位者，必須有英明的決斷力。楊濤則感到自己稍為優柔寡斷。

他說過，國家沒有前途，自己有何前途？他也曾說：「民主是不能倒退的。如果一旦倒退，一定會把剛冒起的民主熱情造成致命打擊，特別對基層群眾的民主熱情打擊尤甚。」

楊濤在記者腦海中的形象有好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在學運剛起之時，由於他跟王丹同住一個房間，所以記者採訪王丹時，他總是坐在一旁默不作聲。第二階段在五月四日之後，學運處於低潮，楊濤與王丹一樣返回學校。他意志頗為消沉。看到他時，他總是手拿著香煙，桌上滿放著許多喝光了的玻璃酒瓶。第三個階段是他角色責任日漸吃重之時，他的臉上看到了自信和笑容；手裏提著的香煙，也不再是什麼「阿詩瑪」、「雲煙」等大陸香煙，而是「登希路」……

據報道，楊濤從北京逃到甘肅省蘭州市時，為怕公安人員辨認出，便把原來的銀絲眼鏡脫掉，換上隱形眼鏡。畢竟這種改變於事無補，他在六月十七日晚上在蘭州西北部一間酒店內被捕。

他那副瘦削臉孔和身材，在被捕的第二天出現在中央電視台的新聞報道中：他被兩名公安人員拉著手，低著頭地走著……

想起楊濤最後一個笑容。他當時笑著談論是次學運可能的結果。他說，這次學運即使不能馬上見效果，但對中國整個民主進程幫助極大，單說這點已很足夠。

楊濤提及自身安全的問題。他說中共領導層所言「不會秋後算帳」是騙人的。他已把個人參與運動可

能的後果計算了。

周勇軍的「平凡」

黎佩兒　麥燕庭


周勇軍

初聽政法大學政治系四年級生周勇軍說這句話，難免把他與吾爾開希作一比較，因為他們兩人均是差不多同時參與悼念胡耀邦活動，並一起籌組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及其後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從而一直成為努力不懈地推動四月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骨幹人物及領袖，但兩人的性格卻又是如此不同。

吾爾開希自詡是一個有能力的領袖，但周勇軍卻自言是一個平凡的人，即使愛好也是很普通的，平常就喜歡聽音樂、彈吉他、下棋和跳舞。故此希望他的朋友不要因他當了北高聯首任主席便對他作出不平凡的要求。他憶述道，有一次跟人開一個玩笑，即有人告誡他，當領袖不可如此！他幾番思量，仍希望能保持自我，不想因為成了領袖而壓抑他的個人發展和行為方式。

當然，這只是他的想法，事實上，他在不知不覺中也因自己的身份而作出不同的抉擇，就以他有一次趕著去開會為例，筆者原欲以計程車送他一程，他猶豫了一會後便拒絕了，因為這會令人誤會他藉著與記者混熟了而出鋒頭，而且坐計程車也是一種腐化的行為，所以還是自己騎單車去比較好一點。至於喜愛的吉他，也已此調不彈久矣，為的是要開會去也！唉，真要命！

那末，這個平凡的人又如何評價自己的領袖工作呢？「領袖只是因應歷史需要而走在群眾前頭的人，但他又不能脫離群眾，而應走回群眾之中，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予以反映。」他深信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旦你不能與民意相通，便會被群眾唾棄。不知這是否是他對國家領袖的期望？但他真的希望中國不要再封建下去，以為當領袖便可任意妄為，更不希望一人下台便弄致民心大亂。事實上，下台也非無能的表現，只是有更佳人選而已，他自己就願意隨時下台。

他已常常告誡自己：每人均有自己的思想，並據此作出抉擇，所以即使是領袖，也不可把自己的意見搶在別人面前。應根據大多數人的意見作準，這才有真正的民主。所以他能自豪地說，他在北高聯反映的主要是政法大學師生的意見。

但這種「聽人家說」的作風卻被友儕評為不夠果斷，他無奈地笑說：不夠果斷也是民主的表現吧，眾人之事總不能自作主張呀！若只涉及個人的，當可果斷處理。

可是機關算盡，仍不免百密一疏。他作了多少正確決定，外人當難下斷語，但有兩次「失誤」卻是有目共睹的：第一次是聽過部份北高聯常委建議和一些老師紛陳利害後，沒經正常程序而決定取銷「四˙廿七」的遊行，雖然這事後來有了好結果，但他也承認這是自己的失誤，並因此被免去北高聯主席一職，只繼續當其常委；其二是在「五˙四」遊行後，只公布了北高聯部份復課議決。議決者還包括五月五日、八日或各高校自行決定全面復課，但他只說了前者，後二者都省了，非如一些常委所說，北高聯沒有作出復課決定。而不少人亦認為復課是理智的決定，但程序上確有紕漏，故欲撤去其常委一職，但又因「政法」學生自治會代表是當然常委而不能罷免他。

經受這等挫折和批評，他為什麼還是那麼孜孜不倦地去推動這次學運呢？「每人均應勇於承擔自己的得與失，況且，個人的得失榮辱與整個運動相比，實在太微不足道了。總而言之，這次運動不結束，我是不會退下來的！」

這份對改善社會的執著，非單在言語間流露，在現實生活中也經得起考驗，這位自言「最怕家人知道他搞運動」的「乖乖仔」，四月底已接獲家書，要他趕快回鄉，但他已斷然拒絕，寧願繼續忍受那份對家人的莫名歉意，為的是「幹自己認為對的事」，而歷史的車輪是往前的，現絕不能往後退，一退就永遠落後的了！這在其他人來說，為民主而違抗父命，可能是普通不過的事，但對周勇軍而言，顯然需要一定的醞釀和掙扎。廿二歲的他出生於四川省蓬溪縣一個農家，家中成員除父親在縣檢察院當檢察員外，餘皆以務農為本，在這樣的傳統家庭中，根本不知民主為何物，只知父親的話就是命令，而所受的正統教育也是在傳統的鄉縣學校中接受的。

在這種較為封閉的環境中過了十八年，他才憑著努力與天資而考上北京的政法大學政治系，這不單開

人民不會忘記
八九民運實錄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展了他獨立自主的生活，還給他接觸外國思想體系的機會，其中自然包括西方的民主思想。

相比之下，他深感中國民主的不足，而即使在大學裏，也不能民主地表達思想。他這種壓抑的情況，就像其他知識分子一樣，藉著悼念胡耀邦而爆發開來，再經天安門廣場的數番辯論，激情遂被挑起，然後經過不斷總結和反思，使政治思維不斷成熟，對民主自由的理解亦逐漸深刻，遂毅然投身這次歷史洪流，把家庭和畢業後的工作分配都拋諸腦後。

他嘗言，若心存日後工作分配這等小節來參加這次運動，則眼光未免太短淺了。

由此可知，他的心志是毋可置疑的，但正如他自己所言，個人成長必會影響其思想，他那傳統的家庭及學習生活對他有著潛藏的影響。

除了農家特有的善良和正直性格外，其壓抑環境和法律訓練亦使他處事謹慎、理性和克制，而性格亦變得沉穩。他憑著這些性格在數次衝突和示威行動中嶄露頭角，後更成為領袖。但「優點發展至極端便成缺點」，其性格亦使他流於猶豫，缺乏領袖氣魄，而感情過於深藏，亦使他一旦犯錯也不屑去解釋，不易得人諒解。再加上口才不佳，所以雖是今次學運的骨幹人物，但鋒芒總不及精靈跳脫的吾爾開希。

周勇軍雖有拚幹之心，並表示希望辦跨院校式的雜誌刊物，以推動校園民主化，使大學成為深化民主的基地，無奈時勢逆轉，學生發起絕食，打亂了他的計劃。

在絕食期間，激情已逐漸掩蓋理性，他當初為人稱道的優點，諸如理性、克制等，在廣場中已找不到市場，逐漸為人排擠而退下去。

周勇軍回顧這一段學運，他認為決定絕食行動是考慮不周，是有點「超前」。

他指出，同學沒作好會導致什麼後果的考慮，而工人以至各界也沒有準備充足，接不上棒，導致目前學運進入低潮，膠著狀態。

五月二十九日晚，北京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成立，周勇軍被選為常委。

他改了名字，以示學生時代告終，他踏上民主另一個進程，與工人結合，開展另一個爭取民主的歷程。

他承認他曾作錯誤決定，他形容這是無可避免，他舉例說，王丹、吾爾開希都曾作退縮的表現。

他歸咎於學生對政治認識不深，眼光短淺，經驗不足，及受不住龐大的壓力。

他加入工人團體是他意識到要開展民主運動，必須要提高一般人的民主意識，尤其要得到工人的參與，而工人的參與是唯一延續民運之途。

他的師友、同學曾力勸他三思，因他一旦離開學生組織，誰也保不住他個人的安全。

出生農村的周勇軍說他自小就吃得苦。和工人混在一起，一起起居飲食，可以盡量了解他們，組織宣傳民運工作。

他們當時正打算辦一份名為《民主之聲》的工人報紙。

他認為學生不應再在天安門廣場呆下去，一是身體太疲憊，二是應深化民運，搞持久戰，但學生一日留在廣場，工人也會支持。

他的畢業論文題目原是「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他希望把它改成「中國的民主進程」。

他形容目前的民運低潮，政府越拖得久，對學生消磨得越厲害，這一段將會延續至頗長時間，除非當局採取鎮壓，便會激起「第三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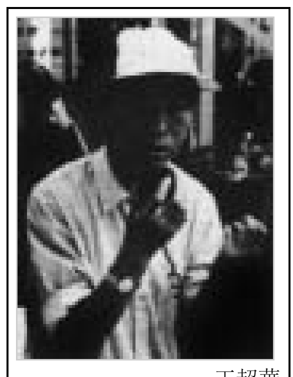
六月本是他畢業的時候，他原來打算找份工作，白天幹活，晚上繼續爭取民主的理想。

「六˙四」鎮壓以後，周勇軍成為當權者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之一，現在生死未卜，但無論如何，歷史已不容許他平平凡凡地度過以後的日子。



滄桑倔強的王超華

蔡詠梅


王超華

北京的學生領袖中有一些傑出人才，由於不是頭號人物也不喜歡宣傳自己，所以鮮為人知。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成員王超華就是這樣的學生領袖。

不少了解學運的人都說，今次學生運動有一些思想水平很高的研究生參加，他們年齡較大，學歷高，在政治上較成熟，比較注意鬥爭的策略，使學生領袖的整體質素比以往提高了不少。

五月二日，北高聯派代表向當局遞交要求對話的請願書。代表從北師大出發時，幾個社科院研究院的學生在交談。他們突然指著一個高瘦的女學生說：「她就是我們對話請願代表的總領隊，我們社科院文學系研究生王超華。」然後向王超華高叫著：「王超華，請你轉過身來，讓香港記者為你拍張照。」

王超華欣然地轉過身，微笑著讓記者拍照，她看來三十多歲，額頭上已出現不少皺紋，給人飽歷風霜的憔悴感覺，說話細聲細氣，與一般想像的學生領袖形象大不相同。

五月四日學生大遊行，到復興門立體交叉橋時，她戴著一頂草帽，臉上淌著汗，在隊伍旁跑前跑後，和一些領隊的學生交談著什麼，顯然身負組織遊行的重任，不過浩浩蕩蕩的學生隊伍和沿途歡呼的民眾誰也未注意到這位瘦削單薄不起眼的女子。即使看見她，也未必會想到她是這支民主大軍的領袖之一。

在五四遊行的次日，我即到北師大西北樓找到她，她正參與北高聯的會議。

她很客氣，但堅決拒談她個人的事。我試探著說：「原諒我冒犯地問一句，你是不是已做了母親？」

她點點頭，然後打斷我的話，阻止我再問下去。「我個人經歷很複雜，我實在不想再談起。」

我有點愕然，也略有些歉意，猜想她一定有很不愉快、或者很痛苦的經歷，我的提問可能揭開了深藏她心中尚未完全痊癒的創傷。

她歉然地向我解釋，「我與參加學運的其他同學不同，他們很單純，喜歡與記者交談，而我不習慣。」

據一些社科院的人說，她是北大教授王瑤的女兒，此話不知是否確實。由於她對自己的經歷諱莫如深，她的身世也變成了秘密。

不過認識她的人都說，她生活經驗豐富，心細，看問題冷靜，能顧全大局，是北高聯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年齡最大的成員，在北高聯一群熱情如火的大孩子中，她常起到平衡各方意見，維繫彼此關係的作用。

一個知情的學生說，沒有王超華，北高聯這個班子可能早已解體。北高聯的班子多次易人，但她和王丹一直是其中少不了的成員。

在北高聯眾多成員中，王超華的思想傾向如何？對民主運動的策略是採溫和還是激進的態度？很少人知道，所知也只是一鱗半爪。

五月十一日，一些學生決定絕食，其中包括當時北高聯的大多數成員，如王丹、吾爾開希、王文、楊朝暉等，但北高聯最初反對這個決定，王超華是反對的。後來在絕食誓師大會上，王超華代表北高聯表示尊重和支持絕食同學的選擇，這明顯是從學運的大局出發，符合王超華一貫扮演的角色。

十四日晚上，學生在統戰部與閻明復等中共領導人的談判破裂，但北高聯和絕食團的領袖未立即將結果通知同學。他們需要先討論，統一認識，作出如何回應的決定。

這時在北大學生剛安裝好的喇叭下，見王超華正激烈地說服其他領袖撤出廣場。她說，根據閻明復講話有意透露出來的訊息，中央內部兩派鬥爭很激烈，改革派的趙紫陽受到很大壓力，學生佔領廣場，對改革派不利。王超華顯然支持閻明復的意見，她一直講到聲音嘶啞。

晚上九時另一位學生領袖王文說，隊伍可能撤退到中山公園或撤回學校，大概王超華已說服了他們。

但最困難的是說服廣場上數萬位血液沸騰，思想單純的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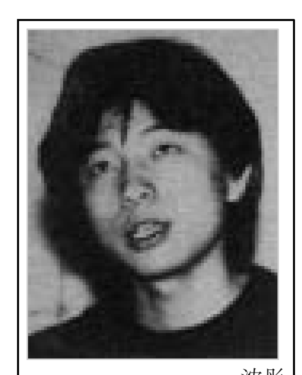
十五日凌晨三時，王超華痛哭流涕地將前日談判經過，以致最後破裂，及十二名知識分子斡旋失敗的情況在廣播中告訴同學，她情緒激動，說話斷斷續續，數度哽咽，但傳達出來的訊息卻很明確：同學們必須撤，否則擔當不起破壞中蘇高峰會議及為中共改革派幫倒忙的罪名。

王超華和其他學生領袖終於未能說服廣場上的同學，在各校派代表投票後，決定繼續留在廣場。而王超華也留在廣場，直到北高聯撤回北大。



從理論到實踐的沈彤

蔡秀霞


沈彤

對於二十一歲的北京大學生化學系三年級學生沈彤來說，參加學運是理所當然的。他自小關心國是，且過去已參加過學潮，對於政治理論的認識，亦比一般的學生深。

參加今次學運的學生，都是懷著青年人的一腔熱血投入這股學運洪流。沈彤與別不同，他曾經參加過八六年學運，在北大，他也一直是學生活動的中堅分子，對於政治理論，亦有頗深刻的見解。

沈彤的父親是北京市政府的幹部，母親是醫生，姊姊在貿易公司工作，由於他的父親、姊姊皆畢業於北京大學，且都曾是校內的活躍分子，故此家常閒談，往往圍繞社會時弊與國家大事，加上沈彤的父母對子女十分民主，事事皆與他們商量，因此，沈彤認為他日後將走的路，家庭對他影響至為深遠。

沈彤認為有些知識不能單從書本上得到。例如民主與自由的概念，就必須從實踐中，才體會得到。他在中學時期，還只是個十三、四歲的黃毛小子時，便經常到北大探望就讀的姊姊，在旁觀察、學習姊姊與同學朋友間討論政局與時事，當他進入北大唸書後，成為校內各大小學生社團研討小組的中堅分子。

沈彤指出，北京近年所發生的學生運動，他都有積極參與，例如八六年底、八七年初的學運，他便跟姊姊在北大組織活動。他說，以他的性格，以及他自小受家庭薰陶與教育，參加這些運動，對他來說是理所當然的。

今次北京學運其中一個口號，是反官倒反貪污。高舉拳頭大聲疾呼的年輕學生們，他們的父母大部分都是國家幹部，而國家幹部大都涉及官倒及貪污的，難道他們要反自己或同學的父母嗎？這個問題，筆者曾詢問過不少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學生，包括沈彤與吾爾開希，他們在回答問題時卻露出矛盾的微笑與惘然的神情，但答案都差不多一樣：「我們不管了，我們現在是搞理想，我們要改革整體的腐化現象，個別的犧牲：算不了甚麼！」這種犧牲精神，在學生中很普遍，沈彤亦不例外。

對於今次學運，沈彤認為它的最大意義不在於它的具體得失，而在於人民與學生對民主的自我教育過程，因為中國幾千年來都是一個封建社會，由一個朝代取代另一種暴政，若推翻現政府而換上另一政府，她在開始時可能很好，但到後來還是一樣的腐化。

因此，沈彤認為改革中國最根本的方向不是推翻現政府；也不是中國幾千年來的農民革命，而是要改革政治體制，人民要不斷地成立新的壓力團體，繼而改變不良體制。若體制不變，縱是打倒了現在的李鵬，另一個李鵬還會上來，打倒了現有的官僚，新的官僚還一樣出現。故此，最近流行的「新權威主義」，沈彤認為只是封建思想，不良體制下的產物。一個國家單靠政治強人來支撐，無論在目前或將來都是可悲的。

沈彤屬於沉靜思想型，他不太愛說話，不愛出鋒頭，因此，他與他的好友、校內另一位政論社團活躍分子王丹一樣，在今次學運中負責幕後策劃與推動，沈彤與其他學生領袖的組織才華在今次運動中盡顯無遺。

在今次學運中，沈彤在北大學生籌委會主要參與秘書處、宣傳部、印刷部，以及《新聞導報》工作，其中《新聞導報》對今次學運的影響十分重要。京城各派勢力皆欲利用今次學運而有所得益，不少人主動向導報提供消息，尤其趙紫陽的親信，差不多北京高層每次會議之後，馬上便派人將會議內容送給北大學生。最顯著的例子莫如北大學生收到楊尚昆在黨政軍的講話，於五月二十九日立刻將三份貼在廣場一帶。

由於沈彤對政治理論有認識，加上他思考冷靜與辯才出色，因此，他代表北大加入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與北京市長和市委書記對話，他並代表對話團到國務院請願。當學生舉行絕食時，北大的學生拒絕讓他加入絕食行動，希望留下他作為背後策劃與對話的重要棋子。

雖然沈彤參加政治活動是極之嚴肅與認真，但他畢竟是年輕人，也有年輕人的天真與頑皮的一面。

沈彤原本喜愛文學與藝術，但他認為通過學習科學，可令他對事物的理解更有分析能力及邏輯性，因此，他考進北京大學時，便選修生化，但他所讀的課外書，絕大部分都是關於文學與政治理論。兩年前，他為了更了解自我，曾到電影學院修讀且拍了幾齣電影與電視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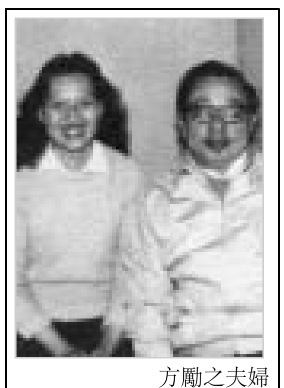
沈彤在學運未開始前，經已申請了美國波士頓的大學，並獲得簽證，他還預備在今年八月到美國唸書前，與巴西籍的女友一起從北京乘火車到莫斯科旅遊，然後南下歐洲，最後以巴黎作終站。想不到世事難料，他原來打算到巴黎浪遊，今天卻變為逃亡，跑到花都與學運戰友吾爾開希等一起向世人控訴中共暴政，茫茫前路，不知何日可返家園。

沈彤在五月底時曾說過，若中共不批准他出境留學，他便會被迫留在中國作民主鬥士，為中國民主前途而奮鬥；若中國讓他到美國留學，他便如小沙進入大海般，專心在外國鑽研學術，不過，世事難料，他亦想不到會逃亡外國，而且是在外國繼續為中國的民主而奮鬥。人生無奈，往往不能自主。



中共芒刺──方勵之夫婦

范卓雲


方勵之夫婦

六月十日北京市公安局下令通緝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和他的夫人、北京大學物理學系副教授李淑嫻，指斥「二人在這次動亂前後及反革命暴亂前採取各種方式，不斷宣傳煽動，並進行幕後策劃、聯絡。」

事實上，自學潮於四月中爆發之初，官方已在內部文件點名指責李淑嫻為「學運黑手」。五月三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記者會上首次公開指出，「方勵之在動亂中扮演什麼角色，將來的事實會作出結論」

五月十九日，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在動員平亂的黨政軍幹部大會上，點名指方勵之「在沙龍集會上煽風點火，北大有人鼓吹在方勵之領導下為民主、自由、人權而戰。」

在五月卅一日官方組織在郊區舉行的擁護李鵬的遊行中，示威者焚燒了方勵之的肖像，並高呼「打倒方勵之」的□號，中共對方勵之的仇視與憎恨已是昭然若揭。

北京發生了六月四日大屠殺事件的早晨，通過長途電話聯絡上方勵之，獲悉他們舉家平安，但仍對方氏夫婦命運深感憂慮。當時方教授語調沉重，一改過往開朗坦然的風格，他說當時他的心情悲憤凝重，雖然預料官方會以武力鎮壓學運，卻從未料想如此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會降臨京城。

就在這個時刻，方教授首次表示非常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因為政府當時已失去理性。六月五日，筆者已再沒法與方教授聯絡，直至六月七日，美國電視台報道方教授避進美國大使館的消息。中美關係更因「方勵之事件」而蒙上陰影。

在五月二十日北京市開始戒嚴後，一度傳出方教授逃離北京的消息，其實方教授到了山西省大同市出席會議，逗留一星期後再到太原他母親的家，與李淑嫻會合，然後兩人攜手於五月三十日晚上回到北京，筆者就在五月三十一日下午拜訪了他們，在他們中關村的家裏暢談了學運的種種。執筆之時，方氏夫婦仍藏身美國大使館內，前途未卜。

以下是五月三十一日方氏夫婦接受訪問的紀錄。

問：最近香港與海外的報章報道中共正在草擬一份「反革命集團黑名單」，傳聞中方教授與李教授都是首當其衝，登上榜首，你有何想法？

方：今次學運是非常正義的，要求民主自由的運動，若果我們要為這次學運而成代罪羔羊，我感到非常光榮。就像戊戌變法的六君子一樣，即使最後全部被殺也很光榮。若歷史把我們兩人推到這個地步，我們覺得非常光榮。（笑）

事實上追求民主自由是種美好的情操，人類自始至終都為追求自由而奮鬥。現在他們卻把傳播自由化思想說成是罪名，這樣只顯示出這個是強暴的政府，表示它與一百年前的清政府根本沒有兩樣。

李：假設我們被抓起來，對我們本人而言可能是不幸，但對整個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反而會有促進作用，我們能令全中國人民看清楚這個政府的真面目。

問：根據報章上披露，中共內部文件指責你們是學運幕後黑手，在背後煽動動亂。你們是否擔心會被捕？

方：是否被抓這個很難說，要看形勢的發展。大家都是普通人，都是肉造的，當然有點害怕，但我們早已做足心理準備，學生一搞這種運動我們便知道一定逃不了。就像袁木在五月三日已公開點我的名，他要靠攻擊我來威嚇學生。

李：運動一開始我們已料到這次將又再是以高層權力鬥爭為結局的。所以今次我們由始至終沒有做什麼事情，我們連天安門廣場也沒有去一次，遊行、示威、絕食從沒有參與過，目的是不想捲進這場權

力鬥爭中去。

問：有人批評你們今次故意避嫌，明哲保身，是為免「秋後算帳」嗎？

方：我避免參與並不是害怕報復，而是我覺得不參與更能表現學生是獨立的，並不是只有方勵之才要求民立自由，而是有幾十萬的學生都要求自由民主。我不與學生接觸，也使官方沒什麼把柄好抓。

李：當學運剛開始時，學生的確常找我談，因為我本身是北大的教師，而且是海淀區人大代表。我與選民接觸溝通有什麼不妥？但我並沒有如他們（指官方）所說為學生出謀策劃，我只與學生討論問題。

他們又說天安門的電話都打到我家裏來，說學生天天向我匯報，其實只是四月十七日那天學生請我把他們的請願信貼在北大，讓更多同學知道他們的要求。我是光明磊落的，我明知我家裏的電話是百分之百竊聽，但這沒關係。我還是答應了他們，到北大貼了一張大字報介紹他們的要求。

發生了衝擊新華門事件後，我到過北大勸學生不要再去新華門，但當時同學情緒太激動，說警察無理打人，於是噓我。我從四月二十日後便很少再與學生接觸了，並不是什麼刻意避嫌。事實上我的身體一直不好，我最近檢查證實患了心臟病。

問：據聞官方內部文件說你幕後操縱王丹，指導學運方向？

李：我和王丹這個孩子比較熟，主要是因為我是海淀區人大代表的關係，我們並沒有什麼特別聯繫。我只是在學運初期時提醒王丹要不提過激的口號，不要被高層權力鬥爭利用。但他們卻說是我教王丹挑起新華門打人事件，教委更造謠中傷我，說我教北大學生搞臭學生會及團委，我一定要控告他們誹謗。我作為一個公民，我有我的尊嚴，他們造謠根本不尊重我的人格。

後來看見他們竟造這麼壞的謠，我和方勵之便叫學生不要再來我們家，以免授人以柄，給他們污蔑學生運動的藉口。從學運早期開始，我們確是有意識地把自己放在較抽離的位置，學生是知道我們支持他們的，學生也自覺不找我們了，王丹後來也沒有到我們家。

問：你們以為今次學運與以往的學生運動有何分別？意義在哪裏？

方：這次學運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大突破，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從沒有一次運動是對政府作如此全面、強烈而獨立的批判。經過這次運動，人民心目中已形成了政府是人民公僕的概念，人民、學生、工人和知識分子自覺是主人了，政府是服務我們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民主概念。現在無論誰當政，就算是鄧小平，當權者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已和以往大為不同，因為現在人民可以對他公開批評，這個事實是無論如何
也不可能倒回從前那個樣子。

李：這次運動是一場很了不起的學生運動，它已經與全國所有人民連在一起。這個運動是空前的，這一代參與這場學運的學生與全北京市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段歷史，學生已經達到了教育自己和人民的目的。

問：但是政府當前的態度那麼強硬，已經戒嚴十一天了，而學生又堅持不撤離廣場，雙方這樣堅持下去並不是辦法，你們以為這個局面如何化解？

李：可能我比較悲觀，學生根本沒有物質基礎與共產黨對立。在中國現在的條件下，根本沒有任何力量可與共產黨抗衡，學生這次的鬥爭很可能被高層權力鬥爭所利用。我很擔心當強權在權力鬥爭中戰勝後，犧牲的會是青年學生，這個我很心疼。當局有可能鎮壓學生，因為市民有很多約束，他們也會很害怕，然後他們會抓一些學生，再扣一些很可怕的帽子在他們頭上。

方：學運在一段時期內會被政治鬥爭所利用，這是無可避免的。現在的戒嚴是很糟糕的情況，但運動要經過一個低壓過程才能醞釀下一個大突破。

問：你以為這個「低壓時期」是否已經到來？這會維持長久嗎？

方：中國將進入一個非常黑暗的時期，像蘇聯的布里茲列夫時代。面對這個時代的來臨，我們都感到很壓抑，但我相信這個時期在中國不會維持很長，至少不會像布里茲列夫時代那樣長，因為只要待老的一代過去，老人政治結束，中國將會出現嶄新的局面。

李：現在正是非常時期，上層現在處於手足無措的階段。但若高層一旦穩定下來，楊尚昆和李鵬上台，那便不會像目前那麼簡單了，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問：若最壞情況出現時會避避鋒頭嗎？

李：在中國是沒有地方避鋒頭的。我們也沒有避鋒頭的經驗，根本逃不了。

方：我們絕不會跑，中國應當有代表中國的良心的人出來說話，但當然不只我一個，我們認為我們應當繼續扮演這種角色。

問：你們認為為何今次知識分子會空前活躍地積極投身這次民主運動？

李：不錯，今次知識分子的參與是百年來空前的。他們這麼積極事實上是共產黨造成的，他們已沒什麼可丟掉的，他們已經夠苦了，還有什麼好害怕？已經苦得太徹底，到了最低底線了，他們只希望共產黨幹點好事。當然，今次知識分子也是被學生運動喚起來的，他們被學生感動了。

問：有些人批評某些知識分子為維護本身既得利益而投身運動，某些人更與高層某些派系有利益聯繫，你們同意嗎？

方：不錯，某些人與某些政治力量有聯繫，但如果他們做的事情有助社會民主的發展，也不用對他們另眼相看，問題是不應以小集團的形式進行。

李：現在很多知識分子都有一定背景，某一派倒下對他們會有直接影響。問：現在北京成立了首都知識界聯合會，你們為何不參加？是否以為是「小集團」？

方：他們亦沒有邀請我加入，我比較希望保持一個超然的身份，以獨立的思考和超然的位置去對政府進行批判和監督。我不是對搞政治特別感興趣，民主追求是我的業餘興趣而已。（笑）

李：我們不希望依附任何派系，也不打算當官，沒有打算加入什麼組織。

問：你們認為學生組織的發展前景如何？能否壯大成社會中制衡政府的力量？或波蘭團結工會式的組織？

李：到目前為止，學生的力量仍不足夠，社會上沒有任何政治力量能與共產黨抗衡。但學生仍可在爭取校園民主與學生自治組織合法性的範圍內繼續努力。

方：學生自己不能形成團結工會式的組織，若他們與知識分子結合起來，會有潛力發展成團結工會式的團體。實際上學生也是走一步、學一步，沒有長遠的發展計劃。

問：你們剛從外地回來，有消息說你們是暫避鋒頭？

方：這個是誤傳，我只是在戒嚴後到大同開會去。

問：為何與李教授一同失蹤呢？

李：說實話，我也是聽到很多不利於我們的傳言。我一直在北京，當時是二十五日，情況突然告急。消息說當局要抓我們，方勵之要開會一星期才回來。我怕會出事，希望看看方勵之的媽媽，她住在太原，我想去找方勵之，抓便一起抓。怎知到了太原我們一直被便衣跟蹤，不如在一個大城市（指北京）被抓好一點，至少不會被人莫名奇妙地弄死，所以我們決定回來。但沿途一直被人跟蹤，我們以為差點回不來北京了。

問：但你們也沒理由獃在這裏坐以待斃。有沒有其他打算？

方：中國知識分子已經不怕死了，我相信真理是不能違背的。暫時也沒什麼好打算了，對不對？（笑）



心繫中華的嚴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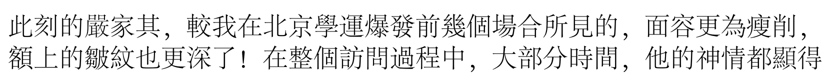
黎錫勳

「在中國人民沒有公審鄧、李、楊反動集團以前，在人民沒有取得勝利以前，中國沒有國慶，只有國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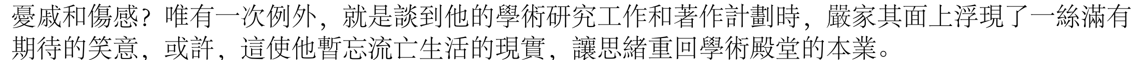
香港市民終於在七月四日「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一周月的晚上，從電視螢光幕看到身穿藍色毛衣，臂纏黑紗的中國著名知識分子嚴家其，以肅穆的神情宣讀這篇「沒有國慶，只有國殤」的講話，證實他確已安全逃離大陸，流亡巴黎，過著他飄泊異國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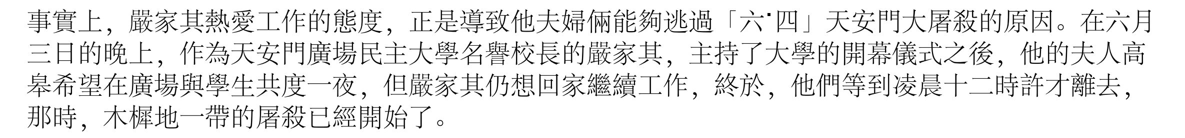
誰會料到，事隔十六天之後，我竟可在萬里之外的巴黎，面對面的跟這位著名政治學者詳談他劫後餘生的經歷，對中國局勢發展的看法，以及今後的計劃。

嚴家其



此刻的嚴家其，較我在北京學運爆發前幾個場合所見的，面容更為瘦削，額上的皺紋也更深了！在整個訪問過程中，大部分時間，他的神情都顯得憂戚和傷感？唯有一次例外，就是談到他的學術研究工作和著作計劃時，嚴家其面上浮現了一絲滿有期待的笑意，或許，這使他暫忘流亡生活的現實，讓思緒重回學術殿堂的本業。





事實上，嚴家其熱愛工作的態度，正是導致他夫婦倆能夠逃過「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原因。在六月三日的晚上，作為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名譽校長的嚴家其，主持了大學的開幕儀式之後，他的夫人高皋希望在廣場與學生共度一夜，但嚴家其仍想回家繼續工作，終於，他們等到凌晨十二時許才離去，那時，木樨地一帶的屠殺已經開始了。

嚴家其透露：他正與夫人高皋合作，策劃撰寫一部延續《中國文革十年史》之後的《中國現代史》，起迄期由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九零年，涵蓋自「四人幫」倒台、十年開放改革，以致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和以悲劇告終的「六˙四」大屠殺，將全部收納於他夫婦倆的這部歷史見證之中。

不過，此段以學生和人民鮮血鑄成的悲壯史實，不會佔去這本現代史的大部分篇幅，充其量也是一章，並且偏向於以學術研究的角度分析成因和影響，資料性的內容將不會太多。嚴家其說：已有很多人整理和紀錄這段史料，毋須由他來重複，不如把重點放於分析成因和影響方面。

嚴家其尚計劃獨力撰寫另一部探討中國日後政治發展路向的書，內容包括政、企問題、政制多元化發展、中國統一的前景，以及如何在憲法中納入邦聯制條文等。

著作等身的嚴家其談及他的著作研究計劃時，說話滔滔不絕，興緻特別高，嚴肅的表情也減去了幾分，彷彿告訴我，他的根就在這裏，只是現實迫人。

經過這次以血腥鎮壓告終的民主運動，顯然沒有改變嚴家其一貫對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看法，相反更堅定了他的主張，邦聯制、民主化、以至反對承襲了中國五千年傳統的君皇權威思想。

他認為中國日後的政治制度，將不能再單以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觀念概括。嚴家其相信大陸、台灣和香港，會在鄧小平時代之後，出現區別性的社會制度，港、台兩地會維持自由經濟體系，但大陸將會發展成為一個混合體，雖然公有制仍佔一個頗重比例，但在產權所有制方面，將會發生變化，也只有改革產權擁有的方式，中國大陸才有新的發展希望。

但姑勿論三地的制度存在什麼區別，政治民主化的原則不應有分別，必須由人民決定政府的人選，並且擁有監察和罷免權。

此外，在訪問中，嚴家其很詳細的和我縷述了他跟趙紫陽的關係，澄清了外間一直指他是趙的智囊的傳聞。

嚴家其透露：在八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間，趙紫陽、胡啟立、薄一波、彭沖和田紀雲五人，組成了一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其下設立了一個辦公室，由趙紫陽的私人秘書鮑彤任負責人，嚴家其當時確實被邀請，參加了這個辦公室的工作。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但嚴家其很清楚的表明，他與趙紫陽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私人交往，而趙的作風，也不喜歡搞個人關係，每次都是準時才來開會，馬上進入討論，完了便走，不會與辦公室的人有特別接觸。

嚴家其說，他能夠成為政改小組辦公室的成員之一，純粹是當時他正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既然是討論政治體制改革，他獲邀加入政改小組辦公室，亦是順理成章的事。

他透露在那段期間，曾經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提出相當多的建議，但最後獲接納的僅有一項，就是設立國家公務員制度。而趙紫陽雖然在外間予人旗幟鮮明的改革派形象，實際上有時也頗保守，而且對一些老革命家如胡喬木、鄧力群的意見顯得很重視。當然，鄧小平的意見，就格外受到趙紫陽的尊重。

嚴家其詳細交代跟趙紫陽的關係，予我的感覺是澄清他與趙之間並不存在私人交往，間接說明他在這次學運中挺身而出，發表宣言，組織「首都知識界聯合會」，以致批評鄧小平是八十年代的昏庸末代皇帝，完全是自發而起，並非在支持某一方面，捲入中共的黨內權鬥。

訪問結束之後，我苦苦思索嚴家其談到他的學術研究和著作計劃時顯著變化的情緒，對於一位以研究為職志的學者、著名知識分子來說，目前流亡異國，確實有另一種不能言傳的鬱悶感受，他再三強調，希望今後仍以學術研究工作為主，並且可以很快恢復，正說明嚴家其在努力衝破目前面對的禁區，準備在科學的「三無世界」之外，加入「流亡也沒有禁區」的積極進取態度。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錚錚風骨的嚴家其

林翠芬

「一個不能從災難中總結並吸取教訓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序。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四五運動紀實》，唸哲學出身的著名政治學學者嚴家其，曾以史家文筆記載文革那個狂飆時代以及一九七六年悼念周恩來的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這場始於悼念胡耀邦引發的愛國學生運動而以當權者血洗天安門告終的歷史悲劇中，嚴家其與其他敢言的知識分子投身其中，竭盡言責而不為當權者所容，以致要遠走天涯，避禍海外。

許多香港人認識嚴家其和高皋的名字，始於一九八六年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面世。那時候，嚴家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高皋是他的妻子，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醫務室大夫。該書的大部分資料，是嚴家其在文革期間搜集，由高皋利用業餘時間寫作，「歷時六年、三易其稿」，再由嚴家其修訂改寫和增補而成。

在此之前，嚴家其也寫過《四五運動紀實》。在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前後，他每天到天安門廣場拍照和摘抄詩詞，四月五日目睹了天安門事件，決心把它紀錄成書，於是訪問參與者，搜集素材，然後與幾位學者共同編寫，在天安門事件三周年的日子出版。

此外，嚴家其曾於一九七八年九月發表一篇結合文學和哲學的「哲理小說」──《宗教、理性、實踐》，訪三個時代關於真理問題的三個法庭（十七世紀意大利的「宗教法庭」、十八世紀法國的「理性法庭」，和未來中國的「實踐法庭」。）其中對當時還被視為「反革命」的天安門事件熱情地讚頌。他說：「我寫這一部份的用意主要是說明一點，任何理論、學說，思想，只有實踐才能檢驗它們是不是真理。」

嚴家其等十二位著名知識分子，在五月十四日中蘇高峰會議前夕，曾到天安門廣場勸學生：若領導人答允對話，學生便應暫時撤離。可惜知識分子對官方和學生的勸諭均未收效。目睹青年學子絕食多時而領導人無動於衷，嚴家其不禁說：「我心疼，我心都碎了！」五月十五日，嚴家其和其他知識分子首次上街遊行，聲援學生。

其後，嚴家其與包遵信等知識分子聯署了「五˙一六」宣言和「五˙一七」宣言；五月廿六日與包遵信二人發表「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兼告李鵬書」。或許就是這些宣言觸及當權者的逆鱗，要把嚴家其除之而後快。「五˙一七」宣言中說：「清王朝已死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

「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取得偉大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布，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六˙四」大屠殺後，中國處於一片大搜捕的白色恐怖，嚴家其偕妻子高皋不得不離京他往，六月下旬經港轉赴法國。傳聞他是被中國當局通緝的著名知識分子之一。

嚴家其現年四十七歲，一九六四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唸的是物理數學，然後再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作為于光遠、龔育之的學生。

也許是念科學和哲學的人，對追求真理特別執著。嚴家其有一句名言：科學領域是一個「三無世界」：科學無禁區，科學無偶像，科學無頂峰。

嚴家其為人耿直，是性情中人，他瘦削的身軀同時肩負著學術思考與憂國憂民的重擔。這位中年學者精神奕奕，思想敏銳，他講話速度頗快，待人溫文有禮，記得他穿深藍色中山裝，一派書生氣質。劉賓雁最近訪港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形容嚴家其是個可愛的人。

假如說嚴家其可愛，那麼更可愛的是高皋，她爽朗率真，國難當前更顯英氣，教人想起清末女中豪傑秋瑾。

身為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在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曾徵詢嚴家其意見。故此嚴教授常

被稱為趙紫陽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智囊。

嚴教授近年致力於研究和倡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著有《首腦論》一書。他去年訪港表示此書力圖揭示人的不完美性，所以要用制度來約束人。當今中國政制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種可以按程序和按多數人意志來修正錯誤的民主制度。「黨政分開」的實質在於確立憲法和法律至高無上的地位，使人治變為法治。此外，他主張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實行直接選舉制。

嚴氏早於一九七九年，在一個全國性理論工作會議上，力倡廢止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而他身為社科院中最年輕的所長，在去年堅拒再三連任政治學研究所所長之職，只出任研究員。

近年他一再批評中國官場的「請示病」和「簡報政治」，希望高層領導人廣聽老百姓自由發表的各種意見，而不靠不全面的「簡報」作決定。

嚴教授去年六月訪港時曾在一篇名為「勞思光精神」的短文中說道：「在今天的中國，由於法制不健全，『無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現象大量存在。所謂『權大於法』，就是掌握某種權力的人，可以不顧法律、規章、制度的規定作出決定……掌握某種權力的人，就可以隨意侵犯人們的權利。」

「中國要實現現代化，樹立法律至上的原則是絕對必要。」

嚴教授一貫強調法治精神，呼籲要用法律保障改革，要用法律來保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他在五月底被傳名列黑名單時尚理直氣壯地說：「我不怕，我沒有做違法的事情。」

可是，其後的現實比他估計的「黑暗期」更可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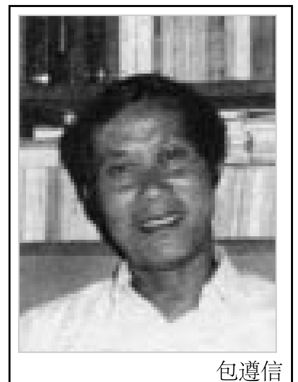
嚴家其於六月下旬經港匆匆寫下公開信說：「希望未來中國要制定一部長期穩定的憲法，把三權分立、聯邦制、軍隊的非政治化和國家化，作為憲法的根本原則，確立憲法至高無上的權威，以法治代替人治。」

嚴家其形容中國的前途充滿了光明──「人民的血不會白流。民主潮流，洶湧澎湃」。



民運急先鋒——包遵信

譚衛兒


包遵信

五月底的一個下午。那天，包遵信背著個大挎包來到筆者下榻的飯店，進門坐下便說：「累死了。」然後一骨碌坐了在沙發上，掏出煙盒，像往常一樣，又開始吞雲吐霧了。

包遵信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是個爽朗，不拘小節的人。每次與他見面，他都是在吞雲吐霧間滔滔不絕地說出他對時局及許多社會問題的見解。離開香煙，他便會有點坐立不安似的。

「我現在是無業游民」，包遵信這樣自嘲。當時，他已放棄了日常的工作。作為首都知識分子代表，他參加了「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與堅守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共商這次學運的發展。

也許已經感覺到了血雨腥風的先兆，他說：「你看我的日常用品都在這個挎包裏了，走到那睡到那，反正是不能回家睡覺了。我已經豁出去了，大不了去坐牢。」

從學運開始，包遵信便全心地表示了支持。四月中在北京時與他傾談，他便很清醒地指出，這是一次純學生運動，沒有人去預謀組織，也沒有人能去預謀或試圖控制。但從八六年學運的經驗看，「到頭來並非沒有鎮壓的可能」。「但是我是不怕的」，他這麼說，望著他那和靄可親的妻子和兩個活潑的孩子。

言猶在耳，包遵信已成為了首批被通緝的知識分子之一。談到對學運的看法，包遵信總是很興奮地說，中國的新希望充分體現在學生的身上，他又強調知識分子的參與不是要去指導學生，而是要與學生共同戰鬥。他還不斷提醒海外傳媒不要把功勞過多地歸於知識分子。

「學生運動完全是自發的，他們不需要指導，今天的青年的確令人刮目相看，他們具有很強的凝聚力，他們的精神面貌心理素質產生了質的變化，這次運動超越了『五四』，也超越了傳統。他們是在推動歷史的發展。」

「學生教育了群眾，也教育了我們，沒有學生，就沒有知識分子的『五˙一六』和『五˙一七』聲明，也不可能有『五˙一七』的百萬人大遊行。」

五月十三日開始，一直得不到政府真誠對話承諾的學生，開始在廣場上絕食，包遵信和一批知識分子目睹年輕的精英一個個倒下，而政府卻不聞不問，不禁心急如焚。他每天奔走於天安門廣場，勸告同學們多保重；同時與另一位也是全心全意支持學生的學者嚴家其，共同發起了「五˙一六」和「五˙一七」聲明，強烈譴責政府的麻木不仁，呼籲建立民主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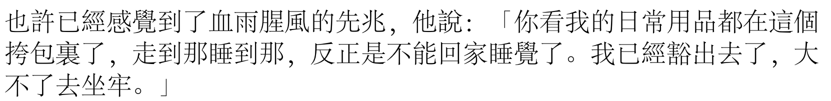
五月二十五日，戒嚴下的北京城氣氛日趨緊張，包遵信與嚴家其又聯名發表了《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問題——兼告李鵬書》：

「當前的問題必須在民主與法制的基礎上解決……如果李鵬要採取暴力鎮壓，如果李鵬不惜動用武力來維持他搖搖欲墜的統治，那麼，億萬中國人民誓將以鮮血和生命來為中國鑄造民主。」

因為包遵信對學生們的真誠理解，使他也得到了同學對他的理解。學生們曾一再強調他們的運動是純潔的，不希望也不願為任何人或勢力所左右。而包遵信更從來沒有以居高臨下姿態去與學生們接觸。

於是同學們便常常找包遵信討論運動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記得幾次在包遵信家裏，我們之間的談話常被電話鈴打斷。「是學生打來的，告訴我一些新的情況。」

包遵信也沒有試圖要說服學生在運動中考慮黨內鬥爭的因素，儘管事態的發展並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學生運動是純潔的，而黨內鬥爭則剛好相反，兩者不應混為一體。」他說。五月下旬，當學生之間為了是否撤離天安門廣場爭論不休，各界人士出於種種考慮紛紛勸告學生撤離時，包遵信卻堅決主張同學們不能撤離廣場。



包遵信分析，撤離廣場本來是個好建議，「但到了五月底卻不能撤離，因為政府已經把同學們逼到了絕路，這個時候撤便是失敗，而且撤了也沒用。」

他以一個知識分子的敏銳觸角，預感惡夢即將降臨。「鎮壓的可能隨時存在，一旦出現鎮壓，中國便會出現專制暴政，十年改革的成果將會喪失殆盡。但我相信，即使他們真的得逞，也只能是短命的政權，因為當一個自稱為人民政府的政府與人民完全對立時，它的壽命就不會長久。」

包遵信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學生們絕對不是要推翻共產黨，他們並非要打倒某人然後扶起某人，他們是要推翻專制。

他還大膽地說出對鄧小平的看法：「他是一個悲劇人物。是他領導的十年改革使人們思想開放，但他卻在一步步地扼殺人們的民主意識。是他把學運的矛盾激化了，因為他實際上與毛澤東是同屬一個思想體系的。從八四年清污和八七年的反自由化，直到今天便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包遵信曾經承認，他同意同學們較為激進的一些做法，因為他深深地被學生們所感動，也因為他只把自己當作學生之友，而非以學生之師自居，才有這樣的感覺。

面對記者，他也是很自然地便從被訪者的身份很快地轉成朋友式的交談，甚至是爭論，但最終大家還是在諒解中道別。

那天晚上，筆者曾與包遵信討論過學生應否撤離廣場的問題，臨走時，他說，「下次再跟你解釋清楚。」

現在，這「下一次」已成未知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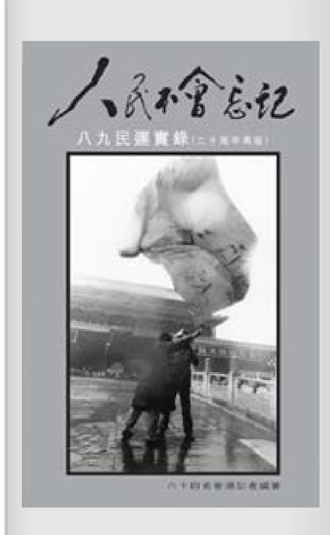
初次見包遵信是去年秋天，在深圳蛇口的一個關於十年經濟改革經驗的座談會上。

散會後，我找到他，跟他談起十年改革的得失，然後免不了談到他作為顧問之一，在當時引起廣泛爭議的電視系列片《河殤》，包遵信很興奮地告訴我說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表示支持《河殤》，並把一套拷貝送給了來訪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他還說《河殤》的作者們又在準備一套紀念「五˙四」七十周年的系列片，「這套片子將比《河殤》更具震撼力。我也會為它作顧問。」可惜的是，這套片子終於又胎死腹中。

為了進一步宣傳大陸知識分子對開放改革的見解，在一群海外熱心人士的幫助下，包遵信從年初開始計劃創辦一份政論雜誌，原定為紀念「五˙四」七十周年發行創刊號，但由於包遵信全心全意投入這場民運，創刊號暫時擱置。「六˙四」事件後，他在港的朋友們繼續包遵信的努力，終於使《太平洋論壇》得以與讀者見面。但是，它的創辦人包遵信現在卻生死未卜，下一期《太平洋論壇》何時再面世，已成未知數，然而我們相信包遵信的一句話：「這樣的暴政，時間是很短命的。」





倡行法制的曹思源

劉銳紹

六月三日深夜，天安門廣場附近的狼兵已在磨刀霍霍，我們正在捕捉各方面的最新動態。忽然，電話響了，是曹思源的妻子打來的。在電話中，我第一次聽到曹思源失蹤的消息。

她說，曹思源於當天中午從古城區家中外出買菜，本來準備很快就回家，但自此一去無蹤。當時，他的衣著很隨便，腳上還蹬著一雙經常在家中穿用的舊鞋。

不久，我們終於從可靠的消息來源知道，曹思源是被捕了，直接原因就是他受全國人大常委胡績偉委托，組織要求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觸怒了權重一時的李、楊集團，因而招來身繫囹圄的結果。

四月中旬學運開始，形勢越趨嚴峻，不少人大常委認為有必要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局勢。曹思源受人大常委胡績偉的委托，徵求其他常委的意見，聯名要求開會。此舉直接刺痛和威脅到當權者的利益，因而要馬上壓下去，不但不准開會（有一內部規定，全國人大的有關會議必須中共政治局討論和確定後才能召開），還要追查此事始末。

曹思源首先被捕，成為今次「秋前算帳」中第一位被算帳的知識分子。他被捕是在血腥鎮壓之前，可見當權者一早已有部署，而不是鎮壓後緝捕漏網之魚，從而可以證明當權者整個算帳行動都是有預謀、有組織的。

曹思源現年四十三歲，江西景德鎮人。他出身低微，家人靠做手藝過活。貧困的生活給曹思源很大的鍛煉。他讀完書後，一直在基層工作，為他了解國情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直至一九七九年，他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班，當時帶他的導師正是張顯揚。

這段學習之後，曹思源進入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工作（當時趙紫陽擔任該委員會主任），成為了國家智囊班子的一員。隨著多種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他於一九八三年提出了企業破產法的構想。他奔走於各大城市之間進行調查，提交報告。一九八四年，他開始為推動「破產法」而開展院外活動。當時他遇上了敢言肯說的人大代表溫元凱，並通過他動員了其他人大代表，把破產法的議案提了上去，就此開始了訂立破產法第一步。

後來，曹思源被調到全國人大法律起草小組，負責執筆起草「破產法」。草案出來之初，人大常委會不通過，曹思源於是分別按資料打電話給一百五十多位人大常委，向他們逐一解釋和聽取意見。當時有人指他不應這樣做，認為這樣會「影響人大常委的獨立思考」。但他認為這是憲法容許的，所以仍鍥而不捨地繼續下去，幾經艱難，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終告誕生。曹思源亦因此而得到「曹破產」之名。近年來，他還不斷地關注「破產法」的執行情況，希望提出完善和修訂的方案。去年，深圳當局要處理一宗破產案，還特別請他南下作「軍師」。

「破產法」一役後，曹思源又向「人大會議旁聽制」進軍。他說：「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是先易後難的，即首先是將人大會議公開化，例如大會、常委會議設旁聽制度，其次是實行人大代表選舉制，差額一定要多於席位一半。」

從一九八七年起，他到處演講，力倡人大會議設旁聽制，後來他更為全國人大代表起草了有關提案，結果再次被接納。由一九八八年六月起，多個地方的人大以及全國人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行了旁聽制。曹思源又一次院外活動成功。

經過了在體改委的幾年工作，曹思源雖然嚐到了成功的滋味，但他同時感到很多無可發揮之處。主要一點是：體改委的工作逐漸變成是為領導層搜集支持其政策和主張的材料，為領導層創造輿論基礎；真正從下而上的改革方案卻往往不被重視。所以，曹思源去年毅然辭退了體改委的工作，在四通集團負責人萬潤南的支持下創辦了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簡稱「四通研究所」）。

很多人不太了解四通研究所和四通集團的關係，其實兩者只是經濟撥款的關係，四通集團撥出一筆款項讓四通研究所進行他們認為值得搞的項目，從沒有要求他們為四通集團的市場和業務作調查研究。這純粹是一種支持
「窮得只剩下知識和良心」的專業人士開展調研工作的行動，加上國內的行政制度規定任何機構，都

要有上級掛靠單位，所以才出現了四通研究所與四通集團這樣的關係。

四通研究所成立後，連曹思源在內，實際的工作人員只有三人。曹的妻子是教師，有時協助一些零碎的雜務。就這樣，這個位於海淀區民族學院附近一個胡同小院內的研究所便幹起來了。他們的工作中，較多人熟悉的是
「修憲活動」和「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簽名事件」。

曹思源在接受訪問時表示，議會民主的建立需要一個過程，長遠是修改憲法，在憲法中應對人民權利、地位有具體規定，包括投票權和選舉權等。在八九年三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他向若干人大代表提出了五項有關憲法的建議，包括人大應設立憲法委員會，使人大及常委會有效行使解釋、修改和監督執行憲法的權力；修改憲法條文藉以保護商品經濟的地位和公民私有產權；要求增加條文，說明任何人在法院判決之前均應作無罪論。

為了深入探討，加強思想溝通，曹思源於三月廿六日組織了一次「修改憲法理論研討會」，豈料又遭到「勸告」。當時中共高層已決定憲法暫時不作修改，但恐怕在研討會中會出現與中央不一致的論調，所以要間接施加壓力。曹思源本來邀請了一些頗有影響力的人大代表，但這些人後來都被「打招呼」不要出席。曹思源同時也接到「勸告」，請他把範圍和影響縮小。為了大局和長遠利益，曹思源主動限制了與會人數，並婉拒了港、台和外國記者的採訪，連一些已發出的開會通告都要收回，所有通知信都寫上姓名和編號，以便入場時核對。當時，這種做法引起了不得其門而入的記者們的猜測，甚至有所誤解。其實，曹思源所想的，正是要避免被人抓住把柄，說他們借輿論界來壓中央，橫加責難。此事反映國內連一些學術主張的傳播自由也沒有，確實悲哀。

與曹思源交往已有一段日子，對他有三點印象至為深刻。其一，他是典型的漸進改革派，這一點他自己也直言不諱。他了解中國有很多事情是急不來的，更不能激進，所以他便常採用院外活動等合符正常途徑的方法，而且也常奏效。

其二，他是個對目標鍥而不捨的人。前面提及的破產法的產生過程可以證明這點。他的人力正表現於事情似勝似敗、希望若斷若續之間。

其三，他的說情說理的表達能力至為到家，相信很多聽過他演說的人都會深有同感。可以說，他的每一句話，都說到點子上的。

當代聞一多——陳明遠

蔡詠梅

四月底到北京後，聽到不少人在議論陳明遠。他們說陳明遠是北京知識界公開站出來支持學生的第一人。

胡耀邦追悼會那天，北京十餘萬學生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外，欲見胡耀邦遺體最後一面，但追悼會結束後，靈車竟然絕塵而去，學生悲憤萬分，於是有北大學生郭海峰等三人舉著請願書，走上大會堂台階，要求見總理李鵬。

李鵬不出來，三名學生把請願書舉在頭上跪了下去，足足跪了三十多分鐘，沒有一個政府官員走出來接請願書，也沒有一個政府官員上前勸解。

廣場上十多萬學生遠望此景，莫不心碎，莫不悲憤，許多絕不掉淚的男同學也忍不住悲憤大哭，有個學生用手提擴音器往自己頭上狠狠砸下，頓時血流滿面。

這時被邀請到大會堂參加追悼會的陳明遠見狀非常感動，立刻趨前抱著下跪的同學，相擁大哭。陳明遠把他們扶起來說：「男子漢大丈夫，不要下跪。」

學生回答他說：「我們不是向任何個人下跪，我們是向國徽下跪，是向周恩來在天之靈下跪。如果周恩來和胡耀邦活著，一定會出來見我們學生。」

陳明遠覺得自己再不能沉默，他激動地向三名學生說：「我作為一個老師，認為你們的行為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因此支持你們的正當要求。」

次日陳明遠前往北京各校園，發表支持學生的公開演講。

陳明遠，四十八歲，是北京語言學院教師，數理語言學家兼著名詩人，文化大革命時，他才是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但因他寫的舊體詩氣魄宏大，曾像毛澤東詩詞一樣廣為流傳，甚至有人把他支持學生的行動與聞一多相比，稱他為八十年代的聞一多。他在北大校園一次演講時也曾說：「我不害怕，我尊敬的聞一多先生在四十七歲時就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五月十六日我在北大三角地帶見到「當今的聞一多」。這天是包遵信、鄭義、李陀等知識分子舉行「五一六聲明」的新聞發佈會。

擠過學生圍成的厚厚人牆，第一眼看見的是站在會場中心，神情悲憤的一位中年男子，及他雪白襯衣上兩行鮮艷醒目的大字「陳明遠誓言，與學生共生死」。

記者會舉行了一個多小時，陳明遠一直是兩手握拳，神情悲憤，雙目凝視前方，一直這樣站著。

到他發言時，他雙手捧著話筒，聲調高昂，略有點顫抖，顯然心中很激動。他說，學生開始絕食靜坐後，他曾到天安門廣場與學生一起渡過漫漫長夜，與學生和民眾坐在一起。他感到「中國人民有了中國人的尊嚴」，而尊嚴就是平等，就是自由，就是能夠講真話。

陳明遠的講話有詩的激情，鏗鏘動聽，運用許多排比句，一句比一句有力，最後把情緒推到最高潮，聽得人熱血沸騰，加上他是學生熱愛的老師，演講結束，學生報以雷鳴般掌聲。

第二次見到他時，在天安門廣場，正是二十日清晨，剛廣播了李鵬和楊尚昆講話，學生運動被當局定性為「動亂」，廣場充滿悲壯的氣氛。絕食團指揮部在指揮車之前舉行記者會，宣布廣場二十萬學生集體絕食。

突然，車上傳來我們熟悉的聲音：「我是陳明遠，北京語言學院教師，我陳明遠決定加入學生的絕食行動，這是為了捍衛同學們的民主權利和憲法的尊嚴。」他拖長了的悲聲在夜空中迴盪著。

但當晚十一時，陳明遠高血壓和腦血栓病發，進了醫院。他托學生打電話給我，我次日到醫院，他身體很虛弱，躺在床上向我口授了《陳明遠繼續絕食聲明》。

他說他反對踐踏憲法的戒嚴令，「如果不取消此令，我陳明遠死不瞑目。」講到激動處，甚至哽咽落淚。但充滿激情的陳明遠的政治觀念卻非常溫和。他說，學生運動之所以能維持一個多月，主要是以溫和理性的方式去爭取民主。有些學生曾一度要自焚，陳明遠和幾個老師力勸才使學生打消這種激烈的念頭。他甚至批評一些人過於激進，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陳明遠處處以憲法為據，就是在病床上憲法也未離過身。

陳明遠不像一些冷峻的學者，對現實保持著清醒的悲觀。他是詩人，沉浸在學生運動壯麗崇高的境界中，因此對前途很樂觀。他說五月底戒嚴令宣布後北京社會秩序良好，相信戒嚴令不會長久維持下去，他還說，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最安全。

但後來局勢的逆轉與這位善良人的善良願望完全相反。

他是個純粹的詩人，不是政治人物，只因為道義、良心和詩人的激情才捲入這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中。在廣場的日日夜夜中，他寫了很多詩。我臨離開北京時到醫院向他辭行，他正在修改那些詩章，我提議為他帶到香港發表，他說還要修改。他說，他的詩都要經過反覆推敲，但這次有些猶豫，說：「最好還是讓這些詩保持我寫時的原貌吧！因為這是廣場的產物。」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備受爭議的戴晴

蔡詠梅


戴晴

戴晴給我的感覺是思想敏銳開放，言詞犀利，有時咄咄逼人，是一個個性鮮明的女強人型知識分子。

到北京不久，即在友人介紹下，前往芙蓉里戴晴家登門拜訪。

大陸很多知識分子與港台記者談話一般都比較謹慎，哪些該談，哪些不該談，都很有分寸。但戴晴似乎無此顧慮，大談她對學運的看法，而且當著我的面與那位友人談論不足為外人道的北京知識界的自家事，甚至他們的鬥爭策略。

她說，不怕接受訪問，但要求絕對忠實，要有錄音機才講。她說，其他知識分子怕錄音機，她不怕，只怕記者歪曲了她的原話。因為我當天未帶錄音機，而且事前也說好只是隨便聊聊，應她的要求，不得報道當日她講話的內容。

後來，我聽說戴晴在北京知識界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這可能與她的身世和政治觀念有關。她是葉劍英的養女，曾在國家安全部工作過六年，與中共上層的改革派人物有一些淵源，據說可以通天。對此戴晴也並不諱言。

在政治上，她是新權威主義支持者，主張開明強人政治，與許多民主派知識分子意見相左。對這次學運，她是不贊成學生到廣場絕食靜坐，認為過於激進的行動會引起動亂，打擊到黨內的改革派。

學運高潮時，北京知識界瀰漫著激進抗爭的氣氛，許多中青年知識分子甚至擺出「死磕」（北京方言意謂拚命）的姿態。在這種情況下，戴晴較保守的立場自然不會受歡迎。

五月廿二日首都知識界大遊行，大隊伍在復興門集合，我在這裏碰見戴晴，平時意氣風發的她，此時顯得有些落寞。有人問起曾與她一道發起聯署行動的蘇煒，她坦然說，「蘇煒已疏遠我，說我保守。」

她拿著「首都知識界」這面旗幟，遊行總指揮、報告文學《強國夢》的作者趙瑜不客氣地對她說，「回到你自己的單位中去。」

以戴晴在知識界的地位，趙瑜似乎不該這樣不客氣。

此變化主要與五月十四日戴晴與另外十一位文化界名人的斡旋行動有關。據其中一位說，該日廣場絕食的學生與閻明復等對話，閻明復通過戴晴找到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等十一名知識分子充當調停人。這位知識分子說，他們去斡旋時，要求當局答應學生的要求，其次勸學生停止絕食，撤出廣場。但次日《光明日報》報道時，卻顛倒了他們呼籲的次序，給人的印象是他們主要是要學生停止絕食。他們感到受了欺騙，被人利用了，而且認為戴晴在其間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一些知情的知識分子也對戴晴頗多微言。有個知識分子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消息傳出後，戴晴正出席前美國大使夫人包柏漪舉行的告別宴會。這時有人建議停止宴會，但戴晴不理，依舊興致勃勃跳舞。

這自然是一方面的說詞，因為太忙，一直無時間訪問戴晴，問問她本人的看法。

不過我注意到，在十四日後，首都知識界的重大活動，如發表「五˙一六聲明」，成立「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等，一向活躍的戴晴並不在其中。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革命工人韓東方

黎佩兒　麥燕庭


韓東方

「現在戒嚴期間，我們到這來，需要承擔『衝擊公安局』的責任，但被抓的是『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的常委，若叫學生去談判，是沒有道理。（鼓掌聲）

「我認為應該由工人去談；北京通訊設施先進，公安局之間很容易聯絡上，若要查有沒有抓人，根本不存在要用一天的時間核實、三天才公布抓人原因的問題。」（鼓掌聲）

他輕輕揚手止息群眾洶湧的憤怒，再以十分冷靜有力，緩疾有致的語調說：「但我們要顧全大局，請你們相信我的頭腦，無論我出來作出的決定是怎樣地出人意表，都請你們相信我的大腦……請你們在我進去之後，想一下什麼是『顧全大局』。」

韓東方三言兩語便把學生在交涉中的代表性，被公安局蒙騙的問題全點出來，他與另外兩名工人終於獲准入公安局交涉「工自聯」三名核心分子的下落。

留下百多名工人和數十名學生，楞楞地看著他高瘦的身影──既震懾於他的冷靜理智，又對他誇下的承諾滿腹狐疑。

那天是五月三十日下午，烈日當空，大批工人學生打著旗幟，不理戒嚴令，公然聚集在前門東大街的北京市公安局，抗議及向公安局要人。

事緣當天凌晨，「工自聯」的沈銀漢、白東平、錢玉民分別被公安模樣的人，強行架走。

二十多名工人早上九時到來交涉，被公安逐個錄像，氣氛十分緊張，千名學生從廣場趕至聲援，工人代表擔心會予當局「動亂」口實，勸諭同學回廣場，僅留部份學生作聯絡通訊員。

公安局指「工自聯」是個非法組織，只答應與學生談，談了很久，學生帶出來的消息是「當局要二十四小時後，才能回覆有沒有抓人，若有，將在兩天內解釋抓人原因」。在場工人非常不滿，群情洶湧。

下午三時許，工人代表終於爭取到入內談判，談了一刻鐘，韓東方出來了。

公安局不斷以強力的廣播：「現在是戒嚴期，同學不要受少數人煽動，不要上人當，應馬上離開，因聚在公安局門前，是違法行為。」

韓沒有用喇叭，他在震耳的廣播句語停頓處，向群眾交代「當局沒有答覆他們」。

他仍然要求在場的工人「相信他的大腦」，再等一小時，才聽他的最後應對方法。

工人在焦灼中度過一小時，公安局仍無答覆，韓東方要求工人聽他的：遷到天安門廣場東北面的中國公安部靜坐，直至該三名工人獲釋。

工人果然聽他的，全站起來跟他打著旗，秩序井然地離開那剛剛增派千多名武警駐守的公安局。

由一名軍隊「先進」變成被官方鎮壓的反革命組織的負責人，韓東方的心路歷程足以證明「革命往往從靈魂深處爆發」的名言。

甫跟個子高高、面孔長長、五官稜角突出的韓東方打個照面，便覺得他是一個硬朗和倔強的人，再加上那股淡淡的、溫文爾雅的書生氣質，記者很快便在一群幹完宣傳工作回來的工人中，注意起他的舉動來，再經人介紹，才知他便是筆者要找的人，當時他是籌組中的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的負責人。

現年廿六歲的韓東方於北京出生，但還未得到首都氣息薰陶，便於三歲回到窮困的山西省黎城縣老家。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爆發，在這五年，他過著艱苦的生活。但他認為，「這是得天獨厚的好事，

他學懂了獨立思考，對外界的反應，防禦都加強了。」

帶著這些特點，他走進了軍隊，過著刻苦的紀律生活，使他倔強，硬朗、吃得苦的性格逐漸形成，並在部隊獲得「先進個人」的榮譽。他笑說：「我紅得很哩！」他復員後轉當了三年武警，於八四年轉往鐵路局工作。

但悼念胡耀邦活動卻改變了他平凡的生活。韓東方憶述道，在四月十七日經過天安門廣場時，他看見紀念碑下圍著很多人，於是便下車看個究竟，聽見不少人在發表有關時弊和民主自由的演講。他說：「我受到感染，很激動，於是也發表演講，大家都很激動，開始感覺到民心所向。」自此以後，他便不時到廣場吶喊和演講。

他和上街募捐的同學傾談起來，更加深了他對民主自由的渴求和對學運的認識。學生開始在廣場絕食後，韓東方每天下班便跑往廣場東側的歷史博物館前留意學生的情況，間中也找學生領袖談理想。

然而，學生為保持學運的純粹性，刻意排拒外界的加入。韓說：「學生對我的意見有興趣，但對我的職業沒興趣。」

韓東方每晚去看望學生，和常在那裏的十多名工人混熟了，他們逐漸感覺學生「承受不住，犧牲太大，需要工人及市民接力。」於是在一些學生協助下，在五月下旬籌組「工自聯」。

在他構思中，「工自聯」並非什麼福利機構，而是一個具監察功能的論政團體，由不同行業的工人選出代表，再由代表選出常委，但考慮到工人會因壓力大而不敢參加，以致一個行業內沒有足夠人數參加，故也可按區選派代表。他樂觀的認為，無論是大廠或小廠，只要約十人參加他們的組織，工廠便不敢怎樣。

但他的想法根本無法驗證，因為號稱實行工人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最怕的便是工人。「工自聯」五月卅日晚上正式成立，但當天凌晨官方便來抓人，使「工自聯」還未正常運作，便遭取締，而學生工人大聯盟的計劃亦告吹。

韓東方沒有懷疑自己籌組「工自聯」的能力。他輕鬆地說：「還可以。雖然我只是高中畢業，沒上大學，但平常也自修心理學、社會科學。而且我頭腦特別清醒，邏輯思維較強。」

韓東方沒有上大學，但他說：「鄧小平上台後曾標榜文憑至上，但我不同意，所以刻意抵制。」他頓一頓又說：「不過，現在倒有點後悔，所以唯有靠自修了。」

那他是否作了一次「錯誤」決定？他將來又會否為現在的抉擇而後悔，害怕被開除？他毫不猶疑地說：「不怕，人總有辦法活下去的，我只希望有一個真正能為工人講話的工人組織，況且現在退回去，處境可能更壞。」

韓東方笑言，他的妻子也是經過他這番解釋後，才減少憂思，後來更常在公開場合出現，在精神上支持他，使他幹得更心安理得。

韓東方不諱言想當政治家，然而，在他心目中，政治家應能看清楚政治形勢，並能掌握民眾心理；可惜現在的當權者已脫離群眾，而政府亦過於官僚。

他在血腥鎮壓前預計，若政府鎮壓學運，國民經濟便會崩潰，因工人可能消極怠工。生產必因而長期受損，比罷工更可怕。此外，更會令中國在國際上的威信一落千丈，而中國的地位亦因而受影響，令一些人瞧不起中國人。

看來，他真的不幸言中了。

學生組織與運動策略

羅綺萍 麥燕庭 梁美芬 黎佩兒



學生愛國心佈滿紀念碑上。 冼偉強攝

「八九中國學生運動」被視為是中共建國以來一次最偉大、最有組織及富策略的民主運動。正因為這個原因，很多人卻懷疑這次學生運動可能有「黑手」在背後指揮，這些黑手，可能來自官方，亦可能來自反政府的勢力。這些疑團，即使在「六˙四屠殺」事件之後，仍無法解答。

本文從整個學生運動的始末和學生組織的興衰探討，在運動中客觀形勢與學生組織的發展如何互相影響；學生何時才開始意識到需要有策略及財政資助，後來又為何不由自主地受整個形勢帶著走。

從學生組織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這次運動的組織性建立於什麼基礎，同學參與的動機，以及究竟官方指這場運動「早有預謀」的程度有多少？

高校崛起自治會

整個運動期間出現的學生組織，分別有各院校的學生自治會或籌委會、「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高聯）、「對話代表團」（對話團）、「絕食團指揮部」、「外地學生自治聯合會」（外高聯）及「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廣場指揮部）。

運動的目標和策略也隨著形勢及時機而改變。學生運動的長期目標是爭取言論、加快民主化和改革開放步伐；中期目標包括懲治官倒、增加教育經費等。在不同時期，學生都有一些短期目標和口號，如為胡耀邦平反、懲治「四˙二○血案」元兇、要求對話、否定「四˙二六」社論、聲援《世界經濟導報》。後來政府不答應絕食學生提出的要求時，學生開始喊出「李鵬下台」的口號，北京實施戒嚴和軍隊開始進城，「反對軍管」及「打倒李鵬」頓成主流口號。

胡耀邦逝世後兩三天的學生上街，極大程度上是自發行動，同學都是自告奮勇地站出來，維持秩序和帶領喊口號。

北京大學是第一所成立學生自治會籌委會的院校。繼北大之後，北京各主要院校都爭相傚尤，成立自己的學生自治會或籌委會，挑戰原有由黨、政府及校方控制的學生會。

北京師範大學在各院校中，是唯一成功以投票選舉方式，選出學生自治會成員，這實屬一項創舉。

投票於四月二十四日舉行，八成同學贊成成立學生自治會，獲選為主席的是吾爾開希，其他常委是梁二、程真、彭濤、張軍和趙剛。

雖然多數院校不能成功選舉學生自治會，但學生代表的代表性卻很少被同學質疑。學生領袖的冒升，一般是透過演講及實務工作，某人表現出他的演說技巧、思辯能力、工作實績及領導才能，便自然被推舉為領袖。反過來說，如果某人作風不務實或愛出鋒頭，校園內很快便出現批評他的大字報，北大的丁小平和張智勇被罷免便是明顯的例子。如果學生的不滿情緒嚴重，學生領袖也會下台，「北高聯」的周勇軍及吾爾開希就先後因為作了錯誤決定，引起同學不滿而遭罷免。

最初，各校的學生自治會組織較鬆散，大多沒有長遠計劃，只是碰到問題才作改善。例如最初他們沒有想到要搞宣傳，後來才組織宣傳隊，在校內及上街宣傳。

總體而言，學運初期雖然已出現了學生組織，但沒有長遠計劃，故不能起太大的領導作用，主要靠學

生目標一致，團結齊心。大多數學生都很自覺知道做什麼對運動有益，什麼對運動有害。這種自覺性，加上一定程度的領導，令這場運動踏穩了第一步。

領導核心北高聯

在北京學運中一直扮演領導地位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北高聯），是在四月二十六日正式宣布成立的，但其前身「北京高校臨時聯合會」，則早於四月二十日已成立。

在悼胡期間，由於學生組織力薄弱，以致在混亂和失控的情況下，發生「衝擊」中南海新華門事件。至此，學生發現若單靠各校個別的行動，難以達到他們要求平反胡耀邦及改善社會的七點要求；於是部分學生開始推動其他院校籌組高校聯會組織。其中以吾爾開希最積極，並擬訂綱領，徵求別人認同，並在四月二十日早上在各大院校內張貼，號召同學前往人民大學開會。

結果，當晚十七間院校前來參加會議，但在較早前較為活躍的清華大學、政法大學和北京大學均沒有承認這個由北師大發起的高校臨時聯合會，只表示支持籌組學生聯會這意念。

迄至四月廿二日，幾間主要院校終於在人民大會堂前悼念胡耀邦時，答應組成北京高校臨時聯合會，並於四月廿三日舉行首次會議，基本定下了北高聯的組織雛型；由北大、清華、政法、師大、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學院和中央美術學院等七所較大院校選出代表組成常委會，其他院校則任委員。但北高聯並非一權力架構，其決定只供其他成員院校參考。

這時的北高聯可說已踏入組織較完善及推動學運的階段，因為它除了定下院校成員外，更鼓勵各院校籌組自己的學生自治會，使該會更具代表性；又建議各校自治會自行籌募經費，應付開支。

北高聯首次發揮作用，是統籌高校學生於四月二十四日起的無限期罷課，以逼使政府與學生對話，答允七點要求。其實許多院校之前已各自發起罷課，北高聯只是從中協調，統一行動。隨著百多所高校逐步加入罷課行列，使「北高聯」的組織更加擴大，討價還價的力量亦越形壯大。

此外，「北高聯」亦決定以北京為「總部」，把學運擴展至全國，因此議決派出二、三百學生串連中國各大城市的院校，游說外地學生投身學運洪流。

領導今次學運的北高聯，在這段期間正處於醞釀及籌組階段，只是因應群情而予以協調，基本不起推動及先鋒作用。

北高聯於四月廿五日決定於廿七日舉行大遊行，以抗議官方指這次學運為「極少數別有用心者製造的動亂」之言。結果學生取得極大勝利，凱旋回校，受盡同學讚賞，這是北高聯的黃金時期。

由四月廿二日至三十日的北高聯，可說是進入全面學運推廣期，其目標除了爭取七項要求外，還要求政府承認北高聯和學生自治會為合法組織，承認這次學運是愛國學運，答應不要秋後算帳。

四月三十日以後，北高聯在學運中的角色即開始淡化，轉為對話，因為政府自「四˙二七」大遊行後，聲言願意和學生對話。但由於政府不願與北高聯這「非法組織」對話，為了顧全大局，北高聯自動淡化角色，以免引起對抗，而對話的角色則由各院校學生選舉或協商產生的「對話代表團」擔任。

到了絕食時期，北高聯再一次退居幕後。吾爾開希、王丹等曾在北高聯會議中提出以北高聯名義發起絕食，但被認為行動太激烈，遭到否決。但二人仍以個人身份，在北大和北師大發起絕食行動，最後有三千人參加。

北高聯在這時期的處境相當尷尬。從組織角度，吾爾開希和王丹應該遵守會議決定，但據北高聯的一貫慣例，決議只供院校參考，無約束力，所以王丹、吾爾開希二人發起絕食，北高聯只能徒呼奈何。加上參與絕食者眾，更加重北高聯的壓力，如果當時北高聯仍堅持反對絕食，必被群眾口誅筆伐。北高聯因此作出快速反應，於絕食首日便發表聲明，重申絕食非由他們發起，但表示支持。

由於絕食非由北高聯發起，「北高聯」在廣場內的領導權便轉到絕食團指揮部，使它在學運的領導角色進一步淡出，改為進行長期深化工作。

制度化的對話團

「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是在五月五日成立的。成員由各大院校以選舉方式產生。代表約有三十至四十人。主要是研究生及博士生等。

對話團的組成是希望把學生與政府的對話「制度化」，成為一個經常性的組織。

對話團團長為政法大學攻讀國際法的學生項小吉，副團長為北大的沈彤。在等候政府與學生對話的答覆期間，對話團日以繼夜地舉行會議，就對話內容作好充分準備，內容主要圍繞三方面：一、這次學生運動的性質及影響；二、就國家經濟體制深化改革、人口、教育等問題進行討論；三、憲法第三十五條賦予公民的言論、結社、出版、集會、遊行、示威權利。可是，政府一直拖延對話，對話團的準備可謂前功盡廢。

五月八日，北高聯已同意復課。除了北大之外，其他大學均已復課。但他們有一個先決條件，要求政府在五月十日或以前與他們對話，不然，他們會保留繼續罷課的可能性。

然而，政府一直採取拖延態度，直到學生決定進行絕食行動，才匆匆定出五月十四日在中央統戰部對話。這是對話團唯一的對話活動。

五月十三日，由於絕食團的同學開始絕食，並把絕食地點移到廣場，而戈爾巴喬夫快將訪京，政府也感到事態嚴重，故在五月十三日下午，派統戰部部長閻明復與個別學生領袖──王丹、吾爾開希及北師大中文系講師劉曉波談話，但沒有結果。

五月十四日下午，閻明復再與學生代表見面，但仍不是限於對話團的成員，參加的學生還有北高聯和絕食團的代表。

這次見面完全失敗。在會議的過程中，北高聯代表王超華認為絕食同學應該撤出廣場，她認為，同學絕對承擔不了破壞中蘇會議的結果。同時，王亦要求政府答應不要鎮壓，不要秋後算帳。吾爾開希則提議絕食同學由廣場西邊移到東邊去，盡量不影響中蘇會談。王丹、柴玲則堅決不撤。在場同學，由於來自不同團體，其中絕食的同學比較激動，聽到類似王超華的意見均表不滿，結果這次會議不歡而散。

五月十四日會議失敗後，整個運動的焦點已由對話團轉到絕食同學身上，運動的主導亦落在廣場的絕食團指揮部上。

直到五月廿日，李鵬宣布戒嚴後，同學們已知道要求對話已是完全沒有意思，對話團亦因此解散。對話團部份成員充當廣場學生組織的顧問。

對話團是多個學生團體中最溫和的，成員也是最成熟的。他們有比較長期的目標，也有充分的資料準備，希望與政府長期溝通。可惜，這個組織一直未能發揮作用，而當絕食行動出現後，這個靜態的、較為理性的組織已經為激情的群眾運動所掩蓋，最後銷聲匿跡。

應急產生的絕食團

絕食團於五月十三日成立，是在部分北大及北師大同學發起絕食之後組成的。成員全是自願參與絕食的同學，人數由最初幾十人到最後三千人。

絕食團開始時是完全自發的。它是獨立於北高聯和對話團。絕食團開始時並沒有具體組織。絕食同學只是希望藉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使政府與他們對話。大部分絕食同學根本沒有預備逗留在天安門廣場超過七天。他們當中，很多都以為絕食兩天以後，即在戈爾巴喬夫抵京之日，政府就會把他們趕走。他們亦沒有破壞中蘇會談的動機。

出乎意料之外，五月十五日，政府仍是沒有任何行動。當時已是絕食的第三天了，在晝熱晚寒的天氣下，絕食學生開始有人暈倒。北京的市民看見學生開始暈倒和吐血都忍受不了，工人聲援隊就在當天下午來到廣場，捐贈行動紛紛出現。

由於聲援與圍觀的群眾越來越多，絕食學生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為了保護絕食學生的安全，避免他們受到過多的騷擾，一些同學開始自發組成糾察隊，以維持天安門廣場的秩序及財政。絕食團指揮部就在此時出現，以安排救護人員的工作及救護車、物資聲援車輛的進出。

絕食團指揮部的成立完全是應急產生的。至於他們如何組成，亦沒有明確的選舉程序。絕食團常委有七人：柴玲、封從德、李錄、張伯笠、郭海峰、王文及夏斌，其中封從德與李錄並沒有參與絕食行動。到底絕食團指揮部常委如何產生，用什麼準則，並不明確。至於指揮部最初的總指揮為什麼由王文擔任，根據王文稱，主要因為他是第一位簽名參與絕食的同學。

後來柴玲成了總指揮，則是由於五月十五日學生在廣場挪移時，她站出來維持秩序，於是自動成了總指揮。

絕食團指揮部成立後，廣場的秩序有所好轉。「特別通行證」亦在此時開始出現，負責秩序的糾察只容許有任務在身的人走進廣場中心，「通行證」似乎是「有任務」的證明。可是，誰有權發通行證？根據什麼原則？卻好像是負責同學的主觀決定，指揮部並沒有一致的客觀規定。因此，有些同學開始投訴指揮部的同學及糾察隊是「小官僚」。不過，直到五月十七日全市大遊行為止，負責的同學總算非常合作，同學團結的情緒仍是十分高漲。

可是，五月十八日開始，北高聯、對話團及絕食團三個學生團體開始出現分歧。

絕食本身是迫使政府讓步的策略，也是所有和平請願行動中最激烈的一種。北高聯一開始就反對採取那麼激烈的行動，但反對無效。三千學生自發絕食，部分學生更將絕食當作目的，而非手段。

絕食的發起人都異口同聲地指出，當時提出兩項要求，原以為政府兩三天就答應了，他們特別選五月十三日開始絕食，就是配合戈爾巴喬夫訪華，製造政府讓步的時機。但他們估計錯誤了，政府堅決不

讓步。

廣場指揮部與外高聯

北京宣布戒嚴的首幾天，廣場內沒有組織正式管理，由北高聯、絕食團、對話團及「京外聲援同學指揮部」集體領導。掌握權力者仍是絕食團常委柴玲、封從德和李錄等。

「北高聯」的角色比較隱晦，主要透過常委吾爾開希、王丹等參與廣場管理。

這段時期學生的主要行動，是組織人手堵截軍車，他們組織敢死隊，分別前往各軍隊駐地，組織群眾攔截軍車，並「教育」軍隊，解釋北京沒有動亂，懇請他們離去。

另外一部分學生則繼續在街頭演說，向市民說明絕食及所謂「動亂」的真相，呼籲群眾於晚上至凌晨到廣場附近，防止軍隊進駐。

這時期在廣場冒起的另一個組織是外地高校學生聯合會（外高聯）。

外地學生知道北京學生絕食消息後，分批赴京聲援，部分參加了絕食，但過半是絕食結束後抵京的。

北京學生對外地學生一直採取冷淡態度，甚至由始至終沒有正式統計外地學生的人數及來地。部分外地學生領袖在絕食時，已向北京學生領袖表示，希望籌辦全國高校學生聯會，但北京學生領袖對他們表示，仍未到適當時間。

外地學生在廣場內自成一體，漸漸發展出自己的組織來。五月十八日凌晨組成「全國高校聯會籌委會」，希望北高聯成為該會轄下組織，但北高聯沒有理會，也不派代表出席。該會便視北高聯放棄權利，仍自稱「全國高聯」，不過一般人仍稱之為外地高校學生聯合會。

外高聯組織鬆散，行動也較激進，決策機構是各省市代表組成的常委。

五月二十三日，北高聯宣布撤出廣場，授權天安門廣場學運臨時指揮部負責管理。指揮部於五月二十四日正式成立，柴玲為總指揮，封從德、李錄、張伯笠和楊濤是副總指揮。

外高聯與北高聯的關係緊張，外高聯與廣場指揮部就有點劍拔弩張的味道。外高聯經常批評指揮部領導不力，五月二十八日竟決議「接管」廣播站，指明日後一切廣播要得到外高聯批准。可是由於外高聯組織鬆散，未能實際執行這項決議。

雖然外高聯與指揮部之關係惡劣，由於二者都較為傾向堅守廣場，故沒有產生明顯衝突。

廣場指揮部及外高聯有一個共同點，都是沒有提出學運的新策略及走向，甚至三百所院校決議的「主動出擊」方案，這兩個組織也沒有實際執行。兩組織在廣場，主要負責分發物資和管理廣場，然而，當中香港學生組成的物資站似乎扮演更重要角色。在鎮壓前的一個星期，分發物資，工作基本上由香港學生統籌，他們更計劃重新編排架設帳篷，整頓廣場。多數物資站的香港學生表示，他們不想扮演這樣的角色，但當時廣場領導混亂，根本託付無人。

撤離廣場？

學生組織的另一個重要發展是加入「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與知識分子、工人及市民組織交換意見，及計劃聯合行動。可惜這個組織尚未正式展開活動便遭鎮壓，實際所做的只是兩度建議學生於五月三十日及六月二十日撤離。

在鎮壓前夕，學生組織間最大爭論是撤與不撤。贊成撤離者以為學運的階段性任務已完成，再留在廣場會招來鎮壓，應該返回校園，繼續深化民主運動工作。

北高聯在這問題上的態度也有改變，初期他們主張撤離，五月二十三日付諸行動，自行撤回北大。但五月二十九日的常委會議，卻決定廣場靜坐應堅持下去，理由是廣場已成為海內外關注的焦點，中國人民爭取民主鬥爭的象徵。

至於柴玲、封從德和李錄等絕食團及指揮部成員，表面上相當堅持不撤，與廣場共存亡，事實上態度很曖昧。

事實證明沒有一個組織可以決定何時撤離及付諸實行。他們曾經用「大民主」的方法決定，就是讓廣場內三百間院校各派一個代表來投票，但過半數的票不僅不贊成撤退，反而要求採取更激烈行動。

然而，學生並沒有充分討論撤離的利害關係，外地學生一腔熱誠來京，要他們了解及認同長遠運動策略，必須加以討論和說服，最好讓廣場每一位學生都知道利害所在。然而學生領袖沒有做到這點，連曾經說過廣場內辦民主沙龍，最終也沒有實現，結果這個不撤離的決定出於感性多於理性。

貪污腐敗？

學生組織另一個引起關注的問題是財政管理。學生的籌款活動匯集了一大筆款項，準備用作長期運動的開支，可是這筆錢卻缺乏完善管理。

北京大學是首間發起籌款活動的。北大學生四月廿一日開始在校園籌款，兩小時內已募捐得一千多元人民幣。其後，許多院校都效法紛紛在校內籌款。

及至四月廿五日，學生透過電台和電視台知悉《人民日報》翌日社論的內容，便到街上宣傳，說明他們不是搞動亂，同時在街頭募捐作學運經費。

當時交收捐款的程序混亂，學生通常拿了捐款便用來買所需用品，沒有單據，甚至沒有登記。由於那時大家都一腔熱誠，貪污濫用金錢的情況鮮有所聞。籌得款項分別用於各院校，北高聯基本上不管財務。四月廿六日，北高聯主席周勇軍表示，北高聯根本不需用錢，活動開支全由各院校自行負擔，學生到外地串連，也是如此。

五月初，北高聯開始直接接收捐款。例如五月五日，它就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港幣一萬元。然而，北高聯此刻仍未建立財務制度，誰管帳也不清楚。

個別院校如北大、政法大學等，處理捐款方式較清楚，他們以大字報形式向同學交代捐款數目及用途，北大更准許同學到指定房間查閱帳目。

吾爾開希四月廿三日以北高聯主席身份，透過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向香港學生發出四項呼籲，其中一項是要求香港的同學解囊支持學運。與此同時，中文大學學生也開始籌款。香港學界在學運早期為北京學生籌得最大筆款項。

除香港學生外，香港各界、海外華人及北京市民團體，都拿出金錢支持北京學生，甚至中華全國總工會也在五月十八日捐贈了十萬元人民幣給學生。

戒嚴期間，廣場管理日趨紊亂，廣場副總指揮封從德承認學生中有「貪污腐化」現象。

學生組織裏較為有系統的財務制度，至五月廿八日始建立。廣場指揮部成立財務部和監察部，前者由封從德負責，後者歸柴玲和王丹管。問題是柴玲是封從德妻子，她掌監察似乎不大合理；王丹則沒怎樣執行過工作。他六月一日表示，他沒興趣和時間，自己根本不願意當財務監督。

另外，許多捐款──尤其是私人捐款──都曾直接交予個別的學生領袖。以個人名義接受捐款的有吾爾開希、周勇軍、楊朝暉、柴玲和封從德等。這些捐款的處理沒有任何監督，是否用於學運也只能憑學生們的良心而已。

學運是學習民主的過程

學生的組織性是體現民主精神的重要機制，然而在參與者眾多、場面浩大、形勢瞬息萬變的學運裏，要這群沒有組織經驗的學生事事合乎民主原則，實在是苛求。總體來說，上述學生組織離理想尚遠，如果配合形勢來評價，已是相當不錯。

其實這些組織在可能範圍內，已依循民主程序作決定。例如一再強調遊行、罷課、絕食純粹自願，不加強迫；五月六日，北大決定是否復課，以宿舍為單位投票決定，結果超過三分二否決復課；五月十五日凌晨，以聲音大小決定是否向東挪動，騰出空位歡迎戈爾巴喬夫；直到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上也同樣以喊聲決定去留；五月二十五日由三百間院校決定未來策略。這種民主精神是值得嘉許的。

誠然，在這次學生運動中，實在是出現不少組織問題，如有些學生領袖貪污以及在運動中有很多非理性決定。正是由於這些問題出現，從而反映出這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並非如官方所說由「黑手」策劃和指揮。學運開始時，學生們並沒預料到會發展到有如此龐大的參與人數及財政資助，因而，他們亦沒有準備要應付處理「財政問題」。因為，以前的學生運動，都沒有這個經驗。

這次學生運動基本上是自發的，是隨著形勢一步一步升級的，連學生自己也預知不了下一步會發展成怎樣。所謂「見步行步」，才是學生處理這場運動的真正特色。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民運中挺立的知識分子

譚衛兒 林翠芬 范卓雲 黃漢軍



橫眉冷對千夫指。 陳木南攝

己巳年（一九八九年）是一個寓意深長的年頭。它剛好是為中國首次帶來「民主與科學」意識的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然而，誰也沒能料到，它更給中國民運歷史上帶來最悲壯最慘烈的一幕。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一開始便投身到這場民主運動之中，並像涅槃中的鳳凰，徹底擺脫了中國人傳統的依賴權勢的軟骨頭形象，在硝煙中獲得了新的生命。

八九年伊始，著名知識分子方勵之首先致函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要求藉著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機會，本著人道主義立場，大赦七九年民主牆運動之後，被判刑十五載的魏京生等一批政治犯。隨後，知識界出現了三次聯名上書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公開信，打開了知識分子以聯署信向中央進言的新局面。

善良而單純的知識分子，懷著赤誠之心，希望當權者能順應時勢，將中國的民主化推進一步。

可是，三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卻對知識分子的熱切提議置若罔聞，「皇帝」不可靠，唯有靠自己的力量。在當時議政欲望已被挑起，卻祇能骨哽在喉的形勢下，許多知識分子紛紛應邀到北京各大校園以民主為題演講，並準備與學生在五四期間舉辦一連串的研討會，探討中國民主進程發展中的種種問題。

一人倒下去，萬人站起來

四月十五日，素以愛護知識分子著稱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鬱鬱不得志中猝然逝世，使中國的民主事業出現新的轉折點。廣大知識分子在悲痛之餘，對中央對胡的「蓋棺定論」極為憤懣，同時也對中國民主前途深表擔憂。

在胡耀邦逝世當晚，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就指出：「必須繼承胡耀邦的民主精神，不能讓中國的民主進程與政治改革停頓，要繼續自上而下的深化改革」。

四月十九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辦事處與《新觀察》雜誌共同舉辦了一個座談會，一批胡耀邦的生前友好、老部下、老同事在會上抒發自己對胡的深切哀思，一致認為中央應對胡作出一個公正的評價。同時，與會者也紛紛表達了對時局的憂慮。發言尖銳，一針見血。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韶華說：「要評價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就要看他是推動還是阻礙了歷史的發展。」前《人民日報》社長秦川說：「按照馬克思主義原則來判斷，耀邦當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堅持實踐與理論的統一，凡親自舉手贊成的政策，他都要去貫徹，如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幹部年輕化等。耀邦同志是一個有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科技日報》副總編輯孫長江說：「與他（胡）在一起感到是和『人』在一起，而不是跟那種官、『假人』在一起。」

馬列主義研究專家蘇紹智說：「胡耀邦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在前年受到不公正待遇時，我們很多人為他惋惜和不平，那種非程序的權力轉移，對中國、對共產黨確實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著名的《光明日報》記者戴晴更指出：「我們的希望，中國的前途，黨和國家的希望不能寄託在個別領導人的人格上，而應該建立在機制的保證上。」

但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準備在四月二十四日的一期刊登此次座談會的紀要時，卻受到當時身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禁止發行，《導報》總編輯欽本立也遭停職，上海市委隨即派工作組進駐《導報》。

人民不會忘記
八九民運實錄（二十周年實錄）
八十四名香港記者編著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一個座談會為何引起當權者的恐慌呢？事實上，能否稱胡耀邦為馬克思主義者，當時一直是中共高層內部激烈爭論的一個焦點。在胡的悼詞起草過程中，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照顧知識分子的情緒，曾指示「能協調的都盡量協調」。悼詞在四易其稿後比訃告較適當地評價了胡在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方面的功績，肯定了胡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為促進思想解放和理論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並稱胡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悼詞未能為八七年學運、胡的下台以及其後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作出重新評價。

也正因如此，四月二十二日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要求參加胡耀邦追悼會的十幾萬大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外聽完悼詞後，心中的憤怒、悲痛終於忍不住爆發，使學生與政府之間的對立情緒，有增無減。

有感於四月二十日產生了流血衝突，翌日，嚴家其、包遵信、李澤厚、于浩成等一批知識分子聯名寫了一封致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公開信，呼籲政府不要忽視學生的要求，並表示同學們提出的加速民主化進程、清除黨內腐敗現象，及要求新聞自由的建議是有建設性的，要求政府吸取「四˙五」教訓，盡快與學生對話。

參與聯署此信的其中四人於二十一日晚把信送去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但卻遭信訪辦官員無禮對待。四名代表被盤問幾十分鐘，他們遞交的公開信亦被擲到地上。他們等人繼而到大會堂向人大遞交公開信，信雖被禮貌地接收，不過沒有任何答覆。

隨後數天，北京大部分高校陷於罷課浪潮中。中國人民大學一百五十四名教師聯署一份公開信，指出官方喉舌對學運報道嚴重失實，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要求《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等單位向學生公開道歉。在其後的數日，不少教授、講師紛紛在各校登壇演講，支持學運。尤其是《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後，激起了更多知識分子反對政府的態度。這時，由嚴家其等人發起的那封公開信聯署者已由原來的四十七人增至二百人以上。

與此同時，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及政府對新聞的干涉，也激起了首都知識分子中的另一群體新聞工作者強烈抗議。五月四日的學生遊行，數百名新聞工作者亦參與，成為遊行中的一個隊伍。

五月九日，幾百名記者到全國記者協會遞交請願書，要求就新聞自由問題與政府直接對話。中國新聞工作者連番大膽行動，得到數以萬計大學生的聲援。

五月十三日，當北京大學生開始了震驚中外的絕食請願時，中國廣大的知識分子不再沉默了，他們終於按捺不住心中的焦慮與憤怒而站起來。

可憐赤子心，驚醒王者夢

五月十四日，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訪華前夕，十二名著名學者和作家：戴晴、嚴家其、李澤厚、溫元凱、于浩成、李洪林、劉再復、包遵信、蘇煒、蘇曉康、李陀及麥天樞，聯署一份緊急呼籲，呼籲黨政領導人趙紫陽和李鵬與學生直接對話，公開肯定學生的行動為愛國運動而非動亂，並承認學生自發組織，不要進行暴力鎮壓。

同時，他們並親赴天安門廣場勸諭學生發揚「四˙二七」和「五˙四」兩次大遊行表現出的可貴理性和克制精神，暫時撤離廣場，以使中蘇高峰會議能順利進行。他們指出，民主是漸進的過程，並非一朝一夕可以爭取到。

可惜，十二位知識分子的緊急呼籲並未被當權者理會。翌日，數萬名知識分子打出「中國知識界」的旗幟，首次上街遊行聲援學生。嚴家其、包遵信、老鬼、鄭義、柯雲路及趙瑜等都身掛書寫自己姓名的布條，走在隊伍的前列。此外，許多大學教師、科學家及北京的新聞工作者也打著各自所在單位的旗幟參加遊行。

「五˙一五」中國知識界首次大遊行，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不再是「缺鈣」的「軟骨病患者」，他們從此與學生一起投入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休戚與共。

五月十六日，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知識分子憂心如焚。一千多名北京知識界名人聯名簽署了著名的「五˙一六」聲明，旗幟鮮明地讚揚此次學運是一次繼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覺醒，再次強烈呼籲黨和政府切實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廢止特權，查禁官倒，清除腐敗，實行新聞自由，廣開言路，共商國是。

聲明指出：「我們已經來到一個歷史的關頭，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已經再無機會可以喪失，再無後路可以退卻。」

「富於憂國傳統和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意識到自己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挺身而出，推進民主進程，為建設一個政治民主、經濟發達的現代化國家奮鬥！」

在聲明上簽署的著名知識分子包括巴金、嚴家其、包遵信、劉再復、艾青、蘇紹智、李澤厚、鄭義、趙瑜、李陀、范曾、馮至、季羨林、王瑤、嚴文井、楊憲益、李洪林、溫元凱、蘇曉康、王魯湘、汪曾祺、劉心武等。

北京十間大學校長也於同日傍晚聯署一封致中央的公開信，希望黨政領導人盡快與學生進行有建設性的對話。公開信說：「我們對同學的健康和生命非常擔心，我們也為祖國的前途擔憂。……廣大同學和政府之間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北京大學的部分教師員工更到天安門廣場通宵靜坐，他們的標語寫道：「學生一去，何以為師，救救孩子！」

在此期間，一些老作家、老學者也為絕食學生的安危，憂心如焚。

八十九歲高齡的名作家冰心於五月十七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此謂民之父母，以能保我子孫」的短文，她寫道：「我認為現在只要有一、兩位黨政主要領導人在天安門廣場露面，向幾十萬群眾，那怕說一、兩句同情理解的知心話，就會引導事態向著理智秩序的方向發展，那麼我們的子孫們就不必付出不必要的慘重的代價！」

病中的老作家巴金在上海發表一封公開信，對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表示支持。他說：「我認為今天學生們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們所做的正是我們沒有能完成的事情，中國的希望在他們身上……我相信，一切愛國的、正直的、有良心的人們都會愛護他們，保護他們。」

可是，無論老作家們如何苦口婆心地規勸，如何強烈地呼籲，處於高位的當權者卻仍然無動於衷，不肯正視問題。知識分子和其他市民的情緒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當五月十六日趙紫陽在會見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並透露鄧小平仍是中國高層的掌舵人後，知識分子及市民的怨憤情緒立即直指鄧小平。嚴家其、包遵信等多名知識分子立即發表「五˙一七」聲明，直斥鄧是一名「老朽」的昏皇。宣言說：「現在我們祖國的問題正充分暴露在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面前，這就是，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

「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布，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的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布，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時窮節乃見，團結威自顯

五月二十日李鵬宣布首都部分地區戒嚴，激起民眾無比憤慨，北京勇敢直言的知識分子紛紛挺身而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誓與倒行逆施的李鵬政府堅決抗爭到底。

戒嚴令頒佈後的第二天，嚴家其、包遵信、金觀濤等十五人率先發表
「保衛憲法宣言」，呼籲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討論學運問題，並聲明憲法賦予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要求政府「立即撤銷違背人民意願的戒嚴令，撤出進駐北京的部隊」。同日，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等五名知識分子聯署拍電報給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要求他結束美加訪問盡速回國，解決當前危機。

五月廿二日，十名知識分子發表誓言，宣誓者包括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王軍濤、沈大德、吳庭嘉、閔琦、陳小平、李德偉和謝小慶，他們誓言「絕不背棄愛國學生的生命和熱血所開拓的爭取民主的事業，絕不以任何藉口為自己的怯懦開脫，絕不再重複以往的屈辱，絕不出賣自己的良知，絕不向專制屈服，絕不向八十年代中國的末代皇帝稱臣」，表現出中國知識分子四十年來罕有的道德勇氣，以及要與強權鬥爭到底的決心。

同日，首都逾萬名知識分子不理戒嚴令的限制，組織了龐大的知識界大遊行。他們高呼「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的口號，強烈反對在北京實施軍管。廿五日，知識分子與工人及學生再一次發起百萬人大遊行，黨和國家直屬機關的許多幹部也毅然參加了。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知識分子組成的裴多菲俱樂部，曾經使匈國的民主運動推向一個歷史性新高潮。在五月的抗爭中，一個中國的「裴多菲俱樂部」也順應潮流在北京誕生，它的誕生對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五月廿三日，九十多名知識分子成立了「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簡稱「北知聯」），嚴家其和包遵信出任總召集人。其他參與者包括蘇曉康、王魯湘、王軍濤、劉再復、李洪林、于浩成、蘇紹智、蘇煒等。

「北知聯」的成立宣言明言：「慘痛的歷史教訓警告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退路。知識分子沒有退路，中國人民沒有退路。後退一步，就是流血，就是中國民主進程的夭折，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前功盡棄。」

宣言又說：「理智告訴我們，再也不能一盤散沙了，知識分子應當組織起來，投入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

這個中國的「裴多菲俱樂部」更明確地打出「打倒李鵬政府」的旗幟。知識分子到了此階段，已完全超越了學運早期時對學生「聲援」與「支持」的層次，而是提升至主動全身投入這場全民愛國民主運動中去。

正如方勵之夫人、北大物理系副教授李淑嫻曾經表示：「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個民主運動中表現出空前的積極性和熱情，是百年歷史中所未見的。知識分子今次可說是被學生所喚醒的，……而且，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太苦了，他們再沒有什麼要丟下了，他們一無所有！」

包遵信也承認知識分子在學運的前後期扮演了非常不同的角色。他說：「最初我們是關心、聲援學生，我們站在支持學生運動的立場上出發。但現在不同了，我們認為知識分子在這個時刻必須挺身而出，學生擁有熱情和勇氣，但缺乏理論依據和冷靜頭腦，知識分子則較深思熟慮，我們在現階段正扮演著學生的顧問角色，為學生作思想裝備，做學生的腦袋。」

「北知聯」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內起了主導和帶領的作用，作為中國的精英，他們在這場全民愛國民主運動中擔當了「智囊」與「參謀」的角色，為學生、工人和市民提供有力的理論和思想武器。在新聞封鎖的情況下，「北知聯」更出版油印刊物《新聞快訊》，報道民運最新動態和海外重要消息，突破官方的宣傳壟斷。「北知聯」所倡導的「要在民間建立起制衡政府的力量」的目標，可說初步達成了。

不過，亦有另一些知識分子更直接地支援學生運動，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擁護改革開放路線的四通公司。一直以來，四通公司被人們視為與趙紫陽有著密切關係，而這家作為全國首家最大規模的民辦企業，自八四年成立後一直是開放改革政策的成功典型。在學運期間，四通的負責人曾多次協助及安排「北高聯」和「外高聯」的學生領袖開會，並為學生籌募了十多萬人民幣的經費，供購買藥物及食品之用。

另一方面，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思源則應全國人大常委、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的委託，徵集在京的人大常委簽名，尋求召開常委緊急會議。

六月二日，在當權者始終施展拖延手法下，知識分子迫不得已實行「死諫」。四名知識分子包括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及文學評論家劉曉波、來自台灣的作曲作詞家侯德健、四通公司顧問周舵，以及原《北大週報》主編高新在天安門廣場用絕食行動抗議當局強硬實行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由我們長期的軟弱所犯下的過失」。他們也對學生的非民主手段提出批評，呼籲學生冷靜反思自己所做的一切，從民主鬥爭中學習民主。

精英遭誣陷，黨爭浪捲來

但是，這批當代中國精英捨身為國家民族前途進言，卻招來中共當權派的惡毒指責，誣指他們為「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和搞政治陰謀的人」，直斥他們「同西方國家的這種戰略相呼應，內外勾結，上下串通，為中國製造動亂。」中共當權派為知識分子扣上了「動亂黑手」和「政治陰謀家」的帽子，企圖把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社會開明進步力量一舉殲滅，以清洗黨內外一切挑戰當權者的異己分子。

在學運期間，不少人士曾經對知識分子的空前參與提出疑問，懷疑他們基於維護自身既得利益而投身民運，藉發動學生及知識界支持趙紫陽和反對李鵬，來捍衛自己的現有權位和博取將來仕途亨通。特別是知識分子發表的「五˙一六」和「五˙一七」宣言，以及後來「首都知識界聯合會」所發表的「倒李」言論，更招來不少「知識分子淪為高層黨爭工具」的流言。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後來在他的「平息暴亂」報告中更指出，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五月十七日便向學運領袖泄露了戒嚴的機密，隨後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主持緊急會議，決定用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村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名義發表了「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並有「體改委」成員跑到天安門廣場公布趙紫陽「被罷免」的消息，並呼籲全國罷工、罷課和罷市，後來這個講話被印成《人民日報號外》廣為散發。

無可否認，不少領導今次民運的知識分子確是與高層有著較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嚴家其，因為過去他在鮑彤負責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工作經歷，使他一直被外界認定為趙紫陽的重要智囊，在推動「保趙倒李」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這種說法只是簡單地把嚴家其與高層的關係和他支持民運掛上因果關係。另一位民運悍將包遵信亦被很多人認為是「保趙」人馬，但事實上，包氏對趙紫陽的保守性亦頗多不滿。

其實在中國現有體制下，知識分子為要實質地影響國策和參與改革政策的制訂，在所難免地要與高層，特別是掌權的領導人保持一定聯繫，以求在建制內發揮影響力。這次民運的發展來說，知識分子確是本著一顆社會良心來推動社會變革，但為與高層保守勢力抗爭到底，在口號上往往提出支持某派系或打倒某領導人。據曹思源的說法，他們只是支持民主改革和開明路線，並非針對特定派系或領導人來支持。可是，知識分子萬萬沒有想到，他們對國家的死諫，竟會換來一場前所未有的腥風血雨。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六月四日，當權者的坦克、機槍粉碎了知識分子祈求政府懸崖勒馬的幻想，隨即大追捕、大整肅的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神州大地。一些人鋃鐺入獄，一些人流亡海外，而一些人則下落不明。

北京當局隱瞞事實，對外界實行新聞封鎖。目前對大陸知識分子的具體情況尚未能瞭解。據初步統計，除劉曉波已確實被當局逮捕外，傳聞已被捕的知識分子還有曹思源、王魯湘、戴晴、李洪林、于

浩成、張顯揚、張偉國、葉文福、包遵信、柯雲路、趙瑜、高瑜、李大同等。另外，在首都的文化界、新聞界人士中，傳聞有大批人士已遭逮捕或隔離審查。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此次民運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嚴家其，以及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等，在「六˙四」屠殺後及時逃生，已輾轉安全到達法國。七月中旬在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際，嚴家其與在美國講學而不得返國的著名記者劉賓雁會合，聯同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組成了「民主中國陣線」，準備在海外聯合一切愛國華人組織，繼續進行推翻北京現政權的鬥爭。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經過六月一場大浩劫後，中國知識分子已擺脫了過去軟弱的形象，挺直了腰板。他們現正痛定思痛，總結教訓，在血泊中爬起來繼續作戰。

我們流著一樣的血——香港的支援

陳寶珣　顏婷　李婉貞
黃慧日　楊健興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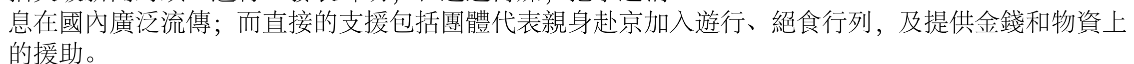


大批香港物資運抵天安門廣場。 陳天權攝

「在因胡耀邦逝世而觸發的北京學運之前，中國民主發展在香港一直只能引發小部分人的關注。雖然絕大部分港人流的都是炎黃子孫的血，但因一直生長在高度競爭的商業社會，港人對爭取本身政治權利尚且冷淡，更遑論對數千里外北京學生追求民主的行動有什麼意見。

「五四」期間北京學運並未引起港人廣泛關注，更談不上援助；直到五月中北京學生開始進行絕食，港人從電視新聞看見救護車不斷在廣場上穿梭往來，「嗚嗚」響號聲不絕，瞬即打動港人冷漠的心靈。而五月十九日李鵬一番殺氣騰騰的訓話，更激起港人的正義感，掀起全港性的支援運動。

港人透過遊行集會聲援，和捐助物資金錢支持北京學生。「六˙四」血腥鎮壓及隨之而來的秋後算帳，雖未改變港人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但對未來支援運動的具體策略，一國兩制下港人對國內民主發展的參與角色，港人治港與港人救港的矛盾相繼出現，港人在幾次百萬人大遊行所表現出來的大團結，面臨考驗。

港人對北京學運的支援可分間接和直接兩方面，間接方面包括突破新聞封鎖、遊行、發表聲明，和透過傳媒，把學運消

息在國內廣泛流傳；而直接的支援包括團體代表親身赴京加入遊行、絕食行列，及提供金錢和物資上的援助。

為了突破國內的新聞封鎖，本港多個團體都發起一人一信或一人十信運動，利用郵遞和傳真機網絡，將北京學運真相，傳送到中國各地，尤其
「六˙四屠殺」之後，這類函件更是「舖天蓋地」湧入中國，引致後來國內一些地區須派駐人看守傳真機，甚至切斷有關線路。

當絕食學生身體開始支持不住時，本港各界都拍電報要求中國政府盡快與學生對話，反對武力鎮壓，其中也包括本港全國人大和政協的代表。從戒嚴開始至鎮壓之後，各類團體，不分左、中、右，不分行業，個人以至公司個別部門，均在各大中、英文報章，發表聲明支持北京學生，反對北京武力鎮壓。

而由五月四日至六月四日屠城後，港人前所未有地發揮團結精神，走上街頭，以口號、歌曲、淚水抗議當權者的麻木不仁，對學生表示支持和深切哀悼。

香港市民的歷史性大遊行

香港十三間大專院校五月四日首次聯手舉行集會遊行，聲援大陸學運，集會規模為歷年罕見，出席學生共三千人，市民則有二千。

五月十四日，二十多名「四五行動」成員開始在天星碼頭絕食，而專上學生聯會的二十名代表則於十五日起在香港新華社門前絕食。

五月十七日，六千多名本港市民和學生應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和學聯的號召，遊行至新華社請願，打破過往香港人遊行人數最多的紀錄。

李鵬「五˙一九」講話後，翌日凌晨上萬人聚集香港新華社門外高呼打倒李鵬。當天雖然高掛八號風球，仍有四萬人冒著風雨參加民促會發起的維園集會，高呼「打倒李鵬」、「李鵬下台」等口號。

五月二十一日，本港出現首次歷史性的百萬人環市大遊行，遊行隊伍由中區出發，遊行至新華社對面的香港賽馬會舉行集會，香港新華社職工徐海寧在會上代表該社部分員工，指責李鵬政權專政，集會上也宣布全港市民聲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正式成立。

「五˙二八」全球華人大遊行，將香港支援北京民運推至高峰，遊行人數約達一百五十萬人，遊行隊伍由中區出發，至北角，再折經東區走廊後解散，過程歷時八個小時。

「六˙四屠殺」徹夜驚震香港，十萬市民馬上於六月四日當天在跑馬地舉行「黑色大靜坐」，哀悼天安門死難同胞。「支聯會」發起大規模一人一信運動，將屠殺真相告知國內親友；幾位熱心市民則在新華社門外設置公祭靈堂，供市民弔唁。

本港親中陣營離心

北京學運期間，本港左派及親中機構亦紛紛倒戈相向，旗幟鮮明地反對官方的處理手法。

五月二十一日，香港《文匯報》社論首次開天窗，只寫上「痛心疾首」四個字。同日，香港新華社部分員工在該社門外掛上橫額，表示堅決支持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擁有十七萬會員的香港工會聯合會及四千多會員的教育工作者聯會在多次遊行中都積極參與，並明顯打出橫額，支持北京學運，譴責軍管和武力鎮壓。

《大公報》和《文匯報》的員工多次參加了遊行，而《大公報》員工在遊行時更打出該報的旗號，而該報館外也掛著大型橫額，支持學運。而在港

人大和政協委員紛紛拍電北京，要求立刻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處理學運事件，避免使用武力。

本港中資機構員工和親中學校，紛紛在報章上刊登廣告，支持學運，要求政府與學生對話。這類廣告，可謂盛況空前，各大報章都因之要加紙，增添頁數來容下大量廣告。屠城前仍可在北京流通的《文匯報》及《大公
報》，逐成為學生的精神食糧，學生看到那麼大量、大篇幅的香港廣告聲明支持，對他們是莫大的鼓舞。部分基本法草委諮委，例如起草委員兼政制小組召集人查良鏞和草委鄺廣傑，在北京宣布實施戒嚴後，均辭去草委職務，草委李柱銘、司徒華、譚惠珠也表示暫停起草工作，以示抗議。

香港的物質支援

香港不少團體發起籌款活動，支持北京學生。

五月一日，「北高聯」在自發慶祝「五一」勞動節的集會上，發表《致香港同胞書》，呼籲香港市民行動起來支持學運。同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宣布成立「中國民主基金」，發動籌款活動；五月三日，香港十四個團體，包括匯點、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等，呼籲全港關注北京學運，並捐款加以支援。

「中國民主基金」共籌得超過港幣六百萬元，而學聯於北京二千名學生絕食的第二日，派出兩名代表攜帶十四萬元赴京。五月二十六日，學聯再派出代表攜帶九十萬元、醫療物資、資訊設備、禦寒用品等，給予北京絕食學生。另外，學聯也曾將五萬元交予廣州高校聯，但高校聯則以本身非普選機構拒絕接受。

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五月二十五日也成立「支援民主運動基金」，而香港演藝界發起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十二小時的音樂會，共籌得一千二百多萬元，全部撥入全支聯的基金。

全支聯五月底派出代表團赴京，為學生提供物資和金錢上的支援，使天安門廣場上原來簡陋的帳篷也給來自香港的五彩繽紛帳幕所取代。

五月十六日，北京學生絕食至第四日，本港教聯會發起「四十八小時救救孩子籌款」，收集到二百三十多萬元，分別於五月十二日和十八日，將兩筆五十萬元捐款交予北京中國紅十字會，指定作為天安門絕食學生醫療衛生之用。本港三個團體，包括中文大學學生會，當代中國學會和學聯的代表，五月二十六日在天安門成立聯絡站，協助了解學生的需要，安排香港的物資援助。

香港學界是支援前鋒

香港學界最早直接投入支援北京學運，但學運初期，亦只是零星和個別地參與。學聯最初亦只是以「了解情況」名義組團北上，「五四」後才旗幟鮮明，全力支援和投入學生運動，三位在京唸書港生亦曾參與絕食行列。

據當時在京活躍學生表示，香港學生大部分都是在港聽聞北京學生情況危急，匆忙趕上首都支援，根

本未有時間考慮具體的參與方式。他們在京期間，由於北上同學不固定，流動性大，加上疲倦，意見分歧等因素，在京學生就如何參與學運只談了兩三次，雖然最後一次即六月三日晚的討論，有機會討論清楚香港的支援何去何從，卻沒時間達成結論。

一位曾赴京支援學運的學生表示，往北京的香港同學，都熱誠希望能協助北京學運，故此，雖然沒有清晰統一的工作方向，但只要看見有什麼可以做，他們會義不容辭，例如在廣場度宿聲援學生、派麵包、搭帳篷、協助整頓廣場、安排廣場上學生的膳食、以及將香港及全國各地的訊息帶到北京等。

學運初期，香港給予北京的支援多來自學生，所以較為零散，發揮不了什麼作用。

五月二十七日，香港學生開始接管香港駐京物資聯絡站，負責統籌及分配源源運到北京的大量物資，也由於物資湧至，港人纔通過物質上的支援作較具規模、較系統的參與。

由於物資站的設立較為倉卒，出現了分配物資的準則問題。據了解，分配物資的原則是只要可以證明自己是廣場的學生，即可向物資站申請幫助。而一位與「北高聯」聯絡的香港同學表示，只要他個人知道學生自治會需要那些器材便會向物資站索款，在一般情況下不管價錢多少，均被批准。各大學的學生自治會一般只要求物資站提供油印機或電腦打字機，價錢並不算昂貴。事實上，該名港生只碰上一次無理的要求。

例如有工人要求金錢援助，負責物資分發的幾位同學只能相信自己的判斷。不過，在物資站協助工作的部分同學認為，管理著如此巨額金錢的香港同學，應充分了解自己的角色，避免透過手執財政，實現自己對學運的主觀願望，而無視國內同學工作方式和學運實際發展情勢。香港赴京同學就此曾爆發激烈爭論，卻並無結論。部分同學指出，廣場上的同學，與廣場指揮部的關係日漸疏離。

香港同學只管埋首整頓廣場容貌，搭建帳幕及分配膳食等行政工作，無疑虛耗物資站同學精力。然而，即使目睹學運領導層出現腐敗現象，香港學生再看不過眼，也不可能取而代之；如何更有效促進學運，達到支援的目的，這個問題一直纏繞負責統籌金錢、物資的香港物資站的香港學生。

支聯會由成立到分歧

香港的「支聯會」強調支持民運是全民運動，所以無論左、中、右團體 ，法定的或非註冊的組織均可加入成為會員。「支聯會」亦因採取這種「來者不拒」的方針，埋下其後聯盟內出現分歧的伏線，而隨著北京鎮壓及其後政局的急劇轉變，這個由二百多個團體組成的大聯盟，在如何支援民運的長遠策略上，顯得茫無頭緒，頗為被動。

在高喊「打倒李鵬」之餘，「支聯會」在香港所能做的支援工作，主要集中在物資和金錢兩方面。在短短十天內，香港各界便循各種途徑籌得二千多萬港幣。「支聯會」派了一個代表團前往北京，親自將部份捐款交給廣場學生，但代表團準備回港時便發生李卓人被扣事件，成為首宗打擊港人介入國內民運的事件。

李卓人在簽了「悔過書」，承認違反戒嚴令及與學生非法組織領袖接觸，被扣留四天才獲釋放。

李卓人事件無疑令滿腔熱情的港人膽顫心驚，面對強權，港人支援的空間實在有限。當中共當局連傳真文件、郵遞信件也不放過時，突破新聞封鎖、提供訊息的努力也被瓦解了。熱潮過後，現實的港人開始反思，他們將來無可避免地要面對他們口中曾經不斷叫喊「李鵬下台」、「鄧小平下台」的當權者，自保心態油然而起，一些輿論開始強調港人不應過份介入國內事務。

六月中，「支聯會」大會通過重新將會以和平、非暴力形式，爭取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在中國實現；並選出司徒華為主席、李柱銘為副主席，設立援助、人權、海外聯絡、宣傳、教育和突破新聞封鎖等小組，分頭開展工作。

然而，在北京官員多番警告港人不要干預國內事務，新任黨總書記江澤民在北京會見香港草委、諮委時，提出「井水不犯河水」之說，部分人士，開始響應北京，反對港人過份介入中國政治。在白色恐怖籠罩大陸下，港人瞬即停止大規模把學運真相郵寄國內，以免連累親友，部分更恐伯「秋後算帳」會算到自己頭上，悲觀者索性專心辦移民手續。

香港傳媒對學運的作用

在這場學運中，香港傳媒扮演著一個重要及具爭議性的角色。

當胡耀邦逝世引發學潮後不久，香港記者便蜂擁而至北京，廣泛報道學運發展。而由於國內新聞單位所發佈的新聞，一般只被國內人民當作黨的宣傳，不可盡信，加上學運初期，國內報章並無正面報道，香港報章遂成為學運初期一個重要的訊息來源。

學運期間，在校園內、街道上，香港報道有關學運的剪報、影印本，被貼在佈告板上，牆上，把北京學生的要求廣泛流傳，在某程度上可算突被內地的新聞封鎖，對面臨重重壓力的學生不無鼓舞作用。而兩份可正式流通在國內的香港中文報章，《文匯報》和《大公報》，更旗幟鮮明地支持北京學生，

反對戒嚴，呼籲北京當局與學生對話，透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傳媒對學運初期的廣泛報道，不僅鼓舞北京學生，亦間接把港人在港聲援推向高峰。但發展至學運後期，特別在戒嚴令下，新聞封鎖，採訪受到制肘，真消息、假消息滿天飛。雖然傳媒應如何判斷新聞的真確性不在本文討論內容之列，但個別報道被北京當權者扣帽子。七月一日《人民日報》國內版以署名文章，指責西方和香港傳媒造謠煽動，反對中國政府、中共和解放軍，扮演著不光彩的角色。

無可否認，在媒介被黨牢牢控制下的中國，海外傳媒，包括香港報章及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的報道，在傳遞訊息方面，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但看來亦只此而已，要說傳媒煽動這麼大規模、歷時約兩個月、波及全國的民主運動，似乎是高估了傳媒的力量，尤其在資訊閉塞的中國大陸。

六四之後何去何從

一向對國是冷漠的香港人，歷史性地大團結，齊步走上街頭，除了因為北京殘酷鎮壓事件太過黑白分明，只須稍有理性、血性的人都難忍義憤之外。從香港與台灣相當不同的反應可以看出，這是基於一種唇亡齒寒，「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心理因素。香港人憶及中共史上相關的慘痛經歷，再與眼前所見重疊起來，自然產生一種兔死狐悲的怨憤，與北京學生、群眾同仇敵愾。香港即將拱手給回中共，那種迫在眉睫的危機感，無不令港人覺得此身安危實如纍卵。

香港人對中國大陸陌生，在怒火高燃中逐漸變得明顯。廣大市民支持北京學生，除了將聲討的焦點放在幾個顯而易見的北京當權者如鄧、李、楊集團身上，和鞏固了一貫排斥共產黨的觀念之外，關於這個我們正在「對著幹」的政府，可說所知甚少。這情況不僅在廣大參與的市民身上有所反映，就是有關團體的負責人亦不過如此。

嚴重的認識差距和地域差距，時刻提醒港人思考支援國內民運時所能扮演的角色，以免製造一個所謂「幫倒忙」的危險。

香港人支援北京時曾有過這些例子，即如香港學生以為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組織經驗，對國內高校推展學運有參照作用，但人到北京方始發現，人家搞的政治運動與自家搞的學生活動是兩回事；而當北京學生思謀如何與政府打開僵局之際，港人在這邊高呼打倒共產黨，為國內的民主運動定性。北京學生私下暗自叫苦，擔心運動會被這隻香港「黑手」抹黑。

這些小例子反映問題尚未嚴重，當前港人還未提出中國應當如何走向民主化的地步，而且，實在說不出一個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所以然來，否則在不清晰兩地差異的情況下，簡單以港人要求的民主發展步調加諸中國身上，後果令人擔心。

香港的支援面對這局限，祇能把支援的重點放在提供金錢、物資和資訊方面。至於直接參與國內民運，一般港人所能做的不多，對大陸的地下管道一無所知；即使部分較有條件的港人，短期內也只能潛藏於地下活動，以免反過來傷害、暴露了國內的民主力量，也容易讓中共當權派抓著口實，指港人以香港為基地，搞顛覆中國活動。

有參與人士指出，港人拿錢上北京，有時很難避免挾巨款以號令「運動」的心態，這在香港學聯及「支聯會」的個別負責人身上都能看到，而不同派別的北京學生亦看準此點，曾出現「北高聯」與廣場指揮部各自試圖拉攏持款港人，希望借外來經濟力量打擊異已。

「六˙四」殘酷鎮壓對港人的影響無法估計，而港人對國內的支援，則在槍聲過後，顯得意興闌珊。特別是中共當權派向港人接連提出帶威嚇意味的警告：港人不要以香港為基地顛覆社會主義中國，在國內活動要受內地法律約束等，加上李卓人和姚勇戰被扣事件，港人瞬即收斂，支援活動幾乎停頓，且很快便把視線轉移到自保自救之上。

百萬港人反中共暴行的語音未落，代之而起是一片港人救港之聲。不少人士提出：那些熱心一時的團體是否退得太急太快，並沉思在所謂「不顛覆社會主義中國」和「遵守內地法律」這兩個大框框之內，是否還容得下港人支援國內民運，促進中國民主法制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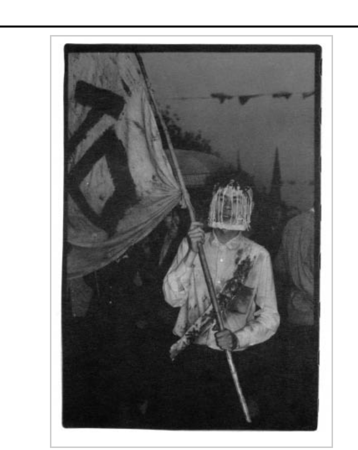
與此同時，亦有人指出，香港的前途在於奉行一國兩制，應將中港政治上的關係以一部基本法斷然割開，香港人再談促進中國民主化，只怕五十年不變的前途難保。若香港介入中國政治，他們擔心會惹中共不悅，橫加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巨變當前，港人對未來看法不一，各有懷抱，恰好反映港人如履薄冰的心情。當港人救港的熱潮漸退，港人爭取保險的前景越見清晰，則關於支援國內民主化的角色問題，相信會繼續未完的爭論。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學運前後的中共派系鬥爭

老冠祥 林和立 鄭偉鳴
楊健興 陳寶珣



學生說：「我們不養狗了。」 冼偉強攝

「六˙四」鎮壓前後的高層權力鬥爭，可說是十年改革開放，以及是人民與執政集團矛盾激化的結果，也是權力自上而下的「老人政治力量」，與鼓吹權力自下而上的「新生政治力量」之間矛盾激化的產物。這三點皆集中反映在中共內部高層鬥爭上。

代溝政治，矛盾重重

「六˙四」事件與中共自四九年取得政權以來的歷次大型政局反覆比較，有以下顯著的特點：

（一）這是文革結束、十年改革開放後出現的逆流；也是在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極左路線後出現的反覆。

（二）鎮壓手段的殘酷超越過去歷次鬥爭。在一段短時期內，軍隊介入政局的情況，比以往歷次政治運動嚴重。

（三）學生、知識分子以至城市居民的醒覺空前高漲。學生在近兩個月持續靜坐、示威、絕食；黨政甚至軍中的一些知識分子敢於站出來抗議，在大陸是破天荒的。他們提出的口號以針對時弊為主，如官倒、貪污和特權，基本上他們仍是維護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但他們亦明確提出民主、自由、法治、打倒專政獨裁等對當權者挑戰的口號。

（四）「老人政治」干預空前突出。「反右」、「文革」基本上是同一輩領導人的內鬥；這次則是三十年代參加過長征的老人向較接受開放自由思想的新生代清算。

大陸代溝政治的出現主要是「文革」十年後的事。鄧小平在「六˙九」講話中說，就因為他們這批老同志還在，中共才能正確處理這場「反革命暴亂」。所謂新生代，是指那些接近權力核心的中年領導，在發展商品經濟、改革開放中取得一定權力者。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是個顯著例子。他們取得了一定的權力，但要將權力鞏固及擴大，便要削「老人」的權。

「老人政治」的權力形態是自上而下的。它的邏輯是：「老子打天下得天下」，當然是由「老子」來分配權力。從制度上說，中共中顧委的成立，目的是讓這批老人在淡出政治舞台後仍享有尊榮和議政權力。胡耀邦及趙紫陽的失敗，很大程度上就是「老人黨」認為兩人不聽話，因此越過程序用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中顧委、中紀委甚至沒有職位的人參加的會議）的方式來迫使他們下台。「新生代政治」的權力形態則是自下而上的。它鼓吹基層更大的參與，通過對話搜集民意，逐漸發展程序政治、差額選舉等。

（五）中共高層對如何回應民運，陷入前所未有的分歧。這是代溝政治及中國與西方日益交往的結果。鄧小平十年來的「左右手」胡耀邦及趙紫陽由於站在改革開放的最前線，自然對僵化的共產黨教條有所反省，對西方思潮有所共鳴，因而他們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有所保留，與死硬、僵化的「老人黨」格格不入，形成嚴重分歧衝突。

各種矛盾，激化黨爭

具有以上多項特點的「六˙四」事件，可以用什麼理論、觀點去解釋呢？

（一）商品經濟發展與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的矛盾。由商品經濟發展所引起的經濟實體獨立化、經濟利益多元化、經濟決策分散化，必然要求政治體制由高度集權轉向相對分權。北京學生要求與黨政高層對話，說明權力集中於幾位最高領導人，下面的人不能作主。而黨政軍內一些人敢於站出來抗議，這與近幾年企業私營經濟發展有一定的關係；不在黨政軍體系內工作，還有其他工作機會。由北京個體戶組成、以摩托車替學生傳遞消息的「飛虎隊」，更是商品經濟發展下的產物。

改革派代表商品經濟的利益，代表人物是胡耀邦、趙紫陽及其智囊團。他們要求黨政分開、向下放權、在經濟體系內引進更多的市場制約、向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更大開放。圍繞在趙紫陽身邊的是較為年輕的、較受西方資本主義理論影響和曾留學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物。

由商品經濟發展而引致的種種政治要求，不能為老人集團與保守派所接受，改革派及其支持者遂受到嚴厲打擊。

（二）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派系是與政見、宗派及個人關係連結在一起的。改革與保守的不同政見是在不同時空相對而言。兩派的分歧有時未必是原則性的，而是在同一條路線上，發展步伐與推行方法有不同意見。以個人關係為基礎的派系之爭可能不涉及政治主張，衹是競相爭逐權位的利益組合，明爭暗鬥。

中共像其他各國共產黨一樣，是強調意識形態的黨。但它把「四個堅持」寫進國家憲法，強迫全體公民遵守，則在世界上其他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也是甚少有的。所以中共派系以意識形態來劃分，從這個黨的特性來說是自然的。中國問題專家常用的「改革派、保守派之爭」衹能粗略地解釋是次學運。

但中共本身，特別是現今的當權派，則用維護「四個堅持」及改革開放作為「正確」的一派、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一派來分類。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說的兩個「司令部」，及總理李鵬說的「不同聲音」就是指這兩派的對立。「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根據中共官方理論是沒有矛盾的，但側重那一點則造成兩派的分別。事實上趙紫陽及胡耀邦兩位前黨總書記就是因為被指責「四個堅持」及「反資」不力而下台。「堅持派」就是海外所稱的保守派，容許「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就是改革派。

（三）利益集團之爭。用利益集團概念代替階級理論較能清楚分析大陸的現實，中共當權派所指有一小撮人企圖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當然不排除有這樣的人及企圖，但指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從事有組織的行動，在實際及理論上皆站不住腳。

提出民主自由等口號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在馬列主義的分類下不屬於一個獨立階級，衹從屬於其他階級。參與民運的市民來自不同的階層及行業，是跨階層的。而從五十年代中期，無產階級的鬥爭對象──地主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指它的經濟形態），經社會主義經濟改造後已不復存在，故此，是次學運中，沒有階級性的對抗卻有利益集團之爭。

利益集團之一是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他們掌握了黨政軍大權，拚命維護自己有生之年對權力的控制，而假維護革命之名而行之。

利益集團之二，是新生代中對民主、自由、法治嚮往的「超前」人物，如圍繞在趙紫陽身旁的智囊團。他們因改革開放而從老人集團手中取得一定權力，希望可以把它鞏固擴大。

利益集團之三，是為保存既得利益而抗拒政治變革的官僚階層。改革派所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如黨政分家，政企分離等建議，對黨政官僚的利益大大威脅，政府機構改革更建議很多政府部門轉為自負盈虧的半企業機構，令這些機關的僱員喪失「鐵飯碗」的保障。

總而言之，利益集團之爭，涉及權利再分配及意識形態的糾纏，而兩者又互為表裏。

（四）發展中的中國對現代化西方挑戰的回應。這涉及列寧主義的壟斷資本主義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侵略的理論，也涉及第三世界與國際資本主義鬥爭的理論。鄧小平在「六˙九」講話中說製造「反革命暴亂」的人，「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鄧小平這個指責失之偏激，但卻指出一個事實：中共當權者極不願意接受隨美國等西方國家經濟力量而來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影響。

（五）「一國兩制」下兩制相互影響的衝突。「六˙四」事件後，中共當權派頻頻指責港、台傳媒，以至個別人士介入策劃「反革命暴亂」，企圖推翻共產黨領導，以資本主義統一中國。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及台灣推行開放的大陸政策後，大陸政局中的港、台因素逐漸增加。由於血緣、傳統文化及地緣的關係，三個地方的互為影響越來越大，而代表三個地域的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也越來越激化。

以上提到的五個理論觀點，其中有些是互相關連。大體上，保守派和改革派正代表著社會上兩種不同的利益集團，它們的社會基礎與商品經濟及政治體制的矛盾有關連，如改革派、新生代就是代表商品經濟下孕育出來的政治力量。

人治傳統，左右大局

中國派系的複雜性增添了分析中國問題時的困難。例如中共派系往往講究人際關係，這是中國的傳統。在軍隊方面，這個特點尤甚。國防部長秦基偉是鄧小平「二野」的老部下，照常理兩人應不會鬧翻。所以傳說秦在「六˙四」事件中反對鄧鎮壓極可能不對。

但軍隊內確曾出現不同意見，其中卅八軍和北京軍區，確出現不服從軍委命令以武力鎮壓學生的現

象。以前總參謀長楊得志為首的七名軍方老帥，就在戒嚴令初頒佈時表示不贊同採用暴力鎮壓學生運動，而聶榮臻及徐向前兩位元帥，亦曾對學生保證軍隊不會動武。

雖然趙紫陽在軍中並無實權，但不少中層軍官都同情他的改革方案。例如五月十七日，超過一千名軍官及士兵參加學生號召的遊行，他們大部分來自後勤及政治部。但支持改革派的力量在軍中畢竟仍是少數，軍隊仍會按照黨內「老人」，特別是曾縱橫沙場的革命元老的意旨行事。

事實上，派系裏的人走在一起，不一定是因為共同的政策主張，而可能純粹是自保及擴大勢力。而中共政治講求表面的一致性，所以派系的鬥爭不到最後關頭都不會公開。

趙紫陽「罪狀」之一是把黨內矛盾公開化，被指責為「分裂黨」。當然人際關係這個基礎並不能解釋每一個案。比如，副總理田紀雲在四川時期已跟上趙紫陽，被認為是趙派，卻沒有受到牽連。現代政治已不像封建時代般牽連九族。

作為實際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他的個人特性在「六˙四」前後的鬥爭，起了特殊作用。他在過去十年獨攬大權中，把自己超越了派系，成為各派的仲裁者。由於改革開放和「四個堅持」皆由他提出，改革、保守兩派皆不能取其一面攻擊之。他既主張向美國等西方國家開放，又支持與蘇聯修好。反對者也不能指責他傾向那一方。論者說他政治保守、經濟開放，或許是中共意識形態的限制及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所造成。過去，中共的派系鬥爭都能統一在如鄧小平這樣搞政治平衡的高手手裏；想不到這次的鬥爭卻以流血來結束。

黨內分歧，早已隱伏

這次由學運而激化的中共黨內權力角力，明顯地在八七年十月間舉行的中共第十三屆黨代表大會時已埋下伏線。大會選出了趙紫陽擔任新的黨總書記，取代被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胡耀邦。趙紫陽亦與胡啟立、李鵬、姚依林、喬石五人組成新的政治局常委。鄧小平在失去胡耀邦後，希望透過趙紫陽，再在黨內建立核心，推動開放改革，與此同時，鄧小平帶頭引退，淡出政治舞台，希望逐漸消弭老人政治的危機。結果便出現所謂「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局面。

鄧小平最後保留軍委主席的職位，陳雲和李先念也退出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但仍保留一個職位。陳雲在十三大後出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李先念改任全國政協主席。此外，「極左」人物紛紛失勢下台，包括軍方的余秋里、長期主管意識形態的鄧力群和胡喬木。整體來說，是鄧小平希望「老人」淡出權力核心，建立一個以李鵬、姚依林為首的保守派與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制衡的局面。

趙在十三大會議上發表的報告中，首次提出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調，為進一步推行七九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開放改革路線尋找理論根據，而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方案。

趙紫陽上台後，一方面經濟上推行一系列大膽改革，包括價格改革；另方面密鑼緊鼓地起草政治改革方案，但對於「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則低調推行，並很快便冷卻。

然而，政制改革措施，遇到重重阻力，遲遲未能出籠；開放價格措施，則引起通貨膨脹，加上官倒嚴重，使人民怨聲載道。八八年七、八月間在北戴河舉行的一連串高層決策會議上，主要討論當前的工資和物價改革的方案，有關的方案經過反覆論證和修改，期間甚至一度傳出會議因中共高層陷於分歧而中斷的消息，反映出傾向陳雲主張的「鳥籠經濟」路線與趙紫陽提倡的市場導向價格經濟的路線，矛盾再次激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終於在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北戴河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原則上通過國務院提出「關於物價、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把價格關係初步理順，總的方向是放開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在獲得鄧小平支持下，趙紫陽提出的價格改革方案仍能支撐下去，但在物價失控下，經濟改革已遇到很大壓力。

八八年底，趙派受挫

八八年九月底，中共舉行十三大三中全會，趙紫陽領導的「改革派」遇到反擊，「保守派」利用闖物價關失利來攻擊「改革派」。大會的公報指出：「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好的，但存在的困難也不少，突出的是物價上漲幅度過大。」大會又確定把未來兩年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在「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在通貨膨脹重大壓力下，改革派受挫，而倡導緊縮經濟措施的保守派再次冒起。

八九年初開始的經濟緊縮政策，令人民對開放改革感到前路茫茫。人民對改革的呼聲便隨著象徵開放改革的前黨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而一觸即發，亦掀起黨內高層的另一次鬥爭。

民運激化，黨爭白熱

學運爆發至遭血腥鎮壓，期間中共高層之間的派系傾軋，顯示在元老派統攝下改革派與保守派三者之間的錯綜關係。

由李鵬、楊尚昆會見鄧小平後，率先在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為學運定調為動亂，以至趙紫陽與五月中到訪的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會面時透露鄧仍為最高領導，可見鄧確是凌駕改革與保守兩派的最高統帥，這點在六月九日鄧小平出面發表講話，老人紛紛亮相可知，鄧的確是負起調和各元老利益、直接統攝政治舞台前兩個派系的軸心人物。

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理應清楚元老的左右力量，他們在鄧小平為學運定調後，仍然肯定學運是愛國運動，鼓吹以較溫和手段處理學運，借群眾力量向元老挑戰的意味已不需言表，亦有利用學潮逼鄧小平「認錯」，並完全隱退之用意。

有跡象顯示趙紫陽在學運初階段已沒有與鄧小平直接接觸，反而要靠改革派中的二線人物閻明復傳話，這已說明了趙與鄧之間的關係，以趙為首的改革派要自保，即不得不走到元老和保守派的對立面去。改革派被擊潰，則是低估了元老和群眾運動的強硬態度，趙紫陽在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門看望學生，及當晚沒出席黨、政、軍幹部會議，高層分歧與鬥爭，亦因之表面化，當時趙紫陽下台已成定局。保守派在前政治局常委的班子中五席佔其三，即李鵬、姚依林和喬石，但由於趙紫陽多年來已成為開放改革的象徵，李鵬、姚依林等雖然在經改路線和具體的權力爭奪中欲取趙而代之，若他們缺乏元老派的強力支持，則只會有心無力。他們成功地借助學運肅清改革派，但由於站在台前扮演了極不光彩角色，雖然在經濟決策上一舉而取得主導權，但面對經濟局面重重困境，要執行他們原來構想的經濟政策已是局面大異，新的困難湧現；而在爭取黨政核心權力的企圖中，卻更突出異數，李鵬等三人最終均不能坐上黨內最高領導的寶座。

學運期間，保守派直接向元老匯報，出謀獻策，處處迎合鄧小平武力鎮壓的想法。三名政治局常委喬石、李鵬和姚依林雖然同謀，但採取不同姿態。喬石掌管政法系統，在鎮壓事件中至具影響力，但一直繞在李鵬身後，繼而傳出與李爭總書記一職，保守派這個以倒趙而統合的集團，亦已埋藏另一次權力爭奪的因子。

改革派潰散，新爭奪難免

「六˙四」屠殺過後，當權者除繼續打擊所謂「反革命暴亂」分子外，高層架構內各派亦再進行權力分配，一度退居幕後的元老派復辟回朝，第二代領導中，改革派雖然潰敗，以李鵬、喬石、姚依林為首的保守派並未能如願進一步奪權。

中共幾經拖延，卒於六月底召開四中全會，新班子人選出人意表。中共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破格提升為總書記，又選出中央組織部長宋平、天津市長及市委書記李瑞環出任政治局常委，與原來的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組成新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江澤民、李瑞環、宋平的提升，顯示鄧小平希望透過一批具溫和色彩的保守派，以制衡以李鵬為首的強硬保守派。儘管對政改的保留、意識形態的箝制，以及經改的步伐，新政治局常委的分歧較前縮小，但在覬覦元老派死去後黨政權力的真空，新常委之間的爭奪勢所難免。

新領導班子的組成有極強的妥協色彩，突出了讓沒有直接介入「屠城」行動的政治局委員出任領導核心。與此同時，新領導層整體上缺乏足夠黨內威望，李鵬因「屠城」及處理民運的責任和對趙紫陽的排斥等，引起黨內不滿情緒；新任總書記江澤民則缺乏深遠的中央黨政系統淵源，需要長時間才能發展其威望。

鄧小平等元老作出此安排自有其苦衷，欲藉以彌補屠殺之後新領導班子在國內外的「認受」危機。但一旦鄧小平等元老死去，難免會激化下一代領導之間的權力鬥爭，尤其是相對溫和的江澤民尚未建立穩固權力基礎，則他的命運可能比過渡人物華國鋒更不妙。

曾經插手民運和屠殺的政治局常委當中，同是強硬派人物的李鵬和喬石在四中全會召開前，分別被傳欲染指黨總書記一職，對於無政治局常委資歷的江澤民破格提升，二人自有想法，其動向亦令人關注。

重建班子，收拾殘局

鄧小平亦明白新班子不穩，故後來在內部講話中強調要以江澤民為核心，新班子要抓幾件大事，否則還要出亂子。但新班子辦事不易，江澤民要尋求黨員幹部的支持，在保護他們既得利益之餘，推行經改、反貪污官倒，都顯得舉步維艱。

新領導層組成後，宣傳喉舌不斷突出鄧小平個人威望，他在六月九日的講話，亦成為全國性的學習文件，希望透過他的權威，平息黨內外對鎮壓的不滿。另一個角度看來，鄧小平本身的地位亦要催谷鞏固，江、李等人的聲望如何，更是不難想像了。

除解決人事變更外，四中全會強調繼續堅決執行七九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及十三大確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即以「四項基本原則」為中心；「改革」「開放」為基本點，強調改革方向堅守不移，絕不回到閉關鎖國的老路上去。全會特別指出要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徹底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二是繼續搞好治理整頓，更好地堅持改革開放；二是加強思想

政治工作；四是加強黨的建設，民主和法制建設，堅決懲治腐敗。

官方加緊搜捕民運、學運核心人物，抓幾個「官倒」，大規模打擊知識分子，一方面是以此顯示新領導班子的決心，另方面是打擊異己分子，防止改革派東山再起，但從鄧小平尚能主持大局及近期中共高層不斷強調堅持開放改革來看，倡行改革的力量看來不致被完全瓦解。

最值得注意的是江澤民和李鵬明確支持海南省開發洋浦港，海南省官員和參與開發的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均表示對計劃樂觀。由於這項計劃涉及金額逾百億元，加上海南省是大陸最新的一個省份，而盛傳地位不穩的海南省省長梁湘與趙紫陽關係密切，這項計劃成為測試中共未來政策走向的「政治寒暑表」。

七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全體會議，決定撤銷康華發展總公司（簡稱康華）和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至於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簡稱中信）、光大實業公司的審計情況，將盡快向社會公布。康華與鄧小平長子鄧樸方曾有密切關係，而中信和光大，分別由人大副委員長榮毅仁和政協副主席王光英經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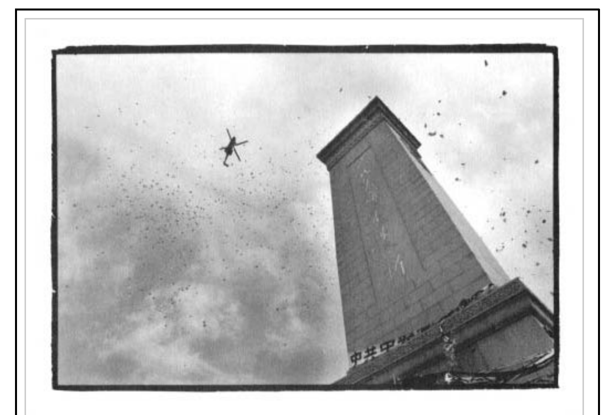
會議又決定制止高幹子女經商，嚴格控制領導幹部出國，嚴肅查處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情況，以平息民憤。可見中共正千方百計在黨內外重建黨的領導權威，安撫民心，以穩定當前的政治局面。



處理民運，引蛇出洞?

陳寶珣　范卓雲　鄧祥兒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直升機在廣場上空撒放解釋戒嚴令的傳單。 冼偉強攝

六˙四血案中數以千討的中國人被殘酷殺戮，接踵而至的無數人在白色恐怖下被拘捕、處決。中共當權派究竟因何要殘殺同胞，甚至不惜後果趕盡殺絕？這段血淋淋的歷史真相，現時是少數當權派之間不可告人的宮幃內幕。儘管外間無法完全猜透這些領導人背後的想法，但客觀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在處理學運問題上的策略部署、對應手段和背後考慮，從中並能夠窺見學生的和平請願行動，如何促使官方轉向採取死硬極端的處理。

悼胡期間，官方克制

四月十七日政法大學青年教師及學生率先上街，以及各北京高校學生的爭相響應，事態發展之突然和迅速，無疑出乎官方意料之外。他們一直擔憂的社會怨氣和「動亂」氣候，竟會因胡耀邦之死而爆發。中國當局對學潮的第一次反應，是在學生千呼萬喚下，由三名全國人大代表在人民大會堂接收北京大學及人民大學學生七項要求的請願信。但在其後數個小時，即四月廿日凌晨，數千武警人員卻以鐵扣皮帶和大頭皮鞋來驅趕學生。

值得留意的是，當天凌晨學生已與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長韓明學取得協議，學生會撤離新華門，以免阻礙交通。令人不解的是武警突然而至並毆打學生。究竟他們為何罔顧協定？是誰下的命令？其動機何在？

一種傳言是主持政法系統的政治局常委喬石下令武警行動；這段期間亦首次有傳言謂喬石想當總書記。

接著的「四˙二二」凌晨遊行往天安門廣場，各院校學生意外地未受到任何阻攔，官方原本說要為準備胡耀邦喪禮而清場，卻始終未有行動。官方克制的態度，在當時是可以理解的。以北京市內的公安武警力量，相信就算成功驅散學生，局面也難以控制，並同時會影響黨政軍領導人出席在大會堂內的胡耀邦追悼會。

至於三名學生代表在大會堂石階下跪，求見李鵬不果，激起學生發動無限期罷課，則顯示中共拙劣的應變手法，也反映中共中央對學生的行動，未有統一對策。

中共傳統上對治喪委員會極為重視，但中共中央處理胡喪禮，治喪委員會換之以「低層次」的治喪辦公室，並遲遲不公布名單。黨內元老陳雲、薄一波等更沒有出席追悼會，中央對胡的評價尚且含糊其辭，對於抬出胡耀邦來壓中央的學生，當然更加抱狐疑態度。

據報道，中共政治局成員在四月廿四日舉行會議，決定起草「四˙二六」社論，並議決指有少數人煽動學生，企圖驅使全國罷工及罷課。議決又指這次動亂是有預謀的，並有跡象要密謀成立非法組織。另外，北京市委提出形勢報告，指學潮是一次蓄勢已久、經長期籌備的行動。又有報道稱鄧小平在四月廿五日聽取李鵬及楊尚昆匯報後，認為學潮是一次全國動亂，鄧認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處理此事流血難免，不要懼怕國際輿論，從而為官方處理學潮的手段定下依據。

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社論，以及三十八軍進京的消息，確令學生及市民難以理解，北京同時陷於一片文革時期的政治恐怖氣氛中。然而出人意表的是，官方未有即時行動，取締各高校自治會一類的所謂「非法組織」，對翌日的「四˙二七」遊行也未有鎮壓。倘若中共要決心阻止，大可以重施以往對付學生遊行示威的伎倆，將學生堵塞在校內，迅速拘走帶頭的學生。中共這次沒有這樣做，說明中共並未決心強行制止學生的活動。有意見認為，「四˙二六」社論或許是一幌虛招，中共圖藉社論來嚇倒學生，結果此計未得逞。

開展對話，孤立少數

令人奇怪的是，「四˙二七」大遊行倖免於官方鎮壓，又標誌著官方相對溫和、積極化解學生壓力的一個階段。具體表現在黨的新聞宣傳工具報道了學生要求和抗議行動，以及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和北京市委同學生對話上。這一切與「四˙二六」社論格格不入；也與元老派的強硬觀點有很大分別。但此時較同情學生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身在北朝鮮，官方的克制手法確實令人費解。

四月廿九日，袁木與全國學聯安排學生對話。不過，就學生提出懲治官倒和新聞自由的要求，出席官員都沒有作出承諾。袁木在開場白中便明釋，這次對話目的是代李鵬說明「四˙二六」社論只是針對「極少數人」，而非針對廣大同學的。可見此次對話作用在分化學生，重新鞏固學生對政府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袁木等官員的講話，初步透露中共高層對當前局勢的看法，這與鄧小平六月九日探望戒嚴部隊時的講話極之相似，令人懷疑中共高層此時對學潮的看法已經定調。

北京市長陳希同及市委書記李錫銘在四月三十日與部分學生對話時，卻公開個人及家人財產情況。陳希同還邀請學生參加清理整頓北京公司，並同意建立定期對話制度。可見這次對話內容較為實質，並具體回應學生的要求。

中共當權派希望通過對話，將廣大學生和少數反黨分子劃分開來，證明他們的確顧忌學生鬧事。但袁木藐視學生的要求，並全盤否定學生自治組織，這亦說明中共不介意把學生推到對立面上。

「北高聯」隨後提出更強硬的要求，要廿四小時內即五月三日前得到政府答覆。中共至此態度轉趨強硬，袁木在五月三日記者會上，指學生要求對話，是要跟政府「平起平坐」，是不合情理的。袁木指方勵之及「中國民主聯盟」在背後出謀獻策，並指有人在高校進行了錯誤政治綱領的灌輸工作，以及種種非法組織串連，企圖將學運抹黑，並分化學生。

趙紫陽從平壤回國後接手處理學潮，他發表的多番講話，力主疏導和對話。強硬派認為這是分裂黨和鼓勵學生運動，中共高層就處理學潮而激化的黨派之爭，遂一觸即發。

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率領的「中央對話準備小組」，終在學生開始絕食前一天成立，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亦準備與新聞界對話，芮、胡二人其後與趙同時獲罪，遭撤銷職務。

學生絕食抗議，官方手足無措

「五˙四」遊行和絕食期間，局勢轉趨和緩。為突破當局的拖延政策，北京高校學生在北大和北師大領導下，決定十三日在天安門廣場無限期絕食。中共方面無論是溫和派或強硬派都顯得手足無措，而溫和派的對話策略更被徹底打亂。

趙紫陽乘著五月十三日與首都工人代表傾談時，呼籲學生在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到訪期間，要「維護國家尊嚴和利益，保持理智」。趙的講話清楚顯示中共高層預料絕食抗議會一發不可收拾。不過，無論是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溫和派，抑或強硬派，都不願見到學生採取絕食的抗議方式。令人疑惑的是，當局為何不在學生絕食第一天便把他們堵塞在校內，使學生不能進入廣場？

一般相信，中共高層投鼠忌器，不希望在戈爾巴喬夫訪問期間將事情鬧大，有失體面，故此對學生採取克制態度。另一方面，黨內溫和派仍寄望以對話及合法途徑解決問題，以圖在劣勢中背城一戰，反敗為勝，故力勸學生之餘仍維持容忍態度，反對武力鎮壓，以致強硬派無從在絕食開始前橫加阻撓。同時亦有理由相信強硬派是在施展欲擒先縱的策略，讓學生抗爭情緒越演越烈，以加強「學運是動亂」的口實，打擊溫和派。

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陳希同及李錫銘等領導人在十四日清晨到廣場呼籲學生返回校園，但不得要領。溫和派將對話提前在當日下午舉行，期間，閻明復承認遲對話乃政府錯誤，並再三表示理解同學的愛國熱情，但聲言不可能否定「四˙二六」社論。透過閻明復的講話，可看出中共高層在最關鍵問題上，從來沒有準備和學生妥協。

北京市公安局勒令學生必須於十五日凌晨三時離開廣場，但最後又沒有採取清理廣場的行動，使國家元首楊尚昆改在首都機場迎接戈爾巴喬夫的歷史性到訪。

在七天的馬拉松絕食中，北京市出現奇怪的「無政府狀態」景象。究竟官方有沒有故意促成這狀態實在值得考究。絕食期間，軍警亦一直沒有按照市公安局通告封鎖廣場。警察幾乎在廣場周圍市中心一帶絕跡，於是，絕食團指揮部在統籌廣場絕食行動中逐漸成為指揮整個運動的總樞紐，正面與政府對立。

北京市政府曾截斷廣場一帶的水源，可是卻挑起學生、市民及社會各界的反感，導致民間反政府情緒日益高漲。

溫和派其實早已看出絕食行動所引發的政治危機，特別是趙紫陽的地位，已經受到嚴重威脅。因此，早在十五日上午政府與學生的對話中，閻明復已明確透露了「絕食行動已令國家尊嚴受到影響，希望學生高度理智」的警號。為力挽狂瀾，閻明復再於十六日下午隻身到達廣場勸諭學生停止絕食，聲淚

俱下，聲嘶力竭之餘，更表示願意作為人質與學生一起靜坐，只求同學停止摧殘自己的身體。但閻的苦苦哀求最後亦遭同學投票否決，至此，溫和派欲以疏導對話手段解決學潮的計劃宣告全盤失敗。強硬派得以理直氣壯地攻擊溫和派對付學潮的手段乃「為學生撐腰打氣，給動亂火上澆油」。

幕前力圖安撫，背後部署戒嚴

根據陳希同後來在七屆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上所作的「平息暴亂」報告中表示，政治局常委早在五月十七日便討論了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問題，建議中央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但當天凌晨二時，趙紫陽卻代表政治局常委發表書面談話，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和保證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帳，並呼籲學生停止絕食。究竟政治局常委的書面談話，是趙紫陽執意專權把個人意志強加於另外四位常委身上？還是五名常委意見嚴重分歧，先以此書面談話作權宜之計，暫時拖延對絕食學生提出要求的答覆？抑或是高層企圖瞞騙全國人民，以趙講話顯示政府對學生的非凡克制態度？

十八日清晨趙紫陽、李鵬、喬石和胡啟立四名政治局常委，親赴醫院探望絕食學生。在學生面前，黨政領導人口口聲聲強調「學生與政府目標一致」，顯見他們決定往醫院看望學生，只圖在舉國人民的眼前、表現出仁至義盡，但另一方面已為武力鎮壓作準備。

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再由李鵬出面與「北高聯」等十多名學生代表對話，但一開始學生便與政府針鋒相對，各執一詞。而當時中央高層決策已作出調動解放軍進京，並實施戒嚴的決定，李鵬卻在對話中聲色俱厲地強調：「我們政府和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李鵬說出這些冠冕堂皇的話，無疑是在掩蓋政府正在部署的軍事調動，製造政府已經順應民心的假象。

正在李鵬與學生對話時，中共已準備在十九日黨政軍幹部大會上宣布「緊急動員制止動亂」。十九日清晨四時左右，趙紫陽與李鵬分別前往廣場探望絕食學生，趙含淚與學生告別，並勸諭同學停止絕食。晚上九時，學生宣布停止絕食，但一個小時後李鵬在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發表講話，其後並宣布戒嚴。

市民堵截軍車，軍隊暫緩鎮壓

但是大大出乎中共高層所料，數以十萬計的市民自十九日晚上開始便自發湧上各街道要塞，以身軀築起血肉長城，並架設路障阻攔解放軍進城，把十數萬大軍堵在北京城郊。面對軍隊進退維谷的局面和群眾空前激烈的反政府情緒，中共並沒有強行清理廣場，駐在北京城內的大量軍警亦沒有執行北京市政府頒佈的三項戒嚴令。對於記者未經批准的採訪活動，亦大多不予制止，在廣場一帶地區亦找不到半個軍警。

在警察絕跡的情況下，市民學生自發指揮交通，維持市面秩序。廣場指揮部繼續領導廣場上二十萬學生靜坐，學生自發組織龐大的糾察隊伍，成立各有專責的部委，另設學生廣播站與政府廣播分庭抗禮，廣場彷彿真的成為「巴黎公社」，公然與李鵬政府為敵，官方亦能從容在廣場上搜集源源不絕的「反政府」罪證。

學生領袖王丹曾向記者透露，在戒嚴令頒佈後，北京市委下令不准公共汽車司機開車，不准所有生產單位將所屬汽車開出，中斷汽油供應，並將交通警察撤走。王丹並指北京市委下令不准警察站崗，市政府又中斷糧、油等物資的運輸，令北京市糧油及日用品供應緊張，借此加罪學運造成市面混亂，交通癱瘓。

另一方面，戒嚴部隊則採取不同方式陸續進入市中心，並進駐重要黨政機關及新聞單位，全面接管宣傳機器，杜絕了早階段官方媒介正面報道學運的失控問題。

便衣挑起事端，離間分化學生

政府一連數天在中央電視台引述黨政軍高層人士否認準備鎮壓學生或清理廣場之傳言，以緩和學生與群眾的戒備狀態。

二十二日晚豐台與六里橋發生軍民武力衝突，解放軍被不明來歷的群眾用磚頭和石塊攻擊，衝突中軍民雙方皆有受傷，學生被打亦有數十人。部份學生事後表示，懷疑政府派人刻意挑起事端，主動攻擊解放軍，種下軍民彼此仇恨的禍根。

為搜羅學生和群眾組織動亂的證據，官方派出大量便衣人員混進廣場和附近一帶遊行集會最多的地區，拍照、錄音和錄像。在廿一日晚上市民就在大北窰路口截獲一輛救護車，發現車內穿白衣的人冒充醫務人員沿途拍攝錄像。除此之外，官方更透過不同途徑接觸學運領袖，故意放出不同情報企圖離間學生，擾亂學運的策略部署。如吾爾開希在廿二日凌晨宣布撤離廣場之前，便曾經會見了自稱來自殘疾人基金會的代表，告訴他解放軍將於八小時後清場。不同的學生領袖亦曾與自稱代表北京市委、中央軍委、殘疾人基金會、戒嚴指揮部等機關的人接觸過，並獲得各種「可靠情報」，可見官方不斷地透過各種滲透方法去分化和擾亂學生的陣營。

按兵不動，引蛇出洞

一種分析認為中共在軍隊進城失敗後，倒過來利用現成的反政府情緒，製造「無政府主義繼續泛濫」、「事態正在一天一天地向著反革命暴亂的方向發展」的罪證，並藉著戒嚴頭兩星期按兵不動的日子，靜待社會上各階層的反對力量和離心分子紛紛湧現，再演毛澤東在反右運動時施展的「引蛇出洞」的陽謀，令反政府聲音無所遁形，然後一網打盡。

但亦有分析認為政府對學生按兵不動，是由於中共黨內對趙紫陽的處理出現嚴重分歧，並恐怕大軍圍城下會出現軍事政變，故在中央取得對局勢的絕對控制之前，不能輕舉妄動。所以在戒嚴期間紛紛安排黨政元老出面表態支持中央和李鵬，並呼籲人民與解放軍合作，協助部隊，恢復首都秩序。

中共當權派在部署鎮壓大屠殺之際，亦同時著手翦除民運外圍力量。五月三十日晚，首都工人自治聯會三名負責人被公安人員帶走；曾替學生通風報訊的摩托車「飛虎隊」十一名成員亦被拘留審查。

與此同時，中共亦開始尋隙分化學生、群眾。黨報開始利用群眾來信的手法，猛烈抨擊學生把廣場弄得污煙瘴氣；民主女神像出現之後，更發動輿論指這是「強姦民意」的做法。中共又組織了反「動亂」的遊行，利用市郊農民來製造支持當局的聲勢。

插贓嫁禍，血腥挑釁

大屠殺前夕，連串試探性挑釁性的軍事行動展開。六月二日晚上，一輛沒車牌的軍車疾駛經過復興門外大街時，撞向市民造成三死一傷慘劇，而司機卻推說要「執行任務」而被帶走，激起市民極大憤慨。目擊者又在肇事汽車內發現武警服裝、警棍、刀等武器，已察覺形勢不妙。就在三日凌晨時分，萬多名「娃娃兵」奉命沿東長安街進軍廣場，但途中被數萬名市民及學生攔截，這隊「先頭部隊」明顯地是接到上級「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命令，因此在與群眾推撞磨擦中一直保持克制態度。同一時候，四輛載軍用物資的旅遊車在建國門和西單分別被市民截停，在車上發現衝鋒槍、步槍、手榴彈和防毒面具等軍用物品，司機遺下武器棄車而逃，人們都認為軍方開始挑釁了，令市民大為憤怒。

陳希同的「平亂報告」中，便以一連串事件羅織「有人有組織地煽動一些人在建國門、南河沿、西單、木樨地等路口阻攔大小車輛，設置路障，攔截軍車，毆打戰士，搶奪軍用物資」等罪名。

學生察覺軍方連串不尋常行動，有嫁禍嫌疑。他們將檢獲武器送至新華門，要求當局收回，但被拒絕。隨後，官方卻藉詞要奪回失去了的彈藥車。武警在六月三日中午向在西單一帶人群的施放催淚彈，並以電棒、鐵釘木棒、警棍攻擊在場市民，製造了自戒嚴以來首宗嚴重的軍民流血衝突；新華門同時衝出約三百名軍人，以木棒和電棒追打在該處靜坐的學生；下午二時左右，人民大會堂西門亦衝出上萬名軍人企圖佈防，即時與數萬市民對峙，並出現人群向軍人擲磚頭事件。凡此種種，已使北京市陷入極端混亂的狀態。整個下午，軍警見人就打，明顯在挑起事端和軍民間的仇恨，大大小小的流血衝突不斷發生。

官方自導自演，軍警打砸燒殺

記者亦看見市民從解放軍棄置的軍車上繳獲大量木棍、菜刀和鐵棍，部分武器亦轉交至廣場指揮部。但根據陳希同報告中指出：「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頭頭，在天安門廣場分發了菜刀、匕首、鐵棍、鐵鏈子和削尖的竹竿，聲言『抓住軍警就要往死裏打』。」可以推斷當時部分軍人棄車而逃，事實上卻是插贓嫁禍於市民的圈套，製造暴亂的鐵證。一些市民更告訴記者他們目擊解放軍棄車後自己砸碎了車輛的玻璃窗，有人甚至目睹軍人縱火燒車，由軍人自導自演一場如官方所說「駭人聽聞的打、砸、搶、燒、殺」的血腥暴亂。

就在三日晚上十時左右，皇子屯近新華社宿舍附近，響起了血腥鎮壓的槍聲，市民遭「人民子弟兵」槍殺；接著，裝甲車在長安街上橫衝直撞，軍人亦跟著在公主墳、木樨地、六部口、西單等多個地方，以實彈槍擊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他們很多是背部中槍，證明是逃跑時給軍隊從後射擊的。

群眾的悲憤和痛恨已如山洪暴發，一發不可收拾，面對瘋狂的劊子手，善良的人們終被逼迫成官方所謂的「暴徒」。為洩填胸義憤，市民終於燒軍車，隨處縱火，扔燃燒彈，毆打解放軍，砸毀裝甲車，甚至燒死軍人，再將之挖肚挑腸示眾。市民卻沒有察覺，他們這些原是官逼民反的行徑，卻被戒嚴部隊全部有選擇地獵入鏡頭，並被說成是「對解放軍戰士發動了滅絕人性的殘殺，手段極其兇暴野蠻」的「反革命暴亂」行為。

學生市民早已準備民運將以鎮壓告終，只是不曾想像人民軍隊的子彈會向他們瘋狂射來，坦克車會在他們身上壓過。

中共手段諱莫如深，真相頓成歷史懸案

其實踏進六月，戒嚴下的民運已陷低潮。白天，廣場上的學生寥寥無幾，長安街上的市民不復穿梭來往，僅以當時北京城內的公安、武警，以及經已潛入市中心的軍兵力量，快速進駐廣場，驅走學生原非難事。為何要策劃連串挑釁，令開始散渙的市民、學生重新集結，又從城外強行推進部隊，對企圖阻擋的民眾下「格殺令」呢？難道真的如李鵬所言，當局沒足夠的催淚瓦斯和水炮嗎？

中共高層處理民運的手段，其中曲折諱莫如深，相信有好一段日子仍是懸案。外間不少觀察分析，特別引證於鄧小平多次講話，認為這是中共當權派有目的、有步驟的一次大規模、不惜代價清除異已的行動，因而在事件中有意地拖延化解矛盾的機會；同時，不斷分化、不斷誘出黨內外反對力量，來一次「引蛇出洞」式的清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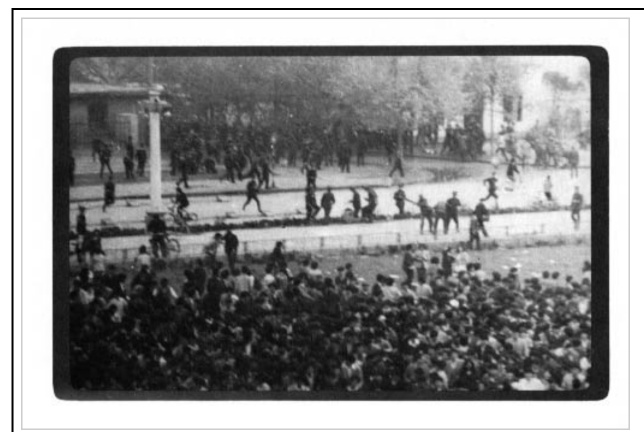
同時，亦有說法指這是高層兩派劇鬥，至使不能及早化解學潮。學運轉化為民運，令中共高層措手不及。加上學生與官方互相推迫對方走上極端，在各不退讓並不斷將行動升級的情形下，雙方都對局勢失去控制，而釀成最後的悲劇。

相對於「六˙四」大屠殺，解釋中共處理手段的不同說法之間的差異已不重要，一個刻意製造屠殺慘劇的政權，無論它走上這滅絕人性的一步時提出怎樣的解釋，都不能改變它必將被送上歷史斷頭台的命運。

學運火焰蔓延全國

李婉貞　曾偉玲　幽芳　徐忠明
楊明龍　張志剛　楊健興

從四月中旬到六月上旬，全國二十多個大小城市，由自發組織悼念胡耀邦活動，到以各種形式支援北京學生，壯大了北京學生爭取民主改革的聲勢。北京與外地學生血脈相連，遙相呼應。北京學生以遊行集會、靜坐、募捐及絕食等行動要求民主；外地學生亦緊緊相隨，更派出隊伍赴京聲援，掀起四九年以來最大規模的自發性民主運動。



四月二十二日西安新城廣場的警民衝突。 學生提供

初期，聲援行動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如上海、廣州、武漢、南京、成都、長沙、杭州等。其後，聲援越來越多，也不囿於大城市，在北京學生絕食期間以及頒佈戒嚴令初期，各地掀起大規模示威遊行。

「六˙四」血洗天安門事件再次激起十多個城市的市民和學生憤怒上街遊行。在抗議政府暴行的同時，一些城市亦恐防遭到同樣的鎮壓，紛紛設置路障阻截傳言會入城的軍隊。但隨若白色恐怖和搜捕，各地市民的「怒吼」也被迫壓抑下來。從六月十日開始，大規模上街活動已不復見，學生組織亦被迫轉入地下。

八九民運與八七學運比較，無疑是牽連更廣。雖然中共當局實施新聞管制，但在很多主要城市出現的學潮，仍能透過各種途徑，為外界知曉，以下是幾個大城市在北京學運期間的主要情況。

上海

學運規模僅次於北京的上海，學生初期亦因悼胡活動而掀起學潮。其後因市委書記江澤民強令刪改《世界經濟導報》刊出的悼胡專輯，以及勒令總編輯欽本立停職，導致學生把矛頭直指市委和政府，爭取新聞自由，同時亦激發起群眾的不滿。

五月二日，上海學生發動了大規模的萬人示威，來自交通、同濟、復旦和華東師範等大學的學生，不滿欽本立因刊載為胡耀邦平反的言論而遭停職，組織上街遊行。學生高舉「打倒官僚」、「還我導報」、「恢復欽本立職位」、「新聞要講真話」的標語，遊行到外灘的市政府門外靜坐，並遞交請願信。學生提出四點要求：（一）恢復欽本立的職位；（二）修改遊行條例，容許真正的遊行自由；（三）保證這次參加者不受清算；（四）客觀報道這次學運。

雖然政府接收了信件，但始終沒有作出回覆。五月四日數萬人遊行後，當天晚上萬名大學生前往上海市委辦公廳門前靜坐，就四項要求提出與江澤民對話，但得不到答覆。

自五月十六日開始，幾百名上海高校學生在外灘市政府大門外靜坐絕食，聲援北京學生，並對上海市委在四月二十五日處理導報的決定，表示強烈不滿。

十七日，上海爆發了自四月中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十多間新聞出版單位，部分市民和工人都參加了高校學生的行列，為數超過十萬人。

當天上午，各高校學生紛紛到外灘，跟在該處通宵靜坐、絕食的學生會合。遊行隊伍高舉「違憲的誰來管？天下人得而誅之！」、「不自由、毋寧死」、「中國醒來了，中國不會亡」等標語，不少學生還喊出「江澤民下台」的口號。下午，上海《文匯報》的七、八十名記者、編輯率先上街遊行，他們高呼「江澤民應對《導報》事件負責！」、「開放報禁、新聞自由」，其後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解放日報》、《新民晚報》、《文學報》、《文化藝術報》、《勞動報》和一些出版社的記者、編輯和工作人員也舉著本單位的旗幟和標語上街。

十九日，江澤民和市長朱鎔基一度擺出友善姿態，仿效趙紫陽及李鵬，親自到市政府門外慰問絕食學生。可是，翌日的情況卻急轉直下。凌晨零時，電台及電視台轉播了李鵬及楊尚昆講話，北京實施戒嚴。上海高校學生領袖開會後決定，停止絕食行動，全部學生撤回校園，避免發生流血事件，學生對政府徹底失望，遂改變鬥爭方式，繼續採取罷課、空校及組織宣傳隊的策略，各院校還每天輪流上街遊行，期望政府低頭。

「六˙四」屠城後，一列由北京開來的客運列車，向臥軌攔車的學生市民駛去，造成四十人傷亡。憤怒的群眾毆打警察，並燒毀了列車和摩托車。

在這個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政府面對大規模的學潮沒有仿效北京以武力鎮壓，而是採取與北京不同的處理手法；曾一度傳說軍隊進上海平亂，結果並沒有，政府只是發動工人，組成糾察隊來維持秩序。

六月八日，市長朱鎔基向市民保證，市政府不會實施戒嚴，並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說北京發生的，是「無人能隱瞞的歷史，真相終得大白。」

天津

距「震央」北京只有一百廿公里的天津，學運期間，雖有學生示威遊行活動，規模卻一直未致擴大及觸發官民衝突，這點與官方處理手法有直接關係。

市長兼市委書記李瑞環一方面要求各工廠企業組織「保衛天津」、「保衛人民」的「雙衛隊」，以二十五萬隊員，配合武警舉行三次大清查，取締非法組織「天津愛國工人聯合會」和「天津愛國民族自治會」，強調「天津不能亂，亂了首先是老百姓倒楣」；另一方面與學生對話，協商遊行路線，故此能保持市內平穩，生活如常，遊行亦井然有序，警察協助維持秩序。六˙四」鎮壓以後一些從北京返回的學生把真相告知市民，不過市民沒有莽動，亦未傳出官方大規模搜捕參與學運人士。

成都

從四月二十日起，成都市連續多天都有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高呼「要民主，要自由」、「打倒官倒」的口號。數百名學生靜坐及數度衝擊市政府。省政府官員曾與學生對話。五月十七日，成都市二十萬人上街遊行。翌日，數十萬名學生、工人、科研人員和各界人士環市遊行，五百五十名高校學生更開始絕食支持北京絕食的學生。接連數天，成千上萬的學生在市中心遊行支持絕食的學生。不過，二十五日起，蓉城學運轉向沉寂。

六月四日晨，軍隊血洗天安門的同時，成都亦發生嚴重流血事件，據報道軍隊開槍射殺三百餘人。報道謂事件起因是學生與軍警衝突，官方則說出現打砸搶等暴動，故採取鎮壓措施。北京鎮壓消息傳到成都後，再有數以萬計的大學師生和知識分子走上街頭，並在市內人民廣場的毛澤東石像前舉行集會，抗議鄧李楊政權的暴行，不久則遭到上千名武裝軍警揮棒驅散，軍民對峙，互擲石塊，估計有十多人死亡，逾百名群眾被打至頭破血流。六月五日，群眾在市中心舉行悼念大會，人民廣場上擺滿花圈和輓聯。同日，據報成都繼北京以後實施戒嚴。

六月七日，據報三百名冒充學生的滋事分子，乘數千大學生遊行示威時搶掠、焚燒了成都市最大的百貨公司，以及在人民廣場附近的人民電影院和東風劇院，又搶掠錦江賓館和岷江飯店的友誼商場。公安局出動了上千名武警，抓獲一百一十八名搗亂分子。除一人為學生外，其他均為待業青年及工人。

成都的暴力衝突，與四川人「豁出去」的性格，以及當局設下的陷阱有密切關係。

據記者一位與省政府高層有密切聯繫的記者朋友說，當局在學運前期提早釋放了一些刑事罪犯，並授命他們「改過」的機會就是負責替政府監視在成都人民南路廣場的絕食學生，並說他們可採取各種手段，因此這批犯罪分子更加肆無忌憚，搗亂學生絕食活動，對市民造成滋擾，使市民對當初支援學生的行動產生懷疑。六月五日，在人心惶惶之際，一批犯罪分子趁學生遊行抗議經過人民商場時，在毫無阻擋的情況下衝進百貨公司放火；附近警察因事先奉命，並未阻止，其他流氓乘機加入，衝入飯店和商店搶掠。

事後，政府把這些事件緣起嫁禍學生，判了兩個犯事者死刑，這些死囚在行刑前曾企圖喊出真相，子彈卻先打進他們口裏。政府恐怕洩密；再次把犯罪分子關回監牢，成都人民似乎普遍認為政府做得對，政府做的那一套「平息暴亂」的戲令成都人十分信服。

四川大學一位中文系教授說：「這些事暴露了四川人的醜陋面目。」成都的知識分子保持慣有的「滑頭」姿態，沒有大規模出來支持學生，削弱了聲勢，不能與政府宣傳抗衡，市民得不到民主教育。其次是成都學生的政治智慧沒有北京學生高，以致被犯罪分子有機可乘，使政府陰謀得逞。此外，政府更歪曲各地民運真相，把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支持民運說成要求將香港提早在九七年前交還給中國，而成都人也半信半疑。

西安

西安的學生活動也被不法分子利用。

四月二十二日，數萬名市民及高校學生在陝西省政府門前的新城廣場舉行追悼活動，有人混進廣場，高呼反政府口號，並圍攻省政府大院，燒毀十輛汽車和二十多間民房，又搶掠一間服裝店。事件中有一百三十名武警受傷，中國新聞社報道學生及市民皆有受傷。而搶劫服裝店的十八名暴徒則當場被捕。

翌日的西安市回復平靜，但政府實行了二十四小時交通管制，以頭戴鋼盔的武警封鎖各個通往廣場的路口。政府更在四月二十四日拒絕傳送任何有關暴亂及西安市面的新聞衛星畫面。

騷亂事件沒有冷卻學生繼續投身民主運動的熱情。一名到過西安的香港學生表示，他從當地學生口中得悉，西安的學運沒有出過亂子，糾察隊一直維持良好秩序。最大規模的遊行包括胡耀邦追悼會及五四遊行，為數幾千人，來自西安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高校。

學生的要求跟北京的大致相同，都是民主自由，及打倒官倒。而其他行動也跟北京的學潮緊密連繫。在北京學生絕食期間，西安學生也進行了絕食，但規模比北京的小得多。該名香港學生聽說絕食的學生人數約為二十，其餘的便在廣場內靜坐。

陝西省委、省政府信訪局負責人曾於五月十一日與學生對話，可惜無實質結果，而公安在監視學生遊行時也沒有加以干預。

可是在「六˙四」屠城之後，西安政府馬上拘捕了四十八人，他們被控煽動學生及群眾，試圖武力顛覆共產政權。在大學門口，更有便衣駐守，搜查學生，檢查身份及阻止他們帶傳單回校。

到過西安的香港學生說，西安市民可收聽到《美國之音》。他們得知北京屠殺事件後，十萬名學生、工人和市民上街抗議，並舉行罷工罷市。

長沙

在湖南省會長沙市，四月二十二日悼胡活動亦有不法分子搗亂。當日長沙高校四千多名學生在市區遊行完畢後，數千人仍聚集在五一廣場，混亂中

有人乘機起哄，推翻汽車，並把交通亭砸爛，及後還搶劫商店、火車站及車站外攤子。官方估計有三十八家商店、售貨攤遭劫掠，損失達八十萬人民幣以上。近百名暴徒被帶走，審查結果證實大多是有前科的流氓，有些青年還佩戴著毛澤東像的徽章。

一名到過長沙的香港學生表示，北京傳來的學運訊息，以及北京有學生串連，推動了長沙學運；但另一方面，長沙、武漢的官倒問題、失業等社會問題，亦激發起群眾廣泛參與，藉機宣洩不滿。

「四˙二六」社論發表後翌日，二千多名長沙中南工業大學、湖南大學和湖南師範大學的學生上街遊行，沿途高呼「民主萬歲」及「打倒官僚」的口號。他們下午到達省政府大樓，衝破公安警戒線，闖入大樓跟工作人員交涉，要求與省領導人對話。

政府其後答應學生要求，於四月二十八日在廣播電視大學與學生進行了三小時的對話。來自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及中南工業大學的八名學生代表要求省政府公布主要官員的私人財產，並談及官員廉潔、教育及重新評價胡耀邦等問題。雖然接見的省領導包括副省長王向天和省教委負責人未有實質答覆，但政府讓學生發表意見，其應付手法和容忍態度都較中央和和北京政府高明。

學生及後的行動都很和平克制。根據這名香港學生引述長沙學生說，這與打砸搶燒事件在他們心中留下了陰影有關，學生都小心行動，不敢過激，以免被人利用乘機搗亂，讓政府有藉口鎮壓。

李鵬「五˙一九」講話後，學生情緒變得激動，紛紛要求李鵬下台，而群眾間的氣氛也緊張起來，恐怕在武漢實施戒嚴之後，政府以打砸搶燒事件為藉口，在長沙實行軍管。傳聞郊外出現軍隊，農民設置路障阻止軍隊進入。市民亦組成敢死隊保護學生，部分工人甚至罷工。

學生在省政府大樓外的靜坐示威於五月三十日終止，但示威浪潮在六月三日再次爆發，學生聽到北京的軍民衝突後，紛紛上街。六˙四屠城後亦曾出現示威。

廣州

在廣州，學生運動的規模亦相當大。每次學生號召的遊行，集會都有超過十萬人參加。

廣州的「天安門廣場」是東風路廣東省政府門口的一塊小空地，從五月份開始，學生幾乎每晚九時後列隊由學校遊行到省政府門前參加集會，凌晨過後始陸續返校，只留下小部分人通宵靜坐。

學生運動在廣州曾經出現兩次高潮。第一次在五月二十日凌晨，當晚正是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學生運動是一場「動亂」。廣州學生收看完中央電視台播出李鵬、楊尚昆講話之後，馬上組織隊伍上街遊行。凌晨三時許，各校隊伍陸續到達省政府門口，學生情緒非常高漲，首次叫出「李鵬下台」的口

號。當日學生領袖還定在天亮後舉行環市大遊行。超過十萬學生參加這次遊行。

第二次高潮是在五月二十三日，當時北京頒佈戒嚴令已有好幾天，大批解放軍圍困北京城。廣州高校愛國聯合會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合辦一次「省港大遊行」，以示聲援北京同學。

數十萬學生和市民原本已經情緒激昂，在遊行期間，更不斷傳出李鵬已經辭職的消息，進一步刺激學生和市民的情緒。遊行沿途有人放爆竹，學生高唱國歌，「抗議大遊行」差點變成「祝捷大遊行」。

在整個學運中，廣州高校學生佔有地利。廣州鄰近香港，很多廣州市民都收聽香港的電台，學生領袖有任何決定，只需透過電台宣布，就可以收「一呼百應」之效。事實上，廣州學運所出現兩次高潮都和訊息傳遞快捷有關。

此外，最值得一提是廣東省政府對待學運的態度。李鵬宣布戒嚴令之後，廣東軍區最先一批發電中央表示支持，而省府亦表示要「學習」李鵬「五˙一九」講話。但是省政府一直沒有對學生採取任何行動，任由學生在省政府靜坐，在大街的牆上塗上極度「反動」的標語，亦沒有發動省內「宣傳機器」嚇住學生，可見廣東省的做法有其靈活的一套。

廣東省這樣做可能是要保護多年開放改革所帶來的成果。假若廣東省領導人採取任何打擊學運的行動，勢必影響將來的發展。現在保存了沿海開放城市的形像，廣東省領導人在處理這次學運動比較明智。

深圳

自胡耀邦逝世至北京學生絕食期間，深圳學生雖然亦有組織悼胡活動，及發表支持北京學生聲明，但整體來說是較沉寂的。直至五月十七日，北京學生絕食進入第五天，深圳大學學生進行第一次上街遊行集會，並進行募捐活動，亦有部分深圳學生上京絕食靜坐聲援。其後的兩天深圳均有學生遊行示威。

十九日深夜，李鵬頒佈戒嚴令，深大學生群情洶湧，第二天差不多全校五千名學生都上街遊行，高呼「打倒李鵬」、「李鵬下台」、「打倒鄧小平」、「李鵬講話是動亂根由」等口號。二十二日，深圳市爆發學潮期間最大型的遊行，五、六萬名中小學生、新聞界、社會團體及深大學生走到街上高呼「反對獨裁，李鵬下台」。同時，深大的協調委員會又發表《告深圳市民書》，強烈譴責李鵬與人民為敵，不代表人民利益，要求李鵬下台。二十三
日起，深圳市區仍有零星的學生遊行及集會，但規模不大，而深圳大學也轉移精力在突破新聞封鎖方面，如搞錄像，影印資料廣為散發。二十三日的「省港澳大遊行」，深大也有二百多名代表赴穗響應。

六月四日，軍隊血腥鎮壓北京民運，深大學生悲憤填胸，但考慮到所冒的政治風險大，得保護深大和學生，學生組織與校方遂決定不再舉辦遊行，但學生會仍響應部分學生自發的「空校」行動表態罷課，並加緊突破新聞封鎖工作，如發起「一人寫十封信」、撥長途電話北京等。六月五、六日，成千上萬的深圳市民自發在深圳大劇院設置靈壇，擺放花圈悼詞，舉行悼念集會，市區也有遊行集會，但規模不大。

學運期間，深圳學潮雖非波瀾壯闊，卻是團結一致，各學校、單位、社團均以整體名義參與。深圳大學全體共產黨員包括校長羅徵啟在五月十八日，急電中共中央，敦請鄧小平退休，又號召發起全市簽名請願運動，這是全國矚目的事件。

但鎮壓過後，羅校長亦被撤換。然而支援背後，深圳市民心情卻較為複雜。

一位學生領袖不諱言說：深圳市民恐懼切身利益受損，要承受的風險大，有後顧之憂。他說市民的心不是冷的，他們知道在北京發生的事情，但礙於懼怕家庭、經濟及個人前途受累，只能在心裏支持，實際行動則是捐款。

結語

由悼胡活動在北京觸發的學運迅即蔓延全國，發展成全民運動，最主要的原因是北京學生爭取民主改革，反貪污，反腐敗，新聞自由等適切反映了廣大人民對社會的長期不滿，因此在北京「一呼」下，其餘省市旋即「百應」，他們不單湧到北京直接參與，亦各在所在地組織學生、工人自治聯合會，例如上海、廣州、貴陽、西安均有類似組織，把民運不斷擴大。

群眾的介入，亦使學生爭取民主改革等理想變得複雜。在部分省市、更由於當地市民乘機搶掠等事件，為政府製造口實，把學運定為動亂。

無可否認，學生在吸收過八七年學運的失敗教訓後，明顯加強了在



亞洲週刊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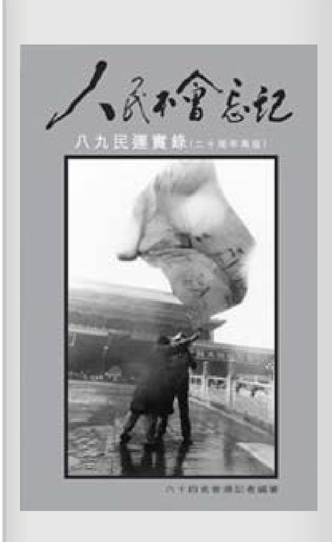
其他省市的「串連」活動，但整體而言，仍缺乏全國性組織。由於運動針對的始終是中央層面的問題，加上個別省市領導能靈活處理學生要求，局勢未致惡化至不可收拾，需要召軍隊進城。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李瑞環領導下的天津。另外上海和廣州等雖在「六˙四」後盛傳軍隊入城，引起群情洶湧，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上海市長朱鎔基和廣東省政府立刻公開否認將要實行軍管，對遊行示威亦採克制態度，避免了官方和群眾的矛盾升級。

事實上，整個學運期間，一些經濟改革搞得較好的省市，例如天津、廈門、大連、廣東等地，處理民運都十分克制、理智，除可反映經濟改革與政治、社會穩定的關係外，亦可看到這些省市的領導，更了解到改革開放的成果比意識形態鬥爭更為重要。

編者按：幽芳為香港一名記者之筆名

戒嚴部隊調動內情

劉銳紹





學生愛國心佈滿紀念碑上。 冼偉強攝

狼兵肆虐，京華淌血。在今次學運和民運中，向有「人民子弟兵」之稱的解放軍扮演了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

趙紫陽失勢軍隊入城

中共這次動殺機，最早可溯源於四月廿四日北京市委的報告。當時市委書記李錫銘向中央打報告，指學生鬧事，背景複雜；但「如果中央給政策，我們是有辦法解決的。」局內人稱之為「請戰報告」，也是最早把學運定性為動亂的報告，當時「名重一時」。

這報告雖然沒有說派兵入城，但已隱藏殺機。其後北京市以保護中央及重點地方為理由，先調動北京衛戍區的部份兵力進駐中南海和人民大會堂等地。當時中南海內有二千士兵，其中一千人集中於新華門內，其後一千人則分守西門和北門。

其後經過「衝擊」新華門、胡耀邦舉殯當天發生衝突，以及聚集於天安門廣場的學生越來越多，北京市委認為情況已趨惡劣，而北京衛戍區的兵力只有三萬人，他們於是請求中央採取措施。中央後來就從保定調來三十八軍的若干個師。駐守中南海的軍隊還接到命令，凡衝入中南海者，一律槍殺。

不過，直至五月十八日之前，軍隊也沒有採取強硬行動。主要原因有二：①當時趙紫陽仍未完全失勢，他力主對話；加上當時主要負責與學生對話的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和國家教委會主任李鐵映也反對動武，所以在「四˙二七」和「五˙四」兩次大遊行時，學生很容易就「衝」過了軍警的防線。其實，當時趙紫陽已安排了對話的「一線」、「二線」。「一線」即李錫銘和陳希同：「二線」即閻明復和李鐵映。李鵬和他本人則是第「三線」。②當時在北京的兵力仍不足夠，發生事情實難以控制，所以其他領導層成員亦暫且同意不用武力。

不過，隨著趙紫陽的失勢，強硬路線逐漸抬頭。五月十九日晚上十時，李鵬、楊尚昆、喬石等人在北京萬壽路總後勤部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正式指學生「動亂」，並馬上要出兵到天安門。

當晚，趙紫陽沒有出席。事後，楊尚昆和喬石表示一早已通知趙紫陽，還說「紫陽同志同意出席」；喬石更說當晚他在總後勤部後門之前等趙，還打電話催促。其實，據接近趙紫陽的人說，自從趙紫陽於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後，即被軟禁起來。他是臨開會前才接到通知的，但因為他反對鎮壓學生，出席只會為當權派塗脂抹粉，鎮壓的責任也落到自己的身上，於是決定不出席，更沒有什麼出席的承諾。其後，李、楊、喬等又利用這事羅織罪名，說趙紫陽「同意後又不出席，把黨內矛盾暴露於外」。

五月初由內蒙瀋陽調兵

李鵬於五月二十日頒佈戒嚴令。其實，在此之前，他們已作了相應的調兵部署。

首先，他們從三十八軍增調兵力，再由內蒙和瀋陽調來新軍。這些安排都是在頒佈戒嚴令之前兩星期已經部署的。直至五月十九日出兵天安門當晚，外來兵力已聚集於北京郊區，為數約五萬，但都沒有攜帶炊具和武器。李、楊集團當時聲稱軍隊「不是針對學生的」。

但軍隊進城，受到人民阻截，因而發生多次衝突。

五月二十日，頤和園北面青龍橋地區的三○九醫院附近出現了一批由內蒙古調來的軍隊，還有四十多

輛運兵的大卡車和三十多輛裝甲車和坦克。在場的軍警與一些農業大學的學生發生衝突，後來動用警棍打傷了六名學生。這也是北京市民第一次發現官方竟真的出動了坦克車。

同日上午十一時，北京市西南約二十分鐘車程的六里橋，又發生軍警毆打群眾事件。據一名剛在現場的醫生說，他看見軍警向人們的後腦、面部和腰部猛擊，而群眾則以玻璃瓶和磚頭頑抗，又有四十多人受傷。

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十時半，軍警在豐台地區與第三師範學院的學生和市民發生衝突，引致四十多人受傷。

雖然如此，學生和市民還是成功地阻止了軍隊進城。但與此同時，中共調到北京的軍力又越來越多。

圍城兵力逐日增加

從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的採訪過程中，筆者發覺軍方的調動主要有以下的特點和過程。

首先是人數越來越多。根據可靠消息，五月二十日，到達北京近郊的軍隊約有五萬人，至二十四日已增至十多萬，包括來自北京軍區的六十三軍、六十四軍、六十五軍、三十八軍、二十七軍、二十八軍和二十四軍；來自蘭州軍區的二十軍；來自南京軍區的十二軍；來自濟南軍區的五十四軍；來自瀋陽軍區的三十九軍，以及空軍的十五軍。有關方面從上述各軍中抽出若干個師到京，已在北京外圍形成了兩個大的包圍圈。第一個包圍圈是近郊，距北京市中心約一小時路程，第二個包圍圈是遠郊，距市中心約兩小時路程。來自美國大使館的消息說，美國的軍事衛星也測到了當時軍隊和戰車的活動情況。

至二十六日下午三時，消息來源透露，圍城的兵力已達二十萬，約佔全國正規軍的十五分之一。

二十七日，軍力繼續增加。若按軍隊的番號統計，約有二十個軍已派出若干個師的士兵抵達北京外圍；北京軍區的八個軍全部都有調兵。

兵力戰備遠超應付群眾運動需要

其次，今次行動中所出動的戰備和武器，遠遠超過鎮壓群眾運動的需要。

五月二十日凌晨，強要入城的軍隊是沒有攜帶武器的。但同日下午，當記者趕赴郊區採訪時發覺，當局今次出動了野戰集團軍。在長辛店，筆者看見七十多輛裝甲運兵車剛從石家莊抵京。在宛平縣，又有十六輛法國戴高樂式運兵車，其餘的補給軍都是長期野戰用的。

二十一日，筆者又在頤和園以北農業大學附近發現帶有重機關槍的裝甲車和裝上重炮的坦克車（共二十一輛）。

至二十四日，情況更令人難以置信。抵達北京郊區的兵種已包括有空降兵、裝甲兵、炮兵、防化兵和陸軍。直升機又連日來在市內上空盤旋偵查。市民後來還在京郊發現類似導彈的裝備，一度傳出消息說這是地對空導彈，其後官方則表示這是催淚瓦斯的裝置。

此外，軍隊內部的緊張氣氛，完全不是因為群眾攔截或所謂「動亂」所造成的，而是軍方高層刻意製造的。

軍隊最初被調到北京之前的兩個星期，都要集中起來，不准看電視和報紙，不准聽廣播；只是集中學習「四˙二六」社論和操練，他們當時還以為是一般的政治學習。後來進城時，他們從上級口中知道今次入城的原因，是「搞一次保衛北京的演習」、「北京發生雨災，需要搶救」、「到北京趕建某項工程，迎接四十周年國慶」；甚至有軍官告訴士兵：「今次進京只是旅遊。」所以，最初兵臨城下時也不是那麼緊張，雖有衝突，但也有不少「軍民魚水情」的場面。

但經過數十萬群眾四出阻截軍隊，並向士兵進行游說教育後，軍方發覺最先入城的軍隊都沒有作戰意識了，於是在二十三日將這些軍隊後撤，與群眾「脫離接觸」（此乃軍事術語，保持軍心穩定的方法之一）。當時，明眼人已看出這不是真正的撤軍。果然，《解放軍報》於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兩天連續發表語氣極為強烈的文章，明確表示解放軍執行戒嚴令，是為了「制止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動亂」，而且目前的矛盾是「關係到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嚴肅政治鬥爭」，「是大是大非的鬥爭」。

據軍方消息說，就在這兩天起，軍隊內的氣氛突然緊張起來。首先，士兵接獲通知，要作好在北京屯兵半年的準備（事後果然證實如此）。其次，子彈和其他裝備直接發到士兵手中，每人最少有十發實彈和五發橡皮子彈；沒有橡皮子彈的則可獲十五發實彈。鋼盔、大頭鞋和壓縮餅乾等亦已交到士兵手中。其三，保持軍事訓練，包括射擊。其四，加強思想教育。

上述步驟，都是要把軍隊的情緒帶回戰鬥的狀態之中。

軍隊入城步驟深思熟慮

中共高層調動軍隊入城，其步驟可謂深思熟慮。早在五月十九日，部分士兵已對主要的傳播機關和大單位進行軍管，包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社、首都機場、電報大樓、熱化廠、電力公司和發電站等，務要控制輿論和重要單位。北京市政府發言人丁維峻於二十四日證實了上述軍管的消息。由於進駐上述單位的都是北京衛戍區的軍人，所以不用從城外調兵，毋須闖過群眾的人牆。

二十日，當局又發出禁令，嚴禁中外記者未經同意進行採訪。同日，直升機開始盤旋偵察軍隊入城之路。

此外，在大軍未闖過群眾的血肉長城之前。軍方已千方百計安排軍隊進城，如通過地鐵、火車、便裝、化整為零等。五月二十日，有軍隊從五棵松站欲乘地鐵前往天安門廣場，但地鐵工人故意把電掣關掉，造成機械故障，令軍隊無功而退。

雖然群眾盡力攔截，但不少軍隊已進城內，分別駐於軍事博物館、人民大會堂、革命歷史博物館、中山公園、北京火車站旁邊的貨倉和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地下通道。中南海內的士兵亦已增至五千；人民大會堂西面的地盤（與中南海僅相隔一條長安街）內也駐有軍隊，隨時與中南海內的士兵對街上的人進行夾攻。當時的指揮部有兩個，一個就在中南海，一個在人民大會堂；前者是總政策的策劃地點，後者則是具體執行任務時的指揮部。越接近學運後期，後者的角色則越來越重。這兩個指揮部連成兩點一線，控制著整個北京城。

五月二十五日，士兵正式收到有關進軍步驟的通知──入城時三十八軍打頭陣，二十七軍次之，六十五軍排第三，其餘的依次隨後。軍方通令各人要作好準備。

五月二十七日，由首都機場前往市區的公路上，也首次發現有軍隊把守。這個發現相當敏感，因為如果有事發生，空路是逃走的最快途徑；軍隊把守通往機場之路，是否有特殊含義？加上於五月二十三日，廣州民航突然接到國務院通知，調出九架大型客機先飛往北京，然後候命待發，以致廣州停售國內機票。這個調動與軍隊把守機場路聯繫起來，實在引起猜疑。當時有人說這些客機是用來運兵離京，但答案至今仍是個謎。

此外，北京郊區的兩個軍用機場──即南苑機場和西郊機場，那幾天都有軍隊到達和調動的消息。

五月底決定大開殺戒

至五月三十日，大軍壓境的形勢基本已定，但人民還不知道浩劫在即。與此同時，戒嚴部隊接獲命令，正式著裝上哨。

最後動兵的計劃於五月三十一日定出。當日京郊懷柔、順義等縣已出現由當局組織的遊行，聲稱「擁護戒嚴令」。按當局的計劃，先花兩至三天時間（由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組織七十萬人，準備於六月三日在市區內遊行「支持政府」，具體工作由北京市政府負責（他們以每人十元人民幣為餌，有些單位還以參加與否作為入黨的標準）。官方的時間表是：六月二日晚上，軍隊出動；三日凌晨二時，清理天安門廣場；凌晨五時，清場完畢並進行封鎖，不准進入；三日的白天，進行「擁護政府」的遊行。時間的確配合得相當好。

但這個如意算盤打不響。六月二日晚上十時四十分，木樨地發生與軍隊有關的嚴重車禍，激起群情。六月三日凌晨，兩路軍人分別進京。逾萬娃娃兵從東邊進城至北京飯店附近被數以萬計群眾截回，這路軍人是準備在清場後駐守天安門的；另外由城西進京的軍隊亦受阻於木樨地，這些軍隊則是清場的主力。

結果清場清不了，原定在三日舉行的遊行亦無法成事；加上人民對軍車傷人一事反應極為強烈，中共高層終於在惱羞成怒之下狠狠地下令鎮壓。

六月三日，軍隊正式接到通知，北京「『暴徒』已難以控制，搶掠了大批軍備，必須維持首都秩序。」終於，在六部口、新華門前和人民大會堂西側於三日陸續發生軍人動武事件。

六月三日晚，軍隊獲命令要強行進城，並可開槍。於是，坦克、裝甲車、軍隊相繼出動，一夜浩劫，山河變色，草木含悲。

誰下令調兵鎮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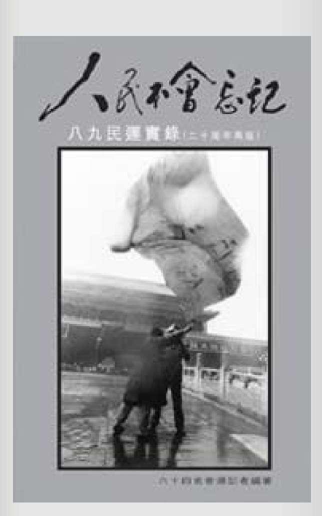
浩劫之後，至今仍有很多疑問沒有答案，其中主要有三：①為什麼要動用如此龐大的軍力？②為什麼會傳出軍隊互相衝突的消息？是否真的發生過衝突？③是誰下令調兵和鎮壓。

經過事後核實和比較各方面消息的準確性後，第一個問題仍沒有清晰的答案；另外兩個問題則有點眉目。

據了解，當時軍隊內確曾出現過一些磨擦，但並不能稱為「衝突」。消息傳出的原因大致有三：①李鵬於五月二十日頒佈戒嚴令後，各軍區即先後表態，但北京軍區卻於五月二十五日才表態，而被視為

擁趙紫陽的秦基偉對北京軍區甚有影響（秦基偉任國防部長之前是北京軍區司令，也是鄧小平的嫡系）。②三十八軍屬北京軍區，其中部份士兵於入城時在木樨地附近棄槍（真正目的未明，有說不願鎮壓學生，有說是「群眾奪武器」的陷阱）。事實上，當一些官兵從群眾口中獲悉北京無動亂時，曾有官兵表示反對鎮壓（三十八軍軍長因此而被禁）。③軍隊入城時，同時接到軍令狀：如果前面的軍隊不肯向前或甚至後退倒戈，尾隨的軍隊可以開槍。按上文所述的次序，尾隨直接受秦基偉影響的三十八軍之後，恰好是二十七軍（其軍長正是楊尚昆的親屬，據稱乃侄兒），兩軍矛盾之說說來有板有眼。

那麼，是誰下令調兵？按中共軍方規定，如要調兵，只有兩種情況：一是中央軍委主席簽令，二是兩名軍委副主席簽令。當時身兼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趙紫陽已失勢，故第二種情況應該不會出現（如果是有令不行則是另一回事）。至於是誰下令開槍鎮壓？筆者認為並非關鍵問題，因為鄧小平、楊尚昆、李鵬、喬石等人均有份制定整個鎮壓的計劃，各人的罪名不能推卸。



掙脫枷鎖的國內新聞界
由直筆到曲筆

馬妙華　劉銳紹　陳天權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他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

北京國際廣播台
英語部主任李丹
六月四日中午廣播

中國的新聞工作者，可以說是知得最多、感受最深，卻寫得最少、說得最少的一群。

然而這群長期在官方壓制新聞自由下工作的人，為了恪守新聞道德，報道真相，縱然要冒上被撤職、被捕、甚至被殺的危險，他們還是在學運期間及官方鎮壓以後，爭取任何空間、渠道，試闖每一個禁區，以傳遞學運的訊息，暴露官方的惡行。

遇上寬鬆的氣候時，他們直筆照寫，但當官方大力箝制新聞單位時，他們就以婉曲的筆觸、或借「外」諷「內」、甚至用哭腫的眼睛和黑衣來表達國殤的哀思。

《科技日報》發難

學運期間首先打破官方新聞箝制的報刊，是隸屬國防科技工業委員會的《科技日報》。

該報記者集體採寫的一篇「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行」，以感情豐富的筆觸，描述四月二十二日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的悼胡大會。

記者們不單講述了參與院校的名稱，學生隊伍的口號和活動，他們也在文中滲入了一些對學生運動的主觀正面評價，例如，文中說：「對八十年代的大學生這樣嚴肅的隊伍，有誰能不為之欣慰呢？」

「學生們的口號代表著首都一千萬人民的心願，代表著全國十一億人民的心願，他們愛國愛家愛人民是顯然的。」

而以屢闖禁區聞名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則在四月廿四日用五頁刊出名為「耀邦活在我們心中」的座談會紀錄，其中一些與會者，要求官方重新公正地評價因八六年學潮被迫下台的胡耀邦；又要求黨正視歷史性的選擇，矯正錯誤。同日，該報更在頭版刊出一幀天安門廣場悼胡人潮的照片。

上述兩報衝擊著報界，然而兩地官方的反應截然不同，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在四月二十六日上海市黨員幹部萬人大會上宣布停止《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又扣起該期三十萬份「問題報紙」。但北京對《科技日報》則網開一面，不加處理。

同業蠢蠢欲動

新聞界此時蠢蠢欲動，試圖直筆記述學生運動。他們冒著危險，恪守新聞工作者本份報道新聞、記錄歷史。

四月廿七日，學生舉行十萬人大遊行，雖然官方已下令只能採用新華社稿件，但北京一些較為開放的報紙採用了該報記者的報道，其中《中國婦女報》刊登「北京數萬高校學生遊行」，內容客觀真實。

「五˙四」遊行翌日；隸屬中國共產黨青年團的《中國青年報》採用大膽的報道，刊出數百名首都新聞工作者上街遊行的文章和圖片，當中有「新聞封鎖不利於穩定」、「加強新聞監督推進政治改革」的標語。

此外，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幀新華社所發的學生遊行照片，圖中隱約可見被視為非法組織

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的會旗，以及聲援《導報》的橫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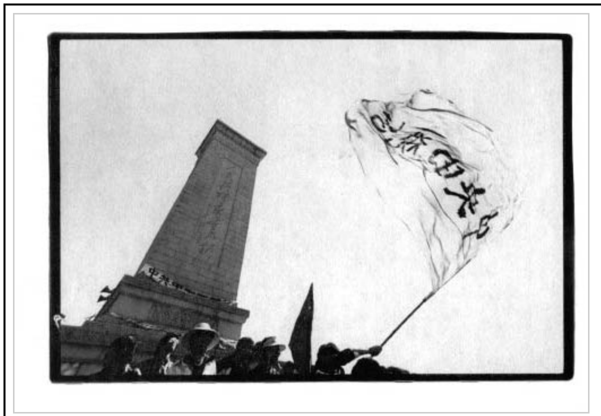
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四月廿九日自北韓回國後，新聞界得到更大的活動空間，而中共高層對如何控制宣傳機器也出現嚴重分歧。趙紫陽有意放鬆，而李鵬則力主嚴控。據香港《文匯報》報道，趙紫陽曾說：「新聞自由，新聞改革已勢不可擋，增加一點自由，風險不大」。而李鵬則在五月十八日與絕食學生對話時表示，對新聞界當時的表現很有保留。

由於趙紫陽及掌宣傳的中央大員有意放寬對傳媒的控制，國內新聞界經歷了兩星期左右的寬鬆期。如《工人日報》、《農民日報》、《北京青年報》、《科技日報》、及《中國婦女報》等，均告打破以往框框，在有限空間內，如實報道學運。

學生五月十三日開始絕食，《光明日報》在五月十五日刊出一張圖片，題為「首都部份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請願對話」，並沒有用官方口吻責怪學生的行動。

十六日，絕食進入第四天，多份報刊刊出學生絕食暈倒的照片。《人民日報》海外版刊出的照片，可見學運領袖柴玲背後的牌子，紀錄著同學絕食的時間和暈倒的人數，《人民日報》國內版，及以保守見稱的《北京日報》，也刊登學生暈倒後被送上救護車的照片，及百萬群眾上街聲援三千絕食請願學生的情形。

電視也造反



中央電視台的旗幟飄到紀念碑上。 陳木南攝

報刊如是，就連官方最重視的中央電視台新聞工作者，也開始巧妙地「造反」了。

雖然當局已嚴謹地審查「出街」的新聞片，但該台卻曾多次插入一些領導人出醜的鏡頭，例如有一次故意播出總理李鵬在一次會議後怒氣沖沖地離場的鏡頭。

而當轉播李鵬與絕食學生代表對話時，中央電視台不知是故意還是被迫剪去一段對學生領袖不利的片斷，當時，李鵬說：「我沒有想把責任加在你們吾爾開希身上、王丹身上，我沒這個意思，但這是客觀事實。」

同期，隸屬市共青團的《北京青年報》在絕食期間，曾在天安門進行了國內不常見的問卷調查，得出結論，發現絕大多數人認為學運不是動亂，群眾也理解絕食的用意。

調查結果刊出後，《北京青年報》即受到嚴厲批評，一些記者和編輯更被停職。

此外，隸屬新華社的《瞭望》周刊在五月十五日一期以學生絕食場面為封面，內附學運大事記。

據了解，這張照片曾遭「三收三放」，始可以面世。該封面首次印妥後，有關方面禁止發行，要改印封面，但社內人員堅持，結果轉折至第三次，由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仁親自批發下才能與讀者見面。

當然，學運期間傳媒內也有一些輕鬆有趣的場面。例如某報章的記者希望刊出一篇有關遊行的報道，總編輯既不敢登，卻又表示同情。

眾女記者於是把總編輯「請」出辦公室，說要跟他談一些家庭問題（因為國內的編輯有責任處理記者的生活問題）。

總編輯心照不宣，走出辦公室，一些記者於是代他簽名發稿。

通過北京主要的報刊及電台和電視台全國聯播，全國都知悉首都正在進行一場愛國民主、反官倒、反腐敗的學運，各地學生也起來響應，示威和遊行聲援。

借「外」諷「內」

五月二十日，一聲戒嚴令下，新聞自由進一步被扼殺，新聞工作者要報道北京急轉直下的形勢，就開始要左閃右避，借「外」諷「內」，間接地挑戰當局了。

舉例說，《人民日報》五月廿二日在頭版右下角刊登一則外國新聞，引述以開放別樹一幟的共產國家匈牙利的總理說：「匈牙利面臨動盪潛在危險，不準備用軍隊解決內政問題。」

五月廿五日，該報又刊出一段新聞，說：「聯合國秘書長關注中國局勢，希望不要發生暴力事件。」此舉明顯地是要向當局暗示不應向學生施用暴力。

到了六月四日，國內新聞工作者，為了採訪，為了讓全世界知道這血淋淋的「特大新聞」，不單要冒

上被撤職代價，更大可能是要把生命豁出去。

據了解，一些記者不顧當局禁止前往天安門採訪的命令，在混亂中被流彈打傷，甚至有人葬身廣場上。

六月四日晚，中央電視台兩名報道員就以「身體語言」去表達國殤之情。

兩人均穿上一身黑色衣服，女報道員杜憲雙眼浮腫，紅筋暴現，泛著淚光，她還一反常態地低著頭讀出官方指定的文稿。後來兩人均被換掉，改由別人當報道員。

為了與官方口徑「劃清界線」，免得玷污新聞工作者的名譽，所以當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要求新華社社長穆青簽發一篇「天安門清場記」的文章時，穆青在萬般不願意但又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提出一個條件，就是要所有新華社稿件必須註明供稿來源，例如戒嚴部隊指揮部，國務院或北京市委等。

穆青提出條件後，流著淚簽發了那篇稿，並發誓以後再也不簽稿。而他也馬上被「請」回家「休息」。

六月五日，中央電視台借「舊」聞來諷刺中國當局。晚間新聞聯播中，他們打出字幕，引述波蘭領導人說：「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又在螢幕打出十個大字：「告誡任何人都不要玩火。」

更有一段明顯是過時但又有影射作用的「舊」聞在聯播中出現，指蘇聯決定撤消中亞軍區，暗示中央應撤離天安門。

六月六日，中央電視台又用同一手法向政府進諫。「以（色列）總理承認武力平息不了巴勒斯坦起義。」用心明顯，不用闡述。

用沉默說話

血腥鎮壓之後，官方不容許新聞媒介報道屠殺真相。不過還有記者用婉轉間接的筆調作出種種暗示，希望國內讀者知道事情並非如宣傳般單純。六月七日中國新聞社記者，在戒嚴部隊軍官帶領下，參觀已封鎖三天的天安門廣場。中新社記者當天寫道：「紀念碑正面的台階上，可以發現有較大面積的損壞；下層的三級石頭台階的棱角，有長約一米的破損；紀念碑前的鐵旗杆，有兩根折倒在地。當記者問劉存康（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坦克或裝甲車是否開到紀念碑下時，劉斷然否認了這一說法。環繞著紀念碑的四周，到處是焚燒後的灰燼。

「記者在灰燼中發現有高音喇叭、汽水瓶、精鹽、帳篷、衣物、子彈殼、扭曲的鋼筋及血跡。在紀念碑東側基座距地面大約四、五米處，可以發現兩處被子彈打過的痕跡。一位知情者說，那裡（廣場處）幾天前被用水沖洗了多遍。」之前有傳言和報道說軍隊在廣場焚燒死者屍體。同去參觀的中央電視台就用沉默來表達。

電視聯播播出劉存康對記者說：「沒死一個人，基本上與學生無發生過衝突。」

但隨後的一分半鐘新聞片，全無旁白，攝影機鏡頭在廣場四周掃探，攝影師刻意拍攝坦克、裝甲車履帶輾過廣場留下的斑痕，紀念碑下大理石台階上清晰可見的彈痕，遭坦克、裝甲車削毀的台階，鏡頭又搜索到燒焦的廢堆中一本殘留的「英語指南」，相信是要觀眾想到廣場上學生的遭遇。

隨著官方控制越來越緊，新聞工作者的「筆」越來越「曲」了，他們甚至要鑽進副刊內，藉著寓言去傳達訊息。

例如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副刊，就曾經刊登過一篇「趣聞」，文章說有一頭雄鹿離群，鑽進一群雌鹿內，甚受歡迎，但當它跑回雄鹿群時，就受到同類圍攻。但故事卻有一個正面的結局，說這頭「鶴立雞群」的雄鹿與同伴和好如初，和氣收場。

故事沒有交代出處和時間，乍看予人沒頭沒腦的感覺，出現在官方最正宗的喉舌上，絕對不可能是「低水準」的作品。

一般估計，這篇寓言迂迴地暗示前黨總書記趙紫陽，由於站在學生那一邊，受到中共高層排斥。但寓言的作者則寄望終有一天中共高層可以排解紛爭，重新接受那位離群的總書記。

槍桿子下說真話

但在芸芸曲筆中，卻有一個異常勇敢的中國記者，膽敢在槍桿子下直說真話。

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主任李丹，在六月四日中午廣播中，自撰文稿並讀出：

「這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這一天，在中國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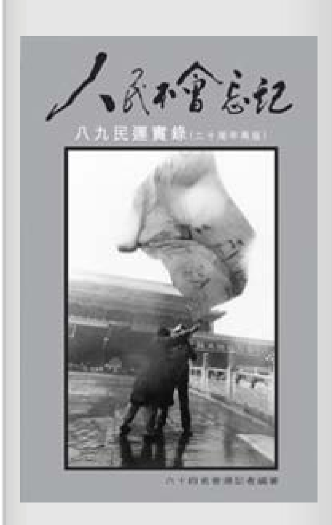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軍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發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國際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以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他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





黨報記者猛回頭

梁美芬 譚衛兒 劉銳紹 陳天權 馬妙華



為自由、民主踏出的一步。 冼偉強攝

伴隨著歷史性的八九年中國學生運動而出現的，是中國新聞工作者一段悲壯的事蹟。

在短短的兩個月中，他們做了不少中共建國四十年以來的創舉。這些被譏諷為「官方的喉舌」、「黨的輿論工具」的傳媒，全都把矛頭倒過來，指向官方。

記者、編輯不單在報社內公然炮轟官方言論及領導人，他們還「打正旗號」地上街遊行、示威、請願，並與官方對話。

造反緣自壓力

新聞界這次「造反」，首先是緣自外來的壓力──學生毫不留情的責難與戲謔，繼而基於本身熱切的期望與衷心的聲援──令新聞工作者要與官方「劃清界線」。

學潮爆發後，整個北京城逐漸沸騰起來。但官方的新聞對此卻極少報道。一位《中國青年報》的記者曾公開說他們接到有關指示，不能過多刊登群眾，尤其是學生自發的悼念活動──因那些行動與爭取民主不可分。

同學對新聞界提出嚴厲的批評。各大校園內，同學常常聚集一起收聽海外電台廣播。一位同學譏諷地說：「我們的報紙除了日期是真的外，其餘的都不是真話！」

其實，當時不少國內的記者，特別是年青記者，紛紛到各校和天安門廣場去採訪悼念活動。「我們大都是自己來的，並不帶有任何採訪任務。因為這些文章不會見報。但我還得來，我們今天的所見所聞，總有一天會公諸於世。」一位《光明日報》的記者曾在天安門紀念碑下這樣說。

學運展開序幕，在「四˙二○」學生衝擊新華門當晚，警察開始動武，混亂中百多名學生及數名警察均告受傷。

但翌日新華社發出題為「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的評論，隻字不提有學生被打傷，反指學生打傷了四名武警。

該篇評論一經中央電視台、廣播電台播出和各大報章轉載後，馬上使學生嘩然。同學很快開始「炮轟」黨的喉舌，北大法律系學生甚至倡議向人民法院起訴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造謠和誹謗，同學們開始轉向點名批評某些新聞機構。當時的一些順口溜很能代表學生的情緒：「人民日報欺騙人民；光明日報一片漆黑；中央電台顛倒黑白；北京日報胡說八道。」

與此同時，學生對敢於說真話的《科技日報》、《世界經濟導報》等表示了衷心的支持和讚賞。

根據一位《科技日報》記者表示，該報的領導班子其實也十分保守，《科技日報》這次之能夠刊登「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行」這篇傳頌一時的報道，完全是因為大部分記者挺身爭取的結果。

他說，該報在四月廿二日前，曾召開報社全體會議，大部份記者都希望能如實報道這次學生運動，領導班子因為這種壓力，卒同意較開明地處理有關新聞。

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刊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後，新聞界嗅到一陣腥風血雨將臨的氣息，他們以為當局會馬上進行鎮壓，更加迫切感到要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報道將要發生的事。

真實是新聞的生命

《人民日報》的記者，立即發起社內簽名運動。他們就鄧小平的講話和該篇社論，起草了《我們的意見》一信。

意見書說：「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也是新聞起碼的職業道德和原則。」

意見書又批評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事前曾干預新聞報道的政治局常委喬石，指他們強姦民意。

編委會當日表示與下屬對話，但後來也不了了之。

就在此時，以開放見稱於海外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因為刊登悼胡座談會，其總編輯欽本立被前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停職。這消息令首都新聞界強烈地感到唇亡齒寒，他們再不願保持緘默。他們知道，「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北京新聞界第一個反應是紛紛聯名致函上海市委表示抗議，又電文上海聲援欽本立，藉此反映新聞界力爭自由的呼聲。

四月廿七日，不單舉行了學生歷史性的大遊行，一批青年記者也開了一個簡短的會議，決定將計就計，以《導報》事件作為突破口，爭取新聞自由，開始了新聞界走上街頭抗議的序幕。

在他們上街前，記者已開始大膽地在報社直斥掌管宣傳的官員和官方言論。

在社內炮轟官方

四月廿九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與由全國學聯選出的學生代表對話。會上，袁木稱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各報實行的是總編輯負責制。

會後，袁木曾囑咐國內記者只可用新華社所發的新聞稿，但記者認為這正違反了基本新聞守則和規律。

其後，在《人民日報》報社內的評報欄上，出現了批評袁木的文章，也有人在那裏貼出批評「四˙二六」社論的文章，公然與官方「對著幹」，有些記者更貼出他們採訪了卻不被刊登的消息。

新聞界的憤怒和因而激發起的情緒，慢慢集結成集體行動。五月三日，百多名記者再次聚集在魯迅博物館，商討聲援《導報》事，並決定以遊行者的身份參加翌日的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大遊行。這次會議就爭取新聞自由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發表三點聲明：（一）就《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發表嚴正抗議聲明；（二）要求與政府就新聞自由問題進行對話：（三）要求客觀報道是次學運，並就較早前袁木與學生的對話在報上進行討論。

這次會議，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建國四十年來，一向被教育為黨和政府宣傳工具的中國新聞工作者破天荒第一次站出來，為新聞自由而吶喊；第一次要求與政府進行實質性的對話。會議後，這份聲明被傳真到各新聞機構徵集簽名。會議同時還決定各單位派一至兩名代表以個人身分組成一個新聞工作者對話團籌委會，該會人數後來發展到四十多人。

記者上街、群眾鼓掌

五月四日，人們終於在遊行隊伍中發現了一向被稱「黨的傳聲筒」的新聞工作者。幾百名記者高舉著「我們想說真話，別逼我們造謠」及「新聞屬於人民」等標語。雖然只有幾百人，他們的出現卻令到人民和學生振奮無比，學生及市民的遊行隊伍，在長安大街看到新聞界的隊伍時，均鼓掌歡呼，高喊「記者萬歲」，彷彿預見了長期以來只擔任「獨唱」角色的新聞界將與群眾合奏「交響樂」。

有些北京市民說：「這些記者是我們國家的希望。」

隨著黨總書記趙紫陽當日發表了一番充分肯定學生愛國熱情的講話，北京經歷了短暫的寬鬆氣氛，記者們初嚐「有限度」新聞自由的滋味。

官方更派出掌管新聞宣傳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與新聞界「平起平坐」地對話。

千人簽名、百人請願

在這種氣氛下，記者在五月九日便心平氣和地進行了一次請願。當日，數百名代表來到全國記者協會遞交那封簽有首都三十三家新聞單位一千零三個簽名的對話請願信。要求全國記協轉達他們希望與胡啟立對話的要求。

對話內容主要包括：（一）導報事件；（二）首都新聞界對悼胡和學運報道中所受到的束縛，違背了中共十三屆代表大會報告中「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的基本原則，必須改善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三）袁木在與學生對話時說中國「新聞報道工作實行的是報社總編輯負責制」之說與事實不符。這次請願得到了近千名大學生的聲援。

雙方達成默契，新聞界先從原四十人的籌委會選出十名對話代表；而胡啟立則與另外兩位分管宣傳工作的中央官員芮杏文及王忍之等分頭到各新聞單位舉行對話，安撫人心。

對話時直批領導人

五月十三日，芮杏文及王忍之到《人民日報》參加編委會擴大會議，該報屬下各部門均有代表參加。

據一名參加者透露，會上報內同仁言詞激烈，曾有記者和編輯在發言時點名批評鄧小平、李鵬和袁木等，並表明他們是站在學生愛國運動的一邊。此次會議令《人民日報》編委會受到很大衝擊。

五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編委會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會上有更多人提出反對「四˙二六」社論。

翌日，該報員工又組織了第二次大遊行，有八百多人參加，包括一些年齡較大的資深記者。

即使在李鵬頒佈戒嚴後，新聞界仍不理會警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電視台等機構的記者和編輯都繼續組織遊行。中央電視台的員工甚至打出所負責的新聞節目名稱，例如「午間新聞」、「全國新聞聯播」等。《人民日報》社長曾勸阻參與者稱當局將全面鎮壓，但記者還是衝上街去。

戒嚴頒佈翌日，李鵬主持成立「戒嚴意識形態領導小組」，取代原來負責宣傳工作的中央領導胡啟立和芮杏文。組長是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副組長是袁木，成員包括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中宣部新聞局長曾建徽和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志堅。這個小組指導宣傳路線和炮製宣傳文章，向新華社等供稿。

廿三日北京各大新聞單位的第一把手奉召到中南海開會，聽取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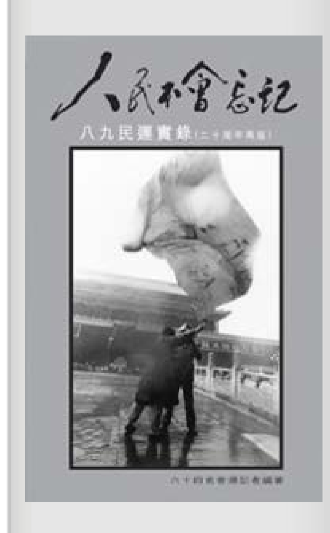
新聞工作者當時都抱著流血犧牲的決心，不再計較個人利害和風險，氣氛悲壯感人。可是，記者編輯們豁出去的勇氣和鬥志並沒有動搖中共高層死命抓著「筆桿子」決心。相反，中共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六月下旬調整了最高層領導班子後，便著手整頓新聞界。在他們眼裏，新聞界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災區」。

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和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本來負責掌管宣傳和意識形態，都因失職被撤，換上李瑞環掌印。

首當其衝的是《人民日報》。一位領導人指《人民日報》是黨中央辦的報紙，「不是某些先生們想怎麼辦就怎麼辦的報紙」。六月下旬黨報的領導班子亦遭整頓，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高狄取代錢李仁出任《人民日報》社長；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邵華澤代替譚文瑞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六十二歲的高狄是中央委員，曾任吉林省省委書記。邵華澤曾任《解放軍報》副總編輯。

其後，國內傳出《科技日報》、《光明日報》高層遭整頓；《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記者張偉國更傳聞被捕；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遭革職。

曇花一現的春天瞬即過去，北京新聞界倒退回沉寂肅殺的寒冬。



個案：《世界經濟導報》

楊慧敏

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以下稱《導報》），因刊登了悼念胡耀邦的文章，被上海市委禁發。該報總編輯欽本立被停職，此事引起中國新聞界、知識界的抗議和廣泛的震盪。

北京學生藉悼胡，要求民主、反貪污官倒。其後因《導報》事件，把矛頭指向爭取新聞自由。

至於闖禁區的《導報》遂成為官方箝制輿論的第一波，此事件暴露了中共新聞封鎖及國內傳媒開拓空間的困境。

原定四月二十四日發售的四三九期《導報》用五頁刊登了悼念胡耀邦的文章，內容取材自該報與《新觀察》四月十九日在北京舉辦的座談會，與會者包括胡績偉、嚴家其、潘維明、蘇紹智、秦川、戴晴等。四月二十二日，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以座談會某部分內容「對當前局勢不利」及「將會加劇某些動亂因素」為理由，查封已印好的三十萬份《導報》，並在二十七日指其總編輯欽本立同意發表悼胡文章是違反黨紀行為，停止他的職務，派上海宣傳部副部長劉吉率領的整頓小組，進駐《導報》。

《導報》是胡耀邦死後首份被查封的報章。北京的《科技日報》四月二十三日也用全頁刊登學運照片，並如實報道學運，但當時並未出事。

《導報》受整頓已非首次。早在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八七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該報均遭工作組進駐。去年及今年，該報皆不獲准採訪全國人大會議。該報曾刊登經濟學者千家駒點名批評李鵬工作報告的文章，而欽本立今年二月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談及新聞自由時說：「《導報》堅持有利於改革開放的基本原則，把握住一個『度』，即把我們的報道推進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把『風險』減到最低程度；同時把握著一個『時機』，即隨著對新聞自由的不合理限制被突破，及時擴大報道的範圍和深度。」由此可見，該報積極爭取突破新聞自由的底線。

據悉，江澤民針對的內容有數百字。問題出在文章說出胡耀邦受到不公平對待，現時應公正評價他，亦說共產黨現時面對歷史性選擇，若能改正錯誤，仍然可以帶領人民，推動改革。

但最後令《導報》停刊的原因，是該報員工在四四二期的第六頁和十一頁，刊出海外給該報的聲援電文和信件，整頓小組對這兩版不予簽發，理由是《導報》不能發表與市委對該報處理手法不相符的意見。

早在四四一期，類似問題已出現。整頓小組當時亦拒絕讓《導報》刊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的公開信。信中指出「欽本立同志是受本學會及上海社會科學院委托主持《導報》工作的，停止他的職務，應由本學會及上海科學院負責人協商決定。我學會認為，上海市委的上述決定違背了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提出有關的精神。（黨應當在憲法的範圍內活動，黨政分開等。）不符合幹部任免的法定程序，上海市委無權直接停止《導報》總編輯的職務，因此上海市委的決定是無效的。我學會謹此向上海市委提出交涉，並要求上海市委就上述決定做出更正。」矛頭已由評價胡耀邦轉向抨擊市委的行動。

新聞界、知識界對此事亦有強烈的反應。四月二十八日即有數百名北京新聞工作者聯名致函中共上海市委，抗議江澤民停止欽本立之職。五月四日，數百名新聞工作者更在北京街上遊行，這是四十年來的首次。

另一方面，知識分子許良英、嚴家其等亦以聯名信形式，指上海市委無權停止欽本立的職務，並稱市委說座談會內容「將加劇某些動亂因素」是對座談會參加者的嚴重誹謗，而中共干涉《導報》編輯工作，是違反憲法第三十五條。部分政法大學師生更表示會草擬起訴書，對上海市委採取法律行動。

四四一期《導報》的「致讀者」說：「這些函電與其說是對本報的支持，毋寧說是對中國新聞改革和民主建設的熱烈期望。」而該報五月十二日發出三項聲明，其中第二項指出：「《導報》事件已不僅僅是一張報紙，一個人的問題，現在我們所需的，不僅僅是圓滿解決《導報》事件的結果，而是要根除再次發生《導報》事件的原因，也就是通過新聞體制改革，促進整個政治體制改革。」

學潮之初，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向政府提出七項要求。其中一項就是在即將推出的《新聞法》中

允許民間辦報。

中國當局在八四年已成立新聞法研究室，並在八八年九月定出草案，本擬在八九年六月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但「六˙四事件」後，中國當局宣布將審議押後。

《導報》最引起爭論的問題，除包括報章是否有批評的權利外，還包括《導報》的性質和權限。據悉，劉吉在五月五日表示，《導報》八○年創刊，上海社會科學院提出申請，經上海市委宣傳部批准。因此《導報》從創刊起就不是民間報紙，更不是同人合辦，而中國從來就不存在這類報紙。劉吉又說，欽本立是市委的正局級幹部，他的任命和罷免都是由市委決定。

但欽本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曾表示，他認為《導報》是民辦的。第一，《導報》不是由那一級政府或黨的部門創辦的，而是由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這樣的學術團體和機構創辦的；第二，在經濟上它是自籌資金，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第三，《導報》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總編輯負責制，理事會由一些知名學者組成，如錢俊瑞、宦鄉、汪道涵等，還有一批高級顧問，如陳翰笙、薛暮橋、許滌新、于光遠、馬洪、徐雪寒、孫懷仁、褚一保等。欽本立一直擔任總編輯，有關辦報方針等重大問題，均由理事會討論決定。

但欽在同一訪問中亦指出：中國目前尚不具備純粹的民辦報紙的生存條件。在當前的經濟體制下，紙張的部份供應，外匯的資助等仍有賴於政府；有時也確實存在著政府的某些官員對《導報》的一些報道持不同竟見，因而試圖通過某種渠道影響《導報》的現象。

人民不會忘記
八九民運實錄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香港新聞界輝煌中的污點

盧永雄 黃漢軍 陳天權
范卓雲 黎佩兒



為自由、民主踏出的一步。 冼偉強攝

絕食、戒嚴、圍城、屠殺……北京學運的一幕幕情景，在人們的腦海中仍歷歷如繪，事發之際，香港記者更心弦緊扣，電子傳媒差不多二十四小時不停播送新聞，報紙很早便被搶購一空。媒介頓時成為生命，生命滲入了媒介。

赴京記者被譽為「英雄」，公眾普遍肯定傳媒報道是次學運的表現。但行內人心中有數，在輝煌的一頁中也看到不少污點，及行內潛藏的危機。本文志在探索問題而非揭同業瘡疤，望有助提高傳媒的報道質素。

虛假消息誰之過

新聞首重事實，但此段期間，傳媒出現了不少誇大失實的報道，甚至是虛假消息，究竟假消息以什麼形式出現？它帶來了什麼影響？為什麼它能大量佔用報紙版面及廣播時間？這裏選取了四個個案來討論。

個案一：李鵬下台夢似真

李鵬發表「五˙一九」講話及宣布北京局部戒嚴後，局勢曾一度平靜。五月廿三日上午，商業電台突然播出李鵬下台的消息。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中共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李鵬受到指責，被逼下台。

稍後香港電台也報道類似消息，予人消息相當可靠之感。消息後來迅速地散播出去。至黃昏時，亞洲電視也有提及類似消息，亞視新聞部是在香港獲悉李鵬下台的消息，並要求在北京的記者作出報道，在京記者認為此消息和他們在北京聽到的大局走向不符，故此只用模稜兩可的方式報道出來。無線電視曾收到觀眾電話，責問為何沒這條新聞，該台在香港的報導員也詢問在京記者有無聽說此一傳言，但記者說傳言很多，未能證實。

翌日，大部分的報章引述了李鵬下台的消息，成為牽連最廣的錯誤消息。只有《南華早報》和《明報》提出質疑，《南華早報》更指出受批判的是趙紫陽而非李鵬，《大公報》和《文匯報》則完全沒有提及李鵬下台的消息。

據悉，傳媒報道有關「李鵬下台」的消息主要來自中共駐港的高層官員，所以才出現牽連這麼廣的錯誤。但為何要散放這消息，實在耐人尋味。

個案二：傳媒「處死」鄧小平

自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訪華後，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一直未有露面。「六˙四」屠殺以後，已有傳言指鄧小平病重入院。《快報》六月六日以特大標題報道一段獨家消息—「鄧小平傳遭毒死，共軍已爆發內戰」，文中引述「可靠消息來源」，指鄧小平已於六月二日中毒去世，而北京軍區於五日凌晨派遣一百二十部坦克組成的裝甲部隊入城，救出鄧小平的家人，轉送昆明。

同日（六日）下午，《東方日報》更出版號外，大幅報道鄧小平去世的消息—「鄧小平已死，全國大亂，屠城廿七軍傳今午投降」。報道引述台北三個電視台的聯播及《聯合晚報》的消息，指鄧小平因癌症住進北京三○一總醫院，於六月六日上午九時三十一分死亡，三○一醫院一名醫生的弟弟打電話給紐約「中國之春」人士，透露此消息。

《東方日報》除了以號外形式報道外，更用大量篇幅報道鄧小平的生平，仿似他真正去世而不是在報道一個傳聞。六月七日該報以「追尋死訊源頭」繼續報道指確有一名鄧姓中共要人病逝於三○一醫

院，但此人原來是鄧穎超，更說她是被李鵬氣死。

鄧小平於六月九日露面會見戒嚴部隊，這個假消息被完全否定，鄧穎超其後亦致信戒嚴部隊。

個案三：零星衝突變內戰

「六˙四」屠城後，六月五日、六日開始，傳媒開始報道解放軍三十八軍和負責屠城的廿七軍衝突的消息，後來更出現各種誇張標題，包括「北京兵變，四路大軍圍攻二十七軍」，不少報紙更大出號外報道兩軍對壘，中國瀕臨內戰邊緣的消息，繪影繪聲報道計有「三十八軍重佔上風、三十九軍地對空導彈毀二十七軍裝甲師」；又傳李鵬蒙古避難。後從各方面的消息顯示，雖然有目擊者確曾見到不同部隊的軍人有零星衝突，但三十八軍及二十七軍並未大規模衝突，某軍被殲滅更屬謠傳。

當時絕大部份香港記者已撤回香港，傳媒大多倚靠外電的消息，加上不知來自何方又未能證實的消息，作大事報道。

個案四：李鵬中槍疑雲

《明報》六月六日以大標題頭條新聞報道「李鵬中槍」。文中引述「北京消息」，指李、楊屠城暴行令人齒冷，一名武警軍官六月四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內向李鵬開槍，可惜距離較遠，只射中李鵬大腿，李鵬傷勢不重，而那位軍官則遭當場打死。

日本《讀賣新聞》亦在翌日報道，李鵬確在人民大會堂受槍擊負傷。但李鵬於六月八日露面看望戒嚴部隊，從新聞畫面所見，他行動不似有問題，六月九日，李鵬再與鄧小平等會見戒嚴部隊，他看來精神奕奕，未似曾受傷。當然，仍有可能李鵬傷勢極輕，但表面的證據已未能確立受傷消息 。

虛假消息，誤導群眾

這裏只舉幾個突出的例子，稍稍回顧，這些重大的「假消息」，在學運期間和其後不斷湧現並廣為傳播，實在使人有點吃驚。這些假消息直接的影響是削弱公眾對傳媒的信心。本地讀者逐漸也知悉傳媒的報道未可盡信，更嚴重的是鄰近香港的大陸聽眾，他們也對香港新聞失去信心。據接觸所得，不少廣州市民便認為香港的電台報道不大準確，他們對香港的消息半信半疑；後來港人借各種途徑進行突破新聞封鎖的工作，其功效亦因此受到一定影響。

然而，最嚴重是中國消息「出口轉內銷」。部分北京學生及市民，得悉香港流傳「李鵬下台」等「消息」，對大局的估計出現偏差，一邊沉醉於「勝利」的氣氛，一邊執著和非理性地堅持不撤出廣場。

再者，中國官方宣傳機器也看準了香港傳媒某些誇張失實的報道，對香港傳媒的消息整體否定。

《人民日報》海外版在六月二十八日，以「如此客觀公正」為標題的文章，「剖析香港某些傳播媒介的造謠手法」。

七月五日，該報更以「如此新聞道德」為題，論述在學運期間，西方和香港新聞媒介扮演了什麼角色。文章點名批評《明報》及《東方日報》散播假消息，及不點名的抨擊香港的電視台。

兩家電視台在當日即發表聲明來反駁，申明一向本著新聞原則，如實報道。《明報》在翌日撰文反駁，《東方日報》則沒有反應。

假消息得以產生及大肆傳播，關鍵是當時的環境因素，在學運爆發初期，新聞的重心在學生身上，他們的活動公開性較強，故此報道最多是誇張而不至失實。隨著事態發展，時局變化的重心由學生轉至中共高層，由於中共活動的透明度低，戒嚴後，特別是屠城以後，記者採訪舉步維艱，加上中共高層鬥爭日趨激烈，不論有心或無意，假消息應運而生，傳媒難辨真偽。

一個黃姓的中國留學生從北京回到美國後，公開在CNN電視上承認，他們曾散播李鵬受傷及鄧小平去世的謠言。因為兩人久未露面，製造謠言是逼他們出來。在當時複雜的政治形勢下，各方面也可能故意製造假消息，傳播界面對重重陷阱。

但傳媒並不可用環境因素來為錯誤開脫，傳媒處理「傳聞」的手法至關重要，若用號外形式，頭版頭條，特大號通版標題報道，在公眾印象中，傳聞也變成了「事實」。若報道時以適當的篇幅、平實的標題、註明是未經證實的傳言，公眾可自行判斷。

市場導向，嘩眾取寵

傳媒如此誇大報道主要是基於市場競爭。

學潮成為香港頭等大事，學運新聞能否吸引讀者，似乎成為傳媒成敗關鍵。某報老闆質問編輯為何不多出號外，不用更「進取」的標題；編輯說他們的報道方式較準確，老闆指另一份報章的誇大報道使該報聲名鵲起及銷量大增，故此他希望員工效尤。另一張大眾化報章的主管，在學運後的總結上說：

「原來中國新聞也可以『起紙』呢！」

部分報章歷經數番失實報道，沒有經受「跌紙」厄運，反而廣開銷路；遂令部分報業老闆繼續以市場導向、嘩眾取寵的手法經營中國新聞。

另一方面，傳媒一直投資不足，不少報章老闆向來「慳水慳力」為原則，可以不投資的地方便不投資，報館既缺乏完善的制度，也無充足的人手，有大事發生時，便不知所措，特別是中國新聞向來不受重視，很多較具規模的報館也沒有一個專門的中國版。一張財經報紙的主管便認為派記者上京採訪學運實際作用不大，並指記者要求赴京採訪是基於「心理需要」，結果該報成為較具規模傳媒機構中，極少數沒有派員上京採訪這場震動全球事件的報章之一。

歷史關頭的角色矛盾

目睹了這場歷史性學生運動的興起、高潮，直至被當局用坦克、機槍鎮壓的全部過程，作為一個新聞從業員，應該與被採訪的對象保持一定距離，以超然的地位去對事實作出冷靜、客觀、公正及全面的報道。

然而年輕的香港記者面臨的卻是：既是一個新聞工作者，但又身為中國人的矛盾，在民族前途，大是大非的重要關頭，如何能夠使自己置之度外，保持冷靜呢？良心、愛國心與專業規範糾纏一起。

在學運興起之初，香港記者大都能恪守新聞工作的操守。隨著學生從校園走上街頭發動多次遊行，北京的知識分子奮起響應，市民情緒高漲，記者也就受感染了。

當遊行隊伍經過時，記者情不自禁地豎起「V」字型手勢致敬，或者將錢掉進學生的募捐錢箱。後來發展成向學生提供報紙，交流外界的訊息；或者自己掏錢請學生吃飯，送香煙給他們抽，與學生建立了友誼。

當五月十三日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靜坐，以至後來戒嚴期間，香港記者幾乎都站到了學生和知識分子的一邊。有些記者曾招呼在廣場堅守了多天的學生，到自己酒店的房間洗澡、更換衣服；也有些記者曾借出自己的房間讓學生領袖開會或休息。部份更出謀獻策，與採訪對象的關係密切。

學運後期，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日漸惡劣和混亂，但學生代表在撤與不撤的問題上爭吵不休，許多記者都顯得心情煩燥、坐立不安。

五月底，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及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的代表攜帶了香港市民的巨額捐款及大批物資赴京，為廣場上的學生帶來了繼續堅守下去的動力和條件。但是，在學聯代表林耀強舉行的一次記者會上，出席的十多名香港記者，差不多異口同聲地強烈抨擊學聯的行動，指責他們將金錢和物資介入這場運動，將會把運動引上死亡之路，措辭相當嚴厲。招待會幾乎變成一次「對質會」，令學聯的代表措手不及，事後仍深感不滿。由此可見，許多記者已將學運當作了自己的事，急學運所急，憂學運所憂。

正由於記者過份投入，在報道學運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偏差：

一、潛意識地為學運作宣傳，不自覺地塑造學運「明星」。

由於許多香港記者在天安門廣場上與學生朝夕相處，成為了好朋友，因此在報道他們時，或多或少帶上了一些個人感情色彩，在不自覺之中將他們捧成了「明星」。例如對學生領袖王丹、吾爾開希及柴玲等，雖然不少記者明知他們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毛病，甚至知道他們犯過某些錯誤、過失，但在報道時卻沒有及時點出。

二、對全局欠缺客觀、冷靜的分析，沒有及時報道學運存在的一些重大失誤。

由於部分記者政治意識不足，因此在報道上未能及時揭示出學運發展中潛在的危險性和複雜性。例如對學生組織內部存在的分裂情況、部份學生領袖的激進情緒、金錢和權力如何腐蝕部分學生，以至外來學生與首都學生的分歧，都因上述原因及形勢吃緊，記者的報道較少，可是這些錯誤的逐步演進，卻是學運走上了悲劇的部分原因。

記者角色混淆，最震撼的個案，要算「黃德北事件」。黃德北雖是台灣記者，但因這事件具示範作用，值得一提。

台灣《自立》報系記者黃德北七月二日與王丹會面，導致他個人翌日被拘留，他在國內的司機王揚和王丹性命堪虞。他被拘問九天後，卒被釋放。

黃德北在北京採訪期間，與王丹熟稔，他聲稱「在公在私」都不能不去會面。

在拘問時，他供出：王丹的近貌，如換了眼鏡，剪短髮；他和王丹在車上對談內容，如逃亡方法計有藏匿在外國使館、通過香港「地下通道」等。

黃德北預計王丹極可能被捕，他承認他對王丹有些內疚，因救不了他。這事件顯示若記者「公私不

分」，對大陸形勢認識不足，不單「幫倒忙」，對大陸不同政見人士，將造成災難性傷害。

記者編輯不相協調

面對北京學運這宗國際級新聞，香港新聞界在統籌和協調採訪上出現種種問題。

曾赴京採訪學運的記者都分別表示：出發前，主管沒有給予提示；到埗後，也沒有明晰的採訪指示，任由記者「自由發揮」、「隨機應變」，雙方沒有定時交換對局勢變化的意見，以釐定每天採訪的重點和角度。對於部分對局勢認識不足的編輯和記者，此舉直接影響了新聞質素。

傳媒主管也鮮有主動地為記者提供後勤資訊，如最新消息。在國內新聞封鎖、資訊閉塞下，記者掌握不了全局形勢，採訪更感困難。

傳媒主管和記者對處理新聞亦有不同意見。明顯的例子是處理「柴玲被綁架」的新聞，一份財經報紙的記者獲得錄音帶，指出了「綁架」風波，源於北京學生領袖分「保命費」，作逃亡之用，分錢不均引起；但該報之主管拒絕發放該消息，該名記者辭職抗議。

這場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不單只激盪每個中國人的心，香港新聞工作者都渴望採訪這場關係民族興衰的歷史事件，不少記者遂自掏腰包，不理家人和報館禁令，趕赴北京作「歷史見證人」。

這批非報館特派赴京的記者，匯成為「盲流潮」，分別在「五˙四」七十周年前、學生絕食期間，及頒下戒嚴令之後，兼程赴京。

「盲流」最多時達數十之眾，他們自費，利用自己的假期，心甘情願的作「無償勞動」。

但記者紛紛北上，離開香港的工作崗位，卻令主管怨聲載道，並被嚴責不守紀律，擅離職守，雙方鬧至僵局，少數記者索性請辭。

北京新聞，香港製造

記者人在北京，但各報聳人聽聞的頭條新聞大多是「香港製造」，北京記者根本無從置喙，如「李鵬下台」的消息，大部份派京的香港記者在求證無其事後，都曾爭取不發放該消息，但大多無效。

《東方日報》六月六日刊登了「鄧小平已死」的號外頭條消息，其後收到讀者投訴。前線記者遂草擬函件，對處理這段消息的方法表示失望，並謂影響士氣，要求主管把函件轉呈報社執事人。

情勢急轉陣腳大亂

香港記者從未試過在戒嚴令下採訪，對採訪暴亂、戰地新聞亦完全沒有經驗，而這次被派往北京的記者，超過半數只入行一、兩年，個別甚至從未到過北京採訪。

香港的新聞界普遍地位和待遇偏低，導致人才流失。以往只報道香港新聞時，勉強可以應付，但這次報道世界矚目的北京民運事件，便感到有點力不從心。

戒嚴令頒下，大部分傳媒機構主管明令記者，不得外出採訪，部份記者遵從指示，沒有踰越；部份著眼於採訪工作，第一時間到達天安門廣場，以防官方真正執行戒嚴，堵塞進口。

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等數天入夜以至凌晨過後，廣場氣氛異常緊張，大部份文字記者都陪著學生，在紀念碑台階守夜，又或到廣場外圍巡察，白天則四出到各大路口要塞，觀看堵車及軍車調動情況。

部分記者提議集體行動，方便互相照應，每天大致分四輪，即上午九時，下午二時及六時，晚上九時，聚集一定數目，才外出行動，後來因機動性不強，參與人數少而告吹。

根據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第三號規定，幾乎限制了記者的所有活動。

可是當各路軍隊企圖入城而被學生和市民成功堵截時，遊行和示威活動卻變本加厲，出現了「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白天睡覺晚上來，晚上睡覺白天來」等口號，部份記者仍堅持採訪。

戒嚴令下，步步為營

到六月一日，在京採訪的記者再一次受到威嚇。北京市人民政府發言人就戒嚴令的有關條款作進一步說明，強調不得約中國公民到外國和港澳台記者的駐地、寓所和飯店等場所採訪，亦不得對戒嚴部隊進行採訪，照相和錄像。

部分香港記者在恫嚇威脅下，即收斂採訪工作，一間電子媒介機構的記者，並且呼籲同業向各自的上司要求縮窄工作範圍，減少工作量，但未獲其他同業響應。部分並派代表到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要求澄清戒嚴令下的採訪事宜。在當時無政府狀態下，當局沒有理睬。

大部分香港記者都住在北京市委經營的北京飯店，被當局竊聽電話監視是意料中事，但記者為了採訪方便，都沒有搬離這間靠近天安門廣場，又可居高臨下眺望東長安街和廣場一小角的飯店。

六月三日晚，坦克車和裝甲車終於開入北京城了。較早前，一些在北京飯店露台拍攝的電視台記者，已遭到公安局方面警告不得再拍。據記者所見，北京飯店對面的一幢樓宇，隱藏了公安人員，監視著在飯店露台的記者。

另一名文字記者，在露台觀看坦克車駛過時，曾遭自稱北京飯店的保衛人員干涉。他喝令記者返回房間，稱記者違反了戒嚴令的規定。該記者反駁整個戒嚴令，都沒有一項禁止記者在露台憑欄下望的。但記者開始感到惡夢即將到來。

六月四日凌晨，軍隊開始肆殺無辜，記者出外採訪完返回飯店，即被把守在飯店門口的多名便衣人員圍住，勒令交出所有菲林，很多珍貴的鏡頭因此無法公諸於世。

浩劫之後，落荒而逃

六月四日凌晨，掀開一幕又一幕屠城慘象。「軍隊將軍管北京飯店；三十八軍與二十七軍幹起來；出動空軍突圍；機場快將封閉」等傳聞，紛紛傳來，並盛傳軍隊會進駐北京飯店，部分記者震驚之下，情緒激動得歇斯底里，有些不斷哭泣。

其後，那些主張撤離飯店的香港記者，號召其他同業行動一致，返回香港，其中數名記者更想到向英國駐華大使館尋求協助，例如安排遷入較安全的地方，以及安排翌日前往首都機場的交通工具，和返港的機票等。

可是英國大使館迴避了香港記者所提出的要求。此外，又有人向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求助，港澳辦的二司司長容康表示已與軍方聯繫，保證軍隊不會進入飯店傷害記者。但記者沒有因容康的保證而放心。

屠城後，大部分傳媒主管勒令記者不得外出，違者紀律處分，然而，除了新加坡《聯合早報》在六月五日急電特約的香港記者，為他購買人壽保險，其他傳媒機構大多數都沒有為記者購買特別保險。

六月五日，北京飯店的服務員，到每個面向長安街的房間，用紙條封住露台玻璃門和窗門，禁止記者走出露台拍照，及報道軍隊的血腥暴行。此一行動反而令記者稍覺安心，因為這種溫和的「勸告」，顯示有關方面暫無意採取武力制止記者採訪。

危機四伏各有懷抱

在去或留的問題上，在京採訪的記者意見不一，主張立即走的，認為大局已定，傳言軍隊將進駐北京飯店、封鎖機場，更有內戰的可能，留下亦沒有什麼作為；堅持留的，認為採訪任務未完成，形勢亦未發展至非走不可，要把當權者的暴行公諸於世。

六月五日，首批赴京採訪學運的記者回港，在機場受到「英雄式」歡迎，他們之間心情卻迥異，部份認為凱旋而回，部份卻感到採訪工作失敗。六月六日，第二批也是最後一批為數較少的記者亦不能堅持，黯然回港。

他們的離去，主要是承受不了來自報社和家庭的壓力，也反映個別記者根本無法獨立承擔這沉重的使命。

目睹「六˙四」血腥屠城，少數記者馬上搬離北京市委經營的北京飯店，一名遷到中外合資的王府飯店，卻頻頻致電給留住在北京飯店的同行，查問人家在槍林彈雨下採訪得來的消息，然後向自己所屬機構發放。

鎮壓期間少數記者驍勇有餘，機智不足，竟打著閃燈拍照；也忽略了子彈射程可達數百米，差點連累旁人送命。

面對生與死，個人情緒反應是難以控制的，然而，在新聞專業精神的問題上，傳媒究竟承擔了多少？

戒嚴令下，人心惶惶，怪象連生。某電子傳媒主管起初嚴禁記者外出採訪，屠城後竟叫記者訪問在街上正在奔跑逃命的人。

五月二十日戒嚴令頒下，傳媒機構大多令記者不要外出，有些召回記者，否則責任自負。一份銷量很高的報章於五月二十六日召回兩名派京記者。

北京處於政治動盪局面，記者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是無可置疑，然而，傳媒主管發出召回命令，是否已盡責任？傳媒將如何承擔把北京消息第一時間向外界發佈的責任？

新聞自由，岌岌可危

「六˙四」屠城暴露了中共當權者的猙獰嘴臉，香港新聞界也經歷了一場最嚴峻的考驗。

一九九七年限迫在眉睫，中國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概念，傳媒報道中國政治問題難免敏感，但他們的編採立場會因此而猶豫嗎？

亞洲電視六月二十八日上午獲得吾爾開希逃離中國後的首次講話錄影帶，該公司的管理階層獲悉後，與新聞部的主管開會，以該講話有「政治聲明」之嫌，勸諭把該影帶剪輯至七分鐘播放，亦即是當天六時十五分新聞的版本，後來新聞部再與主管階層開會，爭取到在晚間播放該則全長達二十多分鐘的「獨家」新聞。

《文匯報》事件更震動業內人士，引起政治干預新聞的爭議。中共領導下的《文匯報》，在學運期間，一度掙脫樊籠，爭取如實客觀地報道，但血洗天安門後，報社內部出現人事紛爭，問題主要出在報紙的立場。

該報社社長李子誦在解僱副社長陳伯堅不遂後，被新華社香港分社免職，該報約三十名員工支持李社長而先後請辭。

在這過渡期間，香港新聞工作者將面臨更多的考驗，需要更多理智的思考和勇氣──黨領導下的報紙為何不是黨的當然喉舌？記者在大是大非前有沒有個人的選擇？在民族大義的大前提下，怎樣避免陷入主觀意願？

「支持學運」、「哀悼六˙四」、「國殤」的廣告曾擠滿各大報紙的版面，香港各報都加紙升紙了。部份報社老闆都或多或少發了一點「國難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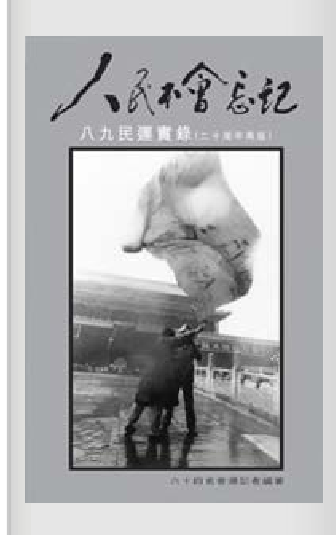
中國大陸政治進入黑暗階段，香港傳媒猶有餘悸。然而，除了想起遷冊移民外，他們可有反省在這次波瀾壯闊的民運中的角色呢？

(寫於七月三十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北大首張倡導民主的大字報



丁石孫校長、王學珍書記及校黨委、校學生工作部、校團委:

今年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作為這場偉大的民主啟蒙運動的發源地，北大一直高揚民主和科學的大旗，走在民族進步的最前列。作為在北大這個民主聖地學習的我們，在紀念五四運動的今天，仍然希望能把北大的優良傳統發揚下去。

回想七十年前，蔡元培校長實施「民主治校」，思想自由、兼容並蓄，充分保障校內的學術與言論自由。彼時之北大，思想空前活躍，各種思潮、學派紛呈，無數以後在中國歷史上璀燦一時的精英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得以成長，這種民主的校園氣氛至今仍令我們為之驕傲和神往，但我們也痛切地感到，七十年後的今天，北大民主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沒有能夠得到很好的繼承，表現之一就是對學生社團管理、辦講座、組織演講、舉辦沙龍等自由方面，仍存在不少來自校規的缺乏明確法律依據的限制。我們不能不意識到，目前大學校園中「托派」、「麻派」盛行，經商熱壓倒一切的現象，固然出自很多社會原因，但也是與種種對學生思想自由的限制，有著密切的關聯的。

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是黨和政府的重大政策之一，作為大學生，我們有責任和義務推動民主政治的建設，同時我們以為，要求民主不能空泛地在口頭上大聲疾呼，應該從實際做起，從身邊的事，從涉及個人切身利益的事做起，具體地說，應該從努力改善校園民主環境做起，我們以為，在北大這樣的高等學府內，應該有充分的言論和學術自由，由於種種原因造成的一些不合理的限制應予取消，北大應作為政治民主化推行的一個特區，為推動中國民主進程作出貢獻。

我們十分珍惜安定團結的社會環境和校園環境，因此本著主動與校方建立對話渠道的願望，願與校黨團各級領導坦誠相見，以切實的行動來改善校園自身的環境，提出以下建議。

從上學期起至今，從四十三樓430活動室到塞萬提斯像前民主草坪，一些關心國家、民族前途的同學自發地組織了十三次民主沙龍，為同學們交流思想，進行理論探討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但近幾次沙龍以來，這些活動受到了來自北京市委、校黨委、保衛部、各系黨總支的干擾，一些同學也受到不少的壓力。我們認為，這種自發的沙龍式的探討形式對活躍校園學術空氣，對促進思想交流，都是大有益處的，繼續保持民主沙龍一周一次的活動方式是大多數同學的願望，因此:

一、建議學校出面排除種種壓力，支持民主沙龍及類似活動的舉辦，並給予其邀請著名學者參加的自由。

二、上述的自由的確切定義為自發組織者在沙龍舉辦前兩天把被邀請者名單提供給校方登記，校方應保證除被剝奪政治權利者之外，一律准許被邀請。

三、建議學校開闢塞萬提斯像前民主草坪作為民主沙龍的固定活動地點，學校可派人每次參加活動，協助維持秩序，但不應以此為借口干擾活動的進行。

四、學校應保證對自發的組織者的合法行為不施加壓力，不施行事後的追懲或在畢業問題上予以特殊安排。

對以上建議我們作以下說明:

一、上述建議完全發自我們對切實保障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的熱切願望，希望校領導發揚「理解」精神，消除不必要的顧慮和誤會，對我們的建議予以認真考慮。

二、我們盼望學校盡快給予有效答覆，以公告形式在三角地向全校師生公開。

三、本呼籲書以徵集簽名方式完成，在此向全校師生發出呼籲，請支持我們的合理要求。我們相信，首先在校園內實行真正的民主不僅是我們簽名的願望，也是所有師生的願望。因此，我們殷切盼望你們能以簽名的形式表示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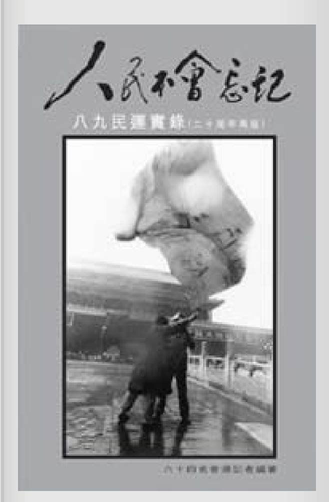
王丹等五十六名同學

一九八九年四月三日
(貼於北京大學校園)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人民日報》社論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動中，廣大共產黨員、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解放軍和青年學生，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哀思，並表示要化悲痛為力量，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貢獻力量。

在悼念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情況、極少數人借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群眾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份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

考慮到廣大群眾的悲痛心情，對於青年學生感情激動時某些不妥當的言行、黨和政府採取了容忍和克制態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召開前，對於先前到達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學生並沒有按照慣例清場，而是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於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證了追悼大會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順利進行。

但是，在追悼大會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污衊、謾罵、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向學生會「奪權」，有的甚至搶佔學校廣播室；在有的高等學校中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甚至強行阻止同學上課；盜用工人組織的名義，散發反動傳單；並且四處串聯，企圖製造更大的事端。

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治理整頓，建設發展，控制物價，改善生活，反對腐敗現象，建設民主與法制，都將化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全民族振興中華的宏偉願望也難以實現。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堅決維護得來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維護憲法，維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對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學生組織權益的行為要堅決制止；對蓄意造謠進行誣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禁止非法遊行示威，禁止到工廠、農村、學校進行串聯；對於搞打、砸、搶、燒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護學生上課學習的正當權利。廣大同學真誠地希望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這些要求只能在黨的領導下，加強治理整頓，積極推進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來實現。

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堅決地制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這場鬥爭事關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成敗，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要明辨是非，積極行動起來，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北高聯」告香港同胞書

親愛的香港各界同胞們：以悼念和評價胡耀邦同志的逝世為起點，與先前的北京高校學生民主運動，已經在大陸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強大聲勢，得到了全國各界人民廣泛的理解和支持，也引起了世界輿論的深切關注。

我們這次民主運動，旨在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加快政治和經濟改革步伐，反對腐敗，重申自由，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強烈的參與意識和民主建設熱誠，學生們不僅對政府在十年改革中的失誤提出了批評，而且對政府工作提出了合理的建設性意見，表達了億萬人民要求進一步鞏固並推進民主和改革事業的強烈呼聲。

但是，政府從一開始，就對同學們的民主要求不予理睬，拒絕與學生進行平等對話，並且利用新聞工具對學生運動加以歪曲，致使矛盾擴大，民主運動規模進一步擴大，在全國人民的民主呼聲中，政府仍繼續對學生們的民主行為採取不明智的敵對態度，嚴重傷害了廣大學生和全國人民的愛國憂國之心，引致了人民強烈的不滿。

香港的同胞們，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我們都希望我們的民族繁榮富強，我們正在進行的運動，是加快中國民主化建設，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部分，也是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一部分。我們希望，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前，大陸的民主政治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能有一定程度的進展，以便使我們更好的聯手起來，為振興中華大業而並肩奮鬥，目前，在關係到民主前途和命運，關係到民主法治建設發展與停止的重要時刻，我們熱切希望，各界有識之士，能夠正直的行動起來，聲援和支持我們，共同為中國的民主建設作出貢獻，特別是在美國正直的愛國中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讓我們團結起來，將民主運動，進行到底。

為民主而奮鬥的首都大學生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趙紫陽會見「亞銀」代表談話

趙紫陽在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的亞行成員代表團團長及亞行高級官員時向客人們分析了當前中國國內形勢。他說，各位到中國來，大概都知道中國最近有一部分學生上街遊行。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政局不穩定呢？我想強調指出，學生遊行的基本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改革」，「推進民主」，「反對腐敗」。我認為，這就反映了遊行隊伍中的絕大多數學生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基本態度：又滿意，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們對十年來改革和建設的成績，對我們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很滿意的，但對我們工作中的失誤是很不滿意的。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而肯定成績，糾正失誤，繼續前進，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有沒有人企圖利用並且正在利用學生的行動呢？中國這麼大，當然難免，總有人希望看到我們出現動亂，總有人會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像的。這樣的人極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絕大多數學生是會懂得這一點的。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信心。

趙紫陽在談到如何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時說：我想，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應該通過改革來解決，應該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辦法來解決。分析一下具體情況就清楚了：現在學生最不滿意的是貪污腐敗現象。這本來是黨和政府近幾年來一直在解決的問題，但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有意見，而且意見這麼大？兩條原因。一是由於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以致某些確實存在的腐敗現象，不能及時地得到舉報和處理；二是由於公開化不夠，透明度不夠，有些傳言，或是張冠李戴，或是無限擴大，或是無中生有。其實，我們絕大多數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不僅是低工資，而且除了工資以外並沒有什麼其他收入，更沒有什麼法定的特殊權利。違法亂紀，搞特權、特殊化的人，有，但並不像人們傳聞的那麼多，那麼嚴重。當然，腐敗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但這個問題必須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監督、擴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結合進行。去年以來，我們在幾個城鄉地區公開政府的辦事制度，公開辦事結果，鼓勵群眾監督，並建立群眾舉報中心，作了一些試驗。這樣，就把懲治腐敗同民主、法制初步結合起來了。現在正在繼續總結經驗，準備在較大的範圍和較高的層次上一步一步推開。

在談到如何處理學生遊行這一事件時，趙紫陽說：我認為，也同樣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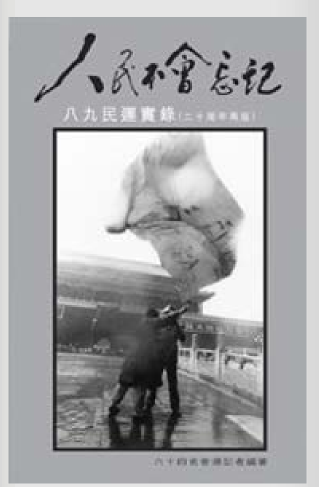
趙紫陽指出，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他說：黨和政府準備這樣做，我相信，學生會贊成這樣做，各界人士也都會贊成這樣做。大家都這樣做，我們就一定能夠達到維護穩定的目的。我相信，這將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團結。在穩定和團結的基礎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一定會進行得更加順利。我對中國的政局的穩定和改革的前途持樂觀態度，中國的投資環境將繼續改善。我希望我介紹的這些情況能夠有助於你們對中國的瞭解。

據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新華社電訊

*****本文是趙紫陽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的亞洲開發銀行成員代表團團長及亞洲開發銀行高級官員時的談話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對話團」建議與官方對話的提綱

一、評價今次學運，包括起因、性質和影響，也包括「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問題。

二、關於深化改革問題，如教育、物價，對外政策和人口政策等。

三、政府如何體現憲法第三十五條有關遊行、示威、集會、出版和言論自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絕食宣言

「我宣誓：為了促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國家的繁榮，我自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紀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在前幾次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之後，今天我們又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鬥爭。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的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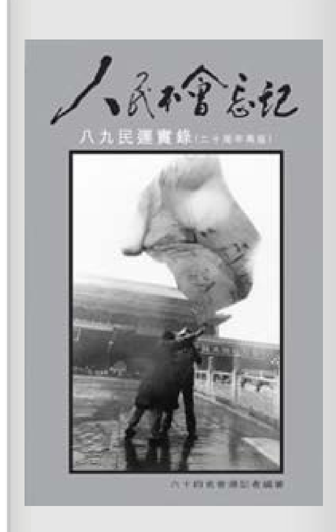
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學生代表團進行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民主愛國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時出發到天安門廣場。」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知識分子「五˙一六」宣言

六十年代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國人民心中無疑是一個專制與黑暗的象徵。二十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強烈地感受到民主與光明的召喚。歷史終於到了一個轉折點。當前，一場以青年學生為先導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在全國崛起。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北京和祖國各地，大規模遊行示威彼伏此起，波瀾壯闊。數十萬青年學生走上街頭，抗議腐敗，呼喚民主與法制，表達了工人、農民、軍人、幹部、知識分子及一切勞動階層的共同意志。這是一次繼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覺醒。這是一個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的歷史契機。

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走上了一條民族復興的現代化道路。遺憾的是由於政治體制改革不力，初見成效的經濟改革也嚴重受挫，腐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矛盾急劇激化，全國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業面臨著重大危機。中國正處於一個嚴重的關頭。在這個決定人民、國家和執政黨命運的時刻，我們參加本聲明簽名的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特此於今天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鄭重簽署如下聲明，公開表明自己的原則立場。

一、我們認為，面對當前的學生運動，黨和政府的某些領導是不夠明智的。特別是在不久前，還存在著試圖以高壓和暴力來處理這場學生運動的跡象。歷史的教訓值得借鑒：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三四十年代國民黨政府以及七十年代末期「四人幫」等獨裁政權都曾以暴力鎮壓學生運動，其結果無一例外，都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歷史證明：鎮壓學生運動決無好下場。最近以來，黨和政府開始表現出值得歡迎的理智。如果運用現代民主政治的規則，遵從民意，順乎潮流，將出現一個民主的穩定的中國。反之，將極可能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引向真正動亂的深淵。

二、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處理目前的政治危機，其不可迴避的前提，就是必須承認在民主程序下產生的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反之，就與國家根本大法所規定的結社自由相牴牾。一度把學生組織定性為「非法」的做法，結果只能激化矛盾，加劇危機。

三、導致這場政治危機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學生在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強烈反對的腐敗現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並非僅僅是教育，更在於忽視了政治體制改革。未經根本觸動的官本位、封建特權進入流通領域，才造成惡性腐敗。這不僅吞噬了經濟改革的成果，還動搖了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黨和政府應該汲取深刻教訓，切實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廢止特權，查禁「官倒」，消除腐敗。

四、學運期間，以新華通訊社、《人民日報》為代表的新聞機構隱瞞事實真相，剝奪公民的知情權；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職務。這些完全錯誤的做法，是對憲法的極大漠視。新聞自由是清除腐敗，維護國家安定，促進社會發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監督制約的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不實行新聞自由，不准民間辦報，一切關於開放改革的願望與允諾只能是一紙空文。

五、把這次學生運動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是錯誤的。承認並保護公民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權利，是言論自由的基本涵義。解放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實質就是壓制和打擊不同的政治見解。只有一種聲音的社會不是穩定的社會。黨和政府有必要重溫「反胡風」、「反右」、「文化大革命」、「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深刻教訓，廣開言路，與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全體人民共商國是，才有可能形成一個真正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六、所謂抓「一小撮」、「長鬍子」的幕後指使者的提法是錯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公民，不論年齡大小，都擁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參政議政的政治權利。自由、民主、法治從來不是被賜予的。一切追求真理、熱愛自由的人們，都應當為實現憲法所賦予我們每一個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我們已經來到一個歷史的關頭。

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已經再無機會可以喪失，再無後路可以退卻。

富於愛國傳統和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意識到自己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挺身而出，推進民主進程，為建設一個政治民主、經濟發達的現代國家而奮鬥！

人民萬歲！

自由的、民主的中國萬歲！

巴　金、嚴家其、包遵信、劉再復、
艾　青、蘇紹智、李澤厚、鄭　義、
趙　瑜、李　陀、范　曾、馮　至、
吳組緗、季羨林、王　瑤、嚴文井、
葉君健、楊憲益、李洪林、溫元凱、
張　權、蘇曉康、王魯湘、汪曾祺、
劉心武等一千餘人聯署。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於北京

知識分子「五˙一七」宣言

嚴家其 包遵信 李南友等

從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時起，三千餘名同學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一百小時的絕食，到現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學暈倒。這是我們祖國歷史上空前悲壯的事件。同學們要求否定《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要求現場直播和政府對話。面對我們祖國兒女一個又一個倒下去，同學們的正義要求遲遲得不到理睬，這就是絕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現在，我們祖國的問題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面前，這就是，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這樣一個不負責任和喪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國的政府，而是在一個獨裁者權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死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個獨裁者說話，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鬥爭後，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布，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的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布，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讓我們高呼絕食鬥爭的偉大勝利！非暴力抗議精神萬歲！

打倒個人獨裁！獨裁者沒有好下場！

推倒四˙二六社論！

老人政治必須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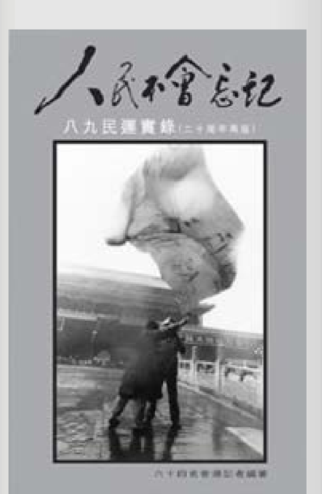
獨裁者必須辭職！

大學生萬歲！人民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趙紫陽探訪絕食學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國務院總理李鵬等領導人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趙紫陽接過學生遞給他的擴音器，作了重要的講話。

趙紫陽說，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的。我想說的是，現在同學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絕食已經到了第七天了，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這是有生命危險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盡快結束這次絕食。我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對你們所提出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覆。我覺得，我們的對話渠道還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終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情況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覆，才停止絕食。

趙紫陽懇切地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九歲、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著急，整個社會都憂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況一天天嚴重，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同學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的國家好，但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失去控制，會造成多方面的嚴重影響。

趙紫陽說，總之，我就是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來，絕不會！你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問題的認識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學們，同時說一說我們的心情，希望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況下，是很難想清楚的。大家都這麼一股勁，年輕人嘛，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遊過行、臥過軌，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麼樣。

趙紫陽最後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他說，有很多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希望你們早些結束絕食，謝謝同學們。說到這，趙紫陽同志向同學們鞠躬，同學們熱烈鼓掌。

趙紫陽講話結束後，同學們紛紛請紫陽同志簽字，紫陽一一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人民日報》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智囊團」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

（一）這次以大學生為先鋒、絕大多數社會階層廣泛參加的愛國民主運動，譜寫了中國民主運動史上最輝煌的篇章。

（二）事態演變到今天這樣的嚴重地步，完全是由於黨和政府在決策上的失誤和拖延所致。

（三）建國以來，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脫離人民，違背良知，與人民群眾的意願直接對立。其原因在於，傳統政治體制不能按法制軌道運行，沒有政治公開性，形成了只管上層權力鬥爭、不以民族利益和國家前途為主的局面。

（四）目前勢態還在惡化，堅持已有的失誤而繼續失誤，以致於採取極端舉動（如軍管），將會導致真正的動亂，甚至造成民族分裂，這種黑暗的前景，是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所無法接受的。

（五）為此，我們呼籲，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由全國人民共同作出判斷和選擇；

我們呼籲，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行使憲法賦予的最高權力，進行干預；

我們呼籲，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對政治局最近一段時期的工作進行審議；

我們呼籲，各界聲援活動務必保持理智和秩序，珍惜這次學生運動已取得的成果；

我們呼籲，各階層人民組織起來，協助大學生做好後勤服務工作；

我們呼籲，絕食人員多多保重身體，爭取盡快結束絕食，你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祖國需要你們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爭取新的勝利！

（六）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
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
北京青年經濟學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李鵬在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

同志們!

今天，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決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要求大家緊急動員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恢復社會正常秩序，維護安定團結，以保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剛才中共北京市委負責同志介紹的情況說明，當前首都形勢相當嚴峻。無政府狀態越來越嚴重，法制和紀律遭到破壞。本來，五月初以前，經過大量的工作，形勢已趨於平穩，但進入五月以後，又更加動亂起來。捲入遊行示威的學生和其他群眾越來越多，許多高等學校陷於癱瘓，公共交通到處堵塞，黨政領導機關受到衝擊，社會治安惡化，嚴重干擾和破壞了全市人民的生產、工作、學習和生活的正常秩序。舉世矚目的中蘇高級會晤中的一些國事活動安排，也因此而被迫變更或取消，極大地損害了我國的國際形象和聲譽。)

天安門廣場部分學生絕食請願的活動還在繼續。他們的健康已經受到極大的損害，有的人生命已處於危險之中。實際上這是少數人拿絕食同學作為「人質」，要挾、強迫黨和政府答應他們的政治條件，連一點點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講了。黨和政府一方面採取了一切可能採取的措施，對絕食學生進行治療和搶救；另一方面，多次同絕食學生的代表進行對話，並鄭重表示今後將繼續聽取他們的意見，希望立即停止絕食，但都未能取得預期效果。在天安門廣場人群擁擠，煽動性口號不斷和人群情緒極度激動的情況下，絕食學生代表也表示，他們已不能控制局勢。現在，我們如果再不迅速結束這種狀況，聽任其發展下去，很難預料不出現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情況。

北京的事態還在發展，而且已經波及到了全國許多城市。在不少地方，遊行示威的人越來越多。在有的地方，也發生了多次衝擊當地黨政領導機關的事件，發生了打、砸、搶、燒等嚴重違法破壞活動。最近，甚至鐵路幹線上的火車也遭到攔截，使交通被迫中斷。種種情況表明，如再不迅速扭轉局面，穩定局勢，就會導致全國範圍的大動亂。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人民共和國的前途和命運，已經面臨嚴重的威脅。

我們的黨和政府多次說過，廣大青年學生的心靈是善良的，他們在主觀願望上是不想搞動亂的。他們有愛國熱情，希望促進民主，整治腐敗，這同黨和政府要努力實現的目標是一致的。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和意見，已經對改進黨和政府的工作起到積極作用。但是，任意採取遊行、示威、罷課乃至絕食請願等方式，破壞了社會穩定，不僅不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事態的發展已經完全不以青年學生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正在越來越走向他們願望的反面。

現在已經越來越清楚地看出，極少數極少數的人要通過動亂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這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公開打出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目的就是要取得肆無忌憚地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絕對自由。他們散佈了大量謠言，攻擊、污衊、謾罵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現在已經集中地把矛頭指向為我們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鄧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從組織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經過人民代表大會依法產生的人民政府，徹底否定人民民主專政；他們四出煽風點火，秘密串連，鼓動成立各種非法組織，強迫黨和政府承認，就是要為他們在中國建立反對派、反對黨打下基礎。如果他們的目的得逞，什麼改革開放，什麼民主法制，什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將成為泡影，中國將出現一次歷史的倒退。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就會變成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中國。

我們所以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揭露極少數人的政治陰謀，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廣大青年學生同挑動動亂的極少數人區分開來，是出於對青年學生的愛護。前一段，我們在處理學潮問題上所以採取極其寬容、克制的態度，也正是出於這樣的願望和目的，不要傷害好人，特別不要傷害青年學生。而那些躲在背後策劃和煽動動亂的極少數人，卻以為黨和政府軟弱可欺，不斷製造謠言，蠱惑群眾，擴大事態，導致首都乃至全國許多地方的形勢發展得越來越嚴峻，迫使我們不得不採取果斷、堅決的措施來制止動亂。

必須強調，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仍然要堅持保護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把他們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嚴格區別開來，對他們在學潮中的過激言行不予追究。不但如此，黨和政府同廣大學生和

各界人士之間的對話，包括同參加過遊行、示威、罷課、絕食的學生之間的對話，還將通過多種層次、多種渠道和多種形式廣泛積極地進行，以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對學生們提出的合理要求，我們將給予明確的答覆，對他們提出的合理批評和建議，如懲治官倒、消除腐敗、克服官僚主義，我們將認真聽取和採納，以切實改進黨和政府的工作。

在這段時間，在十分複雜的情況下，許多學校的負責同志、廣大教師和同學們，為勸阻遊行示威、維護學校的教學秩序，做了大量的極其艱苦的工作；廣大公安幹警和武裝警察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為維護交通秩序、社會秩序和社會治安，作出了很大貢獻；機關、工廠、商店和企事業單位的幹部、職工、堅持生產，堅持工作，為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轉付出了難苦的勞動。對這一切，黨和政府是感謝你們的，人民是不會忘記你們的！

現在，為了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我在這裏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緊急呼籲：

一、目前還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希望你們立即停止絕食，離開廣場，接受治療，盡快恢復健康。

二、廣大同學和社會各界，希望你們立即停止一切遊行活動，並從人道主義出發，再也不要對絕食學生進行所謂的「聲援」了。不管動機如何，再搞「聲援」就是把他們推向絕路。

同志們！在今天的大會上，我還要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和衷共濟，團結一致，立即行動起，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制止動亂和穩定局勢做出貢獻。

各級黨組織必須團結廣大群眾，做好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穩定局勢中充分發揮核心領導和戰鬥堡壘作用。

全體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不僅不參與任何損害安定團結的活動，而且要在團結群眾、制止動亂中發揮先鋒模範作用；

各級政府必須嚴肅政紀法紀，切實加強對所屬地區和單位的領導和管理，認真抓好穩定局勢以及各項改革和建設工作；

全體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忠於職守，維護正常的工作秩序；

全體公安幹警和武裝警察要進一步努力維護交通秩序、社會秩序，強化社會治安，堅決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

所有工商企業和事業單位都要遵守勞動紀律，堅持進行正常的生產秩序；

各級各類學校都要堅持正常的教學秩序，凡罷課的應一律無條件地復課。

同志們！

我們的黨是執政黨，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為了對神聖的祖國負責，對全體人民負責，我們必須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迅速結束動亂，維護黨的領導，維護社會主義制度。我們這樣做，相信一定會得到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各界人士和廣大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一定會得到肩負著憲法賦予的保衛祖國、保衛人民和平勞動的光榮任務的人民解放軍的支持和擁護。同時我們也希望廣大人民群眾對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幹警為維護首都正常秩序所做的努力給予全力支持。

同志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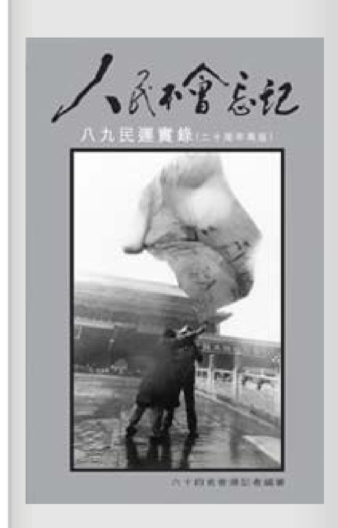
我們一定要在堅決維護安定團結的條件下，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努力清除各種腐敗現象，為把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推向前進而努力奮鬥！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由北京的大學生引發，全國各界人民廣泛參加的偉大愛國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

中國歷史上的革命，自來都是為求溫飽，為求最低的生存條件。這使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完全不同於西方的路德宗教改革，或資產階級革命等革命運動。他們的革命是理想主義的，是為求發展而不僅是求生存的。

但是，現在，中國人民可以驕傲地宣告，舊中國徹底地過去了，我們的這次鬥爭，是為了民主，為了人權，為了求發展。她不僅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甚至也是五四和四五運動所不可比擬的，我們每一個有幸參加了這次運動的人將會為此而感到驕傲。

我們是赤手空拳的，我們手無寸鐵。但是，反人民的暴力反而在我們面前一籌莫展。時代已經改變了，以惡抗惡的時代結束了，以善抗惡的時代開始了。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和人權的鬥爭必將勝利。這是一次人民的革命，它不訴諸恐怖，也不會讓實行恐怖者得逞。人民的覺悟就是鬥爭的目標，就是勝利的標誌。

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這次運動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歷史給予中國人民的，都將是最為輝煌的勝利！

目前，由於李鵬等一小撮人的倒行逆施，北京出現了動亂的局面，他們故意中止正常的公共交通，中斷對生活必需品的正常供應，對各級領導和幹部、工人實行高壓政策，封鎖消息、控制新聞、顛倒黑白、製造謊言、踐踏法制、破壞民主，甚至，他們愚蠢地、野蠻地用軍事力量來迫使人民屈服。

但是，這一切並未嚇倒北京人民，鬥爭現在進入了相持階段。戒嚴令已經發佈幾天，戒嚴部隊卻沒有一兵一卒能夠進城，這不是因為李鵬一伙的寬容，而是表現了他們的虛弱和人民的強大。

人民並非沒有失敗的可能。但是，同胞們，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如果讓一小撮堅持倒退，堅持反人民的人得逞，他們就會秋後算帳，他們會從所謂清污，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直算到這次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改革開放十年來的成果就會喪失殆盡。

到那時，中國民主進程將中斷，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會夭折，我們的共和國將會變成一個白色恐怖的世界，中華民族將長期處於動盪不安、混亂不堪的狀態，我們進入世界強大民族之林的希望將徹底破滅，我們的人民，又將回到任人宰割的無權狀態，等著人民的，是棍子、帽子、牢房，甚至屠刀。

我們只能背水一戰了。多少年以來，在長久的高壓下，我們不少人習慣於明哲保身，習慣於忍讓，但現在，面對瘋狂的反人民的一小撮人，我們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了，他們能把幾千絕食學生的生命置於不顧，我們還能指望他們發善心嗎？

我們不要誤把李鵬的色厲內荏當作有力量。李鵬等一小撮人以前的退讓並不是他們克制，而是無能。他當教委主任，把中國教育推到危機中，他當總理，使生產下降、物價飛漲，他的無能是顯而易見的。他之所以負隅頑抗，只不過因為他自知負人民的太多，我們不能指望他自行退出歷史舞台。但只要我們堅持下去，這個無能的政府是一定會倒台的。

堅持就是勝利！

中國的民主運動正處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如果人民勝利了，中國將開始走向民主化的健康發展道路，一切專制主義者，一切企圖阻止歷史進步的人就再也無力阻止人民的民主要求了。

我們警告自絕於人民的一小撮人，如果誰敢於用軍隊鎮壓人民，如果誰敢於用軍隊來解決黨內、政府內和人民中不同政見的紛爭，他們必將成為人民的公敵，必將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同胞們，祖國在危急中，共和國在危急中。每一個有良心、有正義感的工人、農民、市民、軍人、幹部、學生、知識分子、愛國華僑，每一個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中國人，團結起來，挽救危亡！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關於時局的聲明，王丹於五月二十四日在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時宣讀。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楊尚昆在中央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軍委決定召開緊急擴大會議，請各大單位主要負責同志參加，主要給同志們說一件事情，現在北京局勢還處在一個混亂狀態。雖然宣布了戒嚴，但實際上有些戒嚴任務沒有執行。有些執行戒嚴任務部隊受阻，為了避免正面衝突未強行通過。經過工作，現在多數部隊已進駐預定位置。前幾天還更亂，所有軍牌的車都不能通行。這樣的情況還不說是動亂？首都的狀況就是動亂。這個動亂並沒平息。

一個多月來學生運動時高時低，總的是向高的發展。從耀邦同志逝世時開始一直到現在，大街上宣傳的口號幾次變化，耀邦同志逝世時的口號是要為耀邦同志平反，接著就是「打倒共產黨」，「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敗政府」。那時還沒有普遍喊出「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只有少數地方有。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以後，學生把口號改了，不講「打倒政府」、「打倒共產黨」了，改成「清除腐敗」、「打倒官僚」、「擁護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擁護四項基本原則」。五月四日以後，突然我們有的同志說，這次運動是愛國的、是合理的，這一下子又掀起了一個高潮，之後，又發展到絕食。這些情況李錫銘同志有個講話，很詳細，中央已經發了請大家看材料，這裏就不詳細說了。黨中央總是想緩和群眾的情緒，把事情平靜下來。但是他們越鬧越大，鬧得北京失去控制。同時，外省有一個時間也是比較平靜的，現在又鬧起來了，差不多各省市都鬧起來了。總之，我們每退一步，他們就進一步。目前集中一個口號就是「打倒李鵬」，這是他們內部規定了的，其他口號就不要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推翻現政府。一段時間安定了，中央某人說話或者一篇文章出來，又起來了。然後又下去一點，接著又起來了。到了最後，搞得北京不得不宣布戒嚴。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為什麼搞得首都這樣失去控制？全國都發生大的遊行示威？而且提出來的口號專門對著國務院，為什麼會這樣？前不久幾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陳雲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還有小平同志、王震同志、鄧大姐，對這件事情都非常憂心，事情怎麼會搞成這樣子呢？經過分析事情發展的過程，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件事發生在學生裏頭，但根子是在黨內。就是說政治局常委有兩個聲音，兩個不同的聲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說法，就是有兩個司令部。

本來二十六日的社論精神是堅決反對動亂，這是經過常委討論決定的，是小平同志同意的。當時紫陽同志不在北京，在朝鮮，把常委決定和小平同志意見打電報告訴了紫陽同志。他回了電報，是同意的，完全擁護的。但是四月二十九日他回國，首先就提出來，這個社論定的調子太高了，定性是不正確的。這個社論講了反對動亂的問題，指出這場動亂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其性質是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共產黨。而他認為這是愛國的學生運動，他根本不承認這是動亂，一回來就要中央按照他的說法，要宣布這個社論是錯誤的，五個常委中另外一個聲音就出來了。接著他就講了好幾篇話。第一個是五月三日講話，是紀念五四運動的，當時還看不明顯，他很長一段講了動亂，說我們中國經不起動亂，這都是好話。但是裏頭有些話，說學生運動還是愛國的。最明顯的是接見亞行理事會的講話，這個話你們回去好好看一看，講學生是一個愛國的行動，是可以理解的，然後就提出我們確實有很多腐敗現象，是和學生想到一起了，我們將通過民主、法制解決這些問題，這個講話根本沒有說二十六日社論是否正確，繞開這個問題。但是動亂他講了。這是一篇相當重要的發言。所以鄧主席就講，這次學生鬧事經過幾次反覆，兩種聲音出現，就是指的趙紫陽同志的這篇講話，這是一個轉折點。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統統暴露在學生面前，學生更起勁了。所以就曾經出現「擁護趙紫陽」、「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

這期間，中央常委多次開會，說調子不能再變了。但是他堅持意見，在小平同志來開會的時候，他也堅持了他的意見，說他想不通，在學生運動性質這個問題上，不能同小平同志的說法和常委其他幾位同志的說法保持一致，因此，他就提出要辭職，說他幹不下去了。後來我勸他，這個問題大得很，如果把性質變了，我們就都垮了。學校廣大的教員、校長、積極的學生統統都要挨個耳光，毫無立足之地，一直在學生中做工作的廣大學生黨員、幹部、校長等都要被打下去。這個時候學生就提出要成立他們的新的學聯，反對原來舊的學聯。而且要他們自己選舉，北京也出現有些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樣子，如北京大學佔領了學校的廣播台，把學生會的牌子砸了，政法大學也出現，好幾個大學都出現了奪廣播台，甚至破窗而入。現在的問題是把黨內兩個不同聲音完全暴露在社會上，學生覺得黨中央有一個人支持他們，因此越鬧越厲害，要求開緊急人大常委會，開緊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目的就是要明明白白地想用這些組織作出一條決議，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照他們的說法學生運動是一個自發的愛國民主運動。你們想一想，如果人大常委會作出這麼一個決議，那不是等於把前面那個社論都推

翻了，現在他們正在積極搞這個事情，還在發動簽名。面臨這麼一個情況，我們怎麼辦？先念、陳雲同志都從外地趕回北京，要求無論如何要開會，要確定一個方針，究竟怎麼辦？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同志如彭真、王震、鄧大姐，還有我們兩位老帥，都很關心這個局勢。究竟是退，還是不退？退，就是承認他們那些；不退，就是堅定不移地貫徹我們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方針。

多少年來，幾位八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坐在一起討論中央事情，這是第一次。小平、陳雲、彭真、鄧大姐、王老，都覺得無路可退，退就是我們垮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倒台，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就是美國杜勒斯所希望的，經過幾代之後，我們的社會主義要變成自由主義。陳雲同志講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說這就是要把幾十年戰爭所奪得的人民共和國，成千上萬的革命烈士的鮮血換來的成果統統毀於一旦，就等於否定中國共產黨。北京的同志看得很清楚，在五月十九日上午，紫陽同志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人，你們看他講了些什麼話？稍稍有腦子的人都覺得他講得沒有道理。第一，他說我們來遲了，就哭起來了；第二，說情況很複雜，有很多事情現在解決不了，經過一定的時期終究可以解決，你們還年輕，路長得很，我們老了，無所謂。講了這麼一篇調子很低沉、一片很內疚的話，好像有很多委屈說不出來。北京多數幹部看了他那個講話，都說這個人太不講組織原則了，太沒有紀律了。當天晚上召開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本來安排他要出席的，但一到開會的時候，他突然不去，這樣一個重要會議，總書記不參加，人家馬上就看出了問題，原來安排他講話，他不到，等到開會的時候，大家還在等他，這個時候，軍隊就開始向北京開進了，原定是廿一日零時宣布戒嚴的，因為這個形勢不戒嚴不行了，所以就提出二十日戒嚴。那天本來沒有安排我講話，臨時不能不講那段話，因為軍車阻在那裏，不講幾句怎麼行呢？所以我講軍隊是奉命來到北京，是維護治安，決不是對付學生的，你們不信以後可以看。

社會上流傳的有那麼幾個研究所散佈的材料，他們冒充《人民日報》印號外，講了五個問題，這個東西總政可以印給大家看看。材料說趙紫陽同志提出的這幾個問題，統統被常委否決了，根本沒有那回事，比如其中提出今後要納入民主法制的軌道解決問題，大家都贊成的嘛，準備萬里同志回國後召開人大常委會。近一個月的時間，大家都在作趙的工作，說不能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否定了我們就站不住，他聽不進去。等到小平同志和我們幾位老前輩決定了不能退的時候，他寫了一封信給小平同志，說我不能幹了，我的想法與你們的想法不一樣，我思想上跟不上，我參加常委工作會妨礙常委執行幾位老同志的主意，包括鄧主席在內。但當時他同意：第一，有決斷比沒有決斷好。這是最重要的一句話，退還是不退，總要有個決斷。小平同志同幾位老同志決斷了不能退，所以他表示了有決斷比沒有決斷好。第二，我少數服從多數，小平同志講話是對的，是黨的組織原則。最後他就摔挑子了。

所以我們說，問題的根子在黨內。關於這個問題，小平同志已有兩次講話，一次是說我們出了經濟失調、通貨膨脹、經濟過熱這些現象，這在五年

以前就有了的，特別是最近三年比較嚴重，沒有採取預防的措施。另一次是四月二十五日的講話，說現在黨內有不同的聲音，就拿起來說，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和胡耀邦是一致的，如果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工作進行到底，也就不會出現現在這種情況，特別是反精神污染，只進行了二十天就丟了。這次事件和反對自由化不徹底有關，和不搞反對精神污染有關。所以說，紫陽同志說的話與胡耀邦同志不反對自由化性質是一樣的，這就把問題講透了。還有一次，小平同志和外國人談話，說我們十一屆中全會以來十年最大的失誤是對教育重視不夠，接著說對在開放條件下進來的思想，我們沒有進行艱苦工作，沒有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所以他講的是兩面，一個是教育、一個是精神文明，不是只講教育經費不夠。小平同志思想是一貫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四有」公民。

現在擺在面前的就這麼一個問題，怎麼解決？今天我想給軍隊各大單位的同志先打個招呼。中央考慮來考慮去，勢必要換領導，因為他不能執行中央的指示，同時另外還有一套。他就是要通過這樣一套立法程序達到他的目的，因為在黨內政治局大多數不同意他的意見，常委裏只有他一票。趙紫陽要辭職，傳到外面去了，現在外面就放出空氣，說是七老八十的人，怎麼能解決問題呀；我說這個問題很好回答。這是政治局常委多數作出的決定。這幾位老同志在黨內威望最高，歷史最長，而且對黨對國家有重大貢獻，小平同志不用說，先念、陳雲，徐帥、聶帥、鄧大姐、彭真，還有王老都是有重大貢獻的，在黨和國家這樣緊急關頭，他們怎麼不能出來說話？他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家處於危亡狀態。這是一個共產黨員應盡的責任。現在有人散佈說沒有什麼黨，都是一個人決定的，這是非常錯誤的，這件事的處理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多數人作出的正確決定，陳雲、先念，包括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完全支持和擁護這一正確決定。戈巴卓夫來華，趙紫陽對戈巴卓夫講鄧小平同志的歷史地位，是完全應該的，但是發表消息時，劈頭就講這個問題，講了很長一段，說所有重大問題都是小平同志決定的。稍有頭腦的同志都覺得這是一篇推卸責任的話，把小平同志擺在前面，說明一切錯都是從他那裏得來的。最近他有這麼一系列的東西，我相信你們都會有些感覺的。

現在全黨必須團結起來，一心一意貫徹「四˙二六」社論精神，只有進不能退，今天就是給你們打個招呼，有個精神準備。特別重要的是軍隊無論如何要鞏固。軍隊是不是都思想通呢？這就要靠你們去作工作，我想大軍區一級的同志沒存問題，但軍以下會不會有人有問題呢？現在還有人說，軍委有三個主席，為什麼鄧小平一個人就能調動執行戒嚴令的部隊。這些人根本不懂軍隊，只能欺騙學生，軍隊實行首長負責制，我們這些人只是協助主席工作，起參謀作用。他下決心，不僅找我，還找學智、華清去了，秦部長也去了，他為什麼不能下命令？我把這個消息通報給你們，黨的最高領導機構一旦有人事變動，免得大家感到突然。紫陽同志做這些工作，老實講，我們給他貼了不少金。這幾年的成績，根本正就是由小平同志提出經政治局集體決定的，他只是執行。請大家來，就是要做這幾方面的工作。

一、請你們心中有數;

二、回去開黨委會，跟大家說清楚，軍隊要傳達到團級幹部，團之幹部非常重要;

三、黨委要統一思想，無論如何要統一到中央的思想上來，特別是軍隊，不執行命令，我要以軍法論處。

四、請你們特別注意院校，院校的幹部、主任、教授，要對學員做好工作。軍隊院校絕不能參加遊行示威和聲援。

五、現在到達預定地點的軍隊，要立即安置好，保證他們休息好。要下去動員，向基層幹部講清楚是什麼回事。

剛才我來的時候，鄧主席給我傳了一個意見，要組織幹部幹事，做學生和市民的工作，向學生和街道（群眾）講清楚我們是來幹什麼的。今天已是戒嚴第五天了，五天來我們沒有開過一槍，沒打一個人，這一點老百姓是清楚的，我們要有針對性的做好宣傳工作。

還有一些離休的老同志，我們要分頭向他們打招呼，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離休幹部的工作不做好不行，這些工作盡快地做，開完會以後，看看情勢怎麼樣，幾天以後，你們把大致情況簡單地做個報告，通過你們的工作，是中央決定的精神，能貫徹下去。

一九八九五月二十四日

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兼告李鵬書

嚴家其　包遵信

現在正在發生的學生運動，已發展為全國性的全民抗議運動，這是當代中國劃時代的大事，它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大大地推進了中國民主的進程。這次學運，向全中國宣布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則，即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作為組織政府的執政黨和政府本身的權力並不是固有的，而來源於人民。人民有推翻不受人民信任的政府的權力。這次學運，在全國發出了「打倒李鵬政府」的口號。長期以來，我國的宣傳機器把批評黨和政府的領導人稱作為「攻擊黨和國家的領導」。這次學運，從根本上拋棄了這種陳舊的觀念，使李鵬等人再已找不到任何借口來禁止人民對政府倒行逆施行為的聲討，一個被人民所唾棄的政府首腦，如果不主動辭職，人民可以通過憲法規定的途徑把他罷免。

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有權罷免國務院總理。作為全國人大常設機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牴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

現在的問題是，第一步，必須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打以下兩個問題作出決定：

（一）廢除五月二十日李鵬簽署的「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二）決定在近期內臨時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

國務院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頒布已過五天。這五天來，「北京的社會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體如常」，「在市政府劃定的戒嚴區域內，未見到異於往日的突發情況」，「北京的社會秩序繼續向穩定方向發展」。（與近日《人民日報》報道）相反，正是戒嚴令頒布後，引起學生和市民的嚴重擔憂，為了阻止執行戒嚴的部隊進城，市民在北京市的所有通往郊區的路口，自發地設置了路障。五天來的事實充分證明，國務院的戒嚴令是不必要的，而且也因學生和市民的堅決抵制，由於軍隊和學生、市民有共同的看法，致使戒嚴令無法執行。

憲法第廿九條規定，我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軍隊只能在外敵入侵和國內出現嚴重武裝騷亂的情況下才能動用。現在，北京市既沒有受到外國武裝力量的入侵，又沒有出現任何武裝騷亂的情況，在這時動用部隊調入北京「執行戒嚴任務」，是違反憲法的行為。所以，我們強烈呼籲，全國人大常委會立即開緊急會議，撤銷戒嚴令。

近一個月來，作為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在兩個問題上犯下了極其嚴重的錯誤以至罪行。一是對三千餘名絕食學生的請願要求堅決不予理睬，導致數以千計的學生因絕食而暈倒。在全世界的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政府能對幾千名學生的絕食請願置之不理。這一事實充分表明，李鵬已成了一個喪失了起碼人性的總理。

五月二十日，作為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對手無寸鐵的市民作出了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命令。這激怒了全北京市人民和全國人民，引起了全中國和全世界輿論的譴責。李鵬動用軍隊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這是極為嚴重的違憲行為的。

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國務院總理。憲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如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議認為必要，或者有五分一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提議，可以臨時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我們強烈希望，盡快召開全國人大會議，審查總理李鵬今年四、五月以來背叛人民、反對人民的行為，並罷免李鵬國務院總理職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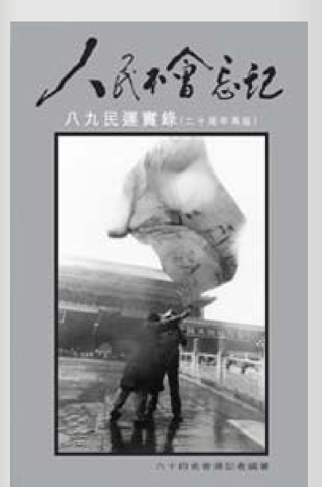
長期以來，由於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無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成了一紙空文。現在，已經到了從根本上改變黨凌駕於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以上的現象的時候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的會議，只要符合憲法規定，無需身兼黨政要職的李鵬或其他人批准，就可以召集。一個要廢除李鵬發布的戒嚴令的人大常委會會議、一個要罷免李鵬國務院總理的全國人大會議，難道要請示李鵬或其他甚麼人批准才能召開嗎？目前發生在我國嚴重的政治危機，唯一的途徑是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為此，我們呼籲每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每一位全國人民代表，投下神聖的一票，廢除戒嚴令，罷免李鵬總理職務。當中國人民看到，全國人大成了名副其實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時，你們每一位對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作出了無與倫比的、偉大的、歷史性的貢獻。

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尚未召開，戒嚴令尚未廢除，李鵬還大權在握。當萬里委員長呼籲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問題時，李鵬等人有可能直接訴諸暴力、鎮壓人民。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會議不能召開，如果由於李鵬實施鎮壓出現大規模流血事件，李鵬將在原來兩個錯誤的基礎上，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這一罪行，終會按法律使身為總理的李鵬受到審判。我們奉勸李鵬，最明智的選擇是主動辭職，減輕國家和人民的災難。我們建議，在李鵬主動辭職的情況下，在李鵬沒有犯下新的錯誤和罪行的情況下，李鵬對絕食學生的非人性行為和五月二十日發布的戒嚴令錯誤，不予追究。何去何從，現在到了李鵬作出最後抉擇的時候了。如果李鵬要採取暴力鎮壓，如果李鵬不惜動用武力來維持他的搖搖欲墜的統治，那麼，億萬中國人民誓將以鮮血和生命來為中國鑄造民主。

一九八九五月二十五日





學生、工人、知識界和市民的十點聯名聲明

北京市高聯、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外地高聯、廣場總指揮部、工人自治會、市民自治會，十點聯合聲明。內容摘要如下：

（一）今次學運與發展成為全面自發性愛國民主運動，並掀起一場內部政治鬥爭，民主力量不會因此而受到阻攔。

（二）即使那一位領導人上台都要順應人民，以民主為出發點，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進程。

（三）對今後民主愛國運動的態度，可以作為領導人分水嶺，肯定者得民心，否定者則不得民心。

（四）李鵬、何東昌、袁木、李錫銘採取否定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態度是不可取的，亦不可能帶領中國推動改革，李鵬在任，對曾經表態支持的工人、市民、幹部和黨員的安全都有危險。

（五）總書記趙紫陽對於今次運動持較肯定態度，應繼續留任。

（六）任何一位倒台領導人應取決於對今次的學運的態度，不應持有對立的態度。

（七）今次運動是一場學生和全民愛國民主運動，而非黨內政治鬥爭。

（八）無論黨內鬥爭結果如何，必須要撤銷戒嚴令，撤退軍隊，否定「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李鵬「五˙二○」講話，以及人大常委會馬上召開緊急會議，提出罷免李鵬議案。

（九）在北京市宣布戒嚴第十天（五月三十日）將整個運動告一段落，撤離天安門廣場，並且舉行大規模遊行和集會。

（十）將四月二十七日定為中國民主自由節。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北高聯」告世界同胞書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剛過去了一個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又一次愛國民主志士用他們的鮮血浸染了鮮紅的五星國旗，長安街上血流遍地，北京城裏哀樂四起。中華民族到了這樣危急的時刻，這裏我們向為了共和國命運而死傷的民主志士致敬，也向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作出嚴正的宣告。

四月十五日以來，北京青年學生自發掀起了大規模的愛國民主運動。四月二十二日，北京青年學生衝破禁令，到天安門廣場參加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會後，學生代表長跪人民大會堂前，呈遞請願書，政府官員無一出面。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粗暴地將此次學潮定為動亂。次日，為抗議人民日報惡意歪曲污衊，首都高校再次舉行示威，首都各界群眾熱情支持，予以肯定。百萬人民走上街頭，全國各地學生與各界群眾紛起響應，掀起了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潮。

面對人民的呼聲、面對勢不可擋的民主愛國運動，政府當局使出慣用的伎倆，陽奉陰違、拖延、搪塞、挑撥離間，不與真正的學生代表對話，拒不答應對話條件，蓄意製造事端，擾亂社會秩序。期間，青年學生和出色的北京人民表示了最大的克制與秩序，維護了北京市的安定團結，對於青年學生和億萬人民的民主要求，政府置之不顧。

五月十三日，首都高校學生忍無可忍，近千名同學自發組織了絕食請願運動。兩天之內，絕食學生迅速增加到三千多人，社會各界反應強烈，聲援活動遍及中華大地，廣大人民強烈要求政府立即坦誠、平等地與學生對話，迅速接受絕食同學的條件。

五月十九日凌晨，趙紫陽、李鵬等人終於匆匆地出現於天安門廣場，看望了絕食同學，並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聲稱黨中央沒有說過學生運動是動亂，保證絕不秋後算帳，然而，就在當天晚上，李鵬、楊尚昆召集北京部分黨軍政幹部會議。稱愛國民主運動為動亂，並號召緊急行動制止動亂。

次日，國務院及北京市政府發出戒嚴令，數十萬軍隊掩至城郊，大軍壓境，殺氣騰騰。

就從軍隊開入北京的那一刻起，青年學生和北京市民便奔赴各個路口和子弟兵談心，共議國家大事，暢敘魚水深情。其後數日，政府一手製造的首都混亂秩序，得以迅速恢復，軍民關係十分融洽。首都人民在和平、安定、美麗的古都愉快地生活和工作著。據新聞報道，這些天首都刑事案件、交通事故和火災發生率明顯下降。

然而，暴行正在陰謀的計劃中，正在向無辜的學生和民眾逼近。

六月二日，軍車超速行駛，在木樨地附近撞死三人，重傷一人，拉開了反動政府向愛國民眾血腥鎮壓的序幕。

六月三日凌晨，軍隊穿便裝乘客車向城中進發，市民學生一起攔阻。前門、六部口、西單等地的軍隊施放催淚瓦斯和發射橡皮子彈，打傷很多學生市民。在六部口當場有一名七歲兒童被士兵踩死。

六月三日晚，由裝甲車、防暴警察和催淚瓦斯開道的軍隊，由四面八方向天安門廣場猛撲，沿途動用機槍衝鋒槍向周圍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無情掃射。木樨地一帶當場死傷四百人，軍隊並向搶救傷者的人民也進行點射。

六月四日凌晨左右，在西單路口由北向南高速開來的三輛裝甲車，撞壞了一輛停在路中的公共汽車。旋即，從軍事博物館方向傳來了的行車聲和連續不斷的槍聲。據被距射而跑出來的學生說，在軍博到西單之間已有大批學生、市民傷亡。零時四十分，軍隊在距西單路口五百米處，首先發射了大量的催淚瓦斯，人群雙目難睜，只好就地蹲下。就在此時，幾輛汽車同時起火，顯然這是便衣蓄意所為，意在嫁禍於學生市民，為當局暴力屠殺提供藉口。

六月四日零時五十分，大批防暴警察口中狂呼「打」，將梭梭子彈射向正在路邊毫無預備和抵抗能力的學生、市民。頓時，一排排學生，市民應聲倒在血泊中，幾十人當場死亡，數百人受傷，死亡者還

包括路過圍觀的民眾。那些進入胡同躲避的學生和市民，只要被士兵發現，就發子彈射擊。在西單東面的一小胡同深處，一梭子彈一氣打傷了四人，街上的人群中從娃娃到老人，無一倖免。

一點多鐘，大批滿載軍人的軍車趕至西單路口，無數群眾立即在路邊或胡同口靜觀，一批批衝來的士兵，對著人群不時掃射，人們成群成群的倒下。他們不僅向人群掃射，而且追打躲閃不及的市民學生。所用器械有警棍、皮鞭、槍托等，北京第二外國語言學院的一位同學，雙腳被打得流血不止，他說：他們幾個男生上前救一名女生，一梭子彈飛過，頓時倒下了五位同學。三個小時之後，西單路口軍隊過完，當時倖免於難的市民和學生，紛紛往天安門廣場，通向天安門的街道又被軍隊封鎖。軍隊毫不猶疑地向道邊的人群掃射，即使是退卻的人也不放過，口號聲起處槍聲更為密集。

從六月三日廿三時至四日六時，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及前門大街一帶，響徹著機關槍與衝鋒槍的掃射聲。軍隊所經之處，處處血漬斑斑，傷亡無數，街邊哭聲不斷，慘不忍睹。天安門廣場軍車林立，坦克橫衝直撞，至清晨六時，據不完全統計，傷亡共七千多人，死三千多人，屠殺還在繼續，傷亡還在擴大。難以計數的市民學生倒在血泊中，他們手無寸鐵，毫無防避槍彈的能力。不過，他們帶毛巾口罩，以為軍隊頂多施放催淚瓦斯，發射橡皮子彈，善良的學生市民絕對沒有料到，李鵬政府如此喪心病狂，慘無人道，在木樨地一帶首批被射倒的學生市民，他們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真的是死在真槍真彈之中。這些無辜的渴望民主與自由的共和國公民，就是李鵬政府所謂的反革命暴徒。

六月三日至四日發生在北京城內，由政府軍隊蓄意製造瘋狂屠殺毫無防衛的人群中，樁樁血案才是李鵬偽政府真正的反革命證據。全世界人民絕不會饒恕李鵬的反動政府，他們欠下的血債一定會如數償還。

四月十五日，發起於北京，燃遍於全國，影響及全國，是一次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青年學生舉起爭民主、爭自由、反專制、反獨裁、剷除官倒、廉潔政府的大旗，代表了全國億萬人民的意願，喊出億萬人民的心聲，這次運動繼承和發展了五四精神，揭開了中國歷史上民主自由的新篇章。然而，以鄧小平、李鵬及楊尚昆為首的一小撮反黨、反人民份子對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懼怕萬分，恨之入骨。他們置國家民族的利益於不顧，為了保護自己及極少數人的利益，掩蓋事實真相，造謠滋事，稱愛國民主運動為動亂、反革命運動。他們的一意孤行，威脅、恫嚇、軟硬兼施，以致於向無數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北京市民舉起了血淋淋的屠刀，製造了駭人聽聞的世界特大慘案。

事實充分暴露了他們的極端兇殘和腐朽的本質，有力的證明了他們的政府根本不是人民的政府，而是世界上最殘暴的專制、獨裁政府，證明了鄧小平、楊尚昆及李鵬一小撮是歷史的罪人，民族的敗類，人民的公敵。法西斯政府已經撕下了偽善的面紗，獨裁者已經暴露了兇惡的嘴臉，中華大地陰雲籠罩，北京城血雨腥風，然而歷史早已宣告：人民必勝，民主自由必勝，我們北京高校學生，絕不在邪惡勢力面前，退縮半步，一定和他們鬥爭到底，我們將用我們的熱血、青春，向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宣告，我們必定無愧於五四先賢、六四英烈，必定無愧於我們的時代及民族，必定無愧於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值此民族危難之際，我們呼籲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推翻鄧、楊、李的反動政府，推翻肆意屠殺人民、慘無人道的法西斯，打倒肆意踐踏人民意志的獨裁者，我們呼籲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自由、民主的國家和人民，團結在和平、自由、民主的旗幟下，聲援中國學生和民眾的愛國民主運動，聲討中國政府當局的法西斯暴行，對鄧、楊、李政府這些獨裁者實行有效的經濟、外交制裁，以弘民主之精神，張人權道鈹，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為民主，為自由而戰，打倒專制，打倒獨裁，打倒法西斯，民主萬歲，自由萬歲，人民萬歲。

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的講話

新華社

同志們辛苦了！ (熱烈鼓掌)

首先，我對在這場鬥爭中英勇犧牲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志們表示沉痛的哀悼！對在這場鬥爭中負傷的幾千名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志們表示親切的慰問！對所有參加這場鬥爭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志們致以親切的問候！

我提議，大家起立，為死難的烈士們默哀！ (肅立默哀)

利用這個機會，我講幾句話。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

《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把問題的性質定為動亂，「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份，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準確的。後來事態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也是必然的。我們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軍隊，也有一批各個時期參加革命的骨幹還在，因此，事情現在爆發，處理起來比較容易。處理這一事件的主要難點在於，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一小撮壞人混雜在那麼多青年學生和圍觀的群眾中間，陣線一時分不清楚，使我們許多應該採取的行動難以出手。如果沒有我們黨這麼多老同志支持，甚至連事件的性質都難以確定。一些同志不了解問題的性質，認為這只是單純的對待群眾的問題，實際上，對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眾，還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會渣滓。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不懂得這個根本問題，就是性質不清楚。我相信，經過認真做工作，能取得黨內絕大多數同志對定性和處理的擁護。

事情一爆發出來，就很明確。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人民要求反腐敗，我們當然接受。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謂反腐敗的口號，我們也要當好話來接受。當然，這個口號僅僅是他們的一個陪襯，而其核心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這次平息暴亂中，我們那麼多同志負了傷，甚至犧牲了，武器也被搶去了，這是為什麼？也是因為好人壞人混雜在一起，使我們有些應該採取的斷然措施難於出手。處理這件事對我們軍隊是一次很嚴峻的政治考驗，實踐證明，我們的解放軍考試合格。如果用坦克壓過去，就會在全國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謝解放軍指戰員用這種態度來對待暴亂事件。儘管損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贏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變觀點。讓大家看看，解放軍究竟是什麼人，有沒有血洗天安門，流血的到底是誰。這個問題清楚了，就使我們取得了主動。雖然犧牲了許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觀地分析事件的過程，人們就不得不承認，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這也有助於人民理解在這場鬥爭中我們所採取的方法，今後解放軍遇到問題，採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這裏順便說一下，以後再不能讓人把武器奪去了。總之這是一個考驗，考試是合格的。雖然軍隊裏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戰士們大都是十八、九歲出頭的娃娃，但他們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險面前，他們沒有忘記人民，沒有忘記黨的教導，沒有忘記國家利益，面對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他們當之無愧。我講考試合格，就是指軍隊仍然是人民子弟兵，這個性質合格。這個軍隊還是我們的老紅軍的傳統。這次過的是真正的政治關、生死關，不容易呀！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黨和國家的鋼鐵長城。這表明，不管我們受到多麼大的損失，不管如何更新換代，我們這個軍隊永遠是黨領導下的軍隊，永遠是國家的捍衛者，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永遠是人民利益的捍衛者，是最可愛的人！同時，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我們的敵人是多麼兇殘，對他們，連百分之一的原諒都不應有。

這次事件爆發出來，很值得我們思索，促使我們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也許這件壞事會使我們的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得更穩、更好，甚至於更快。使我們的失誤糾正得更快，使我們的長處發揚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開來講，只是提出一個課題。

第一個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包括我們發展戰略的「三步曲」，正確不正確？是不是因為發生了這次動亂，我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就發生了問題？我們的目標是不是一個「左」的目標？是否還要繼續用它作為我們今後奮鬥的目標？這些大的問題，必須作出明確、肯定的回答。我們第一個翻一番的目標已經完成了，第二個翻一番的目標計劃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後五十年，要達到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增長速度為百分之二點幾就夠了。這就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對此，我想我們做出的不是一個「左」的判斷，制定的也不是一個過急的目標。因此，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應當說，我們所制定的戰略目標，現在至少不能說是失敗的。在六十一年後，一個十五億人口的國家，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實現這樣一個目標，應該是能夠做到的，不能因為這次事件的發生，就說我們的戰略目標錯了。

第二個問題，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我最近總在想這個問題。我們沒有錯。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不是錯在四個堅持本身，而是錯在堅持得不夠一貫，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年元旦，我在政協講話，講了「四個保證」，其中有一條叫，「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艱苦奮鬥是我們的傳統，艱苦樸素的教育今後要抓緊，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們的國家越發展，越要抓艱苦創業，提倡艱苦創業精神，也有助於克服腐敗現象。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在講艱苦創業，後來日子稍微好一點，就提倡高消費，於是，各方面的浪費現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麼違法亂紀和腐敗現象等等，都出來了。我對外國人講，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裏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

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錯了沒有？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應該說我們上了一個台階，儘管出現了通貨膨脹等問題，但十年改革開放的成績要充分估計夠。當然，改革開放必然會有西方的許多壞的影響進來，對此，我們從來沒有估計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經濟特區時，我與廣東同志談，要兩手抓，一手要抓改革開放，一手要抓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兩點論。但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一硬一軟不相稱，配合得不好。講這點，可能對我們以後制定方針政策有好處。還有，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不能改。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更靈活一些。以後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國搞成一個關閉性的國家。實行關閉政策的做法對我們極為不利，連信息都不靈通。現在不是講信息重要嘛，確實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沒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靈。再是絕不能重複回到過去那樣，把經濟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這個建議，請常委研究。這也是個比較急迫的問題，總要接觸的問題。

這是總結我們過去十年。我們的一些基本提法，從發展戰略到方針政策，包括改革開放，都是對的。要說不夠，就是改革開放得還不夠。我們在改革中遇到難題比在開放中遇到的難題要多。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我們要堅持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而不是美國式的三權鼎立制度。實際上，西方國家也並不都是實行三權鼎立式的制度。美國罵我們鎮壓學生，他們處理國內學潮和騷亂，還不是出動了警察和軍隊，還不是抓人、流血？他們是鎮壓學生和人民，而我們則是平息反革命暴亂。他們有什麼資格批評我們！今後，在處理這類問題的時候，倒是要注意，一個動態出現，不要使它蔓延。

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除了個別語言有的需要變動一下，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政策都不變。這個問題已經提出來了，請大家認真考慮一下。至於一些做法，如投資方向、資金使用方向等，我贊成加強基礎工業和農業。基礎工業，無非是原材料工業、交通、能源等，要加強這方面的投資，要堅持十到二十年，寧肯欠債，也要加強。這也是開放，在這方面，膽子要大一些，不會有大的失誤。多搞一點電，多搞一點鐵路、公路、航運，能辦很多事情。鋼，外國人判斷我們將來需要一億二千萬噸，現在我們接近六千萬噸，還差一半。如果在現有企業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增加兩千萬噸，就可少進口鋼材。借點外債用在這些方面，也叫改革開放。現在的問題不是改革開放政策對不對，搞不搞，而是如何搞，開哪方面，關哪方面。

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要認真總結經驗，對的要繼續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總之，要總結現在，看到未來。

利用這個機會，我就講這一點。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人民不會忘記"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

陳希同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從四月中旬到六月上旬，極少數人利用學潮，掀起了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首都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策動動亂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場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發生和發展，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和國內社會基礎。正如鄧小平同志說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在這場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鬥爭中，趙紫陽同志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嚴重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極其嚴峻的形勢面前，黨中央作出了正確的決策，採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得到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贏得這場鬥爭的勝利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為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堅決反對動亂和暴亂，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表現了很高的政治覺悟和主人翁責任感。現在，我受國務院委托，就這次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情況，主要是發生在北京的一些情況，以及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工作，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匯報。

動亂的醞釀和預謀由來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勢力，總是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包括中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這是他們長期的根本戰略，這些年來，他們利用社會主義國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誤和經濟上的暫時困難，更加緊了這個戰略的實施。在我國，黨內黨外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和搞政治陰謀的人，同西方國家的這種戰略相呼應，內外勾結，上下串通，為在中國製造動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進行了長達幾年的思想、輿論和組織準備。正因為這樣，在動亂的醞釀、預謀和發難的整個過程中，包括製造輿論、歪曲真相、造謠惑眾等諸多手段的使用，都顯示出了國內外、海內外相互策應、相互配合的鮮明特點。

這裏著重講一講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情況。去年九月，黨中央提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廣大群眾和青年學生對這個決策和採取的各項措施是支持和擁護的。整個社會秩序和政治形勢是基本穩定的。今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絕對多數的贊成票（只兩票反對、四票棄權），通過了李鵬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當然，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對於黨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誤，一些國家公職人員中的腐敗現象，以及社會上的分配不公等問題，也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同時在推進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義等方面，還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議，這些都是正常現象，也是黨和政府正在採取措施加以解決的問題。但是，當時在黨內和社會上的確有極少數人緊密勾結，明裏暗裏進行了大量極不正常的活動。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趙紫陽同志去年九月十九日會見美國一位「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後，一些據稱與趙紫陽「智囊團」有著密切聯繫的香港報刊，大肆進行宣傳，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傳媒倒鄧保趙」的政治信息。反動雜誌《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叫囂「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則呼籲趙成為「獨裁者」(1)。香港《解放》雜誌也刊登長篇論文，說北京一些人同香港傳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滅」的關係，這種微妙關係「有了一個最新的個案顯示，那就是在最近一個月掀起的倒鄧保趙風」，還說什麼「就中國走資的希望言，他們看準了趙紫陽」。同這種「倒鄧保趙」風相配合，北京《經濟學周報》發表了同趙紫陽原秘書鮑彤聯繫密切的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與另一個人關於時局的對話，攻擊「治理整頓」會導致「停滯」，提出中國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不能重蹈赫魯曉夫、劉少奇那樣非程序權力更迭的覆轍」，「中國不再允許像文革那樣用非程序化的方式進行權力變動」，這個對話的核心問題，就是為掩蓋趙紫陽的錯誤、保住他的權力地位，以便更加肆無忌憚地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製造輿論。這個對話曾經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香港《鏡報》等海內外多種報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內外勾結進一步加緊，陸續出現了一些觀點十分錯誤乃至反動的政治集會、聯名上書、大小字報和其他活動。比如，去年十二月七日，由《走向未來叢書》副主編金觀濤擔任顧問的「北京大學未來學會」，舉辦了「未來中國與世界」的大型討論會，金觀濤在發言中說「社會主義的

嘗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新觀察》主編戈揚立即以一個有幾十年黨齡的「年齡最大」者的身份站出來「作證」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客氣了一點。」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蘇紹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方勵之等人在北京的「都樂書屋」搞了一個所謂「新啟蒙沙龍活動」，參加的除中國人之外，還有一些美國、法國、意大利的駐京記者，共一百多人。方勵之說，這類集會「對當局採取完全批判、徹底批判的態度」，「火藥味很濃」，「現在需要行動」，「連開三次就要上街了」。二月初，方勵之、陳軍(2)（反動組織「中國民聯」成員）等人又在友誼賓館舉行了所謂的「名人名家迎春聯誼會」，方勵之主要就所謂「民主」和「人權」兩大問題發表了演講，陳軍把「五四運動」同「西單民主牆」作了類比。方勵之說：「希望企業家作為中國的新生力量，同先進的知識分子結合起來，為爭民主而鬥爭。」二月十六日，陳軍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3)，廣為散發方勵之致鄧小平的信，以及陳軍等三十三人致全國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實行大赦，釋放嚴重觸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謂「政治犯」。二月二十三日，台灣《聯合報》發表《大運動的開端，大衝擊！》的文章說：「紐約發宣言，北京公開信，神州春雷動，民主浪潮湧。」二月二十六日，張顯揚（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李洪林（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包遵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戈揚等四十二人(4)，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也要求釋放所謂的「政治犯」。此後，北京一些大學陸續出現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量大小字報和集會。比如，三月一日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同時出現《討鄧檄文口告全民書》的大字報，胡說什麼「共產黨的政治就是空談、強權、獨裁、武斷」，公然要求「取消黨派，解除四項原則」。三月二日北京大學貼出題為《為中國人悲哀》的小字報，叫喊打倒「專制」和「獨裁」。三月三日清華大學等院校出現署名「中國民主青年愛國會籌委會」寫的《致廣大青年學生的一封信》，鼓動「在愛國主義民主戰士方勵之的領導下，參加到『民主、自由、人權』的激流中去」。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廣為張貼方勵之給香港《明報》寫的《中國的失望和希望》一文(5)，宣稱社會主義已經「徹底喪失了吸引力」，要組成政治上的「壓力集團」，去實行「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的改革」。他所說的「改革」，實際上就是全盤西化的代名詞。四月六日北京大學貼出一份題為《時代的召喚》的大字報，以完全否定的態度提出了「社會主義還有沒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馬列主義到底還適合不適合我國的國情」的問題，四月十三日北京郵電學院等校收到署名「廣西大學學生會」寫的《告全國大學生書》，號召「高舉胡耀邦的畫像和『民主、自由、尊嚴、法治』的大旗」，來紀念「五四」青年節。與此同時，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謂的「民主沙龍」、「自由論壇」以及各式各樣的「研究會」、「討論會」、「演講會」紛紛出現，僅北大學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龍」一年就搞了十七場講座(6)，活動十分頻繁。他們曾經把原非法組織「人權同盟」的頭頭任畹町請去，圍繞所謂「新權威主義與民主政治」，散佈了許多謬論。他們曾在塞萬提斯像前舉辦討論會，公開宣稱「要廢除一黨制，讓共產黨下台，推翻現政權」。他們還把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請去，充當他們的「軍師」。李淑嫻煽動說：「要使民主沙龍合法化」，「要經常在這集會」，「要取消北京市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所有這些，都為後來發生的動亂做了思想和組織上準備。香港《明報》載文評論說：「中國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爭取人權而發起的串聯與簽名運動，已對學生產生極大影響，他們早已在醞釀於『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日採取大規模的行動表達對當局的不滿。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則猶如裝滿火藥的桶扔了一根火柴。」總之，在極少數人的預謀、組織和策劃下，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形勢。

學潮從一開始就被動亂的組織者所利用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醞釀已久的學潮和動亂提前爆發。廣大群眾和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達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為學生的悼念活動提供了條件。但是，極少數人卻利用這個時機，以「悼念」為借口，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學潮從一開始就被極少數人所操縱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動亂的性質。

這場動亂，首先表現在大量的大小字報、標語、口號、傳單和輓聯等，對黨和政府進行了肆意的攻擊和詆譭、公然號召推翻共產黨的領導(7)，顛覆現政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報，有的謾罵共產黨是「一代奸黨」，「是個即將潰滅之組織」；有的攻擊老一輩革命家是「朽翁聽政」、「獨裁集權」；有的指名道姓地逐個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胡說什麼「不該去的去了，該死的卻沒死」；有的要求「撤換無能政府，推翻專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產黨，實行多黨制」，「取消各團體、軍隊、學校、單位的黨支部和政工幹部」；有的發表《私有制宣言》，號召「早日敲響公有制的喪鐘，去迎接共和國新的明天」；有的還提出要「邀請國民黨回大陸，建立兩黨政治」，等等。許多大小字報用不堪入耳的語言，誣衊鄧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鄧小平」。

這場動亂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項基本原則的尖銳對立。動亂策劃者們這個期間提出的綱領性口號，無論是通過非法學生組織的頭頭王丹在天安門廣場首先提出的「九條要求」，還是後來提出的「七條」、「十條」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兩條：一是，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二是，徹底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反自由化中所謂「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這兩條的實質，就是要在中國取得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實現資本主義化的絕對自由。同這種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識界的所謂
「精英」分子，也就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極少數人，在此期間也組織種種座談會，利用輿論陣地大肆宣傳，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社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由戈揚主持，參加的有嚴家其、蘇紹智、陳子明（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劉銳紹（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等人。他們議論的中心也是兩個，一是為胡耀邦「平反」，二是為反自由化「翻案」，並且明確表示支持學生的遊行示威，說什麼由此「看到了中國的前

途和希望」。後來，當上海市委作出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的正確決定之後，一貫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趙紫陽同志不僅不予支持，反而指責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

這場動亂，還表現為在極少數人的挑唆和策劃下，許多行為都是極其粗暴的，是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法律和法規的，是嚴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們不顧憲法對「四大」的廢除，不聽勸阻，在校園內鋪天蓋地地張貼大字報；他們不顧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不經申請批准，連日不斷地舉行大遊行；他們在四月十八日和十九日深夜接連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新華門，並且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8)，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發生過的事情，他們違反天安門廣場的管理規定，多次強行佔據廣場，四月二十二日那一天幾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無法正常進行；他們無視北京市的有關法規，不經登記就成立了「團結學生會」（後改名為「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等非法組織，並且向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合法的學生會和研究生會「奪權」，他們不顧法紀和校紀，搶佔辦公室，搶佔廣播站，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在校園造成了嚴重的無政府狀態。

大量製造謠言，蠱惑人心，煽動群眾，是極少數動亂組織者和策劃者採用的另一個重要手法。學潮之初，他們就造謠說，「李鵬在政治局會議上大罵胡耀邦，胡是被氣死的」，誘導人們把矛頭指向李鵬同志。事實上，那次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是教育問題，當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同志正在就有關文件作說明時，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臟病暴發，立即就地進行搶救，緩解後被送進醫院，根本沒有什麼生氣的事。四月十九日夜間，一位師大外語系的女學生在參加晚會後回校途中，被無軌電車撞傷，經搶救無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謠說：「共產黨的軍警開車軋死了學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學生情緒激動。四月二十日凌晨，我公安幹警將衝擊、圍堵新華門的學生強行帶離現場，用公共汽車送到北京大學，又有人造出了所謂「四˙二○血案」的謠言，說什麼「警察在新華門打人，不光打學生，還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緒更加激憤。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結束，李鵬等中央領導同志離開人民大會堂之後，有的人為了製造攻擊李鵬同志的口實，又精心策劃了一場騙局，他們先是造謠說，「李鵬總理答應十二點四十五分出來接見廣場上的同學」，接著就由三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台階上跪遞「請願書」，然後又宣稱「李鵬臨時變卦，拒不接見，欺騙學生」，煽動起廣場上數萬學生的強烈不滿，幾乎造成衝擊人民大會堂的嚴重事件，由於這些謠言的蠱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學生同政府的對立情緒，極少數人就利用這種情緒，提出了「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的口號，造成北京六萬高校學生罷課的嚴重局面，許多外地高校也相繼罷課，使學潮升級，動亂擴大。

這場動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已經不局限於高等學校，也不局限於北京地區，而是向著全社會和全國各地擴散。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結束後，一些人到中學、工廠、商店、農村串聯，上街演講，散發傳單，貼標語，搞募捐，千方百計擴大事態。有的中學出現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標語，有的中學出現了「罷課罷考萬歲」的大字報，有的工廠貼出了「聯合工農，打倒暴政」的傳單。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還提出了「南下北上，東來西走」的口號，企圖發動全國性的大串聯。南京、武漢、西安、長沙、上海、哈爾濱等地的高校都發現從北京去的學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學生也到北京參加遊行。在長沙、西安等地，發生了嚴重打、砸、搶、燒的違法犯罪活動。

這場動亂一開始就有海外、國外各種政治勢力插手。國民黨豢養的反動組織「中國民主聯盟」成員胡平、陳軍、劉曉波等人(9)，聯名從美國紐約發出了《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要參加學潮的學生注意「鞏固在這次活動中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繫，力求以一個堅強的群體進行有效的活動」，「應把徹底否定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運動作為突破口」，「加強與各種新聞媒介的聯繫」，「加強與社會其他各界的聯繫」，「在運動中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參與」。「中國民主聯盟」的兩個頭頭王炳章和湯光中還急急忙忙從紐約飛往東京，企圖闖回北京，直接插手這場動亂。一些主張在中國實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特邀方勵之領銜，從哥倫比亞大學發回了《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政治宣言》(10)，鼓吹「人民必須擁有對執政黨的選擇權」，煽動人們推翻共產黨。一個化名「紅岩」的人從美國用傳真電話發回「修改憲法的十條意見」，提出全國和各級人大代表以及各級法院的法官，都應「由無黨派候選人中選舉產生」。企圖把共產黨從國家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中徹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國的原「中國之春」成員，匆匆忙忙地組成了「中國民主黨」，向北京一些大學發出了《告全國同胞書》，煽動學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們下台」、「促使中共結束其專制統治」。港、台、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一些反動政治勢力，也通過各種渠道，採用各種手段，紛紛介入。一些西方通訊社表現了異乎尋常的熱心，特別是「美國之音」，每天用三種節目，花十多個小時，向中國大陸進行喋喋不休的報道，造謠惑眾，煽風點火，為這場動亂推波助瀾。

以上大量事實說明，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學潮，而是抱有明確的政治目的，背離了民主和法制的軌道，運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動大批不明真相的群眾和學生，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挑起的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動亂。如果不是這樣從本質上分析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會犯極大的錯誤，就會在鬥爭中陷於極大的被動。

《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對動亂的定性是正確的

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四月二十二日治喪結束，趙紫陽同志對悼念活動期間出現的日益明顯的動亂跡象一直採取容忍和放縱的態度，助長了動亂的形成和發展。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中央和北京市許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多次向趙紫陽同志提出，中央應有明確的方針和對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態的發展，但他始終迴避對事情的性質進行認真的分析和討論。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結束後，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議在他四月二十三日出訪朝鮮前開一次會，但他不僅拒不接受，反而若

無其事地打高爾夫球去了。由於他採取這樣的態度，使黨和政府喪失了制止動亂的時機。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萬里同志作了匯報，在萬里同志的建議下，當天晚上由李鵬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對事態的發展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研究，會議一致認為，當時的種種事態表明，在極少數人的操縱和策動下，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已經擺在我們面前。會議決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動亂小組，同時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發動群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力爭盡快平息動亂，穩定局勢。次日上午，鄧小平同志發表重要講話，對中央常委的決定表示完全贊同和支持，對動亂的性質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動亂。鄧小平同志的講話，大大地提高了廣大幹部的認識，增強了大家平息動亂，穩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氣。《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體現了政治局常委的決定和鄧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指明了動亂的性質。同時，明確地把極少數動亂組織者和策劃者同廣大青年學生區別了開來。社論的發表，使絕大多數幹部感到心有了底，行動有了方向，可以旗幟鮮明地開展工作了。

《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之後，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連召開黨內外各種會議，堅持原則，統一認識，運用各種形式澄清謠言，安定人心；支持學校領導、黨團員和學生骨幹大膽工作，對參加遊行示威的學生進行勸阻和疏導；積極開展對話活動，努力爭取群眾。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學生的對話，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同學生的對話，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領導同志同學生的對話，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時，認真做好工廠，農村、商店、中小學和街道的工作，穩住大局，防止動亂向社會蔓延。各省、市、自治區也按照社論精神，抓緊做好本地區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態的影響向外地擴散。

由於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旗幟鮮明，使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被迫在策略上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社論發表前，大量的標語、口號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社論發表後，四月二十六日，非法組織北京「高自聯」就發出了改變策略的「新學聯一號令」，要求四月二十七日「在擁護共產黨的旗幟下遊行到天安門」，規定的口號包括「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維護憲法」等，並且在方勵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敗政府」、「打倒獨裁統治」等顛覆性的口號改成了「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等各界群眾贊同的口號。日本時事社這時從北京發出一則題為《年輕官員結成支持民主化集團》的報道，把所謂「趙紫陽智囊團」的一些人物稱之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輕官員」，說他們「頻繁地接觸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等參加遊行的北京市內的各大學的新自治會代表，給學生們出主意」，在二十七日的大遊行中，學生們舉著『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等標語，這也是遵照了這個集團的指示」。學潮的頭頭們原來打算要「百日遊行，無限期罷課」，社論發表後，這個勁頭沒有了。五月四日同四月二十七日的遊行相比，學生人數由三萬多人減少到不足二萬人(11)，圍觀的群眾也大為減少。「五四」遊行之後，經過各高校黨政領導做工作，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復了課。全國各地在《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發表後，局勢也迅速趨向平穩。顯然，再做一些工作，這場由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引起的動亂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實說明，《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是正確的，它的確起到了穩定首都，安定全國的作用。

趙紫陽同志「五四」講話是動亂升級的轉折點

在動亂接近平息的時候，作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趙紫陽同志，卻採取了出爾反爾、反覆無常的態度。本來，在他出訪朝鮮期間，政治局常委徵求他的意見時，他就打回電報，明確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四月三十日回國之後，他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還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講話和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對動亂的定性，認為前段對學潮的處理是好的。但是，沒過幾天，他卻在五月四日下午接見亞洲銀行年會代表時，發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決定、鄧小平同志講話和社論精神完全對立的意見。第一，在已出現明顯動亂的情況下，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第二，在大量事實已經證明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他還堅持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經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利用學潮策動動亂的情況下，他還只是說「難免」「有人企圖利用」，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央關於極少數人已經在製造動亂的正確判斷，趙紫陽同志的這番講話，是鮑彤事先為他起草好的。鮑彤還要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當天下午就立即廣播，並且要連播三天；又要求《人民日報》次日在頭版顯著地位發表，同時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對不同的意見不僅扣住不發，甚至不許在內部參考讀物上發表。趙紫陽同志的這番講話，經過《人民日報》及某些報紙的大肆渲染，在廣大幹部、群眾中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給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撐了腰，壯了膽，打了氣。

趙紫陽同志的講話同中央的方針截然不同，這一點不僅在國內引起廣泛議論，連國外的輿論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報道中說，趙的講話「與一周前對學生們的嚴厲譴責形成了鮮明對照」是對「上周的判斷的一大修改」，法國《世界報》五月六日也載文指出，「這位黨的首腦（指趙紫陽）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勢的發展變得對他有利了」，這篇講話拋出之後，各級領導幹部、黨團員和群眾中的骨幹，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無所適從，許多人都表示反對，有的人說：「中央出了兩個聲音，誰對誰錯，以誰為準？」有的說：「要我們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個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說：「紫陽在上邊當好人，我們在下邊當惡人。」學校幹部和學生骨幹普遍認為「被出賣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傷心得流下了眼淚，學校工作完全陷於被動。當時，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處境非常困難，明知道中央的意見不一致，對下還要違心地說是一致的，只不過是「側

重點不同」。許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請示，而作為總書記的趙紫陽同志卻遲遲不召開會議。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強烈要求下，五月八日勉強開了一次會，但根本不聽北京市的匯報。會上有的同志反映，趙紫陽同志五月四日的談話與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精神不一致，他聲色俱厲地說：「我講錯了我負責。」在另一次會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線工作的同志都說「被出賣了」，趙紫陽同志生氣地責問：「誰把你們出賣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賣。」當時，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報紙相呼應，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擊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線工作的同志，連遊行的痞子也高呼口號：「北京市委，謊報軍情，欺騙中央，罪責難逃。」大家眼看著事態越來越惡化，有些措施想辦也辦不了。

同上述情況相反，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卻從趙紫陽同志的談話中受到了鼓舞。嚴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發展研究所所長）等人說：「現在出現了轉機，要發動知識界支持趙紫陽。」張顯揚說：「不是說要利用學生嗎，趙紫陽現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趙紫陽同志的鼓動和少數人的策劃下，北京大學和師範大學「自治會」的頭頭當晚就重新宣布罷課，許多學校也相繼宣布繼續罷課，並且組織了「糾察隊」，禁止願意復課的學生去教室上課。接著，遊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五月九日，三十多家新聞單位的數百名新聞工作者上街遊行，遞交了請願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師範大學、政法大學等十多所高校的上萬名學生又上了街，示威遊行，聲援記者，散發傳單，鼓動罷課絕食。從此，事態驟然逆轉。動亂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響下，外地已經平穩下來的局勢又重新緊張起來，趙紫陽同志講話之後不久，五月九日、十日，山西太原就發生了大批遊行示威的學生衝擊省委、省政府，衝擊當時正在舉行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洽談會、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和民間藝術節的事件，在國內和國際上都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

以絕食相要挾，使動亂更加擴大

善良的人們提出，學生鬧得這麼兇，是不是政府對他們理解不夠，體諒不夠，讓步不夠？事實完全不是這樣，從動亂一開始，黨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和憂國憂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廣大青年學生提出的促進民主、深化改革、懲治官倒、消除腐敗的要求同黨和政府的願望是一致的，並且希望通過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決問題。但是，這種良好的願望並沒有得到積極的響應。政府提出，希望通過多渠道、多層次、多種形式的對話，來溝通思想，增進理解，而非法學生組織卻對對話條件提出了很高的價碼。他們要求，對話的對象「必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以上的人員」，每次對話「必須出具聯合公告，由雙方共同簽字」，對話要由「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地點輪流舉行」。這哪是什麼對話，完全是擺出一副要同黨和政府進行政治談判的架勢。特別是趙紫陽同志的「五四」講話以後，極少數人更是利用這一時機，把黨和政府的克制視為軟弱可欺，要價更高，條件更苛刻，使動亂不斷加溫，步步升級，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黨和政府仍然採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態度，希望繼續保持對話的渠道，以便利於教育群眾和爭取多數。五月十三日凌晨二時，「高自聯」的頭頭提出了對話的要求，凌晨四時，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就答覆同意，但天明之後，他們自自食其言，取消了這次對話。五月十三日上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信訪局再次通知他們，決定於十五日同學生進行對話。他們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參加人數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個二十人的名單，政府同意後，又要求增至二百人，還沒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責「政府對話毫無誠意」，在接到對話通知僅四小時之後，就急急忙忙拋出早已準備好的《絕食宣言》，發動了一場歷時七天、前後有三千多人參加的大絕食，從此長期佔據了天安門廣場。「高自聯」的頭頭王丹說，選在十三日開始絕食，「正好可以借戈爾巴喬夫訪華壓他們」，這少數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把絕食學生當「人質」，以他們的生命為賭注，採取極其惡劣的手段要挾政府，使動亂更加嚴重。

在學生絕食過程中，黨和政府繼續保持了極其克制的態度，竭盡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學校工作人員、各級領導幹部直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對他們進行思想疏導。其次是協助紅十字會，先後調配了一百多輛救護車，抽調了數百名醫護人員，晝夜守護在絕食現場，並動員五十二家醫院騰出近兩千張病床，保證因絕食休克或致病的學生及時得到救護和治療，三是提供各種物資，盡可能減少絕食學生的痛苦和保障他們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調幹部、工人和車輛，通過紅十字會，晝夜為絕食學生運送飲水，提供食鹽和食糖，環衛局調出了灑水車，配備了臉盆、毛巾，供絕食學生洗漱；醫藥公司調來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瀉藥劑，交由紅十字會分發，食品部門運來大量飲料、麵包等，以備緊急搶救學生時使用；商業部門調運了六千頂草帽，北京軍區應北京市要求送來一千條棉被，供絕食學生白天避暑，晚上禦寒；為保持絕食現場衛生，搭起了臨時沖洗廁所，環衛工人還趁深夜進行了絕食現場的大清掃；十八日大雨前，又從公共交通總公司抽調七十八輛大客車，從物資局調來四百多塊厚木板，供絕食學生避雨、隔潮(12)。在長達七天的絕食期間，沒有發生一起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這些，都沒有得到任何積極的反響。事實一再教育人們，極少數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是執意同我們作對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讓一萬步，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事態急劇惡化的情況下，趙紫陽同志不僅沒有做他應當做的工作，反而煽動新聞界，進行錯誤的輿論導向，把已經惡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難以收拾。五月六日，趙紫陽同志對當時中央主管宣傳和思想工作的胡啟立、芮杏文同志說，對學潮的報道「放開了一點，遊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甚至還說：「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在這，他竟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稱之為「國內人心所向」和「國際進步潮流」。他的這番指示，當天就向首都主要新聞單位作了傳達，隨後又作了多次部署。這樣，《人民日報》等許多中央報刊便對遊行、靜坐、絕食等採取了充分肯定、積極支持的態度，進行了連篇累牘甚至言過

其實的報造，連香港報紙也對這種奇特的現象表示驚訝。

在輿論的錯誤引導下，從五月十五日開始，上街遊行聲援學生的群眾一天比一天多，聲勢一天比一天大，從幾萬人、十幾萬人發展到幾十萬人，全國各地還有二十多萬學生趕來聲援。一時間，似乎不參加遊行就是「不愛國」，不表示聲援就是「不關心學生的死活」。在這種情況下，絕食的學生騎虎難下，欲罷不能。許多教師和學生家長給領導機關和新聞單位寫信、打電話，要求報社、電台、電視台不要把絕食的學生迫上死路，要求發發善心，救救孩子，停止這種「殺人輿論」，但沒有得到什麼效果。由於學生絕食和市民遊行，首都北京的社會秩序陷於一片混亂(13)，舉世矚目的中蘇高級晤受到嚴重干擾，一些活動日程被變更，有的被取消。與此同時，全國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會城市遊行的人數急劇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現了遊行，波及面如此之廣，騷擾如此之嚴重，是建國以來沒有過的。

為了給學生撐腰打氣，給動亂火上澆油，一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所謂「精英」，紛紛赤膊上陣，走上前台。五月十三日晚，嚴家其、蘇紹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學貼出《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報，動員知識分子參加他們發起的聲援學生絕食的大遊行。五月十四日，嚴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報》記者）、于浩成（原群眾出版社社長）、李澤厚（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蘇曉康（北京廣播學院講師）、溫元凱（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劉再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等十二人又發出《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要求宣布這次動亂是「愛國民主運動」，要求宣布非法的學生組織為合法，說如果不能實現要求，他們也將參加絕食，這個呼籲，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在中央電視台公開播出。這些人還多次到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說，進行煽動(14)，誣衊我們的政府是「無能的政府」，說什麼由學生絕食「看到了中國的光輝前程」。接著，又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發表了《五˙一六聲明》(15)，倒打一耙地威脅說，政府如果不接受極少數人的政治要求，「將極可能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引向真正動亂的深淵」。

在事態一天比一天嚴重的情況下，趙紫陽同志利用五月十六日會見戈爾巴喬夫的機會，有意識地把鬥爭矛頭引向鄧小平同志，更使局勢進一步惡化。他在會見時，一開頭就說：「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了中國黨的這個「決定」。第二天，嚴家其、包遵信等人就發表了極其猖狂惡毒的《五˙一七宣言》。他們咒罵說：「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經死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他們毫無掩飾地說，「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他們聲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對於這種極其反動的叫囂，港台的一些報刊也遙相呼應。香港的《快報》於五月十八日發表《倒鄧倒李不倒趙》的文章，說什麼「趙紫陽的講話充滿暗示，現時國內的烏煙瘴氣，全因鄧小平掌舵而起」，「現今群情洶湧要倒鄧倒李，而趙紫陽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呼之欲出了」。還說，「倘若倒鄧成功，而中國的改革確能走上開明法治之途和實現民主，對香港來說，是一則喜訊。」在這一派呼嘯聲中，咒罵鄧小平同志、攻擊李鵬同志的標語、口號鋪天蓋地，有的要求「鄧小平滾下台」，有的提出「李鵬下台謝國安民」，有的呼喚「中國的瓦文薩你在哪」。在這同時，「擁護趙紫陽」、「趙紫陽萬歲」、「趙紫陽榮升軍委主席」等標語口號充斥於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動亂策劃者們企圖借混亂之機，亂中奪權。他們散發傳單，宣傳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籌委會」，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會，並鼓吹成立「北京區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們攻擊依法選舉產生的國務院是「偽政府」，造謠說已有外交部等十幾個部「宣布獨立」，脫離國務院，世界上已有三十多個國家同我國斷交。他們還造謠說，「鄧小平已下台」，於是就有人抬著棺材遊行，燒毀鄧小平同志的模擬像，在天安門廣場燃放鞭炮慶祝他們的「勝利」(16)。

首都的局勢越來越嚴重，無政府主義惡性泛濫，許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亂和白色恐怖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黨和政府如果還不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那麼，就會再度嚴重貽誤時機，進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這是廣大人民群眾絕對不會允許的。

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是不得已而採取的正確措施

為了保證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在北京市警力嚴重不足，已無法維持正常的生產、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況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授予的權力，國務院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這是不得已而採取的措施，也是果斷的、正確的決策。

五月十九日，中央召開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宣布了進一步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的決策。趙紫陽同志頑固堅持同中央正確決策相對立的錯誤立場，既不同意和李鵬同志一道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也不同意主持大會，甚至連出席一下大會都不同意，把他同黨鬧分裂的態度公開暴露於全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

在這之前，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問題，極少數掌握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出於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當天就泄露了戒嚴的機密。一名在趙紫陽同志身邊工作的人對非法學生組織的頭頭說，現在軍隊要「鎮壓」你們，別人都同意，就是趙紫陽反對，你們要做好準備，十七日晚，鮑彤召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員，在泄露了即將戒嚴的機密之後，發表了「告別演說」，警告與會者不得把會上密謀策劃的情況透露給別人，否則就是「叛徒」，就是「猶大」。五月十九日，就是這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長高山，趕到體改所，向正在開會的人傳達

了所謂「上邊」的指示。隨後由陳一諮（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主持，用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四家的名義，起草了《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廣播，並廣為散發。《聲明》要求，「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要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召開中國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並且授意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要盡快結束絕食」，暗示政府將「採取極端舉動（軍管）」，接著，自稱來自「體改委」的一些人竄到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講，說什麼「懷著極為悲痛極為憤慨的心情，公布一個絕對真實的消息，趙紫陽總書記已經被罷免」，呼籲全國罷工、罷課、罷市，煽動群眾「立即行動起來，進行決死的鬥爭」。這個演講，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報號外》廣為散發。當晚在北京站廣場等公共場所還發現題為《關於學運策略的幾點建議》的傳單，指示「目前絕食對話已不是我們的手段和要求，應當改為和平靜坐，並旗幟鮮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號。即：（一）紫陽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特別會議；（三）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還說「對軍隊的到來不應採取惶惶不安、如驚弓之鳥的態度」、「這種對待軍隊的態度及方式，要在他們到來之前反覆向同學們解釋宣傳」。最近一些已經被逮捕歸案的「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頭頭也交代，五月十九日下午四時許，有人自稱中央某機關工作人員，拿著條子到「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透露了即將實行戒嚴的消息。正是極少數掌握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同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緊密結合，使他們得以及時調整策略，在當天晚上搶在中央召開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之前四十五分鐘宣布把絕食變成靜坐，造成既然學生已經停止絕食政府就沒有必要戒嚴的假象，以迷惑群眾；得以及時組織力量，裹脅不明真相的人，在各路口設置路障，堵截軍車；得以繼續組織輿論，混淆視聽，擾亂人心。他們一面惡毒咒罵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說什麼「我們不要鄧小平的智慧和經驗」，一方面大肆吹捧趙紫陽同志，說什麼「黨無紫陽，國無指望」，呼喚「還我紫陽」。他們還陰謀集結力量，搞更大的動亂，宣稱要動員二十萬人佔領天安門，要在五月二十日組織全市性的總罷工，並且同十九日趙紫陽同志稱病請假三天相配合，揚言三天之後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極端緊急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國務院斷然決定於二十日上午十時起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以防止事態更加惡化，掌握制止動亂的主動權，給廣大反對動亂、渴求安定的人民群眾撐腰。但是，由於我們的決策事先被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所掌握(17)，部隊進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和阻撓。戒嚴的前夕和戒嚴後的頭兩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二百二十多輛公共汽車被劫持，當作路障，交通陷於癱瘓，各路戒嚴部隊不能及時按計劃進入指定地點。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駐地繼續被圍堵，街頭煽動的演講隨處可見，製造謠言的傳單比比皆是，數萬人的遊行示威接連不斷，首都北京處於一片混亂和恐怖之中。隨後幾天，戒嚴部隊採取不同的方式陸續進入城內，廣大武警、公安幹警排除萬難堅持執勤，各城區和近郊區把工人、市民、機關幹部組織起來，建立了約十二萬人的首都群眾維持秩序工作隊，各遠郊縣也出動了民兵，依靠軍、警、民的協同努力，使首都交通運輸和生產、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轉，人心逐漸趨於安定。但是，極少數人製造動亂的活動一天也沒有停止，推翻共產黨領導的目標絲毫也沒有改變，事態正在一天一天地向著反革命暴亂的方向發展。

戒嚴之後，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的一個重要策略，就是繼續佔據天安門廣場不走。他們要把廣場作為所謂「學運乃至全民族的一個中樞」，一日政府做出什麼決定，就準備在廣場上「作出強烈的反應」，「組成一個反政府的統一戰線」。他們早就策劃在廣場挑起流血事件，認為「只要不撤離廣場，政府就會進行鎮壓」，「鮮血可以促使人民覺醒，使政府分化瓦解」。為了支撐廣場的局面，他們依靠海內外反動勢力提供的資金，不斷改善設施，裝備先進的通訊工具，每日耗資約十萬餘元，而且開始非法採購武器(18)。他們依靠香港聲援團提供的帳篷，在廣場建立了所謂「自由村」，開辦了所謂「民主大學」，聲稱要使它成為「新時代的黃埔軍校」。他們還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樹立了一個什麼女神像，原來叫「自由女神」，後來又改名為「民主之神」，把美國的民主、自由作為他們的精神支柱。劉曉波等幕後策劃者擔心靜坐請願的學生難以堅持，就親自走到前台，搞了一個四人參加的四十八小時至七十二小時的絕食鬧劇，為青年學生加油打氣。他們說：「只要廣場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堅持鬥爭，輻射全國，直到政府垮台。」

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利用政府和部隊在戒嚴之後仍然採取的克制態度，繼續組織各種非法活動。他們繼「高自聯」、「工自聯」、「絕食團」、「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等非法組織之後，又相繼建立了「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等非法組織。他們用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名義，明目張膽地打電報給一些部隊，挑撥離間，進行策反。他們組織專門的輿論班子，籌辦地下報紙，從事顛覆政府的地下活動。他們結成死黨，集體進行地下宣誓，聲稱「絕不出賣自己的良知，絕不向專制屈服，絕不向八十年代中國的皇帝稱臣」。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在國際飯店召集「高自聯」的部分頭頭開會，提出了退出天安門廣場的六個條件，即「軍隊回去，戒嚴取消，李鵬下台，鄧小平、楊尚昆退休，趙紫陽復出」，並且準備組織所謂「凱旋在子夜的大進軍」。特別嚴重的是，他們認為趙紫陽同志請病假離開總書記的崗位之後，從黨內解決問題的希望已經渺茫，轉而寄希望於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緊急會議。嚴家其、包遵信等致電人大常委會領導人，說什麼「目前憲法受到少數人的粗暴踐踏，我們緊急建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解決當前面臨的嚴重問題」，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員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發出《提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徵詢意見函，徵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簽名，並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發了緊急電報。他們採取陰謀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發函、發電時，只講建議開會，而不講他們真正的主張，企圖欺騙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盜用他們的名義，強加於人，以售其奸。在辦了這些事情之後，嚴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報》上發表了《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兼告李鵬書》，呼籲「每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每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投下神聖的一票，廢除戒嚴令，罷免李鵬總理職務」。

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還肆無忌憚地挑動和組織暴力行動。他們糾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竄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滿釋放分子，網羅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湊所謂「敢死隊」、「飛虎隊」、「義勇軍」等恐怖組織，揚言要軟禁、綁架黨和國家領導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獄」的方式奪取政權(19)。他們散發煽動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傳單，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號召組織「可能被稱為人民軍的武裝力量」，「團結包括台灣國民黨在內的各種力量」，「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黨和它的政府」。他們揚言，「秋後算帳，非算不可」，要算黨的帳，算政府的帳，並且準備了要鎮壓的幹部名單。香港《明報》還刊登了動亂組織者和策劃者之一的劉曉波六月二日同一個所謂「大陸民運領袖」的「對談」，公然叫嚷「期望趙紫陽復出，我們就必須在人民中組織武裝部隊」。

動亂策動者的種種活動，都有雄厚的財力作後盾。除四通公司等單位給予幾十萬元的物質支援外，還得到海外敵對勢力和一些組織與個人的財力物力支援。美國、英國和香港的一些人，給了上百萬美元和數千萬港幣(20)。這筆錢中的一部分，被用於破壞戒嚴活動，每一個參加設路障、堵軍車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三十元的報酬。同時，他們還許下高價，收買暴徒，去燒軍車和打解放軍，許諾燒一輛軍車給三千元，抓住或打死一個軍人也給幾千元(21)。台灣一位軍政要員發起了「送愛心到天安門」的運動，帶頭捐款十萬元台幣。國民黨一個中委發起募捐一億元台幣，設立所謂「支援大陸民主運動基金」。台灣藝術文化界一些人發起「血脈相連聲援大陸民主運動」。北京「高自聯」致函「台灣藝文界朋友」，說什麼「在此關鍵時刻，得悉台灣藝文界挺身而出」，「給予我們急需的物資和精神支持，我們對此表示由衷的感謝和敬意」。

所有這些說明，極少數人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製造的動亂，絕不像善良的人們想像的那樣，只要政府做點讓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發佈一個戒嚴令就可以解決問題。他們是橫下一條心，要和海外、國外敵對勢力聯合起來，同我們死戰到底的。一切一廂情願的善良願望，只會使他們更加放肆地向我們發動進攻。時間拖得越久，付出的代價越大。

極少數人是怎樣挑起革命暴亂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擔負著「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的神聖職責，而且擔負著「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事業，努力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義務，這是《憲法》第二十九條明文規定了的。部隊進城維護社會治安，正是執行《憲法》賦予的任務。

五月二十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之後，儘管遇到重重阻攔，部隊仍然按照既定計劃，採取不同的方式，陸續進入城內，到達一部分警戒部位。極少數暴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深知，如果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全部按計劃到位，那麼，他們正在從事的種種非法活動和反革命活動就無法再進行下去，他們的全部陰謀就將很快以失敗而告終。於是，他們窺測時機，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動亂加劇，最終發展成為一場反革命暴亂。六月一日，我公安機關收審了非法組織「工自聯」的幾個頭頭，他們就借機煽動一些人，包圍和衝擊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機關和公安部。六月二日晚，中央電視台借用了十個月的武警部隊的一輛吉普車，在返回原單位途中，由於車速過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車事故，撞死了人，但沒有一個是學生。這本來是一起交通事故，有關部門正在處理，而極少數人卻有意把它同戒嚴部隊按計劃進城的行動聯繫起來，大造謠言，說是戒嚴部隊的開道車故意軋死學生，鼓動不明真相的人，要搶奪屍體，舉行抬棺大遊行(22)。一時間，人心浮動，氣氛緊張，經過這樣的煽動和鼓噪，暴亂的火就被他們點了起來。

六月三日凌晨，當部分戒嚴部隊按計劃進入警戒目標的過程中，就有人有組織地煽動一些人在建國門、南河沿、西單、木樨地等路口阻攔大小車輛，設置路障，攔截軍車、毆打戰士，搶奪軍用物資。曹各莊附近十二輛軍車被攔。從燕京飯店門前經過的戰士被強行搜身。電報大樓前的軍車輪胎被扎穿，並被隔離墩圍住。

拂曉前後，永定門橋頭的軍車被推翻。木樨地軍車車胎被扎穿。朝陽門的四百多名進城戰士被歹徒用石塊亂砸。六部口、橫二條一帶軍車被攔截，戰士被圍困。

早上七時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鑽進被圍困的軍車內，搶奪裝有子彈的機槍。從建國門到東單，以及天橋附近，進城部隊被零星隔斷，遭到圍攻、毆打。在建國門立交橋上，有些戰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戰士被打得遍體鱗傷。

上午，虎坊橋一帶的進城部隊被衝，戰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傷的戰士在送往醫院途中遭攔截，急救車車胎被放氣，傷員被綁架。虎坊路至陶然亭二十一輛軍車被圍，在戰士轉移彈藥時，前往護衛的民警被打傷。

中午，被攔阻在府右街南口、正義路北口、宣武門、虎坊橋、木樨地、東四等路口的解放軍戰士，有的被打傷，有的鋼盔、軍帽、雨衣、水、挎包被搶。六部口一夥人截了一輛載有槍支彈藥的軍車，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多次解圍均未成功。車上的槍支彈藥如被搶走或發生爆炸，後果不堪設想。為了保護首都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萬不得已情況下，武警部隊施放了催淚彈，驅散了人群，搶回了彈藥車。

在攔截、砸搶軍車的同時，一夥暴徒圍堵和衝擊國家機關和重要部門。他們衝人民大會堂、衝中宣

部、衝廣播電視部、衝中南海的西門和南門。保衛這些機關的武警戰士和公安幹警數十人負傷。

隨著事態的急劇惡化，暴亂的挑動者更加猖狂。下午五時許，非法組織「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頭頭，在天安門廣場分發了菜刀、匕首、鐵棍、鐵鍊子和帶尖的竹竿，聲言「抓住軍警就要往死打」。「工自聯」在廣播中大肆叫囂，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還有一夥暴徒糾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單附近一個建築工地的圍牆，搶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鋼筋、磚塊等，準備打巷戰。他們的廣播站不斷播放如何製造和使用燃燒瓶、如何堵燒軍車之類的「知識」，進行教唆和挑動。他們策劃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時機，煽動更多的人上街，發動更大規模的打、砸、搶、燒，造成一個群眾暴動的態勢(23)，一舉推翻政府，奪取政權。

正是在這萬分緊急的關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不得不下定決心，命令駐守在首都周圍的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平息反革命暴亂。

反革命暴徒是怎樣殘害解放軍的(24)

自戒嚴以來，陸續進城的戒嚴部隊根據中央的指示，始終保持高度克制的態度，盡量避免發生衝突。六月三日暴亂發生後，在部隊進城前，為了避免傷害群眾，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於晚六時半發出《緊急通告》，要求「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這個《通告》，通過電台、電視台和各種廣播器，進行了反覆廣播。

六月三日晚十時前後，奉命向城內開進的各路戒嚴部隊先後進入市區。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嚴重阻攔。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部隊仍然採取了極其克制的態度。而反革命暴徒懷著對解放軍的刻骨仇恨，卻利用這種克制，發動了駭人聽聞的打、砸、搶、燒、殺。

二十二點至二十三點，從翠微路、公主墳、木樨地到西單一線，有十二輛軍車被燒。有些人用卡車運來磚頭，向戰士猛砸。一些暴徒把無軌電車推到路口，放火焚燒，阻斷了道路。有的消防車趕去滅火，也被砸爛、燒毀。

二十三點前後虎坊橋三輛軍車被堵，一輛吉普車被推翻。安定門立交橋軍車被圍堵。崇文門大街一個團的戰士被圍堵。建國門立交橋三十輛軍車被圍堵。北京煤炭工業學校以西三百多輛軍車被圍堵。為保證軍車前進，有的戰士和指揮員下車做疏導工作，被圍攻毆打，有些被強行綁架，不知去向。被打傷的，有尉官、校官和將軍。在南宛三營門受阻的軍車，為避免衝突,往東繞行，至天壇南門再次被堵，許多軍車被砸、被燒。珠市口一輛軍車被堵後，一幫人爬到車上，下邊有個幹部模樣的人勸他們下來，當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六月四日凌晨以後，焚燒軍車的暴行越演越烈。在天壇東側路、天壇北門、前門地鐵西口、前門東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單、復興門、南禮士路、木樨地、蓮花池、車公莊、東華門、東直門、以及朝陽區的大北窑、呼家樓、北豆各莊、大興縣舊宮鄉等地，數十個路口的數百輛軍車，被暴徒用汽油、燃燒瓶和土製噴火器引燃，火光衝天，有的戰士在車內被活活燒死，有的跳下車後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幾輛、十幾輛，甚至二三十輛軍車同時被燒，一片火海。在雙井路口，有七十餘輛裝甲車被圍，其中二十餘輛車上的機槍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三十多輛軍車被暴徒付之一炬，現場濃煙衝天。有的暴徒手持鐵棍，推著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見車就燒。多輛部隊運糧車、被服車被暴徒搶劫，不知去向。有幾名暴徒在復興門立交橋一帶，開著搶來的裝甲車，邊行進邊開槍。非法組織「工自聯」還在廣播上宣稱，他們繳獲了一部軍用電台和密碼本。

在砸毀、焚燒軍車的同時，一些暴徒對民用設施和公共建築物發動了攻擊。西城區的燕山等商店的櫥窗被砸。天安門前和毛主席紀念堂西側的松樹牆被點燃。一些公共電汽車、消防車、救護車、出租汽車被砸毀和燒毀。特別惡毒的是，一夥人駕駛一輛裝滿汽油的公共汽車駛向天安門城樓，企圖放火燒毀城樓，在金水橋南被戒嚴部隊及時截獲。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們不僅瘋狂攻擊軍車，大搞打砸搶燒，而且，對解放軍戰士發動了波絕人性的殘殺，手段極其兇暴野蠻。

六月四日凌晨，東單路口一夥暴徒用酒瓶、磚頭、自行車砸砍戰士，許多戰士血流滿面。復興門一輛軍車被截，車上的某部管理科長、管理員、炊事員等十二人被拉下車來，強行搜身，然後痛打，多人受重傷。六部口四名戰士被圍攻毆打，有的當場死亡。廣渠門附近三名戰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眾救出，兩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區西興盛胡同，有二十餘名武警戰士被一夥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傷，有的下落不明。護國寺一輛軍車被截，戰士被拉下來痛打後當作人質，一批衝鋒鎗被搶走。一輛裝滿磚頭的汽車，由東交民巷開往天安門廣場，車上的人高喊：「是中國人的上來，砸解放軍去。」

拂曉之後，殘害解放軍戰士的暴行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隊的一輛救護車，拉了八名受傷的戰士送往附近醫院時，被一夥暴徒攔住，當場就打死一名，還叫嚷要把其餘的七名一齊打死。在前門大街的一家自行車店門前，有三名解放軍戰士被打成重傷，暴徒們圍住狂叫：「誰敢救他們就打死誰。」在長安街上，一輛軍車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擁而上，猛砸駕駛室，將司機活活砸死。西單十字路口以東三十米處，一名戰士被打死，又在屍體上澆汽油焚燒。在阜成門，一名戰士被暴徒殘害後，屍體被懸掛在立交橋的欄杆上。在崇文門、一名戰士被一夥暴徒從過街天橋上扔下，澆上汽油，

活活燒死，暴徒們狂叫，這是「點天燈」。在西長安街首都電影院附近，一名解放軍軍官被暴徒打死後，剖腹挖眼，把屍體掛在一輛正在燃燒的公共汽車上。

在幾天的暴亂中，被暴徒砸毀、燒毀、損壞的軍車、警車和公共電汽車等車輛達一千二百八十多輛，其中軍用汽車一千多輛，裝甲車六十多輛，警車三十多輛，公共電汽車一百二十多輛，其他機動車七十多輛。一批武器、彈藥被搶。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六千多人，死亡數十人、他們為保衛祖國，保衛憲法，保衛人民，付出了鮮血甚至寶貴的生命。對他們的功績，人民將永遠銘記。

如此慘重的代價，最有力地說明了戒嚴部隊所採取的極大的容忍和克制態度。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軍隊。這支軍隊對敵人狠，對人民和，歷來如此。他們在戰爭年代能夠打敗美帝國主義武裝起來的國民黨八百萬軍隊，打敗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能夠有效地保衛我們國家的神聖領土、領海和領空，為什麼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卻造成這麼大的傷亡呢？為什麼他們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為好人和壞人混雜在一起，使我們有些應該採取的斷然措施難於出手」。這也正說明了人民解放軍是熱愛人民的，是不願意誤傷群眾的。他們忍辱負重，從容赴死，正是人民軍隊本質的充分體現。否則，怎麼可能造成這麼大的傷亡和損失呢？這不正說明我們的軍隊為了保護人民而不惜犧牲自己嗎？而最終為了平息反革命暴亂，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戒嚴部隊在傷亡嚴重、忍無可忍、讓無可讓而又很難前進的情況下，經過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對空鳴槍開道，進行反擊，擊斃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於圍觀的人很多，有的被車撞、人擠，有的被流彈誤傷，有的被持槍歹徒擊傷擊斃。據現在掌握的情況，暴亂中有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二百餘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這當中，有罪有應得的暴徒，有被誤傷的群眾，還有正在現場執行任務的醫護人員、聯防人員和維護秩序工作隊員等。對於被誤傷的群眾和執行任務中受傷害的人員，政府要認真地做好善後工作。

由於「美國之音」造謠和一些人有意傳謠，社會上一度盛傳，戒嚴部隊進城之後，「血洗天安門廣場」，「有數千人甚至上萬人倒在血泊之中」。真實情況是，戒嚴部隊進入廣場之後，凌晨一時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該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這個緊急通告用高音喇叭，進行了反覆播放，時間長達三個多鐘頭。這時，停留在廣場上靜坐的青年學生集中在廣場南端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帶。三時左右，他們經過內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嚴部隊表示，願意自動撤出廣場，戒嚴部隊當即表示同意。凌晨四時半，廣場上廣播了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同時，廣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迅速恢復天安門廣場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廣場上的數千名青年學生在聽到通告後，打著各自的旗幟和橫幅等，兩邊布置了手拉手的糾察隊，於五時左右離開廣場。為了保證學生們的安全撤離，戒嚴部隊在廣場東側南口開出了一條寬闊的通道，保證學生順利、平安地離開。這時，還有一些堅持不走的學生，戒嚴部隊按照「通告」要求，強制他們離開了廣場。到五時半，清場任務全部完成。廣場靜坐的學生，包括最後被強制離開的，沒有死一個人。有人造謠說，廣場「血流成河」，自己是「從死人堆爬出來的」，完全是胡說八道。

以天安門廣場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嚴部隊全部到位為標誌，首都反革命暴亂被一舉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過程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不怕犧牲，英勇戰鬥，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人民群眾救護傷員、解救被圍困戰士，積極配合和支援戒嚴部隊，湧現出許多動人心弦的好人好事。由於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北京市的經濟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其他方面的損失更難以用金錢來計算。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正在為挽回遭受的損失，進行艱苦的勞動。現在，首都各項秩序基本恢復正常，全國局勢也較快地趨於平穩，這反映了中央的正確決策得到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擁護。但是，動亂和暴亂尚未徹底平息，極少數反革命暴亂分子不甘心滅亡，仍在進行種種破壞活動，甚至夢想捲土重來。

為了取得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徹底勝利，我們要放手發動群眾，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亂分子的工作進行到底。要徹底揭露動亂和暴亂的陰謀，依法懲處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即那些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和搞政治陰謀的人，同海外、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人，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以及製造打、砸、搶、燒、殺等種種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通過堅決果斷、艱苦細緻的工作，集中打擊極少數首惡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頑固分子，盡力擴大教育面和團結面。在此基礎上，依靠廣大群眾，努力增產，厲行節約，艱苦奮鬥，盡快把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造成的損失全部奪回來。

委員長、各位副委員長和委員！

我國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正義鬥爭，得到了世界上許多國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但是，在國際上也有一些國家，主要是美國和西歐某些國家，歪曲事實真相，進行造謠中傷，甚至對我實行種種的所謂譴責和制裁，掀起反華浪潮，粗暴干涉我國內政。對此，我們深表遺憾。對於一切外來壓力，我國政府和人民過去沒有屈服過，現在不會屈服，永遠也不會屈服，謠言必將破產，真相終將大白於天下。我國將毫不動搖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我國將一如既往地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關係，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發展繼續作出自己的貢獻。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

編者按：陳希同為國務委員、北京市長。

由於此報告表面上縷述事實，實際上卻資料錯誤甚多，編委會在下文《陳希同「平亂」報告辨正》中提出商榷，解釋此報告內(1)至(24)項註腳。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陳希同「平亂」報告辨正

編輯委員會

北京市長陳希同的「平亂報告」是一篇重要的文件，文內縷述大量資料，為了將八九學運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提供了「事實根據」。

問題是，文內的資料，任何當時曾經親在北京採訪的記者，均不能不高度置疑。以錯誤的資料來推斷出錯誤的結論，正是中共保守當權派的伎倆。「六˙四」之後，為了逃避劊子手的罪責，當權派不斷編造謊言、偽造事例，來抹黑學運民運，企圖導人相信「平暴」有理。

陳希同報告是此中表表者，其後大量攻擊學運的文章，均源於這份報告。他混淆視聽的手法，不外是：（一）半真半假。在一些曾經發生過的事件當中，增添枝葉，醜化這些事件。（二）顛倒因果。故意將時序倒亂，製造學生和知識分子「煽動」暴亂的假象。（三）杜撰事例。利用外國和港、台記者無法全面採訪的缺口，編造「消息」，肆意造謠。

為免讀者日後對八九學運過程淡忘之時，被陳希同報告的似是而非資料所誤導，本書編輯特將報告中的錯誤資料、或值得懷疑而無法查證真假的資料指出，供讀者辨正。

除了下列二十多項訂正之外，其餘內容，並不表示全部正確，只是有些情況超越香港記者的採訪範圍，無任何根據予以質疑，因此無法加上註腳。此外，本文只提出資料上的疑點，觀點問題則不予辯論。

⑴ 《九十年代》並無這篇文章，《經濟日報》上張五常一篇文章則有類似提法。

⑵ 當時陳軍並非「中國民聯」成員。

⑶ 陳軍當時在他所開設的捷捷酒吧內對個別外國記者透露聯名信的事，不是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

⑷ 二月廿六日的四十二人聯名信，戈揚並無簽名，而且這封信由自然科學家施雅風、許長英發起，張顯揚、李洪林、包遵信等人只是聯署。

⑸ 三月廿九日張貼出來的方勵之文章《中國的失望和希望》，僅在北京大學三角地張貼，而且馬上被人撕掉，並不是「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廣爲張貼」。

⑹ 北京大學的「民主沙龍」由一群熱心學生輪流主持，非全是王丹主持。

⑺ 根據當時在北京採訪的記者的大量報道，胡耀邦逝世之初，校園出現的大小字報和標語，以表達不滿的情緒爲主，絕少所謂「公然號召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者。

⑻ 所謂「衝擊新華門」是官方的說法，詳情請閱本書有關文章。只有個別市民被武警追打時高叫「打倒共產黨」。

⑼ 陳軍一直否認是「中國民主聯盟」成員，直至今年九月才正式加入。亦從沒有公開資料顯示劉曉波曾加入民聯。

(10) 《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改革宣言》是今年二月十七日在美國成立的「促進大陸民主化聯絡組」發表的，當時遠遠早於胡耀邦之死，並非「動亂一開始」就插手的「政治勢力」。而且方勵之並沒有答應擔任組長，經於八九年四月一日通過《百姓》半月刊澄清。

(11) 外國傳媒所估計的遊行人數遠遠不止此數。當時的估計是「四•二七」十萬學生遊行，「五•四」六萬學生遊行。

(12) 北京學生絕食期間，各界人士提供物質、贈送飲品、食料、照顧學生等，據當時記者採訪所知，絕大多數是自發性；學生和群眾都不知道原來「黨和政府」曾經「竭盡全力」地做了工作。

(13) 根據當時中央電視台的報道，學運期間，交通事故和搶劫事件比平時大大減少；沒有任何市民認爲「北京的社會秩序陷於一片混亂」。

(14) 「這些人」到天安門發表演說，其實是應統戰部長閻明復的邀請，勸諭學生撤離廣場；陳希同卻形容爲「進行煽動」。

(15) 「首都知識界聯合會」成立於五月廿三日，《五•一六聲明》早在該會成立前發表。

(16) 上述「造謠」事項是陳希同似是而非的「獨家消息」，根據本書編委成員在北京採訪之見聞，曾在遊行中出現道具棺材，諷刺「官倒」，但非爲了「鄧小平下台」；至於燒鄧像、燃放鞭炮等，無任何外國或港、台傳媒報道有關「消息」。

(17) 根據香港記者在軍隊入城當晚現場所見，各路口堵截軍車者均是附近居民，突然驚見軍車出現而紛紛跑出來，並無「動亂組織者」因掌握軍情而部署的跡象。

(18) 根據北高聯公布的財政報告，無顯示當時已「開始非法採購武器」，亦無外國或港、台傳媒報道這項「消息」。

(19) 「敢死隊」、「飛虎隊」等並無向香港記者揚言要「軟禁……」云云，陳希同首次「披露」有關消息。

(20) 「數千萬港幣」乃空中樓閣，香港各界捐款二千萬港元一直無法送到學生手中，至今留在香港，未知如何處理。

(21) 記者在北京採訪時只聽聞「支持李鵬」遊行者獲發獎金。至於堵軍車和打死軍人可領錢，當時無任何記者得知，此乃陳希同的「獨家消息」。

(22) 車禍死者均被送到醫院，無人可以「搶奪屍體」；北高聯曾號召「抬棺大遊行」，但結果並無抬棺，僅如平常打著旗幟遊行。

(23) 此「暴動態勢」，香港在京採訪記者無人看到，亦無任何傳媒曾作報道。六月三日學生曾在入城軍車內搜出菜刀等物，當時已送交戒嚴部隊。

(24) 由於事態急轉直下，香港記者於「六•四」之後無法正常採訪，且迫於形勢匆匆返港，因此「反革命暴徒是怎樣殘害解放軍的」全段所述情況，無法查證。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目錄
作者
圖片區
申請基金
ENG
香港記者協會 © 2010 版權所有





編後語

我們從北京回來，曾經激動、悲憤、囈語咀咒劊子手。

然後我們重投熟悉的環境，很多人修心養性，又或是鑽營、自謀出路。

中國發生的事情遠著。血淚會乾，一度震懾心靈的景象慢慢模糊起來，除了一些血腥的圖片，某些熟悉的名字，偶爾觸動我們漸趨麻木的神經。

國內仍不斷抓人整人，因為距離、封鎖，無從證實，我們寧取不信，以減輕胸口的沉重。

「看見沒有？」北京人答「沒有」。因為他們連睜眼看的自由都被褫奪了，他們唯有交換眼神。

我們都看見了，「不說白不說，說了白說了」，那麼多人被殘害壓制，人的尊嚴被踐踏淨盡，京城的人沒能吭一言。

我們坐下來，開會討論，盡量接觸曾赴京的記者，聚集了六十多個，從構思到組織，統籌定稿，在一個多月內，我們盡量兼容並包各方意見，做起來才驚覺事務繁瑣，沒完沒了。

記者工作無日無夜，有些甫回香港，不到兩天又兼程出差，大部分記者都是在公餘，不眠不休地趕撰文章、編審稿件。

學運牽涉的問題千絲萬縷，非三言兩語可涵蓋，專題及階段文章便是針對此，以小組討論，分頭整理的形式撰寫，然人多意見紛陳，需力求文思風格統一，紕漏難免，這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事實。而每一篇文章基本上只代表該文作者的觀點。起初是自發的，純粹的，為了紀錄我們見證這個大目標，然後無可避免滲入個人意氣、不同觀點的爭持——討論、通過、推翻；又討論、通過。在集體意識的大前提下，個人被湮沒，我們捺著性子，不斷互相詰疑，不斷修正，求同存異。

過程是繁瑣耗時，事倍功半，但我們都願意這樣，為了那些「不知所以然」逝去的無名者、無聲無息自人間蒸發的人。

靜坐、遊行、狂呼吶喊都停頓了，激情沉澱後，要面對赤裸裸的現實。

要追憶，重新鋪排反省那段沉痛的經歷，是很神傷的事，尤其記者都疲於日常工作。

作者大多欲藉文章向京城萬民致意，人同此心，未能盡錄個別作者的心意。來稿浩瀚，本書力求意簡言賅，部分文章不得不割愛刪節。感謝香港記者協會出版是書，書出來了，鬆一口氣，一些事情還得記協接棒。

歷史翻起波瀾，集體意識統領著個體前進，在萬籟死寂時，我們可復記起那段歷史的重荷？

但願我們的具名文章都不是答案，而是悲壯樂曲的過門，人們仍會譜誦下去，為國內不得不沉寂下來的人。

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人民不會忘記”基金 申請表格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由該書所得收入成立，供有助促進國內新聞、言論和出版自由的項目申請，歡迎申請者提交計劃書，連同項目支出預算，填妥表格，寄回香港記者協會，由"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編輯委員會負責審批。

致：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編輯委員會**

經: **香港記者協會**

電郵: hkja@hkja.org.hk

傳真: (852) 2572-7329

電話: (852) 2591-0692

……………………………………………………………………………………………

1. 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姓名：

(中文)..

(英文)..

通訊地址：..

....

電話：..

電郵：..

2. 計劃詳情

2.1 項目性質 ：..

2.2 項目名稱：..

☞ 請**附上**項目介紹大綱，並說明有關項目如何有助促進國內新聞出版及言論自由;

☞ 請**附上**計劃預算開支

注意事項:

i. 本基金不考慮申請人提出個人報酬;

ii. 項目如有收益，將全數撥歸“人民不會忘記基金”，供其他申請者使用

3. 參與人員

歡迎附上參與人員的相關資歷。

	參與者的角色	姓名	介紹
1			
2			
3			
4			
5			
6			
7			

4. 聲明及申請人須知

i) 基金及香港記者協會不涉及項目之具體操作及責任。

ii) 成功申請撥款將按項目階段批出，申請人有法律責任完成申報項目。

iii) 項目完成如有出版版權，雙方共同持有。

申請人簽署：..

申請人姓名：..

日期：..



八九民運實錄（二十周年再版）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著
香港記者協會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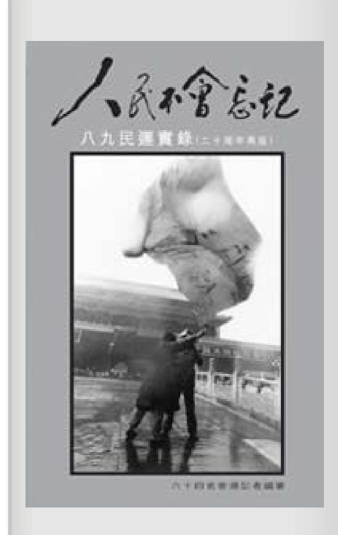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獻 給
一九八九年愛國民主運動中
奮起挺身的同胞；
無私無畏地犧牲的中國公民；
以及
仍然在苦難中不屈抗爭的鬥士。

下一頁





序

劉賓雁

還在今年五月二十一日，當美國蒙塔納大學的曼斯斐爾德中心的中國問題討論會開會那天，我和一位美國著名漢學家就不約而同地想到並且講到：從今以後，中國再也不復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國了。我還多說了一句：中國共產黨再也不復是四月以前的那個共產黨了。

那是李鵬政府發布在北京實行戒嚴令的第二天。我當時所指，並非這個戒嚴令，而是那場波瀾壯闊、震撼全中國的學生運動將要帶來的影響。

這場學生運動，我期望已久。記得胡耀邦逝世那一天，我在紐約和幾位友人曾討論過胡的逝世會不會成為又一場學生運動的契機，多數人的意見認為大概不會；即使北京大學的學生上了街，也會走不到天安門廣場就被軍警驅散了。我的意見稍有不同，因為我始終認為中國人（包括大學生）一九八七年以來的那種悲觀、消極、沮喪情緒，僅僅是表層現象，在這個表層之下，掩蓋著中國人民前所未有的旺盛活力。然而縱然如此，當時的我也僅僅認為學生們會上街而已，根本未曾想到四月十五日那個早晨，一個中國歷史的轉捩點正在醞釀，即將到來。

而在第二天，當我接受ABC「夜線」電視採訪時，我就做出了一個錯誤估計：李鵬政府將在二、三天內倒台。本來，從一九八五年年初起，我就不再認為中國黨政領導人的人事變動有多大意義了。因而，那一天我回答
Ted Koppel 的問題時，本應這樣說：無論李鵬或趙紫陽的官運沉浮，對於中國都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因為決定中國歷史走向與速度的，再也不是中共高層的一個人或幾個人，而是遍及中國的那個由廣大民眾自發推動的歷史變革進程了。

然而決定發動血腥大鎮壓的，畢竟是鄧小平個人，或者說，是由不超過十人組成的那個老人集團。這個事實又怎樣解釋呢？我的回答是：從四月十七日開始的那個重大歷史性事件，主動的一方仍然是以學生為首的人民；鄧小平的屠殺，既不能取消，也不能扼殺這場歷史性民主運動，而只不過是改變了它以後發展的形式。即使沒有這場屠殺造成的暫時挫折，比如說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們提出的某些要求得到了滿足，以後的發展也不會很順利；它還會因自身的和中國社會條件的不夠成熟而遭到另一種挫折。北京因大屠殺一方面使民主運動受到摧殘，使中國暫時沉寂，但它同時也進一步激化了引發此次學生運動的那些社會矛盾，使中國共產黨所面對的種種危機更加嚴重，要繼續維持其統治也更加困難了。

在短短一個多月中，北京的民主運動竟幾次出現出人意外的戲劇性變化，使最熟悉中國情況的人也驚訝得目瞪口呆：先是學生們顯示出來的壯烈的鬥爭精神；繼之是北京市民和黨政各級官員的廣泛捲入；接下來是實行軍事戒嚴的決定，而戒嚴對於北京又不發生任何作用；最後便是震驚世界的大屠殺。

所有上述出人意外的事件，其動因無疑早已潛在。就連戒嚴令和大屠殺都發生在學運已趨退潮、政府與學生之間可以達成妥協之時，以及鄧小平集團失去理性與人性而最終決定瘋狂屠殺，也並不是偶然現象。四月以來發生在中國的事件，又一次證明了四十年來中國社會的一個獨特性，即這個社會中的許多矛盾都常常是隱性的，即使長期處身其中的人，也很難察覺。因而，不僅一般中國人和外國的漢學家容易受到迷惑，就是中共領導人本身也常常受騙。

社會矛盾長期隱而不現，原因之一就是新聞的封鎖。這一次大陸的民主運動，最有力地證明了新聞自由對於中國大陸社會進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有一個非常重要、但極易被人忽略的事實，就是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共領導集團儘管提出「撥亂反正」的方針，也平反了許多冤假錯案，但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往往也就是中共執政以來的過失與罪行）的真相仍然諱莫如深；自己不說，也不准別人去說，甚至連文化大革命這種並不需今日當權者直接承擔責任、他們本身還自稱是受其「迫害」的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也至今還對人民隱瞞著。他們口裏說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卻又不准人家來揭示文革的真相。嚴家其夫婦的一本十分溫和的《文革十年史》竟然也要遭禁，巴金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的主張竟然惹惱許多老人，其中一個居然發狂利用文革時期詆譭巴金的同樣語言──
「反共老手」、「無政府主義者」來咒罵巴金，由此可以想見這些人自知，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

革十年與文革後這些年的三個歷史時期的統治者，實際上都屬於同一集團，差別只不過是統治的方法與其謬誤的程度而已；也就是說，他們知道自己和他們口頭上咒罵的四人幫，本質上屬於同類，因而若是真正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然會否定他們自己。因而，他們不會把文革的真相洩露給人民。由於同一個原因，除胡耀邦這樣個別的例外，這些人也從不肯擴大新聞自由。一個新聞法制訂了六年之久，依然不見蹤影，而蘇聯共產黨則於一九八五年剛剛開始改革，便實行了Glasnost，允許官方報刊自由化！

中共從未考慮過允許新聞自由，而大陸報刊實際上所享有的自由，卻有所擴大，特別是一九八六年以後更是如此。這是大陸新聞界與知識界甘冒風險、長期鬥爭的結果，也是中共領導集團對於中國社會的控制逐漸削弱的結果。北京新聞界在這一次民主運動中最先走上街頭同學生相匯合，並勇敢地擺脫了官方控制，走出政治牢籠，使今年五月間北京的許多全國性報紙一度享有四十年所未有的自由，首次真實地大量報道一個重大政治事件，給中國新聞史掀開了新的一頁。

中國人是過於寬容也過於輕信了，以致久久未能識破鄧小平集團在本質上同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並沒有什麼區別。這就是連最尖刻的觀察者也未能逆料會發生血洗北京城的原因！善良的中國人總是認為他們也會像常人一樣，看到四十年來中國人付出的犧牲和代價已經太多，中共的失誤使中國喪失的歷史良機已經太多，因而不至於再走老路了；總以為至少鄧小平本人同那些頑固分子還有所不同，從而可以寄予希望。鎮壓西單民主牆和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尚未能使人們警醒；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七年的三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仍然不足以使多數人覺悟；允諾整黨而事實上放縱腐敗之風染遍全國，越演越烈，直至使一個新的官僚資本集團誕生、舊的官僚特權階層繼續膨脹，危及城鄉人民生活，仍然只能使多數人把怨恨與憤怒指向貪官污吏，對於中共高層領導的不滿仍未能消除對他們的幻想與希望。天安門的鮮血和繼之而來的瘋狂大逮捕與槍殺，固然洗亮了很多中國人的眼睛，但顯然，中國人為獲得充分的覺醒而必須付出的代價，仍然沒有付完。

然而畢竟出現了一個新的現實。中國人忽然發現：怎麼一夜之間，中國竟變得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那麼相似，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呢？文革時期也曾有過屠殺和逮捕，然而那並不是毛澤東或中央政府下令執行的，甚至並非出於他的本意。毛澤東的理論和個人魅力，曾使億萬人狂熱、自覺自願地投入那場自我迫害、自我殘殺，而現在則全然相反，是幾個人的意志使中國大陸變成一個恐怖世界！四十年來中國人向來是只能靠中共的一次次失誤而一步步走向覺醒。這一次，鄧小平集團的血淋淋的罪惡，將使他們最終識破這一小撮人的真實面目，放棄最後一絲幻想。

這是極其可悲的，然而又是一個不能不接受的現實。一個已然腐朽、脆弱到必須以恫嚇人民來維持其存在的統治集團，竟然還必須由飽受憂患的人民付出數以萬計的頭顱，來換取它的滅亡！

這同時又是一個必須以更卑劣的欺騙來維持其統治的集團。經過十年文革與十年改革，這種欺騙已經很難奏效。它要掩蓋的現實和企圖顛倒的是非又是如此昭然醒目。誠然，強大的宣傳機器伴之以極端的恐怖，仍然會使相當數量的國人被迷惑。然而那些導致天安門事件的種種危機卻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時無地不目睹、耳聞、身受、心知的；這些危機已無法掩蓋，還必定繼續惡化。因而，不須中國所有人都獲悉血洗天安門的真相，天安門廣場上的火炬就會在許許多多中國人的心中燃起。

四月以來中國發生了一起又一起「四十年所未有」的現象。中國人的奮起抗爭和中共當局的殘暴鎮壓與屠殺能在頃刻之間傳遍全世界，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這本書中，讀者看到的是香港記者所採寫的報道。為了在北京採訪這次民主運動，這些年輕的記者，純然是出於新聞工作者的道義責任感和一片愛國之心，不畏千辛萬苦，甘冒生命危險，為這場中華優秀兒女驚天地、動鬼神的壯烈鬥爭和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黑暗勢力對於手無寸鐵的人民所進行的二十世紀以來空前殘酷的鎮壓，寫下了真實的紀錄。作為一個從事新聞工作多年的記者，我為這些年輕人感到驕傲。這些報道，對於喚起香港同胞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支援國內民主運動和抗議中共當局血腥鎮壓的運動，無疑是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而，我們可以把這部書看作重要的歷史文獻。

嗜血者的瘋狂捕殺仍在繼續。中國大陸正在經歷一個近百年歷史上罕見的黑暗時代。然而人民的鬥爭並未停止，只不過轉入了另一種形式。今後數年乃至十數年，那裏仍將是世界注目的中心，仍將是出新聞最多的地方。我相信這部書的許多作者將繼續到大陸採訪，無疑令人悲痛、喜悅與震撼的報道，將從他們筆下流向香港，流向全世界。

中國是一個極其獨特的國家，它走向民主化的歷程也將是獨特的。同時，中國問題又是十分複雜的。我期望年輕的記者朋友們將以這部書中的報道為起點，繼續觀察、思考中國大陸的現實和研究它四十年來的歷史。香港的讀者已經變了，他們將更加渴望了解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中國的出路在那裏。因而，香港記者們肩上的責任將會更重，而他們對於香港的未來所發生的影響，也必將與日俱增。我祝願他們在自己的征途中將一往無前，成果纍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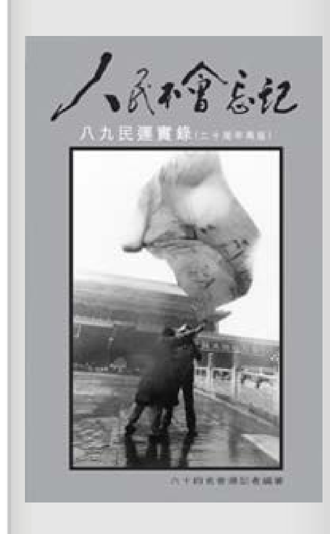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於香港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編者序

編輯委員會



新聞工作具挑戰性的日子通常都在大時代，但是，大時代又往往是不幸的。太平盛世，沒有歷史，沒有什麼歷史責任，也沒有人要為歷史去見證些什麼。

今天，悲劇的降臨，醜惡的嘴臉，已不容記者不走上歷史審判庭的證人台。

四月至六月間大批香港記者第一身採訪了波瀾壯闊的全民運動，記者與學生和市民一起呼吸，感到國人氣息相通，悲樂與共。從運動的規模、秩序、克制、和平，大家都相信國民的醒覺和行動已為中華民族刷出新一頁的史章。但想不到人民共和國政府竟以坦克槍砲埋葬了這場震動寰宇的和平運動；以謊言假象扭曲運動的愛國、民主、和平的本質；以刑場牢獄關閉人民的嘴巴。

親歷其中，耳聞目見的事實，難道可以讓人恣意歪曲，無中生有，指鹿為馬?

曾經採訪過民運的記者自京返港後都懷著同一個願望：把真相告訴國人，告訴世人。北京學生和市民冒死保護香港記者脫險，為的也是如此。故此，我們六十多名記者走在一起，出版這本書，如實地、完整地紀錄我們經歷過和採訪到的事實。

世人論功過，歷史判春秋。只有如實記載，世人和後人才有分析的資料與評論的基礎。不過，為著公允也須一提，在如此激盪人心的運動中，流著同樣熱血的記者，主觀思想和感情時刻都受牽動，儘管事後下筆力盡克制，一些文章字裏行間還免不了流露筆者同情學運，譴責專制的傾向。

全書分為五個主要部分，力求縱橫並重。學運始末和事態發展構成本書內容的縱軸，也是本書的第一章。此章把學運分為七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溯及胡耀邦逝世前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人心思潮、校園情況，然後以胡耀邦逝世、《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學生絕食、戒嚴令、屠城為階段的分水嶺，直至中共四中全會結束為止。為了呈現具代表性和重要的事件，每一個階段都配以數篇特寫報道。

第二章的人物特寫，是要描畫出民運中一些重要領袖人物的性格和思想，讓人了解他們投入運動的目的和作用。事件和人物這兩類特寫遂成為一個個的橫切片斷，立體地呈現出民運的面貌。

還有一些事件貫穿整個學運過程，例如學生自治組織的誕生和演變、中共對付學運的手法、知識分子的角色，香港支援對民運的影響、大陸各地的響應、中共高層黨爭等，都值得深入報道，這些專題文章組成本書第三章。

國內和香港兩地的新聞界對學運都產生了或正或反的作用。戒嚴後實施的新聞封鎖，使新聞採訪工作儼然與中共官方對立。但期間國內新聞界短暫掙脫官方箝制，香港記者突破新聞封鎖的事蹟都足以在新聞史上記上一筆。這一筆就在本書的第四章。

第五章是官方和民間在學運期間發佈的重要宣言、文件和講話，以助讀者更深入了解。

儘管我們力求全面、中肯、如實，但亦感到本書有很多局限和不足之處。客觀方面，事態火速發展，大陸政治的不透明、戒嚴後的新聞封鎖和香港記者撤離北京，部分採訪難以深入發掘，反覆核實。因此整體來說，本書偏向較多紀錄學生和民間的活動，中共高層的鬥爭，幹部內部情緒和軍事調動則較單薄。

另外，記者的經驗、閱歷、知識、和採訪時的後勤支援都有限。最能說明問題的現象是這次赴京的記者，一些入行只有數月，一些則鮮有外地採訪經驗，馳騁十載的記者則如鳳毛麟角，要面對和處理這樣震撼中外、錯綜複雜的世界級新聞，頗感吃力。加上隸屬不同而互相競爭的媒介，不免出現一些資料空白。

中國過去百多年的歷史充滿苦難和不幸，老百姓沒過多少好日子。時代的巨輪有些時候像是煞住了，有時還後退。今天的改革開放，有多少清末維新的色彩，七十年前五四運動揭櫫的民主和科學精神，目下又不是同樣匱乏？一九四七年國民黨武力鎮壓「反饑餓、反內戰」的請願學生，又何別於當前的劊子手？現在主宰萬民的江澤民、喬石、姚依林、宋平，何嘗不是昔日的學運領袖。

國家前進，舉步維艱，究竟華夏子孫吸收了多少慘痛經驗？中國人難道真的如劉賓雁先生在序言中說「過於寬容、也過於輕信」?「中國人為獲得充分的覺醒而必須付出的代價，仍然沒有付完」嗎?

我們感謝劉先生的序言，劉先生是我們的前輩，一位長期堅持揭露社會問題的前《人民日報》記者，也是今次學運後官方清算的受害者。他為本書作序，使我們感到與國內多難的同業一同呼吸。

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讓此書送歷史判官作呈堂證供；讓國人反省思索，後人鑑古知新；也為「五四」七十周年祭，奉上一份獻品。

為使歷史真相玲瓏呈現，更多的資料得見光明，本書收入將用於支持國內爭取新聞和出版自由。

一九八九年七月卅一日





工作人員名單

編輯委員會	
邱誠武 范卓雲 馬妙華 陳寶珣 梁家權 張結鳳 楊健興 黎佩兒 陳木南（圖片編輯）	
參與者	
陳杰文 翁惠玲 陳木南	大公報
陳建平 陳玉華 黃勤帶 葉英傑 劉銳紹	文匯報
梁淑英 崔麗容	天天日報
張結鳳	百姓半月刊
廖美香	成報
林靜潔 梁耀榮 蔡秀霞 顏婷	快報
黎錫勳 羅國威	東方日報
李念慈 林翠芬 陳天權 黃漢軍 曾偉珍	明報
潘潔	亞洲週刊
徐佩瑩 梁宙然 陳潤芝 謝志峰	亞洲電視
邱誠武 范卓雲 馬妙華 梁美芬 梁錦雄 張永翔 楊慧敏 鄭偉鳴 譚衛兒	英文虎報
老冠祥 冼偉強 梁慧珉 蔡淑芳	星島日／晚報
盧永雄	信報
鄧祥兒	香港電台
蔡詠梅	香港時報
何安達 李婉貞 林和立 楊健興	南華早報
何展鵬 徐忠明 陳慧兒 張志剛 楊明龍 謝彩雲	無線電視
彭士雄	華僑日報
麥燕庭 張炳玲	新報
司徒元 陳少強 梁家權	新晚報
黃慧日 羅綺萍	經濟日報
陳寶珣 黎佩兒	自由撰稿人

（參與者全部以個人身份參加，不代表所屬機構。後列傳媒爲1989年學運採訪期間記者所屬機構）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鳴謝

劉賓雁

天主教社會傳播處

夏其龍神父

亞洲週刊

劉大北

何 苦

莫綺華

黃蕙瑜

何青青

王敏勤

盧愛玲

魏派賢

李志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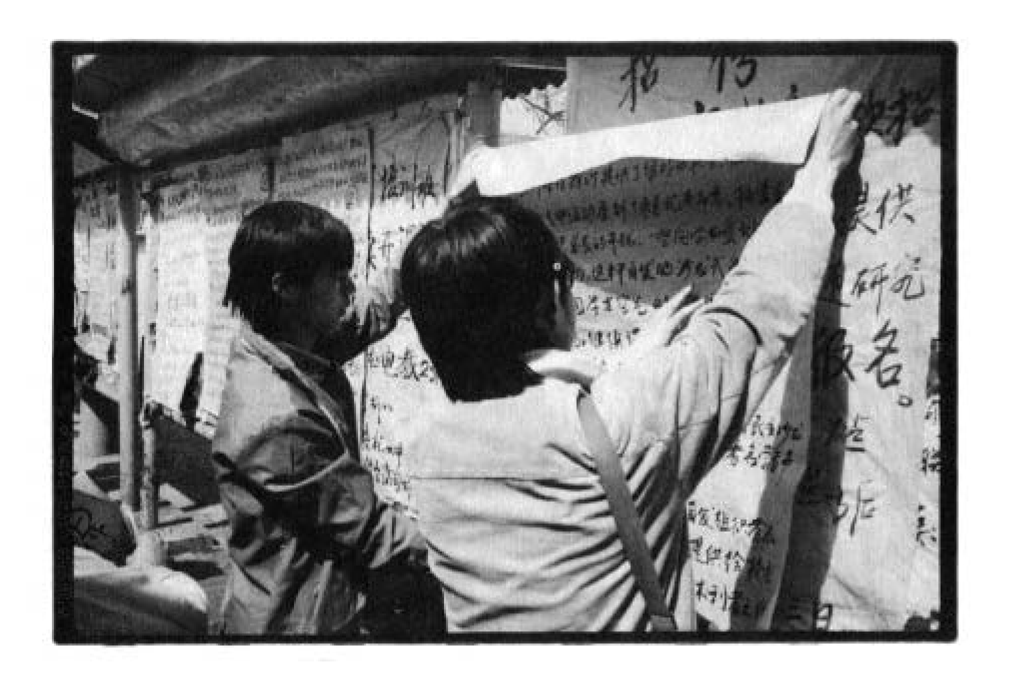
張煥聘

鄭美娟

李月華

及其他協助本書出版的人士

上一頁 返回頁首




國家兴亡
匹夫有责!!!


奠
邦同志


冤！冤！！一万冤……!!!


邦不朽民主万岁


中央美院敬挽
何处招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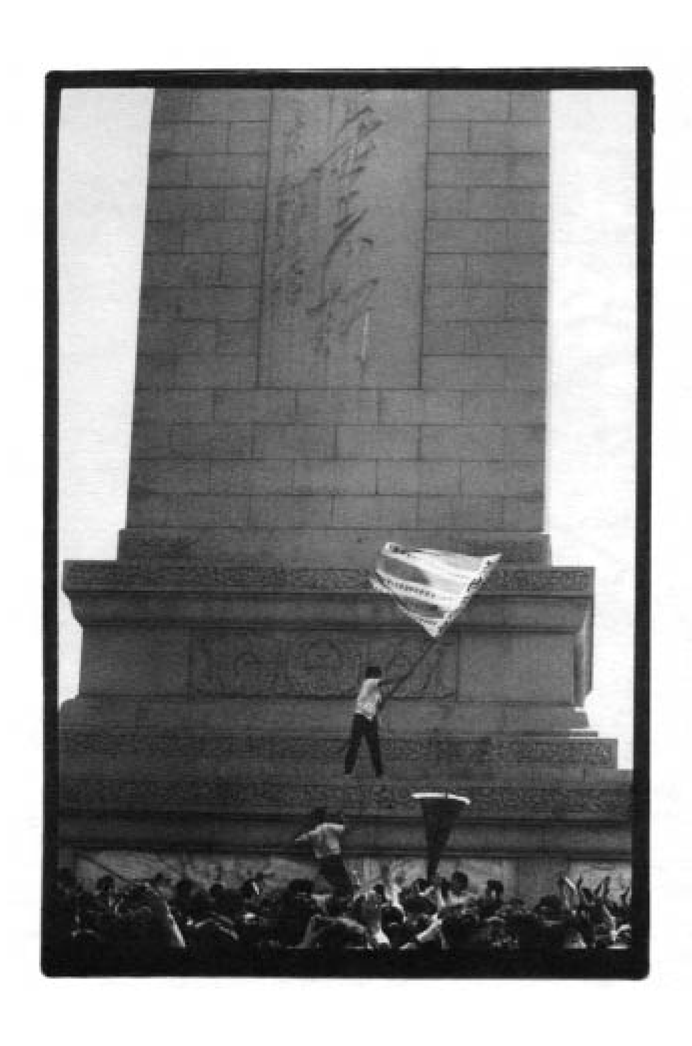





紧急呼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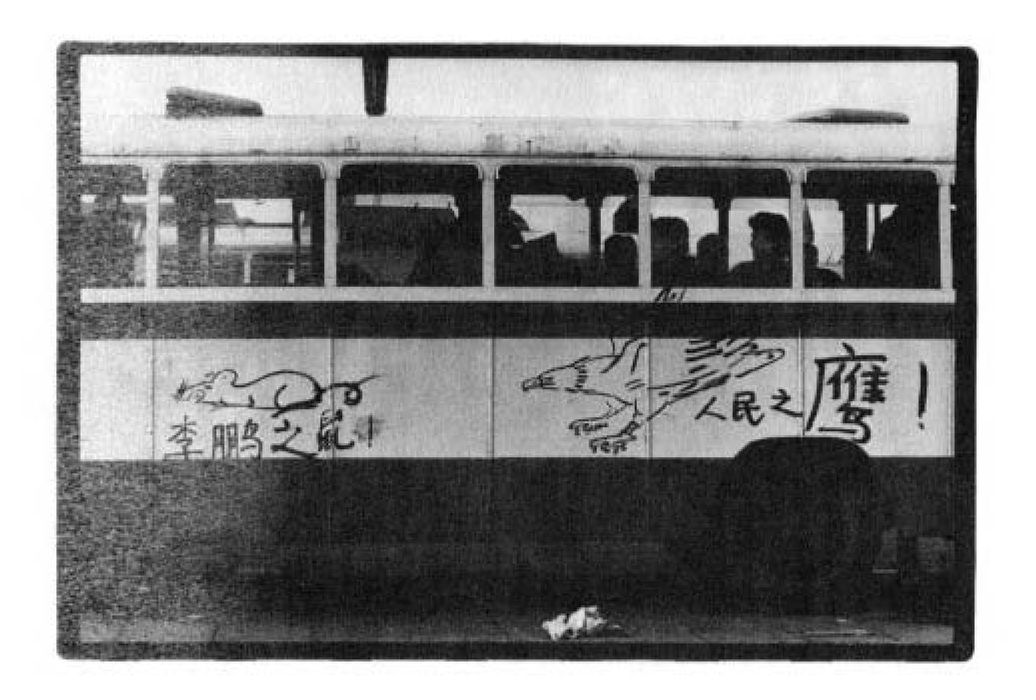



絕食


人大·推
别无
们
一小撮
就


饿你两天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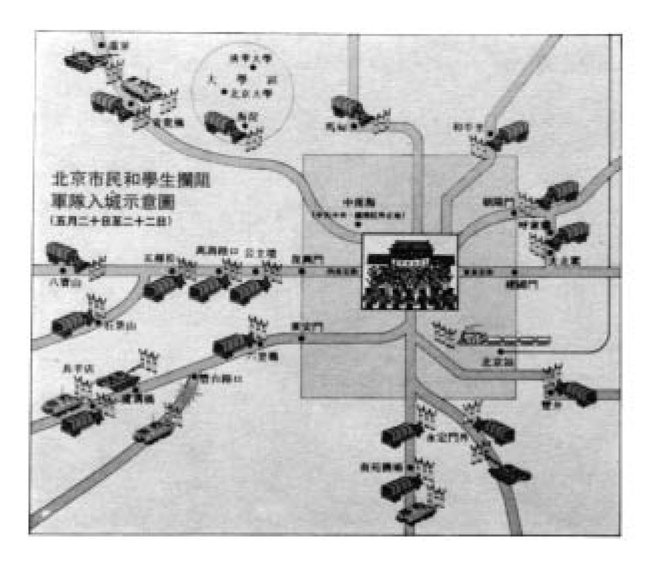

李鹏之鼠
人民之鹰！


中共中央党校师
建立民主国
铲除封建
ДЕМОКРАТИЯ—НАША ОБЩА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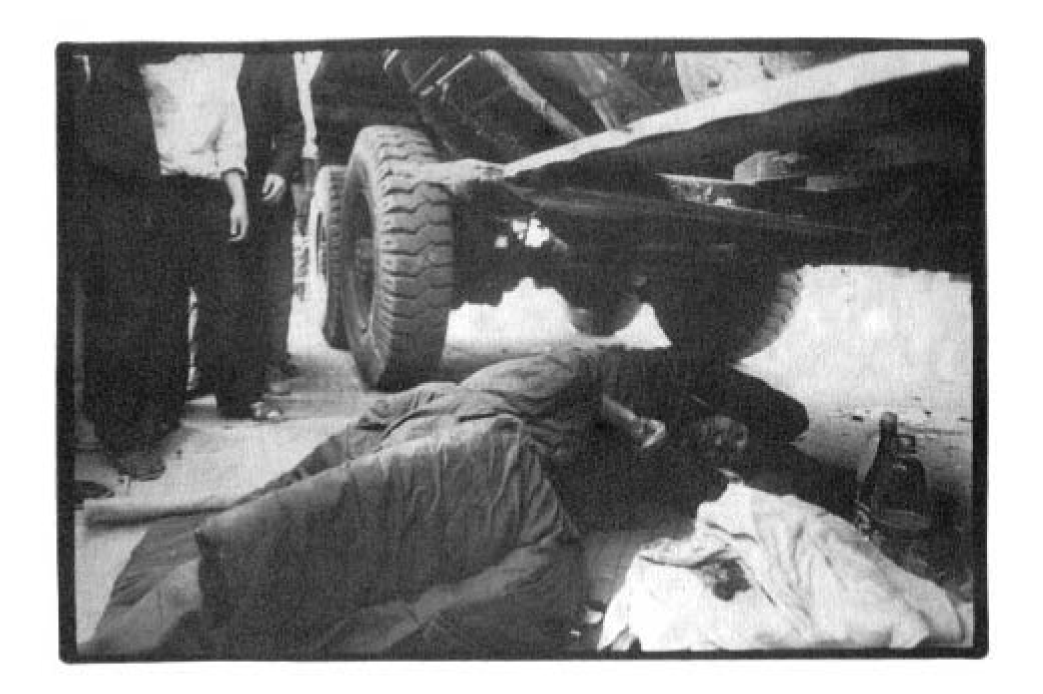

人民警察愛人民




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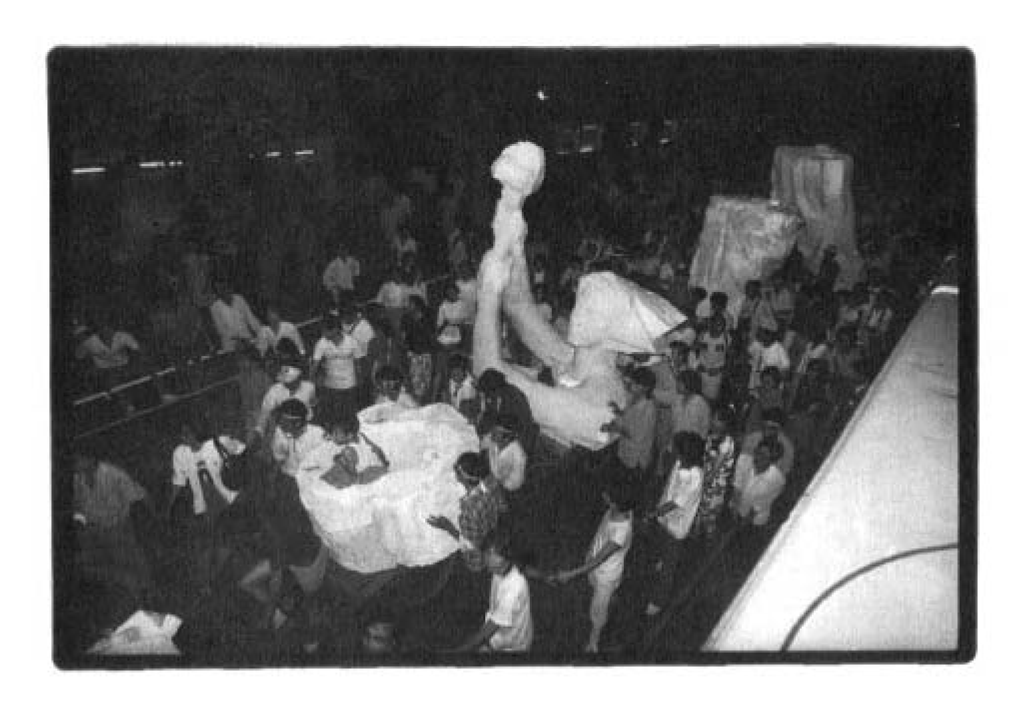

北京市民和學生攔阻
軍隊入城示意圖
（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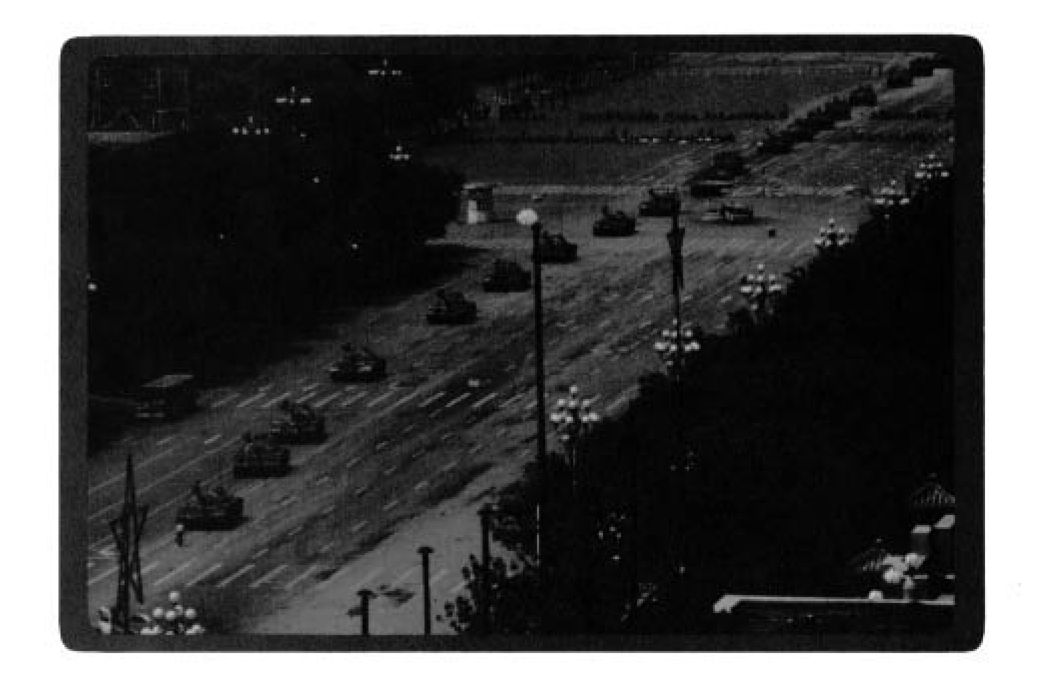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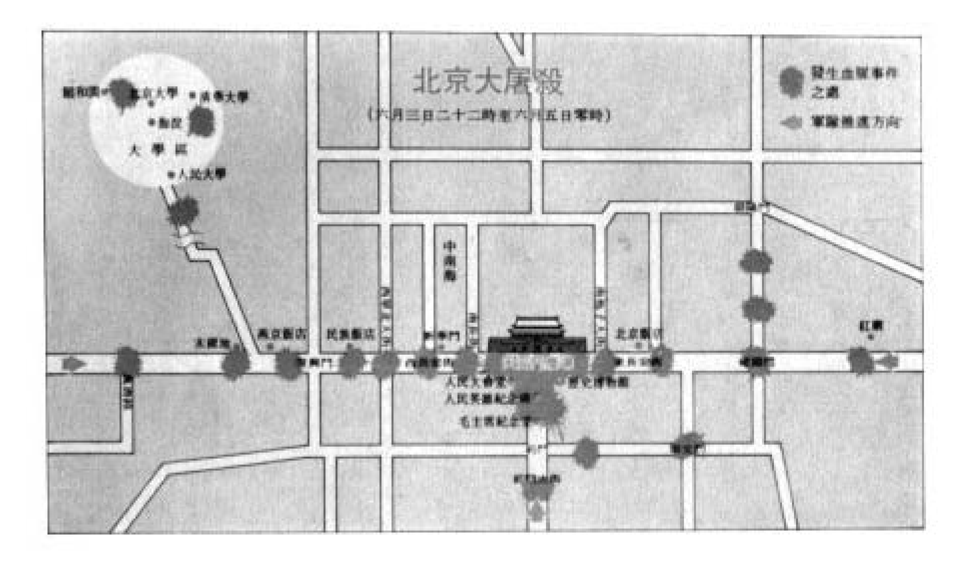

中文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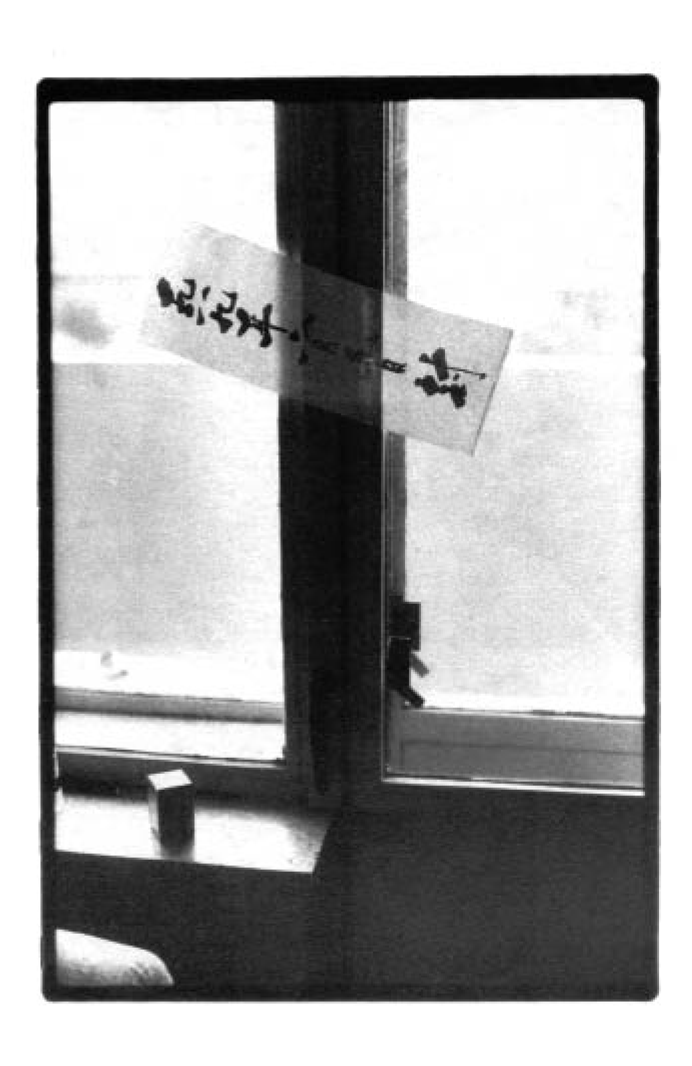

北京大屠殺
（六月三日二十二時至六月五日零時）
發生血腥事件之處
軍隊推進方向
清華大學
海淀
大學區
人民大學
中南海
民族飯店
北京飯店
人民大會堂
歷史博物館
人民英雄紀念碑
毛主席紀念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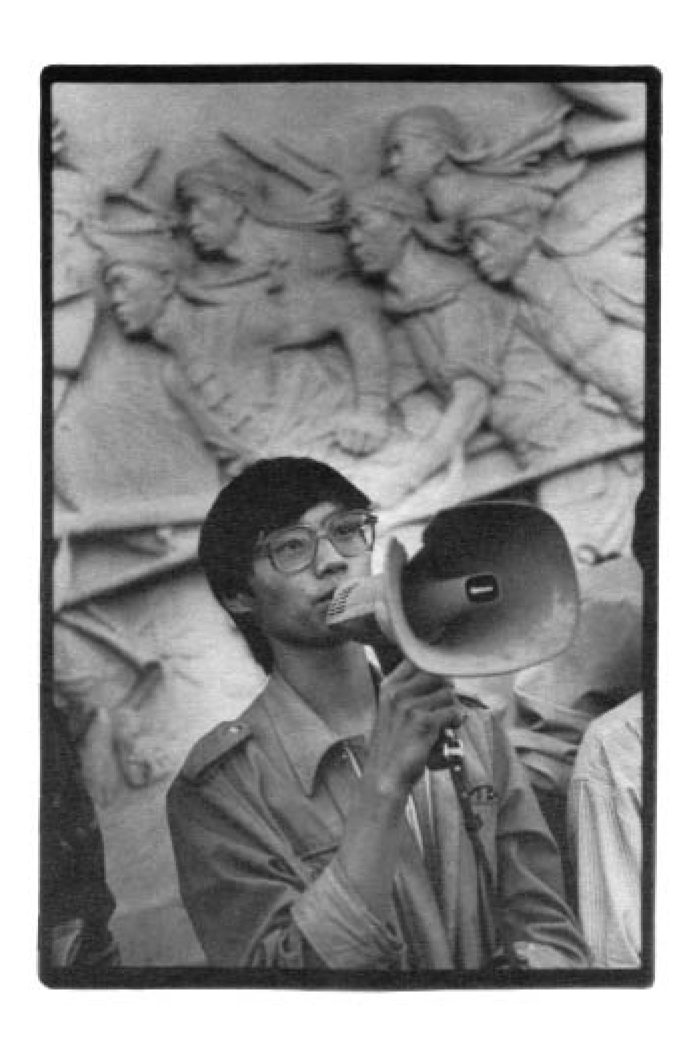



0．6月4日5时30分，戒严部队于天安门广



・在发生反革命暴乱期间，有３００多辆军车
分子烧毁。






























共中央党校师
鏟除封建
建立民主
民主


鲁迅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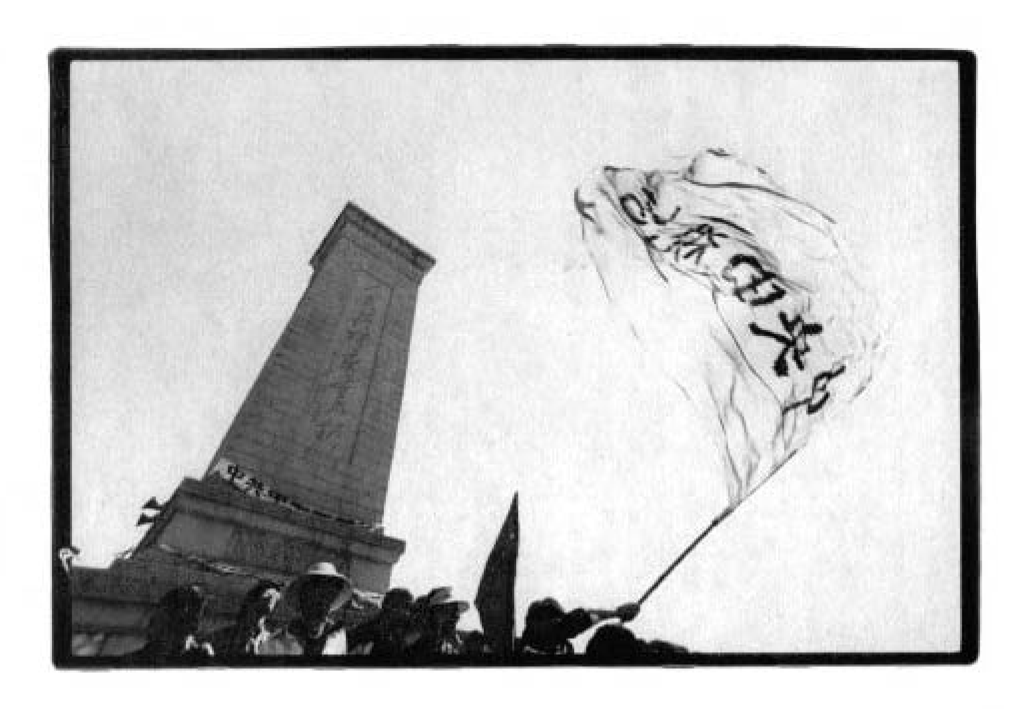





中共中




席捲各大城市風暴
發生遊行
示威的城市
哈爾濱
長春
瀋陽
北京
天津
太原
蘭州
石家莊
西安
濟南
青島
合肥
南京
成都
武漢
上海
重慶
杭州
南昌
長沙
福州
貴陽
昆明
桂林
廈門
廣州
深圳
珠海
香港
澳門
海口




旗帜鲜明
反对426社论

「北高聯」七項要求



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四月二十八日的七點要求及五月一日關於七點要求的具體化條款。

一、公正客觀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具體化條款：對胡耀邦忽然離職作出公開解釋。）

二、重新公正，客觀評論報道這次學運；（具體化條款：查處北京市委製造動亂的行為，成立專門調查小組，調查此事事件始末。我們將這次學生運動稱為「四月愛國民主運動」。）

三、維護憲法；（具體化條款：懲處「四二ｏ」打人事件的直接責任者。）

四、反貪污、反腐敗，鏟除官倒；（具體化條款：康華問題。）

五、盡快制定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具體化條款：公開向全國政協委員徐四民發出回大陸辦私人報紙的邀請。）

六、糾正十年來最大失誤，提高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具體化條款：公布政協三個調查小組對北京高校教育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並繼續派出調查組，調查中學狀況，公開調查結果。）

七、檢討政府重大政策性失誤。（具體化條款：由政府出面，組成專家論政小組，政府提供一切必須資料，分析去年通脹原因。）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北高聯」是北京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簡稱。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